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英] 布赖恩·特纳 编
李康 译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

第2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本书系《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的第二版，在广受赞誉的第一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章，分别介绍社会理论的基础、人类学、现象学以及身体社会学。第一版保留下来的章节也作了修订、扩充与更新。讨论女性主义的篇幅则增加到了两章，添加了关于第二波女性主义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内容。

本书以理论主题而非理论家为组织线索，收录了世界第一流的社会理论家们所撰写的 18 篇文章，不论是对于当代社会理论的重大争论与发展趋势，还是有关经典社会思想的各路传统，都有深刻的见解。而范围广泛的书目也为了了解目前通行的研究文献提供了导引。

● 这是一部从经典时代一直到后现代时期的社会理论的上佳文选。它使读者一方面紧跟最新潮流，同时也没有放弃将社会、政治、文化、性别与种族维系在一起的那些基础论题。每一篇文章的作者都为我们精心提供了对于所探讨主题的非信实的阐述，以及弥足珍贵的书目导引。

——约翰·奥尼尔 (John O'Neill)，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

● 这部修订版的指南让读者倍感亲切，贯彻了鲜明的主题——布赖恩·特纳值得称道地驳斥了他所说的“华而不实的理论”，也就是已经沦为以自身为目的的文化理论。他敦促我们回到关于社会人类学与身体的新章节所体现的那种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

——雷伊·帕尔 (Ray Pahl)，美国俄亥俄肯特大学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ISBN 7-208-04669-7



9 787208 046696 >

定价：68.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英] 布赖恩·特纳 编
李康 译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

第2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英)特纳(Turner, B. S)主编;李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书名原文: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ISBN 7-208-04669-7

I. B... II. ①特...②李... III. 社会学—理论研究—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692 号

Copyright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2000 editorial int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copyright © Bryan S. Turner 1996, 2000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ac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符永卫 张 婷



世纪文景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

[英]布赖恩·特纳 主编 李 康 译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康中路 193 号 www.evsen.cc)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4.5

字 数 822,000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4669-7/C·158

定 价 68.00 元

德朗蒂 (Gerard Delanty)

利物浦大学的社会学高级讲师
《欧洲社会理论杂志》主编

奥斯怀特 (William Outhwaite)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欧洲研究院社会学教授

柯亨 (Ira J. Cohen)

美国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新不伦瑞克校区研究生院社会学教授

莱赫纳 (Frank J. Lechner)

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埃利奥特 (Anthony Elliott)

西英格兰大学社会学教授

博伊恩 (Roy Boyne)

达勒姆大学社会学教授

普鲁默 (Ken Plummer)

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

阿贝尔 (Peter Abell)

伦敦经济学院跨学科管理学研究所所长

法比昂 (James D. Faubion)

赖斯大学人类学副教授

维特库斯 (Steven Vaitkus)

在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社会理论、社会现象学与东欧研究

洛维尔 (Terry Lovell)

英国沃里克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

康诺尔 (Steven Connor)

伦敦伯克贝克学院现代文学与理论教授，文化与人文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

曼达利奥 (John Mandaliolis)

格里菲斯大学讲师

厄里 (John Urry)

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斯马特 (Barry Smart)

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社会学教授

特纳 (Bryan S. Yurner)

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

卡尔霍恩 (Craig Calhoun)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校区社会学兼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目录 contents

第一版序	1
第二版序	20
致 谢	26
第一编 基础	29
第 1 章 社会理论的基础:起源与流变	31
第 2 章 社会科学的哲学	59
第二编 行动、行动者、系统	89
第 3 章 关于行动与实践的各种理论	91
第 4 章 系统理论与功能主义	137
第 5 章 精神分析与社会理论	161
第 6 章 结构主义	192
第三编 社会分析与文化分析视角种种	231
第 7 章 20 世纪的符号互动论	233
第 8 章 社会学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	271
第 9 章 人类学与社会理论	298
第 10 章 现象学与社会理论	331
第 11 章 第二波女性主义	364
第 12 章 已转型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396
第 13 章 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科学	430
第四编 时间与空间视角种种	471
第 14 章 历史社会学	473
第 15 章 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	504

目 录

contents

- 537 第五编 社会理论的当代发展
- 539 第 16 章 后现代社会理论
- 577 第 17 章 普通身体社会学概述
-
- 601 第六编 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
- 603 第 18 章 社会理论与公共领域
-
- 650 附录一 中外人名对照
- 661 附录二 中外术语对照
- 682 附录三 外中术语对照
- 702 译者说明

第一版序*



布赖恩·S. 特纳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旨在为普通读者了解社会理论中的重大发展提供综合全面、紧扣时代的介绍。它是一部独具 20 世纪特色的社会理论导引,注重社会理论最近所面临的种种发展、变迁和论题。因此,它不是经典社会理论的复述,并不打算再来通览一番经典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的那些创始人。诸如此类的复述大多千篇一律,只会事倍功半。当然,也还是有令人信服的观点,要为经典社会理论辩护并作进一步的深入阐发 (Alexander, 1982)。不管怎么说,本《指南》中有学者尝试证明:从社会理论的经典作品到它的当代论题,其间确实是一脉相承。但这样的证明与陈词滥调地捍卫经典社会理论颇有些不同,而后者正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入门教材的通病。只有第一章是在有意识地概述经典社会理论。如果不对社会理论的历史源起和经典基础有所把握,就很难理解当代的社会理论。德朗蒂撰写的这一章提供了一些新颖的思路来切入这项主题。

在本《指南》中,经典社会理论家还会在许多不同场合出现,在那些地方,他们对社会理论中最具当代特色的发展依然保持着重大的意义。例如,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构筑,韦伯的行动社会学显然就具有直接的关联。与此类似,齐美尔有关文化的种种具体实践和形式的分析,依然深深影响着现代文化研究,实际上还深深影响着后现代文化分析的兴起。博伊恩也注意到了涂尔干对于结构主义社会理论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说,《指南》的重点还是社会思想在当代的发展。

我们选择了“社会理论”这个用语,而不是更专门地指称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或者是政治理论,这也表明了《指南》所涉之广泛。社会理论涵括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社会范畴 (the social) 的性质的总体上的关注。因此,《指南》所提供的是对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理论的一般性引介,涵盖了政治理论、社会学、女性主义和文化分析。每一章都力求概览在 20 世纪主导理论争论的那些主要的论题、视角和主题。

* 在第二版中放在第二版序与致谢之后,中译本调整到前面。经与 1996 年第一版序言对照,已略有修改。——译者注



尽管如此,这部文选的题目本身就表明了一些特定的关怀。显然,《指南》把理论的建构、批判和积累视为社会科学中的主要活动。本书中的一些章节,尤其是奥斯怀特关于社会科学哲学的一章,点出了理论在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的独特意义。总的来说,自然科学对哲学和理论的成长兴趣相对较小,而在社会学中,理论思辨的地位却始终相当显赫。我们将会看到,对于理论的这种关怀,与作为一项主题出现的社会范畴那令人难下定论的性质息息相关。《指南》也关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理论传统的连续性。我稍后还会回过来谈作为成功理论之具体目标的理论积累的话题,不过在此我要指出,社会理论中的一些视角在维持其分析历经整个 20 世纪的连续性方面是比较失败的。

本《指南》努力探求这些具有重大分析意义的宽泛问题,尽可能避免××社会学或××社会学之类的文章或争论。《指南》的章节关注的都是宽泛的分析视角与论题,而不是集中于特定领域或主题的社会学。在这一点上,厄里有关时间与空间社会学的分析算是一个主要的例外。尽管如此,这特别的一章也完全可以称作“社会科学中的时间分析与空间分析”,而所谓空间社会学的主题才是一种更精确地界定论题的方式。《指南》提供给读者的,是简要地通览各项主题与论题,而不是一些学科专门领域。

本《指南》试图在所涵盖的论题上做到全面,但它不可避免会有所选择,而且这种取舍也是必要的。例如,我选入了一章通论人类学对社会理论的贡献,因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许多方面转变了我们对于有关意义的分析中一些哲学问题的理解。而出于类似的一系列理由,《指南》之由于篇幅所限而未能收入关于经济学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相互作用的更深层的讨论,也就很让人遗憾了。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关于行动的理论,业已深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性问题的形塑(Holton and Turner, 1986)。阿贝尔在其有关理性选择理论的全面分析中,间接论及了这项主题。《指南》也确实收入了埃利奥特撰写的介绍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章,因为对于女性主义理论、文化分析、政治学研究乃至整体上的社会理论,精神分析理论都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如果不纳入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种种发展的分析,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到拉康乃至更宽泛意义上的后弗洛伊德理论家,就很难书写 20 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

最后,我们或许还要指出,本书是一部社会理论指南而非社会理论家指南。大体而言,有关具体的社会理论家的文献难以胜数,而《指南》却力求为社会理论本身提供一种导引。这种面向主题的研究途径,本质上就比只关注特定的人物更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后者往往流于某种形式的社会学圣人列传。无论如何,从社会学的途径来研究知识,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理论是一种集体性的建构,以回应

在理解社会生活时出现的种种共享的问题和机遇。

1. 社会范畴的性质

在这篇序言里,我大体上关注两个颇为显见的话题,即社会范畴的性质是什么?理论的性质是什么?在本《指南》中,有一项宽泛的主题贯穿始终,所有章节的作者都试图探讨社会范畴的性质,只不过常常以间接的方式。在19世纪的科学争论中,社会范畴常常以与自然或自然范畴(the natural)截然相对的面目出现。社会变迁业已转变了人类所处的自然条件,抑或说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自然的状态与社会的状态殊为不同。在经典社会学中,学者们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或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扩散,社会范畴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或维度逐渐分离。现代工业社会不是一种自然共同体,因为它应对各种需要、满足各种需求的方式是彻底革命的,是独一无二的。而自然共同体则受制于传统,受制于满足需求与需要的传统形式或习俗形式。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时指出,在市民社会中,需求的生产和满足这两个方面,资本主义都创造出了一场革命。从某些方面来看,当代工业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人为创设的经济。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bourgeois society)这一传统的启蒙观念当中,演化出社会维度的观念,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独特、专门的产物。同样,也有一种观念认为,社会学是19世纪发展出来的一门独具特色的学科,旨在分析这种新现象,即社会范畴构成的一个自成一体的自主世界。鲁宾逊这个形象让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迷恋不已,因为他正站在土人的自然世界与新型经济之间的道德边界上。

在社会学理论中,这种社会范畴观念表现在滕尼斯的一对著名区分上,即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对照。尼斯比特(Nisbet, 1967)在关于社会学史的一项颇具影响的研究中指出,社会学传统特别关注属于工业现代化产物的一系列对照,也就是一些对立:神圣与凡俗,个人与社会,权威与权力,地位与社会阶级,最突出的便是共同体对社会。关于现代化的社会学描述,诸如帕森斯的模式变量(Robertson and Turner, 1991),都明确采用了这种传统共同体与现代化社会的对照。滕尼斯做出的这种最初的区分,最终发展成一种带着深层的怀旧情结的观点,即随着世俗社会的演进,真实的共同体关系趋于丧失。这种隐含的真诚共同体与人为社会之间的对照,持续影响着大多数社会分析,比如在社会阶级理论的领域(Holton and Turner, 1989)。

作为一块专门分析领域的社会范畴的兴起,始终是经济学理论与社会理论之

间一系列内在关系的基本内容。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具有一套比较精确、范围明晰的理论论题和概念,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围绕旨在满足个人需要的理性商品消费这一观念。与此相反,令人瞩目的是,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与针对这些经济学根本假设的批判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社会学中的社会范畴概念常常等价于所谓非经济性的观念。也就是说,社会学探讨了价值观念的问题,非理性行动的话题,针对自利驱动力的社会秩序问题,以及在一个竞争环境中创设制度的论题。有鉴于此,社会学理论时常特别注重对于宗教的分析和理解,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或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宗教是极其非理性的。这种针对经济学的社会学观主导了帕森斯的早期著作,正是这位社会学家左右了20世纪50、60年代社会学发展的大半面貌。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Parsons, 1937)一书中唯意愿行动的观念,核心便是对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简单地说,帕森斯认为,功利理性主义的基本假设不能给出一套关于社会的内在一致、让人满意的理论。比如说,欺诈和强力都完全算是理性形式的功利主义经济行为,但也都与社会秩序不相容。功利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说明社会秩序的时候,总是诉诸帕森斯所谓的“剩余范畴”,它们其实不是来自于理论的核心假设;也与这些假设颇不相容。典型的经济学理论一般会诉诸“历史的幕后之手”或“情感和道德价值观念”之类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不能从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假设中演绎或生发出来的。帕森斯借霍布斯有关国家的政治学说,把这个论题描述成霍布斯的秩序问题。这种基于对功利主义学说的批判来理解社会秩序的思路,在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发展当中,已经证明深具影响。绝大多数社会学家甚至在贬低帕森斯后来的作品的同时,也普遍接受了他有关价值和规范在指导社会行动方面的重要性的社会学基本假设。帕森斯主张,如果关于社会价值观没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识,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他通过社会化和内化的概念,继续发展了这一思路。这些观念最终使帕森斯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来描述社会系统,比如他在《社会系统》中的经典研究(Parsons, 1951)。阿贝尔在其介绍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章里,以一种发人深思、富于意趣的方式,采纳了这种研究社会范畴的途径。他指出,帕森斯早期的作品固然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方面构成了重大批判,但却未能发展出一种基于唯意愿行动理论的替代途径,因为他最终转向了一种通过系统来研究社会范畴的途径。他研究社会范畴的途径无法为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解决之道。所谓结构功能主义的种种问题,其中一些已经由博伊恩和莱赫纳在本《指南》中作了分析。

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符号互动论和理性选择理论都一直对社会范畴抱有一种坚定的理解,但与此同时,在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普遍出现了有关社会范畴的理解的深刻变化,这其实是反映了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深深的不确定

感。康诺尔指出,在文化研究里,社会范畴而今已完全等同于文化范畴 (the cultural)。比如有一种标准的观点,说经典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化领域,只关注被理解为与文化相分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与此相反,当代社会理论在分析的角度上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突出并优先考虑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文化范畴的这种显要地位,是与像詹明信这样的作者所提出的有关主张分不开的。他分析了消费主义所造成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已经导致了文化领域的大规模扩张 (Jameson, 1984)。因此,社会理论之所以会高度关注文化范畴,很大程度上也是伴随着文化消费和文化生产的增长、现代社会中一些重大变迁所产生的效应。根据这些理论家的说法,出现了一种社会范畴的美学化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种后福特主义的经济,休闲工业的增长,多媒体技术的经济后果以及全球旅游,这些都突出了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

在后现代理论里,布希亚 (Baudrillard, 1983a) 之类的作者通过一系列类似主张,已经宣告了随着现代传播体系的增长和扩张,在社会领域中导致符号泛滥,社会范畴以一种悖谬的方式,在自身上产生内爆 (implosion),所以社会范畴业已终结。因此,布希亚很是怀疑,那些传统形式的社会理论,是否还有可能用作把握当代符号体系性质的方法或手段。为了表述这种转型,布希亚提出了一系列深具影响的概念来描述这些变迁。尤其是他把现代世界看作一系列摹拟 (simulations),通过这些摹拟,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某种再现 (representation) 的再现的再现 (Baudrillard, 1983b)。这种再现系统的爆炸意味着,传统的社会范畴观念已经完全不适合再用作理解这场传播革命的概念。尽管布希亚是一位既有意思又有影响的作者,但我们最好记住,他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戏仿和反语,他是有意把这些作为写作技巧来运用的 (Rojek and Turner, 1993)。例如,布希亚意识到世纪末行将到来,自己的作品也反映出一种世纪末的心态,具有某种先知预言的成分。经典社会学本身就是 19 世纪的世纪末情怀塑造出来的,社会范畴也就是在这样的情怀里被发现的;与此相反,布希亚意识到了社会范畴的终结。全球污染、欧洲的种族暴力、全球疫病以及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动荡,这些东西孕育出一种处在世纪末看待社会范畴时深层的悲观情绪。斯马特在介绍后现代理论的一章中,深入探讨了許多这方面的论题。

2. 社会理论的衰落?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与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的,就是一种明确的观念,即将社会范畴视为一块单独而自立的领域,包括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之主题的各种

制度与实践。除了对社会范畴的这种明确观念,对社会理论也有一种同样明确的强纲领。当然,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开展的,社会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搜集那些可以促进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善的事实。这种经验社会科学的传统在北美的环境中尤其突出。然而,也有一种同样明确的观点,认为理论的性质就是一套逻辑演绎的命题体系,可以通过形式化变成内在一致的概念体系。这些形式理论被视为真正的科学说明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亨佩尔等作者也发展出一些形式框架,可以借此把这些命题转换成内在一致的关于社会实在的理论(Hempel, 1959)。这些形式框架常常被看作一种等级秩序,从最高的元理论,到分析框架、形式命题,到所谓的中层理论,最后是经验概括和观察。在当代社会理论中,这种分析社会学的观点显然是和特纳(Jonathan Turner, 1987)与亚历山大(Alexander, 1982)之类作者分不开的。这种社会理论强纲领的根本假设是:社会科学家可以从一般性命题的形式化过程,转到经验研究的操作化步骤。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Merton, 1968)就是这种思路的一个例证,他力图通过形式化,将松散的、很不完善的功能主义概念和命题,转为一套确定的研究方案。在当代社会学里,特纳(Jonathan Turner, 1984)尝试通过形式化,将颇有些缺乏组织的各种关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级的概念,转为一套系统有序的理论,这也算是关于理论形塑的强纲领的另一例证。尽管社会理论的强纲领仍有其活力和可取之处,但在主流社会理论中,关于理论本身的地位已经出现了深重的不确定性。确实存在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社会理论还有可能继续存在吗?

但这种看法并不应该使我们忽视一桩事实:关于理论究竟是什么或者包含什么,长久以来一直争执不休。奥斯怀特在其介绍社会科学哲学的一章中指出,在社会理论中,有一种传统是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按照这种传统的理解,社会理论基本上就是就经验中的种种难题、实践和制度所做出的说明。社会理论是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工具发展起来的,旨在通过建立模型或因果阐述等方式,对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给出逻辑一致并且较为简单的说明。根据波普的哲学(Popper, 1963),需要通过证伪过程来决定是接受理论还是否定理论。科学之所以具有批判性,是因为它的任务不在于证明关于现实世界的种种假设正确,而是证明它们不正确。与此相反,受社会科学的解释学思路影响的那些社会理论家,则认为理论基本上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解释,通过恰当的描述来达成理解。通过从社会行动者自身文化的角度出发来阐明行动的意义,就可以达成理解。而对于某些社会理论家来说,寻求因果的说明和寻求意义的理解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活动,相反却是社会分析的两个互补的方面。体现这种观点的比如说有韦伯的社会科学哲学,他宣称,社会学既要努力获得因果说明,也要努力获得意义解释。这种传统一般被称作解释社会

学 (*verstehende Soziologie* ,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Outhwaite , 1975) 。而朗西曼之类的当代作者,则对这种社会学观做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和辩护。

与此相反,其他社会科学哲学家却已经主张,因果说明和意义解释这两种活动是相互排斥的,至少是迥然有别的。在当代哲学中,温奇在其《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Winch , 1958)里就采取了这种立场。这种主张表现为两种形式。首先,动机与原因相当不同,前者是通过理解行动的意义加以把握的。其次,社会关系就像逻辑关系,是受规则支配的。而可以用来描述和理解行动意义的那些实际方法,已经成为社会人类学独具的长处,它发展出的那些实地研究方法,其具体目标就是对那些由外观之常常显得怪异的意义做出解释。例如,关于宗教的人类学研究力求阐明并理解的,就是那些从某种西方的角度看来常常显得非理性或者与理性无关的巫术和宗教的仪轨。人类学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就是揭示出,所谓信仰和仪轨的情境化,一般就是说在一个文化情境当中,来辨识信仰和仪轨的有意义的内容、理性的内容或非理性的内容。埃文斯-普里查德关于阿赞德人巫术信仰的作品,就是从人类学途径研究“原始宗教”的一个经典例证 (Evans-Pritchard , 1937 , 1965) 。

在一些当代社会理论家看来,如果就这样把理论看作对意义的描述,后果便是使社会理论实际上只是描述了行动者对于自身实践的解释。社会理论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以局部性、情境性的方式,来阐述行动和意义对于本地共同体所具有的含义。这样就已经抛弃了所谓理论可以是一般性或普遍性的这样一种观念。也有些主张与众不同 (Skinner , 1985) : 越是局部的,描述也就越丰富。因此,对于跨越多种文化进行形式理论阐述或普遍概括,人类学研究抱有高度的怀疑,而它的实地研究方法在看待文化实践和社会制度的时候,也含蓄地采取了一种颇具相对主义色彩的研究途径。近些年来,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将格尔兹的文化人类学 (Geertz , 1972) 推向了极端化,宣称社会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写作形式,旨在为地方文化和实践书写故事,从而使行动的意义从故事的形式中浮现出来 (Clifford and Marcus , 1986) 。而只要再从这种立场上前进一小步,就等于是说,理论其实就是一种虚构写作的形式,以精心构思的散文,通过想来重构意义。这种所谓理论阐述就是一种写作形式的观点,事实上已经在当代争论中广为流行了。它已经使人们对于作为一种写作形式的理论的叙事风格和叙事结构表现出成熟的自觉意识 (Bourdieu , 1990) 。法比昂介绍人类学的一章中探讨了这些论题。

激进人类学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的这些发展趋势,表明了对于社会科学整体方案的信心的某种失落,至少是对于理论构筑强纲领的信心的某种失落。许多社会理论家已经采纳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形式,作为发展社会考察的一种技术,或

者已经采纳了像德里达这样的哲学作者的解构技术 (Derrida, 1978)。例如盖姆的《消解社会范畴》(Game, 1991)就是这种社会理论思路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些发展趋势的结果,体现出当代社会理论中一种很有意味的悖谬。社会理论中有两股相互矛盾和对抗的潮流。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所采取的路线我们可称为社会理论的弱范式。而另一方面,则是理性选择理论,这是社会科学中一股深具影响的理论思潮,它坚定地奉行社会理论建构的强纲领。这种分野就引发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关于理论实践中延续与积累的可能性问题。

3. 社会理论中的延续与积累

社会理论中只有很少几股传统能够声称,在整个 20 世纪中保持了显见的延续和成长。很少有证据表明,通过经验上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上的重新阐述这两方面的辩证过程,理论成功地实现了积累。比如说,在马克思主义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其后来的各代继承学说之间,显然有着深刻的分野 (Kolakowski, 1978)。早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革命变迁的经济条件,而后来的各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则把注意力转向文化分析,现代社会中上层建筑的角色,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实践的哲学问题 (Anderson, 1976)。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组织化的共产主义体制遭遇的危机,已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作环境。这些全球性的政治变迁已经对一些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负面效果,比如关于发展与欠发展的社会学,阶级分析的社会学以及国家社会学。

和马克思主义类似,对于女性主义,也可以从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浪潮入手,进行历史角度的分析。洛维尔在她为本《指南》撰写的两章中注意到,就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来看,女性主义的立场、取向和分析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如此,近些年来,在黑人知识分子的女性主义与发达工业社会中白人女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之间,也出现了一种重大的区分。在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思路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思路之间出现的一种新的区分,也可能同样显著。人们没有看到理论成功地走向成熟,而是看到了歧异与分裂。

社会学中功能主义的发展历程,或许可以进一步刻画这种显著的非连续性。人们经常认为,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功能主义是北美的主导理论范式。虽说帕森斯社会学与功能主义之间的确切关系尚待商榷,但可以肯定,功能主义的主宰地位是与帕森斯的学术生涯密不可分的 (Robertson and Turner, 1991)。功能主义受到过形形色色学派的攻击,比如冲突社会学、常人方法学和马克思主义 (Alexander, 1987)。可以肯定的是,帕森斯的影响之衰亡,是与功能主义作为一种范式之

衰落相伴随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重新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产生了兴趣,引发了所谓的新功能主义,不过这个群体尚未提出一套关于社会的一般性理论 (Alexander, 1985)。

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在各个传统内部,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理论积累,社会理论更多地表现为时尚与分裂,而不是连续的成长 (B. S. Turner, 1989)。对于这一大体上的观察,符号互动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成长也许算是例外。普鲁默和阿贝尔都认为,在这两个领域里有着连贯的研究传统,相对而言没怎么受到重大范式转移或内在分歧和异见的打断。当然,在理性选择传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途径,比如交换理论和博弈理论,但这些思路都共同享有理性选择理论的那些基本假设。与此类似,尽管符号互动论有不同的学派,但它们所持有的根本假设却是相同的。

那么,是什么因素可能有助于社会理论中的延续与积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显而易见的答案。成功的学派或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一些适宜的制度条件,比如职业社团的发展,一种卓有成效的资助体制的创立,专业杂志的组织以及其他出版渠道。涂尔干学派早年的成功或许是一个经典例证。然而,20世纪社会学理论的主导潮流却表现为分裂与分割,而不是什么成功的积累。因此,我们如何可以说明符号互动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中明显可见的延续性?在这两个例子里,有一些论题似乎比较重要。首先,它们都对某一个限于中程层面的经验问题持有一种明确的观点。理性选择理论一直关注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就是从最佳利益或自我利益之类概念的角度来看理性行动的性质。这里特意用“简单明确”这种表达,以表明理性选择理论认可通过一系列基本概念来努力达成说明的简单化。理性选择理论所面临的难题,其实就是大多数消费行为的非理性性质。有一系列的尝试要为这些基本的难题和困境提供解决之道,而理性选择理论的延续也就是这些尝试合力完成的。关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方面的理性选择,学者们的阐述是相当理想化的,既简单明了,又富有弹性。它大大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里的配置过程 (Margolis, 1982)。符号互动论的根本问题,则在于日常生活当中符号意义的创生与交换。更精确地说,它关注的是为互动这一观念提供一种让人满意的说明,从而就自我的社会性质、社会互动的维持,以及关于越轨行为的种种问题,创造出系列很有意思的概念和思路。

对于如何判定理论的增进,符号互动论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一套明确的标准。比如说,理性选择理论一直力图塑造既简单明了又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两种传统也都关注作为整体的社会理论中的一项核心理论论题,即微观—宏观关系。最后,还可以注意到,两种理论传统都维系着相当丰富的经验研究传统。这方面在符号

互动论的例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经芝加哥学派之手,创立了一种关于职业群体和生涯的研究传统。再到后来,符号互动论发展了标签理论污名化(stigmatization)理论以及诸如次生越轨之类的越轨行为模式,并以此对有关越轨和犯罪的社会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美国,马扎(Matza, 1964)和贝克尔(Becker, 1963)通过局外人观念大大推进了有关污名化的分析,通过犯罪倾向的概念大大推进了对越轨生涯的分析。在英国,20世纪60、70年代,被称为约克越轨研讨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刺激了越轨社会学的发展(Cohen, 1971)。学界人物这样汇聚一处,引发出对英国犯罪的一系列重大研究。在英国,约克越轨研讨会显然是在剑桥犯罪学家的思路之外另寻出路,人们认为后者过于紧跟英国内政部对犯罪的看法。这种长期关注社会问题、实践政策以及经验研究的做法,似乎曾经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延续与积累。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受害者研究,犯罪倾向、标签理论和污名化作为一些研究途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黯然失色了。这种转变反映了英国和美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看待犯罪的思路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不管怎么说,对于一种新犯罪学的追求(Taylor, Walton, and Young, 1973),大大有助于在各种越轨理论之间创造出一致的关注焦点。

4. 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

对社会理论的一个基本批评,就是认为它未能以任何显著或切实的方式,去解决20世纪理论活动中已经成为常年话题的某些根本问题、两分和难题。简言之,在社会理论中很难看出有什么明确的、毫无疑义的进步。不断发现新的话题,也不断弃置旧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为说明与解释之间的两分对立提供某种解决之道时,社会理论确实面临根本上的困难。所谓“理论”究竟指什么,或者理论的进步是由什么来构成,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共识。结果,人们可以把理论看作一种宽泛的框架,用来组织和安排研究;或者看作汇集了一些有助于指导研究关注方向的一般性概念;又或者看作一种特定的取向,将研究者引向那些众人讨论的问题和论题。因此,关于社会理论是什么,或者它可以实现怎样的目标,达成的共识也就比较少了。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晚近的发展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混乱局面和不确定性。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社会理论尚未妥善地处理好那些业已构成理论竞争领域特征的经典两分对立,也就是说在行动(action)与实践(praxis)、行动(agency)与结构(structure)、微观研究思路与宏观研究思路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两分。尽管柯亨以相当同情的立场介绍了结构化理论,但是否

确如他所言,吉登斯版本的结构化理论解决或超越了关于行动与结构的许多经典问题,对此我表示怀疑(Smith and Turner, 1986)。而解决微观研究思路与宏观研究思路之间的对立似乎还更有希望一些。可以肯定,韦伯的行动社会学的宗旨,就是要从对行动、社会行动和互动的的基本阐述开始,逐步上升到规模更大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理念型就属于这种策略,从有关理性、传统、情感等各种行动形式的微观命题出发,逐步迈向一种宏观社会学。帕森斯的唯意愿行动理论也有类似的目标或目的,从单位行动的概念出发,逐步构筑社会系统理论。普鲁默在其介绍符号互动论的一章里,也指出了符号互动论的一种类似的理论策略。未能解决社会理论的概念工具中存在的某些基本争议,或许也是社会理论始终处于分裂、歧异和松散之中的一个原因。社会理论往往在遵从时尚与标新立异之间不断摇摆,通过这种循环往复,社会理论家们也不停地重新发明出理论之轮来。*

这种批评性的议论也许显得过分悲观和否定了。我已经指出,在分裂与歧异的总体画面上,也凸现出一些延续、稳定和积累的例证。维特库斯指出,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丰富而富于生机的社会学分析传统。在这里,你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就是声势浩大的对于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兴趣及其复兴,这是战后社会理论的标志。对韦伯社会学研究兴趣的复兴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新教伦理命题的典型描述,把韦伯式研究思路拓展到人格、生活秩序与社会世界的概念,经济社会学与分层,国家社会学,比较宗教社会学,以及更晚近时以一种具有强烈的韦伯色彩的研究兴趣,关注晚期资本主义中国家与权力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又不同意吉登斯,他倾向于把韦伯对社会学的贡献否定为已经过时、老套了,因为韦伯据说是把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而在我看来,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Giddens, 1990)里勾勒的对于经典社会学的种种批评,都不该落到韦伯的头上。对于全球化的重要意义,韦伯似乎已经有了明确的看法;而他对于现代化进程的看法之犹疑与含糊,也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一些后现代化的大多数争论(Turner, 1992)。

5. 社会理论的前景

本序言中对社会理论的讨论有一个言外之意,就是社会理论只有在紧密参与

* 轮子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中最早的重大发明之一,其后的无数技术发明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谚中所谓重新发明出轮子,意谓忽视前人既有技术积累,从头开始,进行重复劳动。——译者注

经验研究和（或）公共论题的时候，才会发育得最好，也才会维持得最好。卡尔霍恩在分析理论在公共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也明确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这个假定也隐含在绝大多数“作为社会批判的社会学”的阐述中（Bottomore, 1975）。卡尔霍恩主张，批判理论的一种魅力，就在于它坚持不懈地介入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重大争议，比如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批判理论力求弥合曾经在传统的实证主义中占据核心位置的鸿沟，也就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对韦伯的社会科学哲学，出现了这样一种读解，尽管很重要，但却是可悲的、误导性的，即认为价值无涉意味着社会理论家不可以有任何的政治介入。其实，韦伯的价值无涉观念基本上是针对滥用职务和特权而发出的警示。它是对大学教授的批评，认为他们不应当在讲堂上布道，仿佛他们的政见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中立的事实。当然，韦伯也进一步指出了价值关联的重要性，而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也在学术的天职与政治的天职之间寻求着选择。

20 世纪，在对具体政策论题或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某种实际参与方面，社会学理论已经明显表现出很大的发展。在英国社会科学中有关贫困和对贫困的重新发现的争论，或许可以算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它大大推进了我们对于不平等和贫困背景下需要、需求及其满足的理解（Townsend, 1979）。从这些针对不平等的考察中，生发出有关相对剥夺概念的一场重大争论（Runciman, 1966）。关于后福特主义经济背景下贫困的女性化，以及它对家庭结构和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所产生的连带效应，有关的学术争论也可以在此提一下。这些经验性的论题已经使人们用一种精致得多的理论观点，参照公民地位的扩张，来探讨社会性别、阶级和家庭之间的关系（Roche, 1992）。医学社会学中患者角色的概念（Parsons, 1951）可以进一步地说明这一点。尽管帕森斯一般被看作一位抽象的理论家，但人们也许忽视了他对医学社会学的贡献（Holton and Turner, 1986）。虽说帕森斯的患者角色概念遭到了严厉批评，但它却有助于一个有益的宗旨，就是大大增进对医疗职业、社会的医学化的性质以及病人的地位特征的理解。这种经验关注的结果，就是医学社会学在业余转诊体制、异常卫生行为和医疗权力方面，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和理论。

在 20 世纪后期，我们不难预见，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可能的关注焦点，就是某些社会中的公民身份与人权的性质。曼达利奥在他为本《指南》撰写的一章中指出，这些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对民族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提出了质疑，也因此对传统意义上的公民地位提出了质疑。政府对实现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的承诺明显趋于衰减，国家本身的性质不断发生变化，全球性难民问题愈演愈烈，妇女儿童在现代国家中的地位日益模糊，对这些方面的关注已经激发出有关公

民身份的争论 (Turner and Hamilton, 1994*)。鉴于社会公民身份作为一项主题已经进入了关注的焦点,我们也可以预见到会出现关于权利性质的一场更为宽泛的争论,特别是结合考虑社会性别、种族和年龄方面的那些问题。社会学或一般性的社会理论只有在公共领域中介入此类政治和社会议题,才有望顺利迎接 20 世纪后期和 21 世纪早期的这些变迁的挑战。若是没有这些政治投入和公共参与,社会理论就有成为边缘学人精英主义的怪异兴趣的危险,圈外人难以理解。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社会学家对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非常关注。

社会理论介入公共争论的另一条途径或渠道,关系到环保主义和污染的有关问题。政治科学、地理学和哲学都已经开始以公共的方式参与这些议题,而社会学却对科学、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足够的关注。总体来讲,可以说社会理论未能紧扣 20 世纪的科学发展,尤其是生物学方面的发展。19 世纪的社会理论还曾经通过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途径,直接扣合了技术与科学的有关问题,可 20 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却一直避免与生物学有任何具备实质意义的接触。社会生物学在总体上对主流社会理论产生的影响还比较微弱。近年来社会理论的发展中最有意思的,或许要算是围绕着环境污染和环境灾害方面的风险 (risk) 概念。在德国有关科学的角色和环境污染的后果的公共争论中,贝克的《风险社会》(Beck, 1992)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贝克有关风险的阐述有助于促请社会学家直接关注环境事务、医疗科学、生物学,以及在政治上面临全球协作、共担环境责任的背景下学者所扮演的角色。贝克的主张包含许多方面。不过从《指南》的角度来看,贝克是把风险看作全球现代化所造成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其结果便是无法避免风险的大量滋生。不仅如此,贝克还肯定了在有环境公共争论中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重要性,以此避免了大多数评论发达社会的社会科学所渗透的那种典型的悲观情绪。

贝克的主张在理论上已经派生出一些重要的副产品。吉登斯在讨论自我认同、现代性及私密关系方面的反思性现代化时,已经采纳了贝克主张的某些方面。吉登斯和贝克都拒绝接受后现代理论的那些主张,而是指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或风险社会,其标志是去传统化、全球化和风险的扩大化等过程。贝克和吉登斯都指出,既有的社会理论,尤其是经典社会学,已经不足以理解或说明这些社会发展趋势。吉登斯和一些英国社会学家已经对风险、信任和反思性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关注,与此同时,在德国,贝克的主张也已经激起了似乎像是一场新的理论运动,自称是对于个体化过程的分析 (Beck, 1994)。对贝克及其追随者来讲,社会阶级、社会、经济和国家等经典观念业已过时,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反

* 原文如此,书目注为 1989。——译者注

思性和偶变性 (contingency) 需要有一整套新概念, 并归于理论的个体化这一总名目下。个体化和风险这两个概念意味着, 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变迁, 已经使得处在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背景中的个体和个体自主性显得特别重要。贝克的风险概念可以看作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回应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放权趋势。它对抗了现代社会日趋增长的稳定性和管制, 挑战了传统社会学中许多有关这方面的假设。韦伯的理性化概念, 法兰克福学派行政操纵化社会 (administered society) 的概念, 以及埃利亚斯文明化进程的概念, 这些都隐含着一种认识, 即现代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受管制, 越来越讲规范, 越来越例行化, 也越来越受操纵。里茨尔在其《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 (Ritzer, 1993) 中, 饶有趣味地刻画了这种韦伯式的理性化观点。里茨尔采纳了韦伯的社会学观点, 注意到诸如泰勒制和福特制之类的管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已经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常规化和标准化。这种行政操纵化社会的观念似乎与贝克对放权、不确定性和灾害的强调相互矛盾。要想调和这两种看待现代社会的途径, 或许我们可以指出, 社会的宏观环境固然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不规则, 但与此同时, 微观世界或日常世界确实受制于标准化和常规化的过程。当然, 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去常规化也对日常世界造成了重大影响, 但关于日常生活却仍然有着一种显著的稳定性和真实性, 这是数十年来众多社会学家已经观察到的 (Berger and Luckmann, 1967)。

贝克与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研究途径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社会学传统的某种健忘。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 贝克和吉登斯都想要声称自己对社会理论的贡献具有独创性。但即使并不打算否认他们作品的重要意义, 也应该注意到, 在他们的理论作品与前人的社会理论阐述之间, 的确有着某种延续性。例如, 伯格和拉克曼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对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作出了把握和概括。他们将源自曼海姆和舍勒的知识社会学视角与格伦的哲学人类学融合在一起, 创造出一种关于当代社会的崭新视角。由于人类在生物学的角度上属于未完成的动物 (也就是说, 他们在本能上是开放的, 对于环境具有适应能力), 人类社会就必须创造出一种文化的环境, 以取代或补充人类的基本本能结构。而这种神圣的帷幕 (sacred canopy, Berger, 1969), 正是抗御失范和不确定性之类过程的重要屏障。而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或许更有意思的是, 伯格提出, 随着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越来越趋于复杂、断裂和多样化, 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也出现了显著的多元化趋势。都市化和大众传媒对当代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促进了这种多元化的进程。人类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被迫为生活规划这种起到支撑作用的概念耗费时间和精力。伯格指出, “个体把自己的生平作为一项设计好的计划来把握。这个设计就包括认同。换言之, 在长期生活规划中, 个体不仅计划自己将做什么, 而且计划自己将是什么”

(Berger, Berger, and Kellner, 1973: 71)。伯格及其同事们进一步指出,现代认同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分化、个性化并具有反思性(Berger, Berger, and Kellner, 1973: 73—75)。这样来阐述现代性,其实与吉登斯对当代社会中个体的阐述相当接近,因为吉登斯也已经指出,现代性包含着反思性,就此而言,自我成为一种规划。伯格对去传统化的看法似乎是为后来这些形式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无论如何,很有必要指出,至少在20年前,伯格就已经阐明了从反思性的角度来看待现代性的观点。这里举出此例,是要进一步证明社会理论中时尚与不连续性的问题,对独创性的追求似乎使得学者们必须不停地破坏理论建设中的积累与延续。

在20世纪,理论的持续发展还面临一个困难,就是北美社会理论与欧洲社会理论之间的冲突经年不息。欧洲社会理论家时常认为,美国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社会理论阐述形式太简单化,或者固守实证主义立场,或者干脆就是粗俗的,与欧洲的抽象社会理论形式所具有的哲学的精妙和深刻形成了鲜明对比,愈发显得突出。美国经验主义传统与欧洲社会哲学之间的这种张力或冲突,至少可以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帕森斯试图将韦伯、涂尔干和帕累托的作品引入北美学术机构(Parsons, 1937)。而法兰克福学派移居美国则更加深了这种冲突。在美国,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作者自觉地发展出一种理论思辨的形式,有意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分清立场(Fleming and Bailyn, 1969)。所以必须扣合这种关于社会理论地位的国际冲突的背景,来看待帕森斯社会学的兴起与意义。帕森斯主义的崩溃,使得哈贝马斯和卢曼之类的系统理论学者成功地赢得支配地位。在帕森斯之后,美国就没能出现一套整体体系,足以与哈贝马斯的批判哲学或卢曼的系统分析一争短长。德国的重新统一和有组织的共产主义的危机意味着,在世界社会理论的发展当中,欧洲社会理论也许会再次演变成一种新型的支配。在比勒菲尔德举办的1994年国际社会学年会上,这种欧洲霸权的主题已经非常突出,会上明确认可了欧洲社会理论的核心地位(Nedelmann and Sztompka, 1993)。这些国与国之间的争夺,使得在充满政治和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很难确立起社会理论的全局统合或整体统合。

最后,我们还应该考虑到社会理论的道德向度。经典社会理论基于一种假设,认为资本主义文明不仅将极大地改变社会结构,而且将极大地改变道德体系,改变人类的人格与心态,并且很大程度上是起到负面的作用。经典社会理论一般是采取一种悲观的、怀旧的立场来看待社会变迁,认为经过社会变迁,传统共同体的统合会在社会阶级的成长和社会分化的作用下,陷于分裂,遭到破坏。我们已经指出,在滕尼斯有关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中,这一观点至关重要。在当代社会理论里,这种共产主义的立场已经由麦金泰尔之类的学者采纳和发展,他们在一些作品中,将

道德理论和社会理论融合在一起,为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概述。在这篇“序言”中,我已经间接指出,下个世纪主要的道德问题将可能以技术、环境与人体为核心。目前在医疗科学中的变化,尤其是在生殖技术领域的变化,已经就有关人的认同的人体性质提出了重大问题。我在自己介绍身体社会学的一章中指出,身体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关注点,这几乎没有什么可奇怪的(B. S. Turner, 1984; O'Neill, 1985; Shilling, 1993)。环境的污染和技术可能性的迅速转变,都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个世界是否适于居住,思考如何去创造并捍卫适于居住的社会结构。在这个领域,布迪厄的作品堪称对于20世纪社会思想的一项重大贡献。布迪厄广泛涉猎了20世纪社会理论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创造出大量的理论进展、新的概念及术语体系,以理解身体与惯习(habitus)、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序言业已勾勒的有关积累和延续的许多观点,在布迪厄自己的作品里就有所表现,这尤其是因为布迪厄始终关注关于社会分层、惯习和身体的问题。布迪厄有一套关于文化资本的经验研究计划(Bourdieu, 1979),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观(Bourdieu, 1990),以及对于政治争论的担当(Bourdieu, 1991)。

尽管人们时常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成长不利于此类争论,但在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也提出了有关道德关怀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有关差异问题的道德关怀。博伊恩(Boyne, 1990)已经指出,德里达和利奥塔的作品其实直接通向有关社会正义、恐怖和暴力的问题。鲍曼则尝试摸索一种关于后现代道德的阐述,也表明了这一特定领域所蕴含的潜力(Bauman, 1993)。当然,社会理论是否能够通过道德分析和社会分析,对公共领域做出贡献,最终还将取决于一些物质性的社会因素,比如大学的延续,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的可能性,出版的性质以及国家在支持学术活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些条件没有一个可以确切地作出预见,但人们期望,它们会为下个世纪社会理论的延续与发展创造出一个丰足的环境。

参考文献

- Alexander, J. 1982: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1: *Positivism, Presupposition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ed.) 1985: *Neofunction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 1987: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P. 1976: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Bauman, Z. 1993: *Postmodern Eth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udrillard, J. 1983a: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New York: Semiotext(e).
- 1983b: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1994: The debate on the “individualization theory” in today’s sociology in Germany. *Soziologie*, 3, 191 — 200.
- Becker, H.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erger, P. L. 1969: *The Social Reality of Relig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Berger, P. L., Berger, B., and Kellner, H. 1973: *The Homeless Mind: Modern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Berger, P. L. and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London: Allen Lane.
- Bottomore, T. B. 1975: *Sociology as Social Critic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Bourdieu, P. 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1: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yer, R. 1990: *Foucault and Derrida: The Other Side of Reason*. London: Unwin Hyman.
- Clifford, J. and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hen, S. 1971: *Images of Devianc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Evans-Pritchard, E. E. 1937: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65: *Theories of Primitive Relig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leming, D. and Bailyn, B. 1969: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to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 1960*.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 Game, A. 1991: *Undoing the Social: Towards a Deconstructive Sociolog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 1972: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mpel, C. J. 1959: The logic of functional analysis. In L. Gross (ed.) *Symposium o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271 — 307.
- Holton, R. J. and Turner, B. S. 1986: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1989: *Max Weber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Jameson, F.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3 — 92.
- Kolakowski, L. 1978: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rgolis, H. 1982: *Selfishness, Altruism and Rationality: A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tza, D. 1964: *Delinquency and Drift*. New York: Wiley.
-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The Free Press.
- Nedelmann, B. and Sztompka, P. (eds.) 1993: *Sociology in Europe: In Search of Identit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Nisbet, R. 1967: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London: Heinemann.
- O'Neill, J. 1985: *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uthwaite, W. 1975: *Understanding Social Life: The Method Called Verstehe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1951: *The Social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Popper, K.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itzer, G.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London: Sage.
- Robertson, R. and Turner, B. S. (eds.) 1991: *Talcott Parsons: Theorist of Modernity*. London: Sage.
- Roche, M. 1992: *Rethinking Citizenshi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ojek, C. and Turner, B. S. (eds.) 1993: *Forget Baudrillard?* London: Routledge.
- Runciman, W. G. 1961: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70: *Sociology in Its Pl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illing, C. 199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 Skinner, Q. (ed.) 1985: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 versity Press.
- Smith, J. and Turner, B. S. 1986: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y and constituting socie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20), 125 — 133.
- Taylor, I., Walton, P., and Young, J. 1973: *The New Criminology: For a Social Theory of Deviance*. London: Routledge.
- Townsend, P. C.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Harmondsworth: Penguin.
- Turner, B. S. 1984: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9: Some reflections on cumulative theorizing in sociology. In J. H. Turner (ed.) *Theory Building i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Sage, 131 — 147.
- 1992: *Max Weber: From History to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Turner, B. S. and Hamilton, P. 1989: *Citizenship: Critical Concepts*.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 Turner, J. 1984: *Societal Stratific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7: Analytical theorizing.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156 — 194.
- Winch, P. 1958: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第二版序



社会理论汇集了尝试理解、解释和说明社会现象的各种视角,纷繁复杂。正是由于这种纷繁复杂的特点,社会理论也就成了社会科学当中一块聚讼不已的学术思想活动领域。社会科学中分析上的困难和争端不易解决,因此,各个范式之间的竞争也时常显得难有终日。理论的成果常常很难让人信服地表现出积累来。尽管从思想的角度来说,社会理论会使人受益丰厚,但它的研究最初却只能导致困惑,难以把握,而后便是备感挫折,陷入怀疑。当代关于社会现实的分析的基本形貌,就是各种研究途径和框架杂然相陈,而《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第二版的宗旨,就是要引导学生看清这种杂然相陈的局面,并且为专家提供对于现有成就与问题的合理评价。它不仅全面扫描了社会理论的现有格局,同时为学生提供了特定领域的深度探讨。所附书目也为当代的研究文献提供了一份导引。

这一版《指南》并未对初版《指南》作全面而彻底的重新编排,而是作了扩充和更新。置身迅速的思想变迁和争论,它的宗旨是要巩固而不是拒弃第一版。《指南》力求避免局限在学科和子学科上,而是要提供一系列频频跨越学科界限的视角。例如,经过扩充的有关女性主义社会理论的章节,就针对了来自多个学科背景的学生。关于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科学的一章所吸引的学人,也是宽泛地以文化分析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指南》还避免把重点放在理论家个人身上,而是为学生提供各种研究途径和视角的概观。

第二版新增了四章,探讨了如今看来第一版明显付之阙如的领域。在社会人类学方面显然很不足,因为事实上,在 20 世纪,人类学理论和田野调查已经为社会理论的成长做出了极其丰厚的贡献。之所以认真地探讨文化相对主义,大部分动力就是来自于民族志研究;不仅如此,人类学已经为结构主义、行动理论以及文化社会学贡献良多。新版还收入了有关现象学和身体社会学的章节。现象学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社会学研究基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身体社会学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在回应现代社会人口特征、劳动的性别分工、彼此冲突的身份认同、性别政治、医学创新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而现象学作为一种地位更加确立的传

统,探讨了对于社会学本身而言至为根本的一些问题,即日常生活中社会行动、解释和意义的性质。这些新增章节为理解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厚的基础。至于其他章节,也已经作了广泛的修订,以期紧跟时代地把握社会理论中的核心论题。

虽说对社会理论及理论注解的需求尚未表现出任何衰退的迹象,但仍有理由注意到,理论视角的众声喧哗并没有促成或助长任何切实的巩固与积累。社会学典范的观念有如英语文学典范的观念,都是聚讼不已。而对于所谓经典社会学对当代社会理论贡献良多的提法,也有大量的批评意见。在许多批评者看来,与后现代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文化转向”,即便还没有摧毁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可信性,也完全可能摧毁了社会理论的知识可信性。在初版中我提到了越来越从文化的角度来界定社会范畴的趋势。第二版中也反映出这一趋势。随着社会范畴这一观念消解在文化范畴这一观念之中,文化理论是否最终将取代社会理论?斯马特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整个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争论的丰富考察,明确树立了后现代化过程在文化和社会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置身充满如许争议的背景,一部社会理论方面的《指南》理当力求以一种有所限定、有所批判的方式,来为学生指点阅读文献的门径,而不是不偏不倚,温吞如水。在我自己有关社会理论的作品里,我已经越来越不满于文化研究对社会研究的主宰,文化理论对社会理论的主宰。在本篇序言里,我大体勾勒了对于“华而不实的理论”的批判,认为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这种趋势下,“文化”几乎已经取代了“社会”范畴,文学性的解释已经侵蚀了社会学的方法。我在评论中只是间接指出了对这一点的解决之道,就是要使社会学更具有文化的色彩,而使文化研究更具有社会学的味道。华而不实的理论的增长正是文化研究兴起后出现的结果,而其后的背景,就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危机,作为一种主导范式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侵蚀,以及文化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文化研究已经证明是对英语文学遭遇到的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所做出的成功的制度反应(从学生招收模式和出版机会的角度来讲)。康诺尔为我们全面概览了文化研究与文化科学中的种种趋势与论题,而这些学术领域自身内部就充满了分化和歧异。

英语的典范已经遭到了来自文学的去殖民化、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等角度的深刻挑战。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中衍生而来的,因此,文化研究依然是对文本的一种文学研究,只不过常常是以隐蔽的方式。在新的正统下,社会纯粹被作为一种文化文本来读解,在其中被解构或消解。有关文化超级现实(hyperreality)的研究,试图分析在全球电视时代里实在在范畴与非实在在范畴之间的界限,而不必然承诺进行任何系统的经验研究。由此观之,当代文化研究颇为悖谬地复制了马克

马克思主义有关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早期研究中的许多难题,同样用思辨代替了对于经验证据的任何细致关注,经验证据给予“支配性意识形态”观念的支持很是有限。我们可以对这些研究途径提出批评,依据就是文本分析丝毫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文本、符号或图像中种种再现所具有的效果,需要从经验的角度予以评估。有关特定时间和场所下对于文化客体的经验在现象学上的真实性与具体性,文本分析几乎没有什么认识。伯格和勒克曼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思路,还对日常现实的具体性有着清楚的理解;而当代文化研究在有关文化摹拟的分析中却时常倾向于观念论。接受理论和受众研究使我们能够对看电视的实际效应做出经验的评估,这样的作用或许可以免于上述批评,但关于电视节目却有非常多的所谓“经验研究”只是发些关于文化图像和影像的主观议论。关于戴安娜王妃的各种形象的文章,已经取代了长久以来关于王室在英国文化生活中地位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但要说关于奈恩所谓英国王室的“enchanted glass”,单单解构戴安娜的种种形象可是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的。*

一种充分的文化社会学必须得到经验研究计划的推动,对历史的、比较的框架有所认识,并且发展出真正具有社会学味道的关注焦点,也就是说,集中考察社会中不断变动的权力均衡。将社会范畴归入文化范畴的尝试并不能对权力、不平等和社会分层产生充分的理解。在雷蒙·威廉斯、霍加特、早期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手上,曾经形成了一种批判传统,以共同体的失落和传媒的权力为核心关注,而现在的文化研究却已经丧失了自己在这种批判传统中的根基。文化理论已经变成自身的某种目的,即对自身文本传统的某种自恋式考察,并因此丧失了对经验研究重要性的体认。文化研究突出地表现为缺乏比较研究的传统。正如曼达利奥在本书第二版中所指出的那样,对文化认同和文明进程的充分理解必须是比较性、历史性的。

不管是文化研究还是当代社会学,都突出地表现了范式和视角没完没了的转变。针对这种情况,也出现了一种主张,要求在社会学里捍卫一种经典传统。当然,文化研究对社会学的同化过程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因为如果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读解”成文化关系,撇开它造成的其他难题不谈,至少它忽略了权力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的制度化之间的种种张力,而此处的文化正是社会科学发挥作用的思想战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韦伯社会学,作为分析政治与文化的两种一般

* 详参以研究国族主义和新型阶级运动著称的苏格兰学者 Tom Nairn 著于 1988 年的 *The Enchanted Glass: Britain and its Monarchy*, 书中分析了英国王室如何成为英国传统与现代性的混合象征,围绕王室及威斯敏斯特议会主权形成的虚构的统一国族认同。——译者注

性框架,它们传统上探讨的问题都已经被文化研究放逐到了边缘。马克思和韦伯那里的这些政治经济向度,在文化研究中都不复存在,你可以批评这属于非政治的文化评论。这里倒是有一个例子,捍卫社会学中马克思和韦伯留下的遗产,捍卫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要性。在第二版里,德朗蒂撰写的一章涵盖了从启蒙运动到当今的社会学思想传统。而要想捍卫社会学中的经典典范,就必须始终允许修正,不沦为某种排他性的职业界限的组成部分,也不预先排斥以坚定的热情保持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关联。

由于后现代文化研究采取了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所以对于现代社会,它无法提出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的政治批判或道德批判,更不用说接受这样的批判了。因此,从思想的角度上说,文化研究不太可能发展出一批概念,能够在广度、深度和道德严肃性等方面,比得上韦伯的理性化观念、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涂尔干对神圣范畴的分析、齐美尔对精神生活与大都市的理解,或者是帕森斯对教育系统中民主革命的分析。正是社会学传统提供了一种基础和一套准则,能够用来评判和发展现代社会理论。

从某些方面来看,美国大学中的英语文学研究危机远比英国乃至英联邦各国大学中的情况来得深重。在冷战时代,要想使美国文化与苏联文化相区分、相分别,确立一套文学研究的强纲领是很重要的。随着共产主义体制遭遇危机,作为一套内在一致的美国大学必修课程的文学研究也开始衰落了。人们开始强调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承认种族差异,从而不再可能设置什么规范性或典范性的必修课程。文学研究不再可能有一套统一的研究纲领,这便产生了思想上和学术上的真空,并时常不自觉地靠文化研究来填补。认为只有文本和文本分析才具有意义,这样的研究途径已经开始主导了关于传媒、沟通和文化的考察。后现代形式的文化研究的目标所向,常常是宣称传统学术的所谓失败,而不是力求提出一套切实的研究规划。这就造成文化政治越来越沉迷于界定方面的事务。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学者更关注的是理论阐述和定位。

华而不实的社会理论包含着这样一种取向,就是在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起推动作用的不是一套稳定的研究规划,而是理论,是对于变迁的理论回应。这种倾向体现在“理论化”这个动词 (to theorize) 的使用上,它已经变成自我关注、耽于内省的一种活动。其次,这里缺乏任何对于开展历史分析或比较分析的承诺。正是将理论化强调为一种自我维持的活动,才导致了这种缺失。对于文本和文本性 (textuality) 的理解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特性。文本 (text) 并无任何历史背景 (context), 因为它们存在于一个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 的抽象空间中。

尽管我认为这些倾向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但不应该就此推出传

媒是无足轻重的,或者说没有其他可供替代的分析形式。本修订版中许多不同章节已经表明,伴随着一种数字文化的成长,传媒方面的变迁业已对现代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研究诸如此类的变迁正是社会学家的首要职责。而我认为,过去用来分析那些变迁的方法既无助于事,也缺乏根据。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对于当代社会理论,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生活,经典社会学的研究规划依然是切中要害。例如,韦伯的社会学旨在把握我们生活在其间的种种社会条件的独特性质。而我们所处时代的独特性,显然是由这样一些方面的根本变化所确定的: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性别认同的转型,文化系统和信息系统的扩张,沟通与交换的全球化以及文化所造成的经济转型。文化研究尽管正确地认识到文化范畴是这些变迁中的核心要素,但却未能有一种充分的理论或方法论来把握这种变迁。

无须多言,我并不是倡言,只需回到经典社会学便万事大吉。文化再现、信息技术、经济生产和生物繁殖等方面的种种变化,已经使大多数经典社会学过时了。我在自己介绍身体的一章中指出,社会学应当通过重新阐述行动理论,全面吸收身体社会学新近的发展,来回到社会范畴。

因此,要在华而不实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规划的那些浅薄议论之外另寻出路,就需要满足三项前提条件。社会学是对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回答,这个问题便是:考虑到社会行动者具有为互不相容的利益而发生冲突的倾向,社会如何可能?我在自己介绍身体社会学的一章里,试图回答这一传统问题,集中讨论了人体之脆弱性、社会制度之变幻莫测以及社会行动者之相互关联性。这样一种社会行动理论在看待身体 (body) 和身体体现 (embodiment) 时,必须预先假定一种基础主义的 (foundationalist) 认识论,而不是一种建构主义的理论。

首先,行动理论必须建立在行动者的身体体现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具有身体体现的行动者的脆弱性必须成为任何行动理论的一项必然前提。这种理论将参照衰老、残疾和病患来确定脆弱性。其次,具有身体体现的行动理论必须认识到社会制度之变幻莫测的性质。伯格与勒克曼已经追随哲学人类学家格伦指出,制度作为对人的脆弱性和社会偶变性的一种回应,始终是不完全的、变幻莫测的。借用尼采的话,人类是“未完成的动物”,他们必须创造出一些制度,来保护自己免于不确定性。社会理论必须认识到人际关系的偶变性和未完成性。第三,我比较偏好一种围绕比较视角和历史视角建立起来的社会学,因此,行动理论必须将社会行动者理解成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依赖的。人类行动者是并且始终是社会性的。可以说,社会是由这三个环节构成的:人体的脆弱性,各种制度形式的变幻莫测的性质以及各种社会安排的互赖性和交互性。

如果我们诊断的结论是华而不实的社会学归根结底只开花不结果,那么治疗

的办法倒也比较简单。社会理论不能彻底脱离系统的社会调查,因为经验研究会显露出一些坐在学者书斋里绝难轻易想像出的疑惑和问题。“理论化”永远也不可能只是一种观看的操练。当然,观看始终得从某种确定的视点出发。美国哲学家罗蒂已经指出,“理论”和“观看者”源于同一词根。因为进行理论概括就是去注视,所以观看者——比如学院理论家——就是在旁关注。但不管怎么说,观看的行为如果是充分的,就需要有某种政治和道德的指向。观看始终是从某个地方去看。

在本《指南》中,有一批撰稿者已经指出,好的理论必须介入道德论题,与政治世界保持关联。而它只有与正在进行的经验研究计划保持系统的关联,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看法无非是说,社会理论家如果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就必须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洛维尔所撰写的两章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女性主义理论之所以丰富而重要,正是因为它参与了有关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政治论题,与经验研究的传统保持密切关联,并力求发展一种与笛卡尔理性主义遗产相对抗的对于人类身体体现的理解。卡尔霍恩在其关于批判理论、公共生活和知识分子角色的一章中,也以类似的方式探讨了其中一些论题。我之所以对现代社会理论不满意,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属于华而不实的路数,进行这种活动的观看者,除了抱怨再现被扭曲,对政治事务或社会变迁并不关注。社会理论绝不能只是对作为文本的社会生活的一种美学解释。《指南》就是要把学生带出理论概括的中立立场,带到一种既具分析性又有参与性的社会理论,明确区分社会范畴与文化范畴,并力求理解大规模的历史过程。

布赖恩·S·特纳

1999年7月于剑桥



致 谢



我对《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 Society*)杂志的投入,已经改变并还在继续改变着我对社会理论作为一项知识活动的重要性的认识。从学术上讲,它的重要性已经体现在协调了文化研究、文化理论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自杂志创办以来,我一直很重视与费瑟斯通和编委会的友情往来。因此,杂志的演变也深深影响了我看待社会理论的视角。再者,我在本书中有关身体的一章,显然也受到了我与费瑟斯通在《身体与社会》(*Body & Society*)杂志编务交往的影响。

近年来,我开始愈益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总体而言的社会科学,具体而言的社会学,理当为有关公民地位和人权的论题做出某种能够流传下去的有价值的贡献。社会理论要能有助于评估实现跨文化对话、宽容和世界主义德性的可能性。因此,我的思想取向也已经受到了《公民身份研究》(*Citizenship Studies*)杂志各位编委的影响。其中我特别要感谢恩金·伊辛(Engin Isin)、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以及托尼·伍迪威斯(Tony Woodiwiss)等各位为这份新杂志所做出的思想贡献。

有关社会理论对于政治行动的相关意义的这种焦虑,已经使我开始批评当代社会学中大多数的学术活动为“华而不实的”。社会理论可以使世界显得更有意思,更能在美学的角度上让人满意,但它能帮助我们改变世界吗?由此观之,马克思对观念论的谴责依然有它的意义。社会理论能不能够有效地促进伦理问题的形塑,促进实践政治的发展,并最终促进正义的产生?在这种对“华而不实的社会学”的批判的提出过程中,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已经表现出既是我忠诚的朋友,又是我亲密的思想同道。

我感谢各位撰稿人为使《指南》第二版变成现实所给予的支持,感谢苏珊·拉比诺维茨(Susan Rabinowitz)在编务上的协助与建议。最近数月,我在Free School Lane的新同事们使我比较轻松地渡过了又一次转回英国居住的阶段。最后,我的

妻子艾琳·里查德森 (Eileen Richardson) 也给予我思想上的启发与情感上的支持。
若是没有她,此书本不可能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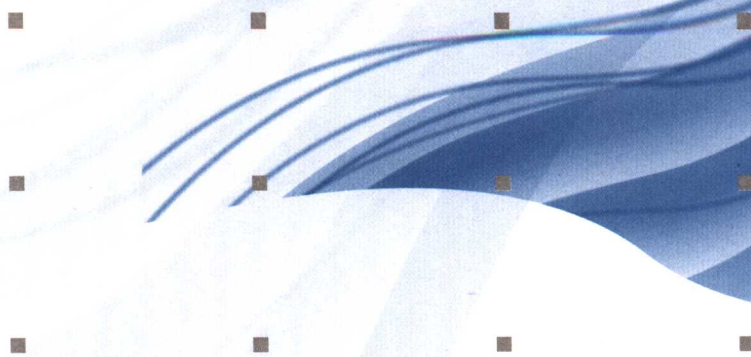
布赖恩·S. 特纳

1999年7月于剑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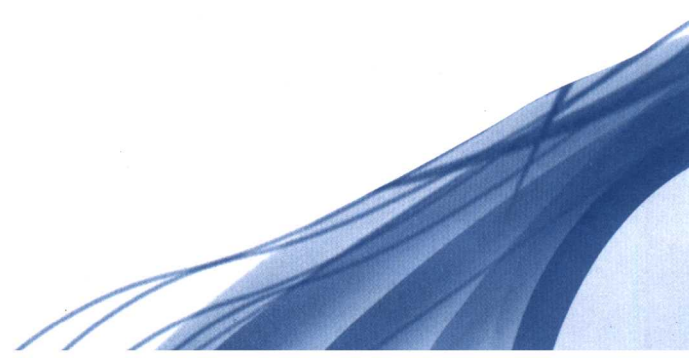


Foundations



BLACKWELL
M P A N I
AT
TU

第一编 基础





第①章

社会理论的基础:起源与流变



G. 德朗蒂

德朗蒂 (Gerard Delanty) 博士是利物浦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1998 年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访问教授,2000 年日本京都同志社 (Doshisha) 大学访问教授。还曾在爱尔兰、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大学执教。他是《欧洲社会理论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的主编,并在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以及有关欧洲各社会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等主题方面,在杂志上和文选中发表过许多文章。他的著作有:《发明欧洲:观念、认同与现实》(Macmillan, 1995),《爱尔兰史重探:民族主义、认同与意识形态》(与 P. O'Mahony 合著, Macmillan, 1998),《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与实在论》(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理论》(Polity Press, 1999),《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Sage, 2000),以及《全球时代的公民身份》(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目前即将完成一部关于大学与知识社会的书 (Open University Press 即出),并正在写作《社会理论史》(Sage 即出)。

- 1.1 引介
- 1.2 现代性之起源:欧洲社会理论的形成
- 1.3 现代性之危机:欧洲经典社会理论的形成
- 1.4 抛弃现代性:欧洲社会理论的衰落
- 1.5 现代性之美国复兴:美国社会理论的兴起
- 1.6 结语:社会理论之碎裂





1.1 引 介

鉴于社会理论起源于现代早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从16世纪到20世纪,现代性的主题一直是社会理论当中一项起到统合作用的重大主题,为许多不同的研究途径提供了参照框架,这些途径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力求提供一种关于现代世界的解释。因此,社会理论首先是针对确定现代性形貌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所做出的一种反应。不过,要是更具体些来讲,在它的形成阶段和经典阶段,大致从16世纪早期到20世纪早期,社会理论就是针对社会的兴起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早先所谓的“社会”,本身并不曾作为一种明显可辨的社会领域而存在,与亲属关系、经济和军事功能、国家或宗教纽带相分离。对于早期的社会理论家来说,社会范畴的兴起是现代性的规定性特征,构成了研究与反思的一种独特对象。因此,社会理论就是对“社会范畴”的解释,而后者又逐渐被视作连接私人世界与国家的一块中介领域。

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范畴的现实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区分也开始凸显,前者基本是社会性的,而后者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外在于社会。人的历史越来越被看作是人性从自然状态当中获得解放的历程。社会史或人类史就此从自然史中分化出来,并导致人们对知识所蕴含的解放力量越来越充满信心。装备上了科学——这个成为现代性文化的规定性主旨的东西——现代人开始声称自身高于自然,而知识也不再是某种神创秩序的表现。直到最近,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又出现了一种观念,认为知识也只是一种建构,有能力构成自己的对象。不过这种观念的源头还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

社会作为一种不同于私人世界和国家的领域,它的兴起促成了三块核心问题域,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个体的社会化,知识的理性以及权力的合法化。首先,社会被看作是在由亲属关系和家庭构成的私人世界之外的领域里构成的,因此是由个体占据的一块领域。不过,它本身也是一种有能力把自身的结构强加到行动(agency)之上的实在。一方是自主的个人,另一方是社会的种种要求与习俗,两方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性理论当中长久沿袭的问题之一,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主体性的一种反思。其次,现代性关注知识的理性,人们认为这是塑造现代性文化之源起的力量。知识摆脱古老权威(教会与王室)的解放与世俗化过程,以及它的民主化过程(具体来讲,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在启蒙运动早期的大学、沙龙、学会和新闻出版界,这些都反映出一个识文断字从而有所见识的公众群体的兴起),都大大有助于现代社会的规范结构、认知结构和审美结构的兴起。最后,我们可以把权

力的合法化问题说成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而现代社会理论一直都是以权力问题为核心关注点的。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就是作为由自由个体组成的领域的社会,与作为权力的领域的国家,这两者之间的政治关系与司法关系。

在下文对于社会理论史的概述中,个体的社会化(或者说社会主体性),知识的理性以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三个问题将被视为现代社会理论的规定性特征。我们已经指出,社会理论是现代性的一种产物,因此,种种变动不居的现代性形式也会体现在社会理论史中。社会理论史的叙事是个相当大的问题:我们是该把这历史当作许多国别史的汇编来讲,还是把重点放在单个理论家的作品上,还是再现某个观念的展开过程或一些思想流派的形成脉络?这又带出来一个问题:社会理论当中的“典范”都包括哪些东西?说到底,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科学是多学科性的、规则有序的思想体系已经瓦解的时代,排他性的典范观念本身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在这一章里,我将在充分认识到叙述社会理论史的困难的前提下,划分出五段历史时期,每一段都有一种特定的现代性观念,这样就可以把事情简化一些。

首先,我将考察在现代早期,现代性的起源及社会理论的兴起,重点是莫尔、霍布斯、洛克这样的16、17世纪学者,以及18世纪启蒙运动,包括卢梭、康德和黑格尔,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透过作为一种政治乌托邦的市民社会的兴起来看现代性。其次,我将考察社会理论中的经典时期,以及这个时期里关于现代性危机与市民社会衰落的主题。这个主题主宰了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欧洲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体现在孔德的作品中,后来是马克思和斯宾塞,一直到20世纪早期涂尔干、韦伯和齐美尔这等人。第三,我将考察20世纪上半叶,欧洲社会理论中现代性危机感的加重,体现在滕尼斯、奥特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的学说里,它们都认为社会范畴的前景颇为暗淡。第四,我将把重点转向现代性在美国的复兴,典型的体现便是米德、帕森斯的作品。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社会的概念和现代性注入了一种超越虚无主义的新意义。在结语里,我简略考察了在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理论如何分裂成纷繁多样的研究途径,本书随后各章将对这些途径做细致的探索。

1.2 现代性之起源:欧洲社会理论的形成

要记叙社会理论的历史,问题不仅仅在于如何保持主题的延续,还在于怎样确定开端。习惯上的说法将社会理论等同于社会学理论,时常是从19世纪30年代的孔德开始。而现在人们一般认识到,对社会理论的描述要想充分,必须从现代早期开始,那段时期经历了促成现代社会及其世界观的一些断裂性事件,即科学革命、

文艺复兴和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同期发生的欧洲对美洲的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导向美利坚合众国、尼德兰联合省、法兰西共和国创立的一系列共和革命。在这段概述的开头,我首先来谈一谈 16 世纪的社会思想。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化——即有关德性和文明生活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头一批关于社会的理论,早期的建筑设计也是如此。在这段时期,我们发现,对于早先希腊和罗马有关社会的一些观念,比如城邦、公民、共和国,人们重新产生了兴趣,这些观念取代了此前的经院哲学以及基督教普世教会 (oecumene) 的观念。“社会”这个词开始表示公民与统治者之间的某种协定或契约。当然,这样来理解社会往往是单纯从政治功能来看待它。实际上,社会理论的历史大部分可以看作是从契约 (司法整合) 转向共同体 (规范整合),再转向社会 (结构整合)。

毫无疑问,最好的起点之一是从托马斯·莫尔爵士 (1478 — 1535) 开始,他的《乌托邦》(1516 年)^[1] 可以视为有关现代社会政策的一项空想计划,也可以视为有关现代社会的最初反思之一。它兼有文学创作和社会批判与评论的意味,在那个时代,是欧洲拥有最多读者的书籍之一,也影响了日后数百年的乌托邦写作,其中著名的实例有培根的《新大西岛》(1629 年),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02 年) 以及后来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 年) 和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1842 年)。在现代早期的社会政治思想当中,乌托邦是一项强大的主题,折射出那个时期的一种信念,即人类的意志在知识的指引之下,可以塑造出社会现实和一种理性的政体。实际上,早期乌托邦当中有许多是从科学的角度构思的,其中可以发现对于社会秩序的关注也与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 中的设计无甚差别,即强调由一群知识精英来掌握领导权。其实,现代早期的乌托邦就是一种共和秩序 (republican order), 和许多共和政体观一样,都相信社会就是由一群政治精英管制的,有时是由一群技术专家精英来管制。在这些早期的作品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范畴的自治性,将社会范畴化约为政治范畴。由于乌托邦与极权主义和社会工程颇有牵连,已经不再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概念;但在现代早期乌托邦兴起之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主导意识形态却依然是基督教,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早期的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现代观念,不如说是处在衰落之中的中世纪制度的一种体现。尽管如此,也不能低估乌托邦的观念对于社会理论的意义,曼海姆的经典之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 年) 的书名就证明了这一点;乌托邦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秩序观,与意识形态两相对立。不管怎么说,乌托邦的遗产中最致命的无疑就是它对社会秩序的偏好,这是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早期地理大发现的余波,以及与此相关的地缘政治中心从地中海地区移到西北欧,早期乌托邦作品的写作背景就

是与这些过程有关的暴力动荡与人口剧变。因此，我们会发现，作为都铎王室的正统王权倡护者，也是它的批判者，托马斯·莫尔爵士会热切地关注社会秩序以及都铎王室生存能力的问题。

除了莫尔爵士，16世纪社会思想的其他主要代表是蒙田、博丹和马基雅维利。在这些人当中，蒙田（1533—1592）尤为重要，因为他的《论说文集》（1570年至1580年）是社会科学中经验研究方法最早的范例之一。与某种宽容和反教条主义的立场相呼应，他的作品突出地表现了怀疑主义。而这种怀疑主义也体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他也是16世纪晚期的一个产物。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他无与伦比地刻画了一种新的社会观，把社会看成与舞台本身相类似的社会关系领域，敏锐地刻画了现代主体性。在达·芬奇的绘画里也能看到这一点。帕斯卡尔（1623—1662）的《思想录》也是怀疑主义的一个早期例证，还有博丹的《共和六书》（1576年）。至于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513年）这样的书，则提供了关于世俗君主权力的最初的一些现代观念。一种关于法治国家的新的强调重点开始凸现，与之相伴的，是推崇共和政府而贬低王朝君室。因此，到17世纪，关注的焦点已经更多地在于合法政府的实质以及知识（尤其是宗教知识）的地位，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个人。

尽管有这种种的创新，16世纪的思想家们也未曾彻底挣脱中世纪。他们的世界依然充满着基督教的虔敬情怀和历史循环观，总想把人类的秩序维系到一种更庞大的宇宙秩序，也就是洛夫乔伊所谓的“存在之巨链”。地理大探险时代的种种发现促使人们自觉意识到，还有其他社会关系可供选择——还有许许多多奇异的、初民的世界，可以用来批判欧洲社会，或者用来证明欧洲社会的优越地位。随着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人相继做出的发现，人们愈益认识到，地球并不是由上帝规定的一个宇宙的中心，人类和他们的种种制度也只是时间长河当中转瞬即逝的事件。但是这些早期的洞见并不曾直接导向社会理论，有一种界定更加有限的政治理论光彩更显夺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宪制问题，是将神学从宗教当中分离出来。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是撰写社会学思想史最早的重要尝试之一，根据他的说法，现代社会学根本是要力求解答霍布斯（1588—1679）*所提出的问题，即：考虑到人类的利己主义，社会秩序如何可能？或者说，各种利益如何可能调和成一种规范秩序？在《利维坦》（1651年）里，霍布斯力图提供一套关于社会如何可能的理论。在他的理论中，市民社会介于前社会的、基于自利的、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与专制的、非社会的国家之间。他提出，市民社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

* 原书误为1697。——译者注

自利的个人认识到,为了能够依其本性规定的那样维持各自的自我利益,他们必须将政治权力让渡给一位全能的君主;简言之,只有当个人与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即“利维坦”,订立一项“盟约”,人们才能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霍布斯相信,这个关于市民社会起源的寓言反映出了社会范畴的本质:追求各自自我利益的独立个人所结成的一种纽带。这样就使得霍布斯成为最早探讨麦克弗森所谓“占有个人主义”的理论家之一,就是将所有权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霍布斯就此被视为早期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是斯图亚特绝对主义王朝的辩护人,因为他主张,一旦订立盟约,就不容撤回,因此盟约也就必然是自我持续的。不过话说回来,人们也把他看作是最早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的政府观正是基于自由主义学说的核心宗旨,即认为国家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人为产物,是维护自由所必需的。不仅如此,对于霍布斯和古典自由主义来说,政治权威都只能作为世俗统治,作为追求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才能加以捍卫。

对于日后继承了霍布斯的两难困境的理论家来说,问题就在于重新构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使社会范畴获得一定的自主性。斯宾诺莎(1632—1677)、洛克(1632—1704)和卢梭(1712—1778)是在霍布斯之后论及这一问题的三位最重要的理论家。斯宾诺莎这位荷兰哲学家是最先倡导具有民主本质的社会契约观的人之一,因为在他看来,人类根本上是社会性的,而民主也是最扣合自然状态的。在他的主要著作《神学政治论》(1670年)和身后出版的《伦理学》当中,他否定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和渗透着心身二元论的笛卡尔认识论,转而主张一种自然神学,承认实体或实在的统一性,承认情感的社会性,拒绝任何从理性角度证明启示宗教的正当性的企图。

在像《政府论二篇》(1690年)和《论宗教宽容》(1689年)这样的著作里,洛克也大大修正了霍布斯的开明政体观,主张绝对主义王朝是与市民社会格格不入的。洛克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勾勒了根植于市民社会的授意观,意思是说,与统治者订立的盟约并不是不可撤回的,而是可以废除的,但是只有在统治者破坏契约的情况下(如詹姆斯二世)。因此,是洛克奠定了一种立宪政府学说和基于相互合作的社会观。这两者之所以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一个自由的政体是以自由言论、宗教宽容和自由结社为基础的。不过也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社会观与霍布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即把个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研究途径)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尽管他并不认为社会是一种纯粹的虚构,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保护它免于陷入原初自然状态,但他的确是把社会看作由本质上自主的个人所塑造出来的。在洛克看来,道德归根结底要先于社会,“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根本权利正是从一种前社会的道德当中生发出来的。因此,他还处于现代早期社会理论尚未与之脱

离的自然法传统之中。还必须注意到，他所谓经验主义的知识理论也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在《人类理解论》（1690年）里，他尝试要为可声称为知识的东西制定标准，主张知识要么源于思维中领悟到的东西，要么源于人的经验中揭启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对教权至上主义的攻击，因为它意味着知识可以是一种共同的财产，所有检视自身经验的人都有机会获得它。

关于洛克和现代早期社会理论，我最后还有一点看法。如前所述，这段时期的理论家特别关注政教分离条件下权力合法化的问题，这种关注所引发的主权概念规定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规范关系，但尚未充分表述社会范畴自主性的观念。对霍布斯来说，社会是由个人制定的一项盟约，从属于国家；而对洛克来说，社会则是一种市民秩序，授权予国家。两位理论家都主张一种与人民主权相对的议会主权。对于洛克来说这一点更为明显，因为在他的时代里，拥有立法权的英国议会已经确立了自身相对于拥有行政权的王朝的自主权，而且（在代表激进主义的平均派失败之后），也享有了相对于市民社会的主权。当然，这是一种独具英国特色的发展（即所谓“威斯敏斯特绝对主权”），*可以与卢梭所倡导的人民主权这种新型欧陆观念相对照。后者在美国影响深远，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1840年）也对此大加称道。

涂尔干把卢梭和孟德斯鸠看作社会学的创建者。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里，卢梭提供了最激进的社会观，认为社会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反对与霍布斯和洛克维系在一起的那种自由主义市民社会观，而主张一种强硬得多的市民社会观，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自我治理，这就给主权观念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他看来，所有的合法政府都是共和政府、人民政府。这个观念不仅仅是带有猛烈的反王权意味，而且将社会视为一种以全体成员参与为基础的自我治理的政治共同体。社会契约的形成源于“公意”，使个人获得了自由公民的地位，截然相对于霍布斯和洛克那里的臣民身份。卢梭的社会契约概念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的盟约，因为后者是个人之间为创立一个市民社会而订立的，而前者本质上是为创立一个国家而订立的。这种极具政治意味的社会观影响相当深远，为共和国家主义和激进民主奠定了基础。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个人观念，不是把个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者，而是作为一个公民，这是现代性当中根本性的道德范畴。

尽管如此，卢梭对真正的社会理论的主张也必须有所限定。归根结底，他属于浪漫主义的反启蒙运动，对这股思潮来说，个人不仅高于社会，而且在本质上是与社会相对立的。以拜伦、赫尔德和歌德为典型的对理性的攻击，就属于这种对社会的反抗。其中特别强调社会制度的腐坏本性，这种观点尽管出自浪漫主义者，但也

* 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宫是英国议会大厦所在地。——译者注

具有社会学的意味。例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55年)中就主张,不平等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的创造。概括起来可以说,在公民观念与未遭腐蚀的人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卢梭的社会理论依然是含糊不定的。更具纯正社会学意味的理论家还要算是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他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奠定了现代经验社会学的基础。在孟德斯鸠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摆脱自然法观念的社会理论。具体而言,他谈到了社会习俗、价值和习惯,即他所谓的民德(mores),是如何被地理因素所形塑的,而社会控制又是如何除了通过法律和宗教,还通过这些民德发挥作用的。因此,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把个人明确描述成一种社会的存在。在18世纪开始了向社会理论的转变,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是一种凭其自身即可存在的现实。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早期就合法政府的本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知识的理性等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这些早期的观念与自然法和政治正义的问题依然有着太深的渊源,无法提供一种关于社会本身的理论。卢梭和孟德斯鸠标志着开始明确地关注社会范畴,这在维柯(1668—1744)的著作里也很明显。他的《新科学》(1725年)在历史循环论的局限当中第一次阐述了社会进化。但不管怎么说,朝向社会理论的决定性转变无疑是在苏格兰发生的。在那里,改革后的教会大大促进了启蒙运动(这一点不同于天主教的法国,在那里,启蒙运动是在和宗教的对抗当中兴起的)。我们就此发现,与自然神学的兴起相伴而来的是道德哲学,它对19世纪的社会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虽说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亚当·斯密(1723—1790)和哲学领域的休谟(1711—1776)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但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弗格森(1723—1816)和米拉(1735—1801)的著作更具重要意义。苏格兰启蒙运动标志着抛弃了各种社会契约学说,因为这些学说都建立在自然权利和人的本性的观念基础上,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观则把社会看作这样一个有机整体,它不仅仅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量的实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依然带有霍布斯对利益作用的高度重视的痕迹。根据他在书中的看法,私人的、利己的利益已经由“看不见的手”——一个世俗化了的宗教观念——通过某种方式联结在一起了,这只手增进了社会的集体利益。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创造财富的动力,而米拉的《等级区分之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1771年)和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1767年)都不同于他,以一种更具社会学意味的方式来阐述分层,就是把社会划分成各个阶级或“等级”,并且认为在社会的多样性之下,潜藏着一种因果结构,可以借助科学来加以认识。社会本质上是沟通性的,也自有其演进的历程。休谟的著作作为社会科学当中

的经验主义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辩护之一,也就是认为,所有形式的真理归根结底都是社会习俗,并无任何客观的正确性。社会理论当中这些早期的著作同时也属于对法律学说和认识论的关注的一部分,因为社会理论尚未与后两者完全分离。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尽管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社会学意味,但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发展今日所谓的社会科学。他们被时人称为“道德哲学家”,研究的学科领域包括法学、哲学以及逐渐为人所知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表述本身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一种创造,反映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性观念和知识观念。苏格兰道德哲学家遵循与洛克分不开的那种经验主义传统,也就是说,知识来自大脑的感官知觉,能够对称得上正确知识的东西做出判定的也正是经验体验;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则处在笛卡尔(1591—1650)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主张知识的基础并不在于经验的记录,因为它可能无法信赖,也不在于传统所具有的权威,而在于科学超越经验与传统、揭示永恒真理的能力。

“社会科学”这个术语18世纪90年代出现在法国,是由孔多塞侯爵(1743—1794)创造的。他是最具影响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之一,与伏尔泰(1694—1778)、狄德罗(1713—1784)、达朗贝尔(1717—1783)、杜尔阁(1727—1781)、霍尔巴赫(1723—1789)以及爱尔维修(1715—1771)一起,构成了“启蒙哲人”群体(philosophes)。但他们倡导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却各有差异,从零散论说小品的社会批判,到立意参与行政的社会科学。这些知识分子有时候被称作“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es),他们创造的巨作是狄德罗主编的煌煌17卷《百科全书》(1751—1772年),是整个启蒙运动的集中体现。这里还必须提一提培尔(1647—1702)的《历史批判词典》(1667年),这是早期社会思想一部令人瞩目的作品,反映了对于知识的一种批判性的理解。

必须指出,作为社会批判家,他们所批判的社会只是宫廷社会。他们远远算不上是革命分子,许多人只是低等贵族,想的是改革法国社会,让他们这些自诩的知识精英为启蒙后的新社会把舵。在这个新社会里,法国文化将会相当于整个欧洲文明,乃至普遍的人性。“启蒙哲人”可以与更激进的“观念学派”(ideologues, ideologists)相比照,后者与国民议会联系在一起,比如发明了“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的特拉西,还有卡巴尼斯。

法国启蒙运动提供的社会理论观念和现代性观念,影响也是极为持久的。它是对理性和进步的讴歌,是对传统高奏凯歌的现代性,代表着科学对宗教和日常知识的大获全胜。尤其是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社会科学强烈地体现出经验主义的特性,体现出革命后行政主义、共和主义国家的权力,这样的国家为自己设下的任务是根据大革命的各种理念来重新构造社会。而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集中地体

现了现代性的精神。物质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和共和主义都是它的驱动力。实证主义的源头也在这段时期,此时的社会科学将医学、数学和生物学奉为圭臬。大革命之后,知识原本允诺担当的批判功能开始向为中央集权国家服务的知识的行政观妥协。归根到底,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关注的是知识的理性,在法国,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形成截然对比的是,没有一位思想家发展出名副其实的完善的社会理论。不过,法国启蒙运动还是奠定了一种持久相传的观念的基础,就是将现代性视为有关知识和权力的一种话语。必须指出,大革命也导致了社会政治思想中一股保守主义潮流的形成,例如法国的德·迈斯特(1754—1821)和德·博纳尔(1754—1840),英国与爱尔兰的柏克(1729—1797)以及德国的费希特(1762—1814)。如果说大革命使欧洲的社会思想家两极分化为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也就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和捍卫者,那么,在美国,独立战争和一个联邦国家的兴起这样的决定性事件,则使得人们更为强调政治共同体的道德基础,而不是社会本身的道德基础。虽然传统与现代性的两分对立在美国不像在欧洲那么强烈,但总体上还是可以说,社会理论的诞生,特别是社会学的诞生,就是来源于强烈地感受到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断裂,并且期望克服这种断裂所产生的一系列两分对立:共同体与社会、神圣与凡俗、地位与契约、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起源与目标、分化与整合。因此,社会理论孜孜以求于一种整合的原则,能够调和现代性的种种矛盾,赋予这个失序、碎裂的世界以统一性。

除此之外,还必须提到康德(1724—1804)和黑格尔(1770—1831)。他们奠定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从某个方面来讲,经典阶段社会理论的整个历史都属于与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争论。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说,集中体现了现代性革命精神的康德开启了三项核心问题:社会的限度、知识的限度以及在一种世界主义的秩序当中权力的合法化。第一项问题,在此只需指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和《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等著作里,就社会范畴的规范基础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指出,道德是自主的、自我立法的;而在另一方面,自然是客观的,本身也是自主的。在自然和道德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基础:从人性当中推演不出理念的法则。这是对比较古老的自然法传统最初的重大打击之一,大大促进了世界的去中心化过程。这个过程从科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开始,由达尔文、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完成,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原本固定不变的参照秩

* 苏格兰两座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城市,历经数百年的爱丁堡(Edinburgh)大学和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是上述道德哲学家的活动中心(如穆勒和亚当·斯密即分别出自两校),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象征。——译者注

序——不管是生物学、意识还是语言——的核心地位给相对化了。但康德对自然法的摆脱也暴露出一个问题:根据康德的说法,那些归根结底源自“天命”(providence)的政治、社会或历史便没有了一席之地。简言之,康德丝毫不曾考虑到社会范畴本身的自主性,无法说明人类是如何从自然状态当中发展而来、并赋予自身各项社会制度的,除非诉诸老套的“天命”观念。

第二项问题,康德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他的知识学说,他力求贯通英国的经验主义(洛克与休谟)与法国的理性主义(笛卡尔)。对康德来说,知识必须是自我限制的,对自身的限制有清醒的意识。他就此主张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一种批判性知识,即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始终有可能过多地宣称自身了解范围的知识。他还否定了认为知识具有一体性的幻觉,主张从根本上说存在三种知识:自然知识、道德知识和审美知识。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1790年)中概述的审美知识,是对前两种知识的综合。这种将现代性划分成认知、规范和审美三块价值领域的三分法,深深影响了日后像韦伯和哈贝马斯这样的现代性理论家。在康德看来,知识结构的这种自我批判的性质、分化的性质所产生出的解放力量,正是现代性的最高体现。这种看法体现在他的名文“什么是启蒙?”(1784年)以及一篇题为“系科之争”的作品(1798年),后者第一次证明了现代世俗大学体制的正当性。

第三项问题,如果说康德的认识论是与休谟和笛卡尔的争论,那么他的政治哲学则是与卢梭的争论。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年)和《论永久和平》(1795年)等作品里,康德勾勒了一种国际共和秩序和世界公民身份的观念,其中的意义如今比往日更显重要。在对市民社会的种种解释当中,这也属于立场最为激进、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不过话说回来,康德缺乏对个人的社会性质的理论阐述,因此还受到自然法传统的束缚,这使他把社会看作是其成员的单纯聚合。

黑格尔的哲学可以看作是对康德的批判的历史解释。他的根本洞见在于,道德是在社会当中创造出来的,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得到表达的。这种看法体现出一种转变,从康德思想中无法调和的二元论,转向《精神现象学》(1807年)和《历史哲学讲演集》(1837年)里勾勒的那种辩证法。在黑格尔这里,认识论不再只是一种知识学说,而是变成了社会理论:问题成了知识如何在历史当中构成。黑格尔对知识所做的历史化处理可以如下方式来说明。现实是通过知识来构成的,而知识始终具有批判性(在康德那里,知识只是自我限制的;与此不同,这里的知识能够转变它的对象):因此,知识与现实都是以辩证的方式塑造出来的。所以,对黑格尔来说,批判性知识就是一种意识提升形式,而知识的最高形式就是作为自我意识的那种意识。当然,黑格尔的社会理论还带有相当的观念论色彩:知识形式的演进对应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普遍”与“特殊”在不断提升的知识形式(最终将

超越社会)的形成过程当中得到了统一,构成他所谓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认识论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如何解释自身的学说,兼具辩证法和现象学的色彩,尽管从属于历史哲学,但仍可以看作是后来成为“知识社会学”的早期版本。不过,康德一样,对黑格尔来讲,知识也始终具有自我限制的性质,虽说他与康德有所不同,认为知识作为时代精神的自我意识,总是不能及时到来,无法在政治实践中实现,所以最终只能借助“理性的狡计”,为哲学家所把握,因为哲学家是时代的根本表达,从而可以超越于时代。就此而言,黑格尔的思想是激进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可以一方面拒绝革命的观念,尤其是革命分子的观念,同时还能证明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

在《法哲学原理》(1821年)里,黑格尔概述了一套市民社会理论。伦理生活(Sittlichkeit)或共同体存在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领域)。市民社会既创造了伦理生活,也扼杀了伦理生活,因为“需求体系”是在资本主义的各项条件下实现的:“伦理生活四分五裂并就此丧失”。所以现代意识是“一种不满的意识”。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一种高于市民社会的共同体表现形式,是弥补市民社会缺陷的一种功能(国家既是干预主义的,又是福利主义的)。概言之,黑格尔社会理论的主题就是市民社会当中意识的分裂/异化,就是寻求一种政治上的解决来实现共同体。

我们可以将有关现代早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这段概述归结如下:在这段时期,通过对政治权威性质和知识地位的反思,社会理论逐渐兴起。对社会范畴的关注,对历史哲学的关注,逐步代替了有关合法权威性质的宪制问题和政治问题。导致转向社会范畴的决定性事件是人们开始觉察到:现代性是一种危机四伏的话语,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法学理论,都不足以说明现代性危机的实质。而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的《为女权辩护》(1792年),则在批判性地理解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书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套关于民主政治的激进理论,而且还是关于主体性的批判。^[2]

1.3 现代性之危机:欧洲经典社会理论的形成

现在我们要来探讨欧洲社会理论的经典时期。在启蒙运动社会思想的背景下来看,我们会发现出现了一种自觉,意识到现代性也产生了深重的社会问题。19世纪继承了早期对知识的理性的迷恋,尽管如此,19世纪的社会思想却表现得更明确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关注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要求的那种政体。它对自身的理解是改良式而不是革命式的;不过,革命的冲力依然留存,刺激了工业时代新生的关于社会的追问。因此,市民社会的重大主题也分裂成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

社会观（马克思）和工业社会观（孔德、斯宾塞）。经典时期的前半段大致是 19 世纪中叶，不过向前可以追溯到大革命以后的时期，向后可以延续到 19、20 世纪之交的世纪末时期。在这段时期出现了两种彼此竞争的现代性观照，一是马克思（1818—1883）的学说，一是孔德（1798—1857）的学说。

人们一般尊孔德为社会学的创建者，社会学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他的主要著作《实证哲学教程》（1830 年至 1842 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现代性所做的重要解释之一。孔德与此前所有的社会理论家都有所不同，第一个对社会本身的性质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作为 19 世纪 20 年代的一代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致力于调和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与保守的、反革命的复辟时代，前者萦绕着对于社会失序、恐怖、革命变迁的忧惧，而后者则带来了稳定，为工业主义奠定了基础。在他全部思想中贯穿的主题是：现在是不完善的，甚至是软弱无力的。他敏锐地从现代性的核心当中捕捉到一种根本性的危机感。在黑格尔的启发下，他的社会学是以一种观念论的抽象方式强调变迁，认为社会是随着它们的知识体系的发展而经历着变迁。他的“三阶段”法则描述了一种规范性的进程：社会从神学阶段（巫魔的或前反思的知识占据主导地位）进步到形而上学阶段（典型的知识是理性的、抽象的知识，比如主权和法律方面的观念），再进步到实证阶段（现代实验科学成为主导知识形式）。他对社会学的贡献也大大归功于他对“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区分，这种区分大致上涵括了秩序与变迁的观念，以及将社会学分析视为有关结构和功能的考察的观念。孔德受到了生物学领域发展的影响，相信可以从部分对整体的功能主义关系的角度入手来分析各个社会。在他看来，现代性首先是不断增长的知识力量的产物，他眼中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就是实证主义的时代，他的意思是说，知识将充分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孔德是 19 世纪 30 年代最令人瞩目的社会思想家，甚至在法国之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在 19 世纪 50 年代之后，孔德对现代性的观照遭到了它最大的挑战。挑战来自一位恢复了革命传统的思想家。马克思的现代性图景强调的是现代性未臻实现的本质，并第一次*诉诸一种集体行动（collective agency）的观念。马克思承继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并进而分析了阶级结构，以此扩展了关于分裂的阐述。他和黑格尔一样，都相信包括社会现实在内的现实不能被化约为一种本质，而是由多种矛盾所构成。不过，不同于黑格尔的是，他并不认为这些矛盾会在一个较高的层级（在黑格尔那里，就是国家，即绝对精神）上得到解决。因此，辩证法的概念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却在一种更具社会性的批判理

* 英文为“……,for the first, time……”，疑为原书之误，应为“……,for the first time, ……”。——译者注

论当中获得了新的意义。科学在与其对象的关系之中辩证地向前发展,构成了它的对象,同时也为它的对象所构成。理论与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变成了阶级意识的提升。

我们可以在与下列思潮的批判性论争背景下来看待马克思的作品:自由主义(洛克、穆勒),乌托邦社会主义(圣西门),左派黑格尔主义者(像费尔巴哈这样激进的黑格尔信徒)以及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亚当·斯密)。针对自由主义,他宣称基于抽象权利的市民社会是有局限的。针对自由主义理论家,他也主张要彰显社会正义。针对19世纪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比如圣西门,他对孔德的影响极其重要),他坚持把现代社会根本上看作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因此并不相信工业主义的种种力量会把社会带向乌托邦的美好前景。针对黑格尔和德国观念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1820—1895)主张用一种物质论的概念来看待历史,而不是把历史化约为精神或宗教之类纯粹文化产物的展现。而针对古典经济学家,他则主张形塑社会的是利润的来源,而不是亚当·斯密所主张的“看不见的手”。

马克思早期的著述,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贯穿着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praxis)和异化主题。劳动是实践的首要范畴,它意味着人的自我实现,人的创造性以及人的需要的满足。所谓知识主体与知识客体的分离这一旧有的认识论问题,在早期马克思这里变成了一套异化学说,一套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的学说。在《资本论》(三卷本:1867年、1885年、1894年)里,他纯粹从社会学的角度勾勒了一套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而不再诉诸某种历史哲学。在这种转向后期著述的过程中,他也更明确地强调了结构,这与早期著作里所谓创造性能动作用的主体构成了鲜明对照。

主导成熟期著作的是关于商品化的主题。资本主义社会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化约成商品,而这样的商品已经不仅仅是客体对象,而且是“拜物教”,因为它们是由主体性与客体对象之间种种被扭曲的关系组成的。他的“商品拜物教”概念表明了结构和文化再生产是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也表明了不能把文化看作超越于社会现实的东西。至此,社会理论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马克思的作品处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中。他主要的努力之一,便是要说明利润的来源和意义,在他看来,这是现代社会中的驱动力之一。和他那个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鲁东、李嘉图、亚当·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通过勾勒他的“劳动剩余价值论”,成功地说明了利润的来源。这套学说是马克思整个资本主义学说的基础,因为它使马克思得以主张阶级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根本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的。根据劳动剩余价值论,利润是在劳动力与工资的交换中产

生的,劳动力是实际的劳动能力,其实也就是时间,而工资则是劳动者凭其劳动时间而非其生产出的产品的价值所得到的报酬。这些产品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而被售卖,产生出为私人所占有的利润。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根本上讲只有两个阶级,一方是那些为工资而劳动的,另一方则是占有利润的,即资本家。这种矛盾的解决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驱动力,使它成为至此存在的所有社会当中最具活力的一个。

因此,概言之,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特征首先便是商品化。社会范畴作为分析的对象,不能被化约成市民社会及其权利模式,而需要有一种批判,其规范性的立场就是为社会正义而斗争。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对他来说,批判的宗旨不是单纯为了说明或理解社会。社会科学的知识本质上就对通行的秩序持批判立场,并致力于揭示支配的体制。

在孔德和马克思之后,社会理论分裂成三股传统。一股传统部分来自于孔德,其主要的代表是托克维尔、斯宾塞和涂尔干,这股传统构成了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基础。它经常让人想到明确地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强调现代性,想起一种社会分化的观念以及功能主义的分析。它有许多支脉,但都体现出在相当程度上奉行实证主义。第二股传统源自马克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在欧洲社会理论的经典阶段,在马克思去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股地位显著的理论传统,但它从商品化的角度来强调现代性的思路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功利主义之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替代思路,后者尽管最初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哲学,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三股是后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敌视态度,但并非不可调和。这股传统来自于新康德主义的德国思想,主要是与韦伯联系在一起。它的主要倡导者包括齐美尔,以及后来的曼海姆、沃格林、博克瑙、舒茨和埃利亚斯。他们分别代表了韦伯式现代性诊断的不同支脉。贯穿韦伯著述的重大主题是有关文化和理性化的主题,尤其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悖论。我将依次评点这几股传统,从斯宾塞开始,然后是涂尔干,最后是韦伯和齐美尔。

斯宾塞以一种更系统的方式承继了孔德的观念,并对现代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为孔德的功能主义所折服,将其树立为社会学说明的理论基础。社会静力学就是对社会秩序的分析,而社会动力学则是对变迁的分析。他的全部著述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通过物质、能量和运动的相互作用,会出现一种他称之为分化的过程,变迁就是在这种分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他的进化学说主张,变迁是从简单性到复杂性的运动的结果,是专门化的结果。在所有的物质形式中,不管是生物形式还是社会形式,这样一种从统一到分化、从同质到异质的运动都在发挥作用。他把

自己的分化理论用到现代社会上,主张现代社会的规定性特征就是其整合能力,体现在它的经济互赖、自愿合作和政治自由主义上。他坚信进步的理念,并在此激励下,把社会变迁理解成一种历史进化过程。现代社会作为“工业社会”,凭其实现稳定的能力而与“军事社会”构成截面对照。军事社会指的是军事化、集权化的国家,它们的社会秩序是由等级和忠诚确定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斯宾塞认为,自己所处时代的这个社会代表了一种比此前各个社会形态更为先进的形式,但他的“工业社会”和“军事社会”观念只是理念性或理论性的建构,用来描述各个社会来回演变的两种极端。在这个历史时间的连续统上,具体存在的各个社会都只是过渡性的,处在两种理念型当中的某个位置上。在经典阶段的所有社会理论家里,斯宾塞也许是最不强调从危机模式入手来看待现代性的。大致可以推想,这与以下事实不无关联:和绝大多数欧陆国家不同的是,英国的社会政治秩序相对比较安定。

孔德和斯宾塞将社会变迁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向度上逐步展开的进化过程,这种观念也反映在涂尔干(1858—1917)的社会学里。和斯宾塞一样,涂尔干也采用了一种两分类型体系,把各种社会放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两个极端之间。他的模式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当中,机械的整合形式被有机的团结形式所取代。(前者的典型特征是一种非常强调作为身份参照点的群体的集体意识,以及价值体系和社会行动者之间某种直接的、“机械的”关系;而后的典型特征则是个人主义和合作,通过与实质性价值相对的一般化规范体现出来。)现代社会高度分化,是“分工”的产物。涂尔干最著名的作品,1893年出版的著作的书名就体现了这一点。现代性涉及从通过宗教和家庭实现的社会整合,转向通过职业群体实现的社会整合,以及这些群体与英才教育之间的相互依赖。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是修复性的(*restitutive*),与(传统社会中)压迫性的文化结构截然不同,使个人之间有可能相互合作,相互补足。对现代性状况下的道德的这种关注,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

和斯宾塞一样,涂尔干也相信,自己所处时代的这个社会已经抵达一个转变的关头,机械的整合形式业已瓦解,但现代的形式尚待显现。这或许可以说明他为何有兴趣研究“失范”,即通过自杀之类规范缺失状态(*normlessness*)的病态现象体现出来的社会统合的崩溃。他探讨自杀的名作《自杀论》(1897年)可看作对现代性之病患的一种评论,这部作品无疑受到叔本华的文章“论自杀”(1851年)的影响。叔本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思想产生了悲观主义的影响,大体上也深深地影响了涂尔干,反映出在涂尔干总体上的实证主义倾向之外,也有理念主义的一面。实际上,涂尔干的“集体表现”概念与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

世界》(1818年)有着直接的联系。不过话说回来,涂尔干在政治上是位实用主义者,希望在道德个人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实施社会改良和重建。对于社会失序,对于在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和德雷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的威胁下形成的忧惧氛围,他深表忧虑,这对他的现代性理论大有触动。毫无疑问,涂尔干的社会变迁观归根结底关注的是一种“有机的”公民道德成为新式社会契约的基础的可能性。

韦伯(1864—1920)受到尼采的强烈影响(他使韦伯提出了现代世界“伦理非理性”的主张),深切关注在一个理智化、理性化的世界里的意义问题。韦伯的研究途径是把文化看作一种自生的力量,它能够赋予人意义,赋予人对于自身利益的取向,正是这样的能力驱动着文化。韦伯的社会理论很复杂,但它的有些基本主题可以说与理性化过程有关,通过这种理性化过程,文化的价值体系逐渐转变成自身内在动力的结果,按照韦伯的记述,这个变迁过程就是从巫魔到宗教再到现代物质主义的文化理性化过程。在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社会学以及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年至1905年)里,韦伯描绘了宗教价值,尤其是对救赎的形而上追求,是如何导致了对充满物质利益的凡俗世界所持有的一种特定立场。西方世界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基督教,特别是它的加尔文宗,蕴含着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一种张力。基督教和世界上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为了确保来世得到救赎,需要有一种兼具理智性和物质性的关于如何操持世界的伦理。就此而言,韦伯相信基督教是产生社会变迁的一种充满动力的力量。

尽管如此,韦伯并没有采取一种单一因果关系的简单模式。他对文化的强调必须放在他更宽广的理性化理论背景中来看,因为他相信,理性化在所有生活领域里都发挥着作用:法律,科学,经济和政治,概莫能外。最具影响的变迁发生在16世纪到18世纪的西欧,此时的基督教理性化在早期加尔文宗的“新教伦理”那里达到了顶峰,从道德上和文化上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并促使价值与利益之间达成了完美的和谐。从此之后,根据韦伯的命题,资本主义和改革后的基督教所独具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扩散到各个生活领域,并最终促成了一种科层式的个人主义,也导致了意义的丧失。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基础就是一种根本性的悖论,即著名的“理性主义的悖论”,就是说西方世界对意义的追寻产生出一种理性化的、充满意义的秩序,而这种秩序却又毁灭了意义的可能性本身。新教伦理越是使世界理性化和理智化,就越是将意义从这个世界中清除出去,最终也清除了宗教的各项条件本身。这种悖论产生出两种核心冲突。首先是各个现代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即一种统一的世界观不复存在,科学、道德和艺术等各个自主秩序开始兴起,其原因便是他所谓的文化的“除魅”(disenchantment),即文化不再有

能力使人着迷或提供魔力。意义越来越成为主体性的东西,而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下,诸如科学与道德之类的文化领域再也不能够调和在一起。因此,现代性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伦理非理性”的基础上。韦伯还捕捉到在各种理性秩序之间存在第二种冲突,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在总体上的文化与科层制、法律和经济等工具化了的秩序之间存在的冲突,后者似乎摆脱了主体文化的束缚。在韦伯看来,最后尚存的巫魅(enchantment)在于(公共生活中的)克里斯玛和(私人生活中的)爱欲。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俄国革命爆发,德国陷入一片混乱之时,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1917年至1918年)。在演讲中他提出,现代世界不仅已经丧失了宗教的确定性,而且伴随着启蒙运动的最终崩溃,还可能正在丧失现代主义知识的安全感。在20世纪早期欧洲社会理论重新确定方向的过程中,这篇文本的地位至关重要,代表了对后现代性之到来的最早认识之一,也是对欧洲社会重建过程中激进观念之作用的谨慎认可。

最后可以来谈谈齐美尔(1858—1918),以此结束这段对经典社会学的阐述。在齐美尔这里,现代性观念遭到了第一次重大批判。他的核心概念之一——“文化的悲剧”,表现了20世纪早期社会理论典型的对于现代性愈益悲观的论调。在“文化的概念与悲剧”(1914年)和“现代文化的冲突”(1918年)里,他把现代性看作是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根据齐美尔的说法,文化分割为两种形式,一是文化的主体创造,即作为从个人那里生发出来的文化;一是文化趋向于呈现为属于自身的客体存在。他所谓的文化的悲剧,指的是这两块领域之间的分离:理性化造成了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丧失,导致了文化的客体化。在另一名篇“大都市与精神生活”(1903年)中,齐美尔概述了现代城市是如何成为这样一块领域,客体文化以主体文化或个体文化的牺牲为代价而在其间发展。大都市的特点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的体验。在大都市里,货币经济获得了绝对主导地位,形塑着各种社会关系,导致体验的碎裂。齐美尔的《货币哲学》(1907年)受到了马克思商品化观念的启发,并影响了韦伯的理性化学说。他在书中把自己有关文化悲剧的分析扩展到货币研究,把货币作为一种加剧了生活的物化的文化范畴。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比韦伯或涂尔干更明确地表现了异化的概念。不过,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与劳动维系在一起的,而与此不同,对齐美尔来说,异化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范畴。概而观之,齐美尔将马克思关于商品化的分析拓展为一种消费社会学,因为在他眼里,消费行为比生产更典型地体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特征。出于这一原因,人们经常把齐美尔看作是文化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将齐美尔和涂尔干相比,我们也能发现分化的主题,这也是前者一部书的书名,即《论社会分化》(1890年)。尽管如此,对齐美尔来说,必须是从商品化和理性

化过程的角度来看待分化。齐美尔同意涂尔干的观点,都认为社会是凭其自身而存在并值得进行科学分析的现实,但他并不像后者那样,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把社会看作是由“社会事实”组成的一块结合紧密的物质领域。他也不是从团结和公民道德的角度来看待文化,而是从个体自主性的碎裂体验的角度出发。在欧洲所有经典大家当中,齐美尔最为关注个人社会化的主题,而在他的著述里,“文化转向”也体现得最为明显,虽说这在凡勃伦的作品里也很突出,比如他的《有闲阶级论》(1899年)。齐美尔的大多数作品关注的是对社会中交往关系的分析。总之,可以说齐美尔代表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极致化,正是在他的作品里,商品化、理性和分化这三项重大主题奠定了20世纪社会理论的基础。

总之,现代性是社会学中经典传统的背景。这门学科的三大创建者,即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现代性状况之下社会范畴的兴起。从孔德经斯宾塞到涂尔干,极为注重功能主义,这股现代化的思想传统强调分化观念作为现代性的独特性质:在工业社会的演进过程中,社会功能愈益分化为各个专门化的领域。在韦伯的社会学里,至关重要的概念是**理性化**的观念。现代性带来的是理性化过程在宗教、经济、法律和科层制等领域中逐步展开的进程。而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的独特性质既不在于分化,也不在于理性化,而在于**商品化**,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中去。马克思所致力解决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结构(资本法则)与行动(劳动从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之间的关系。齐美尔所代表的对这些研究途径的综合,则标志着欧洲社会理论的衰落和美国社会理论的兴起,因为齐美尔思想直接影响的正是早期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

1.4 抛弃现代性:欧洲社会理论的衰落

欧洲社会理论的经典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走到了尽头,这是欧洲社会思想的一个分水岭。1917年涂尔干去世,1918年是齐美尔,而1920年则是韦伯。在他们英年早逝的时候,某种悲观主义已经潜入了社会理论,甚至在他们后期的著述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迹象。而现在则受到了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等另一代著作家的深重影响,他们的思想正是对启蒙运动的拒弃。与涂尔干和韦伯不同的是,齐美尔接受了战争带来的病态现象,并且和当时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在国家主义和审美主义的共同影响下,欣然认同一战,视其为解放性的事件,能够克服“文化的悲剧”,重新将“形式”加于“内容”。实际上,20世纪早期在欧洲兴起的社会理论明确具有反启蒙运动性质,宣告了现代性的终结。尼采

■ (1844—1900)、弗洛伊德 (1856—1939) 和海德格尔 (1889—1976) 是此时最令人瞩目的三位思想家。无论是滋养对于现代性的除魅, 还是去除启蒙运动的承诺本身, 即知识的确定性和以理性方式组织政体的可能性, 尼采都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尼采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而主张一种时常称作虚无主义的个人的反抗伦理, 拒绝所有的绝对价值。弗洛伊德则揭示了在理性的自觉意识和人格的统一性、一致性之下, 还潜藏着深层的、非理性的无意识力量, 前历史的文明冲突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尽管他的著述主要探讨的是性的原初力量, 但他后期的著作受到一战及随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影响, 开始更为明确地关注侵犯。他的核心见解之一是指出, 人类具有对压制的对象抱有爱恋之情的倾向, 所有的文明都建立在暴力的原初行为基础上。至于海德格尔对于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 则在于他强调人类社会的基础或本体条件是语言而不是理性。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里勾勒的哲学, 导致了回归早期希腊思想; 同时, 对尼采作品的关注和对技术的批判, 也导致了抛弃启蒙运动的遗产。这三位思想家都表现得非常强调个人, 普遍地怀疑社会, 怀疑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朝向语言和无意识的转向, 这种对现代性的抛弃, 有着多方面的体现: 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 历史主义的终结, 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 以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冲击下, 牛顿式科学已经行至末路, 而这些发展也反映在绘画中表现主义的兴起 (恩斯特·克利), 建筑 (包豪斯学派), 以及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乔伊斯、庞德、T. S. 艾略特)。这些思想运动受着一战后社会重建需要的激励, 都鲜明地体现出对逐渐丧失信誉的那种欧洲历史的公开抛弃, 体现为聚讼不已的相对主义哲学, 回归否定经验内容的形式主义和抽象性, 以及从自我创造的角度来看待意识。

一次大战后的欧洲社会思想可以分作: 西方马克思主义, 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葛兰西; 较具保守倾向的社会学家, 比如奥特迦、格伦 (具有纳粹倾向) 和滕尼斯 (尽管在政治上是位社会主义者); 其他具有各色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还有曼海姆、雅斯贝斯和阿伦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德国世纪末文化悲观主义传统下写作, 秉承了这种传统中深重的浪漫主义和绝望基调, 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 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尼采、韦伯、曼海姆和弗洛伊德的学说调和起来。他俩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4年)的主题便是: 人类的历史就是自然与神话之间斗争的历程。他们一直把启蒙运动追溯到文明之始, 认为它表达了通过工具理性而实现的对自然的主宰, 也是对恐惧的主宰。因此, 随着社会越来越获得对自然的主宰, 它也必须对主体性行使新的支配形式。也就是说, 对自然的主宰是以对自我的支配为代价的。这就是所谓“启蒙的辩证法”: 支配的内化。所以说, 启

蒙运动是工具性的,将知识与权力条件维系在一起。在这部悲观主义著作的作者看来,文明历史的终极表现,就是在纳粹、苏维埃的例子中表现出的极权主义,就是他们黯淡眼神中的现代大众社会。通俗文化、娱乐或“文化工业”被说成是极权主义通过其他手段的进一步延续。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讲,现代性的主旋律并不是韦伯所谓的“铁笼”,而是毒气室。

与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理论,将现代性化约为它的负面特征:现代性被视为一个封闭的、总体化的权力体系。现代性有三个向度:道德—实践向度,认知向度和审美向度。其中只有最后一个向度有可能为突破他们所谓“总体受操纵社会”中的支配提供另外的出路。只要审美向度依然保持在大众社会中的自主性,就可以维持被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拒弃的救赎性批判的力量。从这方面看来,尽管他们持有总体批判的立场,但归根结底遵循的还是启蒙现代性的模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包括如下方面的作品: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葛兰西、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以及稍后一代的勒费弗尔、戈尔德曼和阿尔都塞,还可以加上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名字。总体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映出从政治经济学转向关注文化,关注意识的物化,这种转向最终在后现代主义这里达到了极致。其中影响深远的著作包括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1923年)。而它的许多具体表现可以看作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1918年俄国革命的后果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如果说马克思的著作是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做出的回应,那么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1918年的余波冲击中对革命信念的一种反思,而在西方世界,也就是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兴起的反思,因为它们对现代性的规划提出了质疑。

而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1887年)里,则从一种更具保守色彩的视角出发,认为现代世界将会导致共同体的衰亡。所谓共同体,指的是由传统社会关系组成的有机的、结合紧密的世界;而所谓“社会”,指的则是分裂了的现代性的世界,其结构是理性化、理智化和个人化的。共同体是文化上整合一体的总体,而社会根本上是由其各个部分所确定的。在滕尼斯眼里,共同体,即村庄的世界、乡村共同体的世界,已是渐行渐远,而社会,即城市的世界、都市文化的世界,则行将到来,他对此深感遗憾,因为他坚信,共同体会为个人提供更多的道德资源。因此,共同体的观念能够使人有更强烈的归属感、邻近感和总体感,而社会则意味着碎裂、异化和距离。滕尼斯就此认为,现代性正慢慢地回复到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它原本就是从那种状态当中衍生出来的。实际上,他发表过许多有关霍布斯的著述,认为这

位学者对社会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类似的视角出发,西班牙理论家奥特迦在《大众的反叛》(1930年)里也同样相信,时代的困境正在于大众倾向于反叛精英,而精英的统治对于维护稳定是非常紧要的。在《西方的没落》(1918年)里,施本格勒也描绘了一幅欧洲文明衰落的图景。

总的看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标志着欧洲社会理论的衰落。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许多一流大家移居英美,这也加速了欧洲社会理论的衰落。欧洲人往往对现代性抱以悲观的态度,而美国人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重新构建社会理论的基础。其实,这些学者中许多是在德国受的教育,当他们回到美国,经典传统也就开始和美国传统相嫁接了。

1.5 现代性之美国复兴:美国社会理论的兴起

美国社会理论有三股来源: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联邦立宪党人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皮尔斯、罗伊斯、詹姆士和杜威),以及德国古典观念论和社会理论(特别是康德、黑格尔、齐美尔和韦伯)。联邦立宪党人从自由政体和道德共同体的角度入手,奠定了一种政治社会观的基础;实用主义者提供的是一种理性世俗伦理和常识实在论的观念;而齐美尔和韦伯的社会理论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一种对于社会的理解。米德和帕森斯是美国首要的两位社会理论家,是他们重振了欧洲的传统。^[3]

米德(1863—1931)求学于德国,师从19世纪晚期首要的新康德主义者之一狄尔泰(1833—1911),力求融通德国社会思想与美国实用主义,尤其是杜威和詹姆士的作品。这几种传统的融合为符号互动论奠定了基础,从全新的角度,将主体性理解成是在社会当中构成的。在诸如《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年)这样的著作里,米德主张将自我理解成主体间性的,通过社会控制、角色和一般化他人等机制,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建构而成。这种见解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我和道德,将社会学理论阐述的起点设定为互动,而不是行动或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换使用)。米德的影响相当可观,曾经一度,欧洲经典社会理论的宏观社会学关注都从属于符号互动论中微观社会学的世界。尽管米德并不是探讨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现代性的理论家,但我们还是可以把他的著作看成以一种极为系统的方式,力求把握作为社会自我并具有公共责任的现代自我的构成。这种自我观既摆脱了从集体主义出发设定一种社会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又摆脱了从个体主义出发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自我观。归根结底,他关注的是要开辟一条通向普遍主义道德的道路,有了这样一种道德,社会就可以更好地处理它的种种问题。对于

公共道德——有时称作“公民宗教”——的这种渴望,标志着美国社会理论摆脱了欧洲社会理论,后者业已陷入了虚无主义。

美国社会理论最初受到的形塑作用,是在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中体现出的带有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色彩的实用主义,但后来越来越受到帕森斯(1902—1979)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他在二战后主宰了整个美国社会理论。在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当中,帕森斯第一个尝试去综合经典社会理论,后者已经分裂成分别由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开创的几股传统。在他的首部主要著作,即《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中,帕森斯为自己设下的任务正是要为经典社会理论提供这样一种综合。他的命题是:可以把经典社会理论理解成几种理论传统的融会,从经济学理论导向社会学理论。在这部著作里,帕森斯力求用他所谓唯意愿论的学说,比如帕累托和A. 马歇尔的学说,来整合韦伯和涂尔干的研究途径。在帕森斯看来,问题就在于把握价值(涂尔干社会学的主题)和行动(韦伯的理论所概括的那种)如何能够与利益联系在一起。奇怪的是,在帕森斯看来,研究利益问题的代表性理论家是帕累托和A. 马歇尔,却不是马克思或弗洛伊德,马克思在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当中算不上一位重要的人物,而弗洛伊德的重要意义帕森斯只是在此书第二版中才予以承认。

贯穿帕森斯著作的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秩序如何可能?他的早期著作深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从约束和选择的限制的角度来提社会秩序的问题。所以,对于早期的帕森斯来说,关于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霍布斯的那些问题,只不过是规范的视角而不是功利主义的视角来处理的。而他在成熟期的著作,比如《社会系统》(1951年)和《迈向一般性行动理论》(1951年),涂尔干的色彩就要重得多,强调规范整合。在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的这些作品里,帕森斯逐渐舍唯意愿论而取功能主义。以韦伯的晚期著述和法兰克福学派为最佳例证的欧洲社会理论相信,规范整合正在意识形态的扭曲和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影响下受到破坏,而帕森斯作为一位美国自由主义者,却对社会的未来抱持乐观的态度,深信各种规范机制将会牢固地调控好现代性所造成的功能分化,并且存在某种功能一致性,可以确保社会的再生产能力。这可以看作是表现了“美国例外论”,即认为美国的现代性道路有能力避免欧洲所遭致的种种灾难。

帕森斯的现代性观照从一种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入手,重新阐发了欧洲经典的现代性观念,其本质就是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功能上整合一体的社会的结构逐步展开的进程。因此,当欧洲社会理论最终在某种程度上退到了各执己见的状况,此时帕森斯所确立的社会理论则是建立在对共识整合的信念的基础上。在此还可以提一提另一位美国一流社会理论家贝尔,他在另一种传统中写作,他的书《意识形态的终结》(1962年)集中体现了帕森斯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前提假设,也就是

说,战后的美国社会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政治文化,以自由民主和个人成就等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从而消除了冲突。

尽管默顿重新阐述了帕森斯式综合的一些核心范畴,比如引入了反功能的重要性,但这种综合并没有流传下来。伯格和勒克曼合撰了一部堪称经典的著作,即《现实的社会建构》(1966年)。和他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知识社会学,就体现出对帕森斯正统观念的一种重大挑战,为重新恢复被忽视的曼海姆的活力开辟了途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对现代化理论的各路批判者开始重新兴起,重视通向现代性的多重道路,在此挑战之下,帕森斯的影响业已消逝。在美国,米尔斯在流亡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启发下,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从古尔德纳到像马尔库塞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帕森斯功能主义的各路批判者也大大消解了它的主宰地位。不仅如此,在一个正逐步进入文化革命的时代里,他的理论的意识形态假设,即认为社会是建立在共识价值观念和一致性的基础上,已经不再让人相信了。学生的反叛,越战,女权运动,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以及民权运动,所有这些都对结构功能主义所塑造的新进化神话提出了质疑,而20世纪70年代早期波及世界的资本主义危机则对这种神话构成了更进一步的挑战。当帕森斯开始撰写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即《美国大学》(1973年与普拉特合著),此时的结构功能主义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思想体系,无法应对社会抵抗。即便单就现代性制度而言,在帕森斯作品中非常重要的公民身份理论,也在英国社会政策分析家T. 马歇尔更具影响力的理论面前相形失色,后者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一文(1950年)也为公民身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持久的理论框架。

随着帕森斯理论的衰落,美国社会理论也开始丧失了它作为社会学知识创新中心的地位。^[4]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的社会理论重新焕发生机,生发出多种多样的理论传统,对一种理论正统观念的可能性本身也构成了挑战。这些传统中包括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和埃利亚斯的著作、阿尔都塞、后结构主义(罗兰·巴特、德里达、拉康),以及解释学和现象学当中的一些新的研究途径(奥尼尔、利科、伽达默尔)。到了20世纪末,美国思想中的主导势力已经不再是社会理论,而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战,这些思潮更关注的是政治共同体,而不是社会范畴的性质。不管怎么说,在美国影响依然强盛的不再是社会理论,而是界定更为狭隘的社会学理论,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途径就是一例。就与社会学理论相对而言的社会理论来讲,美国更像是欧洲观念的保育箱,而不是创始者。美国人对阿多诺、本雅明、早期哈贝马斯和晚期福柯的接受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1.6 结语:社会理论之碎裂

在帕森斯之后,要综合社会理论中各种理论传统的最具雄心的尝试,就算是哈贝马斯的了。在他最核心的著作,即两卷本的《沟通行动理论》(1984年)里,哈贝马斯雄心勃勃地希图综合社会理论中的两大脉络,以此奠定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新解释。在这部核心著作里,哈贝马斯试图把从马克思经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对于工具理性的批判,与从涂尔干和米德到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传统和符号互动论调和在一起。通过沟通行动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以宏大理论的形式来进行一种综合是可能的。现在是要围绕着工具理性与沟通理性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冲突来理解现代性,哈贝马斯分别把这两种理性联系到“系统”和“生活世界”,前者即经济与政治,后者即文化和社会关系。沟通行动被看作是对极其强大的工具理性的侵入所做出的抵抗,由作为文化现代性之载体的社会运动来调动。在哈贝马斯眼里,现代性这个方案并不曾耗尽活力,而是尚未完成。因此,哈贝马斯一方面对那些将现代性化约为一系列现代化过程的学者抱以抗拒的态度,同时既反对保守主义对现代性终结的批判,也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终结的批判。现代性始终蕴含着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某种张力,而只要生活世界还与沟通过程保持着关联,权力就永远也不可能是总体性的。与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他力主现代性的沟通潜力,认为这不能化约为工具主义;而与功能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又力主现代文化中包含的激进的、批判的要素。在许多人看来,哈贝马斯的研究途径在更具正统色彩的各种马克思主义途径之外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因为他能够在维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的同时,还可以提供一种比囿于阶级分析思路的分析更为多样化的晚期资本主义分析。

社会理论正逐渐分裂为互不相让的各种传统,许多人尝试要将它从这种趋势中拯救出来,其中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属于最为全面、最具雄心的尝试之一,但归根结底,他也未能达到帕森斯曾经享有的那种优势地位。宏大理论的时代已经逝去,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成了与其他理论途径并行竞争的一种研究进路,从卢曼、卡斯托里亚迪、吉登斯、图海纳、布迪厄、鲍曼和沃勒斯坦,到女性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思潮。通过沟通的方式安排起来的生活世界,和以工具的方式规定的系统,他在这两方面之间勾勒出的核心冲突并未经受住批判性的审视。而他新近的著作也反映出更关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而不是社会理论。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著作,属于对新兴社会运动的解放潜力所抱持的普遍信心,在这方面,他和图海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理论家。到了90年代,在新

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在旧有运动沦入制度化的冲击下,对于社会运动的解放潜力的这种信心逐渐消逝,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新理论途径,反映了在一个广泛认定的全球时代当中变化了的情势。

致 谢

本章承蒙下列人士阅读初稿并给予惠评,不胜感激:南希·库克(Nancy Cook),赫第·格兰杰(Herdi Granger),约阿斯,乔斯·伦纳德斯(Jos Lennards),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约翰·奥尼尔,威廉·奥斯怀特,克里斯·罗杰克,皮尔·斯特登(Pier Strydom)以及布赖恩·特纳。

注 释

[1] 括号内为初版年份。限于篇幅,我没有给出完整的详细书目。但我给出了一份深入阅读书目。

[2] 更具社会学意味的视角可见马蒂诺的作品,例如她的《美国的社会》(1837年)以及赖特的《美国风土与社会—观》(1821年)。

[3] 其他属于经典美国传统的重要人物还包括库利与帕克。

[4] 这样说并不是忽视艾森斯塔德、希尔斯、贝拉、里斯曼、柯林斯、加芬克尔等后帕森斯主义者的重要意义。

深入阅读书目

Abraham, J. H. 1973: *Origins and Growth of Soci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Alexander, J. and Sztompka, P. (eds.) 1990: *Rethinking Progress: Movements, Forces and Ide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Unwin Hyman.

Anchor, R. 1967: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Aron, R. 1965 and 1967: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Vols. 1 and 2. New York: Basic Books.

Bottomore, T. and Nisbet, R. (eds.) 1978: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Heinemann.

Callinicos, A. 1999: *Social Theo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amic, C. (ed.) 1997: *Reclaiming the Sociological Classics*. Oxford: Blackwell.
- Collins, R. and Makowsky, M. 1993: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5th edn. New York: McGraw-Hill.
- Coser, L. A. 1977: *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2nd ed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Craib, I. 1997: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lanty, G. 1997: *Social Science: 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elanty, G. 1999: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risby, D. and Sayer, D. 1986: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Giddens, A. and Turner, J. (eds.) 1987: *Soci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wthorn, G. 1976: *Enlightenment and Despair: A History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lbron, J. 1995: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ilbron, J., Magnusson, L., and Wittrock, B. (eds.) 1998: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Dordrecht: Kluwer.
- Hughes, H. S. 1958: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原书误为 Rein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New York: Knopf.
- Joas, H. 1996: *The Creativity of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ayder, D. 1994: *Understanding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 Levine, D. 1994: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ay, T. 1996: *Situating Social Theor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Nisbet, R. 1970: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London: Heinemann.
- Ritzer, G. 1996: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2nd edn. New York: McGraw-Hill.
- Rundel, J. 1987: *Origi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ica, A. (ed.) 1998: *What is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Skinner, Q. 1978: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Q. (ed.) 1985: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ydom, P. 2000: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The Making of Enlightenment Sociolog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Swingewood, A. 1991: *A Short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Szacki, J. 1979: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London: Aldwych.

Toulmin, S. 1992: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S. P. (ed.) 1996: *Social Theory and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Wagner, P. 1994: *A Sociology of Modernity: Liberty and Discipline*. London: Routledge.

Wolin, S. 1966: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Wrong, D. 1994: *The Problem of Order*.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Zeitlin, I. 1968: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第②章 社会科学的哲学



W. 奥斯怀特

奥斯怀特 (William Outhwaite) 教授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欧洲研究学院教授社会学。他的著作有:《理解社会生活:被称为“理解”(Verstehen)的方法》(1975,第二版由 Jean Stroud 于 1986 年出版),《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形成》(1983),《社会科学哲学的一些新学说》(1987)以及《哈贝马斯评介》(1994)。与博托莫尔(Tom Bottomore)合编有《20 世纪社会思想辞典》(1993)。

- 2.1 社会科学的性质
- 2.2 科学哲学
- 2.3 社会科学情况又如何?
- 2.4 客观性
- 2.5 结语



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哲学在社会理论里所起到的作用,要比在自然科学里显著得多,至于这种差异是好是坏,姑且不论。社会科学是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在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当中发展起来的,温奇在他 1958 年那本影响甚广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所谓“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正是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一项重大主题。实际上,对科学这一观念本身,社会科学哲学里的探讨可能要比总体上的科学哲学更为充分。科学哲学往往会将科学及其独特性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从对迷信和形而上学的批判迅速转向各种技术话题,而对于这些技术话题的讨论,又常常脱离了自然科学的实际发展。而在社会科学哲学里,社会科学是不是应该模仿自然科学,或者对于这些社会科学门类来讲,是不是应该把所谓“科学”理解成一种意思弱得多的系统来考察,始终还是有待探讨的话题。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向上,对社会科学哲学的设想本身提出质疑。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哲学。据称,社会科学应当安排属于自己的方法论事务,而无须哲学家插手,或者是无须承担哲学家角色的社会科学家插手,那样或许会更糟。诸如此类的观点不仅体现在那些认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基本上不成问题的实证主义者那里,而且也体现在像罗蒂 (Rorty, 1979) 这样的约定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那里,以及埃利亚斯 (1897—1990) 这位杰出的社会学家的作品里。第二种观点影响更为深远,不同意作为社会科学哲学的观念。在这种观点看来,科学就是科学,而科学哲学不应当有条块的分割。这种观念在 20 世纪中叶赢得了大量支持,当然,间接的认可多过明确的倡导;不过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种观念已经有些衰落了。

20 世纪的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其实可以大略分作三个阶段。这个世纪的前三分之一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一些彼此竞争的视角的延续或肇始:

1. 罗素和怀特海的逻辑原子论;
2.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
3. 形形色色的新康德主义视角,包括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历史主义和解释社会学或曰“理解”(verstehende)社会学;
4. 胡塞尔的现象学,尤其是他后来在 1938 年出版的著作中的现象学*以及由舒茨 (Schutz, 1932) 扩展到社会学中的现象学;
5. 种种马克思主义视角,包括正统的与非正统的;非正统的视角特别体现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Lukács, 1923),以及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联系

* 胡塞尔在该年并未有重要著作出版,但次年也就是 1939 年出版了《经验与判断》,疑原文有误。——译者注

在一起的“批判理论家”；

6. 韦伯有关方法论的著述,表述上不很系统,但却日见其影响;
7. 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在 20 世纪的中叶,维也纳学派以及英美的相关思想家与思潮所代表的视角,开始在英语国家取得霸主地位,并愈益在北欧也取得如此势力。“逻辑实证主义”或者维也纳学派成员更喜欢自称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统一科学”观念,是 20 世纪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结构要素,至少在英语国家是如此。维也纳学派创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纳粹兴起之后被驱散,其结果,它的科学观在美国起先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影响,到了 40 年代更是普遍流行开来。

科学哲学的这种“标准观念”是一种有所调整的逻辑经验主义,强调与更具思辨性的社会理论形式相对立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强调经验可检验性的重要意义以及社会科学的价值无涉。这种观念依然决定着大多数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规划。比如说,最近一部教科书里所探讨的四项主题,实质上就是逻辑经验主义及其随后的批评者提上议程的那些主题:归纳主义,约定主义,观察的性质,以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明确界分 (Gillies, 1993)。尽管如此,大约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开始,这种标准观念失去了许多社会科学家和一些科学哲学家的青睐,许多思想家和理论从早年的立场跳回显赫一时的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尼采主义等等。就马克斯·韦伯 (1864—1920) 来说,对于英语国家在社会科学哲学方面许多晚近争论的感觉,想必会比从前——比如在其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去世的 1953 年——感觉自在得多。当然,这种周期性趋势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更技术性的方面,以及在支撑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各种资源方面,必须有与这种趋势相称的重大进展。无论如何,对于社会理论的概念结构,这些进展并未产生它们的行家里手原本时常期待的那种影响。例如,数理经济学取得了让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并且融入了该学科的主流,而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数理社会学始终是一种少数分子的追求。

本章我的目标是要勾勒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哲学家在这些话题上业已尝试过的那些思考方式之间的断裂与连续。我首先从所有问题中最宽泛的一个开始:什么是社会实在? 社会科学研究的究竟是什么?

2.1 社会科学的性质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本领域的争论更多地关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科学(尤其

是社会学)的性质,而不是人们原本可能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的那个问题,即社会的性质或社会实在的性质。社会理论家在探讨“社会”的时候,常常主要是在思考研究社会学的方式,在这里也就是由社会学自身的成员所实践的那种思考社会的方式。齐美尔(1858—1918)在探问“社会如何可能?”(1908年)的时候,想的也就是这一点。这里反映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导取向:关注知识和知识的基础。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实证主义者及其“解释学”对立阵营的共同取向,也是实用主义者(如Rorty, 1979)和实在论者(如Bhaskar, 1975)的批评目标。

在更细致地介绍这些争论之前,我们最好先记住,不同的欧洲语言在阐述这些论题的方式上存在一种重要的语义差异。英语中的“science”这个词,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它在罗曼诸语言*中的对应词,其使用语域都往往要窄于德语中的“Wissenschaft”和俄语中的“Nauk”,以及它们在其他日耳曼语言和斯拉夫语言中的对应词,后者往往适用于任何系统性的学术考察。因此,在社会科学的英语语境里所提出的标准问题,“它是一门科学吗?”(Morgenbesser, 1966),在德语语境里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有一位操英语的人说我在社会学领域的工作其实算不上“science”,我就得预备进行一场哲学上的探讨;而如果有一位操德语的人说我的工作不是“Wissenschaft”,我会因受此攻击而却步。

那些对“它是一门科学吗?”的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人,通常被称作自然主义者,这里指的是这个语义含糊的词的多种意思之一。而那些对该问题做出否定回答的人,则被称为反自然主义者或方法论二元主义者。在20世纪初,有两股大致属于自然主义的研究途径以及两股反自然主义的研究途径。在自然主义者的阵营里,有一股是孔德(1798—1857)及其实证哲学所残留的强烈影响,根据这种哲学,形形色色的科学各自有其独特的考察领域,构成一个彼此相关的等级秩序,并且逐步从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过渡到实证知识的阶段。这又使我们能够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做出预见,并且有所作为。还有一股实证主义流派与此颇有不同,以维也纳的马赫(1838—1916)为代表,后来发展成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经济学家中的“历史学派”强调,各种经济过程都根植在人类历史上的大规模进化潮流之中,针对这种研究路向,经济学家门格尔(1840—1921)则提出了一种分析的或“精确”的科学研究路向。而韦伯虽然对门格尔的研究路向逐渐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但还是主张关于具体现实的科学(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 a science of concrete reality)的观念,以反对“自然主义偏见”,即所谓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都应该追求自然科学里确立的那种普遍法则。这种“方法论争论”

* 罗曼诸语言(Roman Languages)系印欧语系一语族,自拉丁语衍生而来,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欧洲大陆主要语言。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族。——译者注

(*Methodenstreit*) 通过 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延续下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及 60 年代,早期英语国家的分析历史哲学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Gardiner, 1952, 1974; Dray, 1957, 1964; 参看 Danto, 1965)。

在反自然主义的阵营中,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立场,并且时常伴有康德和(或)黑格尔的强烈影响。这些立场强调文化科学或“精神”(Geist)科学相比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比如说,狄尔泰(1833—1911)设想要基于对“精神”的种种表现的理解(*Verstehen, understanding*),构筑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精神”不同于自然,而理解也是一种很不同于从因果法则角度所做的说明的过程(参看 Makkreel, 1975[1992 第二版]; Outhwaite, 1975; Ermarth, 1978)。

文德尔班(1848—1915)及其学生李凯尔特(1863—1936)提出了一种相当不同的反自然主义,其基础是我们对自然和对文化分别持有的兴趣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具有的差异。就文化而言,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个别现象的独特性质(法国大革命,贝多芬的音乐,拿破仑的人格特征,或者随便什么东西及其与一套文化价值观念的关系[参看 2.4]),而不是一般的规律性。在李凯尔特看来,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就是两种理念型,各门实际科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它们有密切的关联(参看 Arato, 1974; Outhwaite, 1975; Manicas, 1987)。

韦伯在这方面再一次采取了一种中间立场。他虽然受到过李凯尔特的强烈影响,但却逐渐把自己的那种理解社会学构想成一种借助“理念型”概念对社会规律性进行的考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呈现(*zurechnen, incorporate*)文化上重要的现象”。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以来的英语世界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种颇多受惠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这些早期阐述的研究路向,它的体现有温奇的维特根斯坦式社会科学观念或查尔斯·泰勒论解释的著述(Taylor, 1964);有胡塞尔(1859—1938)现象学更直接的影响,系由奥地利裔美国人舒茨(1899—1959)将其拓展至社会科学领域;还有伽达默尔(1900—)的解释学。*所有这些都作为重要的元素,融入了 20 世纪 60 年代及其后哈贝马斯、阿佩尔和维尔默的“批判理论”,以及稍后基于反实证主义、实在论的科学哲学,来重新阐述一种有所限制的自然主义的种种尝试(Keat, 1971; Bhaskar, 1975; Keat and Urry, 1975; Benton, 1977)。

最后,除了关于社会科学的这些哲学概括和规定,还应该注意 to 社会科学本身内部在强调重点上的一些重要转换,其中部分是受到哲学发展的影响并影响了哲学的发展,另有部分则独立于哲学的发展。本《指南》的其他章节中,对这些潮流

* 伽达默尔已于 2002 年去世。——译者注

做了更细致的描述。但一份简要清单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有些是新出现的，其他则涉及到重返一些被忽视的领域。我将首先谈谈后一种情况，尽管它们也经常和一些更晚近的创新融合在一起。

晚近社会理论中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之一便是历史社会学的复兴。与此同时，是埃利亚斯斥之为“社会学家向现时的退却”（Elias, 1983）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业已逆转（参看 Dennis, 1991）。* 新兴的历史社会学往往特别注重各种政治关系与军事关系，尤其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的此类关系，以“国家复归分析”来弥补多年来的忽视（Evans, Ru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体现了复归一种更为广泛、更具思辨并且常常不那么自觉追求“科学”性的理论阐述模式。这种过程也被描述成“宏大理论的复归”（Skinner, 1985）。它包含了来自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跨学科性的重大影响，有社会人类学中的列维-斯特劳斯（1908—），观念史方面的福柯（1926—1984），哲学解释学领域的伽达默尔（1900—），批判理论里的哈贝马斯（1929—），再有就是科学史领域的托马斯·库恩（Kuhn, 1962）。20世纪70年代的这些发展旋即遭遇到一场反向运动的抵抗，即对宏大理论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判。这些批判断言所有的知识都必然是不完善的、分裂性的，强调与普遍主义原则相对的多样性和“差异”。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Lyotard, 1979）就是这方面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

可以看出，上述各变化过程的特点之一，就是传统学科界限的销蚀。从某些方面来讲，这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长期以来的一种跨学科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构主义的影响尤其体现在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中。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为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提供了一种共同语言，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目前的情况也依然如此。结构主义的影响更为弥散，不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及其对二元对立的强调，被列维-斯特劳斯等人运用到社会人类学及其他一些领域里。与这种方法论上的语言学取向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在实质上强调语言和话语对于社会现实的构成作用和中介作用，尤其是结合各种权力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及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中各种“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这些研究路向与哲学和文学理论中追随德里达称之为解构的研究路向多有共同之处。和它们共存一时的，还有一种更具科学主义性质的研究人类认知的路向，它和人工智能研究一起发展起来，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表现比较突出，不过也扩散到其他领域中。还应该注意到兴起了一些明确具有跨学科性质的领域和分领域，比如文化研究、发展研究、女性

* 查章后文献为 N. Dennis，系原文作者之误，应为 Dennis Smith。——译者注

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以及精神分析研究。

方法论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新旧融合的趋势。在比较令人瞩目的创新当中,就有对于经济过程及其他社会过程的数学模型建构与模拟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的分领域,它们松散地归类在“计量经济学”的名目下。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经济预测已经吸引了政府和媒体相当的注意力,这就对未来学中更具跨学科性质因此也更为复杂的种种努力提出了挑战。“理性行动”和“理性选择”等研究路向从经济学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也体现了旧有理论主题的复兴。这些研究路向与基于社会结构或文化传统的理论构成了竞争,增强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甚至到了出现经济学接管社会科学的危险的程度(Becker, 1976),并且与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之间结成了强有力的同盟(Hollis, 1977)。

尽管如此,在自觉遵循“科学”性或演绎性的研究途径发展的同时,“定性”研究方法或“日常”研究方法的合法性也在不断地增长。民族志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之类确立已久的研究实践,而今得到了口述史与生平研究的补充(参见Bertaux, 1981等)。这方面也和别处一样,在社会科学的创新思路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也出现了重要的融会之势。

关于社会理论、经验性社会科学、社会批判以及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纷繁复杂、对立鲜明的许多观念,这或许是这些趋势当中最重要的,而且也涵括了前文开列出的许多趋势。这些论题在本书序言中也有论及,影响了本章余下部分所讨论的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中的那些发展,并且也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

2.2 科学哲学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一些主要的欧洲语族中,“science”这个词的指称范围有着重要的变异。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出现了一股普遍的趋势,哲学家们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科学,而物理学家和其他自然科学家们则转而关注起哲学来(Passmore, 1968:第14章)。但是,当英美的“科学哲学”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德国的“科学学说”(Wissenschaftstheorie),越来越关注对科学陈述的形式分析时,法国“认识论”(épistémologie),尤其是梅耶松(1859—1933)、巴什拉尔(1884—1962)和康吉兰(1904—1995)代表的那种“认识论”,则成为融合历史分析与哲学分析的一种更为宽泛的研究路向(Lecourt, 1972)。这些人在法国的科学哲学或“认识论”中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当代有关复杂性和自组织系统的著述里(参看Morin, 1982等)。马克思主义也坚持了一种同样宽泛的研究路

向,重提 19 世纪的自然哲学 (Naturphilosophie),这在其正统的苏联版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和 70 年代的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和法国认识论交织在了一起:阿尔都塞的巴什拉尔式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受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及其科学革命观念 (Kuhn, 1962) 强烈影响的一种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相汇合;而与此同时,也有一批英国思想家基于一种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复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明确设定了一种“科学世界观”(Neurath, 1973)。这种世界观的基础,一方面是可证实的经验陈述,另一方面则是可以用逻辑形式和数学形式表述的真理,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玄学。所有各门科学的陈述,最终都应该可以化约为物质对象的语言或物理学的语言。由此观之,理论就是一种经解释的复杂演算,其所包含的各项命题可以用演绎的方式相互关联,并且有经验数据作为填充。因此,倘若理论宣称风的阻力与速度之平方成正比,那么我可以分别以 30、40、50……公里的时速行驶,以此充分检验这一命题。

这个老掉牙的例子提出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归纳推理的问题:我有多大的确定性,可以保证如果我行使得更快,这种关联依然成立?在最终那势所必然的事故之前,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恼人的不确定性。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是从或然性的角度来重新表述这个问题,根据统计上的规律性,消除个别事件的不可预见性;一项具体预测的置信度,是当作一种技术计算的事务来处理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关联最终是否依然成立,这个问题在此是被回避了。这里也没有真正涉及如何从因果上说明发生概率很低的事件,比如环境辐射所导致的白血病。不过话说回来,社会科学里流行的选择,还是一种更不正式的归纳主义研究路向。比如,在社会学里,格拉泽和安瑟伦·施特劳斯 (Glaser and Strauss, 1968) 就提出了他们所谓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以对一种一般性假设趋势的个别例证的观察为基础,逐步向上建构。

对归纳问题还有一种更为强劲的回音,在科学哲学中也更具影响,是由所谓的假设—演绎式或演绎—法则式说明模式所提供的。这种回音让人想起了杰文斯 (1832—1882) 对穆勒的归纳主义的批评,但流行开来却是到 20 世纪中叶, C. J. 亨佩尔 (1905—) 和奥本海默于 1948 年合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并重印于亨佩尔 1965 年的文集 (Hempel, 1965)。在这种观念里,法则式陈述不管在最初如何具有思辨色彩,也可以在观察中予以检验,即使不能得到证实,至少也有被证明不成立或曰得到证伪的潜在可能。后面这种说法是由波普 (1902—1994) 所提出的,认为一种理论如果能接受明确的辩驳,能够经受反复的证伪尝试,就是成

功的理论。而我们下文将会看到,尽管亨佩尔和波普将这种说明模式运用到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去的种种尝试一般被认为是不成功的,但是,经波普改造过的这种逻辑经验主义还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当中都取得了极其显赫的地位。而在更晚近的时候,巴斯卡尔 (Bhaskar , 1975) 及其他实在论者也提出,普遍法则即便能够站得住脚,也不能对它们的具体例证提供说明。可观察事件的规律性或不变关联,不仅不是确立因果法则的充分条件 (因为规律性可能是偶然的), 而且也不是必要条件。我们所面临的外力当中,有许多只是彼此勾销了,没留下太多东西被观察到,比如太阳的周期运动所导致的对地球的离心力和向心力。或者从社会科学领域中举一个例子。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般会被相反的一些趋向所抵消,以至于在利润率方面可观察到的趋势也许不符合形式模型。法则式陈述是扎根在它们所描述的对象的内在此趋势之中,必须从自然的必然性的角度来分析。

归纳推理、例证以及检验 (证实和证伪) 等有关问题都具有充分的技术性质,足以躲开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认真关注。而对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哲学中所谓的“标准观点”更具破坏性的,是理论语言和观察语言之间更具一般性的关系,它越来越松散,越来越缺乏精确性。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科学理论是如何重新概括了我们的观察,常常还规定了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记录这些观察,那种最初的理想,即理论方面与观察方面的直接匹配,也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到了 1951 年,美国哲学家蒯因 (1908 —) 继承了迪昂 (1861 — 1916) 的观点,主张科学理论与经验之间是一种整体论的关系:“我们有关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分别地接受感官经验的检验,而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接受这种检验” (Quine , 1958 : 41)。蒯因后来指出,这样一种关系便造成在各种可供替换的理论之间作选择时,不可避免地是靠任何可能的观察材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给出证明的”。人们开始觉得,以简单的基本句子,*记录下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事实,这种观念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在社会科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社会科学里,有关描述的问题似乎特别难以驾驭 (参看 Runciman , 1983)。

实证哲学的历史就好像斯大林主义经济计划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种种改革尝试的历史。但是,这种向各种理论的整体论观点逐步靠拢的趋势,也同时将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即唯意愿论甚或相对主义的成分,引入了理论选择的过程。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Kuhn , 1962) 使“标准观点”退守防御。库恩强调了以下两方面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是他所谓“常规科学”的例行化“问题解

* 基本句子 (protocol sentences): 指描述直接经验或知觉的命题。——译者注

“决过程”，在此过程中，科学家是在基本上不受质疑的框架或范式内工作的，而这些框架或范式都是根据典范性的理论、模式或技术确定的；另一方面是革命性科学的异常时期，此时这些框架开始受到质疑。他所谓的科学革命，在保守主义盛行的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性的提法。他提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动力与偏好，与某种具有严格科学性的推论过程，两者对科学革命的说明程度是一样的。这种主张带出了一个幽灵，拉卡托斯（1922—1974）称之为“科学中的暴民统治”。而拉卡托斯则更精确地描述了一种科学研究纲领模式：这些纲领可能以渐进的方式发展，以便吸纳新的知识，或者退化为防御性的辩护。（反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候把上面提到的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辩护看作是此类退化性问题转换 [degenerative problem-shift] 的一个例证。）费耶尔阿本德（1924—1994）像拉卡托斯一样，攻击当代的科学哲学是些空泛之论，并欣然接受了一个怀疑主义的结论：在科学里，“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他认为，我们在编造理论和说明性的阐述时，应当是想怎么创新就怎么创新，并且相应地容忍别人的努力。可是，正如克里格（Krige, 1980）所言，如果真的怎么都行，那么这种容忍也就意味着“怎么都成立”，而批判的可能性也就很有限了。

在库恩的激发下，涌现出一大批关于自然科学实践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的细致研究。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论源出多门，包括知识社会学（巴恩斯和布卢尔）、民族志田野调查（拉图尔和伍尔嘉）以及常人方法学和谈话分析（马尔凯和吉尔伯特）。它们往往以一种相对主义的眼光来展现自然科学的实践，主张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家在说明“真的”科学信念与“假的”科学信念时，应该使用同样的程序，以一种民族志式的超然（ethnographic indifference），来处理他们所考察的那些研究者做出的科学主张的具体内容。当然，人们依然可以宣称，诸如此类的对棘手的科学实践的描述，丝毫不能影响（合格）科学的哲学的前提条件，波普对库恩就是这样回应的。但是，过去的这种策略还是显得越来越不能让人信服了。

不仅如此，从演绎主义观念的崩溃中，同时还有其他科学哲学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赫茜（Mary Hesse）和阿尔（Rom Harré）强调了比喻和模型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它们可以呈现实际过程。巴斯卡尔则主张，科学实验过程要想成为一项可以清楚理解的活动，所考察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和作用方式通常就得独立于我们的实验干预；而科学的法则也就是关于事物趋势和机制运作的陈述。根据这种说法，自然秩序并不是单纯在实验中给定的，也不单单是一种想像的建构，而是人类存在和人类活动——当然也包括科学的社会实践——的一种条件。

人们在发展和采纳理性主义和实在论的科学理论的时候，常常是旨在为各门科学确立一种可供替代的非经验主义基础。正如霍利斯所言（Hollis, 1977：

179)，“在我看来，近来的科学哲学已经揭示出经验判断须以理论判断为先决条件，但尚未否弃科学中追求真理的需要。”理性主义者往往追随莱布尼茨（1646—1716）的立场，主张如果科学陈述属真的话，那么就是必然的真。这种立场用在理性行动理论上尤其显得有道理，在这个领域里，最好的行动选择就**必然是最好的**。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理性主义者最喜欢这样一些理论形式，这绝非偶然。按霍利斯的口号来说，“理性行动的说明就是它自身”（上引书第21页）。当然，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时候，人们在行事时并非按照完全的理性，甚至连部分的理性都谈不上。对于非动物界也可以做出类似的判断。如爱因斯坦所言，“只要数学法则指涉现实，它们就不是确定的；而只要数学法则是确定的，它们就不指涉现实”（参看 Cartwright, 1983）。

这个问题也对一些形式的实在论产生了威胁，例如普特南（曾经一度）和博伊德为之辩护的那些实在论说法（参看 Leplin, 1984）。他们从科学理论的真理的角度，或者至少是向着这种真理会合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实在论观点。这样一种立场特别容易遭受相对主义的反击（参看 Laudan, 1977；Leplin, 1984）。阿尔提出了相对真理实在论而言的实体实在论，这是一种更有希望的实在论形式，它关注的是实体、结构、机制和力量的实在，而不是被推定存在的理论真理。这种实在论的辩护者，首先是阿尔自己（Harré, 1986），再有就是像哈金（Hacking, 1983）和巴斯卡尔（Bhaskar, 1975, 1989）。根据这种说法，科学作为一种描述各种事物和关系的尝试，没有确定答案，也难免有所失误，哪怕这些事物和关系好像独立于我们对它们的描述。实在论与形形色色的约定主义立场一样，都与经验主义恰恰相反，强调科学对现象的重新描述的复杂性；不同的是，实在论并不接受那种怀疑主义的结论，即认为这些重新描述永远也只不过是再现或“保全”现象的尝试性技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实用主义思潮的重要性，它在整个20世纪一直处在思想的背景之中，这一点在美国体现得尤其明显。皮尔斯（1839—1914）在19世纪70年代末开创了实用主义，而詹姆士（1842—1910）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其发扬光大。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它在美国深具影响，某种程度上在欧洲也是如此。形式哲学集中探讨的是有关知识理论中怀疑和确定性的抽象论题，皮尔斯与此截然不同，强调的是我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实践性、经验性的一面，即我们通过怎样的方式，调整自己现有的思维习惯，以便处理行事时遇到的新的经验与实际困难。因此，真理不是被规定为与实在的直接对应，而是研究者共同体基于说明上和实践上的成功而达成共识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

最主要的一些实用主义思想家所关注的，相应的就是一些实践性、实质性的科

学话题。皮尔斯一心要发展一套关于记号的一般性理论,他称之为符号学 (semiotics)。詹姆士则对心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杜威 (1859 — 1952) 将实用主义哲学系统化,并且将之拓展至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教育学说。而对于社会理论来讲,最重要的实用主义思想家要算是乔治·赫伯特·米德 (1863 — 1931),他是符号互动论之父,对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用主义和互动论的思想传统表现出与欧洲解释社会学和人的科学的理论之间多有类似之处 (Helle, 1977)。更为晚近的时候,德国的阿佩尔借助解释学和语言学理论,对先验哲学进行了他的“转变”,也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路线。哈贝马斯 (Habermas, 1968) 在其关于科学考察对象之构成的学说中,对皮尔斯多有借鉴;而其关于沟通行动的实质性社会理论 (Habermas, 1981) 也广泛吸取了米德的思想。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约阿斯也撰写了大量关于米德和实用主义的著述,最近又在关于“行动的创造性”的社会理论中,重新构造了一种被忽视的模式 (Joas, 1993)。而实用主义哲学本身也已经在雷舍和更引人注目的罗蒂手上有所推进。罗蒂的处女作《哲学与自然之镜》(Rorty, 1979) 从实用主义的方向出发,提出了一种强有力的认识论批评。至于他晚近以“后哲学”的方式将科学化约为语言学,对于相当老套的科学哲学观念来说,则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巴斯卡尔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Bhaskar, 1991)。

还有一股与此有关的思潮在德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只是在别处迄今还鲜有人知,那就是洛伦岑 (1915 — 1994) 及“爱尔兰根学派” (Erlangen School) 的其他成员所提出的“原物理学” (protophysics)。这种“建构性”或“实践性”的哲学以丁勒 (1881 — 1954) 的早期著作为基础,强调在自然科学与测量之类世间日常操作之间存在着连续性 (参看 Böhme, 1976)。*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来讲,还出现了自然哲学的某种复兴势头,在德国尤为突出,按照伯梅最近的说法 (Böhme, 1994),自然哲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之间一度处在衰落之中。

因此,对于渴望在如何开展与评估自己工作方面得到专家指导的社会科学家来说,20 世纪末的科学哲学为他们提供的是一幅相当混杂的画面。尽管有些哲学

* 在数学家 Paul Lorenzen 与哲学家 Wilhelm Kamlah (1905 — 1976) 的主导下形成的这个学派,与逻辑经验主义截然相对,在数学中强调直观观念,在物理学中强调长度、时间与质量之类的物理特性首先需要规定测量手段。Peter Janich 将这种建构论进一步扩展到所谓原生物学 (protobiology) 和原化学 (protochemistry)。他们的学生后来在康斯坦茨 (Konstant) 大学哲学系形成气候,发展成爱尔兰根—康斯坦茨学派。——译者注

家还在继续探索一些比较传统的论题,比如确证理论、归纳说明与演绎说明等等,但大多数工作的焦点现在已经转到关于科学组织方式与科学进步的更宽泛的论题。有些哲学家明确选择了一种描述性的路向,基于进化选择之类的观念来研究科学变迁;另有些哲学家则指出,甚至是关于说明的哲学方面的技术论题,也应该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来理解(参看 Losee, 1993:第14至19章)。更为剧烈的变化,还得算是一些研究科学的理论家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常常立足于对科学实践的经验考察,或者以后现代主义的名义,又或者是以女性主义思想的某些派别的名义。

2.3 社会科学情况又如何?

所有这些变化是怎样影响了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家中,甚至在哲学家里,都没有太多人算得上是维也纳学派的统一科学理念的正牌支持者。不过,这种理念的一种较为温和的形式,却在20世纪的中叶成为主导潮流。那段时期里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教科书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它们典型的做法是从物理科学中借取绝大多数的实例,而对社会科学的讨论却是敷衍了事。这种哲学影响也进一步增强了以下观念:社会科学的使命就是效仿自然科学,积累并整合合乎事实的知识及法则一般的概括。言下之意,凡不照此办理的作品,就是个人卖弄,印象主义,小说家言,如此等等。

当然也有例外。尤其是社会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按照实证主义形象重塑自身的命运,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民族志田野调查(当然这本身也是对早期“书斋”人类学的一种对抗,后者所依赖的是些多少难以确信的书面素材),以及对语言、亲属关系结构和信仰体系的细致理解(参看 Geertz, 1973)。在社会学里,类似的例外体现于符号互动论以及有时被系统称之为“比较”方法或“个案研究”的方法。

在偏重哲学的一面,曾经显赫一时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中,也存在一些耐人寻味的技术问题。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路向,分析了一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对该整体所做出的贡献。它起源于19世纪的生物学主义社会模型,并由涂尔干(1858—1917)为其在社会学说明中赋予了重要位置。尽管如此,涂尔干也只是把功能说明看作是对因果说明的补充而非替代。在20世纪的20、3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这两位人类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向,并由帕森斯(1902—1979)、默顿(1910—2003)等人拓展到社会学领域。对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家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和将功能主义视为一种说明类型相伴而生的:一桩事件或一种结构的存在,是不是能够根据其后果加以说明?即使是人类及其他高等动物的行为可以从有意图的或“目的论的”



角度得到说明,我们也并不清楚,这种模式能不能拓展到社会系统。比如说,与某些保守派政治家的期望恰好相反,人们之所以结婚,并不是为了增强家庭制度及其对社会稳定所做出的贡献,也不能期望他们如此。不管怎么说,即使在行动者自身背后确实发生了这些效应,其中的种种机制也尚待证明,至于个人动机与社会需要之间如何可以达成必要的契合,也得再给出些说法。功能必备项(*functional imperatives*)的概念本身若不借助循环论证,就很难得到具体说明,因为人类社会不像生物系统,并没有明确的运作界限,无论生老病死,也都没有任何可以明确限定的方式。

对标准观点最为有力的挑战,来自历史哲学。看起来,对于历史事件的概括法则式的说明,要么不可能成立,要么就过于琐碎。比如,为了借助某种概括法则来说明路易十六的倒台,人们被迫在所谓“初始条件”的名头下,加入繁多的补充细节,无非是些国王的名讳不祥之类,而有关他的国家的情况却不在说明之列。亨佩尔的文章“历史学中普遍规律的作用”,追随了波普,也持有一种统一的自然主义的说明观。此文之后还伴有一系列的修整,以回应日见其破坏性的各种批评。这些批评的依据就是上面这些意见以及关于行动的分析哲学所提出的主张,即强调行动的原因与行动者行事的理由之间的差别。

温奇的新解释学理论(Winch, 1958)以及欧陆解释学逐步渗入英语世界,揭开了第二波批评的序幕。温奇采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观念,来倡导从内部理解社会关系,视其为关于社会现实的各种观念的表达(Winch, 1958: 23;也可参看Apel, 1967)。盖尔纳(Gellner, 1962[1970: 148])在对人类学功能主义的批判中,同样把分析哲学带到了讨论的第一线,针对温奇的立场提出了核心论点:“所谓(以社会成员的方式)理解关于一个社会的各种概念,也就等于理解这个社会,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概念能够揭示现实,也同样易于掩盖现实,并且对于现实的某些成分的掩盖或许正属于这些概念的一部分功能。”然而,即便完全追随温奇的社会科学家寥寥无几,他的这种观念,即一般来说,要想理解社会情境,至少应当首先去细致地考察“行动者的意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以及政治学研究中的“行为”取向,所得成果都很贫乏,这就表明诸如此类的科学主义研究路向的诉求或许是徒有其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来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就已经对实证主义取向的自然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追问如何能够揭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种种效应的伪装,并且克服这些效应。霍克海默(1895—1973)在其“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Horkheimer, 1937)一文中,区分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知识形式,一种是笛卡尔主义的,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路线,并不仅仅是某种研究假设,在

不断前进的事业中展现出自身的效用；它是创造一个满足人类各种需求与权力的世界的历史努力中无法撤除的要素。”二战之后，阿多诺（1903—1969）与马尔库塞（1898—1979），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霍克海默自己，都继续坚守这一立场，而一些年轻的思想家，如哈贝马斯（1929—）和维尔默（1939—），则参照实证主义理论与反实证主义理论方面一些更新近的发展，对该立场做了重新阐述。

著名的“实证主义论争”（Positivismusstreit）发端于德国社会学协会的1961年年会，并又持续了若干年。最初的交锋起于阿多诺与波普之间，而他俩各自的支持者又进一步延续了这场争论（Adorno et al., 1969）。维尔默也出版了一本有关波普的批判性论著（Wellmer, 1967），还有一本讨论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的颇具可读性的著作（Wellmer, 1969）。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则通过一种涵括甚广的批判史学，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到孔德、狄尔泰、尼采和弗洛伊德，来摸索一种与实证主义针锋相对的雄心勃勃的模式。哈贝马斯的《知识与人类旨趣》（Habermas, 1968）在一段时间里为这些讨论定下了基调。他早在1965年的就职演说中即已预告了此书的写作，而他在自己的《论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Habermas, 1967）中对解释性社会理论的批判性考察，也算得上是此书的一个先导。

批判理论家更为关注的，是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种种效应，而不是整体上的科学哲学；而持实在论立场的实证主义批判者，则更注重先发展一种可供替代的整体性科学元理论，然后再谈在某些情况下将这种元理论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里来。解释学和批判理论已经暗含了一种方法论上的二元论，而实在论则开启了以下两方面之间新的关联：一方面是一般性的科学哲学，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沉湎于自身；另一方面是各种解释性和批判性的研究路向及法国结构主义——它们所依据的科学哲学中的传统当然相当不同——的重要影响所引出的一些新的关注点。

我们在前文业已看到，在法国，科学哲学的发展与科学史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英语国家里，一直要到库恩引发的革命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法国的社会科学家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难以预料。一端的观念自孔德与涂尔干的著作问世以来便为人所熟知，强调实证性的科学知识 with 单纯的常识或意识形态之间的非连续性（参看 Outhwaite, 1983；第二章）。第二种观念大为不同，是一种颇为温和的约定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随兴妙语堪为佳例，说结构主义的神话分析或许只是另一种神话，又如布迪厄取自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费英格（1852—1933）的名言，说社会科学中的断言始终应当在前面加上一句限制性短语“一切就有如……”（Bourdieu, 1972：203，注49；参看 Vaihinger, 1911）。

巴什拉的科学哲学可以用来支持这两种立场：他有关新兴科学和理论借

助“认识论断裂”得以创立的模式,适合于前一种观念;而他的名言“万物皆非给定;凡事俱自建构”又似乎支持了后一种观念(参看 Lecourt, 1972; Bhaskar, 1975)。而像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和福柯之类的结构主义思想家,则往往会在对其分析的实在论解释和约定论解释之间含糊其辞。(结合阿尔都塞来谈这一论题的有关讨论,参看 Benton, 1984; Collier, 1989; Bhaskar, 1991。)至少在福柯的作品里,可以清楚地辨识出从结构主义向所谓“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人们不再相信存在什么根本的结构,转而强调形形色色的关系之间难以预测的相互作用。

在某些新近的哲学和文学理论中对于解构的强调,与社会理论中的一些早期作品颇多亲和之处,后者包括每种形式的作品,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Adorno, 1966),到常人方法学的某些派别(Blum, 1974)。在更为晚近的时候,有些学者主张建立一种后现代社会学(postmodern sociology),它的碎裂性和游戏性特征将能与“后现代性”本身的此类特征相匹配;另有些学者则坚持一种更具系统性的关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ostmodernity),而这种社会学本身不应该具备这种意义上的后现代性质。在后现代社会学中,元理论似乎既不能作为立法者,甚或也不能作为解释者(Bauman, 1987),而只是理论的游戏(Weinstein and Weinstein, 1992)。后面提到的这些趋势是否会对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哲学产生什么持续的影响,尚有待观察,或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对各种较为极端的理性主义和系统化形式的一种对抗。

理性主义本身绝非处于防御态势。我在前文提到过社会科学中理性行动理论的复兴,这在埃尔斯特特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霍利斯已经通过一系列论述全面、可读性强的作品,倡导了社会科学中的理性行动理论,并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倡导一种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理性行动理论中的主导重点之一,正是埃尔斯特特等人从个体理性的角度,重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行动学说。

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中能够在一处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一方是诸如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系统理论、理性主义和实在论之类的理论阵营,依然抱有对知识的理性追求这种多少具备传统色彩的观点;而处在另一方的那些理论方案,则从上面这些研究路向中看到了权威主义的危险,或者是传统男权制的残余,转而主张一些不那么具有权威主义味道而更具有游戏色彩的替代选择。后现代主义的浪潮或许巅峰已去,但它已经促使社会理论开始敏锐地注意到有关欲望、性、身体及非理性范畴等论题,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纪里,这些论题依然将十分重要。有关这一领域以及早先围绕现象学、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解释学的争论,最好的导引之一便是伯恩斯坦的著作(参看 Bernstein, 1976, 1983, 1991)。

2.4 客观性

20世纪社会科学哲学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论题之一,就是事实性陈述与评价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再一次发现,在20世纪的中叶,一种明确的实证主义正统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其两翼,则一端是一些相当极端和浮浅的立场,一端是一些比较细微的立场。

在20世纪早期,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有关这一论题的四种不同观念。首先,在涂尔干等人的著作里,延续了孔德式的实证主义。在他们看来,一种科学的社会学应当能够区分社会的正常状态与病理状态。社会学家的客观目光超越了社会普通成员普遍接受的那些观念,从正面为行动制定出先决条件,就像涂尔干所主张的那样,可以通过一种职业团体的体系,来缓和现代社会中的失范状况。

第二种观念的核心是马克思的批判概念,其典型体现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书中,马克思所理解的批判概念既是对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科学发展,又是对那些理论及资本主义本身的一种批判(Sayer, 1979)。卢卡奇(1885—1971)强调指出,相对于“物化”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分析上的碎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具有总体化的一面(Lukács, 1923)。萨特(1905—1980)也从总体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辩证思维的观念(Sartre, 1960)。而戈尔德曼(1913—1970)的文学社会学与卢卡奇的文学社会学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也提出了一套类似的社会科学观(Goldmann, 1970)。阿尔都塞(1918—1990)提出的观念更为单纯(尽管颇有些自命不凡),以巴什拉尔的立场将马克思主义看作科学,并且结合了一种相当粗陋的列宁主义观念,将哲学看作“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再往后,埃奇利和巴斯卡尔重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念,主张在社会科学里,我们可以从对虚假信念的科学批判,转向对产生那些信念的环境条件的社会批判(Edgley, 1976; Bhaskar, 1986, 1993)。因此,在社会科学里,从对一些神圣化过程本身的批判,可以直接推出对只能借助神圣化过程来维持的那些社会关系的批判。在这一点上,实在论者的模式与下文将讨论的哈贝马斯的模式取得了一致。

尽管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Adorno, 1966)有着很强的怀疑主义基调,但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们在发展批判观念时,所使用的方式还是与既有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相当接近的(Horkheimer, 1937)。哈贝马斯就“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的阐述,把它定位在“哲学与科学之间”(Habermas, 1963)。他继阿多诺与波普在“实证主义论争”中的激烈交锋之后,针对分析性科学哲学,进一步捍卫了辩证法。哈贝马斯本人则概括出一套批判性



社会科学的模式,他认为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都算得上是这种批判性社会科学的范例,都贯穿着一种解放旨趣 (emancipatory interest),以去除“系统扭曲的沟通”(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中的理解所遇到的因果性障碍 (Habermas, 1968)。再往后,哈贝马斯还提出,所有用语言做出陈述的严肃方式,即我们所说的真实、真诚和规范意义上的适当,其前提最终都意味着认可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其中有关各方均可在平等基础上,以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讨论这些有效性诉求 (validity-claims)。

关于社会科学中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第三种观念出自德国历史主义。该学说认为,对于各个历史时代的理解,只能是从它们各自的世界观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这意味着社会科学家永远无法超越他们自身所属时代的价值观念视界 (horizon),因此也就不应该企图去超越。李凯尔特对韦伯的社会科学哲学产生了首要的影响,他就主张,研究文化的学者应当允许自己的概念受“一般性文化价值”的形塑,因为正是这些价值观念赋予历史考察的对象以意义。在对人类文化的考察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势必会融合在一起,其途径便是价值关联 (Wertbeziehung, value-reference) 的概念,即把某个现象与一个或更多的文化价值联系在一起。换言之,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其说是作为我们可以概括出普遍法则的那些革命中的一个实例 (这在李凯尔特看来即所谓“自然科学”式的考察类型),不如说是作为人类思想史和行动史上一桩关键性的事件。

我要区分的第四种观念,就是韦伯自己的观念,尽管说它的一种更为粗陋的形式后来变成实证主义正统观念的核心要素。韦伯接受了李凯尔特的主张,也认为我们是参照了价值来组织自己对社会世界的观念的,但他明确区分了这种**价值关系 (value-relation)**与具体的**价值判断 (value judgments)**。后者在科学 (Wissenschaft) 中不该有任何位置。根据这种观念,科学知识可以就实现特定价值的可能性提供具有实用性的指点,但却不能告诉我们,我们究竟该不该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那些理念。

韦伯把一种假设的因素引入了李凯尔特的价值关联概念。他的意思是说,社会科学家应该有能力从可能有的多种评价角度来理解某一社会现象,并且尽可能清晰地区分什么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而什么又属于个人的评价 (在听讲的学生面前尤其得做到这一点)。因此,根据韦伯的说法,社会科学家最终将在各种可供替换的价值选择面前卷入一种存在性的抉择。不管怎么说,更具问题意义的是,韦伯也和李凯尔特一样认识到,大规模的文化变迁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科学家理解并概括其考察对象的方式,所以客观性始终是受条件限制的。

从这个立场出发,大致有三条发展路线。其中之一以卢卡奇为例,便是采取一

种终极目的的伦理,不管发生什么事也要去追求它。但如果我们确实如此行事,并且充分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奉行什么样的事情,也有悖于韦伯的建议,即使韦伯对此表示了尊重和认可,也只是勉勉强强的尊重和有所保留的认可。第二条路线导向下文将讨论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第三种立场是人们熟悉的实证主义立场,认为价值判断在科学中没有位置,我们应当像排除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污染源一样地排除这些判断。

20世纪末的社会科学家,又一次面临令人困惑的各种选择。单纯的实证主义路线已经遭到了两个方面的威胁。首先,有一系列的尝试主张从事实转向价值,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通过对“制度性事实”的分析,比如说承诺:我承诺写这一章,那么我就应该去写,我要不写就是我的不对(Searle, 1970)。其次,正如我们已经在别处看到的那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种理论和价值观念会通过一些方式,形塑我们的事实判断。无论在新马克思主义里,还是在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各种学说里,意识形态理论都已经变得更加成熟了。社会科学家是应该依然坚持追求价值无涉的科学(这当然并不排斥在其他领域有积极的政治介入),还是应该采取一种明确具有批判倾向或保守倾向的立场,似乎仍旧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虽说颇有些想法坚定地指向其中某种选择。比如说博托莫尔,他就既主张将社会学理解成社会批判的一种来源,又主张事实与价值在形式上相互分离(Bottomore, 1975; 参看 Edgley, 1987)。

行文至此,我已经从价值无涉的角度探讨了客观性的论题,但在这些讨论中,相对主义的有关论题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历史主义具有明确的相对主义性质,而经曼海姆(1887—1947)、舍勒(1874—1928)等人之手发展起来、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语国家兴盛起来的知识社会学,一般也认为具有相对主义的意味。如果所有的信念都具有社会性的原因,就好像我们的饮食穿戴习惯,那么真实和虚假之类的观念还有何用?曼海姆和舍勒对这些意涵表示了坚决反对:舍勒用的是一种颇为传统的绝对主义哲学人类学和伦理学,而曼海姆用的则是一种比较宽泛的韦伯式的视角观,他称之为关系主义(relationism)。曼海姆认为,尽管思维的情境根植性(Seinsverbundenheit, situational groundedness)会产生形形色色的偏向,但在对这些偏向逐一进行掂量与排除之后,我们还是能够尽最大可能地接近客观性,甚至能够预见到将政治变为一门科学的前景。[曼海姆纲领性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annheim, 1925)第三章即题为“政治如何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再往后,伯格和勒克曼(Berger and Luckmann, 1966)将现象学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开创了一股仍在持续发展的传统,即“社会建构主义”,并又经由科学社会学,反过来融合到



科学哲学本身当中。这些趋势与哲学和文化理论中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思潮,在许多方面可谓并行不悖。

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也已经对这些立场中的一部分重新做了阐述和勾画。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多数女性主义作品都集中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揭露主流(mainstream)或“男流”(malestream)哲学与社会科学中忽视妇女,并盛行着许多带有性别歧视倾向的假设。到了晚近,许多女性主义者采取了一些更为明确的社会建构主义形式,对有关知识客观性的一些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有些人把对客观性的追求视为男权主义理性的一个方面,认为这样的理性忽视了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已有学者基于与此有关的一种方法论立场指出,女性主义社会科学必须更注重互动式的定性研究方法,而不是将素材与接受研究的对象客体化的定量研究方法(Roberts, 1981: 86)。另有些女性主义者则如此捍卫“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既把它当作一种政治选择,又主张它是反击盛行偏向的最佳方式(Harding, 1993)。在反种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里,也存在这一研究路向的一些成分。这种理论的根源在于杜波伊斯和法农的作品,但目前比较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于出身文学理论的一些思想家,比如萨伊德和霍米·巴巴以及像斯图尔特·霍尔和吉尔罗伊这样的社会学家。

2.5 结语

从以上介绍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相比于从前,比如30年前,社会科学哲学已经成为一块复杂和分化得令人生畏的领域。我们那时依然有可能坚持将科学哲学理解成一块相对自主的专业领域,不受实质性社会理论或科学史方面发展的直接影响。而到今天,再要捍卫这样一种立场就会很困难。因为今天的人们处处都会被下面这些方面的相互关联所触动:元理论与实质理论概括之间的相互关联,经验性理论与规范性理论之间的相互关联(比如政治理论中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前景的争论或自由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之争所体现出的此类关联),以及理论和学术性学科(disциплиnes)——或许已经与时代不合,但我们依然这么叫——之间的相互关联。

换言之,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哲学都突出地表现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它们作为思维样式所固有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则是职业化和分工等制度上和学科上的压力。斯金纳编的那本影响甚广的文选,即《人类科学中宏大理论的复归》(Skinner, 1985),或许有助于体现这一点。此书涵盖了下述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托马斯·库恩、罗尔斯、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以

及年鉴学派史学家们。这些思想家中没有一位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哲学家,但一种社会科学哲学要是不以某种方式,重视这些思想家及其他相当的思想家在方法论领域和实质领域的种种关注,那就有沦为无足轻重的危险。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说明这一主题,就是想想下述理论中对理性概念的多种不同用法:理性行动理论、系统理论、研究社会和伦理方面的沟通理论、研究知识和解放实践的批判性实在论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或解构理论。哈贝马斯已经指出(Habermas, 1981[1986: 71]),在社会理论中,理性这一问题域至少出现于三个层面,即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换言之,即使的确有某种东西像是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Habermas, 1985),在它的当代形式里,哲学、科学和社会理论也是错综复杂,难以分解。

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很不幸的状况。当然也有可能声称,维也纳学派以及那些独立提出一种类似的经验科学观念的人,走的才算是正道。他们为有学科界限的考察和职业分化树立了典范,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种种文化变迁和政治变迁的作用下,它们已经被赶出了社会科学的正途,有待于在周到的科学政策协助下重新确立地位。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曾经在一处稍有不同的场合下提到这一点,说漫漫长假业已过去,该是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了。由此观之,一种严肃的社会科学观曾经享有的霸权地位,是和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战后资本主义的这段黄金岁月大体吻合的。无独有偶,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本身内部目前这种歧异和碎裂的局面,也对应着“去组织化了的资本主义”的现状(Offe, 1985)。

显然,对于这幕衰落的景象,我并不抱赞许的态度。就像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在社会科学哲学里,或许应该把二战后一定程度上被常态化的四分之一世纪看成是例外而非非常规。在这两个领域里,我们都必须学会在更大的不确定性中生存。诚然,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鼎盛时的严格精神和怀疑精神,也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一种整体上充满敌意的气候下,比如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波兰,它还是对抗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制衡。尽管如此,发展到最后,实证主义的研究纲领不得不破坏其自身。它的消逝留给我们的东西,比起它曾经提供的那种相当含糊的橡皮图章,即所谓科学性,可要珍贵得多。它的消逝使我们和更为久远的传统重新取得了融合,就像在另一种不同的场合下,1989年革命所起到的效果一样。东欧所谓的“历史的重生”(Glenny, 1990)在西方社会理论中也有其呼应:人们重新感受到,跨越时间、空间和学科界限,包括社会科学哲学与其所研究的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开放边界,社会思想具有一种延续性。和作为整体的科学哲学一样,最让人感兴趣的贡献也是来自于哲学与实质理论的交汇处。



同样,我也不认为我们应当将现有处境看作基本上属于分裂和混乱。我已经在别处更为细致地指出,以实在论科学哲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哲学,和以批判性解释学为取向的社会科学观,这两者之间已经表现出显著的汇合趋势。我想,我们需要一种实在论的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哲学,以便继续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社会世界,相对独立于我们可能会对它做出的具体描述。这不仅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前提,为科学活动和争议赋予意义;它还是一种必要的条件,让作为人类的我们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我们触及社会现实的途径是复杂的,我们对社会现实的前科学理解也是复杂的,如果我们要对这些复杂状况做出充分的描述,就需要采纳解释学传统的一些深刻见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批判性解释学,因为哈贝马斯等人已经正确地提出,意义及对意义的理解都不能脱离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不能脱离超越这些关系的尝试。

在这种观念下,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结构与行动,物质论与观念论,许多旷日持久的对立都可以看作是得从具体的角度入手的议题,需要结合在时间和空间中有具体定位的特定社会情境来讨论。元理论以及较为抽象的理论形式也成了有待实质内容来填补的框架。社会理论最有前景的道路,就在于老套的哲学立法与只注重实际表现的纯属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对于这条道路,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创建者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而对这种研究路向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科学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暴民统治。如今,参照所谓“大科学”^{*}发展起一种科学政策,并且以令人怀疑的方式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在这种半生不熟的拓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旨在复兴和强化专门化的学术职业精神及其实际表现的企图,这或许才是上述研究路向最大的威胁。

参考文献

- Adorno, T. W. 1966 (1973): *Negative Dialectics*. London: Routledge.
- Dahrendorf, R., Pilot, H., Albert, H., Habermas, J., and Popper, K. R. 1969 (1976):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 Apel, K. O. 1967: *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Geisteswissenschaften*. Dordrecht: Reidel.
- Arato, A. 1974: The neo-idealist defense of intersubjectivity. *Telos*, 21, 108 — 61.

* 大科学 (big science):指现代工业制度与科层制结合下发展起来的、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人力、物力的统筹安排的科学技术研究。——译者注

- Bauman, Z. 1987 (1990):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cker, G.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ton, T. 1977: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Three Soci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 1984: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ist Marxism: Althusser and his Influence*. London: Macmillan.
-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66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London: Allen Lane.
- Bernstein, R. J. 1976: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Oxford: Blackwell.
- 1991: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rtaux, D. (ed.) 1981: *Biography and Society: The Life History Approa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Sage.
- Bhaskar, R. 1975 (1978):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2nd edn. Brighton: Harvester.
- 197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Brighton: Harvester.
- 1986: *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London: Verso.
- 1989: *Reclaiming Reality*. London: Verso.
- 1991: *Philosophy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Oxford: Blackwell.
- 1993: *Dialectic*. London: Verso.
- Blum, A. 1974: *Theorizing*. London: Heinemann.
- Böhme, G. (ed.) 1976: *Protophysik. Für und wider eine konstruktivistische Wissenschafts theorie der Physik*. Frankfurt: Suhrkamp.
- 1994: *Natürlich Natur*. Frankfurt: Suhrkamp.
- Bottomore, T. 1975: *Sociology as Social Critic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Bourdieu, P. 1972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twright, N. 1983: *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ollier, A. 1989: *Scientific Realism and Socialist Thought*. Brighton: Harvester.
- Danto, A. 1965: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nnis, N. 1991: *The R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Dray, W. H. 1957: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4: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gley, R. 1976: Reason as dialectic. *Radical Philosophy*, 15, 1 — 7.
- 1987: Sociology, social criticism and Marxism. In Outhwaite and Mulkay (1987).
- Elias, N. 1983 (1987): The retreat of sociologists into the present.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4 (2 — 3) June, 223 — 247.
- Elster, J. (ed.) 1986: *Rational Choice*. Oxford: Blackwell.
- Ermarth, M. 1978: *Wilhelm Dilthey: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vans, P. B., Ruschemeyer, D., and Skocpol, T.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rdiner, P. 1952: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 1974: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 1973 (1975):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London: Hutchinson.
- Gellner, E. 1962 (1970): Concepts and society. Reprinted in D. Emmet and A. MacIntyre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 Gilbert, N. and Mulkay, M. 1984: *Opening Pandora's Box: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cientists'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lies, D. 1993: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 Glaser, B. and Strauss, A. 1968: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Glenny, M. 1990: *The Rebirth of History: Eastern Europe in the Age of Democracy*. London: Penguin.
- Goldmann, L. 1970: *Marxisme et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Gallimard.
- Habermas, J. 1963 (1974):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Heinemann.
- 1967 (1971):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nglish tr. 1988.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68 (1972):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London: Heinemann.
- 1981 (1986; 1989):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2 vols.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 1985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acking, I. 1983: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S. 1993: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In L. Alcoff and E.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49 — 92.
- Harré, R. 1986: *Varieties of Realism*. Oxford: Blackwell.
- Helle, H. J. 1977 (2nd edn, 1992): *Verstehende Soziologie und Theorie der Symbolischen Interaktion*. Stuttgart: Teubner.
- (ed.) 1991: *Verstehen und Pragmatism*. Frankfurt: Peter Lang.
- Hempel, C. G. 1965: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Hollis, M. 1977: *Models of 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rkheimer, M. 1937 (1972):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his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M.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Joas, H. 1993: *Pragmatism and Soci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eat, R. 1971: 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problem of naturalism.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1.
- Keat, R. and Urry, J. 1975: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Krige, J. 1980: *Science, Revolution and Discontinuity*. Brighton: Harvester.
- Kuhn, T. 1962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tour, B. and Woolgar, S. 1979: *Laboratory Life*. Beverly Hills: Sage.
- Laudan, L. 1977: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court, D. 1972 (1975): *Marxism and Epistemology: Bachelard, Canguilhem and Foucault*. London: New Left Books.
- Leplin, J. (ed.) 1984: *Scientific Re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loyd, C. 1986: *Explanation in Social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 Losee, J. 1993: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r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kács, G. 1923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Press.

- Lyotard, J. F. 1979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kkreel, R. A. 1975 (2nd edn, 1992): *Dilthey: Philosopher of the Human Stud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nicas, P. 1987: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Blackwell.
- Mannheim, K. 1925 (1991): *Ideology and Utopia*. Trans.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London: Routledge.
- Morgenbesser, S. 1966: Is it a science? Reprinted in D. Emmet and A. MacIntyre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 Morin, E. 1982: *Science avec conscience*. Paris: Fayard.
- Neurath, O. 1973: *Empiricism and Sociology*. Ed. M. Neurath and R. S. Cohen. Dordrecht: Reidel.
- Offe, C. 1985: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uthwaite, W. 1975 (1986): *Understanding Social Life: The Method Called Verstehen*. Lewes: Jean Stroud.
- 1983: *Concept Formation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1987: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 Outhwaite, W. and Mulkay, M. (eds.) 198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Criticism. Essays in Honour of Tom Bottomore*. Oxford: Blackwell.
- Passmore, J. 1957 (1968): *A Hundred Years of Philosoph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Quine, W. V. O. 1958: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his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 H. (ed.) 1981: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Rorty, R. 1979 (1980):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Oxford: Blackwell.
- Runciman, W. G. 1983: *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rtre, J. -P. 1960 (1976):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 Sayer, D. 1979: *Marx's Method. Ideology, Science and Critique in "Capital."* Brighton: Harvester.
- Schutz, A. 1932 (1972):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London: Heine-

mann.

- Searle, J. 1970: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mmel, G. 1908 (1959): How is society possible? In K. Wolff (ed.) *Georg Simmel, 1858 — 1918*.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Q. (ed.) 1985: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C. 1964: *The Explanation of Behaviou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Vaihinger, H. 1911 (1925): *The Philosophy of "As If"*. London: Kegan Paul.
- Weinstein, D. and Weinstein, M. A. 1992: The postmodern discourse of metatheory. In George Ritzer (ed.) *Metatheorizing*. Newbury Park, CA: Sage.
- Wellmer, A. 1967: *Methodologie als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 Suhrkamp.
- 1969 (1971):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Winch, P. 1958: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深入阅读书目

- Achinstein, P. 1968: *Concepts of Sc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Adorno, T. W. et al. 1969 (1976):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 Benton, T. 1977: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Three Soci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 Bernstein, R. J. 1976: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Oxford: Blackwell.
- 1991: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haskar, R. 1989: *Reclaiming Reality*. London: Verso.
- Blaikie, N. 1993: *Approaches to Social Inqui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leicher, J. 1980: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London: Routledge.
- 1982: *The Hermeneutic Imag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 Brown, S. C. (ed.) 1979: *Philosophical Disput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righton: Harvester.



- Collier, A. 1989: *Scientific Realism and Socialist Thought*. Brighton: Harvester.
- Dallmayr, F. and McCarthy, T. 1977: *Understanding and Social Inquiry*.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Delanty, G. 1997: *Social Science: 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 (ed.) 1986: *Rational Choice*. Oxford: Blackwell.
- Gardiner, P. 1952: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 1974: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cking, I. 1983: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fpenny, P. 1982: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Harding, S. 1988: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arré, R. 1986: *Varieties of Realism*. Oxford: Blackwell.
- Held, D. 1980: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London: Hutchinson.
- Hempel, C. G. 1965: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Hindess, B. 1977: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righton: Harvester.
- Hollis, M. 1977: *Models of 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at, R. and Urry, J. 1975: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Kuhn, T. 1962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udan, L. 1977: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pkin, J. (ed.) 1984: *Scientific Re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loyd, C. (ed.) 1983: *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6: *Explanation in Social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 Lyotard, J.-F. 1979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nicas, P. 1986: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Oxford: Blackwell.
- Martin, M. and McIntyre, L. C. (eds.) 1994: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 Scienc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May, T. and Williamson, M. (eds.) 1998: *Knowing the Social World*.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Oakes, G. 1988: *Weber and Rickert. Concept Formation in the Cultur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Outhwaite, W. 1987: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 Richards, S. 1983 (1987):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 Ryan, A. 1970: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Macmillan.
- Sayer, A. 1984 (1992):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Sayer, D. 1979: *Marx's Method. Ideology, Science and Critique in "Capital."* Brighton: Harvester.
- Stockman, N. 1983: *Antipositivist Theories of the Sciences*. Dordrecht: Reidel.
- Wellmer, A. 1969 (1971):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Actions, Actors, Systems



第二编

行动、行动者、系统





第③章

关于行动与实践的各种理论



I. 柯亨

柯亨(Ira J. Cohen)教授是美国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新不伦瑞克校区研究生院的社会学教员,教授社会理论。同时他也在拉特格斯大学纽瓦克校区教授社会学。他于1980年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出版有《结构化理论:吉登斯与社会生活的构成》以及许多论文与短文,主题广泛,包括经典社会理论与当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社会学以及关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学说。目前他是《现代性与社会》系列丛书的总编,该丛书将由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在未来几年内陆续推出。他自己正在编辑该丛书中的一卷,主题是贯通经典现代性理论与当代现代性理论。

- 3.1 韦伯
- 3.2 帕森斯
- 3.3 杜威与米德
 - 3.3-1 杜威
 - 3.3-2 米德
- 3.4 加芬克尔
- 3.5 吉登斯
- 3.6 社会关系中的实践与行动
- 3.7 结语





对于惯常观察人的行为的人,最难的莫过于去探索人的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因为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难以逆料,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蒙田*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能力行动,有能力互动,还得有能力理解我们所作所为的意义。那么,社会理论家们为什么会发现,这样一种平淡无奇的现象却是如此难以理解呢?最初的挑战来自于人的行为的规范性意涵。对于霍布斯、洛克和康德等现代早期哲学家来说,理解行动的基础,也就是理解人的处境的基本特征,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在道德行为中实现伦理原则的种种可能与限制。尽管哈贝马斯为这股传统重新带来了生机,但是更能让 20 世纪的大多数理论家们感受到严重挑战的,还是作为一种经验现象的行动的复杂性,而不是从一种哲学角度来观看的行动的伦理。

20 世纪之前,主导性的理论立场是功利主义哲学,一般将行动描述得似乎极其简单。行动者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以尽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者说,尽最大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降低自己的不适。绝大多数的功利主义者都以某种形式体现出这样一种观念。而浪漫主义的哲学家们则拒绝接受这种功利主义的立场,认为功利主义者忽视了所有行动中都会直接表达或间接蕴含的那些社会意义、文化道德和个人情感。功利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之间的种种差异,凝聚成围绕几个相沿已久的哲学问题的争论:[1] 社会行动本质上是否与道德有关? 激励社会行动的是个体的自利还是共同的义务? 行动是出于个体的自由意志,还是由文化的社会化和(或)可资利用的物质资源所决定? 当代哲学家们所探讨的,无非是以一些新的形式,继续了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这些争论。实际上,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了西方哲学的整个面目,以至于到了现在,这种争论本身,而不是具体这种或是那种立场,成了现代伦理学、政治哲学和社会法学的确定性特征。

但是,即使当社会学思想家们远离哲学争论,也会经常被行动的一种甚至更为基本的特性所困扰,就是它显著的复杂性。[2] 正如蒙田的格言(Montaigne, 1588: 239)所示,早在现代性到来之前许久,知识分子们就已经对如何探讨作为一元现象的行动而深感困惑。而当代行动理论家们的困惑程度也丝毫未见减弱。尽管如此,他

* 此处译文据《蒙田随笔全集》中卷第一章“论人的行为变化无常”开篇,译林出版社 1996, 中卷,第 3 页。——译者注

们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对于一般化的、可经验验证的知识的认同,却已经产生出了大量的行动理论。但是,仿佛是要核准蒙田在 400 年前写下的观点,我们现在绝不比从前任何时候更近于达成单一的一种行动观,让所有具有经验思维的思想家们取得一致,哪怕只是勉强超过半数的社会科学家。即便是那些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也就是那些如今自称为理性选择理论家的人(比如 Coleman, 1990: 14—19),也承认他们对于社会行为的描述只是为了方便研究社会组织而作的一些简单化处理,对那些热诚的行动理论家必定会探讨的复杂情况进行置括,暂不考虑。

用从理论的角度上来说具有一般性的术语来探讨经验上行动的种种复杂情况,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现代,这项任务越来越将关于行动的社会学学说与哲学学说区分开来。在 20 世纪上半叶,米德、杜威和帕森斯将哲学的论证转变成具有经验取向的理论探索。而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加芬克尔和戈夫曼之类的理论家则大大促进了社会学深入行动的种种复杂情况,而将哲学追问留在了各自著作的背景之中。在此过程中,探讨蒙田关于行动复杂性的问题确实是有所进展。

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概括行动,理论家们都必须假定,行动从来也不会是全然无章可循。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努力去寻找,就可以找到社会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模式。而理论的技巧就是确定我们希望找到的那些模式源于何处。概而观之,当代种种行动理论,大抵都是将社会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模式的源泉确定在社会行为的两个维度之一上。有些理论家主张,对于行动的理解,最好是着眼于它对于所涉及的行动者(们)的主观(存在的或现象学的)意义。另有些理论家则从行为的实行、实施或生产的方式入手,来确定具有重要意义的模式。我将保留这一区分,将强调主观性质的理论说成是行动理论,而将强调实施性质的理论说成是实践理论。

但是,即便到了这一步,也必须充分重视蒙田的问题。行动理论或许强调主观意义,而实践理论也或许强调实行过程,但是,这些主题各自都有许许多多的变异。结果,社会行为似乎更像是诗,而不是一种一元的、自然的现象;呈现给理论家们的是规则有序的韵律,反复出现的意义以及约定俗成的形式,但绝无任何统辖一切的归并原则。哪怕是最自负的行动与实践的理论家,要透过绵密交织的韵律、意义与形式,捕捉出一星半点的模式安排来,也是一种挑战。

由于行动理论家与实践理论家在研究规程上毫无共通之处,所以,围绕任何一项具体问题或主题而组织起来的讨论,就都有可能对某一些理论阐述得更清晰一些,对另一些理论的阐述就差一些。实际上,对于许多理论家来说,要想达成关于社会行为的新概念,第一步并不是给出新的界定或理论概念,而是一种新颖的问题,能够给理论家提供独立的视点。而就本《指南》的宗旨而言,更应该选择的是一种较



具包容性的研究路向。为此,我在阐明、比较和批评各种行动理论的时候,应该主要是从它们自身的角度出发。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有选择地讨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20 世纪理论家。我力求在此处所言的主观取向理论家 and 实践理论家之间谋得平衡。韦伯与帕森斯代表着第一种研究路向,而杜威与米德、加芬克尔、吉登斯则代表着第二种研究路向。

在《指南》的第二版中,我已经添写了新的一节,以充实的篇幅讨论了一些关于社会关系的新理论。就在同一代人里面,有一大批现代理论家,包括蒂利、柯林斯和艾默贝耶,以及格拉诺维特之类的网络分析学者,已经使得社会关系成为关于行为的意义与实行两方面的新型描述的支点。但是,正如我在下文将要指出的那样,这些理论的种子,是早在齐美尔和舒茨等经典理论家的作品里就已经酝酿下了的。所有这些我将依次道来:首先我来谈韦伯,他是关于主观上富有意义的行动的种种理论的源头。

3.1 韦伯

韦伯敏锐地察觉到,行动者赋予他们行为的意义千差万别,各不相同。这为 20 世纪的行动理论向着经验分析的方向带来了实质性的突破。哲学家从非经验性的假设或个人的直觉当中演绎出或者推论出人的行为的基本属性,韦伯在长期浸淫于这样的思路之后,提出社会科学家应该尊重社会行动者一项不可让渡的权利,也就是有权利确定他或她的社会行动对其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行动者的这种尊重的根源并不在于一种人性说或现象学,而在于德国对于文化客体所具有的主观意义的研究 (Geisteswissenschaften),突出的体现就是狄尔泰的作品。但是,韦伯虽然赞成通过基本上采纳李凯尔特将一般化概念建构为非经验性理念型的方法,从抽象的、概念性的角度来对有意义的行动进行理论阐述,却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办法 (参见 Burger, 1976)。

如果说是行动者而不是理论家来确定自身的行动,那么,任何关于行动的一般属性的探讨就必须尽可能多地考虑视条件而定的偶变性行动形式。在《经济与社会》(Weber, 1921)的起首一章里,韦伯对于行动理念型的阐述稠密得让人望而生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不遗余力地想诸项开列自己所能设想到的、从行动者视点出发解释的行动意义的种种经验可能性。韦伯在这些段落中的行文笔调非常平实,遮掩了他博实的史识与深邃的哲思,也遮掩了他在推论或想像行动者如何理解自身行为方面的非凡能力 (这是运用“Verstehen”[理解]方法所需要的技能)。

韦伯将行动整体上界定为个体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Weber, 1921: 4），而他的理念型分析的长处和短处也都来源于这种类属界定。韦伯对于意义的强调程度怎么说都不为过。对于自然环境与人的处境的每一个方面，他几乎都是从行动者的存在视点出发来确定的。经济学家会把非生命的人工制品与资源看作是物质产品，而韦伯则会根据行动者如何理解它们的实际用途或符号意涵来看待这些东西。有些哲学家会将生与死看作是人的处境的普遍常项，而韦伯则注意到，在整个历史上，行动者解释并作用于这些关乎生命的生物性事实的方式可谓千差万别。但是，事实上，行动者对于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常常只有一种模糊的理解，这又该如何看待呢？韦伯十分明确地承认，大多数行为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是缺乏意义的；但是他就当行动者会赋予其行为以清晰而明确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理念型，以此维持自己对于行动的解释学兴趣（Weber, 1921: 21—22）。

韦伯的行动观念有许多值得推介的地方。但和所有的理论家一样，他所设想的行动也排斥了行为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说，韦伯将社会学对于行动的研究兴趣限制在行动者能够理解的行为上，从而削减了冲动行为对于社会学的相关意义，也模糊了无意识动机的存现（Weber, 1921: 9、13—14、25）。不过，对于情感因素的这种排斥相当松散，足以容纳自我承认的那些感情，比如克里斯玛式领袖所激起的热情和加尔文教派命定论所唤起的焦虑。可是，被行动者升华或压抑的那些感情，比如狂怒、焦虑、羞耻和羡慕，它们所产生的那些行为后果，就会被排斥在外。^[3]

至于不具反思性的习惯与想当然接受的传统，则都只是被韦伯视作勉强够格的有意义行为（Weber, 1921: 4—5、24、25、29、319—320）。但是，他的思想诚实又迫使他承认，自己正是通过这种概念举措在关于行动的经验研究中创造出了问题。习惯与传统也许缺乏意义，但它们却浮现在各种行为当中，为行动添加秩序，其方式五花八门，从人际交往的礼节到日常家庭起居惯例。受传统束缚的行动者在组织许多日常的、周期性的习俗的时候，也同样是遵循着那些想当然接受的行动形式。韦伯为了充分地探讨手上这些作为研究素材的经验现实，富于策略地牺牲了自己对于行动的界定。在他的所有作品当中，传统与习俗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这些让步证明了韦伯是如何乐于尊重行动者的视点。但是，韦伯的让步也依然是将存在性意义置于自己思想的核心。而更为晚近的行动理论家们，尤其是杜威和吉登斯，则实际上倒置了韦伯对于行动的界定，提出许多普通行动形式的基础就在于那些被想当然接受的行为形式，而存在性意义基本只是在惯例被打破的关键时期才会浮出表面。

韦伯在决定将行动界定为有意义的行为之后，又凭借着精妙无比的分析技艺，



进一步扩充关于行为的各种基本形式的阐述。他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根据他关于存在的初始假定,即每一个体都会自己解释自身的行为,来发展关于社会行动与制度秩序的阐述。在《经济与社会》的起首一章里,韦伯通过三步环环相扣的概念步骤,完成了这项重大工作。[4]

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界定(Weber, 1921: 4, 22—24)的第一步,是将其社会学意义上主要强调的重点,放在行动者主观上以他人行为为取向的那些行为上。对于韦伯的前提假定,舒茨从现象学角度所做出的经典批判(Schutz, 1932)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读者不难通观这种界定所能够允许的社会现象的范围。“他人”这个词涵括了大量可能有的取向。社会行动可能以一个人的行为为取向,可能以几个人的行为为取向,还可能以数目不定的大量人群的行为为取向,可能会包括一些庞大的人群或有组织的群体。这些他人可能是同时代人,可能是先辈,也可能是未来世代的成员。而行动者与自己行动所取向的他人之间,可能有着个人的交往,也可能素不相识。

许多社会科学家对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界定熟记于心。但如果他们能够同样熟记韦伯关于社会关系的界定(Weber, 1921: 26—28),那会大大有助于理解韦伯。韦伯通过这个界定,向着达成关于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观念迈出了第二步。当几个行动者各自行动意义的取向都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他人的行为时,就存在着一种社会关系。在此,一个简单的概念再次掩盖了充满经验偶变性的世界。[5] 其中最重要的偶变因素之一便是,行动者们相互之间并不一定就其对此行为的解释达成共识。比如说,两位将军或许误解了各自对手的战术,但还是打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一对夫妇可能都同意结婚,但其中一位或许将订婚看作是最终的承诺,而另一位则或许依然有所保留。

韦伯在关于社会关系的探讨行将结束之时(Weber, 1921: 28),添上了似乎有些偶然的一点,使他有可能朝达成关于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观念迈出了第三步,正是这一步使他有可能确立大规模制度秩序的理念型。韦伯注意到,在长期的关系当中,有可能持续存在一种稳定的有意义的内容。他指出,这种内容可能被行动者理解成一套准则、规则或规范,他们期待同处那种关系中的其他行动者也会以此引导他们的行为。宗教方面的戒律、科层制里的规则、实践经验中的生存法则都属于这个意义上的超个体的准则。而行动者在主观上与公司或国家之类的集体维系起来的那些规范,也属于这种情况(Weber, 1921: 12)。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赢利能力方面的规范要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见Cohen, 1981)。这种规范引导经营者去组织安排能够赢利的劳动模式、采购程序、资金管理以及产品销售。不过话说回来,很有必要注意到,对于同样的超个体规则或规范,不同类型的行动者

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引导自己的行为。例如,公司的经营者们或许会接受可赢利的运作方式作为一种合法的规范,而公司的雇员们之所以也以赢利能力的规范来引导自己的行为,则或许只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确实需要得到那份工资。

超个体规范的观念使韦伯得以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概念,包括区分关于理性的超个体规范的不同类型,值得作比较详尽的阐明,但限于篇幅,在此我无法详论(参看 Kalberg, 1981; Levine, 1981)。韦伯还区分了社会行动本身当中理性的不同类型,我将等到下文探讨帕森斯的时候再作介绍。现在我想要说明的是,在韦伯的行动观念中,是如何结合他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即合法秩序的概念,突出了超个体规范。在韦伯看来(Weber, 1921: 31),“秩序”这个词代表着涉及以某项准则、规范或规则为取向的行为的任何关系。在一种秩序中,只要至少有某些行动者相信自己受到职责的约束,情感上受到驱迫,或者在道德上承诺要遵从秩序的规范或准则,那么这种秩序就获得了合法性。韦伯在这一点上推进得极其谨慎,考虑到了行动者在以同样的规范作为自己行为的取向时,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而并没有任何职责或承诺的感觉。比如说,行动者可能只是出于受迫、自利或习惯而遵从某项准则。他们也可能在同一项行为里以好几种秩序作为自己的取向,就好像宗教领袖在筹划一次神圣庆典的时候,会采取措施以遵从有关法规。合法性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那些确系出于某种职责感或道德承诺而遵循准则的行动者(例如高层官员),其行事方式会有助于使秩序中的关系模式保持稳定。但是,一种给定的制度秩序的稳定性是必须得到证明的,而不能只是假定如此。合法性可不能确保能够在那些只是权宜行事而非尽忠职守的人当中成功地推行行政命令。

韦伯在把分析的范围从社会行动转到合法秩序的时候,始终还是主张,是行动者确定自身的行为。不过,他关于行动作为有意义的行为的基本界定在此也产生了额外的困难。有两个问题关系到他对于社会行动的描述中颇有些奇怪的权力的特定地位。首先,来看看韦伯那广为人知的权力定义(Weber, 1921: 53),即某一关系中的一个行动者有多大可能性推行自己的意志,甚至是面临着对抗。就其本身而言,这个定义完全讲得通。但是,考虑到韦伯强调行动中的意义,似乎很难确定为什么他要提到“意志”。“意志”似乎意味着一种坚定的决心,混杂着强有力的情感与行动者有意义的意图。但是,要想捕捉到“意志”的这一核心特征,就需要对情感的强迫力有敏锐的把握,而这正是韦伯对于存在性意义的取向所缺乏的。仿佛是为了充分地考虑权力的概念,韦伯允许在自己的作品里出现对尼采“权力意志”的某种响应,但却不曾为这个术语确立适当的概念基础。^[6]

其次,来看看关于不平等的问题。韦伯从自己有意义的行动与关系等基本概念的角度出发,相当成功地理解了地位与阶级之类特定的不平等形式。但是他被

迫在有意义的行动领域之外,来说明为何在绝大多数社会背景中都明显普遍存在着不平等。不平等完全是因为太过普遍了,所以无法单单在观者眼里显出其意义来。通过一段复杂难缠的概念探讨(Weber, 1921: 38—40),韦伯指出不平等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对于社会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或生存机会必然存在争夺,也就是说竞争、冲突或“选择”(selection)(行为或关系中的相对成功)。但他对行动的基本定义中,没有丝毫迹象让人预见到会出现“选择”或冲突。因此,从有意义的行动的角度来看,不平等就像权力一样,似乎又是理论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3.2 帕森斯

帕森斯称自己整个理论方案为“行动理论”,但是,如果把这个词用于他在自己学术生涯后期构筑的那个功能上相互渗透的各个系统组成的严整框架,所代表的就只是对人们熟知的那些社会行为形式的类比。帕森斯作为一位杰出的行动理论家,其声名主要在于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Parsons, 1937),然后才是他后期的互动理论(参看Parsons, 1951: 第一章; 1968)。为了不让我自己的阐述失去控制,在此我只限于讨论《社会行动的结构》。^[7]

如果说有些社会科学家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除了一点其他一无所知的话,那就是知道它以一种高度抽象的方式探讨了行动。在作品开篇不久(Parsons, 1937: 43—49),帕森斯就从分析上将行动解析为抽象的要素,并将这些要素重新构建成一种探索性的理论模型,即“单位行动”(unit act)。绝大多数的评论者都遵照了帕森斯的引导,从这种模型入手来介绍他的行动理论。尽管如此,这个模型的细节却可能会遮蔽他的思想当中其他更为宽广的方面。正如卡米克所注意到的那样(Camic, 1989: 70—71),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行动理论,在一些关键方面依赖于他对一些扩展行动链(extended chains of action)所组成的分析性构型的理解。尽管对于帕森斯理论的任何简明解读都不可能把握其思想的所有要素,但在此我仍要强调行动链的核心地位,而不是他的单位行动模型。在此过程中,我将从影响他著作的几种视角的基本立场入手,来解释他的理论。首先,帕森斯从功利主义理论那里借取了手段—目的的行动结构。其次,他借取了韦伯的认识,即行动者自己确定各自行动的意涵。而帕森斯理解手段—目的的理性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方式,则揭开了行动链的重要性。我将指明,帕森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一种至关重要的立场偏向:价值作为理性行动的基础。说明了这一点后,我将比较简略地谈谈帕森斯思想中的第三点要素,就是将涂尔干的洞见引入有关行动的道德整合的观念。这一点从帕森斯广为人知的“秩序问题”的角度为其行动理论

定了位。

手段一目的理性指的是这样一种行动,其中的行动者计算自己的资源是否足以完成任务,并且基于这种计算来选择一项目标或宗旨。之所以说手段一目的理性是功利主义的行动,是因为它是从行动者的利益角度来确定的。对于绝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家(现在的功利主义理论家就是这样界定自己的)来说,所有的理性行动都具有同样一种手段一目的形式。然而,韦伯(Weber, 1921: 24—26)却认为手段一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只是社会生活中行为的许多主观取向中的一种而已。韦伯引入了第二种理性行动形式,即价值理性行动,以此强调了这种多样性。价值理性行动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行动者通过它计划来实现某种绝对价值。现代的仪式,比如拜谒墓地以向故去的亲朋好友表示敬意,或坚持素食以表示尊重动物的生命,都是在实现这个意义上的绝对价值。理念型的价值理性行动与功利主义的手段一目的关系之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不考虑后果。行为的理性就在于行动者实现其价值观念中蕴含的义务的意图。

韦伯仅仅承认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理性行动,就未再细究下去;而帕森斯写作《社会行动的结构》,则是作为理性主义者,带着一项使命,要将手段一目的关系从功利主义思想在理论上令人无法接受的那些意涵当中解救出来。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自有其源于常识的依据。帕森斯(Parsons, 1937: 251)就像绝大多数的日常行动者一样,也相信人们一般会投入“精力”,换言之,会主动地行事,以调动自身的行为去追求一个目的。^[8]功利主义的理论家们在处理这个意义上的主动性时,已经遇到了困难。他们当中许多人只是简单地将行动者如何选择目的或目标的问题悬搁不论(比如Simon, 1983: 7—8),因此也就将是什么调动行动者去行事的问题悬搁不论了。帕森斯则指出,这些置括使得目的似乎是随意变异的(也就是说,它们根本就不是由行动者所选择的)。

目的的随意变异表明了一个双重问题的一面,帕森斯称此问题为“功利主义两难困境”(Parsons, 1937: 64)。而困境的另一面则引出了生物决定论与物质决定论的潜在可能。将类属意义上的社会行动者视作一种本能的动物,基于遗传特征来引导自己的行动。然后再将这个行动者定位在一个特定的物质环境当中。这样一来,行动者就将发乎本能地选择目的,并以手边所拥有的最有效的资源来努力实现那些目的。在这里,他或她的目的并不是随意的。它们完全是被限定的。但是,不管是随意还是限定,“功利主义两难困境”都没有给行动者留下任何机会,可以去选择自己将要追求的目的。

帕森斯对“功利主义两难困境”的两方面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社会行动者是积极主动地选择自己所追求的那些目的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帕森斯如何

能够从随意的变异之中,或者从生物条件与物质条件的限定之中,将行动者对于其行为目的的存在性投入挽救出来?帕森斯的解决之道在于将自己的理论关注点从单个行动拓展到行动链,这种行动链由分析上有所关联的许多行为组成,并且基于道德上具有价值的目的。试举一马派色彩的例子。在使人异化的岗位上工作的工人们,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或执行的工作,或许并没有半点既得利益。他们只是一味地按照监督他们的人的命令去做。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工作呢?在工厂的直接行动背景下来看,似乎他们的工作是为了挣那一份工资,但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只有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会将金钱——也就是纯粹的交换价值——本身看作是目的。对于其他所有行动者来说,要想确定金钱的终极价值,必然先要经过各式各样的行动来追寻其踪迹,直至它落实为使用价值,这才是人类花费金钱的最终宗旨。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可能会把他们的工资花在为各自家庭谋取安乐生活上,或者是过上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又或者是资助工会。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都会将各自异化了的工厂劳动视作一种手段,处在扩展行动链当中,导向一个他们认为其本身就有价值的终极目的。^[9]

帕森斯 (Parsons, 1937: 255, 706) 认为,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终极目的”,正是扩展的理性行动链的主导原则。行动者或许没有能力确切地阐述这些目的,但是它们依然作为弥散的情感或“价值态度”而存在着。行动链上的个别行动本身并不需要具备价值。但是,任何一项行为,既包括符合所有不可避免条件的行为,也包括需要服从另一个人要求的行为,都可以被行动者看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只要这个行动者在主观上将此行为理解成一种手段,以达成自己脑子里某种有价值的宗旨。如此看来,帕森斯似乎在理论上偏向于价值理性。价值调动起朝向终极目的的主动性,并将存在性意义注入到哪怕是异化了的行动之中。

帕森斯在强调价值观念对于理性行动链的影响方面可谓是毫无保留。但是,在他的行动理论里,也有一种亚历山大 (Alexander, 1983) 所称的“多维”性质。帕森斯清楚地意识到,物质障碍与政治障碍可能会阻碍乃至防止行动者达成他们赋予价值的那些目标。他为了从概念上总结这些障碍,在分析上抽象出三种“中间性的”工具取向,在扩展行动链上,这三种取向介于“精力”的投入与某项终极目的的实现之间:其一是经济取向,引入了对于稀缺资源之耗费的关注;其二是技术取向,引入了对于资源之有效使用的关注;其三是政治取向,引入了对于强制性资源的控制者的关注 (Parsons, 1937: 232 — 237)。正如卡米克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些取向赋予具有明确工具性的社会行动实例的角色,要比帕森斯的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更为重要 (Camic, 1989: 71 — 74)。

从帕森斯的视角来看,讨论到这一步还只是留下一条松散的理论思路。而要

将这条思路织进他的整个思想,还需要引入帕森斯广为人知的“秩序问题”。为了界定“秩序问题”,帕森斯从行动者的视点转移出来,开始从社会整合和调控的角度来考察行动的面目。这种转换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个体以终极目的为取向而遵循行动链的观念。帕森斯相信,如果行动者所追求的是彼此完全独立的目的,他们就会毫无负疚之心地利用其他行动者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作为假设当中的极端情况,就会导致一场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帕森斯承认,极少有社会能够完美地整合在一起。不过他发现,更有意思的是,也很少有社会曾经退化到永无宁日的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之中(Parsons, 1937: 247—248)。他的秩序问题问的就是:是什么确保一个社会将会在可控制的程度上维持一种整合的秩序?(Parsons, 1937: 89—94)

帕森斯的全面回答的一个核心要素(Parsons, 1937: 238, 247—248),就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像霍布斯建议的那样,通过外在强力来维持秩序;要么行动的终极目的得到充分整合,社会的个体成员都分享共同的目的。考虑到他对于价值理性的偏爱,帕森斯显然是希望强调共同目的的重要性。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共同目的又是如何能够为社会秩序提供一种基础?说到底,任何特定个人对于目的的追求,都涉及到对于稀缺资源的经济取向与政治取向。即便个体追求的是共同目的,又靠什么来防止那些有机会获得更有效资源的人无情地对待他们的竞争者呢?

帕森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所表露出的观念,系取自涂尔干关于文化规范之约束性力量的说法。在帕森斯之前,涂尔干就已经强力主张,社会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终极价值观念。但是,涂尔干还有一个连带的观念,即社会为行动者提供了一整套规范性规则以指导其具体行为,这给帕森斯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Parsons, 1937: 400页以下)。在涂尔干看来,这些规则自有其道德上的力量。帕森斯则将这种力量的基点落在价值观念的神圣性上,认为是这种神圣性为社会的共同目的提供了正当性。比如说,一位父亲若是以自己子女的安乐生活(一种神圣的价值)为超越一切的价值,就会遵循被其文化成员(道德上)认可为子女最佳利益的养儿育女规范,从而在具体行为当中实现这一价值观念。与此类似,一位医生若是以自己病人的健康(一种神圣的价值)为义务,就会遵循那些规定在具体情境下处理病人的(道德上)正确与错误方式的规范,来实现这种义务。这种规范性的视角是不是否认了父母有可能对孩子放任自流,或者医生有可能玩忽职守,或者笼统言之道德上不负责任的行动?也不尽然。帕森斯(Parsons, 1937: 404)效仿涂尔干指出,约制与规范联系在一起,就表明不太可能指望有很多行动者会偏离规范性规则。但是,帕森斯也设定了一种对于任何霍布斯式解体趋向的强劲制



■ 衡。简言之,他的理论基础设定,有相当数量的行动者确实会始终信守规范。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偏离了规则,那么约制就将不可强制执行。

对于终极价值观念在经验上的效力,对于从行为的角度确定的道德规范,帕森斯深信不疑。这种信念触及了社会思想中一种深层的脉动。康德、卢梭和黑格尔的作品典型地体现出,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哲学家们就在竭力解决社会行动中“实然”(is)与“应然”(ought)之间那棘手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实际如何作为与伦理原则主张我们理当如何行事之间的关系。帕森斯的意思似乎是说,在许多情况下,“实然”与“应然”之间至少有着松散的关联。也就是说,鉴于并未出现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他就假定许多行动者是以道德上预先规定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终极目的”。帕森斯的批评者当中很少有人从“实然”与“应然”的角度来谈,纵然如此,对于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说,帕森斯对于规范与价值的效力的信念也很让人恼火。社会理论家们常常是出于一种热烈的欲望而投入写作,以这种方式生活在一个价值影响行动的世界里。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一个“好社会”该有的样子。但是,这种热情本身就推动着许多理论家去批评,在社会行动的表面面貌与行动者根据道德规范理当遵从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帕森斯也许可以在理论上解决“功利主义两难困境”和秩序问题,但是,他的批评者们会主张,他应当更加密切地关注,行动者在实际当中何以未能更加密切地遵循道德规范。

批评者们对这一思想的发挥方式纷繁多样,已经远非此处所能概括。我将只限于探讨从韦伯的立场就帕森斯对价值理性的依赖所作的批评。有必要重申,帕森斯是本着现实主义的立场,承认了工具性手段对实现被赋予价值的目的所具有的影响,以此来补充自己对于终极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的影响的信念的。实质上,帕森斯认为在行动链中,对于经济、政治和技术能力的工具性计算约束并引导着对于社会生活中关键性目的的追求。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工具性的资源毫无道德意涵可言。帕森斯未能考虑到,对于工具性资源的追求本身也有可能成为目的,哪怕事实上这些资源根本就缺乏任何道德意义。至于实例,我们只需看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注意到(Weber, 1920: 53),在绝大多数社会里,经济获取都充当着实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资本主义扭转了行为的通常进程。经济的获取尽管缺乏任何形式的道德正当性,却成为行为的终极目标,这种没有道德实质内涵的行动取向现在却在组织着社会生活中的大量秩序(参见Cohen, 1981)。这一思路表明,帕森斯所谓行动者始终将自己的行动与那些从社会伦理价值中推出其意义的目的联系起来,是一种过于急切的假定。帕森斯的行动理论草率地认为,行动不可能既在道德上缺乏意义,又具有目标的取向。而今天的许多

理论家（比如贝尔、贝拉和鲍曼）附和着韦伯的主张，也认为这种与道德无涉的目标取代伦理上富有的价值的目的的现象，已经成为现代性的重大问题之一。

帕森斯处理与道德无涉之行为时出现了种种困难，表明可对其行动理论进行更为广泛的批评。读者们有时候会抱怨有一种奇怪的体验，会陷于帕森斯的推论之中难以自拔。表面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如果你在少数几个论点上赞同了帕森斯的意见，就很难找到出路，摆脱他整个的理论体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受困的感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作品中基本假设的界定比较狭窄。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帕森斯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因为它们都牵涉到精力的使用和不可避免的特定条件下手段的运用，以及对于被赋予价值的目的的追求。他进一步主张，有足够多的行动是由道德规范引导的，足以防止解体而陷入霍布斯式的无序状态。这样的主张充分表明了帕森斯的理论技能，就是说他有能力将极其庞杂的互不相关的观念整合成一种行动形象，以如此众多的前提预设作为起点。尽管如此，帕森斯还是低估或忽视了其他理论家所留意的许多行动要素。行动者对于所有行动的筹划都是从欲望中的目的和有效的手段角度出发的吗？我们应当如何衡量未经反思的习惯和发乎冲动的情感的力量（参见前文对韦伯的评论）？最后，所有的行动都像帕森斯所表明的那么具有主体性吗？处在对于种种价值观念与规范的认同之中，处在对于达成被赋予价值的目的之手段的种种选择之中，行为本身，行为的实际执行本身，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帕森斯和韦伯一样，对于行为的实际执行都几乎是未置一辞。而对于有待下文讨论的那些理论家来说，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行为的实际执行对于行动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帕森斯或韦伯所承认的程度。

3.3 杜威与米德

现在我们从行动理论转向实践理论。但是，这样的区分本身似乎会被指责为社会理论家从根本不存在差异的地方看出差异来。说到底，行动与实践指的都是社会行为。那么这里的差异在哪儿呢？差异很简单，不过却是深层的。韦伯将“行动”界定为从主观意义来谈的行为，这种界定忽略了行为的另一个维度，即行为的实际执行或实施。简言之，如果行动指的是行动者借助自己之所为而表达出的意义或意向，那么实践指的就是行动者如何使自己之所作所为实际发生。实践指的不是我们通过自己行动而表达出的意义，而是当我们行动时实际发生了什么。

西方思想生活中早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开始，哲学家们就已经让我们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从一些主观的方面来思考行动。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并

不在于分析上的考虑,而在于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念将思考的责任及其后果放在了个体的精神行为上。当我们将行动的责任交付行动者头脑中的见解时,我们也就指定了一些思想状况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意义,所谓理性、自主、奉献、忠、爱、信,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些思想状况而已。

实践理论家们主张,主观主义的行动理论赋予意识的特殊地位太过分了。因此,将实践理解成行动的核心方面,也就是否认了人类心智具有不受限制的自主权力来指导行动的进程。杜威和米德这两位我们首先探讨的实践理论家,在行动理论与实践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杜威和米德都是实用主义者。约阿斯晚近的一些作品已经重新恢复了实用主义行动理论的活力(Joas, 1980, 1992, 1993),他指明了这种桥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Joas, 1992: 148—167)。实用主义者坚持了一些被行动理论家所忘却的东西,即说到底,社会行动者要去行动,就必须落实到身体上。但是在这些实用主义者当中,杜威、米德同样敏感地注意到,事实上,体现为身体的行动者也有他们的思维。

杜威和米德想要终结笛卡尔笔下心高于身的偏向。其实并不是“我思故我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行动,世界有了反应,我们的思维逐一记录并对世界作出回应,然后我们再行动。这样措辞或许不那么雅致,但现在身和心就可以被视作我们行为的展开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了。而实践也就此成为实用主义理论的支点。

尽管杜威和米德最终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实践理论,但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从一套共同的假设出发的。正如约阿斯所言(Joas, 1992: 158—159),实用主义理论将社会行为定位在情境(situation)之中;也就是说,定位在一些为行为开启一系列可能性的情景(context)之中。行动者是带着自己的身体来到这些情境当中的,这种见解看起来平淡无奇,却掩盖着实用主义实践理论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假定。根植在我们的身体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植在对于类似我们过去曾经经历的情境的器官或肌肉的反应,我们已经“记录”(这也是生理记忆的一种类型)下一般化了的反应,由类似情境的新实例中的要素所激发。我们最初是通过我们的身体感觉来探知这些反应的,就是当在一个给定情境中被激起时,我们已准备好如此行为。比如说,当一位讲演者起身在一群听众面前开口言说时,会感受到生理上的焦虑;或者,一位歌剧迷甚至在自己喜好的咏叹调还没开始表演时,就已经感到了生理上的激动。行动者所把握的每一个处境都有其自身的一系列身体上的紧张、敏感、犹豫、激动等等。我们进入一个情境,通过我们的身体,对于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又将作何反应,已经体验到一种预先的期待。

但是对于杜威和米德(以及约阿斯,见Joas, 1992: 133)来说,这些期待也是

有可能实现不了的。讲演者或许起身发言,却忘了带她的稿子;而那个歌剧迷也可能对咏叹调的演绎方式感到失望。这些破灭的期待为新颖的(从而也是富于创造性的)反应开启了机会。讲演者或许即席发挥了一篇演讲;歌剧迷或许会对他的同道们表露对表演的批评意见。对于我们有关杜威、米德乃至整体上的实用主义理论的理解,约阿斯的重要贡献之一即在于指出,他们在自己更宽泛的实践观念中,融入了有关他所称的“情境限定的创造性”(situated creativity)的理论。也就是说,行动者置身任一给定情境中,(在体现身体的意义上)期待出现通常经验与常规反应,而与此同时,出乎预期的发展也会将我们的理智力与想像力都引向对于最有效的反应方式的追寻上。这种创造性可能是重大的,也可能是平淡的。但即便是平淡如找回我们放错了地方的钥匙,也涉及到一点情境限定的创造性。这里要注意的是,情境限定的创造性是如何同时包括了身与心。我们寻找我们的钥匙,当它们不在我们期望它们所在的地方时我们感到紧张,思索着会把它们落在哪儿,搜寻着那处场所,而当我们找到它们时,会感到一种身体上的放松。主观性只是行为的一个阶段,只是实践的一个方面(参见 Joas, 1998: 156—157)。

在此必须指出,前文所叙并不专门是社会学家拿来与种种“符号互动”理论维系在一起的关于行动的说明。由于布鲁默(Blumer, 1969)有选择地重新构建了米德未刊行讲演中的深刻见解,因此,他对“符号互动”的解释就常常取代了对于米德作品本身的评价。实际上,米德与杜威所论及的哲学研究规划都要比布鲁默所承认的宽泛得多,而有关社会改革的行文也要比布鲁默所看到的带有更多的规范认同。[10]

布鲁默(Blumer, 1969)十分正确地将米德归为“互动论者”。尽管如此,米德对于“互动”(interaction)这个词的使用并不符合正统方式,杜威也是一样。互动这个词在他们的作品里出现时,是和诸如“调和”(accommodation)、“适应”(adaptation)这样的词同义的。这种“互动”概念所涵括的范围,远比布鲁默的面对面行为来得宽广。对于杜威和米德来说,各式各样的实体,从原子和细胞到社会的成员,都既在本身内部有所互动,也与其所处环境有所互动(参见 Dewey, 1925: 145)。这种高度一般化的对于互动的理解,有时候似乎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设定,暗示着杜威与米德所运用的互动比喻并不源自面对面行为,而是来自于对达尔文进化论中适应观念的一种实用主义读解(参见 Shalin, 1986: 9—13)。杜威与米德抛弃了庸俗达尔文主义对于“适者生存”的说法,主张人类与其他任何物种一样,也在竭力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与他们在自己互动的那些情境中所遇上的任何人(或任何事情)之间达成稳定而协调的调和。

但是,互动的并不仅仅是人类。自然世界中的一切都在互动,就和社会世界中

的情形一样。米德 (Mead, 1934 : 185) 举了下面这个例子, 以说明一个人类行动者与自然力量之间的互动中存在的这种交互性。工程师建造桥梁时, 他会遇到物理上的应力与拉力。实际上, 桥梁是在对工程师的行动作出反应, 是在调和他或她所作出的变动。工程师做出了某种变动, 以缓和某些应力, 而桥梁则再一次作出回应。又经过了数度调整适应, 桥梁达到了令工程师满意的应力水平。

那么好, 如果我们区分出作为行动者的工程师与作为客体对象的桥梁, 那么这个过程似乎就不太像是一种互动, 倒像是一系列单方面的举动。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互动并不完全是属人的。桥梁缺乏任何属人的、精神的力量, 来认识到自身所处的情境或考虑自身的行为。桥梁和所有物理的东西一样, 也是以一些机械的方式作出回应。而杜威和米德也都能够接受桥梁并不以属人的方式互动。这是因为他们的互动观念包含了所有调整适应形式, 而不仅仅是那些涉及人的回应与自觉反应的形式。

但是, 这样一来, 又是什么使互动成为属人的互动呢? 杜威和米德假定而非阐明了我认为属于他们重要关怀之一的东西, 将我们带回他们的实践理论的心智阶段。试以达尔文的话来说, 人类物种所操习的能力, 能够对变动不居的情境作出灵活多样的调整, 提供独一无二的优势以控制各种环境。很难否认, 这种灵活多样的特性有赖于人的心智官能, 比如推理、想像、反思等等。我们已经看到, 如何将自觉意识根植在行为之中, 这个问题在杜威与米德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分量一直很重。他们两位都追索着这个问题, 也对这个共同的主题各自发展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要想看看他们如何将行为与自觉意识融合在一起, 现在就有必要分别来探讨这两位。

3.3-1 杜威

回想一下, 韦伯在将习惯理解为行动时遇到了困难。实际上, 所有的主观论者都不能顺利地处理习惯, 因为习惯的施行可以仅仅凭着默契理解的意义或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意图。杜威也同样在习惯这一点上遇到了问题 (参见 Dewey, 1922 : 第 14 章), 但这种问题是规范性的而非分析性的。杜威认为, 人类社会状况的民主改进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这使他反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单调乏味的习惯, 比如流水线生产, 比如学校里的死记硬背。这些例行常规极大地牵制着求索的思维和锐意的创新, 后两者原本可以产生更令人满意的调整, 以改变社会生活中使人沮丧的情势。杜威知道, 习惯在创造出来时并不都是整齐划一的。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许多形式的习惯的前反思性经验 (参见 Ostrow, 1990)。然而, 他也领会到,

对于人类行动者就自身环境所作的灵活调整,反思性意识或敏锐的推理具有重要的意涵。实际上,他的实践理论所探讨的与其说是习惯,不如说是从习惯、反思性意识、理性意识一直到行为变化的循环往复。

因此,杜威的实践理论(Dewey, 1922: 51)一方面认为创造性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同时也承认习惯为人的行为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效率与协调。我们完全缺乏能力对自己执行的每一项行动都进行反思。人类的头脑并无能力留心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在短暂的时间跨度之间实施的形形色色的活动。有些习惯或许是呆板、机械的行动,但大体而言,杜威(Dewey, 1922: 31—32)将习惯视作富于动力的倾向,我们需要根据它来适应我们生活中的种种情境。社会生活不可能在每次发生的时候都以新的面目被创造出来。

尽管约阿斯在英语世界里最著名的是他对米德作品的杰出考察(Joas, 1980, 1998),但在许多方面,杜威比米德更多地为他实用主义行动理论的重构提供了模板。前文业已提到,约阿斯与杜威一样,都认为当有问题妨碍习惯的施行时,期待就会受挫,我们就体验到(体现在身体上的)心理不适。杜威(Dewey, 1922: 第14至17章)和约阿斯(Joas, 1992: 第4章)倒是对这种躁动表示欢迎,认为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促进了行为上的变化。当然,有些反应或许不如其他一些反应那么富有成效。有些时候,行动者也可能会在白日梦、毒品或愤怒与焦虑的情感骤发当中释放自己的受挫感。但是在更为快乐的情境下,受挫是可以通过比较具有思想性和想像力的方式克服的,而我们也可以改变受挫情境本身。

3.3-2 米德

米德的问题核心与其说在于习惯当中反思性推理的地位,不如说更多地在于社会互动当中个人意识的地位。约阿斯关于创造性的理论更多地借鉴了杜威而不是米德(但是可以参见Joas, 1998)。但不管怎么说,在这里,一些为人熟知的符号互动概念,尤其是具有显著意义的符号与语言姿态所具有的核心地位,都很好地反映了米德的观点。

米德以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风格提出,互动当中的调整适应并非专为人类所有的特征。所有的动物都会做出姿态来,激起本物种中其他成员发乎本能的调整。对于人类的互动来说,姿态的施行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类缺乏类似的生物本能,因此是通过显著符号来调整各自的行为的。所谓显著符号,是一些特定的姿态(主要是但不全是言语),以含蓄的方式,从一种姿态的施行者那里激起某种反应倾向,而这种倾向也同样是施行者意欲从参与互动的他人那里激发的。施行者就

此可以预期他或她的共同参与者将会以某种例行的方式回应这种姿态,以此扮演他人的角色。反之,共同参与者也可以理解姿态的施行者脑子里的那种反应。

这种大胆的概念突破以独特的方式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插入了沟通(因此也就插入了意义)。尽管如此,在此也必须将意义与反思性的思考过程区分开来(Mead, 1934: 77—81)。实际上,当显著符号激发出共同期待的行为形式时,整个的施行过程就可以习惯的方式实施了。在出于习惯的符号互动当中,意义只是以默契的方式进入了思维。习惯原本可以完全地取代反思性思维,只不过米德与杜威都持有的一种新达尔文主义信念,认为所有的适应循环最终都是会被打破的。

作为布鲁默作品带来的一种后果,绝大多数的符号互动论者都忽视了米德思想当中的生物性一面。但对于米德来说(Mead, 1934: 98—100),行动者之所以可以摆脱习惯性的反应,是因为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会延搁对于某种刺激的反应相当长的时间,乃至在情形许可下,一个行动者可以思考是否有替代性的反应模式。当共同参与者未能作出期待之中的反应,从而阻碍了针对显著符号所作出的共同理解下的反应(这在米德那里相当于杜威笔下的习惯)时,行动者就会在自己的反应中使用生物学角度上许可的延搁,以便以反思性的方式预演他们可以实施的种种具有显著意义的替代性姿态大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具有显著意义的姿态此时便成了思想的工具,行动者可以用来激发自己潜在的反应,而这些反应本来也可以是自己在其他人身上激发出来的。行动者可以选择实施某种习惯性的反应,而不是即兴发挥一种新的行为形式。不管怎么说,在这些带有反思性的自觉意识环节里,即兴发挥同样是一种开放性的替代选择。

对于杜威来讲,内在反思为人的理性在社会实践中提供了一席之地;而对于米德来说,内在谈话则为社会实践提供了一种自我的实用主义基础。自我的“客我”(me)阶段指的是对于显著符号所产生的合乎习惯或期待之中的反应,而这些符号是一个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能把握的(在概念上称作“一般化他人”)。但是,内在的对话并不发生在“客我”的不同部分之间。如果说是发生在“客我”的不同部分之间,当旧的习惯受到阻碍时,行动者就可以在可相互替代的多种习惯之间再作选择,而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新的习惯了。自我的“主我”(I)部分是米德用来说明互动中的创造性与即兴发挥的。从他的新达尔文主义视点来看,“主我”执行的功能至关重要,能够针对构成问题的情境或环境,产生更令人满意的新的调整适应。

在未来的社会学领域里,实用主义的实践理论似乎注定要有一次复兴。在这方面,约阿斯并不是惟一的一位重要贡献者。我在下文将要详细探讨朝向关系性

行动理论的一种新动向,包括通过艾默贝耶的作品体现出来的在实质上强调实用主义理论(参看下文有关社会关系的一节)。除此之外,有关自我的新的实用主义理论也已经崭露头角,从许多很有意思的新方向上拓展了米德的“主我”与“客我”观念(参看 Wiley, 1994; Joas, 1998)。但不管怎么说,由于实用主义理论还在继续启发着社会学,所以还有一些核心的问题有待克服。

首先,如果想要透彻地分析社会实践与互动,能够架通身与心,就需要对处在具体情境中的人的情感进行深入的分析,要比目前所看到的大大完善才行(在这一点上,朗对符号互动的批评依然是富于洞见的[Wright, 1963])。尽管杜威与米德都敏锐地意识到身体性的反应,但他们主要还是从认知的角度来理解行为的心智特征的(例如 Mead, 1934: 173)。而当代的理论家们则开始从米德的作品中重新挖掘出一种情感理论(参见 Collins, 1989; McCarthy, 1989)。不过话说回来,就人的情感与激情而言,在理论的成熟程度上,实用主义的实践理论并不比韦伯与帕森斯强多少。

哈贝马斯重新挖掘了米德沟通互动理论中的规范性意涵(Habermas, 1981: 1—42;也可参看 Antonio, 1989),这种思路已经引起了许多规范理论家与批判理论家的关注,因为用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生活当中的交互性与调整适应,就蕴含着一种民主的观照。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评论者也都一致认为,杜威与米德有关社会行为中实用主义的适应与互动的理论在政治上似乎都很天真。个人之间的每一次社会互动,或者较大共同体当中的每一次行动序列,都有可能生产出一种相互丰富、调整完好的稳定关系——这样一种理论阐述或许很能鼓舞人心。但是,要是试图从这些方面来进行经验分析,就会严重低估控制他人行为进程的斗争在社会生活中的存现及种种后果。杜威与米德在对调整适应的强调上,或许有点过于乐观了。或许可以说,在社会行为当中,调整不良与未经解决的问题所占的分量,不比实用主义理论家们所重视的反思性实践少。

杜威与米德那里最常被指出的疏忽之一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在政治上是何等地严重失察。在两位理论家关于调整与调和的绝大多数议论当中,都忽视了稀缺资源对于社会生活的无所不在的(但在经验上却是复杂多变的)影响。当然,这里的意思决非要将实践化约为资源之竞争。社会行为是那样的开放,那样的复杂,以至于原本建立在对于更好的资源的获取渠道基础上的优势地位,也可以与相互调整和调和交织在一起。因此,杜威与米德强调社会互动也许比我们所设想的更为和谐,这样的论点还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对政治资源或经济资源的获取渠道不均衡,会产生互动中调整不良的潜在可能,如果简单地忽略这一点,就会助长一种永远不可能存在的理论伊甸园的观点。



3.4 加芬克尔

一种是加芬克尔所引入的常人方法学的实践形象,另一种是米德所启发的符号互动论的形象,这样的区分历经多年,已经蜕变成一种党派之争。对于没有任何既得利益的旁观者来讲,乍看起来,似乎两方之间有着大量的共同之处。它们都很关注行为的具体实施,都很关注互动,也都对社会偶遇 (social encounters) 的交互节律印象颇深。尽管如此,在这场学术争斗中,两方立场之间的差异要比初看起来的大一些。

米德与加芬克尔做出理论阐述的方式相当不同。米德十分关注哲学问题,而加芬克尔 (Garfinkel, 1963, 1967, 1988, 1996) 则更倾向于参照经验研究的特定实例来进行推论。加芬克尔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位社会学极简主义者 (sociological minimalist), 从社会偶遇最不起眼的方面当中寻找重要意义。但与艺术上的极简主义者一样,* 他的所有作品里都渗透着一种暗含的理论敏感 (参见 Heritage, 1984; Hilbert, 1992)。因此,情境也是很重要的,或者用加芬克尔的术语来说,就是情境性 (contextuality)。米德与日后的符号互动论者都倾向于寻找那些被假定为根植于逐步展开的情境当中的显著符号。而加芬克尔与总体而言的常人方法学家们对情境性都未作出任何假定。相反,他们力求考察,社会实践是如何以反思性的方式,依赖于一次社会偶遇中生产出来的所有情境,以及偶遇中的每一次后续举措所产生的一点一滴新的情境。

加芬克尔对明确阐述自己的理论立场缺乏兴趣,这使他得以回避了一些思想争论,那些争论有可能使他不能集中注意力阐发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一项争论是加芬克尔明确想要避免的,就是个人意识在互动中的地位,而这在米德那里可是很突出的话题。有时候,加芬克尔会夸大他对自觉意识的排斥 (比如可参见 Garfinkel, 1963: 190)。但事实上,他本意上想要搁置一旁的只是思想与情感的存在性经验,从而在说明时将行动者的个人情感与存在性意义弃而不论 (参见 Garfinkel, 1967: 268, 276)。

加芬克尔奠基性的洞见其实非常平淡:具体情境中的社会行动是一种积极生产出来的成就 (accomplishment)。尽管如此,在加芬克尔及其所启发乃至时常亲身调教的常人方法学家们的研究当中,还是有一种特别的发现。社会行动者们知

* 极简主义者 (minimalist): 极简派抽象艺术系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发端于纽约的视觉艺术与音乐方面的思潮,形式极其简单,以纯客观的态度,排除艺术家自身的任何感情表现。——译者注

道如何去生产社会行动,但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对自己所知道的东西的觉察只是停留在不言自明的状态。这些被人“视若无睹”的实践面相,就是加芬克尔理论上与经验上的研究领域。(他的这种研究领域以及相伴而来的发现与戈夫曼和奥斯汀完全一致)。加芬克尔某些早期研究(Garfinkel, 1963)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冲犯或“破坏”表面上平淡无味的实践惯例,证明存在一些默认的做法以便成就互动。比方说,在画“连城”游戏* (“O” “x”游戏)之类日常游戏的时候,加芬克尔把他的记号划在了按照规则来说不合适的点上(比如不在格子里)。这些举动似乎微不足道,却在他的研究对象身上激起了困惑的表露,怀疑他有什么隐藏的动机。这些强烈的反应表明,行动者对于一般而言根本不曾注意的那些做法,其实有着多么深的认同。

那么,行动者又为什么要如此认同这些做法呢?赫里蒂奇(Heritage, 1984: 70—71, 77—78)从“认知性秩序问题”的角度入手,阐释了加芬克尔“破坏”研究的结果。这个问题彰显了这样一种深刻见解:正常的实践生产出社会组织过程中可以理解的那些特性,生产出事件中一种被行动者在其日常生活中想当然接受的秩序。加芬克尔在破坏画“连城”游戏中的认知秩序时所激起的那种受挫感,通过暂时取消认知秩序而证明这种秩序占有核心地位。但是,加芬克尔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对认知秩序的心理需求,而是在于行动者使用哪些做法来建构这种秩序。正如他所言:“在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通的活动里,也有着一种秩序”(Garfinkel, 1996: 7)。

要对一个具体情境中的认知秩序生产有所认识,不妨来看加芬克尔研究中的一个实例(Garfinkel, 1967: 第四章)。法庭召集陪审团,后者负责根据听审时提供的种种相互冲突的证据,构建出一种有秩序的对于事件的说明。法庭还预先规定了正式规则,陪审员们理当根据这些规则来构建他们的有秩序的说明(比如遵照关于罪的法律界定来进行诉讼程序,只接受允许提出的证据等等)。但是,加芬克尔发现,陪审员们并不一定遵照正式规则。相反,他们将自己的方法带进了诉讼,用在家里和自己同伴使用的那些惯常做法,来临时商议法官的定罪建议。**这就产生了许多后果,比如法官会为法庭证词中一些含糊不清之处做出特别的说明,否则这些含糊不清之处本来是有可能破坏他们判决的正当性的。这项研究可以推广

* 画“连城”游戏:游戏双方在一井字格里轮流画“O”和“x”,以先排成一排或一列或一对角线者为胜。——译者注

** 定罪建议(instructions):法官在陪审团做出裁决之前,就案件适用条款所作的法律要点说明。——译者注

到几乎任何类型的互动。认知秩序是由我们在社会互动中随处可观察到的那些适当而正常的做法生产出来的。如果认知秩序的生产陷于崩溃,结果便是一种让人深感不安的失范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具有意义(Garfinkel, 1963; Hilbert, 1992:第五章)。

互动是加芬克尔常人方法学所研究的惟一焦点。在他的作品里,自成一体、富于反思的个体形象从来也不占突出地位。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各种有序情境生产的细节,加芬克尔有着一位经验研究者的偏爱,这要比米德显著得多。有一种基本的洞见让我们对常人方法学式的社会行为特征(以及与此同时加芬克尔与实用主义式的“情境”之间的距离)有所认识,即对于常人方法学家来说,任何与互动分开考察的符号或姿态,在被引入一个局部建构的特定情境从而被具体规定为有意义的符号或姿态之前,都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加芬克尔在关于“索引性”(indexicality)的讨论当中(比如 Garfinkel, 1967: 4—7),引入了这种很好理解的见解:在一次互动中的某一个时刻,一个短语可以成其为一种严肃认真的插入语,但在另一个时刻,它的表达却有可能显出讽刺或轻浮的味道来。由此观之,谈话中绝大多数的插入语都有实质性的议论,也有对正在说的东西的描述。情境中每一句插入语都间接或直接地包含了对实践内容的说明。行动的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在经验的角度上可能是复杂的,很难进行分析,但一个简明的例子可以证明基本的论点。当一个行动者以一种真诚的方式说“我很抱歉”时,他或她实质上是在对自己所实施的那种行动做出描述(给个说法)(参见 Austin, 1962)。

加芬克尔和韦伯一样,对于行为的规则性与偶变性给予了同等的关注,尽管他并不像韦伯那样偏好从行动者的视点出发。加芬克尔的经验取向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常人方法学中涌现出大量内容丰富的经验研究。另一种更富于争议的结果,是有些常人方法学家主张(参见 Pollner, 1991),对行动中认知秩序之生产的考察,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于所有社会秩序类型的固定性质的信念,包括对于所有社会科学知识形式中的秩序的信念。就此而言,常人方法学的使命就在于将那些未受质疑的永恒真理重新解释为局部的、或然的建构,始终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常人方法学被刻画成理论上的煽动者,没完没了地唆使别人挑战广为接受的信念,并且意识到任何新的信念都与被它们所取代的那些信念含有同样多的社会建构的成分。

诚然,在这个意义上,常人方法学已经被视作一种不折不扣的异端。然而,且不说波勒纳,就整体上的常人方法学家来说,尤其是被称作谈话分析学者的那一派常人方法学家,近年来已经将他们的考察向更大的“制度性”关注开放,而后者正

是社会学始终关注的话题。当然,加芬克尔从未彻底遗漏制度,比如法律体系。更晚近的时候,他启发了许多常人方法学家去研究科学发现过程等工作形式中所涉及的做法(参见 Garfinkel, Lynch, and Livingston, 1981; Lynch, 1993)。

但是近年来,谈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已经在制度研究中打上了自己独特的烙印。谈话分析是社会学中最为艰辛的经验取向研究形式之一(有关概况参看 Heritage, 1984 :第 8 章),但是,它的理论出发点却决非难以把握。谈话分析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谈话具有一些影响互动内容的一般化形式,而把所有关于意义的问题都搁置一旁。他们的研究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比如 Sacks, 1964 — 1965 :第一讲; Sacks, Schegloff, and Jefferson, 1974 ; Schegloff, 1992a)。以插入日常谈话的任一问题为例。无论这可能是个什么样的问题,一旦已经被表达出来,谈话各方就会预期与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下一个插入语,它通常是但也不总是一个回答。即便在问题提出之后,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说话,沉默本身也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出现在谈话中该有个回答的地方。与此类似,打个招呼就会创造出一种回复的谈话机会,而收场话则不再允许有任何进一步的谈话,等等。谈话分析就此尽可能深入地将认知性秩序问题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直至互动中话序承接 (turn-taking) 的基础。

不过话说回来,谈话分析在将实践推进到谈话形式中的形式基础的时候,也往往忘却了社会实践的社会学实质。考虑到谈话分析强调形式重于内容,这看起来也许原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到底,谈话并不仅仅是会话中的话序轮次。不过谈话分析的形式主义已经在许多方面遭到了批评,而谈话分析学者自己也已经超越了单纯研究形式的形式分析。

但这并不等于说,谈话分析已经完全放弃了它的形式取向。相反,它已经使得会话的形式在研究实质性场景中的谈话时也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人们的工作场景中(参见 Drew and Heritage, 1992)。这一点如何可能做到?常人方法学中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罗尔丝主张 (Rawls, 1987),日常互动,即戈夫曼所称的“自成一体的互动秩序”(Goffman, 1983),除了产生科层机构、法院、学校班级之类的制度结构,还产生了道德认同。试举一简单的谈话实例。在非正式的谈话当中,有一种暗含的平等。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发问,而一旦一个问题问了出来,在其他方面也都有一种义务要给出某种回答。但是,在科层机构的会议上、大学的讲演中、医生与病人之间的讨论里乃至其他结构性场景内,谈话并不采取日常的形式。有些问题是下属、病人和学生无权问的,而管理者、医生和教员就有权问出来。不仅如此,他们有权提出的问题可以采取具有特定结构的形式:比如社会工作者向其救济对象提出的具有既定结构的问题,又比如法庭上表述问题所使用的法律语言。



正如谈话分析运动中的领军人物谢格洛夫所言 (Schegloff, 1992a), 相对于主流社会学家的结构性关怀, 诸如此类的谈话并非边角零碎。在社会学对于科层制、经济阶级、社会地位之类东西的结构性关怀的核心, 那些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 正是在这些日常场景下进行的谈话形式中实现的。谢格洛夫并不否认这些社会场景中他称为“直觉知识”的东西。绝大多数人都知道, 教师比学生更有权力, 医生在约见病人时仰仗自己的地位, 如此等等。但不管怎么说, 谈话分析的目标就在于从谈话内部着手考察这些结构性质。人们确立他们的地位、行使他们的权力的那些方式, 要比前述诸例具有更微妙的形式。谈话分析就像整体上的常人方法学一样, 提出要关于制度结构的经验考察推进到互动的基础本身。

3.5 吉登斯

吉登斯 1976 年开始着手创立他以对实践的考察为基础的结构化 (structuration) 理论, 在此之前, 他就通晓常人方法学的研究。但不管怎么说, 常人方法学家是将社会实践推向社会秩序的根基, 而吉登斯则是力求将一种更为宽泛的实践观念, 融入有关整体上社会生活基本性质的综合, 这种综合更见其包容性和理论性。

吉登斯常常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 (Giddens, 1979, 1984) 框定为超越两种概念上的二元论或二元区分的手段: 一种是将有意识的主体与社会集合体分离开来的区分 (通常称之为主体/客体之二元论), 另一种是将行动 (agency, 即实践) 与社会生活的集体形式分离开来的区分 (通常称之为结构/行动之二元论)。尽管在每一对区分当中, 集合体都似乎作为次要的方面出现, 但是这些二元论并不尽相同。其间的区别简言之即是: 主体/客体之二元论预设了一个有意识的行动者 (agent) 作为行动的“中心” (locus), 而结构/能动作用之二元论则预设了具体实施的行为形式作为行动的“中心”。

在结构化理论的不同阶段, 吉登斯的确处理了这两方面的问题。然而, 尽管他对实际存在中的行动者的关注近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增强 (尤其参见 Giddens, 1991), 但他最初创立结构化理论的立意, 却是作为一种手段来调和实践与集体性社会生活的持存特性。结构化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常识命题, 即社会生活中发生或存在的任何事情, 都是通过具体实施的行为形式产生的。因此, 与杜威、米德或加芬克尔不同的是, 吉登斯并不仅仅将实践看作定位在局部情境中的行为。虽说所有的实践可能都定位在局部的情境之中, 但也都有助于系统性关系和结构性模式的生产与再生产。我在下文将详细阐释作为集体性概念的系统与结构。但是大体而言, 我将只限于探讨与实践理论直接相关的一些话题。(有关吉登斯对社

会生活各集体维度的分析,参见 Cohen, 1989, 1990;有关吉登斯思想的整体简介,参见 Cohen, 1998)。

吉登斯有关行为之具体实施的最初洞见主要源于加芬克尔所提出的实践理论,在较小程度上也来自戈夫曼和温奇所提出的实践理论。这并不等于说吉登斯只是引入了业已成型的社会实践或认知秩序的观念。比如说,与加芬克尔或戈夫曼不同的是,有关形塑(促动与约束)社会互动的那些物质条件,吉登斯也提出了一些深刻见解(Giddens, 1984: 110—119)。在这些有关物质条件的见解当中,有许多源自新兴的时间地理学领域(有关吉登斯与时间地理学的关系,参见 Pred, 1990)。具体而言,吉登斯效仿时间地理学家,也注意到,人类身体的各种感觉能力只能允许数量有限的一些行动者在同一时间里参与互动。他还赞同时间地理学家(以及戈夫曼和福柯)的另一项看法,也认为行为的物质场所形塑了行动者可以实施的实践种类,比如说,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由于人声喧哗,推来搡去,就很难进行一种面对面的互动。

吉登斯的思想来源倒不曾扩展到杜威头上,对后者他似乎全然不熟。尽管如此,我认为,在几点要害之处,杜威也应该被视为吉登斯最重要的前辈之一。在不言自明地重复的实践或习惯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方面,他们俩的共同之处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是,杜威纵然非常留意将实用主义的理性和创造性与自觉意识整合在一起,但在社会再生产这个问题上,却从未多费笔墨。不仅如此,他的实践理论也缺乏吉登斯这般更为宏大的社会学抱负。但不管怎么说,杜威认为习惯必然会给行为带来效率,这样一种理解也表明,他从直觉上认为,只有当行动者将自己的行为视作想当然的东西,社会实践才能被再生产出来。这正是吉登斯关于实践之再生产的描述的出发点。

尽管如此,吉登斯与杜威在这方面也有一点重大的差异。吉登斯与杜威不同的是,他清楚地指出,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实施的实践,即他称之为制度或例行常规的东西,是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因为它们再生产出了为人熟知的一些社会生活形式。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妨碍吉登斯在例行常规之扰乱对于社会变迁的重要性方面,与杜威走到了一起。例行常规方面的崩溃,其中有些被吉登斯(Giddens, 1991)称之为决定性时刻(fateful moments),是需要付出反思与想像以便做出应对和变更的,这一点对于吉登斯与对于杜威,其实似乎同样至关重要。

吉登斯的新颖之处与其说在于他有关实践的局部生产的观念,不如说更多地在于将实践与社会系统和结构性模式整合在一起。在吉登斯看来,这些术语表示着集合体在分析上各具特色的一些属性。出于种种的原因,评论者往往忽视了实践与系统之间的关联。有鉴于此,我首先来谈谈系统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



■ 探讨一番结构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在结构化理论里,“系统”这个术语指的是各种聚合类型中的关系模式,从私密性的小群体到社会网络,再到大型的组织。但并不曾有任何假定说,系统性的模式就一定会达到类似于生物有机体所展现的那样一种闭合。系统再生产的进行,一般是通过再生产出来的关系的持存循环来完成的,在这样的循环里,反复再现的实践充当着纽带与关节。在这里,吉登斯做出了他最重要的区分之一,尽管也是常常为人所忽视的一种区分,使他得以一方面承认局部秩序的深度生产,另一方面也同时提供了概念手段,以把握较为松散的关系的生产,这些关系充当着大规模系统的关联纽带。这里的区分(Giddens, 1984: 28—29)涉及到两个术语: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社会整合指的是面对面互动当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秩序(关于互动秩序,参见Goffman, 1983)。从现代核心家庭到贵族宫廷,再到农庄村社,有许多社会系统所包含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社会整合再生产出来的。尽管如此,像戈夫曼与加芬克尔这样的理论家,只把注意力集中于关注性互动(focused interaction)中种种微妙而富于技能的策略,却忽视了事实上行动者也可以通过一些更为间接的方式,与那些由物理距离和(或)时间间隔所分开的人发生关联。吉登斯(Giddens, 1984: 第三章)提出了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概念,用来分析处在广泛时空范围内的行动者之间种种关系的复杂变异。沟通与转送的媒介(比如电报服务与电话)一般都会减少互动的强度,尽管如此,它们也使社会关系得以远远超出局部的情境。自从电子通讯与机械交通出现以来,在“不在场”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之中,现代系统已经在实质上环绕了整个地球。当然,系统也包含着局部的、面对面的互动。但是,吉登斯的系统再生产概念指的是远距关系的生产,因此也开创性地将一种关于现代大规模组织之形态学的清晰图景带入了实践理论。我将在下一节指出,今日的吉登斯在这一点上已不再是孤身前行了。实际上,吉登斯只是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行动与实践的理论当中蔚为大观的种种发展。

如果说社会系统指的是群体(也可参看关于社会关系理论的下一节),那么“结构”这个术语可能就显得多余了。可事实上,是结构为关于具体实施的行为的描述添入了一种必不可少的集体性要素。试以一种例行性的实践为例,比如说,平凡如在一处繁忙的十字路口指挥着车来人往的一位警察。警察向司机发出的手势迅捷、果断,也完全属于例行常规。一遍又一遍,不断重复的手势将前行的许可从一条车流转向另一条车流。单单通过观察工作中的警察,就能够充分地把握这些实践吗?不能。在此之前,这位警察想必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技能,可以安全地指挥司机,而不会威胁到他们的幸福乃至他自己的幸福。不仅如此,这些技

能并非我们的交警的发明创造。自从有了交通控制,所有合格的交警就已经习得了实施(也就是再生产)类似做法的有关技能。

吉登斯的结构观念包括从分析上将这些做法分解成四个要素(每一个已有既定结构的实践都融合了所有四项要素):(1)程序性规则(实践是如何实施的);(2)有关如何实施算作适当的道德规则;(3)物质资源(配置性资源);以及(4)权威资源。吉登斯关于结构性模式的分析提供了把握各种集合体的实质属性的手段,但是,考虑到眼下的话题,我先将这一话题搁置一边。这里的关键在于,已有既定结构的实践提供了分析社会再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单位。绝大多数情境下都充满了复杂的情况,但先来考察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所讨论的已有既定结构的实践是为商品或服务而发生的通货交换。实践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结构性特征,比如通货所代表的物质资源,支持通货的国家所拥有的行政管理资源,道德规则(在以货币换取商品方面,一般会有一种受到广泛尊重的行为规则),当然还包括对于实施交换所需要的有关技能的知识。行动者很少注意到实践的这些结构性要素。(用加芬克尔的话来说,人们对它们“视若无睹”。)如果结构性要素陷入受置疑的境地,比如说,如果通货的物质价值受到怀疑,如果资金交易的道德规矩受到破坏,或者如果有一个行动者(比如说早老性痴呆症患者)缺乏完成交换的有关技能,那么,实践就将失败。

在吉登斯看来,已有既定结构的实践是首要的分析单位。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假定存在已有既定结构的实践,却忘记了它们是如何再生产出来的,忽视了它们也有可能发生改变,这样的思路也会带来危险。而我们却常常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探讨制度化实践;比如说,我们抽象地谈经济交换、担负一项工作或结婚,却不曾提及这些制度的再生产所经由的那些实际发生的实践。吉登斯(Giddens, 1979:5)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概念在理论上始终保持对结构与实践的内在联系的关注。结构二重性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再生产出一种有既定结构的实践,行动者必须借取此前已经获得的知识与资源。但是,正如行动者需要了解有关知识,知道为了再生产出一项实践而该如何去实施此项实践,当他们实施此项实践的时候,也就再生产出了这种知识,将这种知识推进到时间上的一个新的环节,并进一步增强了关于的确存在这种实践(及其资源配备)的自觉意识。比如说,在进行一笔现金交易的时候,也就再生产出了与现金交易有关的资源能力、道德规则及程序技能。任何一个给定个案里的实例似乎都是十分琐碎的。但是如果行动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止了现金交易的再生产,比如现金彻底被电子信用手段所取代时出现的情况,那么在处理货币时所涉及的规矩、资源和技能就会从日常生活当中消失。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实践体系转换(praxiological

shift)也可能产生极其深刻的后果。例如,信用交易比起使用无法鉴别身份的通货来,可允许的匿名性程度要小得多。

吉登斯在探讨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的时候,也有能力从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实践当中,抽取出多种有关社会关系的深刻见解来。他对于上级与下属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敏锐,将其理解为一种控制的辩证关系(Giddens, 1979: 93)。这种观念承认,上级可以借助自己对较为优越的资源的获取机会,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但它也进一步注意到,与此同时,在上级面前,几乎所有的下属都至少留有少量的制衡能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凭借的是下属所控制的那些为上级所需的资源。即便控制的辩证关系极端地失衡,但只要上级还依赖于下属在无须胁迫的情况下遵从基本秩序,下属就还可以保有某些微小的特许。(如果上级毫无理由维持下属的生命,比如种族灭绝,控制的辩证关系就会崩溃。)这个概念中有一点弥足珍贵,它拓展了权力关系的有关分析,使之不局限于今日地位显赫的一些社会理论中表现出的关于支配与压迫的简单形象。^[11]

吉登斯或许是将实践作为其分析的核心单位,但我前文业已指出,他也融入了一种关于行动着的主体的理论,其中就有关于社会变迁之肇始的深刻见解。要把握这种理论,有一种方式尽管处理得有些简单化,但却比较有效,那就是从以下两个问题入手来考察这种理论:为什么行动者会坚持参与例行常规的再生产?为什么他们会参与变迁的生产?这不禁让我们回想到,杜威也以这些问题为其核心的关注。实际上,杜威笔下稳定习惯的形象以及其后的心理波动和创造新的例行常规的努力,大体上与吉登斯所展示的形象相类似。但是,这两位之间的差异也不应忽视。

吉登斯关于行动着的主体的理论(Giddens, 1984:第二章;1991:第二章)设定了三种层面的主体性。话语意识(discursive consciousness)是主观论行动理论家(比如韦伯与帕森斯)主要关注的层面,也就是推理与存在性意义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指的是对例行行为形式的不言而喻的意识。它符合杜威的理解,即行动者以一种想当然的方式,体验着他们对于习惯性实践的参与。在这些层面之下,吉登斯还设定了一种无意识层面的主体性。这个层面是结构化理论的独到之处,它提出的论点与杜威有关习惯与变迁的想法有一处关键的不同,并由此表明了行动者再生产或改变实践的原因。根据吉登斯的看法,从婴儿早期开始,行动者就已经有了某种原初的、无意识的需要,渴求一种熟悉感,渴求对自身所处社会世界中的那些稳定性质有一种切实的把握。吉登斯称这种复杂的感情为“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归根结底是由成年人通过参与例行常规之再生产而得到保障的。社会再生产进一步增强了行动者对于

自身具有资格能力的感觉,确保他或她对自己世界中的认知秩序保持信任。吉登斯就此与杜威分道扬镳,后者认为行动者之所以抱守习惯,是因为习惯在他们的行为与其环境之间产生出稳定的调和。而对于吉登斯来说,行动者之所以会再生产例行实践,就是因为替代的选择就是激发焦虑的失范状态(Giddens, 1991: 36—37)。

与杜威颇为相似的是,吉登斯关于行动着的主体的理论同样意味着,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其行为的意义,并不时时刻刻必然投入实质性的反思。相反,积极主动的反思与推理,即吉登斯所称的“话语意识”,只是在例行常规中出现关键性断裂时才会被调动起来,有一些是可以预期的(比如西方社会中的毕业与退休),有一些则会在毫无警兆的情况下突然袭来(比如失业与重病)。不管是什么情况,当例行常规出现具有关键意义的中止时,行动者就会调动起自己的精力,集中自己的思维对问题作出能够减轻自身焦虑的回应,并最终促成社会变迁。

吉登斯对已有既定结构的系统有着广泛的认识,这使他能够在比杜威好得多的基础上注意到,在大规模、集体性的行为模式当中存在的种种张力与矛盾,有可能会破坏例行常规,激起导向社会变迁的反思与推理。不管怎么说,吉登斯并不像杜威那样坚信,解决该问题的必然之道就在于实现行动者与环境之间较之过去更好的调和。在此重申:对于吉登斯来讲,激起行动者变迁的,是对于日常例行常规的无意识需要,而不是追寻调和的冲动。除此之外(尽管业已超出了实践理论的视野),吉登斯还始终敏锐地捕捉着实践所带来的那些有可能破坏极其周密的筹划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而吉登斯将变迁的原由根植于激发焦虑的情境之中,也就使得他自己很容易招致这样的批评,说他缺乏一种社会实践中的规范性根基,以便容纳那些关于共同体团结、民主调和或其他什么规范性社会理想的见解。他的实践理论没有以任何实质性的观点,表明种种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中,何者可取抑或何者不可取。实践的道德意涵只在于行动者对它的理解,不增一分,不减一毫(关于他对有关规范性话题批评的回应,参看 Giddens, 1989: 288—293)。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对于吉登斯的实践理论,最为盛行的批评意见并不是说他未能为对社会理想的信念提供一些根基,反倒是说他未能充分地描述集体性的约束,也就是说未能充分地描述防止行动者满足自身需求的那些障碍。我在另一场合已经详细讨论了这种分歧(Cohen, 1989: 213—231),但限于篇幅,不能在此探讨。但不管怎样,应该指出的是,吉登斯将实践与一种对于本体性安全的基本需要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分歧双方的核心问题。简言之:行动者之所以会以想当然的方式抱守着许多例行常规,就是因为这些例行常规满足了行动者对于本体性安全的无意识需要,有鉴于此,再要去问这些行动者是在满足其他需要方面受到限制,



还是被阻止生活在一个更为可取的社会里,这样的问题就很难再提出来了,更不用说以哪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方式给出回答了。只有在行动者的本体性安全受到破坏的时候,约束与规范性理念对于行动者才会产生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吉登斯或许是提出了一种经验上可以验证的论点(虽说经验研究也同样有可能得出一些出人意料的结论)。但是,正如我在讨论帕森斯的时候已经指出的那样,社会理论家常常深深地认同一些伦理价值。吉登斯力图证明,只要行动者感到自己享有本体性安全,就始终不情愿为达到“好社会”而努力,但不管他为证明这一点会提出什么样的事实证据,也不会令某些人满意,这些人在分析行动的时候,就看到人的行为坚持着一些前景,以待一种更好的生活的到来。

3.6 社会关系中的实践与行动

1973年,格拉诺维特写了篇日后影响深远的文章“弱纽带的强度”,从经验的角度证明了,对于邻里政治运动、地方劳动市场以及其他一些往往盛行弱网络纽带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较强的社会关联会产生反效果的(也是反直觉的)后果。格拉诺维特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证明,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网络纽带是如何在社会行为中生产出来的,尽管这在他的研究中只是充当了配角。根据格拉诺维特的考察,那些通过持久的、负载情感的互动来维持的“强”纽带,能够为“架通”各个社会网络的关系提供的机会比“弱”纽带要少,而这些关系能够使种种资源与信息在不同群体之间传递。

格拉诺维特将有关社会行为的理论与有关社会关系的理论结合在了一起,然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演变成深深扎根于经典社会学的一些有关实践与行动的新视角,以及当代美国社会学中的一些新分支领域。格拉诺维特关于“弱纽带”的考察业已清楚地表明,社会关系的概念所包含的,不仅仅是那些戈夫曼(Goffman, 1973: 189—190, 第五章各处)所理解的偏爱与熟识之类的亲密关联,戈夫曼认为这些是“扎根于”符号性的姿态和共享的个人历史之中的。而网络、共同体以及各种复杂组织一般都融合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关系。但是,不管社会关系属于“扎根关系”还是“弱纽带”,它们始终是在各具特色的社会实践中维持下来的,并且得到了参与者以种种富于意义的方式作出的解释。

在过去的20年里,针对构成社会关系的种种意义与实践,理论家已经提出了问题,开辟了新的考察。但是,如果就这么说,或许是为这股思潮赋予了一种比它实际所具有的更多的连贯一致性。有关行动与实践的关系性描述不同于常人方法学或结构化理论,起步的时候并不曾有一位像加芬克尔或吉登斯这样的奠基性思

想家来制定某种思想基础。相反,有形形色色的理论家,在他们对于社会关系本身的首要兴趣的引导下,转向关于行动与实践的这些追问。带头的是网络分析学者,吸引他们的是对网络纽带如何“嵌入”文化意义与惯常行为形式的关注(参见 Granovetter, 1985)。柯林斯(Collins, 1981, 1988)则从一种大为不同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一种关系性的实践观念。他想要搞清楚,互动仪式是如何增进或减少了文化资本和情感自信。他的看法与戈夫曼(Goffman, 1967)一样,都认为关系性实践就是涂尔干式的团结或排斥的仪式,社会共同体、等级秩序以及其他各种群体,都是从这些基本形式当中塑造出来的。但是在柯林斯看来,这些仪式形成了“链”,情感能量与文化资本在这些链中跨越不同的社会网络,逐渐积累起来或衰减下去。

在20世纪90年代,理论家们已经融入了新的研究兴趣。蒂利在提出他雄心勃勃的社会不平等理论的时候(Tilly, 1998),发现有必要在理论中加上有关社会剧本(social script)的实质性描述,互动与局部性的即兴发挥就是以这些剧本为基础的。尽管蒂利回避去谈一种一般性的社会行为理论,但他认为关系性实践既依据剧本又有即兴发挥,这种观点使他能够将认同形塑与群体界限形塑这两个研究范畴,融入一种不平等理论,在根本上表现为稀缺资源的积累与利用。

这些形态各异的研究兴趣与规划,或许不会在不久的将来,汇聚到一种获得共识的关于实践与行动的关系理论上。尽管如此,在艾默贝耶新近的一些文章里(Emirbayer, 1997; Emirbayer and Mische, 1998),关系性视点却已经达到了一种新的理论成熟高度。艾默贝耶基于实用主义理论家的学说,包括杜威后期一些不甚知名的作品,^[12]以综合的方式,建构了一种“关系性语用学”(relational pragmatics)的本体论。关系性语用学将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都看作交易,即随时间推展而展开以形成社会关系的复杂协同活动(Emirbayer, 1997: 289页各处)。尽管这一构想将社会关系置于实践理论的观照之下,但在艾默贝耶及其合作者米舍的一篇相关作品里(Emirbayer and Mische, 1998),同样也拓展了社会关系的主观的、文化的意义。

简要地比较一下艾默贝耶的关系性语用学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助于阐明整体上的关系理论的一些独特之处。社会关系理论家们也同样具有结构化理论的关注,即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生活的集体性维度。艾默贝耶(Emirbayer and Mische, 1998: 971)与吉登斯乃至绝大多数其他关系理论家一样(比如 Tilly, 1998: 56—58; Collins, 1981: 991—992),也强调以下两方面之间的关联:一方面是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实施的例行常规;另一方面是“社会世界中的稳定性与秩序”的生成,它又有助于长期维持各种认同、互动与制度。因此,关系性语用学与结构化理论在一些观念上潜在地走到了一起,比如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观念

以及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之间的区分。

但是,艾默贝耶在体现出蒂利与许多网络分析学者的关注的同时,也和他们一样与吉登斯有某种根本的差异。吉登斯和所有行动与实践理论家一样,出发点都是以某种形式表现的以下问题:人的行为如何构成了社会生活?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实践或行动成为其他所有社会形式的根本源泉。而艾默贝耶的出发点却是一种不同的本体论立场。在他看来,社会生活是在社会关系逐步展开的序列中构成的。因此,在社会关系的考察当中,行动、实践、意义和目的都成了次要的话题。这一点引起许多争议。米德关于世界上所有物质力量、自然力量或人的能动作用之间互动的描述倒是支持了这种观点(参见前文关于杜威与米德的章节),但艾默贝耶丝毫没有声称,自己已经提供了一种关于关系性本体论的强有力的辩护。提出这种主张,似乎有可能激起那些相信社会生活中是行为先在于关系的理论家的对立主张。也可能哪一方都不会在社会学共同体中取得彻底的优势地位。不过,从这样一种争论当中,也常常会冒出一些极其新颖的社会学见解。

行文至此,我一直仅限于讨论相当晚近的几代关系理论家。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学者,特别是像艾默贝耶,也注意到关系性视角最初源于受有关主体性的新康德主义学说影响的社会理论,尤其源于齐美尔与舒茨的作品。那么,诸如艾默贝耶、格拉诺维特、蒂利和柯林斯之类的关系理论家,又是如何能够如此轻易地在对于实践的实用主义见解与对于主体性的新康德主义见解之间转换的呢?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借助了自己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出发点。由于他们将自己的见解的核心放在关系而非实践上,所以能够在实践与主观性行动维度之间来回转换,而无须改变自己的根本观点。因此,要说艾默贝耶声称自己的见解一方面来自杜威与米德基于实用主义立场做出的有关实践的说明,另一方面来自齐美尔与舒茨有关社会关系的文化意义和主观意义的观点,倒也没有任何不相一致的地方。

齐美尔比日后其他所有理论家都更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活当中混合着主观的互动内容与各种互动形式。齐美尔写道:“任何社会现象或过程都是由两种要素组成的,而这两种要素在现实当中是不可分离的:一方面,是某种利益、宗旨或动机;另一方面,则是个体之间互动的某种形式或类型,正是通过这种形式或类型,或者说在这种形式或类型当中,那种内容成其为社会现实。”(Simmel, 1908: 24)不过话说回来,出于社会学的考虑,齐美尔主张可以先将个体的心理过程搁置一旁(Simmel, 1908: 34)。这样,他就赋予了关系之于主体性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关注心理状况是如何通过种种关系形式而变为现实的。^[13]

尽管有许多关系理论家现在已经认识到,在自觉意识的经验视界内,始终暗含有不言自明的仪式性行动形式。但对于社会关系背景中现象学意义之形成的分析,

却依然是齐美尔时代以来社会理论中的一项重大主题。比如说戈夫曼,在其长期而杰出的学术生涯中,就始终反复强调社会关系的富于意义的性质。再往后,柯林斯与蒂利也以一些新颖的方式,将对于关系形式的关注与对于主观内容的关注融合在了一起,在精神上回应了齐美尔,尽管并不符合后者研究路向的细节。

但不管怎么说,要讲从一种新康德主义的视点出发来探究社会关系,最具理论深度的还是舒茨,而不是齐美尔。作为一名社会现象学家,舒茨更关注行动与互动的富于意义的性质,而不是社会关系。实际上,对于舒茨来说,所有的理论道路起点都是关于人类经验的社会性质的问题。尽管如此,舒茨还是和在他之前的其他现象学家不一样,拓展了有关人类经验的问题,使其不仅仅包括个体的思维。在他里程碑式的作品《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中,舒茨将一系列极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纳入了有关富于意义的经验的分析。

看一看舒茨如何将社会关系带入其描述,会有一些启发。当他批评并拓展了韦伯有关主观意义的个体主义观念,将经验与社会行动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纳入考察范围时,他的思路首先是跨越了主观的界限。^[14]他的下一步(Schutz, 1932:第四章)则向着一种关系性的视点大大迈进了一步。在此,舒茨首先就面对面互动进行了现象学解释,然后以螺旋发散的方式,考察了更为间接的关系,匿名的同时代人之间的松散互动,最终甚至分析到生活在现时代的行动者在历史上的那些先代。在这一次次的概念推进当中,舒茨从未放弃自己对于个体意义经验的关注。比如他(Schutz, 1932: 113—116)非常重视主体间性理解的问题,也就是说,行动者在互动过程当中,如何将与自己类似意识赋予他人。他(Schutz, 1932:第四章)还区分了关系的种种极端情况,从纯粹“我们关系”(we-relation)中同情交感的面对面经验,到某种“你们”(thou)关系的单纯存在,即两个行动者认识到的只是对方作为人的存在。他接着又将“我们”关系与“你们”关系和对于同时代人的知识区分开来,对于这些同时代人,行动者根本就不指望有任何面对面的互动,也就是说,是一种“他人”(other)关系或“他们”(they)关系。

有许多人依然认为舒茨的社会现象学是有关自觉经验行动的社会理论的典型。然而,电子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转型,包括通过电话、留声电话、电子邮件以及万维网上的聊天组等形式进行的人对人直接沟通,以及通过广播电视、录音录像、互联网站等形式实现的大众沟通,已经给晚近数代的社会理论家留下了这样的深刻认识:随着21世纪的到来,新的关系形式也正在涌现。从某些方面来看,舒茨对于这些新的发展提供了概念上的一种保障。^[15]不过话说回来,这些研究中有许多对于社会学实践观念的倚重,已经超出了舒茨对于主观意义的强调所能允许的程度。

吉登斯在写于 1984 年的《社会的构成》当中，第一次区分了两类关系：一类是通过面对面实践所生产出的关系，另一类是行动者跨越更大范围的时空距离而生产出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区分当中，吉登斯从实践研究的视点出发，认识到了中介关系（mediated relations）的重要意义。吉登斯相当重视通过电子媒介实现的点对点式互动，认为这种手段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关系的空间跨度，并且在同样重要的程度上几乎完全掩映了时间的维度。在此之后，卡尔霍恩的研究（Calhoun, 1992）补充并拓展了吉登斯关于现代性中电子沟通媒介对系统性社会关系之影响的理论考察（Giddens, 1989, 1991）。

而早在吉登斯之前 20 年，麦克卢汉（McLuhan, 1964）就已经大胆地推想了其他类型的电子传媒、大众沟通的种种效应，以及他称之为“地球村”的一系列新型独特关系的形成。但麦克卢汉的见解却在社会学圈子里多年无人问津。直到 1986 年，梅罗维茨才将麦克卢汉有关大众沟通的新颖效应的深刻见解，与戈夫曼从拟剧论角度区分社会互动的前台场所与后台场所融合在一起，最终将大众传媒带入了有关社会关系之具体实施的研究（Meyrowitz, 1986）。尽管梅罗维茨也像麦克卢汉一样，并不总是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他的基本见解却是非常重要的。大众传媒已经将大量的后台知识转换成了社会生活的前台行为，在这种转换之下，从互动中正式礼节的衰落，到社会行动者越来越乐于挑战社会传统与合法权威，一切都披上了全新的色彩。

电子传媒所引入的这些新的关系形式牵连甚广，错综复杂，要一一厘清，将在未来吸引大量关注。理论家们已经开始进行这项研究规划所要求的那种综合分析。而由于他们的出发点是关注关系而非行为，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就本着艾默贝耶与蒂利一般的自信，或者在此可以说像齐美尔与米德一般的自信，将互动的实践要素与意义要素融合在一起。比如说，近来，切鲁洛与鲁安（Cerulo and Ruane, 1998）着手进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关系分类体系研究，旨在将新兴的各种社会关系形式统统纳入考察范围。切鲁洛与鲁安在建构自己的范畴的时候，一方面特别关注社会关系当中互动的性质，另一方面特别关注富于意义的私密关系与社会位置（或角色）的范围与程度，从而诉诸了两大主题，这是从齐美尔经舒茨直至今日的格拉诺维特和艾默贝耶，有关社会关系的社会学中两项相伴而生的主题。

如上所述，注重关系的各种学说假定社会关系是社会世界的基本素材，从而绕开了有关行动与实践的一些根本问题。然而，尽管他们从形形色色的社会行为理论中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借取了种种深刻的见解，但是，这种灵活求变的能力也必须有所权衡。这是因为，针对行动与行为的一些问题，当代绝大多数研究社会关系的学者们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兴趣尚不够深入。如果研究社会关系的理论家们不比

他们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那么有些难题是不可能轻易解决的。在此我只想简单地探讨其中的两点难题。

首先一个难题源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关系的极其复杂多变。当网络分析学者首先集中关注社会关系时,他们常常是将这些关系本身简单地处理成“关节”之间的“关联”,从而将几乎所有的规范性、语义性内容都从自己考察的关系中化约掉了。在格拉诺维特与蒂利的引导下,这股思潮已经将更多的实质内容注入粗陋的“关联”与“关节”模式,但这种模式在今天的网络分析当中依然俯拾皆是(Mizruchi, 1994 提出了一种善意的批评)。不管怎么说,切鲁洛与鲁安的分类体系表明(Cerulo and Ruane, 1998: 405),关系理论家还只是刚刚开始考察社会生活中种种关联的复杂多变性。从齐美尔的经典研究开始,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关系理论家们,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如果关系理论家们想要富于技巧地处理好这一问题,就得更深入地钻研有关行动与实践本身的那些基本理论。

最初的这类努力中有一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米舍与怀特在此项考察中(Mische and White, 1998),从其中一个方面入手,处理了社会关系种种错综复杂之处,也就是说,在谈话与互动的序列当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文化关系与相互交叠的网络领域,而行动者又是如何在这些关系与领域之间成功地实现转换的。他们的考察将他们从网络分析带向了谈话分析与语言学,最终产生了一种关于程式化互动(stylized interactions,即“情境”)与信号(signal)的观念,行动者正是凭借这些东西,从一种网络领域转换到另一种网络领域。他们通过这种努力所做出的贡献,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实践与理解日常生活中彼此交叠的网络的构成,或许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关系理论家们需要面对的第二个难题,或许会引导他们将一系列大为不同的关注纳入考察范围。如果假定社会生活是由社会关系所组成的,那么也就忽视了,事实上,所有的社会行动者大量时间都是独自度过的,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与思维的流动之中。如今,任何对舒茨的现象学有所领会的人都会认识到,行动者可以运用自己的独处来反思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通过互动、电子传媒或看书读信之类让人全神贯注的活动,一个行动者的注意力会被引向他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种种的情境、剧本、偶然和即兴发挥。而不管怎么说,独处几乎始终是一种个人解释的机会,将一层个体的意义添加到这些东西上。出人意料的是,从一种关系性的视点来强调实践与行为,倒是可以引导我们理解到:在社交与独处之间,或者换句话说,在对种种关系纽带的关注与对自身精神生活的关注之间,社会行为有节律地来回交替着。至于社交与独处之间的这些节律纯属现代之产物,还是属于人类的普遍状况,尚且有待观察。(当然,社会生活在社交与独处之间来回交替,似乎是从农

民文化到现代通勤文化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现代通勤文化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经由在自己汽车里的孤独之旅,在家与工作场所之间往返穿梭。)

3.7 结语

如果行动缺乏连贯一致的意义,实践缺乏稳定的形式,社会学就会失去它思想上的意义。在本章所探讨的众多理论与理论家的努力下,社会学对于社会行为性质的把握,要比19世纪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家们完善得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进步。但是,蒙田提请我们注意,我们永远不可能指望充分地把握行动。无论我们考察了什么样的模式,其他模式都会证明是难以捉摸的。正如我在一开始所说的那样,社会行为就像诗,包括了许多的韵律、意义与形式,但却没有任何归并性的原则。因此,在结束之时,有必要就行动和实践中对当前理论所回避或忽视的一些方面作一番考察。

首先,社会理论在衍化出行动理论与实践理论之后,如今是缺乏任何可以将这两种社会行为的根本维度融合起来的手段。比如说,韦伯和加芬克尔都承认,他们各自对于行为的见解都未能说明某些东西。在一段很少有人引用的话里,韦伯指出,“在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当中,实际行动在进行时,对于其主观意义是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或者其实就属于无意识”(Weber, 1921: 21)。与此相反,加芬克尔在与萨克斯合写的一篇论文里(Garfinkel and Sacks, 1970: 345)提出,常人方法学家们为了追求他们自身的研究兴趣,会克制对日常活动的价值与重要性作任何判断。每一位理论家都会准备将行为当中其他理论家提议要研究的那些方面弃置一旁。韦伯之所以集中考察了行动的主观意义,就是因为他将社会科学看成是一种理解各种现象与事件之文化意涵的手段。而加芬克尔之所以将行动的价值与重要性置括,则是因为他想要知道行动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种研究兴趣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实施的实践,而这正属于被韦伯弃置一旁的“行动中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方面”。

韦伯与加芬克尔都将自己的研究兴趣推向了极致。其他理论家则在强调主观意义或行为的生产的时候,并不曾完全忽略行为中不被强调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杜威、米德和吉登斯,都是在强调想当然接受的习惯和不言自明的例行常规的理论背景下,从理论上阐述了行动在哪些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对行动者具有意义。戈夫曼(Goffman, 1967)关于“面子工夫”(face-work)的分析就展示了一种弥合鸿沟的坚实途径。戈夫曼对于社会面孔(social face)很感兴趣,这就将他的分析维系在一种对于绝大多数现代行动者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与价值的现象上。不管怎

么说,戈夫曼的考察最终揭示了多种多样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实施着的仪式,是这些仪式捍卫、保护并维持着社会面孔。

但是,即便我们能够简单地融合当前种种关于行为意义与实施的理论,在本章所涵括的所有关于行动与实践的理论里,至少也有两处无疑十分重大的盲点:一是情感,二是权力。

人人都知道,所有的社会行为都负载着情感。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情感在行为中蕴含的方式,如何理解行为激起我们感情的方式。尽管在少数研究里也表露出情感的一些线索与迹象,但绝大多数关于行动与实践的理论都透露出这样的意思,即行为基本上是一种认知性的努力。

要在“情感工夫”(emotion work)或情感意义的基础上创立一种协调一致的行为理论,这样的任务或许是当代行动理论家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自从霍克希尔德独辟蹊径,将戈夫曼与米德的思想拓展到对情感工夫的研究领域(Hochschild, 1979),已经过去了20年。但在许多方面来看,她的作品在宽泛的理论角度上依然居于领先地位。其他的研究尽管自有其十分重要的地方,却在向纵深追求有说服力的主题的同时,牺牲了理论的广度。埃利亚斯对西欧中世纪时期情感与行为方面控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研究(Elias, 1939),而舍夫也在理论上分析了羞耻、骄傲与互动之间的种种关联(Scheff, 1990),两者都适用于上述判断。

韦伯的权力与支配概念,吉登斯有关控制的辩证关系的说法,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帕森斯关于中介性、工具性行动取向的描述,都表明了具有政治取向的行为理论的一些可能性。尽管如此,只有再探讨一些基本的论题,才能探索出有关行为中权力之运用的成熟理论(参见Crespi, 1989)。挑战之一将在于,把韦伯作品里可以捕捉到的对尼采权力意志的回应,进一步用来描述受动机激发的行动。这种意义上的行动可以阐释为行动者主动进取以求在世界上留下他或她自己的印记,而互动也可以阐释为各种意志之间的竞争。戈夫曼(Goffman, 1967: 239—258)以含蓄的尼采式立场,描述了“性格竞争”,有效地刻画了这一点。另一种挑战是理解对资源的操纵影响互动的性质与后果的种种方式。布迪厄有关文化支配与符号暴力的描述尽管略有夸张,但仍可接受(参见本章注[11]),表现出一些新颖的思路,而关于互动与谈话中的支配和服从的一些研究也是如此(例如Goffman, 1967: 47—96; Tannen, 1990: 第七章)。

在集中探讨一般化概念的一章里,比较适当的做法是在最后提请人们注意:是经验研究的成果确定了这些概念的理论基础的价值。当前的一系列关于行动与实践的理论之所以能够继续下来,并不只是因为它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行为当中

我们视为重要的那些方面。它们之所以赢得我们的关注,是因为它们使我们得以理解各种社会领域当中实际进行着什么。关于行动与实践的种种观念之所以需要有一定的详细理解,是因为它们蕴含在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里的几乎每一项主题当中。但是,就像所有的类属性概念一样,它们始终都只是通向其他思想目的的必要手段。

致 谢

我感谢卡尔贝格就韦伯所提供的建议,感谢切鲁洛、艾默贝耶与米舍对社会关系一节的协助,感谢谢格洛夫就常人方法学新近的发展所提供的建议。还要感谢布赖恩·特纳,对于我延误时日方呈上此篇修订,他的耐心容忍已经超出了编辑的本分。

注 释

[1] 道 (Dawe, 1978) 对于经典行动理论中两种人性观的分析,出色地综合了许多从规范角度出发的重要主张。

[2] 例如:哲学家(以及研究集合体的理论家)一向要比研究行动的理论家更为关注自由意志与约束的问题。而当行动理论家也开始关注约束(如帕森斯、吉登斯),问题看起来就要比集合体理论家所说的复杂得多了。

[3] 西卡 (Sica, 1988) 以对韦伯的一种解释为例证来强调指出,有关社会行动的绝大多数现代理论都忽视了非理性范畴。

[4] 韦伯丰富的理念型表明,他极其细致地把握了行动与结构背景和秩序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参看 Kalberg, 1994)。

[5] 韦伯把关系界定为关于会有一个有意义的行为进程的“或然性”,从而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许多偶变性因素 (Weber, 1921: 26—27)。

[6] 韦伯和尼采都使用了不同形式的德语“Wille”这个词,用来表达某种坚定的决心。我感谢卡尔贝格确认了韦伯著作德文本中对这个词的使用。

[7] 应当指出,帕森斯论互动的著述(例如 Parsons, 1968)依然保留了许多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观点。但不管怎么说,以“互动的双重偶变性”(double contingency of interaction)为始的种种新颖见解,削减了单位行动链在其后期著作中的重要性。

[8] 帕森斯所谓的“唯意愿”行动理论究为何指,这或许是看起来最言之成理的一种理解方式,也就是说,行动者必定具有某种主动性。不过,这个词对于自由意志的强调意味,也比帕森斯实际所主张的要强一些。

[9] 根据帕森斯的理解,绝大多数行动者在他们的扩展行动链之中,都会去追求好几个不同的目的。在此,我遵循他的方法,从行动者所赞同的一系列复杂的——并且常常是不相一致的——价值与规范中,抽取出一一些单个的行动链。

[10] 晚近的作品(例如 Joas, 1980; Habermas, 1981; Shalin, 1988)已经重新发掘了米德和杜威的民主观念,在未来的岁月里,这必将成为规范理论里的一项首要主题。

[11] 布迪厄与吉登斯同样关注行动/结构的问题。然而,布迪厄没有采纳吉登斯的控制辩证关系的观念,而是似乎假定种种文化支配与压迫关系实质上是不可避免的,体现在符号暴力的实践当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很少具备有效的回应手段。尽管布迪厄就概念上的问题有过广泛的论述(例如 Bourdieu, 1980),可他从未用堪比于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发展他关于实践的观念时那样的方式,清楚地界说他的行动概念。但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布迪厄对于文化支配之效力的夸大处理,至少是基于两项未经承认的主题:一是假定所有人都有得到他人承认的欲望,类似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某些主张;和这一假定相伴随的,是认识到围绕承认的斗争无处不在,体现在每一种实践形式当中,意味着符号支配(或韦伯所说的地位支配)的一种潜在意志,类似于尼采的“权力意志”。在此我不能企望详细阐明这种读解,但它会使得布迪厄看起来更近于福柯而不是吉登斯,并意味着可以说明在布迪厄关于惯习与场域的核心概念中,为什么缺乏任何类似于吉登斯所谓控制辩证关系的東西。

[12] 写于杜威一生的晚期,大大晚于前文有关杜威之评述所依据的《人性与社会行为》。

[13] 在此无法深入探讨齐美尔更为广泛和基本的观念,他正是从这里得出了上文的深刻见解,即关于个体心理状况和社会关系在现实中的关联与在社会学中的分离。齐美尔将社会学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尽管没有清晰地阐述,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弗里斯比为此做出了卓越的归纳努力(Frisby, 1981:第二章各处),但仍有大量的综合、解释工作有待进行。

[14] 在这个讨论中,舒茨提出了一套观念,启发了加芬克尔早期沿循常人方法学思路的某些思考(Schutz, 1932:第三章;参见 Heritage, 1984: 54—61)。

[15] 对于那些在社会现象学中坚持舒茨的立场的理论家来说,情况就尤其如此。

参考文献

- Alexander, J. C. 1983: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4: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Thought: Talcott Par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ntonio, R. J. 1989: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emancipatory theory: evolutionary versus pragmat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721—48.

- Austin, J. L. 1962 (1976):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urdieu, P. 1980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urger, T. 1976: *Max Weber's Theory of Concept Formation: History, Laws, and Ideal Typ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alhoun, C. 1992: The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ity: indirect social relationship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H. Haferkamp and N. Smels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5 — 236.
- Carnic, C. 1986: The matter of habi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039 — 1087.
- 1989: Structure after 50 years: the anatomy of a char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38 — 107.
- Cerulo, K. A. and Ruane, J. M. 1998: Coming together: new taxonomies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relations. *Sociological Inquiry*, 68, 398 — 425.
- Cohen, I. J. 1981: Max Weber on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m: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action edition. In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1989: *Structuration Theory: Anthony Gidde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Life*. London: Macmillan.
- 1990: Structuration theory and social order five issues in brief. In J. Clarke, C. Modgil and S. Modgil (eds.) *Anthony Giddens: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London: Falmer Press.
- 1998: Anthony Giddens. In R. Stones (ed.) *Key Sociological Thinkers*. Basingstoke: Macmillan, 279 — 290.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R.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984 — 1014.
- 1988: Toward a neo-Meadian sociology of mind. *Symbolic Interaction*, 12, 1 — 32.
- Coulter, J. 1989: *Mind in Acti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 Crespi, F. 1989 (1992): *Social Action and Power*. London: Blackwell.
- Dawe, A. 1978: Theories of social action. In T. Bottomore and R. Nisbet (eds.)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 Dewey, J. 1922: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New York: Henry Holt.
- 1925: *Experience and Nature*. Chicago: Open Court Press.
- 1934: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 Minton Balch.
- Drew, P. and Heritage, J. (eds.) 1992: *Talk at Work: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6?00.
- Elias, N. 1939 (1978, 1982):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I: *The History of Manners*. Vol. II: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Trans. E. Jephcott. New York: Pantheon.
- 1987 (1991):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Ed. M. Schroter; trans. E. Jephcott. Oxford: Blackwell.
- Emirbayer, M. 1997: Manifesto of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281 — 317.
- and Mische, A. 1998: What is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962 — 1023.
- Frisby, D. 1981: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A Reassessment of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Heinemann.
- Garfinkel, H. 1963: 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 “trust” as a condition of stable concerted actions. In O. J. Harvey (ed.) *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88: Evidence for locally produced, naturally accountable phenomena of order, logic, reason, meaning, method, etc. in and as of the essential quiddity of immortal ordinary society (I of IV): an announcement of studies. *Sociological Theory*, 6, 103 — 109.
- 1996: Ethnomethodology's program. *Social Psychological Quarterly*, 59, 5 — 21.
- and Sacks, H. 1970: On formal structures of practical actions. In J. C. McKinney and E. A. Tiryakian (eds.) *Theore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 Lynch, M., and Livingston, E. 1981: The work of a discovering science construed with materials from the optically discovered pulsar.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

- ences, 11, 131 — 158.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89: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D. Held and J. Thompson (eds.)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f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Anchor Books.
- 1973: *Relations in Public*.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 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 — 17.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2 — 1380.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 — 510.
- Habermas, J. 1981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Heritage, J.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Oxford: Blackwell.
- Hilbert, R. A. 1992: *The Classical Roots of Ethnomethodology: Durkheim, Weber, and Garfinkel*.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Hochschild, A. R. 1979: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551 — 575.
- Joas, H. 1980 (1985): *G. H. Mead: A Contemporary Reexamination of His Though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2 (1996): *The Creativity of Action*. Trans. J. Gaines and P. Ke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3: *Pragmatism and Soci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8: The autonomy of the self: the Meadian heritage and its post-modern challen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 7 — 18.
- Kalberg, S. 1981: Max Weber's types of rationality: cornerstones for the analysis of

- r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in hist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1145 — 1179.
- 1994: *Max Weber's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vine, D. 1981: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Weber and beyond. *Sociological Inquiry*, 51, 5 — 25.
- Lynch, M. 1993: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Ethnomethodology and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D. 1989: Emotions are social things: an essay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 In D. Franks and D. McCarthy (eds)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Original Essays and Research Paper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Ed. C. W. Morr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38: *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 Ed. C. W. Morr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yrowitz, J. 1986: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sche, A. and White, H. 1998: Between conversation and situation: public switching dynamics across network domains. *Social Research*, 65, 695 — 724.
- Mizruchi, M.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recent achievement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Acta Sociologica*, 37, 329 — 343.
- Montaigne, M. 1588 (1958): Of the inconsistency of our actions. In *The Complete Essays of Montaigne*. Trans. D. M. Fram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39 — 243.
- Ostrow, J. M. 1990: *Social Sensitivity: A Study of Habit and Experi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arsons, T. 1937 (1968):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1951: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68: Social interaction. In 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7. New York: 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
- Pollner, M. 1991: Left of ethnomethodolog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radical reflex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570 — 580.
- Pred, A. 1990: Context and bodies in flux: some comments on space and time in the writings of Anthony Giddens. In J. Clark, C. Modgil, and S. Modgil (eds.) *Anthony Giddens: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London: Falmer Press.
- Rawls, A. 1987: The interaction order sui generis. *Sociological Theory*, 5, 136 — 149.
- Sacks, H. 1964 — 1965 (1992): *Harvey Sacks: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Ed. G. Jefferson. Oxford: Blackwell.
- Schegloff, E., and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 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690 — 735.
- Scheff, T. J. 1990. *Microsociology: Discourse, Emo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egloff, E. 1992a: On talk and its institutional occasion. In P. Drew and J. Heritage (eds.) *Talk at Work: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6 — 100.
- 1992b: Repair after next turn: the last structurally provided defense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convers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1295 — 1345.
- Schutz, A. 1932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Trans. G. Walsh and E. Lehnert.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halin, D. N. 1986: Pragmatism and social interaction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91, 9 — 29.
- 1988: G. H. Mead, socialism, and the progressive agend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913 — 951.
- Sica, A. 1988: *Weber, Irrationality, and the Social 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mmel, G. 1908 (1971): The Problem of Sociology. In D. Levine (ed.)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3 — 35.
- Simon, H. A. 1983: *Reason in Human Affai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nnen, D. 1990.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New York: Morrow.

- Tilly, C. 1998: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cquant, L. J. D. 1992: Toward a social praxeology: the structure and logic of Bourdieu's sociology. In P. Bourdieu and L. J. D. Wacquant (eds.)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ber, M. 1904 (1949):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E. A. Shils and H. A. Finch (trans. and ed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20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s.
- 1921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 G. Roth and C.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 Wiley, N 1994: *The Semiotic Sel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rong, D. 1963: Human natur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Social Research*, 30, 300 — 318.

深入阅读文献

- Abell, P. 1991: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Alexander, J. C. 1988: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ernstein, R. J. 1971: *Praxis and Ac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ourdieu, P. and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ns, T. 1992: *Erving Goffman*. London: Routledge.
- Collins, R. 1990: Stratification, emotional energy, and the transient emotions. In T. D. Kemper (ed.)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ooley, C. H. 1902 (1964):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1981: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arre, R. 1984: *Personal Being: A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nneth, A. and Joas, H. 1980 (1988): *Social Action and Human Nature*. Trans. R. Me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ymes, D. 1974: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Manning, P. 1992: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chutz, A. 1962: *Collected Papers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Ed. M. Natans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Taylor, C. 1964: *The Explanation of Behaviou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5: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Philosophical Papers: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J. B. 1984: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eber, M. 1905? (1975): *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es*. Trans. G. Oak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07 (1977): *Critique of Stammler*. Trans. G. Oak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erlin, B. 1988 (1993): *Society, Action, and Space: An Alternative Human Geography*. Ed. T. Brennan and B. Werlin; trans. G. Walls. London: Routledge.
- Winch, P. 1958: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第④章 系统理论与功能主义



F. 莱赫纳

莱赫纳 (Frank J. Lechner) 是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他最初于荷兰蒂尔堡大学开始自己的社会学学习, 后来在匹兹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一系列的论文中用系统理论的观念分析原教旨主义, 包括他这一章引到的几本选集中的一些论文。他与人合编有《探寻基本原理》(Kluwer, 1995)。他关于宗教变迁的著述中晚近的一例有在《宗教的科学研究杂志》(*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97) 上发表的“荷兰存在世俗化趋势吗?”他还发表过几篇讨论帕森斯的论文, 最近的一篇刊于《公民身份研究》(*Citizenship Studies*, 1998), 题为“帕森斯论公民身份”。而他与 John Boli 合编的《全球化读本》(Blackwell, 1999), 则反映出他始终在关注全球化问题。

- 4.1 背景
- 4.2 帕森斯
- 4.3 帕森斯之后
- 4.4 卢曼
- 4.5 结语



在关于社会的研究里,系统理论和功能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深具影响。本章将首先从主题与历史的角度简单回顾一下背景,然后详细讨论两位最主要的倡导者的作品,反映他们对于社会分析中核心问题的回答,对于现代社会独特性质的洞见。最后,本章将就系统理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前景做一番简评。

4.1 背景

社会生活里确实存在一些模式,而社会科学家可以去把握它们。社会学当中的系统理论家和他们的学界同行共同持有这样的信念,但却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解释它。他们主张,社会生活中的模式并不只是碰巧遇到一起的人们所造成的偶然结果,并不只是我们碰巧捕捉到的那些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人们一旦以社会性的方式行事,就已经陷入了维持着一个独特整体的一些特定关系、制度与社会。社会秩序的确存在,而且形式多样。要想充分地看待这种秩序,就得把它说成是一个“系统”。系统理论家们主张,社会生活当中的绝大多数模式都反映着一种关系、组织或社会的结构。以社会性的方式行事,常常也就意味着维持某种诸如此类的结构;而社会行动当中的大多数规律性,也都必然涉及到维持一个系统。当然,也不是说生活里什么东西都是“系统性”的。但是,努力找出什么是“系统性”的,能够使观察者们捕捉到大部分对于共同生活来说意义重大的东西。

以上所述绝不等于说,系统理论家认为秩序必然是样好东西。他们会主张,创造出一种富有意义的整体,这样的一种认识是绝大多数社会追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若是没有某种有所领会的秩序感,生活又如何能够富有意义呢?不过,系统理论的要旨并不在于宣扬诸如此类的哲学滥调,而系统理论家们也并不认为秩序始终是地位牢固的。系统理论的拥护者并不将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来接受。他们感兴趣的是对于秩序的追问:秩序如何可能?那强大有力的模式安排,那共同生活中的统一体,究竟是如何兴起的,又是如何在一个始终富有挑战性的环境当中历经时间而持续下来的?不仅如此,在系统理论里,秩序并不排斥冲突。实际上,冲突之所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恰恰是作为某种时下关注的社会秩序中的张力。同样,关注于系统,也不一定就得对变迁视而不见。系统当中的变迁,系统本身的变迁,是绝大多数系统理论家眼里的核心问题。他们会主张,不管存在的是什么样的秩序,要是对此缺乏清晰的概念,那么甚至都搞不清楚正在变迁的东西可能是什么。当然,他们会坚称,在结构之中,冲突乃通往变迁之路。

在澄清了一些可能会有误解之后,我们可以来谈谈,社会科学中的系统理论家们实际已经做了些什么。首先,比较平常的是,他们提出了实质理论,揭示社

会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在下文里,我将给出两个突出的实例。但是对它的绝大多数践行者来讲,系统理论已经起到的作用并不限于练习如何建构形式理论。本章将会表明,系统理论的第二项贡献就是为解释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框架。有那么一种秩序是这个时代的社会所独有的,因此都说,万事万物也就是由此而维系在一起的。系统理论家是从系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世界的,并且往往会本着社会科学的传统来看各式各样的系统。这样就有了第三项贡献,就是他们一般会将自己的理论作为一种综合提出来,要解决未经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融合那些否则就不相一致的观点。换言之,系统理论常常宣称要在关于社会的分析当中创造秩序。

最后一点,系统理论家们还提供了某些特定类型的社会说明。不管是什么系统,只要想有某种程度的运作,都会面临某种自己必须解决的特定的“功能”问题。某些特定类型的部分或过程就必须到位。因此,系统理论家所探讨的说明上的问题,就必须涉及特定的行为、组织或价值观念是如何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的。这种意义上的功能说明有赖于先描述一个系统的组织机制。如果我们分析一个社会系统,就必须寻求以某种特定方式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构,寻求以某种规则形式相互关联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如果我们能够描述一个特定社会系统的组织机制,就会从中大体了解到它的各个部分或程序为何以如今这种方式运作。在许多系统理论家看来,功能说明其实就是一种描述,因为这等于是在说“此项要素就是这样与这个较大的整体求得适配的”。还有一种更强硬一些的系统功能主义则试图这样来说明这种适配:系统内部的各个部分或程序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何以说就是因为系统及其进化使然。在这个意义上,功能说明就在于揭示某样东西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被系统所“选择”的。这两种功能主张都与另一种更为常见的功能主义有所不同,后者并不一定得有什么系统的观念,也就是说,这种说明在为某种社会性的东西给出说法的时候,是着眼于这种东西对于别的一样东西的正面效应(“中产阶级家庭之所以在社会化过程中倡导自主性,就是因为它宜于孩子们今后进入专门职业”;“人们之所以通过‘约会’来求爱,就是在缺乏牢固的共同生活纽带的情况下,约会会有助于选择合适的伴侣”)。诸如此类“功能”说明的痕迹渗透着整个社会科学;本章中我将撇开这一点不谈,只关注系统理论家提出的那些功能主张。

而系统理论家也有许多类型。根据我所概括的标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有此资格,包括“世界体系”理论家。但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的社会学里,有两位学者作为系统理论家是极其出色的:一位是帕森斯(1902—1979),一位是卢曼(1927—1998)。本章将重点探讨他俩的作品。他们思想中的一些主题——尽管并非他们主要论点的特色——可以追溯到一些显要的前辈。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来

看,帕森斯与卢曼代表了一种根源于 19 世纪社会思想的传统。

而那股传统中一位关键的人物,就是英国学者斯宾塞(1820—1903)。斯宾塞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立志要找出能够说明这些领域的原则。在他看来,社会就是一个超有机体的实体,是一个独立于构成它的各个部分或个体的社会整体(Spencer, 1898)。社会与有机体一样,也包含着各个具有专门功能的部分,这些功能都有助于整体,并且相互依赖。作为一个类有机体的系统,社会将自身的各个部分整合成一个持存的、聚合的结构。与此同时,社会又不是有机体;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与其他部分有着直接的关联,符号在社会生活当中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再有就是社会的所有部分都自觉地追求着目标(参看 Turner, 1991: 38—39)。社会也会成长:随着规模的增加,各个部分之间的差异也会增加。在进化当中,新的整合形式与新的专门化过程相互适配,从而在复杂性之中产生出结合。在斯宾塞看来,这就代表着一种普遍的进步模式,支撑着其他表面上形形色色的进化模式。现代社会的形貌就是一种进化过程的结果。斯宾塞主张,现代社会已经从“军事”阶段过渡到了“工业”阶段。他宣称,在工业系统里,种种的关系是通过自愿合作而非强迫产生的。现代社会故此具有一套更完善、更整合的系统,但也更促进各项制度与个体的自由进取。在各项制度或个体之间的竞争当中,“最适者”得以生存下来,并走向一个新的进化水平。斯宾塞就此将系统理论与自由主义的哲学信念以及一种早期版本的物竞天择说融合在了一起。这样的简略概括虽说不能充分地反映斯宾塞思想的全貌,却也能够体现出一个要点:斯宾塞已经表达出日后界定系统理论传统的绝大部分主题。它们包括: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之间存在显著类似;凸显各项制度作为一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而履行着基本的功能;将进化视作分化加上整合;强调符号体系或文化之于社会系统运作的独特性;以及将现代社会看作成功求得适应的复杂系统,增进了它们各个组成部分的自由。

在社会学里,涂尔干(1858—1917)采纳了其中的一些主题,哪怕他在另一方面明确批评了斯宾塞。涂尔干将社会描绘成一种独特的现实,一个具有正常状态与病理状态的系统。社会学的任务不单是要揭示社会事实——即持久性、集体性的行为方式与思考方式——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因为,如果诸如此类的事实要持存下来,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有助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运作。所以,要说明社会事实,就必须揭示它们在确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所履行的功能。例如,涂尔干在他对劳动分工的分析中(Durkheim, 1984),不仅强调分工的起源在于人口密度的增加与竞争的加剧,而且强调分工的功能在于通过一种独特的团结来整合现代社会。

而在人类学里,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8)效仿涂尔干,也将社会作为一种自主存在的现实来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会维持一些对其生存来说至

关重要的条件。理论也必须是“功能性”的,因为它的目标就是找出那些对整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实际过程,但并不假定必须得有普遍必备项 (universal requisites)。因此,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必然是说明,特定的结构特性是如何有助于像团结这样最重要的基本条件的。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主张,在那些由家庭拥有绝大多数土地的社会里,世系系统通过负责裁断冲突来促进团结。马林诺夫斯基 (1884 — 1942) 则借鉴了斯宾塞的学说,提出存在层次各异、呈等级安排的各种系统,这些系统各自有一些独特的必备项。比如说,在“结构的”或社会的系统层次上,他就概括出了四种功能需要 (Malinowski , 1964): 经济组织 (提供生产与消费); 社会控制 (调控行为); 教育 (通过传承知识而贯彻社会化); 以及政治组织 (运用权威来推行秩序)。为了满足这些必备项,社会将种种活动组织到各项制度当中,而要分析这些制度本身,又可以着眼于一些核心的要素,比如它们的人员、规范和功能。

就本章的宗旨出发,这些评论只是有选择地强调了一些历经数代延续下来的主题。它们表明,这些作者已经共同创建了一种传统,一条连贯一致的思想脉络与考察路向。帕森斯则推进了这股传统。他将涂尔干树为一位举足轻重的前辈,并且在伦敦曾经短暂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尽管他很少直接提及斯宾塞,但他后期的作品却将斯宾塞的许多要旨重新引了进来。他还融合了许多学者的观念,比如其导师亨德森。亨德森是一位心理学家,他从生物学的视角出发,探索了社会系统与有机系统之间的类似之处,考察了各个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适配” (Barber , 1970)。

4.2 帕森斯

作为一位“颇有些守旧的新教徒”,帕森斯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先是进了阿默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 然后去德国求学一年,最后在哈佛大学度过了绝大部分职业生涯。在哈佛大学,他最初只是一名地位低微的经济学讲师。而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早期,他一直是世界社会学中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尽管他在当时美国的背景下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各项社会政策,但到了 60 年代,更为年轻的学者们却指责他是保守主义分子。即便当他的职业影响业已黯淡的时候,他也依然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在跨越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当中,帕森斯出版了长长的一串著作、论文与译著。从他去世以来,他的作品已经重新赢得了关注,并已经引起对其中的长处与问题的更宽广的评价。

帕森斯的整个作品体系涉猎广泛,代表了解决社会学中理论话题的最具穿透力的尝试之一。帕森斯曾经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论家”。当然,他提出了一

一种系统理论。但帕森斯并不曾主张系统化地从一些公理中推出一套连贯一致的形式理论。相反,他的思想是逐渐演化而来的,时常基于许多关注经验问题的文章的前导研究,这使他得以将自己理论的成长相比于普通法的成长 (Parsons, 1977a)。他并不曾撰写一部皇皇巨著,集其成熟思想之大成。尽管他坦诚想要为社会学发展一种“一般性”理论,堪与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相比,但归根结底,理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工具。理论是一种手段,用来理解他自身所处的社会,捍卫其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人类成就所具有的生命力。系统理论有助于他的事业,即对开放社会中进步与自由所抱持的自由主义信念。

是哪些问题激励着帕森斯?他最初与最后出版的作品给了我们一条线索。在早期关于德国学者韦伯与桑巴特的一些文章里,帕森斯 (Parsons, 1991) 重新建构了他们对资本主义之兴起的说明。实际上,帕森斯是以某种表述形式接过了曾经萦绕在韦伯脑海里的一个问题。帕森斯也同意,当代的资本主义就其使生活理性化的程度而言是崭新的;它体现出一种新型的经济,去除了传统的共同体约束。但这种经济体制的兴起以及经济事务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本身,都不能纯粹借助经济的东西来加以说明。“经济”的问题自始至终伴随着帕森斯。他在去世前不久,还撰文讨论了工业社会中一种新型经济的兴起是如何提出了意义的问题 (Parsons, 1979)。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们新的集体力量的?这种新的经济机制的成果是如何分割的?哪些类型的关系可以遏制似乎是自主性的经济发展力量?19世纪与20世纪的种种思想体系关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帕森斯自己多年发展出来的主张则是,经济已经发展成为更广泛的社会系统当中一个专门化的子系统。它现在得依赖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交换,并至少是间接地受到已经被专门化为规范约束的一般性价值标准的调控。简言之,现代社会为一种理性化的经济“开出一席之地”,并且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输入”,但也控制着这种经济,重新使其固着,以便维持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在实际当中的文化,至少就其主导潮流而言,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合法性,助其对抗那些反现代的抵抗,后者在根本上对工业资本主义本身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帕森斯式的系统理论有助于揭示现代经济如何可能存在,因此本身就对一种悠久的传统做出了贡献,即从理论上把握一种革命性的社会现象。

与此同时,经济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在经济变迁所引发的有关问题中已经有所表现。理性资本主义之兴起也伴随着一种新型的话语。西方知识分子开始这样来理解社会生活,认为其核心便是这样一些个体,他们能够塑造自己的生活规划,制定属于自己的目标,并选择能够有效达成那些目标的行动。实际上,一种与经济领域本身中行动者思维方式相契合的思维方式已经颇具影响。帕森斯接受了它的

许多前提:他相信个体切实存在,弥足珍贵,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也被赋予了选择的机会。即便不是要理解整体上的社会系统,而只是要理解现代社会,也需要为这种有选择、有行为、有理性的个体“开出一席之地”。但是,帕森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主导传统的种种前提(常常被称作功利主义前提)无法在不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下说明社会行动的结构,说明社会秩序的兴起。在一种将理性行动视作选择手段以达成特定目的的模式下,社会秩序只有靠这种模式之外的因素来提供,比如靠行动的环境去调节,或者假定个体天然地享有同样的利益。但诸如此类的举措最终必然以否定支撑这种模式的那些假设而告终(Parsons, 1937)。帕森斯寻求着一种解决方法,既可以维持传统的有效成分,又能够说明社会行动的秩序性。

而他的核心主张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即已提出,并始终处在不断深入完善之中。他指出,对于创造必备的结构来说,行动模式中的“规范要素”十分关键。在给定的共享规范标准之下,行动者会在其广泛的框架内选择目的(即手段),但也有充裕的弹性,以适合各自规划和所处情境的方式去解释标准。帕森斯认为,要想在社会生活当中成为理性的人,不可能只是意味着个体“各行其是”。它还涉及到受共享规范的指引,至少只要当他们的理性实践还属于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与制度的一部分。根据这一观点建立起来的理论,帕森斯称之为他的唯意愿主义行动理论。一开始,行动只是具有“系统性”的特征;而随着帕森斯思想的推进,他的理论转向了一种关于行动系统的理论。因此说,一种特定的、“经济性”的行动理论是有它的种种局限的,而系统理论就是克服这些局限的一条途径,不过也融合了一种由来已久的思想脉络的长处。由此观之,系统理论体现了韦伯与涂尔干之类学者早期工作的智慧,在帕森斯看来,他们已经在一种唯意愿主义的社会分析上走到了一起。

帕森斯对于自己行动理论的早期陈述比较简单:社会行动的结构——他的书即以之为题——是由“单位行动”的各个要素之间一种确定关系构成的,这些要素包括行动者、情境、手段、目的以及规范要素。单位行动具有其秩序,但并不具备社会秩序的所有维度。帕森斯的下一步是要问:诸如此类的单位行动是如何能够累加成一种充分发育的社会秩序的?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当中,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单位行动又是如何可以规则有序地协调在一起的?他的回答是:社会秩序是一些特定的社会系统的产物,这些社会系统为行动者提供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供行动者对情境作出回应;而这种提供本身又有赖于向个体行动者具体指明共享的价值模式,以适当的形式激发他们的动机,把他们调动起来。他将社会系统规定为“在一个至少具有物理上或环境上特性的情境中彼此互动的行动者所组成的多元复合体,这些行动者动机之激发来自于求得‘满足最大化’的趋向,而他们与其情境之

间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则由一个文化上已经具备一定结构并被共享的符号系统来作出规定并充当中介”(Parsons, 1951: 5—6)。

为了说明这样一种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帕森斯首先必须深入探讨行动者可以采纳的各种价值取向类型,就像他在有关系统“功能必备项”的论点中所做的一样。为了使它们的关系具有“系统性”,这些取向必须简单明了。因此,帕森斯提出,行动者在对一种情境或其他行动者采取某种态度时,面临着一些基本选择。比如说,他人之所以重要,是凭借他们的专门表现呢,还是靠着他们作为人而具有的扩散性质?对于他人的判断,是根据普遍的标准,还是根据某种关系的特殊性质?数量有限的几组“模式变量”提供了此类基本选择可以采取的导向。各项选择的不同组合则创造出不同的角色期待系列。比如说,工具性经济行动的指导标准就是普遍主义的,注重实际表现的。专门由此类期待所指引的互动,会具体化为整个社会系统当中的专门化子系统。社会系统就是通过分化来加以组织的。

但是,在任意一个系统里,特定的一套选择又是如何能够真正成为行动的指引的呢?价值取向不能只是简单地被创造或强加;要想发挥作为价值取向的功能,它们必须源于共享价值观念的宝库,这样的话,人们所扮演的特定角色才会被视为本质上具有合法性。共享价值或符号具体归入特定(角色)期待的过程,帕森斯称之为“制度化”。他指出,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就在于制度化了的规范文化。但是,结构是不能够行事的。社会秩序要求行动者的动机被激发起来,以规则的方式扮演角色,协调他们的行动。简言之,社会系统有赖于价值取向的内化,不仅必须与文化取得整合,而且必须与人格取得整合。它们每一个都是独立存在的一个行动系统。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作为个体的行动者会很妥帖地嵌入预先指定好的社会中合适的位置(social niche)。他主张,要维持一个系统的正常运转,就得打压可能出现的越轨。要想做到这一点,办法之一就是为哪怕可能破坏系统的问题提供规范结构;因此,因为社会有某种“功能利益”要最大限度地减轻疾病,所以患病也就被界定为既是一种角色,也是一种将患者整合进社会的方式。

帕森斯在许多探讨具体制度的论文里,尤其是关于医疗制度与家庭制度的论文里,展现了这种分析思路。当他在20世纪50年代谈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时提出(Parsons, 1955),它已经非常清晰地演变成整个社会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变得更为限定,因为其他的子系统业已接过了经济、教育和治疗的角色。这样会导致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角色分化的加剧。在更为传统的背景下,男人与女人原本还有许多共同的任务可做,而在战后的美国,职业角色已经落实为一种男人的禁脔了。这种角色将养家糊口的丈夫与工作场所从业者联系在一起,架通了经济领域与家庭领域。而女人的角色却在于育婴,从而

始终更适于应对家庭成员的表达性需要,越来越明显地集中于情感性的工作,现在这成了首要的家庭专门事务了。随着家庭在结构上越来越隔离,女性的角色期待也就越来越集中在独具“女性特质”的品性上。而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那些期待其实却提供不了多少指导。这些女性没有渠道进入工作世界,但单纯的家务劳动却不能充分发挥她们的才能。而帕森斯认为,这种情况下女性的重负是系统变迁未臻完善所导致的后果,这一点被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抓住了把柄。

帕森斯的理论在他出版《社会系统》一书后不久发生了重大变化,此书似乎是一部集大成之巨著。但是,在一些核心要点上他的立场没有改变。他为1968年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两篇文章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Parsons, 1977b, c)。他在文中提出,一个“互动系统”包括了彼此互动的一些单位,确定那些单位的取向结构的一套规则,一种有秩序的互动过程,以及一个供发生系统性交换用的环境。在互动当中,每一个行动者都既是积极行事的行动者,又是她自己以及他人的取向目标,从而引入了更大的复杂性。互动具有“双重偶变”(doubly contingent)的性质,意味着一个行动者的成就不仅依赖她自身对各种目标的成功处理,而且还取决于其他行动者的介入。互动可以有多种方式出岔子,比如理解错误、同途异路之类。那么,互动又是如何达成某种秩序和稳定的呢?不出所料,帕森斯认为,这就涉及到通过“规范秩序的共享基础”,也就是必然指引着行动的一种共同文化,来“整合”互动系统。而那种共同文化,则必须在角色承担者的人格当中取得内化;而这些角色承担者还必须将他们各式各样的角色期待整合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除了诸如此类的理论原则,帕森斯还坚持着他的系统信念:任何一个一般化的学科,都必须具有某种手段,可以分析各个部分和过程之间种种有规则的互赖关系,而这些互赖关系也同时维持着与周遭环境之间的规则关联。他与一般意义上的系统理论一样,都认为关键在于“关系的任何规则性,如果将它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整个相互依赖关系丛纳入考虑,就可以更充分地予以理解”(Parsons, 1977b: 177)。

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之后,这种有关行动系统的实际分析又为什么会发生改变呢?如果说行动是要形成一个系统,那么赋予行动以结构的那些东西就必须内在于那个系统。但是,直到1951年,帕森斯还仰赖着行动者的取向,仿佛个体能够简单地承载着结构。他对那些取向的描述也有些武断的地方:究竟有多少取向呢?又为什么只有这些呢?帕森斯的关键论点便是认为,是模式变量确定了行动者与情境之间的关系,将行动者的某种特定态度与其情境中对象的相关特性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中考察处在这样一种关系当中的结构,帕森斯就能以系统得多的方式来探讨模式变量。帕森斯以一些特定的方式将这些模式变量并置起来,

至于这些方式,我们在此无须细究。他就此发现,将行动者与情境联系起来的种种选择的特定组合,其实正描述了系统的不同功能维度或功能问题。他由此指出,存在四种功能:适应 (adaptation),即关注于以某种可持续的方式,将一个给定的系统与其环境联系在一起;达鹄 (goal-attainment),即引领系统资源达成共享目标;整合 (integration),即以规则的方式将行动单位彼此联系在一起;以及潜在的模式维持与张力调控,*即确保基本运作中的连续性(此即 AGIL 图式)。

这套四重图式有助于解答帕森斯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现代经济。新工具在手,帕森斯与斯梅尔塞 (Parsons and Smelser, 1956) 也就能够主张,社会系统往往会沿着一些功能的脉络愈益分化。经济只是其他子系统之中的一个而已,是集中关注“适应”问题的一系列社会行动。而经济还有赖于其他的子系统,每一个都在功能上有所分化,经济必须与它们交换(输入)要素和(输出)产品。例如,家户(被赋予维模功能)向(适应性的)工商企业提供劳动,换取工资,消费物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Parsons and Smelser, 1956: 208)。帕森斯主张,生产当中的各色要素,实际上都是通过经济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类似市场的作用过程来提供的。将经济视为多种社会系统类型中的一种,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理论至多不过是关于社会系统的一般性理论中的一个具体实例。与此同时,帕森斯有关社会系统的分析现在也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学味道:行动者之间或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成了交换的事务,而作为整体的系统结合得是否致密,也取决于此类交换的效率。

帕森斯的下一步使这种味道愈发浓重。如果子系统边界之间的交换对于社会系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它在实际当中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各个专门化了的单位是如何能够成功地联结起来的呢?上面提到的那种家户与企业之间的交换已经包含了答案。它们之间的交换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是闭合的,因为工人并不会从其企业中接受实际的产品,以作为自己服务的回报。她所得到的是货币工资,用这笔钱她可以与其他的企业进行交换。与此类似,帕森斯提出,其他专门化的交换也需要使用一般性媒介 (Parsons, 1977c)。如果我们把达鹄子系统叫做政治,那么它的特有媒介就是权力。维模子域 (subsector) 用价值认同作为自己的媒介,而整合部分的媒介则是影响。这就促使帕森斯和他的一些学生进一步去分析以下各方面之间的复杂关联:其他媒介的功能运作与货币的相似程度;它们的使用条件;它们升值或贬值的方式,等等。这种研究大体是要表明:一个沿循功能脉络而分化的社会系统,必须发展出专门化的媒介或语言,以促成子系统边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 原文为“latent pattern-maintenance and tension-management”,常常简称“pattern-maintenance”(维模),见下。——译者注

这四种功能性的、表面上看像市场一样的社会系统,实际是怎样维系在一起的呢?尽管帕森斯在这里试图超越经济理论,但由于对经济理论有所借鉴,所以交换本身就有可能成为维系社会系统的粘合剂。但是,仅仅是交换,又如何能够创造出持久存在的社会秩序呢?靠它自身是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帕森斯依然相信,制度化了的规范文化是创造社会结构的关键要素。那么,这种文化又是如何嵌入新的系统分析模式的呢?帕森斯将对实质问题的见解与其系统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把两方面都推向了更广泛的视角。他主张,社会系统就是行动系统,而行动系统就是生命系统。生命系统执行运作以维持某些特定的内部状态(比如,自平衡机制调节体温)。诸如此类的运作又类似于那些非生命体的“控制论”系统的运作,后者拥有制导(steering)能力,能够调整内部状态以适应环境变化,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状态。帕森斯认为,在此类系统里,某一层面上产生的信息会上向渗透到另一层面上,因此可以用来执行系统功能。所以,一个运转中的系统就必须得有某种内部控制能力。帕森斯就此假定,在行动系统里,这种能力表现为一种“控制的层级”(以及一种互为补充的“条件的层级”),“下向”流动,从L经I和G到A。而在社会系统里,L代表着制度化规范要素的传承;在帕森斯对于系统的一般观点里,这种要素起到了一种控制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适应领域所产生的资源也引出了新的可能性,而处在更高层面上的系统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组织这些新的可能性。根据帕森斯成熟时期的观点,正是控制能力处理新条件的方式,以及规则指引资源使用的方式,生发出了社会系统中的结构。

随着帕森斯将自己先前的见解转换成系统角度的表述,他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区分的四种功能。如果说行动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并且按照四项功能来运作,那么这四项功能就必须在所有生命系统中都有其对应功能。这些功能必须在某种方式上对生命体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确是如此,那么,由于以前是专门从模式变量的角度来推出四重图式的正当性的,所以已经不够充分了。不过帕森斯还是提出(Parsons, 1977d: 230页以下):“对于理解所有的生命系统来说,功能都是一个核心的概念。”生命系统维持着一种比其环境更稳定的组织模式,但也与那个环境关联在一起。它的功能运作必须有助于维持“其独特模式以对抗内部状态与环境状态之间的差异,对抗后者更大的变异性,……并维持系统自身的‘开放性’”。要做到这一点,任何系统都得有一部分运作集中于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其他一部分运作集中照管其内部结构。系统也要在长时间内运作,有些是要提供条件供未来使用以满足目标,另有些运作集中于实现系统目标本身。帕森斯就此提出了两条系统分化轴线:一条是内部的一外部的,一条是工具性的一完成性的(consummatory)。把它们合并起来,就产生了四种功能(适应就是工具性一外部

性的,如此等等)。如果行动是一个系统,我们就必须能够区分出四种功能来。但在帕森斯绝大多数的早期著作里,却只有三种: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当然还有社会系统。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他的系统分析,帕森斯加上了第四种,也就是行为有机体,或行为系统,集中于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产生出他所称的“一般行动系统”,社会系统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生命系统的关联对帕森斯的思想产生了另一种后果:回归进化学说。帕森斯曾经犹豫要不要从理论立场来考察变迁,因为他认为,首先需要确立关于变迁中系统的强有力的模式。20世纪60年代,他掌握了一种更让人满意的模式,能够去问社会系统是如何进化,即如何实现更高层面上的有组织的复杂性,从而增加适应能力和系统自主性的。实际上,这只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去问,像他自己所在的这样一个社会,如何能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富于生产力,却又不陷于瓦解。帕森斯大致的回答是:社会进化涉及到四种过程之间的协调(Parsons, 1971)。他主张,当在某一个制度或社会里,出现了一种基本问题或张力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功能分化,将此前组合在一起的多种角色拆开。分化后的单位必须有助于适应性升级(adaptive upgrading),也就是说,产生社会可以使用的新资源,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分化单凭自身之力不能导致一种新型秩序;还必须辅之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此前统一的各种角色或制度整合起来,这个过程帕森斯称作涵括(inclusion)。而就此形成的新型关系又会要求从新的规范准则角度上得以合法化,从而无碍于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里所做的工作;这个必需的过程就是价值一般化(value-generalization)。这种模式使帕森斯得以追溯美国社会在其进化道路上所迈出的脚步。他用自己的系统与进化概念提出,自己所处的社会事实上恰恰处在社会进化的边缘。它更为分化,也找到了新的整合机制;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加,也只从少数几个基本价值观念的角度就使其集体努力获得了合法化。

在此,我们开始看出,系统理论是如何同时成为一种解释性的框架的。帕森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少在探讨“理论”话题的同时,不诉诸自己社会里的具体发展。甚至在他以最抽象的方式探讨一般性理论的有关问题时(Parsons, 1977d),也散布着他对于西方“成就情结”(achievement complex)的评论。这种情结明显反映在美国人赋予“工具性行动主义”(instrumental activism)的价值之中,后者的典型体现就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公共学校教育。系统理论使帕森斯有能力建构关于自身所处社会的一种观点,一种现代性的典范。它都包含哪些内容?现代性,美国模式的现代性,历史独具特色,文化意义丰厚,组织切实有力,进步瑕不掩瑜。首先,美国社会是一种独具历史特色的社会系统。激起帕森斯兴趣的那些问题,即新型经济与新型经济话语的兴起,在他自己的社会里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美国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更大程度地推进了经济的分化,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密切地将个体主义的思想融入了自身的文化当中。因此,它不得不在实践中面临秩序问题。在帕森斯看来,事实上,它已经成功地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社会框架,将个体主义转变成建设性力量。不出意料,这项成就的关键就在于一种制度化过程:最初,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形塑了美国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个体的内在平等价值以及他们积极参与富有条理的生产性行为的义务,归根结底都是来自做基督徒的前提,只是都已经被一般化,融入世俗原则中了。美国的个体主义与理性成就的文化,特别有助于产生这样一个社会:它的成员们自由地结合在一起,追求种种机会,增进他们的物质前程。而由于在表面上美国依然是一个基督教社会(Parsons, 1978),所以在文化上也还饱含意义。它是有一些共同原则,但这些原则都具有适度的一般性,为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多元主义留出了充裕的空间。原则指引着行动,但却没有过分的约束。事实上,就美国人塑造彼此之间关系的方式而言,从早期的社会化到正规教育,到医疗实践乃至美国式的死亡方式,都普遍渗透着制度化了了的个体主义与工具性的行动主义。

这便导致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组织方式。这个社会所涵纳的角色和制度之广泛远胜于其他任何社会;而这些角色与制度之间的关联也变得远为复杂。但分化本身就是一种处理新问题的方式。不仅如此,它其实还有一种新的整合方式与之相配套。平等公民身份将成员们维系成一个社会共同体,使他们能够根据各自的才能与兴趣而广泛参与,放手让他们自由地追求各自的个人规划,而没有先赋性或权威性的约束。它还通过抵消不平等来整合社会,其本身则在行动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原则下获得了合法地位。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打造起一种新型的系统。它加强了对其环境的控制,扩大了它的成员资格,容纳了此前被排斥的那些群体。自由与平等相谐以进。因此,绝无必要走回头路,或是为反现代的替代选择所吸引。

帕森斯的乐观之见发自一位在现代世界中倍感自在且自信的自由主义者。但是,美国的进步也有它的局限:涵括并不彻底,可悲可叹;一般化价值始终不能充分实现;永不停息的分化创造着新的张力;而经济的力量本身也总是需要引起社会的警惕。比如说,帕森斯在20世纪50年代分析了妇女的角色,而在平等介入所有制度这个意义上,妇女尚未获得充分的成员资格;人们不期望她们像男人一样成为积极主动的个体;家庭的分化对她们有着特定的影响;而当她们被拖入劳动力市场时,却又面临新的困境,因为在她们的生活当中,经济的利益有了新的意义。但是按照这些标尺来衡量,女性主义的革命进一步贬低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武断的先赋约束的作用,从而在新的水平上实现了分化与涵括;它使所有的价值观念平等适用于男女两性,动员女性介入经济,将她们转变成家庭领域之外的“生产性”社会



成员。而在帕森斯看来,系统内部发生诸如此类的变迁,正好证明了系统有能力自我修正。他认为,美国社会已经令人赞叹地应对了它所遭到的功能上的挑战。

4.3 帕森斯之后

帕森斯为自己制定了一项相当庞大的研究规划,而学者们的问题就是他是否实现了他自己的抱负,过去如此,现在也依然如此。我简单地描述一些他们提起过的问题,但不是要不厌其烦地开列失误,而是要传达他那种系统理论所产生的社会学研究规划上的条条目,指明任何一位系统理论家都会面临的那些抉择。有些问题已经生成了新的理论出发点,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卢曼的著作。

系统理论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理论?这个提问其实涉及到帕森斯终其一生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他声称拥有一种“参照框架”(frame of reference),一个由一般化概念组成的体系。批评家们指责说这还不够:组成一种理论的必须是可以在证据面前予以拒弃的说明性陈述。因此,指出经济有赖于与其他制度之间的交换,并不等于说如果有某些供应陷于短缺,就会产生某些经济混乱。参照框架可以新瓶装旧酒,但却不能作出新颖的预见。在这些批评家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帕森斯的作品缺乏经验性的内容,而在于帕森斯没有提供任何清晰的路径,从概念过渡到经验陈述,或者是用经验研究中获取的信息来修正理论。其结果便是,许多属于此类的论者都与帕森斯分道扬镳了。而帕森斯主义的学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尽管平心而论,系统理论尚未成为一种持久的研究方案,但有些学者已经表明,仍然有可能用帕森斯的观念来搭建研究规划的框架(Smelser, 1959, 1962; Nettl and Robertson, 1968; Alexander, 1985; Gould, 1987; Alexander and Colomy, 1990)。其他有些学者则指出,尽管帕森斯的那些一般性主张依然富有出成果的潜力,但目前的关键远不在此,而是用他的系统理论来解释现代性(Holton and Turner, 1986; Robertson and Turner, 1991)。在有关现代性之命运的社会学争论中,系统理论因此成为一座富饶的矿藏。

帕森斯笔下的系统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它们是作为活生生的东西而存在,还是用来理解活生生的东西的一些概念模式?世界本身是系统性的,还是说“系统”只是以一种学究性的方式来理解世上的种种事件?帕森斯自己给出的回答含糊不清:他倡导“分析实在论”(analytic realism),声称自己有一套可以捕捉世界的现实维度的参照框架。话虽如此,我前文的概述业已表明,他所做的不仅限于所声称的那样,而是把社会系统看作拥有属于其自身的生命,将现实当中的民族国家作为实在的系统。可是,如果“系统”这个术语只具有分析上的地位,那么将美国

作为一个特别自足的“系统”来讨论,正当性何在?帕森斯实际上是来回摇摆,一会儿将现实当中的民族国家作为社会系统来讨论,一会儿又关注那些纯属分析性的系统,只对应于现实的某些特性。这就让人困惑不已。有一条出路,就是把帕森斯笔下的社会系统看作是实在的。这其实也是哈贝马斯(Habermas, 1984)所选择的道路。帕森斯已经分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维度;系统也的确存在,以帕森斯所描述的那种方式运作。但是,他也确实是受自己关于经济的分析蛊惑,将社会的所有方面都作为系统来思考,与此同时,他的行动理论还对自己所批评的那种传统的工具性行动恋恋不舍。而哈贝马斯指出,实际上,社会永远也不可能只是系统,就好像行动不可能只是工具性的一样。在所有的沟通当中,都固在地存在一种寻求相互理解的人类旨趣。像经济这样的系统,它们的特有之处就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引导沟通,从而删减了沟通的丰富性;系统当中的沟通始终是专门化的。但这也削减了人类在互动中免受强制而追求真理的能力,它限制了对于共享问题的自由讨论,从而使社会缺乏活力。老板和工人之间、法官与被告之间绝无开诚布公的交谈。曾经提供了自由讨论之论坛的公共领域也已大大缩减。而个体可以在其中真正致力于达成理性共识的那个生活世界,也已经遭到了威胁,尤其是因为经济、教育或法律系统的必然要求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帕森斯也认识到了共同理解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分析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在他看来,始终存在一种规范性的理解,以某种方式良好地运转着。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试图详细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参与不受强制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举足轻重的力量,以抗衡系统的增进。尽管哈贝马斯与帕森斯都持有某些自由主义信念,但他却相信,一种一般性的系统理论永远也不可能有所批判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那些根本张力。他的沟通行动理论只是把系统作为现实既存的社会中的一个方面,从而抛弃了两个观念:一是行动本身有其系统特征;二是可以有一种社会系统理论来涵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哈贝马斯关注系统所导致的那些问题,从而也抛弃了帕森斯所建构的那种具有精致系统性的特定版本的现代性。

为什么行动系统中的“规范要素”应该享有帕森斯所赋予的如此重的分量?帕森斯在世时,常常被指为一个“共识”理论家或“共同文化”理论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会维系在一起,就是因为人们对核心价值观念取得了一致意见。而帕森斯的回应是:自己的论点只是一种分析性的论点;现实社会中的实际共识显然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如此,即便证明了帕森斯对于规范的强调确有其正当性,他对这种规范性的深入发挥也是站不住脚的。帕森斯变成一位观念论者,强调规范文化在社会系统任何一个部分都扮演着角色。而帕森斯的学生们为了走出这种困境,也采取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倡导“多维度”预设而放宽系统理论的限制。亚历山大主张,



要想说明社会生活的某种稳定特性,就得找出个体与集合体之间的种种关系,找出行动的物质特性与符号特性之间的种种关系 (Alexander, 1982, 1983)。另一条道路就是坚持将“相互渗透”视为建构秩序的一种核心过程,因此,行动的规范性一面与限制性一面就始终是直接关联的 (Münch, 1987, 1988)。明希就此提出,在成功的分化里,不同类型的制度彼此之间是相互支撑的;一个工业化的经济会和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共同体“相互渗透”,后者系可持续增长的一项前提。这两种办法都牺牲了帕森斯实际的系统理论的某些成分。

为什么现代性就应该如此富有活力、值得珍视,至少是在美国?帕森斯用系统理论来建构自己的现代性模式,但这并不等于说,一方为另一方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理论不能证明美国就一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常运转。帕森斯的解释依然可以独立于“理论”证明来评价,而且必须如此。他在世时的许多批评家认为,帕森斯成了用保守主义观点来看待美国社会的辩护士。他们怀疑,系统理论就是在生成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果真如此吗?前文的概述业已表明,帕森斯对自由主义的进步持有坚定的信念;他认为具体的制度只有工具性的价值,天生就是容易变迁的。而对于帕森斯的学生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纠缠过去的那些意识形态争战,而在于将帕森斯对系统理论的运用看作是表达了对于现代情势的一种重要态度。这种态度既不是思乡病,也不是乌托邦,而是对于自由主义现代性所独具的力量的一种认可。即便说系统理论已经不再发挥本身原有的作用,帕森斯的工作成果也依然有其重要意义,表达了属于 20 世纪中叶的一种深具影响的立场。

4.4 卢曼

卢曼生于(德国)吕内堡 (Lüneburg),受过法律专业训练,当过公务员,在 20 世纪 60 年代转入社会学。在比勒菲尔德 (Bielefeld)大学,他成为自己乃至其他任何世代中最多产的学者之一,其名下大约有 50 部著作和数百篇论文。他的研究出发点始终如一,而涉及范围甚至比帕森斯还要宽广,涵盖了法律与宗教,艺术与爱情,乃至世界社会与互动。卢曼对生物学、语言学和现象学的诸多思潮皆有所借鉴,旨在提出一种关于社会系统的一般性理论,超越社会学中所有的经典理论,同时融合其中的一些核心主题。这项研究规划的顶峰就体现在一部尚未从德文译出来的著作,论的是“社会之社会”(Luhmann, 1997)。他的作品整体的广度与深度都使他在德国获得了巨大的认可。1998 年各大报章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他的辞世,讣告写的都很富有深度,但对他的刻画却是多种多样,有的说他是一位可与牛顿媲美的学者,有的说他是一位叙写现代性的诗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思想

世界,还有的说他是与实际社会学失去接触的思想家。

卢曼的行文思路怪异难测,喜作悖谬之论,常常晦涩地让人生畏。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理论演进的纯粹载体,以此来转移种种毁誉之辞,暗示在某一个关键的时期,自己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自动写出来的”(Luhmann, 1995: lii)。卢曼的思想有两个显著特点。尽管他以抽象的术语写作,但他的兴趣却在于实际的社会事实或制度。他想要了解实际的法律、实际的经济和实际的社会是如何作为系统而运作的。卢曼在一系列专门讨论个别制度的著作中分析了这些东西,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世界图景:它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系统所组成的世界,每一个系统都有其独特的内在运作。卢曼还刻画出一幅引人入胜的崭新的现代性图景。他主张,现代性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它是彻底分化的,许多系统有着属于自身的运作,全无一个核心或共同价值观念。他也指出,自己的新理论是对一种新型社会的自我描述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样一些方式,卢曼体现了系统理论中一种全新的出发点。要描述这种新的出发点,化减这项庞大规划的复杂性,我把它说成是对帕森斯的一种回应。尽管从生平的角度来说这样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曼在1960年师从过帕森斯,但这并不意味着判定帕森斯的那些局限是促动卢曼所有作品的动机。

在卢曼看来,帕森斯试图尽可能简明地分析行动,这种想法还是不错的。他自己也集中探讨了符合这一要求的问题,即行动者参照其他行动者来作决策而其他行动者自己也需要作出此类决策时,所产生的那种“双重偶变性”。但帕森斯所依托的那个传统束缚了他。在帕森斯的认识里,行动始终是行动者的事情;也就是说,始终出自个体之力。个体们所建构的秩序,来源于传统哲学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因素,即共享规范标准。帕森斯考察了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创造出一个整体,试图以此表述那种秩序,这同样属于系统思想中的传统方法。而在卢曼看来,这样做并未充分考虑到社会行动实际是如何发生的。相反,他建议将社会行动理解成沟通。任何沟通都具有某种统一性。在许多可能有的讯息以及传递这些讯息的手段之中,任何一种沟通行为都只是选择其中少数几种。但即便是最最基本的沟通形式,也是一个系统,因为它在自身与更为复杂的环境之间维持着一种差异。枕边的私房话是一个系统,立法审议也是一个系统。要维持这种差异,关键在于“意义”的运用;也就是说,符号性的“种种潜能的实现”,而这些都指向一种共同的“可能性视界”(Luhmann, 1995: 65)。意义的再生产是通过信息、通过“选择系统状态的事件”而发生的(Luhmann, 1995: 67)。因此,一项“有罪裁定”的意义是由对“有罪”的实际宣判再生产出来的,后者“选择”了审判中的一种特定状态;选择开启了未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上诉或挑选判刑方案。规范尽管让人扫兴,倒也维持

了期望,但只是化减沟通当中的复杂性的方式之一;实际上,一味依赖规范,会阻碍而不是促进沟通。卢曼提出,系统当中有意义的沟通只需要有一种二元符码,也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区分适合与不适合的讯息。比如说,法律系统的运作就是基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根本区别。作为一个系统,它仿佛有其自身的生命。尽管卢曼从未否认是个体在进行沟通,但他并不将沟通视作个体头脑之间观念的一种交换。对于卢曼来说,将沟通视为系统便意味着将个体意识视为环境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系统理论必须将焦点放在现实的纯粹社会性的维度上。

根据卢曼的说法,帕森斯也正确地认识到了系统需要与其环境之间保持差异,正确地认为它们需要区分现时状态与未来状态。在思考此类系统问题的时候,他提出了 AGIL 图式。卢曼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该图式已成作茧自缚。在他看来,帕森斯既不能证明自己的四项功能就是唯一的四项功能,也不能证明这四项功能是所有社会系统都必须具备的。这是一种限制性的自我简化,无法把握到实际系统所具有的实际复杂性。它迫使帕森斯建构出种种精致完善的图式,层层嵌套,尽管帕森斯根本没有清晰的办法可以将任何一种具体的行动指派给一个特定的系统。在帕森斯看来,一个系统的环境始终包含着其他的系统——但是,又如何挣脱这自己织就的束缚呢?在他的主要著作《社会系统》里,卢曼提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分析系统的结构,认为许多系统,比如沟通的系统,都有“自均衡”(autopoiesis)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它们用自身的运作来生产自身,就好像一个有机体不断地从遗传密码及其内在物质当中重新创造出自身。以法律为例,在根本的意义上,是法律创造了它自身:法律程序就是通过法律程序而产生的。这种自我再生产的关键在于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也就是系统处理自身、考察自身作为一个系统而发挥功能的能力。因此,判决书不仅必须解决具体的案例,而且担保法律程序本身执行适当。法律系统创造出一些有利的视角,可以由此来检视并改进法律系统本身。根据一个系统所独有的沟通,这种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任何特定的“功能”系列都不能完全把握。枕边的温情软语与宪法解释的话语自然不同。

卢曼同意帕森斯的看法,也认为现代社会独特的组织形式就是功能分化。尽管在中世纪的欧洲,不同的群体和制度是按照等级秩序的方式安排的(卢曼称之为“层级分化”的模式),但至少是从18世纪开始,就分裂出各种制度以形成地位相当的专门化系统。卢曼主张,分化意味着特定的系统执行各自特定的运作,以此协助社会的整体组织——也就是说,系统对作为整体的社会发挥着“功能”,并为了其他系统而“实施”。卢曼比帕森斯更明确地强调经济只是许多系统中的一个;而如果认为经济受到特别的限制或者是特别的重要,就是忽视了它根本的位置

(Luhmann, 1998)。那些系统并不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维系在一起。并没有帕森斯曾经想出的那些共享规范或价值的构造；公民权利或道德准则所发挥的功能，只是为社会中的所有参与者提供了平等介入各个子系统的渠道（比较 Parsons, 1982: 243; 1990: 34—35）。法律无法像帕森斯曾经主张的那样，通过反映共同承诺的规则来解决所有冲突，以此整合一个社会。充分分化造成了社会不再具有一种独特的认同；它只是涵括了所有可能有的沟通。“最后，到了今天，社会的一体性已经根本不能从物质的角度来界定了，因为它包含了所有以某种方式将人们彼此联结起来的東西。协调各个子系统的那些视角变得非常具有自主性，从而没有能力代表作为整体的社会”（Luhmann, 1982: 348—349）。由于社会不再“能够在其自成一体的存在状态中被界定……社会只有作为世界社会才是可能的”（Luhmann, 1982: 354）。功能分化了的各个系统没有面临任何扩张的阻碍，将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全球系统（Luhmann, 1990）。民族国家仅仅是这个总体社会系统当中一个子系统的各个区域而已。

帕森斯曾经认为，现代形式的社会是进化过程的稳定产物，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价值观念一种比较成功的制度化产物。而卢曼的观点则不那么乐观。现代性确立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但它并不体现出任何特定的价值图式。对他来讲，现代社会具有彻底的偶变性——原本可以是其他样子的种种状况以一种不太牢靠的方式实现了。现代社会也必然是向未来开放的，被视为“决策的风险”（Luhmann, 1998: 70—71）。进化注定要继续，扫荡我们熟悉的世界。实际上，进化始终是“在极大程度上具有自我破坏的性质……业已创造出来的东西所剩无几”，因此“未来的社会，即使它们能够基于有意义的沟通而继续存在下去，也将会在另一个世界里生存……将会惊叹于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癖好”（Luhmann, 1998: 75—76）。由于关于未来惟一知晓的事情就是它将是另一幅面目，所以对于社会学来讲，要创造一种变迁的规划，或者是坚守对于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希望，都将徒劳无益。从卢曼的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像帕森斯这样的 20 世纪自由主义分子所秉持的信念，也只能是一种一时兴起的“癖好”，导致了关于社会的有欠缺的自我描述。

卢曼因此对系统理论家们的传统见解提出了挑战，实际上也是对整体上的社会科学的传统见解提出了挑战。在他的笔下，沟通并不是自觉主体的事情，系统自己生产着自己，社会绝无任何政治或道德上的核心，世界陷入分裂与除魅，而他的理论也不对任何特定的变迁抱持丝毫持恒的希望。即便不考虑它最终对整个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影响，单就其本身而言，这种挑战就具有重大的意义，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卢曼的观念已经努力进入了法律和神学这样的领域，对这些观念的接受情况表明，他的影响还大有增长的余地。随着学者们检视卢曼系统理论的种

一种可能性——就像他们已经开始做的那样，尤其是在德国（Baecker et al. , 1987）——学者们将会遇到一些问题。

从传统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类问题中有一个便是：理论如何能够被证明不能成立。卢曼认识到，未来将会给系统带来惊奇。但是它们是不是也可以给理论带来惊奇呢？卢曼本人是对经验性“验证”这个观念本身提出质疑的，认为它需要先假设存在一种独立的“现实”。在他看来，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得看系统如何理解它。因此，任何理论都只能是一种有所取舍的建构。我已经指出，卢曼的这种特定的建构具有某种特定的思想力量。但是它具有非常强烈的内向闭合性，以至于普通的科学批评可能对它没有多少影响。

社会系统实际上是不是像卢曼所指出的那样闭合呢？卢曼在他学术生涯的后半期里，开始比起步阶段更加强调内向的闭合。这样一来，一个子系统对社会的“贡献”的确切性质，或者是这个子系统从其他子系统那里接受功能运作表现的过程，就更不清楚了。但是，自我指涉性的自均衡闭合的强硬观念本身就带有风险。以美国的堕胎法案的演变为例（Deflem, 1998）。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堕胎案例努力进入了法庭，有关“生命”的含义与女性的自然“权利”的种种主张就被转换成了特定的法律术语。尽管如此，最高法院就堕胎做出国家合法化以来的法律过程的进展，绝不单单是一种内在的法律事务。更准确地说，种种相互竞争的世界观与政治思潮都进入了法律领域本身当中。这并不否认法律具有自均衡的性质，但它表明，卢曼所暗示的那种法律的自主性充其量不过是相对性的。

现代社会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随着卢曼抛弃了传统的种种整合力量，他也贬低了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他最终将分化过程本身表述为一种整合形式。但是，这么说是否充分？如果没有对一个社会里各个子系统如何在一起运作有某种认识，那么，系统理论最初的冲击力也就行将失落了。不仅如此，如果不明确地凸显整合问题这一主题，卢曼的理论也会无法切入现代社会自我主题化过程方面的一个关键论题。

是什么将世界社会塑造为一个系统？卢曼有关全球化的探讨只是勾勒出一个充满沟通、不受地域分划阻碍的世界。但是，是什么把这个世界塑造为一个社会呢？这个世界作为一个系统，是如何产生自己的结构的呢？不同的系统或文化又如何产生对于这个社会的一致性的自我描述？卢曼除了把功能分化本身说成是一种全球力量，并没有多少进展。甚至在这一点上，也还留有许多问题。比如说，在什么意义上，法律是一种全球分化的系统？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法律工作都是在民族国家的界限里执行的；即便法律确实是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分化，也不足以表明，法律就是一个全球分化的系统。国际法的体系确实是在日益增长，但是，

对于它的许多基本运作来说,依然有赖于政治支持或许可。国际法确有它的基本内容,但它的许多条文(比如人权)却尚未有清晰的法律意义。国际法确实获得了某种自主性,但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法律之外的运动与组织的工作。所以到现在,国际法争取自主的斗争,确立自均衡闭合能力的斗争,都还在继续。

4.5 结语

在当代社会科学里,系统理论的生命力是成问题的。它尚未成为一种可以验证的理论,有条不紊地指引着作为常态科学一部分的研究。许多学者反对目的论的残余,即在说明的时候着眼于目的,或者着眼于一种制度或过程对假设中的系统目标或需要所具备的贡献。他们还进一步在功能主张中捕捉到了同义反复,即先从已经满足的功能中推出系统的生命力,假定这就是有待证明的东西,而功能是否满足又是根据一个系统是否继续生存来判定的。研究社会变迁的学者们已经对进化理论产生了怀疑,因为它设定了一种进步性变迁的普遍过程,却没有多少历史的、说明性的内容。在友善的评家看来(Turner, 1991),系统理论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分类图式和有启发性的比喻,只是其功能有所限制罢了。

帕森斯和卢曼至少可以避免目的论与同义反复的问题,足以使学者们相信他们的精华之见仍能予人启发。因此,他们可以继续从所继承的丰富思想遗产当中博采众长。系统理论似乎可以以其他一些方式保持其重要性。它所包含的对于现代性的思考,是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的时代之后,社会学中最具系统性的思考。学者们将继续就现代性的形式与未来争论不已,就此而言,系统理论还将成为此类论争的衡量标尺。就其实质内容与最终抱负而言,系统理论也构成了古典社会理论与当代社会学之间的一条清晰纽带。而根植于经典中的传统依然富有活力,因此,系统理论也将被视为其中的一种关键要素。比如说,帕森斯就经济在当代世界的位置,从根植于经典的社会学的角度作出了他的回应,值得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的学者们作出响应。相比于绝大多数作为论战对手的视角,系统理论都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古老的希望,希图建立一种关于社会的一般性理论。而在后现代的时代里,那样的研究规划已经不合世人的口味,但如果它重新恢复了活力,那系统理论将注定扮演核心角色。最后一点,系统理论在探讨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时,其态度之严肃不亚于社会学传统中其他任何一股流派。即便此处介绍的特定看法最终还是没能完全解决那些问题,未来的理论家们也将不得不再一次应对类似的论题。当他们试图超越其前辈的种种局限之时,明智之举也将是站在那些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





参考文献

- Alexander, J. C. 1982: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I: *Positivism, Presupposition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3: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IV: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Thought: Talcott Par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d.) 1985: *Neofunctionalism*. London: Sage.
- Alexander, J. C. and Colomy, P. (eds.) 1990: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aecker, D., Markowitz, J., Stichweh, R., Tyrell, H., and Willke, H. (eds.) 1987: *Theorie als Passion: Niklas Luhmann zum 60. Geburtstag*. Frankfurt: Suhrkamp.
- Barber, B. (ed.) 1970 : *L. J. Henderson on the Social Syst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flem, M. 1998 : The boundaries of abortion law: systems theory from Parsons to Luhmann and Habermas. *Social Forces*, 76 (3), 775 — 818.
- Durkheim, E.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ould, M. 1987: *Rev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e Coming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Holton, R. J. and Turner, B. S. 1986: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Luhmann, N. 1982: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0: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lfare State*. Berlin: De Gruyter.
- 1995: *Social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
- 1998: *Observations on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linowski, B. 1944: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Mütnch, R. 1987: *Theory of Action: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Going Beyond Parsons*.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8: *Understanding Modernity: Towards a New Perspective Going Beyond Durkheim and Weber*. London: Routledge.
- Nettl, J. P. and Robertson, R. 1968: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eties: The Formation of Goals and Attitud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Glencoe, Ill. : The Free Press.
- 1951: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 The Free Press.
- 1971: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77a: Social interaction. In T. Parson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54 — 176.
- 1977b: Social systems. In T. Parson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77 — 203.
- 1977c: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symbolic media of interchange. In T. Parson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04 — 228.
- 1977d: Some problems of general theory in sociology. In T. Parson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29 — 269.
- 1978: Christianity. In T. Parsons, *Action Theor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79: Religious and economic symbolism in the Western world. *Sociological Inquiry*, 49, 1 — 48.
- 1991: *The Early Essays*. With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Cam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 Bales, R. F. 1955: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Glencoe, Ill. : The Free Press.
- and Smelser, N. J. 1956: *Economy and Society: A Study in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 Glencoe, Ill. : The Free Press.
- Radcliffe-Brown, A. R. 1952: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Glencoe, Ill. : The Free Press.
- Robertson, R. and Turner, B. S. (eds.) 1991: *Talcott Parsons: Theorist of Modernity*. London: Sage.
- Smelser, N. J.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Spencer, H. 1898: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D. Appleton.

Turner, J. H. 1991: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Belmont, CA: Wadsworth.

深入阅读文献

Alexander, J. C. 1987: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将晚近的理论作为对于帕森斯的回应予以介绍。

—— 1998: *Neofunctionalism and After*. Oxford: Blackwell. 对于重新构建帕森斯的传统及其后的“新理论运动”的评论。

Beyer, P. 1994: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用卢曼的观念来分析全球化的方方面面。

Colomy, P. (ed.) 1992: *The Dynamics of Social Systems*. London: Sage. 用帕森斯的观念来分析各种问题的一本文集。

Luhmann, N. 1986: *Love as Passion: The Codific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对于爱之作为沟通媒介的一种较为浅显的探讨。

Parsons, T. 1977: 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 In T. Parson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作者对自己研究经历的反思。

—— 1982: *Talcott Parsons on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一部有用的选本,并有 Leon Mayhew 之佳序。

Thesis Eleven 1997 (November). 评论卢曼文章之专辑。

第⑤章 精神分析与社会理论



A. 埃利奥特

埃利奥特 (Anthony Elliott) 是位于布里斯托尔的西英格兰大学社会政治理论
研究教授。著有《服从自身: 社会理论、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性》(Polity Press ,
1996), 《2000 年的弗洛伊德》(Polity Press , 1998), 《约翰·列农之悼》(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9) 以及《变迁中的社会理论与精神分析》(1999 年第
二版)。编有《布莱克威尔当代社会理论读本》(Blackwell , 1999), 并与人合编有
《具体情境中的精神分析》(1995) 和《达到限度的精神分析》(2000)。目前他
正在与布赖恩·特纳合作为 Sage 出版社编辑《当代社会理论概观》。

- 5.1 弗洛伊德的遗产
- 5.2 批判理论、弗洛伊德与关于现代社会的分析
 - 5.2-1 弗洛姆
 - 5.2-2 马尔库塞
 - 5.2-3 哈贝马斯、弗洛伊德与被扭曲的沟通
- 5.3 复归弗洛伊德: 拉康
 - 拉康理论的长处与局限
- 5.4 拉康主义与后拉康主义的社会理论
- 5.5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判
 - 5.5-1 拉康主义与后拉康主义女性主义理论
 - 5.5-2 对象关系性女性主义理论
- 5.6 当代精神分析社会理论中的一些理论争端
 - 5.6-1 后现代精神分析
 - 5.6-2 精神分析社会理论中的一些新趋向



社会理论的任务是提供有关人的行动的性质、社会生活、人的行动的文化产物等方面的观念,并且这些观念都能够用来服务于社会科学和总体上的人文学科。在社会理论关注的问题中,包括语言和对于意义的解释,社会制度的特征,各种社会实践和过程的阐明,以及更一般层面上的社会转型问题。但是,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从来也不仅仅事关非人身的“过程”和“结构”。创造它,经历它,也是在我们最具人身性的种种需要、激情、欲望等等的内在世界当中。爱、同情、焦虑、羞耻、罪疚、沮丧:不参照行动中这些属人的要素,就无法成功地开展任何有关社会生活的研究,或者获得有意义的解释。在现代性这个时代里,这种属人的要素构成为一块系统的知识领域。而这块知识领域就是人们所知的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作为 19 世纪晚期欧洲文化的一个产物,已经对 20 世纪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理论家和政治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女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都充满热情地采纳了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深入发展的那种精神分析。它的理论是那样富于启发,而它对我们当代文化痼疾的诊断又是那样鞭辟入里。至于精神分析对于社会理论的重要性,尽管众说纷纭,成为思想论争的焦点,但还是可以从一些非常具体的领域里看出它,尤其是有关人的主体性、性欲、社会性别秩序安排以及文化政治等问题的当代争论。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理论本身形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的概念和理论就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克里斯蒂娃、伊莉嘉瑞、卡斯托里亚迪,一直到利奥塔,形形色色的社会理论家们的研究都分享了弗洛伊德的遗产。不过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社会理论家中间这种转向弗洛伊德的趋势,背后的基本动力中的政治因素与思想因素不相上下。这个世纪目睹了极权主义的兴起,亲历了广岛和奥斯维辛,也看到了“核冬天”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世纪里,现代性释放出了自己前所未有的破坏力,社会理论需要有一种语言能够应对这种局面。而精神分析已经提供了这套概念语汇。

下文中将简要概括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些核心演变轨迹,然后结合人的科学中的一些社会理论争论,来考察精神分析的相关性与分析力。我会努力捍卫这样一种看法:在主体性、意识形态、性的政治等方面的有关分析里,在应对当代文化中的诸多危机时,精神分析理论能够大大有助于社会理论家,包括女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

5.1 弗洛伊德的遗产

回首已是百年,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一个人的指引下出现了。弗洛伊德在

19世纪晚期的维也纳创立了精神分析,既把它作为一种治疗实践,也将其作为一种关于人类心智的理论。从治疗的角度上来说,也许最普遍的是把精神分析理解成一种“谈话疗法”,用这个简明响亮的概括来描绘语言缓解精神疾苦的魔力。谈话疗法的关键就是所谓的“自由联想”。病人把脑子里浮现出的一切东西都告诉给分析者,不管这东西是多么琐屑或者多么令人不快。分析者可以由此渠道入手,了解病人想像中的各种欲望与历史,然后就可以在临床疗程中给出解释和重新构建。作为临床实践的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要把隐藏在神经症之下的情感和冲突揭示出来,以便缓解病人的痛苦症状。

而从理论的角度上来说,精神分析的根基在于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系列动力模式。无意识的范畴,压抑,性驱力,自恋(narcissism),拒斥,移置(displacement);这些都是弗洛伊德有关自我的说明的核心维度。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主体的存在,并不独立于性、力比多享受、幻想,或者现代文化的种种父权性的社会符号。事实上,启蒙理性中的人类主体,也就是统一、稳定、整合的一个实体,被精神分析解构成一种幻想,即本身就带有隐秘的力比多因素。对于知识,弗洛伊德的看法和叔本华与尼采一致,都认为属于欲望世界的内在成分。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看来,当代意识形态中的一系列对立,如理智与情感,生意与娱乐,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理性与非理性等等,统统都具有受到移置作用的潜在可能。

要想细致绘制一幅精神分析与社会理论之间相互交织的精确地图,就必须大致说说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下面的勾勒只是希望指点一下弗洛伊德理论的总体方向(有关更细致的探讨,参看 Rieff, 1959; Ricoeur, 1970; Gay, 1988)。弗洛伊德关于心理与文化的作品中充满了含糊与矛盾的韵味,在本章下面各节中将对这方面的许多话题进行讨论,不过在这里我只打算点到为止。

“我们有意识的动力全都只是表面现象:在它们后面,是我们身上各种驱力之间的冲突……重要的、基本的活动是无意识的。我们的自觉意识只是跟在后面蹒跚前行。”写下这段话的并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尼采。无独有偶,歌德与席勒之类的浪漫派诗人,叔本华与费尔巴哈之类的19世纪哲人,也都将无意识情感的决定效应置于人类主体性的核心。对于这些深刻的见解,弗洛伊德了如指掌,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援引,虽说在一定程度上,他对浪漫主义将无意识范畴理想化的倾向报以怀疑态度。

如果说这些诗人与哲人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无意识情感的本质的话,那么弗洛伊德探索的则是无意识情感对于人类的性和心理生活所具有的意涵。弗洛伊德的原创性就体现在他关于无意识就是**被压抑的东西**的关键分析。他最重要的洞见之一就是,存在一些意识不能了解的心理现象,但却对日常生活产生某种决定性的

影响。在他著名的元心理学论文“论无意识”（Freud, 1914）中，弗洛伊德提出，自我意识不能直接为己所用，意识也并不是持续自我的某种核心的表达。相反，在弗洛伊德看来，主体性就是**分裂**，是自我的意识与被压抑的欲望的潜在力量之间的撕裂。弗洛伊德通过考察他的病人的语言，发现在自我认同的所有图像背后，都隐藏着深层的情感骚动，都有一种内在于主体本身的根本的**他者性**。在讨论人的主体性的时候，弗洛伊德把心理划分为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部分。前意识可以理解为一所巨大的记忆仓库，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可以随意唤起。相反，无意识的记忆和欲望是从意识中被隔绝或埋存的。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无意识并不是“另一种”意识，而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心理体系，有其独有的过程和机制。他指出，无意识不关注现实；因果关系、矛盾、逻辑或否定之类的东西也都和它扯不上边；它完全沉浸在于快乐和力比多享受的追求中。不仅如此，它还是不能被直接了解的，而只能通过它的效应，通过它对意识产生的种种扭曲，才能探查它。

弗洛伊德对于无意识情感的强调，也贯穿了他有关人类主体的本体论学说。他拒绝认为意识可以提供主体性和知识的基础，而是明确主张，相对于秩序和常识的世界，欲望才是首要的。这里至关重要，人之降临于世属于“早熟”。弗洛伊德从我们固定的生物性需要入手，追溯了我们早年对于他人——通常是我们的父母——的依赖所产生的心理效应。他说，婴儿要是得不到他人的关爱、温暖和养育，是没有能力靠自己生存下来的。然而，在弗洛伊德那里有一点根本的看法：人的需要始终超出了生物性的需要，其实是和快乐的获得联系在一起的。弗洛伊德所举的范例就是婴儿从自己母亲那里吮吸乳汁。婴儿求得哺育的生物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出现了从吮吸本身得到的某种特定快乐，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快乐正是无意识性欲的核心：

婴孩顽固地坚持吮吸，证明了处在早期阶段的某种满足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来源于哺育，被后者所挑起，但却努力要获得独立于哺育的快乐，因此可以称之为、也应当称之为性的需要。（Freud, 1940: 154）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这样大大推进了性欲与主体性之间的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性欲就不是什么既定的、一体的生物力，出生时便以完全成熟的形态存在。相反，性欲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事先充装好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欲属于“多形态的扭曲”，意思是说性驱力及其对象都具有极强的弹性。性的主体性表现为以一种多变的、偶然的方式，将各种力比多快乐组织在一起。这种主体性将始终在混乱纠缠的婴儿期性欲框架中展开。

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无意识的性质与自我和认同的构成有着密切的关联。大体来说,弗洛伊德认为自我认同的出现是与哀痛、忧郁、悲伤等心理过程维系在一起的。在“自恋绪论”(Freud, 1914)中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不仅仅是自我维存的现实原则的一种防御性产物,而是不复占有的对象的一种具有固定结构的积淀。这些对象已经融入了主体性自身的构造当中。弗洛伊德说,失去一位自己所爱的人,必然会导致把这个他人摄入自我。他这样说明丧失和自我形成之间的关联(Freud, 1923: 28):

我们假设,(为了克服这种伤害)丧失了的对象又在自我当中确立起来,也就是说,认同作用代替了对象投入(object-cathexis),这样我们就成功地说明了痛苦而混乱的忧郁症障碍。尽管如此,此时的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过程的意义,还没有了解到它是多么常见,多么典型。要是那样,我们必须理解,这种替代过程(substitution)在确定自我所采取的形式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塑造所谓的自我“性格”作出了基本贡献。

因此,自我认同是通过与重要他人之间多重的、自恋式的认同作用,作为某种幻想替代而塑造出来的。

在精神分析理论里,婴儿必须作出反应的原初丧失(primeloss)就是离开母体。母体的丧失事实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至于不仅成为个人化和分化的奠基性环节,而且成为性差异和性别差异*的奠基性环节。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丧失和性别倾向直接与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挂钩,而这种情结就是进入被接受的社会意义的心理通道。在弗洛伊德看来,俄狄浦斯情结是性发展的症结点,是某个丧失的、被列入禁忌的欲望对象的符号内化。在将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的丧失加以内化的行为中,婴儿与其父亲的关系就成为巩固自我和巩固性别认同的关键了。对于社会生活的主体间性的信任由此开始:父亲占据的结构位置外在于也异在于这一想像领域,发挥着打破母婴对偶体的作用,从而向孩子指出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网络。对于母亲的欲望遭到来自父亲一方的禁止,而这种禁止被感受为阉割的体验,同时又具体体现了被压抑的欲望,指向由各种可能的社会意义组成的外在世界。不过,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这个由意指关系和人际关系所组成的世界始终会被无意识的欲望所超出,即被压抑的东西的复归。认同、性欲、性别、意指,这些都在以下两方之间被截然分开:一方是意识的自我觉察的持续发展,

* 考虑到概念的演变过程,在女性主义进入社会理论之前,我们仍然把“sex”(生理性别)译作“性”,而“gender”(社会性别)译作“性别”。——译者注

另一方则是无意识或被压抑的欲望（有关这方面进一步的探讨，参看 Ricoeur，1970：211—229）。

弗洛伊德的作品告诉我们，自我并不是自己居所的主人。无意识、压抑、力比多、自恋，这些才是弗洛伊德对主体进行的精神分析变位（dislocation）的核心维度。不仅如此，正是因为认同的这种分裂，认同的概念才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占有如此关键的地位：主体通过投向他人的认同过程而创造出身份认同，这里的他人处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符号背景之中。在当代的社会理论里，主体的精神分析变位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出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当中，它属于这样的一种努力：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和科层体制等方面被客体化的那些特征，重新思考自我认同的无力感和孤立性。在哈贝马斯那里，它表现为一系列有关被扭曲的沟通之性质的主张，以求从理论上阐述压抑性的意识形态。在拉康那里，它被用来刻画针对自我隐匿（self-concealment）的各种想像建构，并涉及这样一种观念：语言就是确立被压抑的无意识的东西。在拉康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里面，用它来从政治上彻底地批判生理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等级秩序。而在德勒兹和瓜达里的后现代作品里，在利奥塔的后现代作品里，它主要是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下精神分裂和变位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见解。

5.2 批判理论、弗洛伊德与关于现代社会的分析

社会理论当中有许多尝试卓有成效地发展了精神分析，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为突出。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与社会理论中其他的研究途径不同，与其说是它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论拓展，不如说首先在于它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综合起来。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法兰克福学派就将精神分析用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希图分析为什么人类主体会服从于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并且表面看来全无抵抗。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个人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各个社会心理维度而发展出来的总体说明模式，在社会理论中已经获得相当的关注（Jay，1973；Benjamin，1977；Held，1980；Elliott，1992）。以下我将集中考察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的作品里对精神分析所进行的社会理论重建。然后，我将考察当代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是如何借鉴精神分析来重塑批判社会理论的形貌的。

5.2-1 弗洛姆

弗洛姆从 1926 年以后就一直在从事精神分析研究，也是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

究所的一名成员。他的早期研究致力于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融合在一起。赖希的《性格分析》(*Character Analysis*)回溯了关于社会和无意识的种种语言表达,在此书的影响下,弗洛姆开始关注性压抑所带来的各种效应,关注家庭在经济体系与个人之间的中介作用。根据他的看法,要想把握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和形塑人的经验的各个内在维度,就必须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尽管如此,弗洛姆对于压抑的效应的关注与赖希所做的分析也有着实质上的不同。在弗洛姆看来,赖希没有能够提出一套充分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因为他把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化减成单子式的对于生殖器性欲的关注。而他坚持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根本上属于一种“社会心理学”。对弗洛姆和弗洛伊德来说,都必须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入手来理解个人。

弗洛姆说,要理解个人表达、文化控制与意识形态支配之间的种种关联,资产阶级的核心家庭至关重要。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代理机构,家庭被说成是“一个基本媒介,经济处境通过这个媒介对……个人的心理产生影响”(*Fromm, 1932:483*)。弗洛姆认为,家庭在主体性的核心埋下了回归(*regression*)的种子,维持经济处境的意识形态性质,并培养被动顺从、自轻自鄙、软弱无力的自我观念。因此,弗洛姆早期著作的核心要旨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效应不仅仅集中体现在经济机制和制度上,而且涉及到在每一个体的内在生活和心理动力斗争中确立支配的固着过程。

随着 30 年代的逝去,弗洛姆对正统弗洛伊德学说的怀疑也愈益增强。他强烈地批评了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观念中的生物还原论色彩,认为这种观念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在理论层面上将现代文化的破坏性、攻击性倾向予以合法化。引人瞩目的是,弗洛姆也开始受到新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影响,比如萨利文和霍妮,他们强调了自我的构成当中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强调文化对于认同形成的作用的立场,在弗洛姆的主要著作《逃避自由》(*Fromm, 1941*)和《健全的社会》(*Fromm, 1956*)中也很突出,他主张一种根本的“人性”观念,而这样的人性已经受到了资本主义支配模式的压抑和扭曲。

尽管弗洛姆早期有关个人被整合进资本主义支配体系的研究大体上被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所接受,但是,他后来有关基本人性的社会学分析却遭到了其他成员强烈的异议。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马尔库塞就指责弗洛姆(以及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论者),理由是后者将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一些发现——诸如无意识、压抑、婴儿性欲之类——中的批判性力量给去除了。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姆的修正学说只不过是将从无意识的变位性质替代掉,以此促进自我的功用顺利运转。马尔库塞这样总结了核心要点:“弗洛伊德集中考察了基本驱力的变化,



在作为类的人与作为个体的人身上最隐秘的层面上发现了社会；与此同时，修正论者却把目标放在具体、现成的形式上，而不是放在社会制度和关系的起源上，从而未能把握到，这些制度和关系对于原本据说要去实现的人格究竟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Marcuse，1956：240—241）。因此，马尔库塞说，弗洛姆尝试要在精神分析中添加社会学因素，却只是沦为一种虚幻的政治乐观主义，清除了弗洛伊德那里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成分：对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发现。

5.2-2 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与弗洛姆一样，也认为心理压抑和政治压制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在马尔库塞看来，要摸清楚支配是怎样作用于人类主体的内在世界的，要理解资本主义和大众文化是怎样塑造人的欲望的，要分析人类解放的各种可能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是很合适的工具。不过，与弗洛姆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并不认为必须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添入社会学因素和历史因素。相反，他致力于从弗洛伊德作品的内部释放出解放潜能，期望能揭示出它激进的一面。

马尔库塞对精神分析的重新理解旨在发展弗洛伊德作品中的“政治内涵与社会学内涵”（Marcuse，1956：xii）。他的分析起点在于接受精神分析里面的某些核心主张，其中包括无意识学说，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冲突，生本能与死本能以及文明蕴含着性压抑的观点。但马尔库塞也指出，弗洛伊德错误地认为心理压抑始终有其文化上的必然性。马尔库塞固然同意，所有的社会再生产都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压抑。但是，他认为，弗洛伊德没有看到，是资本主义创造出危害极大的压抑的重负（尽管这种重负并不是永恒的）。由此观之，个人实际上会去适应资本主义的支配的破坏性力量，而这些力量却乔装打扮，成了“现实原则”。

马尔库塞在其经典之作《爱欲与文明》（Marcuse，1956）和《五篇演讲》（Marcuse，1970）中提出并发展了这些发人深思的观念。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解释的关键，就在于将压抑划分成“基本压抑”和“剩余压抑”。基本压抑指的是面对社会生活时最低限度的力比多克制，这实际上意味着是一定程度的压抑在支撑着“社会化主体”的构成，这样的主体有能力维持社会再生产与性的再生产的事业。与此相反，剩余压抑指的是以非均衡的权力关系为场所和渠道创造出来的对约束的强化。马尔库塞笔下剩余压抑的具体体现就是一夫一妻制—父权制家庭和工作场所。他说，这种压抑性的剩余是通过“操作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来运作的，这是一种具有文化特定性的现实形式，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决定其结构。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原则会产生明显可感的破坏性心理效应。“操作”将个

人重新锻造成单纯的“物”或“对象”，用生殖器性欲代替了欲爱，塑造了对于人体的某种纪律作用[即马尔库塞所谓的“压抑性去升华作用”（repressive desublimation）]，以防止被压抑的欲望扰乱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

马尔库塞努力把这种对于弗洛伊德的重新解释纳入了关于现代性的心理代价的批判理论。在马尔库塞看来，20世纪发生的规模浩大的社会转型和工业转型——不仅有文化生产方面的变迁，也包括经济体系和技术体系方面的变迁——已经大大加剧了心理压抑的程度。他认为，技术资本主义越是发达，压抑也就越是变成剩余压抑。从技术、现代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中释放出的巨大的生产能力，已经转过来对主体施加了报复。结果，人身的领域就很容易趋于分解和分裂。根据马尔库塞的说法，精神分析中将个人划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办法已经不再适用。资产阶级核心家庭中的父权权威日趋衰落，伴之以大众传媒与商品化文化的不良影响，已经使人的主体趋向权威的束缚，容易操纵。在晚期资本主义状况下，“subjecthood”* 仅仅表现为经济支配体系中的功能要素。

尽管马尔库塞为当今时代描绘出这样一幅黯淡的图景，但对于社会转化的前景，他还是抱持乐观的态度。马尔库塞始终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分析它本身，探索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对他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操作原则恰恰会产生社会的激进转型所必须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物质丰裕为释解剩余压抑开辟了道路。马尔库塞所认为的解放，牵涉到文化、自然与无意识的快乐之间的某种协调。这种生存状态，马尔库塞称之为“力比多理性”。要实现力比多理性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包括克服快乐与现实、生与死之间的分裂，恢复被压抑的需要与欲求。马尔库塞说，通过幻想结构和社会背景方面的一些变迁，社会就可以重新获得爱欲的成分。

马尔库塞关于趋向“剩余压抑”的当代意识形态压迫的分析包含了许多深刻见解，不过里面显然也有一些重大局限。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究竟如何将压抑由“基本压抑”转为“剩余压抑”，马尔库塞只限于泛泛而论，未能有任何具体的探讨。（有关这一点以及马尔库塞作品中相关心理—政治困境的详细讨论，参看 Elliott, 1993）。与此类似，他主张可以将理智或理性定位在被压抑的本能中（“力比多理性”的观念），但缺乏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对于主体间性的社会关系，马尔库塞的作品也缺乏任何实质性的分析。不过，在他有关政治自主的见解里，被压抑的本能得到解放和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被压抑的欲望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的理解既是个人主义的，也是社会性的（参看 Held, 1980；

* 可以理解成“主体身份”，也可以理解成“臣属地位”。——译者注

Chodorow, 1989)。

5.2-3 哈贝马斯、弗洛伊德与被扭曲的沟通

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当代作品里,可以看到一方面试图克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局限,同时也继续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为批判性社会理论的范例。在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支配的分析方面,哈贝马斯受马尔库塞的影响,也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和丰富批判理论。他与马尔库塞一样,也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社会组织 and 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压抑。不过哈贝马斯也说,在晚期现代性状况下,由于经济短缺的约束已经被克服,所以我们开始看到,社会压抑的转型(或许是根除)的可能性大大加强。

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的重新理解,与拉康的精神分析(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讨论)有许多共同之处,虽说最终的结果相当不同。与拉康一样,哈贝马斯也把精神分析理解成一种探索主体间性沟通的理论构造和方法论体系。同样与拉康一样,哈贝马斯也主张无意识本质上是语言的无意识。不过,与拉康不同的是,哈贝马斯主张,有可能通过恢复被压抑的无意识而求得解放。哈贝马斯完完全全地认可精神分析是一种“谈话疗法”,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言语将无意识变为意识,所以他致力于将社会压抑的克服与公共沟通结构的转型联系起来。

哈贝马斯说,意识形态这种沟通结构,已经被权力系统性地扭曲了。在发生扭曲的地方,社会的理性化侵入了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的经验领域——包括文化再生产、社会化、人的认同等领域。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哈贝马斯也认为,一种理性化、科层化的逻辑愈益渗入文化生活,已经败坏了社会关系。匿名的行政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增长已经失去了控制,越来越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经济子系统和行政子系统包围并渗入生活世界的这种过程,并不只是社会支配的问题。相反,诸如此类的病态现象开始纳入当代认同和心理经验的严格单调的特征。实际上,哈贝马斯讨论了“生活世界的内部殖民化”,而这意味着欲望和情感越来越被社会系统本身所组织、所支配。

哈贝马斯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探索社会权力与意识形态对主体性的沟通扭曲的话语。他在《知识与人类旨趣》(Habermas, 1972)里指出,无意识的压抑是语言扭曲的一种效果。他说:“自我摆脱自身的运作正是以语言为载体和渠道进行的。否则,就不可能通过语言的分析,从解释学的角度来回溯防御的过程。”(Habermas, 1972: 241)这样用沟通来读解弗洛伊德,压抑就被理解成一种“革除沟通权”(excommunication)的过程。哈贝马斯借鉴了洛伦泽有关病理现象的

精神分析研究,提出无意识的构成就是通过语言的私人化和畸形化,将语言革除出公共领域。无意识作为一块心理的领域,被理解成从主体间性沟通中排斥出来的东西。按照哈贝马斯的主张:“要使不可取的需求倾向变得无害,在心理上最具效力的方式,就是将这些需求倾向上附着的各种解释排斥出公共沟通”(Habermas, 1972: 223)。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贝马斯认为解放就涉及到**清除对于沟通的无意识扭曲**,以便确保争取政治自主的自我反思性运动。

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尤其是马尔库塞一样,哈贝马斯将压抑概念重新塑造成一种革除沟通权的思路也已经大大刺激和影响了当代社会思想。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对弗洛伊德的解释具有个人主义色彩,与之相反,哈贝马斯从沟通的角度对精神分析的读解则直接面对了被压抑欲望的主体间性特征,从而使得精神分析的研究传统更直接地切合了社会理论的关注话题。尽管如此,对于哈贝马斯利用精神分析的路数,也有不少不容忽视的异议。首先,哈贝马斯似乎将压抑与无意识混为一谈,从而未能考虑到其他无意识过程的重要意义,比如幻觉性的愿望满足、幻想之类(参看 Whitebook, 1989)。其次,与这种批评意见有关的一点,哈贝马斯从语言的角度对心理的重新理解,与拉康一样,都抹除了无意识情感的前语言领域,因此,也就屏蔽了情感在社会世界的构成和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哈贝马斯抛弃了这些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至关紧要的因素,也就只能将无意识说成是本质上否定性的、约束性的,所以他才会主张,在集体的层面上,无意识必然会成为意识!这当然就忽视了无意识幻想和情感中更为积极、更具创造性的维度,而这些心理经验维度对于社会生活和批判性自我反思来说却是至为根本的(参看 Elliott, 1992: 第三章)。

5.3 复归弗洛伊德:拉康

许多精神分析理论家都将丧失作为自我构成中的核心因素。从婴儿丧失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的关联,到俄狄浦斯叙事中充满痛苦的命令,一直到此后成年阶段所体验到的种种拒斥与否定,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所有的感情相互作用中,丧失都居于核心的位置。然而,尽管在整个精神分析的历史中都一直在强调丧失与认同之间的关联,但只有法国精神分析学者拉康深入阐述的对于认同形成的解释,才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理论。拉康透过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角度,重新读解了弗洛伊德,提供了社会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参照点,用来分析以语言为场所和渠道的**主体的构成**,分析主体间性的欲望空间。本章稍后讨论女性主义理论时,还将回过来讨论拉康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这里,重要的是概

■ 述和考察拉康的欲望主体理论。

我们已经指出,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婴儿是在与其母体的某种共生关系之中开始生命历程的。生命伊始的婴儿,心理上对于自我与他人、自己与外在世界之间没有任何区分。在这个阶段,婴儿的世界就在于自己与母体的某种融合。拉康称这种令人感到快乐的存在领域为“想像界”(imaginary order)。拉康眼里的想像界是一种前语言、前俄狄浦斯的秩序,欲望在其中绕过了一个接一个的母体上的小对形(part-objects),*比如乳房、嘴唇、目光、皮肤之类。不过,在拉康看来,一旦婴儿认识到自己具有某种与其母亲相分离的身份认同,这种整体性的想像经验也就被打破了。婴儿在这一原初性的分离环节中所体验到的就是一次摧毁性的丧失;这种丧失非常痛苦,以至于会导致对与母亲领域之间前俄狄浦斯关联的原初压抑,也就是这种压抑确立了无意识。一旦割断了对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的原初认同,婴儿就被抛入语言的领域,抛入内在于意指过程的差异,拉康称之为“符号界”(symbolic order)。拉康理论里的符号界属于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意义、逻辑和分化的层面。符号化和语言使主体可以向自身和他人表现欲望。不过拉康也说,欲望的表现始终被对于母亲的想像认同遭受的创伤所玷污。作为有言说能力的主体,我们的话语始终带有某种缺失的标记,也就是被压抑的无意识。拉康说,“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

拉康通过考察弗洛伊德的自恋学说,讨论了自我构成过程中在想像方面的磨难。在“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1949)一文中,拉康提出,婴儿通过在“镜子”中认识到自己的形象,有了一种身体上的统一感。“镜子”为婴儿提供了一种令人安慰的形象,自身呈现为一体的、自足的。正如拉康所言(Lacan, 1977: 1):

还不会走路甚至还不会站稳的婴儿,虽然被人的扶持或被学步车所牵制……他仍然会在一阵欢快的挣扎中,摆脱支撑的羁绊,保持一种多少有点前倾的姿态,以便在自己的目光中维持这种姿态,恢复在镜中获得的瞬间的特征。

然而,这种反射性的镜像根本不像其看起来的那样。拉康说,镜子所产生的是一种“一致性幻象”(mirage of coherence),一种产生异化的误识(misrecognition)。

* 参看齐泽克(即日热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页20,“译者前言”,注一的详细说明。——译者注

tion)。一句话,镜子在撒谎。镜子诱使婴儿把自己想像成稳定的、一体的,但事实上此时它的心理世界是分裂的,身体运动是不协调的。在理念与实存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下,以憎恨和攻击为支撑,反射镜把婴儿带到一个无拘无束的自恋领域。拉康说,想像中这种关于自我的草图,“在自我接受社会决定过程之前,就将自我的能动力量引向了虚构的方向”(Lacan, 1977: 2)。

因此,可以将想像界描述成由被扭曲的镜像组成的原初领域,自我与他人之间难分难解的空间世界,从中引出的原初自恋和攻击性充当了认同形成中的核心素材。但是,如果说想像界已经是欲望的某种异化,那么语言的符号界当然也是如此。拉康说,符号界击碎了想像界的那种镜像一体性。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都认为伴随着这种过程,父亲也就进入了孩子的心理世界。俄狄浦斯阶段的父亲破坏了母子纽带,打破了想像界中自我与他人的一体性。对拉康来说,语言正是塑造俄狄浦斯过程之结构的根本媒介。孩子经由语言进入符号界,也就遭遇到了时间、空间和逻辑上的种种差异,对于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来说,这些差异都是奠基性的。语言在拉康眼里,就是主体间性的一种符号化秩序,携带着文化约制的力量,或者按照拉康的说法,是“父亲之法”(the Law of the Father)。正是以语言为场所和载体,主体尝试重新构建丧失了想像一体性。

拉康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入手,重新书写了俄狄浦斯情结。在这一点上,他以索绪尔为理论参照点。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把语言阐述为一种差异系统。按照这种观点,记号是由能指(声音或形象)和所指(所唤起的那种意义的概念)所组成的。因此,一个词的意义就是从它与其他词之间所确立的种种差异当中产生出来的:这样的词并不“意味着”它们所指示的对象。语言是通过差异之间的某种内部相互作用而表示意思的。拉康的精神分析接受了索绪尔语言学的核心要素,但是大大推进了它。索绪尔所探索的所指或概念不管其构成有多么的“任意”,拉康也不会有任何探索的念头;不过,拉康倒转了索绪尔对于记号的读解,主张在意义的生产过程当中,是能指对于所指具有首要性。拉康说,所指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说清楚,因为它始终在“浸入”或“褪入”无意识范畴。在这一点上,拉康强调了意指与无意识之间的深层关联。被压抑的欲望必然与能指本身有共同的范围。在拉康说来,无意识是“言语对于一个主体的诸般效应的总和,在这个层面上,主体从能指的各种效应中构成了自身”(拉康语,转引自 Ragland-Sullivan, 1986: 116)。

语言作为一套差异系统,构成了人类主体和被压抑的欲望。拉康眼里的主体,一旦脱离了想像界中自恋性的完满状态,就被插入符号性的语言结构。这种主体间性的秩序是欲望流转的文化场所。主体试图以语言为场所和载体来把自身表现给他人。尽管如此,由于事实上欲望本身就是一种“能指的效果”,是语言的间隔

或差异的表露,这就使通往我们自身乃至他人的渠道变得更加复杂。从这个角度来看,无意识范畴与其说是个人“内部”的一块领域,或者是语言“之下”的一块领域,不如说是主体之间的一块主体间性空间,就定位在将词与词、意义与意义分开的那些间隔之中。拉康说:“无意识范畴的观念正是符号界相对于人来说的外部性 (exteriority)” (Lacan , 1966 : 469), 或者用拉康那句招来骂名无数的口号来说:“无意识范畴的结构安排一如语言。”

拉康理论的长处与局限

拉康对于弗洛伊德的重新读解已经对现代社会理论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他强调符号结构在主体构成中的核心位置,强调了无意识范畴的断裂效应对这些结构产生的破坏作用,这些对于晚近有关认同和文化形式的争论都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参看 Leupin , 1991 ; Ragland-Sullivan and Bracher , 1991 等)。他强调语言和欲望之间复杂的纠缠,这一点也是独特新颖、富有启发的。重要的是,它还有效地矫正了社会理论中将自我描绘成理性心理作用机制的运行场所的说法。不仅如此,他从语言的角度对无意识范畴的重新理解,有力地解构了那些假定思维与世界自动取得契合的再现 (representation) 理论。

不过,话又说回来,拉康关于主体性和社会关系的说法中还有不少局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主体身份的说法。拉康认为,在镜像阶段锻造成的那种对于自我与他人的想像认同,等于是宣判了注定要异化。弗洛伊德认为误识与自我的形成有着内在的维系,这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但是,拉康对这个过程的看法却牵涉到一系列的实质问题。考虑以下问题:是什么使得个人有可能从自己的镜像中认识(误识)自身?它究竟是如何利用这种自我身份的授予的?所谓镜子产生了扭曲的观点自有它的问题:它未能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心理能力促成了诸如此类的误识。也就是说,它未能详细说明镜子是如何被构成为**实在的**(参看 Elliott , 1992 : 138 — 146)。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拉康从语言的角度重新理解精神分析,将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发现模式化,将它化减为能指之间的一种偶然游戏,这实际上是抑制了这些发现中的激进意涵。在这方面,拉康所谓无意识自然与语言维系在一起的主张也遭到了猛烈抨击(参见 Ricoeur , 1970 ; Castoriadis , 1984 ; Laplanche , 1987)。这些抨击明确指出,无意识的东西正是语言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拉康把欲望说成是不体现在身体上的,从语言的角

* 原文此处为“precondition or language”,疑为“precondition of language”之误。——译者注

度上是具有既定结构的,这样实质上就剥夺了主体任何自主、反思和转化的能力,这种说法当然大可商榷。

针对拉康关于文化的解说,也出现了一些同样不容小觑的批评意见。拉康将“无意识范畴的主体”与“记号的任意性”之观念相联系,带出了意识形态权力的复制这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拉康未能说清楚,在个人领域的塑造过程中,某些意识形态意义和政治意义怎么就主导了另一些意义。相反,他把文化支配视同于语言本身。用来说明主体之陷落的,是个人相对于符号界、相对于法的力量臣属地位。不管怎么说,按照迪尤斯的看法(Dews, 1987),拉康将语言视同于支配,这就严重低估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文化网络和政治网络的再生产中的重要性。

5.4 拉康主义与后拉康主义的社会理论

拉康复归弗洛伊德的努力已经有力地影响了有关晚期现代自我与社会之间关联的诸多争论。在拉康的学说中对于语言和沟通方面问题的强调,已经使得这股思潮对于社会科学中多种多样的社会理论话题都具有了高度的相关性。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在他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lthusser, 1971)中,试图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拉康的精神分析综合起来,以理解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刻画成这样一种话语,引导个人主体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自身和他人,能够支持统治阶级权力的再生产。他与拉康一样,也主张人们与其说是在制度的公共世界里体验社会形式,不如说是在想像界的幻想领域中体验这些形式。阿尔都塞写道:“以其必然的想像扭曲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并不都是既存的生产关系……而首先是个人与生产关系及其生发出来的其他关系之间的(想像)关系”(Althusser, 1971: 38—39)。从这个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提供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想像中心,将认同授予自我与他人,让个人感到在社会文化网络中有一定价值。

那么,支撑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又是哪些?阿尔都塞响应了拉康的观点,也主张意识形态是在镜射(mirroring)中并通过镜射来发挥功能的。就像拉康笔下站在自己镜像面前的那个孩子,意识形态的镜子也把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意义灌输到主体世界的核心中去。不过,就像在镜像阶段时那样,社会形式的构成也必然涉及到一种误识,因为意识形态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主体间性世界给理想化了,给扭曲了。通过“服从”有关阶级、种族、社会性别、民族主义等方面的意识形态话语,个体开始把自身误识为一种独立自主、自我立法的主体。想像性的误识是通过阿

阿尔都塞称之为“质询”（*interpellation*）的过程发生的。社会以意识形态为场所和渠道，“质询”作为一个“主体”的个人，既将认同授予那个社会位置，也让个人服从那个社会位置。阿尔都塞认为，意指过程和想像性误识之间的相互交织，就落实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上，包括学校、工会和大众传媒，其功能就在于确保个人服从以阶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不同的社会位置。人类主体的主体性实际上已经被去除了中心地位，但是，他们会趋于忽略这一性质，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这恰恰是意识形态的功能，也由此增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性权力的利益。

阿尔都塞提出的这套意识形态理论，内在地使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标志着刺激 20 世纪社会思想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它阐述了一系列有关个人领域与社会领域、想像生活与制度生活之间关系的观念。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想像性媒介，这一观点十分重要，也充满挑战，大大促使人们不再信任所谓意识形态都只是虚假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学说。阿尔都塞眼里的意识形态，就好像弗洛伊德眼里的无意识，都不随时代背景而转变。不过，现在学者们也广泛认为，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说法里也有许多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关于意识形态的镜射扭曲的观点，最终也陷入了与拉康关于想像界的说法一样的理论僵局。也就是说，如果要让一个人顺从地以意识形态话语为场所和渠道认识（误识）自身，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就必须已经具备了某些情感能力以作出主体性的回应。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投射、认同、表现、反思等方面的心理能力意味着，个人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肯定不像阿尔都塞的研究所称，是什么文化上严格控制的封闭的社会形式的“植入”。* 这方面的关键问题在于，阿尔都塞的理论所蕴含的文化支配观念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主体被严格地插入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关于阿尔都塞对拉康精神分析的误读，详细的讨论参见 Barrett, 1991 : 第五章; Elliott, 1992 : 第五章。）

但是，不管有着什么样的缺陷，阿尔都塞/拉康的模式也依然是当代社会理论中一个强有力的影响源。事实上，近来已经有学者从关于主体性、社会与文化的研究中一些新的研究兴趣出发，考察了阿尔都塞理论中的拉康学说成分。詹明信（Jameson, 1990 : 51 — 54）就主张回到阿尔都塞社会理论中的拉康学说基础，以便塑造他所说的后现代文化的“认知图景”。无独有偶，斯洛文尼亚的批评家日热克（Žižek, 1989, 1991）也改造了阿尔都塞的“质询”模式，试图以此刻画在传媒和电影之类文化形式中创造出来的幻想认同。

* 原文此处为“*implanation*”，疑为“*implantation*”之误。——译者注

5.5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判

在近年来精神分析社会理论最重要的一些观念进展中,有一些是来自女性主义者关于生理性别主体性与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争论。这些进展基本上关注的是这样一些探索:将精神分析运用到政治领域的话题上;导致妇女在现代文化中丧失性别特征和能动作用的那些心理力量;在婴儿的成长中父亲一方和母亲一方的力量之间的关系;性欲、身体及其快乐之间的关系。从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出发,女性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们力求扩大她们对于现代社会中两极化生理性别认同的理解,重新思考重构现存的社会性别权力形式的可能性。

晚近女性主义对于社会理论的这些介入,主要是受到两股精神分析研究思路的启发:一是拉康主义与后拉康主义的理论,二是对象关系性精神分析。第一种思路从更大范围内的男权制*社会符号结构的角度入手,对社会性别进行了解构;第二种思路将弗洛伊德和拉康对于符号结构或俄狄浦斯结构的强调倒转了过来,转而集中考察前俄狄浦斯阶段发展的过程以及主体间性的一些关系形式。现在我们就来考察女性主义的这两种思路。

5.5-1 拉康主义与后拉康主义女性主义理论

在今日的女性主义社会理论中,拉康主义的精神分析或许是最具影响力的潮流(有关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中后结构主义流派与对象关系性流派各自贡献的详细讨论,参看 Flax, 1990; Elliott, 1994)。前文已经指出,在拉康对于索绪尔语言学的阐发里,意义只能是从差异之中生成的。在语言的秩序中,一个能指是通过对其其他能指的排斥,才与一个所指之间建立起指涉关系的。而在男权制的文化里,被排斥的就是**女性特质**:妇女被否定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拉康因此主张,“妇女并不存在”,而这句话被许多人认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反对女性主义的立场。他将无意识与本质上属于男权制的语言组织形式和文化组织形式联系在一起,从反面界定了女性特质。妇女作为他者,作为外在于符号界的范畴:正是这种范畴使男性特质自我呈现为权力与权威。

* 考虑到概念的演变,我们在正面讨论女性主义的章节中,把“patriarchy”、“patriarchal”译为“男权制(的)”,泛指包括家长制、父权制等历史形式在内的一切男性支配形式。但在其他地方,尤其是现代女性主义兴起之前,为遵从习惯,我们仍保留“父权制”的狭义译法。——译者注

在这里,有必要简略考察一番拉康有关社会性别分化之主体性的学说中的一些核心特征。拉康与弗洛伊德一样,都认为阳具是生理性别差异的最佳标志。父亲和他的阳具粉碎了母婴之间带有乱伦意味的一体性关联,以此向婴儿指明了更广泛的文化网络。不过,与弗洛伊德相反,拉康主张从概念上完全切断阳具 (phallus) 与阴茎 (penis) 之间的任何关联。拉康指出,阳具是幻觉性、虚构性、想像性的。与其说它属于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不如说它的存在属于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能够引出次生权力,在这种权力中,欲望和权力、和全能 (omnipotence)、和整体 (wholeness) 融合在了一起。在拉康的理论里,阳具所保证的权力与母亲的领域直接维系在一起。根据他的说法,婴儿希望得到其母亲完全排他性的爱。然而,婴儿满怀痛苦地了解到,母亲的欲望被投放到了别处:投放到了阳具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得出这种发现的同时,婴儿也在语言中发现了自身,作为一个分离的主体。在这一点上,很有必要指出,拉康说的是两种生理性别都作为被阉割的东西而进入语言的符号界。婴儿与母体空间的分离被体验为一种摧毁性的丧失,*而这种丧失的痛楚正是阉割,从此,生理性别上的主体性开始与不在场和缺乏深深交织在一起。

因此,缺乏横跨了社会性别:男孩和女孩都会经历阉割。但是拉康也说,进入符号界,也就进入了男性特质的世界。在拉康看来,生理性别认同的确立是通过将可见的东西——也就是有没有阳具——确立为有特殊地位的东西。按照拉康的说法:“可以说,(阳具的)能指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是性交的职责中最能够被感触到的因素……它是一种生命流动的形象,因为它传宗接代。”(Lacan, 1977: 287)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特质处在语言、文化、理性和权力的外部。尽管如此,由于意义只是从差异之中生发出来的,所以拉康从社会性别学的角度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微妙的曲解。他指出,只有通过排斥女性特质,才能确保男人作为阳具权威的自我呈现。失位的女性特质使作为阳具权力的男性特质得以存在,不过也同时带有破坏后者的危险。在符号界的范围之内,女性特质既维持着现存的社会性别权力形式,同时又在暗中颠覆着这些权力形式。

对于自己理论的社会运用问题,拉康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这并不妨碍女性主义者批判性地利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来发展一种关于社会性别学的社会理论。在英语世界里,女性主义对于拉康观念的兴趣始作俑者是米切尔。她在《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一书 (Mitchell, 1974) 里,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思路来探究当代的社会性别体系。米切尔以拉康学说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发展了关于性政治的分析,

* 原文此处为 “adevastating loss”,疑为 “a devastating loss”之误。——译者注

强调是语言的符号界创造了生理性别的区分。在米切尔看来,基于社会性别的主体性必然维系着一种根本性的丧失:那就是母体的丧失。在这一点上,阳具作为“超验能指”,起到了一种想像性的加衬或建构的功用,掩盖了在生理性别差异的层面上人的主体的缺失。不过,根据米切尔的说法,这里的关键还在于,这些想像性的图景会将男人和女人定位在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中。男人被构成为一种自决、自主的能动者,而女人则被构成为缺乏的他者(lacking Other),构成为性的客体对象。尽管如此,米切尔还是用拉康的理论来反对其理论本身,探索了社会性别转化的可能性。她指出,尽管阳具可能代表进入符号界的渠道,但对于它这种想像性的客体对象,无论哪一种生理性别都不能永远确保。如果把阳具看作一种交互性的认同协商,那就不一定和男性支配联系在一起。因此,米切尔得出这样的结论:“进入文化的渠道除了意味着对于妇女交易的无意识,其他表达就得到非男权制的社会里去找了。”(Mitchell, 1974: 415)

米切尔关于社会性别的分析尽管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是,绝大多数评论者现在都一致认为,她的分析蕴含着严重的理论难题和政治困境。例如,它似乎假定性和社会性别的社会再生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事情,没有充分考虑分裂的主体性和无意识的东西所带有的种种矛盾与含混之处。这就牵扯到一些很重要的政治意涵。因为即使从符号的角度上来说,妇女在与男性特质的关系中,通过对欲望的某种压抑,被锁定在缺乏的他者位置上,但对于妇女为什么会感到不得不对当代的社会性别体系提出质疑或挑战,我们依然很不清楚。这一点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拉康对于女性特质的具体界定始终是从反面入手的,比如缺乏、他者、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这样的界定方式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有一些含混之处。一方面,拉康的学说已经成为一种颇具价值的理论资源,供女性主义者分析在男权话语和文化中如何将妇女视为被排斥的他者;另一方面,如果囿于拉康的思路,女性主义将不断面临一个问题:人的性的方方面面都被铭刻在能指之中,从而也就陷于律法而不能解脱。拉康将女性特质化约为他者性,等于是说妇女只能被界定成男性主体的影子,因此永远无法逃脱一种在社会性别方面严格分化的话语的支配。

尽管如此,晚近法国也出现一批女性主义者站在拉康的对立面上,致力于就女性的生理性别主体性提出一套新的见解,以期替代法国精神分析中的传统看法。这种重新评价女性特质的思路一般被称为后拉康主义女性主义,也有不少概念上的具体体现。大体说来,后拉康主义的女性主义诉诸一种肯定性的女性特质形象,这种形象强调了妇女的生理性别主体性的多重、多元维度。西苏讨论了女性力比多系统的节律、流动*和感受,并将其与男性主义对生殖器性欲的过度强调作对比。西

* flows, 亦指月经。——译者注

苏指出,女人有“能力无私地献出 (deappropriate), 她的身体没有边界, 没有附属, 没有基本的‘组成部分’……她的力比多无边无际, 正如她的无意识四处弥漫” (Cixous, 1976 : 95)。与此类似, 伊莉嘉瑞将女性特质定位在来自嘴唇、阴道、阴蒂、乳房等等区域的身体感受的复合上。与男性性欲的那种唯我独尊的阳具强制性相反, 妇女的性表达的能力与需求就寓于女性特质本身的复合与流动之中。按照伊莉嘉瑞对妇女的说法: “她的性欲事实上是多元的, 至少始终是双重的” (Irigaray, 1977 : 102)。

最后, 我们还在克里斯蒂娃的研究中, 发现了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的另一处交汇点。她深入阐述了关于一种独具女性特质的存在模式的观念, 这种存在模式改变了男权语言和文化的原有位置。在《诗学语言的革命》一书 (Kristeva, 1974) 中, 克里斯蒂娃对比了拉康的符号界——也就是父亲所体现的那个律法——与“符号域” (the semiotic) 中的多重力比多力量。符号域是前语言经验的领域, 包括婴儿在其与母亲的前俄狄浦斯关系中体验到的种种感觉、驱力和节律。根据克里斯蒂娃的说法, 我们对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的符号性渴求, 尽管受到被迫进入符号界的压抑, 但仍然体现在无意识范畴中, 不能从社会和文化中彻底隔离。克里斯蒂娃指出, 符号域就体现在言语的节律、失言 (slip) 与沉默之中, 是律法的颠覆因素, 因为它是基于与女性特质的一种前男权关联。不过, 克里斯蒂娃并不认为女性特质的符号域和社会性别之间有什么固有的关联, 因为它是源于前俄狄浦斯阶段, 因此先在于生理性别差异。所以, 即使说符号域是“女性特质”的, 这也是一种始终具有潜力被男人和女人共同利用来努力转变社会性别权力的女性特质。克里斯蒂娃把符号域看作是一种颠覆男性主导的符号界的手段。她认为马拉美、洛特里阿蒙和阿尔托等先锋派作者的作品清晰地表达了符号域, 藐视了男权语言。克里斯蒂娃还认为怀孕现象中存在着符号颠覆 (semiotic subversion)。她指出, 生育的心理体验再生产出“主体的分离过程的剧烈磨难: 身体的倍增, 自我与某个他者的分离与共存, 自然与意识的分离与共存, 生理与言语的分离与共存” (Kristeva, 1986 : 206)。

前面提到的各种女性主义理论代表了当代精神分析批评方面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它们比传统的拉康式说法更有助于清楚地说明, 性意识形态是通过哪些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 同时也探索了对于社会性别的一种女性主义转化都有哪些激进化的可能性。但是, 这些理论中也有某些假定需要予以质疑。首先, 在这些说法里, 与男性主导的律法相对立的, 要么是女人的身体, 要么是女人对语言的颠覆性关系。但有些女性主义者已经指出, 这种思路无非只是恢复了一种“女性本质”, 先在于生理性别主体性的建构, 因此也就存在一种危险, 即有可能通过一种非属本

意的生物学主义,反倒增强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区分(参见 Moi, 1985; Frosh, 1987; Flax, 1990; Elliott, 1992)。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点忧虑:这些理论要么通过替代精神分析关于生理性别差异的建构的说法(比如伊莉嘉瑞和西苏的理论),要么通过本质主义(比如克里斯蒂娃将符号域与母亲身份融合在一起),抹除了联系幻想与社会现实的中介因素。(有关这些方面的进一步讨论,参看 Benhabib and Cornell, 1987; Cornell, 1991。)

5.5-2 对象关系性女性主义理论

与拉康主义和后拉康主义的理论相反,近些年来有许多女性主义者转向了对象关系性精神分析,在美国尤其多见。拉康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生理性别差异和生理性别认同的构成取决于俄狄浦斯作用或符号过程;而有关早期婴儿发展的对象关系性研究则倾向于强调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发展对于自我构成过程的重要性。这类研究把焦点放在母婴对偶体中心理发展的最早期或最原初的阶段,并由此出发,从理论上阐述对于社会性别认同的核心认识。按照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说法,社会性别差异是受俄狄浦斯情结组织的;而精神分析中的对象关系性流派则与此不同,强调婴儿对于母体的前俄狄浦斯依恋和幻想,认为这种心理认同对于日后人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是婴儿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欲望对象,所以这种关系的实质就被视为塑造了孩子对于自我和社会性别的基本认识。克莱因、温尼科特、费尔贝恩和巴林特等学者的精神分析研究在这派思想里占有核心地位。我们将会看到,处在社会理论、心理学和哲学的交织点上的女性主义者已经卓有成效地借鉴了这种概括自我、他人、性、社会性别和欲望的思路。

从社会学的角度运用对象关系性理论的尝试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或许要算是女性主义者乔多萝在《育儿的再生产》(Chodorow, 1978)中的论述了。在这本书里,乔多萝着手分析了排他性的女性育儿的社会学意涵与政治意涵。她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社会学错误理解了对压迫性的性角色的再生产,因为它没有任何手段来处理男权社会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心理动力交流。为了矫正这一点,乔多萝主张,必须运用一些基本的社会学范畴和精神分析范畴来分析男性主导的社会性别作用机制,尤其是女儿和儿子与母亲之间的心理关系模式。在乔多萝看来,从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人际交流中,出现了一种独具女性特质的人格结构形式。而对于女性的自尊感和自主感来说,这种人格结构形式是有害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她如此说道:





一位母亲很容易体验到与其婴儿之间的同一感、连续感。但她和女儿之间的这种感觉会更加坚固、更加持久。与女儿之间的原初认同和共生关系往往会更加坚固,在女儿身上的欲力投入 (cathexis) 也更有可能是保持并突出自恋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更有可能建立在这样一种体验的基础上:女儿是母亲本人的一种延伸或复制。而对于女儿的欲力投入中视女儿为一种生理性别意义上的他者,这样的主题常常就比较脆弱,意义不那么重大。

由于女婴及其母亲之间这种强烈的前俄狄浦斯融合,女儿们发展出了感受性、同情性和亲密性方面强大的情感能力。尽管如此,这一类的关系性成就也须付出严峻的代价。这是因为,母亲并不认为自己女儿是和自身相分离的,而是自己的心理延伸,所以女孩们也就不能实现一种独立的自我感和能动性。

与此相反,乔多萝明确指出,男孩则会发展出一种更强烈的自我感和社会性别认同感,这主要是通过拒斥了他们起初与母亲之间的那种亲近状态。他们开始学会以一种比女孩确定得多、对立得多的方式,脱离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乔多萝说,男孩必须否认自己对于母体的原初依恋,永远地把自己的女性特质压抑到无意识当中去。但悖谬的是,正是母亲开启并鼓动了这种心理压抑。乔多萝认为,母亲把自己的儿子推向分化和个体化,因为她们把自己的儿子看作是他者,和自己不一样。就这样,母亲使自己的儿子在感情上脱离了自己。男孩们发展出一些更具工具性或分析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这就创造出了男性主导的公共生活框架里期待男人具备的核心社会性别认同,尽管它会给男人的私人生活带来相当的压力和张力,即便这仅仅是出于向他人表达他们的情感时的那些困难。

乔多萝在自己的女性主义社会学中对于对象关系性理论的运用,已经遭到一些评论者的尖锐批评。比如塞加尔 (Segal, 1987) 就认为,乔多萝忽视了妇女在当今时代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中面临的诸般心理情结。她指出,女人(还有男人)在其情感构成上的复杂多样、彼此分隔的程度,远甚于与此相对的乔多萝关于核心社会性别认同的建构中的意味。其他一些学者也指出,乔多萝尽管借鉴了精神分析理论,但却没有缓解无意识为了有助于“社会性别植入”,而对基于社会性别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分裂效应 (Rose, 1975)。据称,无意识的欲望和幻想,使任何“核心认同”的获得都陷于错位和分裂。

这些批评意见尽管十分重要,但并无损于乔多萝观点的社会学意义。她对于社会性别发展的讲法非常详尽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许多男人感到没有办法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对于女人和育儿之间的关系,也比主流社会学的讲法考

虑得复杂一些。乔多萝在自己书的结尾以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作结:改造现行社会性别体系的最佳办法,就是通过男女共同承担养育职责。在女性主义者的圈子里,这个建议已经成为众多争论的主题。美国批判理论家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本杰明也已经指出 (Benjamin, 1988, 1998),单凭分担养育职责本身,不太可能改造男权社会里文化上对于妇女价值的贬低。她敏锐地注意到了更广泛层面上社会结构的符号影响,认为生理性别差异中的种种对抗与互补——主体与客体、积极与被动、知识主体与知识对象——需要保持其张力,以便重新塑造压迫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在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心理中的铭刻。包括弗拉克斯 (Flax, 1990)和斯普伦内特 (Sprengnether, 1990)在内的其他女性主义者,也同样借鉴了对象关系性精神分析,来强调思维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主体间性维度,尤其集中考察对社会性别两极对立的局面进行重塑时,在情感和沟通的方面具有哪些可能性。

5.6 当代精神分析社会理论中的一些理论争端

5.6-1 后现代精神分析

在后现代精神分析中,人的主体不仅是被去中心化了,而且是被去主体化了。这就意味着,主体性的观念本身已经从根本上被解构了,至少在其更加彻底的形式里是这样。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主体”这个词只不过是在理论的层面上,用简略的表达指定人的经验中那些复杂多样、充满矛盾的要素。与主体性的原则截然相反,后现代精神分析强调的是力比多享受方面流动的、多重的轨迹。后现代对于人的社会经验中多维的、分裂的特征大加礼赞,其核心要素便是欲望的不确定性、重复、死本能、身体区域和激情 (intensities)。

大体说来,后现代精神分析的宗旨就在于重新思考欲望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期望能够就此开拓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拉康的精神分析已经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尖锐的批评,认为它在政治上带有反动的意味。德勒兹与瓜达里在他们杰出的后现代著作《反俄狄浦斯》(Deleuze and Guattari, 1977)中指出,拉康关于欲望的讲法有助于压抑,因为它将个人与社会秩序束缚在一起。他们提出,无论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还是拉康式的精神分析,都起到了将欲望个人化的功用,将所有的无意识生产都诉诸核心家庭中带有乱伦意味的性的领域。与此相反,德勒兹和瓜达里力图反对这种精神分析的评价,不将无意识欲望说成是律法的产物。他们所主张的不是对欲望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而是一种绝对实证性的无意识生产,以精神分裂症作为他们的范例。

德勒兹和瓜达里提议颂扬精神分裂式欲望中流动的、多重的激情,用这些激情来抗衡律法的压抑性功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分裂式的欲望增生很有价值,因为它们被视为具有内在的颠覆性、越界性和分裂性。他们拒绝接受俄狄浦斯和资本主义的那些刻板、封闭的世界,希望提倡精神分裂症而不是神经官能症,欲望流而不是缺乏,分裂而不是总体性,差异而不是一致性。他们写道:“精神分裂症是在社会生产的限度之内的欲望生产”(Deleuze and Guattari, 1977: 35)。在资本主义话语的俄狄浦斯化逻辑下,欲望被纳入预先限定的通路,针对这种逻辑,德勒兹和瓜达里主张,精神分裂欲望的非个人化流动可以预示社会的某种激进转型。

而在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早期著作里,也采纳了与此类似的一些理论方向,指出政治社会本身就带有隐秘的力比多性质。德勒兹和瓜达里认为,欲望是以资本主义为场所和渠道被整理和压抑的;但在利奥塔看来,当代社会却是一个巨大的欲望系统。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描述成一个由各种技术组成的巨大的力比多环路,一种充满了引诱性的记号与形象的文化。从政治上来说,这里面的要旨就在于这样一系列主张:如何才能最好地从后现代文化中抽取力比多快乐和激情。利奥塔写道:“有意思的应当是一方面停留在我们现在呆的地方,同时又把握住一切机会,发挥作为激情的优良导体的功能。”(Lyotard, 1974: 311)

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德勒兹和瓜达里的研究以及利奥塔的研究,都强调了当代的体验是分裂、错位和多价(polyvalence)的体验。由此观之,所谓可以把社会转型和释解隐藏的意义或话语联系起来信念(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的精神分析社会理论都有这样的意味),似乎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相反,后现代精神分析里的真理则在于力比多激情本身的直觉性里。无意识是不能被驯服或组织的。欲望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它就是它自身。不仅如此,正是在欲望的弥散、反常和精神分裂式的显现当中,可以发现一些新式的认同、他者性、幻想和符号体系。

后现代精神分析所提出来的这些话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参照诸如全球化和新的沟通技术之类当代社会转型来看时就更是如此。不过话说回来,这些理论是不是为社会实践、政治或价值定位提供了什么评价标准,还不是很清楚。正如迪尤斯(Dews, 1987)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精神分析的许多流派所竭力主张的对力比多激情的掩饰(dissimulation),无论是进步的政治力量还是保守的政治力量,都会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安排。重要的是,那种认为欲望事实上是反叛性、颠覆性的观点,是基于一种幼稚的自然主义的前提,未能考察无意识情感根植在其中的那些社会、文化和政治形式(参看Frank, 1984)。更有甚者,对于分裂与流动的心理状态会涉及的潜在危害、痛苦和破坏,几乎也未作考虑。

5.6-2 精神分析社会理论中的一些新趋向

目前,弗洛伊德的理论传统在关于主体性与社会行动的研究方面正在经历一场令人瞩目的复兴。已经发展出好几股新的研究思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框架上进行重新界定,概念上予以重新阐述,为社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添了一分力。社会理论家当中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的这场复兴,始作俑者正是卡斯托里亚迪的杰作《社会的想像性制度》(Castoriadis, 1987)。这部著作分析了人类的创造产物都是通过哪些心理形式、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浮现在主体性和历史之中。为此,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 1984, 1987, 1991)提出了**激进想像界**(the radical imaginary)的概念,指的是由种种表现、驱力和情感组成的一套纯粹原创性的基本结构,自我和社会就是通过这套结构得以构成和再生产。激进想像界在影响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时候,是一股边界开放的意指流,它的无意识内核富于生产潜力,使人类主体有可能创造和更新社会。

根据卡斯托里亚迪的说法,在社会理论和精神分析中,已经对社会生活的想像性维度作了化约性的理解,常常把这些维度塑造成差不多只是对外在世界的单纯“反映”或“复制”。在卡斯托里亚迪看来,拉康的想像界就是一个绝佳例证。在拉康的理论里,小孩从镜子里接受了一种映像,而这是一种**扭曲了自我构成的映像**。与拉康不同,卡斯托里亚迪主张“想像并不来自于镜中的形象或他人的目光;相反,‘镜子’本身及其可能性以及作为镜子的他者,都是想像的产物”(Castoriadis, 1987: 3)。他认为,心理的想像是无中生有的创造。想像界的特征就是纯粹的创造,就是作为自我生产的各种形象、表现与幻想的塑造与重塑。表现性的心理领域为社会日常生活的延续性提供了原材料,还和公共制度的结构化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也就在全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的突显过程中居于核心位置。不过,卡斯托里亚迪也非常小心地避免任何形式的精神分析还原论。他就此详细谈道(Castoriadis, 1997: 376):

心理范畴和社会历史范畴是不能相互化约的。你不能用心理的东西来造出社会(除非你已经偷偷地将后者引入了前者,比如说通过语言的形式)。无意识范畴产生出来的只是幻象而不是制度。同样,你也不能基于社会范畴来产生某种属于心理范畴的东西——甚至这种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都不清楚——不能完全将心理范畴重新吸收到*社会范畴中去,即使是原始社会或一九

* 原文此处为“reabsorb”,应系“reabsorb”之误。——译者注

八四式的社会也不行：人们始终会去做梦，始终会抱有逾越社会规范的欲望。

因此，在卡斯托里亚迪看来，心理范畴与社会范畴的存在是一种让人迷惑的含混、张力、错位的状态。

由于卡斯托里亚迪的著作，在社会理论的一些流派里出现了一种共识，认为拉康的核心观念中有许多（涉及到想像界以及语言在心理范畴的建构中的地位）在概念上走入了死胡同。例如，怀特布克在他的《反常与乌托邦》一书中，尝试发展一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说更具反思性的社会理论。他追随卡斯托里亚迪的路数，充分承认社会行动者的心理创造力，承认他们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基于这种认识来发展自己的分析。怀特布克写道，拉康关于自我的自恋式起源的说法，问题就在于它将“那些病态的、僵化的自我形成之形式与自我本身”混为一谈（Whitebook, 1995: 14）。而怀特布克所勾画的替代说法则是认为，在自我与无意识表现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自治（autonomy）与他治（heteronomy）之间，存在着复杂难缠、充满矛盾的关系。怀特布克认为，弗洛伊德的治疗原则不仅要求动机的无意识源泉成为自觉意识的自我反思的对象，而且要求诸如此类的驱力在主体的生活乃至整个的社会中都能找到充分的表达。归根结底，怀特布克希望伸张激情与情感，要想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余波中重新思考主体，这些主观源泉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激情完完全全是政治性的；或者，不管怎么说，对于任何旨在重构政治制度领域的坚定努力来讲，政治无意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怀特布克如此嘲讽哈贝马斯的自治概念：“形式程序的制度化无论有多么基本，如果缺乏推行这些程序的情感认同和政治意志，也就微不足道了。事实上，大屠杀仅仅过去 50 年，启蒙后的欧洲就能够再一次容忍在自己的大陆上发生种族灭绝；这不得不使人停下来，怀疑它究竟有多大的决心”（Whitebook, 1995: 11）。政治似乎就像性一样，也始终面临两种危险：要么在情感上过于投入，要么是投入不足。而关于社会的反思性批判理论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警惕大范围的政治背景中出现诸如此类的无意识想像。

但是，如果说无意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令人担忧，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我与社会的联姻之间暂时出现了某种令人感到无力的隔阂。怀特布克指出，一种激进的政治要求始终会从现实原则的逻辑之外挖掘某些东西；幻想作为人的心理生活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属性，无非是一种“反常的核心”，始终濒临彻底的自我破坏、错位与断裂，哪怕只是因为欲望的自我构成是多重的、不连续的、没有限定界限的。在这一点上，怀特布克响应了马尔库塞的主张，也认为反常的冲动与乌托邦的

冲动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他借鉴了沙瑟盖—斯米格尔与麦独孤的精神分析作品,认为如果要探索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理想与实际之间的种种差距,研究各种反常现象会带来不少启发。过时的与理想的,过去的与未来的,幼稚的与乌托邦的,这些范畴之间并不是一种非连续性的关联,而是一种相互关联,始终在现存政治系统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讲,这就意味着所谓可取的东西也就是原则上可以在实际存在中探察到的东西。或许可以公允地说,这样一种解释步骤包含着某种侦查(这里是把弗洛伊德理解成福尔摩斯),最好是理解成将性的矛盾、符号的矛盾折回当代政治逻辑中去。因此,具体说来,精神分析并不只是某种确立了的妄想,而是一种尝试,要严肃地对待激进的想像力,探问什么类型的替代性未来选择会成为现实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方面之间的清晰对应:一方面是精神分析对于激进想像力的这样一种采用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一直致力于发展的对于政治无意识的重新塑造。

我自己写的《变迁中的社会理论与精神分析》(Elliott, 1992; 第二版 1999),以及它更加通俗的版本《精神分析理论引介》(Elliott, 1994),广泛借鉴了卡斯托里亚迪对拉康社会理论中困境的批判,力图根据激进想像力和幻想创造力的命题,就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展一种新颖的阐述。我已经指出,想像性的心理领域既是构成人类行动和实践的源泉,同时也是无意识压抑运作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分析的社会理论研究的是人类主体在日常生活的结构化过程中,以哪些方式产生并再生产出想像性表现和符号性表现。诸如此类的表现形式会改变、颠覆或增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就权力的组织来说,这些关系都不是均衡的。我在《精神分析理论引介》之后写的东西,尤其是我的《服从自身》(Subject to Ourselves),力图刻画出从弗洛伊德到拉康再到福柯的谱系,将对象关系性精神分析、新拉康主义精神分析与后克莱因主义(post-Kleinian)精神分析一起纳入一种更具反思性的与批判性社会理论的遭遇之中。

因此,正是这种对于激进想像力和人的创造力的强调,有助于区分拉康取向的社会理论与晚近的一批社会理论方案。在一般性理论建构之外,社会理论家还在其他几块发展领域里奋力耕耘,探索具有文化特定性和历史特定性的精神分析理论主张,同时用后弗洛伊德的理论发展来支撑对于社会文化实践的分析。精神分析社会理论所作出的贡献,尤其显著地体现在认同政治、种族歧视、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领域里,以及有关生理性别差异、男性特质以及同性恋等话题的争论当中(参看 Rustin, 1991; Frosh, 1994, 1997; Elliott and Frosh, 1995)。这项工作体现在一系列的精神分析立场当中(从新拉



康主义的观点到新克莱因主义的观点), 丰富多样, 也十分复杂, 难以在此详论。不过, 从这类工作中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对精神分析的重塑愈益深化, 以期更进一步地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精神分析关于“他者性”和“陌生性”的观念已经产生了许多启发, 使我们更丰富地理解了认同、自我、共同体、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范畴的灵活性 (参看 Kristeva, 1991)。

所有这些研究思路的共同之处, 就在于力图将想像力、能动作用和创造力结合到更具一般性的关于制度和文化的社会理论中, 恢复它们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分析力。在理论思考的现有发展阶段, 需要有一种全面的努力, 逐一刻画当代精神分析各思想流派中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等维度。由此观之, 正如我已经在别处指出的那样, 在这个世纪里已经出现的精神分析社会理论是那样的纷繁多样 (例如对象关系性理论, 拉康主义理论, 女性主义批评, 后现代精神分析, 等等), 可以理解为通过丰富多彩的尝试, 全面地把握当代的历史、政治与文化 (Elliott, 1994)。这是因为, 精神分析既体现出人的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创造性角色, 同时也扮演了这种角色, 对于社会理论以及它未来的发展, 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Althusser, L. 1971 (1984):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 Barrett, M. 1991: *The Politics of Trut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nhabib, S. and Cornell, D. (eds.) 1987: *Feminism as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njamin, J. 1977: The end of internalization: Adorno's social psychology. *Telos*, 32.
- 1988: *The Bonds of Lo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 New York: Pantheon.
- 1990: *The Bonds of Love*. London: Virago.
- 1998: *Shadow of the Other*. New York: Routledge.
- Brenkman, J. 1987: *Culture and Domin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astoriadis, C. 1984: *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87: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1: *Philosophy, Politics, Aut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odorow, N.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9: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ixous, H. 1976 (1981):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In E. Marks and I. de Courtivon (eds.) *New French Feminisms*. Sussex: Harvester Press.
- Cornell, D. 1991: *Beyond Accommod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1977: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New York: Viking.
- Dews, P. 1987: *Logics of Disintegration*. London: Verso.
- Elliott, A. 1999 (1992): *Social Theory and Psychoanalysis in Transition: Self and Society from Freud to Kristeva*. 2nd edn.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1993: The self-destructive subject. *Free Associations*, 3(4), 504 — 544.
- 1994: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 Elliott, A. and Frosh, S. (eds.) 1995: *Psychoanalysis in Contexts: Paths between Theory and Moder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Flax, J. 1990: *Thinking Fragments: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ank, M. 1984 (1989): *What is Neostructur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reud, S. 1914: The unconscious. In Freud (1935 — 1974), Vol. XIV, 159 — 215.
- 1923: *The Ego and the Id*. In *ibid.*, Vol. XIX, 1 — 66.
- 1935 — 1974: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Hogarth Press.
- 1940: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In *ibid.*, Vol. XXIII, 141 — 207.
- Fromm, E. 1932 (1982): The method and function of an analytic social psychology. In A. Arato and 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Continuum.
- 1956 (1991): *The Sane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Frosh, S. 1987: *The Politics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 1991: *Identity Crisis: Modernity,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elf*. London: Macmillan.
- 1994: *Sexual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1997: *For and Against Psychoanalysis*. London: New York.
- Gay, P. 1988: *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London: Dent.
- Habermas, J. 1972: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London: Heinemann.



- Held, D. 1980: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Hutchinson.
- Irigaray, L. 1977 (1981): Ce sexe qui n'est pas un. In E. Marks and I. de Courtivon (eds.) *New French Feminisms*. Sussex: Harvester Press.
- Jacoby, R. 1975: *Social Amnesia*. Sussex: Harvester Press.
- Jameson, F. 1990: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Jay, M. 1973: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Kristeva, J. 1974 (1984):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 Moi. Oxford: Blackwell.
- 1991: *Strangers to Ourselves*. London: Harvester.
- Lacan, J. 1966: *Ecrits*. Paris: Seuil.
- 1975 (1988):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1953 — 19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7: *E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 Laplanche, J. 1987: *New Foundations for Psycho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 Laplanche, J. and Pontalis, J. B. 1973 (1986):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Hogarth Press.
- Leupin, A. (ed.) 1991: *Lacan and the Human Science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Liotard, J.-F. 1974: *Economie libidinale*. Paris: Seuil.
- Marcuse, H. 1956 (1987): *Eros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Ark.
- 1970: *Five Lectures: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Utopia*. London: Allen Lane.
- Mitchell, J. 1974: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oi, T. 1985: *Sexual/Textu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Ragland-Sullivan, E. 1986: *Jacques Lacan and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agland-Sullivan, E. and Bracher, M. (eds.) 1991: *Lacan and the Subject of Language*. New York: Routledge.
- Ricoeur, P. 1970: *Freud and Philosophy: An Essay o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ieff, P. 1959 (1979):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 Chicago Press.
- Rose, J. 1985: *Sexuality in the Field of Vision*. London: Verso.
- Rustin, M. 1991: *The Good Society and the Inner World: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Culture*. London: Verso.
- Segal, L. 1987: *Is the Future Female? Troubled 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Feminism*. London: Virago.
- Sprengnether, M. 1990: *The Spectral Mother: Freud,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hitebook, J. 1989: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monadic core of the psyche: Habermas and Castoriadis on the unconscious.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XXVII, 226 — 245.
- 1995: *Perversion and Utopi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Žižek, S.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 1991: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深入阅读文献

- Castoriadis, C. 1997: *The Castoriadis Reader*. Ed. D. Curtis. Oxford: Blackwell.
- Chodorow, N. 1994: *Femininities,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Elliott, A. (ed.) 1998: *Freud 2000*.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Derrida, J. 1998: *Resistances of Psychoanalysi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rrester, J. 1990: *The Sedu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Freud, Lacan and Derrid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gden, T. 1994: *Subjects of Analysis*. Northvale, NJ: Aronson.
- Pile, S. 1997: *The Body and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 Prager, J. 1998: *Presenting the Past: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Misremember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 J. 1994: *Why War?* Oxford: Blackwell.





第⑥章 结构主义



R. 博伊恩

博伊恩 (Roy Boyne) 是达勒姆 (Durham) 大学社会学教授, 教授有关风险、监控、当代电影等方面的课程。他于 1981 年完成自己讨论福柯与德里达作品的博士论文, 此后发表了关于这些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著作。近些年来, 他一直在研究社会科学、当代艺术以及电影中的主体性问题。他已经在《人文学科史》、《文化价值》、*Angelaki* * 和《身体与社会》之类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有关该主题的论文。

- 6.1 引介
- 6.2 人类学的谱系
- 6.3 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
- 6.4 拉康学派
- 6.5 后结构主义

* Routledge 出版社 1993 年创刊的新锐杂志, 以多学科理论研究传统人文学科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趋势为导向。——译者注

6.1 引介

1869年,门捷列夫和梅耶各自独立地探索出了详细的元素周期表。门捷列夫基于自己关于电子结构布局的理论的分析,借鉴了达尔顿的原子量观念,主张只可能有92种天然存在的化学元素。那些元素中大部分当时还不为世人所知,但在周期表上已经为它们预留了空位。因此,周期表就成了一种理论机器,从中可以生发出对于经验世界中数目固定的客观可能性的种种表述。在经验世界里,由结构所表现的理论可能性将会有具体的实际体现,而它们的客观化具体表现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作是来源于或生成于这种结构。在周期表这个例子里,所有元素的实例在1869年都只是在理论上而不是经验上为人所了解,不过从那时开始业已确立(这种结构模型设计的实例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不过倒也富含成果,体现在周期表自那以来已经扩展到所包括的元素最大原子序数达118,其中在序数111号元素ununium*之后的最末几种元素尚待合成)。

周期表的模型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核心范式。在关于人的各门科学中,人类学和语言学几近照搬这样的范式。人的科学里的结构主义也被吸收进了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形式,文化哲学,以及比较文学批评,但在这种吸收的过程中,周期表模型的根本假设也有所演变,最终随着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兴起而被超越。

6.2 人类学的谱系

结构主义在社会理论当中的发展历史是从斯宾塞与涂尔干的作品开始的。如果要有一人声称是原创者,那或许是斯宾塞,他对社会结构的思考可以在以下这段写于1876年的话里看出来:

在社会里,与在生命体中一样,体积的扩大通常会伴随着结构的生长。相伴而来的是进化的首要特征,即整合,同时还有体现在更高程度上的次要特征,即分化……当我们从小群体进到较大的群体,从简单的群体进到复合的群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就会增加。社会集合在规模微小时是同质性的,而伴随着每一点增长,通常也会获得异质性;要达到巨大的规模,

* 1994年于德国合成,原子量272,尚未有正式中文名。——译者注



就必然获得巨大的复杂性。（Andreski, 1971: 126—127）

这段话的核心观念便是**整合与分化**。前者指的是整体各个分离部分之间的内在合作。至于这个“整体”是一只哺乳动物还是一个社会,这并不重要。对于斯宾塞来讲,结构整合的原则才是至关重要的。分化指的是整体内部的分工:整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不同的专门工作要去做,有不同的专门**功能**要去履行。斯宾塞认为,规模的增加就会带来整体内部分化的增长。^[1]如果我们像斯宾塞那样,拿早先的铁匠与19世纪末复杂的制铁业相比:前者不仅制造基本的工具,还炼自己所需的铁;而在后者那里,各式各样的熔、炼、搅、轧和设备修造,在每一样的基础上都能形成各自分离的组织。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斯宾塞想必已经看到的,结构的规模与分化之间的关联是多么的明显。

斯宾塞在把握结构的发展时,其潜在的根本假设可以大致看作本质上属于功能主义。一个有机体,不管是一只狒狒还是一座装瓶厂,其中所有的组成部分在正常情况下都可以看作是在执行一种正功能,对整体起到了重大的贡献。斯宾塞1852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动物繁殖普遍法则所推出之人口理论”,其中十分明确地从理论上概括了发展的原因,而不是描述发展的过程。在谈到人口压力时,有如下言论:

它产生了人类的最初扩散。它迫使人们放弃猎食的习性,开始农作。它导致了对地表的清理。它强使人们进入社会状态,使社会组织成为不可避免之选择,并且发展出了社会情感。它激励人们日益提高生产,增进技能和智力。它天天都在迫使我们发生更密切的接触,进入更为相互依赖的关系。（转引自 Corning, 1982: 362）

我们将会发现,诸如此类思辨性的关于结构发展的因果分析,会在涂尔干的作品里再一次出现。斯宾塞对早期的涂尔干影响重大。

涂尔干挑明了在斯宾塞的社会学里还只是隐含的东西,即关于结构的功能分析与因果分析之间的区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Durkheim, 1895）里明确阐述了其间的差异:

说明一个事实有何效用,并不等于说明这个事实是怎样产生的和为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因为事实产生的效用虽然要以事实的特有属性为前提,但效用本身并不能产生事实。我们对事物的需求并不能使它们具备某种特定的

属性；因此，需求并不能从无到有地产生事物……每一事实都是一种力量，支配着个体的力量，有它自身的性质。要使一桩事实存在，仅仅靠希图孕育出它的欲望或意愿是不够的。此前必须存在一些其他的力量，有能力产生这种得以牢固确立的力量……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事实……如果想要说明一项社会现象，就必须分别考察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和它所履行的功能。（Durkheim，1895[1982：119—123]）

或许不太明显的是，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从范式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结构。不管怎么说，当他将社会事实界定为外在于个体的东西，约束着个体，并且多少是普遍渗透在整个社会当中时，他的核心所指即是社会的结构基础。从他对社会形态学的理解当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用时下的术语来讲，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包括：它的人口规模，它的地理区域，以及它形形色色的社会互动的程度，这些都被看作是外在的、约束性的和普遍的。在涂尔干看来，这些都是独立的变量，是核心的因果性结构特征，它们在各个社会之间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说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相互依赖的种种分化形式，何以会在各个社会之间有所变异。正如涂尔干所言：“将社会环境看作集体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念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拒绝这种观念，那么社会学就无法确立任何因果关联”（转引自 Andrews，1993：119）。

概而言之，在迫近世纪之交时写作的涂尔干看来，结构的“事实”是说明社会生活之个别现象的关键。不过大致可以肯定地说，涂尔干很快便认识到，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实在太粗陋、太笼统了。从他的思考中演化出两条发展路线，其中一条力求阐明社会形态学的诸项任务，但相比而言成效甚微。^[2] 它仅仅是导致了纲领性的诉求，要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类型和亚类型作百科全书式的探讨。而另一条发展路线成效就要大得多，关注的是集体信念的结构。由此，过去那种粗陋的主张，即粗略的社会结构与具体社会行动的实际类型之间的直接关联，让位于寻求理解集体良知的中介体现。但要等到论述宗教的著作，才能找到有关这种理解的主要陈述。

1899年，涂尔干提出，宗教是“一种多少组织化了的现象组合，（包括）种种义务性信念，通过与信念中给定的客体对象相关联的确定仪轨而联系在一起”（转引自 Lukes，1973：241）。这种界定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不充分的。组织的原则未经确立。而对于这种义务的源泉与性质的探讨也不充分。最后，宗教的性质被简括为义务、信念与仪轨之间的和谐，令人难以信服。尽管如此，当他在自己设定的结构的三个环节咬合之处勾勒出宗教时，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是一位结构主义者

在进行这样的思考。对于 1899 年的涂尔干来讲,将这三个环节中的一个从结构中除去,所得的结果便不是宗教了。而到了 1912 年,也就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出版之时,从义务来界定宗教的做法就已经为从神圣的东西来界定宗教所取代了。研究的焦点从自发地履行宗教职责,转向由某种制度性基础结构支持并受约制保证的要求,在预先规定形式的仪式中向社会表示效忠,随着这种转移,对于社会结合的维持的说明也就更强有力了。他对宗教的界定此时的说服力已经大大增强:

宗教是由种种特定的信念和仪轨所组成的一套统一体系,它们都关系到神圣之事物,也就是那些与众不同、受到禁止的事物。这些信念与仪轨统一为一个单一的道德共同体,称为教会,其中的所有人都遵从这些信念与仪轨。
(Durkheim, 1912[1915: 47])

宗教现在被看作以将整个世界两分为神圣世界与凡俗世界为其典型特征。而这种结构划分两边的信念与仪轨,都受到同一个道德共同体的支撑。教会作为宗教领域的道德共同体,维持了宗教生活的结构一体性。涂尔干毕生忧心不已的是,没有一种机构或一套机构,能够有效地支撑凡俗文化的结构一体性。从结构的角度上来说,他认为将一系列市民制度和职业制度置于国家与个体家庭之间,能够有助于提供他认为缺乏的那种支撑。尽管如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们对事物的需求并不能使它们具备某种特定的属性;因此,需求并不能从无到有地产生事物,以这种方式赋予其存在”(Durkheim, 1895[1982: 120])。

涂尔干的结构主义不应被忽视。尽管他一开始处在斯宾塞有机论思想的影响之下,但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阐明了有关社会结构的两种主要研究思路,即功能的思路与因果的思路,并且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解,就是结构与主体/客体之间的中介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规。实际上,他在论述宗教的作品里,开始逐步体会到,中介性的事例本身就必须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结构来考察,并且,社会结构需要维持的机制。他始终抱定自己的反主体主义立场(在这一点上他与斯宾塞不同,后者认为个体是一个核心参照点,既作为处在一个发展中的系统结构里的分析单元,也作为意识的一种来源),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确定了结构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最后,他在晚期认识到,神圣客体的实际身份无关紧要,从而打破了客体与结构之间的循环,虽说他表面上还在努力刻画这种循环。鉴于神圣客体和仪轨与凡俗文化之间的关联才是关键性的关联,因此可以理解,在同一个结构里,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置换。我们现在不妨继续来讨论结构人类学,首先从英国传统的结构人类学入手。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这两人的作品打造起了人们所称的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反击了19世纪的进化主义与历史主义。马林诺夫斯基几乎是凭一己之力而创造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践惯例。他对异文化进行了精心的观察,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逐渐熟悉构成异文化的个人的普通日常行为和间或出现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通过这些观察的勾画形成对于所考察的社会系统的理解,这样得来的理解纵然错综复杂,却具有相当确定的结构。以下便是他的实例之一,你将会从中看到,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想法里,各个层面是如何与下一个层面相关联,形成以整体观之的社会的总体结构:

即使是像性这样的一项主题,也只有在这它的制度背景当中,通过它在文化的其他方面的种种显现,才能予以探讨。爱情,性接近,性欲,再加上爱情巫术和爱情神话,这些只不过是特洛布里恩群岛上示爱习俗的一部分而已。同样,示爱也只是一个阶段,是通向婚姻的一个预备阶段,而婚姻又只是家庭生活的一面。家庭本身又会衍化成氏族……这个系统会控制部落民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支配他们的经济,渗透他们的巫术与神话,进入他们的宗教,甚至进入他们的艺术生产。(Malinowski, 1932: xx)

如果把马林诺夫斯基说成是一位结构主义者,并不会有多少特别的帮助。他感兴趣的是具体的社会实践意味着什么,只是为了回答他的问题,他不得不将社会看作是由彼此关联的现象所组成的系统。无论如何,他对系统之间的比较并不怎么感兴趣(也有例外,他的一些信函明确表明,他想要追问“什么是我们身上最根本的东西?”,从而间接导出比较),也不很关注从概念上把弄结构,看看可以挖出什么意味来。整体而言,他的研究思路属于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的一类,其理论预设使他能够理解和描述那些异文化的生活世界。不过,要说到我们现在认为与马林诺夫斯基比肩而立,同为社会人类学创建者的那位拉德克利夫—布朗,可就有不同的说法了。

拉德克利夫—布朗进一步推进了涂尔干在确定和探讨社会结构时对于科学方法的信守。他不满足于与此前各种社会有机论维系在一起的那些生物学比喻,而坚持一种更具康德色彩的立场,因为他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涉及到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1935年,他在谈到动物有机体时如此写道(Radcliffe-Brown, 1952: 179):

它的组成细胞并不会历经时日而一成不变。但各个组成单元之间的结构安排却依然如故。有机体的结构延续性赖以维持的过程,就叫做生命……



按照此处所使用的功能这个词的意思,一个有机体的生命就可以理解为其结构发挥功能的过程。

因此,对于拉德克利夫—布朗来说,社会生活就是其结构发挥功能的过程。“结构”这个词作为复数出现,因为就动物有机体而言结构大多可以看出来,而就社会而言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所谓只有一种普遍结构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这便使得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1)都有哪些种类的社会结构?(2)这些社会结构是如何发挥功能的?(3)新型的社会结构是怎样开始形成的?第一个问题将我们带到分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使人们觉得有必要从概念上理解社会学的生命类比(试看:“一个有机体的生命就可以理解为其结构发挥功能的过程。”)。而第三个问题则把我们引向社会变迁。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虽说这些问题比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更为抽象,也更具一般性,但我们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于结构和(多个)客体之间的循环当中,更有甚者,还依然是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抽象层次上进行思考。对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这三个问题,不是通过理论概括来作出回答,而将通过田野工作和观察来找到答案。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所需要的就是“对类型繁多的社会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同时对尽可能多的单一社会进行深度研究”(Radcliffe-Brown, 1952: 184)。

在这方面,并没有显露出任何突出的结构主义方法。拉德克利夫—布朗有一次致信列维—斯特劳斯,信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我对“社会结构”这个词的用法,与您的用法非常不同,以至于讨论是如此的困难,不太可能有所获益。对您来说,社会结构与实在毫无干系,而是与所塑造的模型有关。而我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实在。当我在海滩上拾起一片具体的贝壳,我会认识到它具有一种具体的结构。我还可能找到属于同一品种的其他贝壳,它们也都有着类似的结构。通过审察一批不同的品种,我也许能够认识到某种特定的一般性结构形式或原则,即螺旋结构,可以用对数等式来表述。照我的理解,这种等式也就是您所谓的“模型”。我考察了澳洲土著的一个地方群体,在一定数量的家庭中发现存在一种人员安排。对此,我称之为那个特定群体在那个时刻的社会结构。另一个地方群体所具有的结构,也在许多重要的方面类似于头一种。通过考察某一地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地方群体样本,我就能描述出一种特定的结构形式。我不能肯定,您所谓的“模型”是结构形式本身,还是我对这种形式的描述。要想发现结构形式本身,可以通过观察,包括统计观察,却不能通过实验。(转引自Kuper, 1973: 70—71)

我们将会看到,列维—斯特劳斯这方面是坚定地支持拉德克利夫—布朗研究结构的严谨思路,而在后者这方面,却无法把握前者工作的要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是经验性的结构。因此,我们现在不得不问的是:非经验性的结构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在门捷列夫模型中,结构就是非经验性的,就是生成性的。它是对可能存在的情况的一种动态描述,而不是预估将会出现的情况的一套法则。之所以会想要描述结构,是因为在理解某种具体的东西时,想从其作为部分所从属的那个一般性领域入手。可以认为,它所缺乏的正是一种确定性原则。那种将会把客体的可能性转化为实在性的原则付之阙如。个体确定性的这种缺乏其实在某种层面上是完全缺失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正在迈向一种新式的分析,与功能分析和因果分析比肩而立,但与它们皆有不同。现在,在自然科学的(Naturwissenschaftlich)传统下,社会学家追随着列维—斯特劳斯以社会科学为目的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就能够就现象提出三个各自分离而各具特色的问题。这些问题分别涉及固定结构领域中的原因、功能与定位。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对此又有何应对?

对于亲属关系系统的理解,是人类学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生物相关性意义上而言的亲属关系,是人类各社会的一项必要且普遍的特征。在目前所知的所有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的亲属关系单单涉及、纯粹涉及性的再生产,表面上看来,亲属关系系统似乎是由各个社会中相对固定的一些原则所调控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研究亲属关系的传统思路缺乏确凿的理论基础,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普遍原则能够说明各个亲属关系系统之间的种种变异。他问道,亲属关系的问题究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还是一个自然的问题(同时充分地意识到这种对立并非稳定不变),并在1949年提出了如下回答:

无论何地,只要存在规则,我们就能确定,已经达到了文化的阶段。与此类似,很容易将普遍性视同自然的标准,因为在人类当中恒常不变的东西,必然落在习俗、技术和制度的范围之外……我们不妨就此假定,人类当中所有普遍性的东西都与自然秩序有关……而所有受制于某种规范的东西则都是文化的东西,都是相对的、具体的。我们就此面对着一组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面对着一组事实,根据此前的种种界定,这些东西还不曾彻底摆脱那桩丑事:我们指的是,被简括为乱伦禁忌的种种错综复杂的信念、习俗、限制和制度,不带半点含糊地体现了两种特征,并以不可分离的方式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我们在这两种特征中认识到两种相互排斥的秩序里那些彼此冲突的特性。



(Lévi-Strauss, 1949[1969 : 8])

这个惊人的断言从理论上概括了乱伦禁忌介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含糊性,指出在乱伦禁忌形成之前,“文化尚不存在”(Lévi-Strauss, 1949[1969 : 25]),乱伦禁忌正是社会范畴的开始。

乱伦禁忌是交换现象的根源:如果不能和自己的子女婚配,就必须与另一个人的子女婚配;但另一个人又该和谁婚配呢?也可以将交换看作是一种先验的假定,其结果是,“乱伦禁忌与其说是一种禁止与母亲、姐妹或女儿婚配的规则,不如说更多地是一种迫使母亲、姐妹或女儿给予他人的规则”(Lévi-Strauss, 1949[1969 : 481])。但是,不管我们采取哪一条思路——哪一条是首要的思路或许是不可判定的——依然会有强烈的倾向,使得一旦有了乱伦规则,交换便成为基本的社会过程。莫斯在《礼物》中揭示道:在“原始”社会当中,交互性(reciprocity)的意义至关重要。在诸如此类的社会当中,礼物交换是社会结构的维持过程的核心,其本身远不止于经济上的意涵。在社会人类学中,人们对这些开端有着清楚的认识,以它们为起点,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将亲属关系视为一种交换形式。列维-斯特劳斯所做的便是清晰地捕捉前进的脚步将去往何处。他区分了有限交换与普遍交换。在有限交换系统里,交换以比较透明的方式,在两个群体之间互换往来。而普遍化交换的标志则是群体的多重复合(常常是非常不透明的),从而互换往来也不一定是无中介的,就将会提供交换的那个方面而言,这种往来也是开放性的。

从以下关于对偶组织(dual organization)的行文中,可以看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涵括之宽广(Lévi-Strauss, 1949[1969 : 69]):

婚姻作为一种交换形式,其根本特征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对偶组织的例子里……这些半偶族(moieties)时常是族外婚制的……除了这一点,对偶组织之间还有着相当多的共同之处……世系绝大多数是以母系传承的;有两位文化英雄,有时候是一长一幼两兄弟,有时候则是孪生兄弟,在神话系统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社会群体的一分为二时常延续到整个宇宙的一分为二,分成有生命的物体和无生命的物体,而半偶族也维系着诸如以下这些典型的对立:红与白,红与黑,明与暗,日与夜,夏与冬,南与北或是东与西,天与地,陆地与海洋或水,左与右,顺流与逆流,优与劣,长与幼。

列维-斯特劳斯基于以上发现,并基于以下主张,即乱伦回避的原则无异于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先天综合判断,进一步(1)从结构的角来理解基本亲属关系系

统, (2) 富于创见地理解结构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 (3) 从结构的角度理解神话, 以及 (4) 基于自然世界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心物同型论 (isomorphism) 的假设, 提出一种康德式的反存在主义观点。

1960年, 列维-斯特劳斯就任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教席, 在就职演讲中说到 (Lévi-Strauss, 1960[1967: 32]):

有必要确立每一种亲属关系术语系统及其相应婚姻规则的系统性质。而要做到这一点, 只有付出额外的努力, 深入完善这些系统所组成的系统, 将它们放到一种转换关系之中。然后, 曾经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序的实际场面就在语法的角度上组织化了, 强制性地特许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方式, 以设立并维持一种交互系统。

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只是在说他自己, 而是在说整个社会人类学的话语。在他的前辈当中, 或许要算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将结构人类学推进得最远了。但说到底, 拉德克利夫-布朗所做的研究, 简单来说, 却是有些东西非常类似于门捷列夫在物理化学领域里的工作, 勾勒出对偶组织性亲属关系的各种可能形式, 确定了至少一种尚未为人所知的亲属关系形式, 后来在澳洲找到了具体实例。那么, 总的看来, 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亲属关系的研究, 又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了哪些呢? 他抛弃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主张, 不再认为必须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明亲属关系结构; 而是充分利用社会人类学中一些正在兴起的趋势, 将婚姻视为交换形式, 认为由各种预先规定或禁止的交换组成的系统, 都可以从由各种可能性所组成的普遍结构中推导出来; 他进一步将关于亲属关系的结构分析, 拓展到有限交换与一般化交换之间的过渡领域; 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 将亲属关系结构理解为一种语法会很有帮助, 实际存在的系统就是言语 (parole), 而结构便是语言 (langue); 最后, 他便将亲属关系结构与心智而非生物属征联系在一起。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 社会的出现已经等于一定程度的秩序的出现。对于“原始”社会, 实际上也对于当代社会, 秩序的起源差不多已经被忘却了, 而那种秩序的确切性质也是不明确的。但是, 社会存在的有序性会通过某种方式一代一代地再生产出来, 即便说到那些经历剧烈转型的社会, 或是处在战争状态的社会, 也决不会破坏或削弱这一事实。如果说社会的结构一代一代地再生产出来, 那么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列维-斯特劳斯拒绝接受涂尔干的柏拉图式观念, 即一种与社会个体成员相分离的集体良知, 而是采纳了莫斯所做的修正, 即社会学范畴通过教养的过程塑造了心理学范畴的结构。深受社会学范畴浸淫的教养是所有社会化过

程的典型特征,塑造和构筑了个体的心智,因此,所谓“客观的世界”,只是基于一套特定的假设框架来理解的。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同意种族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原始社会”所采取的假设是虚幻的,而分类系统也是不充分的,当与20世纪欧洲的系统相比较时,就显出其虚幻和不充分来。尽管说20世纪欧洲的那些系统可能比“原始社会”的系统更复杂些,但将前者关联在一起的那个连续统却并不一定关联着后者,因为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有序假设框架的本质特征都不在于它与某种神话性的“实在世界”充分匹配,而在于它那种秩序本身。在某种层面上,社会结构秩序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还不如它作为结构的存在本身来得重要。即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不管什么分类系统,总要优于混沌,即便是感知属性层面上的一种分类系统,也算是向理性有序化迈向了一步”(Lévi-Strauss, 1962[1966: 15])。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勾勒那些我们确已知晓的结构,并且很快就会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理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列维—斯特劳斯所称的“新石器悖论”(Neolithic paradox)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牢固地掌握了文明的伟大艺术,包括制陶、编织、农耕和驯养家畜。今天不会有任何人再会将这些巨大的进展归之于一系列偶然发现的幸运积累,或者相信它们是由对某些特定自然现象的被动知觉所揭启。(有人试图去发现,如果铜矿石意外进入一座炼铁炉会出现什么情况:各式复杂的实验业已表明,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要想获得金属铜,能够找到的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将经过精磨的孔雀石放在陶皿里,再倒扣上一个泥钵,然后以高火烘烤。这样得出的惟一结果,便是将出现偶然机遇的可能限制于某个专门负责给器皿上釉的搬运工在窑内活动时)。(Lévi-Strauss, 1962[1966: 13—14])

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根本结构促成了铜的发现,但列维—斯特劳斯的言下之意是,我们的确知道必须得有那么一种结构;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人们头脑中承载这种结构的方式,非常类似于语言使用者头脑中以(极为)不自觉的方式承载着语法结构。不仅如此,结构与实在之间的关系并非在于刻意求来的复制,虽然带有一些改变,但可以由越来越逼真来开脱。因此,将“原始社会”指为低等,绝对是不正确的。

当列维—斯特劳斯开始研究神话时,他的目的又何在呢?他随意地抽取了一则神话,并要证明它“纯属产生于同一社会或邻近社会或遥远社会的其他神话的一种程度不等的转型”(Lévi-Strauss, 1964[1975: 2])。由于不存在任何权威性的

神话版本,因此,笛卡尔式的原则,即在分析上将客体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似乎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方法了。不管怎么说,列维—斯特劳斯所看到的,是“属于一个给定共同体的全部神话,堪与这个共同体的言语相比”(Lévi-Strauss, 1964[1975: 7])。除非共同体灭绝,否则神话永不会穷尽。如此,所需要的便是为这种“神话”语言制定一种语法。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对这种“语法”的研究是他对亲属关系的研究的一种自然发展:

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里,在支配婚姻的法则表面上的偶然性和缺乏一致的多样性背后,我捕捉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简单原则,归功于它们的作用,那些初看起来杂乱无章(人们也普遍认为就是如此)的繁复多样的种种习俗与仪轨,可以化约为一种有意义可循的系统。尽管如此,要说从中产生出一些义务,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或许它们只是人的头脑中对某些业已在制度中客观化的社会特定需要的反映……因此,我现在通过神话学着手进行的实验就会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神话体系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实践功能:但和此前所考察的各种现象不同的是,它直接联系着另一种实在,后者被赋予的客观性要高于神话学自身,因此,神话体系可能传递给似乎完全自由的人的心智一些指令,禁止后者放纵于其自发的创造力。因此,如果同样有可能在这一点上证明,心智在表面上的任意性,它那据说是自发的灵感涌动,以及它那似乎是不受限制的创造性,都意味着存在一些在更深层面上运作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心智可以不受干扰地与自身交流,而不再被迫与客体对象打交道时,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将自身摹仿为一样客体对象;而鉴于主宰其运作的法则与它在自身的其他功能中所展现的法则并无根本不同,它也就表明了自身其实只是许多物中的一样物。(Lévi-Strauss, 1964[1975: 10])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里我们一再发现,无论是偶发的意外,还是据说属于心智自由创造的东西,其表面上出于偶然的产物被重新塑造为结构决定作用的后果。他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雄心:“要找出在哪些条件下,各种真理系统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这些条件的模式具备了一种自主客体的性质,独立于任何主体”(Lévi-Strauss, 1964[1975: 11])。他在1963年写道:“最简省的说明也就最接近真理,这样的断言要成立,归根结底有赖于设定宇宙法则与人类心智中的法则之间的同一性。”(Lévi-Strauss, 1963: 89)

不过话说回来,可以认为,在列维—斯特劳斯这方面,并不怎么乐意更进一步,

充分地探求他业已发现的那些结构的形式特征。斯库布拉指出,列维—斯特劳斯在数学表述的承诺与人类学细节的丰富性之间左右为难,尽管有一定的摇摆,但他关于神话的结构分析中的数学形式很大程度上依然限于一种暗含的特定语法,而这种语法所针对的则是一个无尽丰富的领域,甚至是一个赫拉克利特式流变不息的领域。在斯库布拉眼里,列维—斯特劳斯作品的潜力而今便在于弥合描述彼此关联的种种变异与说明这些变异的源起两者之间的鸿沟。照他看来,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人类学(至少部分如此),其未来都可以在汤姆和珀蒂托—柯寇达的作品里看出来:“形式突变理论(formal catastrophe theory)的力量将使布尔组合之类的二元对立有可能相互联结,而这些对立原本只允许相互交叉。这将使我们得以追溯这些结构的起源及相互激发,而我们目前的术语使我们只能去做表面的描述”(Scubla, 1998: 291)。同样引人深思的是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在斯库布拉和珀蒂托力图塑造的后列维—斯特劳斯传统里,所使用的语言正在由主体与客体(这种语言在结构主义里已经是声名扫地)替换为行动位(actants)(从行动者网络理论那里,这个术语已经为人所熟悉),后者指的是一个系统当中的潜能最小点,与之相对的潜能最大点即(根据格雷马斯的术语)所谓义素(semes),也就是结构的深层语义对立,例如英雄与恶棍之间的二元对立。至于这种预期中的潜能是否会实现,又如何实现,尚有待观察。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主体之死”是法国结构主义中一项很时髦的主题。保罗·利科在考察宇宙法则与心智法则之间这种心物同型论的性质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提出的是一种康德式的无意识:

这种无意识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由本能、性欲冲动及其符号化力量组成。它更像是一种康德式的无意识而非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一种范畴性、组合性的无意识,但这只是就其组织过程而言,因为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一种范畴系统,而不涉及思维主体。正因为这一点,作为一种哲学的结构主义会发展出一种唯理智论,在根本上具有反反思、反观念论、反现象学的性质。不仅如此,这种无意识的心智还可以说类似于自然,或许它就是自然。(Ricoeur, 1974: 33)

因此我们发现,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里,在一些关键论点上深刻体现出拒斥生存主体性的自由模式:他在说明亲属关系系统时切入的角度,几乎恰好构成了一种反题,对抗所谓自由、强健、古朴的人格或许发现自己已经遗落在时间的重重迷雾中的观念;他揭示出“原始”的知识是借助了可能永远无法复原的一些结构性

分类系统而建构出来的,而不是那些聪明或幸运的氏族成员精妙灵感的结果;推动他进行神话学考察的是他认为,神话结构全面受到规则约束的性质将证明,即便是诗的领域、艺术的领域,也无法作为自由思维、无拘无限、富于创造的主体性的最后庇护而得以生存。但是,鉴于心智的普遍结构与自然的普遍结构之间被划上了等号,就必须考察关于中介的问题(就像涂尔干告诉我们的那样),而这又必然将我们带向关于语言的问题。

6.3 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

人们普遍认为,索绪尔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奠基人物,对列维-斯特劳斯具有重大影响。他从1891年到1913年执教于日内瓦大学,1901年始任印欧语言学与梵语教授,从1907年开始兼任普通语言学教授。索绪尔辞世之时,他的语言学论著尚未成稿,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根据学生的笔记重新编排,并于1916年出版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一、二编从语言记号的性质出发,阐述了结构语言学的核心主题。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记号并不会将一个词与一物联系为一体,就好比“马”这个词与驻足田野的那匹有血有肉的马。相反,它是由一种声音形象和一个概念所组成的。声音形象关系着记号的声音与音节,而概念则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形象。索绪尔决定将声音形象称作能指,而将概念称作所指,保留“记号”这个词来指这两方面之间的统一。记号的这两个方面有时候像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用索绪尔自己的话说)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但不管怎么说,结构主义的发展却是越来越强调能指,而越来越不重视所指。索绪尔主张,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比如说,对于“姐妹”这个能指,除了惯例业已确立的东西,并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将其与其所指联系在一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说不上什么理据,然而却是固定的,不在个体行动者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是普遍的规则,即使是拟声词也不会破坏这一规则。

至关紧要的关联并不在于记号与“实在”的客体世界之间,而是在于记号与整个语言系统之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语言系统都是固定的:

尽管种种表象都表明,能指就其所表现的观念而言是自由选定的,但就使用它的语言共同体而言,它却是固定的,而不是自由的。普通个人对此没有发言权,语言所选择的能指也不能被任何一个别的能指所取代。(Saussure, 1974: 71)



这并不等于说,语言系统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它的确是会变化的。语言在历时性的角度上 (diachronically) 是可变的。尽管如此,这里的确意味着,语言中压倒性的力量还是共时性的 (synchronic)。给定的系统并不需要任何请求就会施加其作用。即如索绪尔所言,“共时性的视角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对于言说者的共同体来讲,这就是真实的现实,也是惟一的现实” (Saussure , 1974 : 90)。

那么,语言又是如何作用于听者的呢?索绪尔的意思是,这在理论上非常简单。我们用言语作为原始材料,将其描绘成“两条平行链,一条属于概念,一条属于声音形象” (Saussure , 1974 : 104)。彼此平行的声音与概念所组成的这种线性流会以某种方式分开,索绪尔所指出的就是,这种线性流的意义实现,不是通过流的各个组成部分以肯定方式指示某一记号的机制,而是通过流内部的种种差异所组成的系统,它们会在这个系统里一起发挥作用,以产生某种实在的意义。即如索绪尔所言 (Saussure , 1974 : 120):

在语言里,只有差异没有实名词。不管我们是说所指还是能指,语言既没有存在于语言系统之前的观念,也没有存在于语言系统之前的声音,而只有从系统中生发出来的概念上、声音上的差异。

索绪尔对组合 (syntagmatic) 关系与关联 (associative) 关系或聚合 (paradigmatic) 关系的区分,进一步表明了对于差异的强调。线性组合就是组合段 (syntagms)。例如,“如果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就出门”这句话是作为一个线性流被听的,而这段流中的任何一个片断的含义都是由此前和此后的片断所确定的。流的各个组成部分以组合的方式联系到一起。线性差异的关系产生了意义。不过,产生意义的差异关系并不只是这一种。如果“我们”这个词被看作从一个系列中抽出的一种可能性,这个系列里包括了“我”、“你”、“我们”、“他们”等等,那么,出现的是“我们”,而不是其他可能性中的一种,也就确定了所说句子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同样发现了记号流的意义来自于差异,但这一次的差异是在于已然所是与本可以所说之间。索绪尔将可能记号与实际记号之间的关系叫做关联关系或聚合关系。在当代的讨论当中,往往更多地使用后一个术语。

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对索绪尔有关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之区分的借鉴意义重大。他将前者看作是语言的“横向”维度,而后者是语言的“纵向”维度,主张横向的邻接关系属于换喻 (metonymic) 类型,而纵向的从诸多类似范畴中选择的关系则属于隐喻 (metaphoric) 类型。从语言的这两极出发,雅各布森确

立了对于诗学的如下理解：

做出选择的基础在于等值、类似与不类似、同义与反义，而组合，即序列的逐步形成，则是基于邻接。诗的功能就在于将等值原则从选择的轴投射到组合的轴。（Jakobson，1960：358）

雅各布森满心努力，要摸索出一套语言的诗学功能理论，但却是在普通结构语言学的背景当中推导出来。这样的努力使他成为一位卓有影响的人物，与列维—斯特劳斯联手对波德莱尔的诗“猫”作了著名的分析，也对拉康有所影响，后者采纳了他的换喻与隐喻之区分，从（分别与之对应的）凝聚作用与移置作用的角度重新概括了弗洛伊德有关梦的作用的分析。

无论是对于索绪尔，还是对于后来的雅各布森，结构语言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语言系统，也就是“langue”（语言）。索绪尔认为，结构语言学本身说到底应该看作属于更宽广一些的关于记号的科学，他称之为符号学（semiology）。不过这一提法也招来众多怀疑。比如罗兰·巴特就宣称，语言科学其实是一门首要的科学，涵括了关于所有意指系统的研究（Barthes，1964[1967：11]）。索绪尔的作品所导出的发展，其基础是集中关注系统，暂时不考虑三个介入层面：主体性、历史性与特殊性。当然，索绪尔也不曾否认任何一个层面的地位，但它们的地位只是从属性的。语言系统被看作具有自我指涉性。人们在分析这个系统的时候，是从它的结构而不是它的具体体现入手，也就是从它的形式而不是实质入手。有关意义的问题并不是首要的问题，但索绪尔在讨论到这一点时认为，语言创造了意义而不是传递了意义，语言建构了指称（reference）而不是作为指称的中介。日后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分析家进一步修润了这其中许多主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叶尔姆斯列夫的作品，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学形式主义，还有布拉格学派，在这个学派里，雅各布森与特鲁别茨科伊一起充当了活跃分子，他们关注的是认识语言在社会中履行的所有功能。但不管怎么说，语言学中结构主义的下一步飞跃，还是体现在乔姆斯基的作品里，这一点没有多少疑问。

无论是否出于有意，乔姆斯基拒绝接受他的老师布龙菲尔德所倡导的那种语言学方法论，从而与索绪尔站到了一起。布龙菲尔德认为，科学的语言研究要想推进，只能基于边界明确的资料。学者的任务就在于从一套资料中推出语言的语法，而这套资料便是实际被写下或说出的语言。乔姆斯基则意识到，这种经验主义的语言学研究路向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如果把语法界定成具备合格能力地使用一种语言所遵照的规则系统，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这套资料中的用语哪些是合格

语言能力的范例,而哪些又是错误?其次,研究边界明确的语言用法,又如何能够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事实上,“一个人掌握了一种语言,就有能力理解他未尝经验过的众多表达”(Chomsky, 1972: 100)?当然,我们也能够自己创造出诸如此类的新表达。因此,乔姆斯基与索绪尔一样,关注于语言的系统,而不只是它有实际记录的用法。他在努力增进我们对于语言的理解的时候,出发点不是记号,而是句法:

句子是要借助一些原则和步骤,在特定的语言里得以构成的。句法就是对这些原则与步骤所进行的研究。对于一种特定语言的句法研究,其目标即在于建构一种特定的语法,而该语法可视为生产所研究的语言的句子而使用的某种手段。(Chomsky, 1957: 11)

乔姆斯基所要寻求的是一种**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非常类似于拉德克利夫-布朗首先概括、随后又由列维-斯特劳斯发展和推进的亲属关系系统的那些结构模型。最简单的备选者就是有限状态语法(finite-state grammar),它可以通过少数几条可以循环使用的简单规则,生成数目不限的句子。句子的第一个词是从可以展开一个句子的语言的词表中挑选出来的,而第二个词是从可以紧接被选中之第一个词的词表里挑选出来的,如此这般,直至句子结束。这种模型非常吸引严格的行为主义者,他可以从刺激与反应、尝试与错误以及存储起作用的序列等角度入手来看这种线性链。乔姆斯基揭示道,有限状态的手段不可能生成一种语言中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这一见解相当重要。它不仅推进了他对有效生成手段的寻求,而且以精警的方式驳倒了行为主义者,后者自以为他们对于人类行动的那种说明是非常充分的。乔姆斯基提出的问题是:“在一次刺激与其反应之间,可以产生多少东西?”如果说在两者之间可以产生数量难以确定的信息,那么反应者又将如何知道何时做出反应呢?在刺激之后,必须有某种“噪音”的收尾表示,但那种收尾表示本身就会被视同一次刺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最初的刺激就不再能够简单地界定为那个刺激了。如果我们用这种观念来看句子的生成,首先就会注意到,在彼此并不邻接的词语之间,也可能具有依存关系;然后我们又会注意到,在插入的各个词语之间,也可以具备其他的关联,而这些关联同样也不一定非得是邻接性的。可以逐步推出下面这个例子:

在像“谁要那么说,他就是在撒谎”这样的一个句子里,“他”和“就是在撒谎”这几个词之间存在一种依存关系。“谁要那么说”这个简单从句(其中

在“谁”和“说”之间存在一种简单依存关系)将它们分开。我们还不难想出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比如“谁要说不承认那一点的人就有错,他就是愚蠢的”。在这句话里,我们有两种依存关系,一是“他”和“就是愚蠢的”之间,一是“人”和“就有错”之间。我们还可以继续在“那一点”和“就”之间插入从句,而这个从句本身就含有非邻接但相互依存的词语。结果便得出一个具有“镜像属性”(mirror-image properties)的句子,也就是说,这个句子的形式是 $a + b + c \cdots \cdots x + y + z$,在最外层成分(a和z)之间、次最外层成分(b和y)之间等等都存在一种协调关系或依存关系。(Lyons, 1970: 54)

包含此类“镜像”句子的语言超出了有限状态语法的范围。它们的说者与听者有时候都必须应对在刺激词语与反应词语之间数目不定的中介作用,在此类情形下,当具备所需的能力,能够统筹全局,步调正确,依次解决各种关系,显然也就超越了有限状态语法中的刺激—反应形式。

语法阶梯上的下一级就是短语结构语法(phrase-structure grammar)。这种手段比有限状态语法更为有力,因为它不仅能够生成后者的所有句子,还能够生成更多的句子。以“我的朋友喜欢游泳和网球”这样的句子为例。我们可以指明一种手段,将句子概括为名词短语+动词短语:(我的朋友)+(喜欢游泳和网球)。我们还可以将它更进一步细分,拆解成名词短语+动词+名词短语:(我的朋友)+(喜欢)+(游泳和网球)。无论哪一种情况下,都是在表层表述的层面上,在给定的句子的层面上,来努力指明短语结构的手段。现在看来,在给定语言的层面上起作用的短语结构语法,已经表明不足以作为能够生成所有合格语言用法的手段。为了具体说明这种不充分性,乔姆斯基比较了两个句子:“约翰肯定比尔要走”和“约翰肯定走”。他的结论如下:

表层结构并不一定会精确地指明确定句子意义的那些结构与关系;在第二个句子中……表层结构未能指明,“约翰要走”这个主题句也表达了这个句子的一部分意义。(Chomsky, 1972: 105)

乔姆斯基的结论需要有一种深层结构的概念,因此,在转换规则的作用下,深层结构短语得以产生表层结构。这样的转换语法将有潜力为英语或法语之类的语言构成一种充分的语法。

转换语法假设语言是计算系统,通过经验而获得,在使用时遵循暗含的规则,以形成头脑中的再现,并基于这样的假设,区分了表层结构和深层(或先天

■ [innate] 结构。从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一直到进入 80 年代,转换语法的范式一直被看作属于人的科学中认知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语言深层结构的模型设计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语言学结构主义的认知转向似乎不可逆转。不过话说回来,与此同时,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短语结构可能不太容易变化,但有一些转换得确定:

比如说在英语里,名词、动词、形容词和介词都在它们的宾语成分之前;而在日语里,相应的东西都在其宾语成分之后。英语被称作“头朝前”的语言,而日语被称作“头朝后”的语言。一些非常简单的句子就可以确定这些事实,比如这两句:“约翰吃苹果”(英语里)或“约翰苹果吃”(日语里)。要想习得一种语言,孩子的头脑里必须确定转换是如何确立的,凭借简单的材料就必须足以确定转换的背景,就像在这个例子里一样。(Chomsky, 1990: 642)

这里似乎表现出一种切实的可能性,将强调的重点从语言系统转到语言习得和使用的条件。这种动力表现得极具吸引力,因为乔姆斯基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语言学而转向政论,因为绝大多数的语言科学家都似乎已经远离了结构主义的方案。

莱昂斯在 1973 年写道:“无论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将生成语法理解为关于语言性质的理论,还是比较狭义地视其为对语言单位之间所持有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一种形式化表述,生成语法都已经丰富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但并未取代后者或者使后者过时”(Lyons, 1973: 19)。莱昂斯这么写,脑子里想的是,索绪尔的学说强调系统而不是用法,强调共时性而不是历时性,强调意指而不是指称,强调结构性思维而不是经验性材料搜集,这些强调是如何移置到转换语法的研究方案当中,后者又继续表明了索绪尔方案的潜力,证明它较之行为主义还是要胜出一筹。但不管怎么说,随着普遍语法的方案开始偏向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方面更具经验取向的认知研究,整个局面为之一变。转换的范式依然存在,但主要的特征现在已经和关于语法与语境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目标是诸如语言学中当前对相对主义问题的争论(Gumperz and Levinson, 1997)。我相信,乔姆斯基本人并不肯定这个方向是否正确。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看法,认为语言是心脑认知系统中最根本的一个要素(Chomsky, 1990: 646)。至于对这个系统的具体指明,如果它包含一种普遍语法,则最终可能是相当明确地拒弃了索绪尔所体现的那些原则。

6.4 拉康学派

索绪尔所整理的一系列概念,如系统、差异、非主体任意性(asubjective arbitrariness)、自我指涉、共时性和符号学,不仅奠定了列维-斯特劳斯作品的部分基础(他对系统性与任意性这两个观念都明显表现出认同),而且甚至更为明显的是,还奠定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的部分基础,而后者已经跨越结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以及当代女性主义的某些流派,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拉康本体论学说具有三重结构,也就是说,人类主体关系着三种秩序:符号界、想像界和现实界。其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是现实界,因为我们从不能够直接触及它。它始终是以其他两种秩序为中介的。正因为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关联,正因为触及现实对象的进一步关联很成问题,所以人类主体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被想像界与符号界所隔断,而后两种秩序之间的相互关联本身也是不固定的。在话语当中,能指是在由多个能指所组成的一整套系统的语境当中发挥功能的,至于意义的创造,则是靠给定的一系列能指来固定的,因为这些能指彼此相异,而且与原本可以从整个系统中提炼出来的其他能指相异。而社会认同的创造也与此类似,是靠幼儿在由多种共存自我组成的系统中固定下来。固定的过程始于镜像阶段,是由符号界与想像界所组成的双重秩序,新的个体被锁定其间。正如任何能指与物本身之间均无半点必然关联,个体与现实界之间也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个体首先拿来当作自己的现实的东西就在想像界之中,这种秩序的特点是寻求同一和类似,因此,也就唤起了镜像阶段这一隐喻。符号界“最后”一个登场,但其实却以回溯的方式,确定了想像界与现实界的结构,因为进入了符号界,也就是进入了语言与社会秩序,进入了父亲之法。在精神分析的传统里,尤其是在拉康的研究里,通过俄狄浦斯的神话,对这种进入符号界的过程进行了深入探索。当孩童接受了自己无法占有父母时,俄狄浦斯冲突也就告以解决。这种接受体现了一种理解,即不仅存在多个自我(也就是对于镜像阶段的理解,在这个阶段,类似性/同一性的问题主宰了想像界的层面),而且这些自我是复杂交错地安排在一起形成秩序的(就像一种语言里的各个词语是通过差异而发挥功能的)。对于父亲之法的这种认识与接受,以及其暗含的将主体区分为不同的种类,使社会权力有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想像界就是个体认同的秩序;而符号界便是社会调控的秩序;至于现实界,则是一个难以说清的层面,既以某种方式支撑着其余两种秩序,但又始终必须由那两种秩序作为中介。

现在我们要来更细致地看看镜像阶段,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拉康式的欲望概念,



■ 以此更精确地介绍拉康的思想。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涉及意识形态的概念,性的政治,以及拉康的分析所凸显的那些关于解释的话题。

拉康于 1936 年引入了镜像阶段概念,当时他正受着超现实主义者的研究以及他们对形象和想像的关注的影响,也正在借助柯热夫通过强调主奴辩证法所作的特定解释,思考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详参 Macey, 1995)。在一定程度上,从这样一些源头出发,关于扭曲、认同、想像和发展等方面的主题开始在拉康的思想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 1949 年,他再一次就自己关于镜像阶段的思想,向苏黎世国际精神分析大会提交了论文。

一个婴儿是在什么时刻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总体,以种种边界,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分离?自我人格早期构成的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从获得自我人格的这种特定方式当中,生发出哪些主要意涵?它以这样一种方式达到目前的状态,对于我们关于自我结构的理解又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弗洛伊德自有属于他的回答:归根结底,要想达成自我人格,有赖于对欲望的压抑。也就是说,定位在社会之中的自我不得不控制自身的驱力,纯粹的欲望是反社会的。在弗洛伊德看来,社会自我的出现将欲望移置到无意识当中。欲望的现实界被自我的想像界所取代。而在拉康看来,在大约 6 至 8 个月期间,人类的婴儿“依然深陷于其运动机能上的无能和对于哺乳的依赖之中”(Lacan, 1966[1977: 2]),是在想像的层面上塑造对于自身身体统一性的知觉与符合期望的控制。对于未经分化的存在的现实经验,逐渐为想像形象所取代,而想像形象中一个主要的、明显的例子,就是镜子形象。并不是非得有一面镜子,而任意一个婴儿在镜子前的行为也不必与拉康的观点完全吻合。更准确地说,镜像阶段是一种强有力的隐喻。关键在于,引动自我的构成的是一种丧失,关于欲望的现实经验的丧失。作为这种丧失的平衡,则是一种获取,是自我认识的获取。但被认识为自我的并不是欲望的“现实”身体,而是在形象中体现出来的想像总体。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拉康的思想从一开始便体现出结构主义的一些首要特征:重新估价经验的东西,反主体主义,以及将一套严格的理论框架置于经验之上。拉康 1949 年提交的会议论文中就有如下关键主张:[3]

镜像阶段的概念使我们站到了任何直接从我思 (cogito) 中导出的哲学的对立面……孩子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不管这段时间有多么短暂——赶不上黑猩猩的工具性智力,但是,在这个年龄上,孩子已经能够认识到镜子里他自己的那种形象……此项行为远不像在猴子那里一样业已穷尽自身的所有潜力,在孩子那里,一旦把握了形象,发现它并无现实内容,就会直接激起一系列的姿态。在这些姿态中,他在游戏中体验到表现为形象的运动与所反映的

环境之间的关系……孩子在婴儿阶段依然深陷于其运动机能上的无能和对于哺乳的依赖之中,以这种欢快的方式接受了自己特定的形象,似乎会在一个典型情境里展示符号的母型,在这样的母型里,“我”(I)以原初形式突入脑海,此时的“我”尚未在与他人的认同的辩证关系之中客体化,而语言也尚未以全称的形式赋予其作为主语的功能……关键在于,这种形式先于自我的社会决定机制,将自我的能动作用定位在虚构的方向上。(Lacan, 1966 [1977: 1—2])

因此,通过镜像阶段这个过程,自我从属于一个表面上轮廓鲜明的形象。但感受到的是混乱骚动的未成熟状态,看见的却是镜子里界限确定的形象,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再尖锐不过了。会出现某种调和吗?如果会,又当如何调和?拉康的根本回答就是,这个过程的确得更往前推进,必须涉及到孩子之进入语言。

在拉康所说的三个秩序当中,符号界也许可以看作是支配性的。要想进入现实界与想像界,就必须经由语言,换言之,也就是经由符号界。对于婴儿来说,符号界是最后一个登场的。这种浸入语言的过程也是接受控制、从属和纪律的过程。当然,可以预见到会出现抵抗,但向语言之法则屈服,向拉康所谓父亲之法(le nom du père,也就是le non du père)*屈服,是一项不容置疑的要求,否则就不可能达成社会成熟状态。这也正是斯各特对这一系列戏剧变化的看法(Scott, 1989: 80):

婴儿与母亲处在一种未经分化的纽带之中,这种纽带拉康有时称之为一种“整体”(All),它既不是语言性的,也不是符号性的,既非有意识的,亦非无意识的。当孩子开始开口说话时,语言,也就是促成个体表述的那些关系的符号结构,就开始侵入,拆解了这种纽带。通过言语,语言承载了一套网络,包括大量不可避免的因素,这些东西作为彻底非个人性的、缺乏关爱的命运,以野蛮的方式,隔断了母婴之间的这种“整体”。母婴对偶体是一种闭合的密切关系,而语言则必然属于距离,必然属于能指在所指中的存现与缺失,在语言当中,“整体”只能是欲望的记忆。

拉康将社会性看作是对欲望的压抑,认为某些形式的欲望延续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欲望的这种丧失。他有时候把这种残余的对象称之为“小对形”(ob-

* 拉康在此处玩弄了一个双关,前者为父亲之名,后者为父亲之无。——译者注

jet-petit-a)。拉康写道 (Lacan, 1966[1977 : 314 — 316]):

驱力 (是)能指的宝库……当主体消失在要求之中时,就从要求中生发出驱力来……双唇,“牙关”,肛门外缘,阴茎顶端,阴道,眼皮之间的那道狭缝……粪便,阳具(想像的客体)……音调,目光,声响……镜像把自己的衣裳借给了这个无法在镜中予以把握的客体。深陷映像之网的实体,在被剥夺了自身充满映像的内涵之后,却再一次表现出实体一般的映像半推半就的诱引。

按照拉康的说法,对于他者的难以言喻的欲望,以及他者的难以言喻的欲望,对于这种欲望的这些替代并不怎么重要。作为能指,它们属于符号性的一类,它们的“现实性”是它们差异的产物,而不是现实界的效果。不仅是被赋予语言一般的结构的无意识如此,丧失的欲望客体,以及它们那些符号性、(略略有些)慰藉性的替代物,也都属于这种情况。伴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孩子放弃了他对作为最初欲望客体的母亲的总体诉求,接受了文化王国的原初法则 (Lacan, 1966 [1977 : 66]):现在,结构性的前提条件得以确立,以便将特定社会中由种种信念、实践、习俗和仪式组成的系统,简言之,即意识形态,强加给符号界的初来乍到者。

这种结构主义的范式后来既遭到了挑战,也得到了利用,有时候几乎是在同一流派之内就毁誉参半,在女性主义理论里尤其如此。但是考虑到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些强有力的机制,考虑到拉康后来又转回寻求语言的庇护,这种遭际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女性主义学说中这两种根本性的反应分别来自克里斯蒂娃和伊莉嘉瑞。克里斯蒂娃的研究路向是想在她所谓的符号域 (semiotic) 里,在用拉康的话来说属于自相矛盾的逆喻 (oxymoron) 中,找出一种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女性特质,以此努力挖掘拉康的现实界范畴。她在 1979 年写了篇文章“女性的时间”,文中将“纪念碑式的时间”与母亲的身份相提并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研究设想。^[4] 而在她 1985 年接受的一次访谈里,她的一段话也能体现出这种进一步挖掘拉康的现实界的情怀:

我确实觉得,符号域——如果你真想找出与拉康观念的对应的现象——所对应的现象,在拉康那里同时存在于现实界与想像界当中。在他看来,现实界就是一个空洞,一种虚空;而我认为,在精神分析所关注的一些经验里……符号域的观念使我们得以谈论现实界,而无须简单地把它是一种空洞或空白;它使我们得以尝试进一步去深挖它。(Guberman, 1996 : 23)

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深入探索符号域,将使我们置身于虚构的领域。正是通过想像界,我们可以寻求深入探索现实界。因此,她对现实界的深入探索是反形态学的,是前中介的(pro-mediational);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否在根本上依然处于结构主义传统之中,那条反人本主义的细绳是否依旧充当主线,延绵不绝,尚可商榷。

而伊莉嘉瑞则不接受克里斯蒂娃向某种前俄狄浦斯领域的转移。在她看来,俄狄浦斯的游戏是男性规定的,无论是解决之前还是解决之后,都存在这种控制。她在一本书里表明了这一观点,或许这是她丢了自己在万塞讷大学(Vincennes)教职的大致原因,因为拉康在那里影响巨大:*

为什么让小女孩,让女人,以和小男孩,和男人,大致相同的方式,担忧、嫉羨、企望、憎恨、拒绝,如此等等?为什么她如此轻易遵从?因为她柔顺吗?还是因为她容易歇斯底里?但现在我们开始对这种恶性循环有所意识了。她甚至只能自甘沉沦于那些反常,为的是“让人高兴”,为的是配得上那期望她具备的“女性特质”,不这样,她又能如何?当她的性本能已遭阉割,当父亲强迫她接受那样表现,当单凭他就可以令她满足,引她达到快乐,当他更喜欢从制定法则中得到额外的性享受,……除了柔顺,除了歇斯底里,她又能如何? (Irigaray , 1985 : 59 — 60)

她拒绝接受阳具特权,吁求一种避免男性控制的女性认同语言。但不管怎么说,这样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男女分离主义者。她反对将母亲身份视为达成女性认同的要害,吁求一种不涉及受难的对于女性特质的理解,所以她说道:“学会喜欢你自已,喜欢你的生理性别,也喜欢另一种生理性别……这不正是我们最低限度需要达成的某种认识吗?” (Irigaray , 1993 : 104)

在新近接受华莱士访问时,伊莉嘉瑞说道:

我并不想捣毁同性恋的神像。谁打算尊崇这些神像,就去尊崇吧……如果说我迄今为止一直在遵循着一条道路,那么这条道路尚未终止……我还在往前走,我还是个小孩子,自恋会到来,同性恋会到来……与另一种性的关系也会到来。但如果我决定在同性恋这个阶段上止步,我将永远不会了解随后

* 拉康曾任万塞讷(Vincennes)大学“弗洛伊德研究中心”主任。——译者注



的那些阶段。(Wallace, 1998: 19)

这段话意味深长,因为在伊莉嘉瑞那里找到的对同性关系的理论研究规划,可以非常容易地重新定位在一种激进的酷儿理论框架中,所以对于酷儿理论之兴起,伊莉嘉瑞对差异语言的寻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巴特勒广泛地探讨了伊莉嘉瑞的作品,在她最近的一部书里,自我通过一种满怀忧郁的认同过程,获得了社会性别化的认同。这里说的不是权力和为获取权力所产生的争战,不管是在男权制结构之内还是站在这些结构的对立面上。这里说的是悲苦(grief)。她引用弗洛伊德的话,“当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一样性对象,常常就会引发他的自我的更替……忧郁症就是这种情况”(Butler, 1997: 133)。这种更替体现为某种替代过程:依恋为认同所取代。对母亲的哀悼产生了成为母亲的一种过程。即如巴特勒所言,“认同成为维持(欲望)客体的一种具有魔力的心理形式”(Butler, 1997: 134)。而这又“提供了一种方式,维持了作为自我组成部分的客体,因此,也避免了丧失成为一种彻底的丧失”(Butler, 1997: 134)。这一点的意涵再推进一步,也许是将对同性恋欲望的禁止,而不是将对乱伦的禁止,确立为文化的首要律法。但对于同性恋欲望的禁止远未完成,其实或许根本就不曾付诸实施,而要阐明此项律法肯定将会同时要求去破坏它(言下之意也要破坏它所确立的那个社会)。有鉴于此,从列维-斯特劳斯到拉康,到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再到一种潜在的通过酷儿理论对列维-斯特劳斯的重新解读,要对这样一种解释学循环做出评论,似乎还为时过早。我们不得不静观其变。

在拉康的著作里,我们发现了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这种统一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思想,已经在一个非常根本的方面具备了后结构主义的潜力,也就是普遍要求建立一种(社会性别化的)主体模式。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涂尔干、索绪尔或列维-斯特劳斯来说,人的主体并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但在阿尔都塞的作品里,它却作为一项论题而重新凸现,尽管他常常被归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拉康又一次起到了相当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也是就一定程度而言(我们会看到,在日热克的作品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意识形态成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意识形态结构(包括认知结构、情感结构、道德结构、历史结构和审美结构)如何生成了人之主体本身?要想切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我们首先必须考察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异对比。前者强调的是关于世界的所谓原始理解与所谓先进理解——比如巫术与科学——之间的结构同构性,因为这两类理解都由一些分类模式所支撑,都有它们的

实际效力。而对于阿尔都塞来说,随着他称之为(用巴什拉尔的术语来讲)认识论断裂的到来,也就揭开了科学性的时代。他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之前的所有历史学说都称为前科学的,认为在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之间,存在某种理论上的质的非连续性,也就是一种认识论断裂:

种种历史哲学谈论的是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非正义,心智,自由;而马克思则开始探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等等。我的结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与前马克思主义观念体系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连续性的关系(哪怕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这种连续性关系的缺失,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这种辩证式的跃迁,我称之为一种“认识论断裂”,一种“决裂”。(Althusser, 1973: 6)

尽管阿尔都塞对自己理论假设中的某些内容作了重新阐述,但这并不是因为结构范式中出现了什么理论上的不匹配。实际上,我们很快会在福柯那里看到,认识论断裂的概念表现了整个结构主义中对于结构非连续性的强调的重要进展。^[5]更准确地说,它归根结底是因为,阿尔都塞对于科学与意识形态所作的区分,“不断地威胁着对于实证事物的理解,使科学深陷重围,而让那些实在的特征变得模糊不清”(Althusser, 1965[1969: 29]),从而逐渐被舍弃了。意识形态开始被看作社会形态中无法根除的一个层面,“如果人们要被塑造、转变和训练,以回应他们的生存条件的种种要求,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层面)也就是不可割弃的”(Althusser, 1965[1969: 235])。在阿尔都塞具有后认识论色彩的意识形态观念中,除了诸如家庭、学校和教会之类的社会结构制度,最重要的成分还包括拉康的观念:想像自我通过误识,通过被胁迫而浑然不觉,进入了符号界并深陷其中:

弗洛伊德已经为我们揭示道,现实的主体,具有独特本质的个体,并不拥有某种形式的自我……(而是发现)人类主体是去中心化的,由一种同样没有任何“中心”的结构所构成,惟一的例外在于对“自我”的想像误识,也就是它其中“认识”到自身的那些意识形态形态(ideological formations)。(Althusser, 1971: 201)

而这种想像自我的形象在拉康的术语中得到了深入挖掘,按照马丁·杰的描

■ 绘,成了文化研究的看家概念:

这种主体表面看来是连续的,线性的,一致的,实际上却是由……乌达特所谓的“意识形态”缝合 (suture) 所制造出来的……它就是一种能指,表面上“缝合”了语言永远不能够真正弥合的那些匮乏与缺失。乌达特宣称,就是顺拍/逆拍这样的转换技术促成了视觉上的缝合。它们鼓励实际生活中的观众逐一认同电影中人物的目光,认同那似乎来自于一些具有中心和统一性的主体的目光,从而将观众们彼此分散、相互矛盾的主体性缝合成一个虚幻的和谐整体。为了说明支撑此类技术的基本认同过程,波德利、普勒内、乌达特以及他们的那些追随者,逐渐转向了拉康式的精神分析。(Jay, 1993: 474)

日热克在其作品里,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刻的眼光,探索了主体的想像认同在文化情境中的结构生成过程。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我们显然不在结构范式之内,哪怕日热克这位理论家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坚持不懈地主张、分析并发展着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将意识形态视为结构和结果 (precipitate) 之间的一层中介。或许我们应该更留心一点儿,其方式可以是通过症候合成人 (sinthome), * 这是拉康的一个观念,说的是处在心理的核心、现实的边缘以及现实之中的同时存在的吸引与排斥:

到了他的晚年,拉康的所有努力都旨在描绘前在于太一 (the One) 的某种特定的他者性:首先,在作为差异而存在的能指的领域里,每一个太一都是由它与其他者之间的那些差异关系所确定的……就在那个太一者的领域里 (符号界)。……但是突然一下子,在《讲演录十》(Seminar XX) 中,我们却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一种特定的太一……它尚未具备他者领域所特有的那种表达。这种太一当然就是快感 (jouissance) 的太一,是能指的太一,因为它尚未受到束缚,而是自由地飘浮,浑身透着快感:也正是这种快感防止它被联结到链中。拉康为了指明这种太一的维度,发明了一个新词,即症候合成人。这个

* 详参齐泽克 (即日热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页 77,注一。此处译名略有不同。——译者注

论点充当了主体一致性的最终支撑,属于“thou art that”,* 标志着“主体中超出自身的部分”,以及他因此“超出自身之所爱”。(Žižek, 1991: 132)

那么,日热克是不是已经在拉康的《讲演录十》里发现了某种认识论断裂? 在这种断裂之前,或许自我中一定程度的他者性是被拒弃的(或者是被抑制的),不管是在什么结构平衡里都难以说明;而在断裂之后,就有了某种转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种认识,了解到快感的存在本身可能是外在于结构的各种力量的。1989年,日热克写道:

英语世界对于拉康的接受……尚未融合《精神分析伦理学》(1959—1960)讲演标志的断裂所产生的全部后果,这个断裂从根本上转变了他教学的重点:从欲望的辩证法到快感的情性,从作为编码信息的症候到……渗透着快感的症候合成人,从“被赋予语言一般结构的无意识”到内心之中的物,即不可化约的快感内核,它抗拒着一切符号化过程。(Wright and Wright, 1999: 13—14)

在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阐述方面的这类发展或许可以表明,结构主义传统依然有它的生命力,但它们也似乎使我们远离结构主义传统的主流,特别是远离结构主义的生成范式。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拉康、阿尔都塞和其后一些分析家们的著作里,模型设计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不管我们是在讨论拉康那里的符号界—想像界—现实界之模型,还是在讨论阿尔都塞那里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模型,我们所处理的都是如何从概念上来把握跨越变动不居的经验环境而始终一致的那些结构特性。而拉康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恰恰在于我们发现受到强调的那种结构一致性,被揭示为隐含在变动不居的幻觉之后,而这些幻觉则确定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表层理解。至于日热克那才华横溢的作品是否已经彻底告别了拉康的后结构主义范式,则已不在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6.5 后结构主义

我们已经提到过,拉康从1959年到1960年间所作的第七次《讲演录》,可以考虑作为结构主义转向其未来的关键标志之一。而第二个可以考虑的标志,来自

* 即“you are that”。——译者注



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序列。这是一种英雄般的失败,因为它自己原本的雄心在于说明**事物的秩序**,而自己却置身这样的雄心之外。它起初的抱负完全处在结构主义的范式当中,但它关于现代性之中人的科学的结论,却将这些人的科学说成是在自身之上**折叠**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只是在**一个行将消失的形象——也就是人——**上运作,而这个形象就像是潮之将至的海边沙滩上画出的图形,从而驳斥了任何诸如人的科学之类的**范畴归类**。但不管怎么说,对于这种包含在跨越多个时代的结构框架之中,细致入微、风格怪异的历史研究,他的读者们已经做好了阅读的准备,因为在关于**疯狂史**的研究中,在关于**医学凝视之兴起**所构成的认识论断裂的研究中,他们已经看到了**类似的努力**。

在《事物的秩序》里,福柯描述了三个重大的认识论时期。它们分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古典时期的开始同时也就是从文艺复兴的认识论构型 (epistemological configuration) 中撤出来。肇始于 14 世纪意大利的艺术与文学的**伟大复兴**,其认识论结构是由类似 (resemblance) 关系所主宰的。福柯提出,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发展,依据的是**类比、通感、邻近和摹仿**的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真理是一种连续性和邻近性的功能。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事物的知识是无须中介的。它的标记是事物本身所有的标记,而不是刻在它们身上的标记。在对文艺复兴知识型 (episteme) 的超越当中,有两个关键人物,就是培根和笛卡尔。他俩都嘲笑文艺复兴的那种自我强制,就是要**把世界规则化**,而不去思考这些假想中的规则性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随着古典知识型取代了文艺复兴知识型,讨论的重点也转到了**记号的性质**,而得出的结论便是:记号的性质就是一种再现,是次生的层面,它或许可以是透明的,但无论如何不同于其所再现的东西。福柯对古典知识型的描述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成性结构主义话语的天然家园正是古典时期,那个时期的系统是从“**计算、分类和遗传分析**”(Foucault, 1966 [1970: 74]) 的角度来界定的。计算的典型就是代数,用可操纵的记号来再现简单的性质,而这些记号是被有条理地安排进一些分类系统当中,至于支撑着这些分类系统本身的,则是关于世界的方方面面大致如何发展的那些已被广为接受的学说。

福柯描绘了文艺复兴知识型与古典知识型在一些领域上的差异,这些领域被如今的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分别由经济学、语言学和生物学所占据。他指出,每一种话语都受到那支配一切的知识型的强烈限制。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使得过去(仿佛可以)开口为自己说话。他的结论是:古典时期记号与事物之间的中介当中,是**归属 (attribution)、关联 (articulation)、指称 (designation) 和溯源 (derivation)**等运作支撑了数学图式、分类图式与遗传图式。这种系统的作用遍及古典时期各式各样的话语。为了揭示这一点,我们就得去看看人们

常常提及的一点:福柯否认就《事物的秩序》而言,自己可以被看作一位结构主义者,那样是对他这个人的简化处理。对于这部著作受到的结构主义的影响,曼弗雷德·弗兰克说得更为明确(Frank, 1992: 104),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结构主义者的标签或许适用于研究计划的方法论,但当福柯着手研究现代性时,他所做的就破坏了这种标签的适当性。

走出古典知识型,走入现代知识型,这一关键转换也就是逐渐摆脱认识论上的确定性。在福柯的事物图式中,社会科学属于古典时期,因为它们的核心概念,如功能、规范、冲突、规则、意指和系统,都是从古典时期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话语那里取来的;也因为是在整个本体论秩序里寻求理性分析的笛卡尔式冲动养育了它们。尽管如此:

人的科学不同于19世纪以来的经验科学,也不同于现代思想,无法找到一条路来避开再现的首要性;和整个古典时期思想一样,它们属于这种首要性之中,但它们绝对不是它的传人……那种构型确定了它们的实证性,赋予了它们在现代知识型中的根基,也同时使它们不可能成为科学……由于人类已经成为历史性的……人的科学所分析的那些内容也就再没有什么可以保持稳定了。(Foucault, 1966[1970]: 363—370)

因此,在书的结尾,福柯不得不驳斥知识型决定论。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现代知识型本身就被规定为超越了此类控制。现代性是一种永不安分的运动,将会持续下去的正是这种永不安分的性质,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此前种种知识型所残留下来的林林总总的现象,依然可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归根结底,它们再也不会是神圣的了)。因此,现代性中的社会科学必然在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而它们的践行者会被这一点弄得不知所措,对于这些人,福柯根本就不曾直接提及),它们在现代知识型中的存在也将在根本上描述和反映变迁。当我们思考后结构主义的时候,我们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考察着这些认识论后果。

可以说,福柯之所以没有能力展现出这样的前景,将生成性结构主义范式扩展到黑格尔那样的历史范围,原因正在于现代性本身的结构之中。不过,福柯在性情上也不适合去追求认识论上的闭合,这也是事实。因此,当福柯一方面将结构主义范式推向极致,同时却又对这种范式加以批评,在概括现代知识型特征时尤其明显,这样的态度虽然自相悖谬,倒也不让人奇怪。《知识考古学》一书延续了这样的批评,书中福柯力图证明,话语形态的观念并不是一种结构。无论如何,福柯1963年写的讨论巴塔耶的文章“越界绪论”,最好地表达了福柯对结构主义范式的颠覆。



■ 具体来讲,单挑出一句话——这也是我们考察结构主义转入后结构主义时可以考虑的第三个标志,它孕育了整个后结构主义批判的种子:“如果一种限制完全不可跨越,那它也就不可能存在”。在这句话里——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话——重点开始转向可渗透性、偶变性、时间性,以及结构主义迄今为止一直在力求确立(令人想起多年以前涂尔干业已看到的)结构的维持的需求、严格的程式以及坚硬的界限。

关于当前的界限划定有利于哪些人的宗旨,基于这一问题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批判直接遵循着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话语,并且可以看出在这些话语中起作用。以德勒兹和瓜塔里为例。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基础假设提出了如下质疑(而且,甚至当拉康主义者们自觉地在一种界限更为松散、模糊的后结构主义框架内工作时,已经有些学者在考虑摒弃界限的观念本身,不管这界限是不是可以跨越):

法律告诉我们:你不会娶自己的母亲,你不会杀自己的父亲。而我们这些驯服的主体也对自己说:这些正是我心中所想……可真实的情况却是,法律所禁止的,是欲望领域中纯属虚构的东西。(Deleuze and Guattari, 1972[1983: 114 — 115])

德勒兹与瓜塔里两人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称得上是一种质询式的哲学批判(如果质询成功,那么其成功的条件,也就是关联的可能性,或许也是其大量增生的充分条件)。这种批判也是对结构给定性的某种本体论解构〔最简捷的方式就是通过根茎关联(rhizomatic connection)概念,这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结构观念,其中的各种关联始终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在多样态的事物秩序中塑造和重新塑造的:“根茎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与其他任一点关联起来……这和树或根大为不同,后者规划了一个点,限定了一种秩序”(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7)〕。最后一点,这种批判还是一种关于可能性(作为本体性的创造)的政治,源于一种视世界为可能性的意志,一种以世界的潜在可能来估价世界的意志(Zourabichvili, 1998: 339 — 340),而不是将世界看作现有关联的结构所产生的一系列选定后果或必然后果。

后结构主义批判的另一个要素,就是将主体重新置入游戏的领域。近年来对尼采的观念,尤其是那些出自《道德谱系学》的观念,学者的研究兴趣有所回潮,一定程度上受此激励,主体开始扮演了一种特定的角色,那是结构主义话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禁止它扮演的。我们已经看到,在整整一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对拉

康的利用里,核心的动机便是社会性别化的主体这个观念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趋势,就是在福柯晚期关于古希腊的作品里,越来越趋向主体,引发了有关自我形塑的美学、有关主体作为“一件艺术品”的讨论。〔6〕

德里达常常与后结构主义联系在一起。当然,他确实赞同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主体,作为一种社会性和哲学意义上的可能性。比如他写道:

主体绝对是不可割弃的。我并没有破坏主体,我只是在给它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也就是说,我相信,无论是在经验的某个层面上,还是在哲学话语与科学话语的某个层面上,都不能没有主体的观念而取得推进。(Derrida, 1972: 271)

德里达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主体(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一种功能,而不是作为恢复元气的人性居所),还像德勒兹一样攻击了结构主义似乎预设的那种单向度的本体论。具体来讲,德里达将以下两方面对立起来:一方面是自由游戏的观念,是愿意接受积极解释的世界的观念;另一方面则是结构主义者对于控制和确定性的欲望(Derrida, 1978)。但不管怎么说,德里达对于后结构主义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完善了对于在场的批判,在于他指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永不可能真正触及物本身,无论这个物是一种现象的现实,对于它的寻求开辟了现象学,还是作为能指的另一面的所指,还是不管什么政治运动所允诺的乌托邦。德里达指出,这里始终存在一种延迟,这种推迟会永远地推迟那最后时刻的到来,在最后的时刻,我们会找出秘密,了解结构,见到我们的上帝,过上理想的生活。他进而指出,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观念在整个政治当中都是起作用的,并且通过价值观念对于文学与艺术的种种或微妙或明显的渗透方式,也在整个文化当中起到作用。解构实践就此诞生。它的精神在于探明那些所谓在政治与文化中超越能指的虚幻诉求。而它的实践则常常在于找出那些二元对立,比如黑人与白人,男性与女性,东方与西方,然后挑战它们内在的等级秩序,剥离两方中的一方的那些虚幻诉求,即惟有这一方能够通往某种隐含的在场环节(文明的“白人性”、男性的领导地位与保护能力、西方世界的理性)。不管怎么说,解构主义写作风格的传播凸显了德里达与德勒兹之间的一点重大差异,即解构并不旨在那些可能的东西,并不拥有“先知之眼”(Deleuze, 1998: 80),而德里达则有个无懈可击的回复,说这样一种“眼光”只不过是场之形而上学的另一种比喻。这场争论难有定论,正犹如结构主义本身的未来。



注 释

[1] 应当指出,关于结构分化的争论旷日持久,例如斯梅尔塞即有如下主张:

分化始终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统领全局的特性。专门化的职业(尤其是在服务业)不断衍生,科层组织不停扩张,都表明了这个进程,国际性生产专门化的巨大增长也是如此。这个现象并不仅限于经济与行政管理方面的活动。现代核心家庭的兴起就包含了将工作重新定位在工厂和其他正式组织当中,让家庭成为关注点更加集中的单元,“专门”负责社会化与亲密关系,就这样,经济活动从家庭中分化出来。同样,包办婚姻逐渐消逝,基于浪漫恋爱的婚姻逐步兴起,也标志着求爱不仅从亲属关系中分化出来,也从财产传递与地位传递中分化出来。在当代世界,我们见证了这个过程的极度扩张。非婚家庭、单亲家庭、同性恋同居、群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合法,标志着许多东西,其中就有核心家庭先前对于亲密关系的垄断业已发生分化,分散到其他类型的关系当中。与此类似,幼儿园、学前班、日托站、亲子中心和其他一些集体设施的建立,正是将儿童早期社会化分化出来。家庭在这方面此前近乎垄断的地位再一次分散了。试举最后一例,女性主义的政治宗旨之一就是社会性别认同从职业定位与地位安置中分化出来。(Smelser, 1997: 54—55)

仿佛作为直接的回应,朗西曼如此写道:

人们会这样预计: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们的结构与文化的变异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宽广。但是,并不是那么宽广。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说法,不妨试着列出:在一个幅员广大、繁荣文明但依然处于前工业时代的社会里,分配和实施权力的所有既存方式,甚至所有可能的方式。(Runciman, 1998: 119)

朗西曼针对任何一个幅员广大、繁荣文明但依然处于前工业时代的社会,开列出十种组织劳动力的方式,十种社会等级排列的形式,六种安排合法暴力手段的模式,将这一整套形式华丽的家伙说成是“基于全部可选择替换的实践做法的名单,其长度远远不算难以把握,其新奇也远远谈不上令人困惑”。可以将这样一种形态学的结构主义联系到看待非连续性社会发展的另一种观点,就是将间或发生的社会发展(比如书写或资本主义工业)视为开启了整个局面为之一新的难以预料的视野。而在斯梅尔塞更具连续性和进化论色彩的观点中,创新或许始终处在形成过程之中。

[2] 在19世纪的生物学中,也有制度上无法实现的形态学承诺所造成的类似障碍(Nyhart, 1996)。

[3] 芬克指出,拉康在1960年对于镜像阶段命题的重新阐释极其重要。芬克写道:“由于在镜前抱着孩子的父母所做出的赞赏姿态,镜像阶段被内化,并被赋予力比多”(Fink, 1997: 88)。芬克接着指出,这对于孩童如何将父母的理念内化的刻画是切中要害的。还可以指出,这种刻画巧妙地将镜像阶段与阿尔都塞的“质询”观念联系起来(有关对此观念的批评意见,参见Dolar, 1993; Butler, 1997)。

[4] 这是一篇被广泛征引的文章,探讨了反叛、对抗、恐怖主义之类的主题(以及纪念碑式时间与线性时间的观念)。她在1994—1995年的巴黎讲演中还会回来探讨这些主题,随后以《反叛之意义与无意义》(*Sens et non-sens de la révolte*)出版。在其中她提出这样的主张:权力如果缺乏单一的中心,或许会要求建立某种反叛文化的制度,如果不是一切都变得机械呆板、死气沉沉的话。

[5] 关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中的这次转换,重要的是它对于界认基本结构特性的过程意味着什么。科学与意识形态之区分支持了一种特定的结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以意识形态为终点的目的论式运动(这种基本的结构前提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所共享,但在结构主义中一般给予了批判性的处理)归根结底规定了历史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离弃的一面的意识形态模式让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如何运作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对于社会生活的功能主义理解下,关于历史的假定往往要么是结构性存在条件始终如一(例如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要么是在一些点上,几乎无法解释清楚这些结构条件,但可以很肯定地说发生了变化。后面这种情况的最好例证便是福柯的《事物的秩序》。

[6] 在福柯《性史》第二、三卷中,我们发现希腊的男性公民所过的生活必须保持明确的自我控制和节制。男人的领袖所过的生活,理当始终与某种美学联系在一起。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并不是一种欲望解释学,而是一种生存美学:既非遵从一致,亦非斋戒净化,而是将生命作为一件作品来度过,确立值得景仰的限度与内在准则。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会声称的那样,美的生活与任何领域中不加约束的过度都是格格不入的。所有的人都要看到生活的自我主宰所具有的美。


参考文献

Althusser, L. 1965 (1969):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73: 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entific discovery. *Theoretical Practice*, no. 7/8, 4—11.

Andreski, S. (ed.) 1971: *Herbert Spencer: Structure, Function and Evolution*. London: Nelson.

Andrews, H. F. 1993: Durkheim and social morphology. In S. Turner (ed.) *Emile* 

- *Durkheim: Sociologist and Moralist*. London: Routledge.
- Barthes, R. 1964 (1967): *Elements of Semiolog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utler, J. 1997: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 1972: *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90: On the nature, use and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In W. G. Lycan (ed.) *Mind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 Corning, P. 1982: Durkheim and Spenc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359 — 382.
- Deleuze, G. 1992: What is a dispositif? In T. J. Armstrong (trans.)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er*.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Wheatsheaf.
- 1998: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London: Verso.
- and Guattari, F. 1972 (1983): *Anti 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 ———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errida, J. 1967 (1976):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72: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In R. Macksey and E. Donato (eds.),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Dolar, M. 1993: Beyond interpellation. *Qui Parle*, 6(2) 73 — 96.
- Durkheim, E. 1895 (1982):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Macmillan.
- 1912 (191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London: Macmillan.
- Fink, B. 1997: *A Clinical Introduction to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63 (1977):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In his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Oxford: Blackwell.
- 1966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Tavistock.
- 1986: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The Use of Pleasure*. London: Penguin.
-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 *The Care of the Self*. London: Penguin.
- Frank, M. 1992: On Foucault's concept of discourse. In T. J. Armstrong (trans.)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er*.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Wheatsheaf.

- Guberman, R. M. (ed.) 1996: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umperz, J. J. and Levinson, S. C. (eds.) 1997: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rigaray, L. 1985: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3: *Je, Tous, Nous: Toward a Culture of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Jakobson, R. 1960: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 A.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Jay, M. 1993: *Downcast Ey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risteva, J. 1986 (1979): Women's time. In T. Moi (ed.)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 1996: *Sens et non-sens de la révolte*. Paris: Seuil.
- Kuper, A. 1973: *Anthropologists and Anthropology: The British School 1922 — 1972*. London: Allen Lane.
- Lacan, J. 1966 (1977): *E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 Lévi-Strauss, C. 1949 (196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 1960 (1967): *The Scope of Anthropology*. London: Jonathan Cape.
- 1962 (1966): *The Savage Min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64 (1975): *The Raw and the Cook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Lukes, S. 1973: *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Allen Lane.
- Lyons, J. 1970: *Chomsky*. London: Fontana.
- 1973: Structuralism and linguistics. In D. Robey (ed.) *Structuralism: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ey, D. 1995: On the subject of Lacan. In A. Elliot and S. Frosh (eds.) *Psychoanalysis in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72 — 86.
- Malinowski, B. 1932: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3rd ed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Nyhart, L. K. 1996: *Biology Takes For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Radcliffe-Brown, A. R. 1952: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London: Cohen and West.
- Ricoeur, P. 1974: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



- versity Press.
- Runciman, W. G. 1998: *The Social Animal*. London: HarperCollins.
- Saussure, F. de 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Fontana.
- Scott, C. E. 1989: The pathology of the father's rule: Lacan and the symbolic order.
In E. Wyschogrod et al. (eds.) *Lacan and Theological Discourse*. Albany: SUNY Press.
- Scubla, L. 1998: *Lire Lévi-Strauss*. Paris: Editions Odile Jacob.
- Smelser, N. 1997: *Problematics of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lace, J. 1998: The feminine mystique (a meeting with Luce Irigaray).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September 18, 19.
- Wayne, H. (ed.) 1995: *The Story of a Marriage: the Letters of Bronislaw Malinowski and Elsie Masson*.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 Wright, E. and Wright, E. (eds) 1999: *The Žizek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 Žižek, S. 1991: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Zourabichvili, F. 1998: Deleuze et le possible (de l'involuntarisme en politique). In E. Alliez (ed.) *Gilles Deleuze: une vie philosophique*. Plessis-Robinson: Institut Synthélabo, 335 — 357.

深入阅读文献

亦参上列文献

- Calvet, L. -J. 1994: *Roland Barth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uller, J. 1975: *Structuralist Poetics*. London: Routledge.
- Differences* 1992: (The Phallus Issue), 4(1), Spring.
- Dosse, F. 1997: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 vol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Elliot, G. 1987: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London: Verso.
- Fraser, N. 1998: The uses and abuses of French discourse theories for feminist politics. In S. Mariniello and P. Bové (eds.) *Gendered Agents: Women and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acan, J. 1977: *É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Lévi-Strauss, C. 1968: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Penguin.

Moi, T. (ed.) 1986: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Stocking, G. W. 1995: *The Heroic Age of Anthropology*. London: Athlone.

Whitford, M. (ed.) 1991: *The Irigaray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第三编

社会分析与文化分析视角种种



第⑦章 20世纪的符号互动论



K. 普鲁默

普鲁默 (Ken Plummer) 是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他长期关注符号互动论、定性研究方法以及性的社会学特征。他的主要著述是《性的污名》(Routledge, 1975), 《生活的记录》(Allen & Unwin, 1983), 以及《讲述荤故事》(Routledge, 1995)。他还发表过大量的论文, 编有《符号互动论》(两卷本, Edward Edgar, 1991), 《芝加哥学派》(四卷本, Routledge, 1997), 《现代同性恋的形成》(Hutchinson, 1981), 以及《现代同性恋种种》(Routledge, 1992)。目前, 他和 John Macionis 合撰了教材《社会学——全球性视野的概论》(Prentice Hall, 1998), 并创办了《Sexualities》杂志。

7.1 符号互动论: 形象、历史、主题

充满争议的历史

7.1-1 早期岁月: 互动论思想的基础

实用主义的传统

形式主义与齐美尔的遗产

7.1-2 互动论之盛期: 实践中的芝加哥社会学

7.1-3 流行、批判和更新

7.2 进一步的发展: 重归互动理论

否定与忽视

7.2-1 摆脱 20 世纪的虚设二元论: 微观分裂之终结

7.2-2 通过微小概念 / 启发性概念对经验世界作理论阐述

7.2-3 后现代主义与符号互动论的竞争性亲和?

7.2-4 “超出理论的”诸向度: 方法、道德与权力

7.3 面向后现代世界的批判性人文主义实用主义?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不是完全的封闭,完全的稳定,仍然有某些不确定的方面,仍然处在塑造过程之中……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不确定性、选择、假设、新颖以及可能性,都是那么自然……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出于偶然的世界里,如果直言不讳,那么他的存在就是一场赌博。世界就是一场冒险,它不确定,不稳定,非常地不稳定……

——约翰·杜威

世界始终是有所不同的。每天清晨我们睁开双眼,都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满脑子里想的就是不断地适应这些差异。生活也因此充满了乐趣。我们始终是在向一个新的世界前行……

——乔治·赫伯特·米德

实用主义体现了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哲学立场,也就是经验主义的立场。但它对于这种立场的体现……比起经验主义迄今所呈现出来的形式来说,更加激进,也更讨人喜欢。一个实用主义者,面对职业哲学家所珍视的许多根深蒂固的习惯,他(原文如此)会毅然决然、一以贯之地予以拒绝。他拒绝抽象和不充分,拒绝光说不做的解决之道和先验推定的不当理由,也拒绝一成不变的原则、自我封闭的体系以及煞有介事的绝对和起源。他偏向具体和充分,偏向事实和行动,也偏向力量。这就意味着,经验主义者的性情到处占上风,而理性主义者的性情则甘拜下风了。它意味着活泼开放的空气,充满潜力的自然,而不是教条、做作以及真理中那种自命不凡的决定性。

——威廉·詹姆斯

带着实用主义、人文主义色彩的符号互动论学说,已经不动声色地成为 20 世纪最为持久的社会理论思潮之一。它命运跌宕,有时步步上升,有时被宣告死亡,但始终是在变化,在适应周围的世界。有些评论者已经提到了晚近“符号互动论渐显迟暮”(Saxton, 1989);另有些评论者却说起“符号互动论重焕生机”(Stryker, 1987);还有些评论者在谈“符号互动论先是可悲地沉入老朽,中间神秘地消失了一段,最后又光荣地卷土重来”(Fine, 1993);而在其他一些人看来,它是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先驱。但不管怎么说,现在一方面是大数社会理论家都忽视它,同时也有一些自封的符号互动论学者组成界限明确的群体,通过他们自己的杂志、会议、网站和专业组织(符号互动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ym-

bolic Interaction]), 为它摇旗呐喊, 装扮成种种“后布鲁默主义”(post-Blumerian)的形式, 横扫社会理论的大部分领域(参看 Fine, 1990; Denzin, 1992: xiv)。本章我的目标是要大致介绍一下, 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 这种纷繁多样的理论有着怎样曲折多变的命运, 并为它在下一个世纪的未来指点一些路向。

7.1 符号互动论: 形象、历史、主题

绝大多数的符号互动论社会学, 尽管它们之间各有差异, 但是都贯穿着四项彼此交织的主题。第一项主题认为, 体现人的特色的世界不仅是物质的、客观的世界, 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号的、象征的世界。实际上, 对于符号互动论学者来说, 使人类不同于其他所有动物的标志, 正在于他们发达精细的符号体系: 这种生产符号的能力, 使人们能够生产出一种历史, 一种文化, 生产出复杂交错、含有多重意义的沟通网络。符号互动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 就在于关注人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组合意义的任务: 我们如何界定我们自己, 我们的身体和冲动, 我们的感觉和情绪, 我们的行为和处事; 我们如何界定我们所处的情境, 形成对于更广泛的社会秩序的视角, 编织叙事和故事来说明我们的行动与生活; 而诸如此类的意义是如何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不停地塑造出来, 又是如何通过日常遭遇得到处理、调整、转换因而演化的。这是一个由话语组成的符号世界, 是由记号、解释者(interpretants)和客体对象所组成的三重聚合, 而在这样的世界里, 意义永远也不会固定下来, 不可变易。相反, 意义始终在变动, 突生, 最终具有多重性。尽管我们可能以惯常的方式创造习惯、例行常规和共享意义, 但这些东西始终可以接受重新估价和进一步的调整(Perinbanayagam, 1985; Rochberg-Halton, 1987; Wiley, 1994)。

这就点出了第二项主题, 也就是关于变化、流动、突生、过程的主题。生活, 情境, 乃至社会, 都是每时每地在演化、在调整、在生成。这种持续不断的过程使得符号互动论学者关注人们通过哪些策略, 来获得这样一些认识: 自我, 塑造生平, 适应他人, 组织某种时间感, 协商秩序, 直至建构文明。这种对于社会世界的看法是非常积极的, 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世界里, 始终在通过这些互动, 干着自己的事情, 拼合各自的活动路线, 并构成社会。这就是第三项主题——互动。一切互动论研究的焦点都既不在于个人, 也不在于社会本身, 而是在于协同行动, 人们的生活就是通过这些协同行动组织起来的, 而社会也是通过它们组合起来的。这种研究关注的是“集体行为”。它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自我, 这就意味着, 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始终体现着“他人”(the other)这个观念: 我们永远也不能够只靠一个“自我”

■ 孤单过活 (Wiley, 1994)。但是,它所有的核心观念和概念突出的都是这种始终影响着个人的社会他人 (social other):“个人”这个观念本身实际上是通过他人来建构的。从本质上讲,互动论关注的就是“人们如何一起做事”(Becker, 1986)。

第四项主题关注的是积极介入经验世界。符号互动论学者不像其他许多社会理论那样只在理论的天国里高高翱翔,而是始终扎根地面。

研究任何一种社会性的现象,符号互动理论都可以提供指导。尽管将会发现的始终属于经验调查的内容,但是从原则上来说,互动论学者可以考察和探究社会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正如布鲁默所言 (Blumer, 1969: 47):

符号互动论是以脚踏实地的路数进行的对于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的行为的科学考察。它的经验世界就是发生这类群体生活和行为的自然世界。它把自己的问题定位在这个自然世界当中,在这个自然世界里展开自己的研究,并从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中推出自己的解释。如果它希望考察宗教崇拜的行为,就会深入实际发生的宗教崇拜,仔细观察它们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它希望考察社会运动,就会悉心追踪实际运动的历程、历史和经验。如果它希望考察青少年当中使用毒品的情况,就会下到这些青少年的实际生活当中,对这类使用情况进行观察和分析。至于其他引起它关注的事情也大致如此。因此,它的方法论立场就是对经验世界进行直接的考察。

所有这些主题都融会在一起。意义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的过程,它就是从互动中突生出来的。自我也是从日常偶遇中塑造出来的一种过程,被赋予的意义也是变动不居。社会客体负载着什么样的意义,就取决于人们在协同行动中是怎样处理它们的。社会则是各种“社会世界”的一个巨大母型,通过“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符号互动而构成。只有立足一个有切实的根基、有观察渠道的经验世界,才能够去考察自我、日常偶遇、社会客体、意义等范畴。因此,在种种符号互动论社会学学说背后,有一种关于符号、过程、互动以及亲密熟悉感的普遍意象。这一切都有助于塑造它的理论工作的面貌。

充满争议的历史

关于符号互动论的历史,现在有好些种说法。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一块充满争议的领域。在这种理论的当代倡导者里面,登钦或许算得上最杰出的一位。他就提出

过一种分六阶段的历史,从 1890 年到 1932 年间的“范典”确立阶段,历经其他一些阶段,一直到晚近的“多样性与新理论:1981—1990”阶段(Denzin, 1992: 8)。但是,这种提法基本上还只是一种相当武断的分期。还有许多学者的年代划分尝试与此不合。这丝毫没有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如果世界就像符号互动论学者所描绘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1)关于符号互动论,不存在任何一种一成不变的意义;(2)有关符号互动论的性质和起源的种种“说法”也会因时而变,实际上是允许不断进行重新商谈的;(3)符号互动论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取决于具有显著意义的他人的界定,是这些重要他人的互动构成了它的意义。

因此,理论的那些起源和历史本身就是一块充满争议的领域。长久以来,学习社会学的本科生们一直被教导说,乔治·赫伯特·米德是 20 世纪 20 年代互动论的创建者。但是,这个术语本身却是由布鲁默在 1937 年撰出来的,他当时写了一篇用作教材的短文,为学生读者评述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现况(Blumer, 1937)。从符号象征的意义上讲,这个年代可以看作是理论的创建,而布鲁默就是它的创建者。但这又会把一个复杂的沟通问题给过于简化了,有悖于符号互动论学说本身。在有些人看来,创建者是帕克(Strauss and Fisher, 1978)。另有些人看来,创建者是更一般意义上的芝加哥学派(Joas, 1987)。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再向前追溯很多,把亲缘关系一直推回到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回到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推回到 11 世纪经院哲学的唯名论;或者更近一些,推回到仅仅 200 年前的苏格兰道德学家,或者在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作品中发现的“道德哲学的常识学派”。对后面这些人来说,“社会必然是一种母型,人的心灵从这里获得理智和道德情感”。他们为角色扮演、自我和心灵提供了一种最基础的说法(Shott, 1976)。尽管如此,大多数美国早期互动论学者似乎都不太可能受到这类文献的特别影响。

即使我们继续看更晚近的发展趋势,符号互动论的“意义”也丝毫不见得更清楚些。* 在布鲁默想出这个术语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似乎并未被人普遍使用。贝克尔这位当代第一流的互动论学者可以告诉我们,在他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50 年代前期呆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术语。而作为这股传统的另一位推动者与引导者,休斯的情况可能也是一样。更尖锐的评论见于曼福德·库恩,他在有关 1937 年至 1964 年间(即他所称的“探索时代”)符号互动论发展趋势的报告中谈到,“一大堆理论分支混战一团,名目各异,却唯独没有符号互动论的称法”,倒是列出了角色理论、参照群体理论、自我理论、人际理论、语言和文化理

* 原文此处为“no less clear”,但根据上下文,疑为作者笔误,应为“no more clear”。——译者注



论以及人的知觉 (Manford Kuhn, 1964)。直到 1970 年,一系列的读本和教材已经出版,“符号互动论”这个术语已经充分确立,此时还有梅尔泽、佩特拉斯和雷诺兹引入了一套划分体系,分出了四类学派:“芝加哥学派、衣阿华学派、拟剧论和常人方法学”(Meltzer, Petras, and Reynolds, 1975)。这种类型划分体系如今看来是带有误导性的。从符号象征的角度上说,芝加哥学派是与布鲁默联系在一起的(尽管那时他已经在加州伯克利,正在开创一个“加州”学派!),被认为比衣阿华大学的曼福德·库恩所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更具有人文主义色彩。不过至少这两个学派还都宣称是符号互动论。但姑且不论种种争议,不管是戈夫曼的拟剧论,还是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都不是那么容易归入一类的。前者的来源在涂尔干,后者的来源在帕森斯。所以说,不管如何尝试写一部 20 世纪符号互动论史,势必会有所偏重,有所筛选。

7.1-1 早期岁月:互动论思想的基础

如果把符号互动论当成一块广博的思想领域,是可以认为它和不少思想传统有亲缘关系的。而这些思想传统中绝大部分肇始于北美社会,或者至少是在北美社会如鱼得水。(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地方工作的互动论学者寥寥无几)。它的谱系可以联系到人文主义、浪漫主义、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不过在本文中,重点将放在后两种传统上,也就是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带有矛盾性质的混合。这两股思潮实际上都源出于欧洲思想,并且在理论中确立了持久的张力 (Rock, 1979)。

实用主义的传统

符号互动论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当然要算是实用主义,它把这个传统整个儿接受了下来。实用主义是北美的主导哲学,它拒绝去追寻什么根本性、奠基性的真理,回避建立抽象的哲学体系,而是意味着基于具体经验和语言的变动不居的多元真理,其中的真理是根据其后果来予以评价的。在这方面,人们经常提到的有米德的自我理论,詹姆士对经验的描述,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库利的“镜中自我”,以及杜威的民主改良学说。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理论,产生于一个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但很奇怪的是,却在 20 世纪晚期,在罗蒂、迪恩、威斯特以及大多数女性主义的研究里重新焕发生机 (Dunn, 1992; Joas, 1993; Seigfried, 1996; Dickstein, 1998)。实用主义力图将理智的思维和逻辑的方法与实践的行动统一起来,并诉

求经验,诉求民主化的推动力。

乔治·赫伯特·米德的遗著《心灵、自我与社会》(Mead, 1934)常常被视为核心原典。它表达了符号互动论中许多核心的工作观念:分析牢固确立在社会中的经验;语言、符号和沟通在人类群体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的言语和姿态通过角色扮演的过程,以哪些方式激起他人的反应;自我的反思性和反射性(reflective and reflexive nature of the self);以及“行为”的核心地位。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科学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的角色,因此立志要把这一切给统贯起来:“科学方法……无非是一种高度发展的不完全智力形式……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米德所倡导的立场有时候被叫做“客观相对主义”,他会考虑“多种视角的客观现实”。关于现实可以有多种描述,就看采取的是哪一方的立场。比如说,历史就始终是从某个处在现时的人的角度对过去的描述。与此类似,任何理论家或理论都有可能面临一系列不同的解释和重新解释。比如在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里,法恩和克莱曼(Fine and Kleinman, 1986)就讨论了“米德的‘真实’意义”,认为可以把米德看作一位符号互动论学者、社会行为主义者、心理学功能主义者、现象学家、法团自由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一元论者、观念论者、黑格尔主义者、唯实论者、唯名论者、自然主义者,还有就是一位经验主义者!真正的乔治·赫伯特·米德面对这些会感到满意么?

但是,单单关注米德(1863—1931)会让人误入歧途。因为除他之外,至少还有三位实用主义学者对互动论观念深具影响:詹姆士(1842—1910)、杜威(1859—1952)和皮尔斯(1839—1914)。他们彼此很不相同,而这些差异已经预示了互动论中的一些思想争论:皮尔斯和杜威常常被看作唯实论者,而詹姆士和米德则被认定是唯名论者。比如说,詹姆士倾向于现象学,而皮尔斯则主张以唯实论的立场来考察记号。实际上,皮尔斯是符号学的创建者之一,他的作品大体上与主流互动论路线不一致。

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他们都倡导实用主义。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独具特色的北美哲学的形象被严重扭曲了,被看作一种市场资本主义的哲学,里面所有的观念都必须是有用的,或者说具有“可兑价值”。但根据詹姆士的看法,这是一种严重的歪曲。实用主义涵纳多元立场,但其核心意涵就是三样事情。首先,它认为处理具体的、特定的东西比探讨抽象的、普遍的东西更重要。詹姆士在《实用主义》里说:“让那些伟大的帝国,包括绝对范畴的帝国,都见鬼去吧……给我个人,给我他们的活动领域”(Perry, 1935:卷二, 315);而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宣称,“所谓单独存在的个人,是在经验中看不到的抽象,而当社会被看作与个人相分离的东西时也是如此。人的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Cooley, 1956:

36—37)。只有皮尔斯是个重要的例外,其他没有一位实用主义者热心建构哲学体系,与其相关的是,也不热心寻求柏拉图式的本质的东西。正如罗蒂所言:“我概括的实用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在用于‘真理’、‘知识’、‘语言’、‘道德’之类的观念以及类似的哲学理论概括对象上时,它纯粹是一种反本质主义。”(Rorty, 1982: 162)

因此,实用主义的第二项核心意涵就是:对**惟一真理**的寻求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对多元真理和意义的寻求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这里的复数形态的真理,是从通过语言所产生的可感效应的角度来理解的。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就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与**我们经验的其他部分**结成令人满意的关系”。最直截了当的说法,就是托马斯的名言:“一旦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真实的,情境就具有了真实的效果”。与此类似,詹姆士在《实用主义》里也问道:“如果一样东西是真实的,那么会对某人的实际生活带来什么样具体的不同?”皮尔斯在他那著名的“实用主义公理”里也说到了这一点,只是不那么精警:

考察是什么东西在发挥效应,也就是那些可以理解为产生实际意涵的东西,我们也**就在考虑我们的观念对象的内涵**。因此,我们对于对象的全部观念,也**就在于我们对于这些效应的观念……对于一种属性乃至其他任何属性的全部观念,就在于它的可把握到的效应**。(引自 Scheffler, 1974: 77—78)

第三项核心意涵,就是避免哲学二元论的立场。也就是说,在理论中明确反对区分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主体与客体,以及有创新潜力的因素与业已确定的因素。通过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具体的东西上面,也就直接超越了西方哲学思想中永无终日的二元论争执。而烦扰着大多数社会学的“行动—结构”之争,也就表明是一场虚设的争论 (Strauss, 1993)。

形式主义与齐美尔的遗产

在齐美尔对于形式的关注里,可以找到塑造互动论面貌的第二股重要思想传统,不过这股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实用主义的遗产相对抗 (Rock, 1979)。齐美尔 (1858—1918)写的是短文,是关于社会生活的闲谈散论,像显微镜一般细节丰富,质地绵密,但全然缺乏系统,未有定论。他的这种模式也预示了日后大部分互动论作品的形貌。他的考察范围广泛,形态多变:从讨论康德和歌德的著作,到关于艺术和文化的研究,再到宗教、货币、资本主义、性别、群体、都市生活方式、道

德伦理乃至爱情等等方面的重要分析,所有这些都他的众多论题之内。在齐美尔的作品当中,最重要的是细节,而不是抽象的概括。因为他主张,要就其本身来理解整体或总体是不可能的,但研究的任何一段碎片都有可能让人对整体有某种把握。

他的社会学非常独特,区分了形式和内容,意在穿透相互对立、混杂一团的种种社会经验,以便触及其下那些根本性的人类结合形式:冲突与容纳,服从与等级,附加与分解。它的宗旨是要捕捉社会生活的种种潜在“形式”,提供一套“社会生活几何学”。在齐美尔创见性的作品里,他区分了社会生活的“内容”(战争、做爱、教育、政治)与“形式”(比如冲突),后者贯穿了这些领域,社会生活也是通过这些形式获得模式的。冲突作为一种形式,可以在战争、做爱和政治等多种不同情境中找到。而这种形式会逐渐获得某些特定的共同特征。“内容”是富于变化的,而“形式”则作为组织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显露出来。在齐美尔的思想里至关重要的“形式”包括:群体组合数目(单独的个人,二人群体,三人群体)的重要意义,上位(superordination)与下位(subordination)的模式,群体关系(冲突、竞争、联合),认同与角色(陌生人、穷人),暴露(秘密,秘密社会),以及估价(价格、交换)。从某种意义上讲,齐美尔的作品属于结构理论的一种基础形式,可以看作在一定程度上与互动论的实用主义遗产相抵触。但本章下文将会展示,通观互动论的整个历史,一直非常重视形式:对于社会互动形式的探求是互动论理论追求的核心。在互动论的分析里,到处散落着微小概念(mini-concepts):生涯、社会世界、自我、污名(stigma)、意识情景(awareness contexts)、剧本(scripts)、地位过渡(status passages)、策略、角色、集体行为、视角、认同、情感工夫等等。这些概念与齐美尔脑子里想的或许不完全一致,但在多种不同的实质研究领域之间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联系纽带,突出了实现互动的那些实践中的基本过程。

7.1-2 互动论之盛期:实践中的芝加哥社会学

实用主义哲学和形式理论的传统在芝加哥经验社会学那里汇聚一处,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是通过亚当斯的作品(Deegan, 1988),后来是通过帕克(1864—1944)的作品。帕克是齐美尔的学生,后来当过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在有些人看来,也是符号互动论真正的创建者。帕克带给芝加哥大学的方向,是既关注城市中体现出来的经验世界的丰富细节,同时探究城市生活的种种“模式”(Mathews, 1977)。在20世纪的头四十年里,芝加哥社会学主导了整个北美社会学;而符号互动论正是它未曾言明的理论。芝加哥大学第一个建立了社会学系

■ (1892年由斯莫尔建立);随之(在1895年)创办了第一份重要的社会学专业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05年成立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然后是第一本重要的学生教材,帕克和伯吉斯合编的《社会学科学导论》(1921年);一所规模不小的研究生院;还有一系列重要的研究专著。芝加哥社会学坚定地经验世界进行直接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完全不同于在此前后有些北美社会学家更抽象、更系统也更偏理论性的倾向。正是在芝加哥,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写出了他们里程碑式的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这部书是20世纪早期北美社会学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但今天人们却太随意地忽略了它。正是在芝加哥,帕克告诉他的学生们“去坐在豪华旅馆的大堂里,也坐在廉价客店的门阶上;坐在高级住宅的沙发里,也坐在贫民棚屋的地铺上;坐在庄严堂皇的大音乐厅里,也坐在粗俗下流的小歌舞厅中。简单说吧,去做实际研究,把你裤子的屁股坐脏”(Bulmer, 1984: 97)。正是在芝加哥,城市生机勃勃,大肆扩张,就像一间“社会实验室”,像一幅“多重社会世界的镶嵌画”,等待着人们的细致研究。也正是在芝加哥,经典的个案研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塞拉瑟的《团伙》(*The Gang*),肖的《小偷儿》(*The Jack Roller*),安德森的《流浪汉》(*The Hobo*),佐尔博的《高级住宅区和贫民区》(*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还有沃思的《贫民窟》(*The Ghetto*)。但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些范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观察和个案研究方法的发展。这种对于**经验理论**的关注始终普遍渗透在互动论学者的作品中,使其成为可能是20世纪惟一重要的经验理论。互动论的基础就这样渗透在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对经验世界的直接观察之中。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这是理论在世纪末依然保存的一个特征,尽管现在它已经变得复杂了许多(Faris, 1970; Plummer, 1998)。

布鲁默(1900—1986)在20世纪30年代把这一切都推进了一步。他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米德在30年代早期去世之后,是布鲁默接手了米德的课程。他发明了“符号互动论”这个词。而他始终关注的就是社会学应当成为对于群体生活的脚踏实地的研究。他的立场鲜明地体现在其主要著作《符号互动论》(Blumer, 1969)中。实际上,正是布鲁默提供了符号互动论中最常被引用的“典范”,所以他值得一引。他认为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建立在三项核心假设上:

第一项假设是:人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是根据事情对于他们所具有的意义来决定如何行事的……第二项假设是:这些事情的意义来自于或者说生发于一个人与自己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第三项假设是:人在应对自己所遭遇的事情时,会使用一套解释步骤,而这些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处理和调

整的。(Blumer, 1969: 2)

就是这些重要的意象,指导着对于这种视角来说至关重要的田野调查。但是,它们几乎构成不了任何成熟完善的“理论”。尽管如此,布鲁默还是避免抽象的理论。布鲁默很不喜欢社会学家当中的一种倾向,就是去分析自己并不曾亲眼见证的现象。而对于宏大的抽象理论,他更是深表厌恶。相反,他力倡这样一种方法论:探索和审察丰富、多变、鲜活的社会经验;从经验当中提炼启发性(sensitizing)概念;直接基于经验世界来提取理论;不断返回经验世界来核查这类理论的实用意义。具体说来,他感兴趣的是大众传媒、时尚、集体行为、劳资关系、种族关系以及生活史研究。况且,尽管布鲁默写过许多关于米德的东西,但他并不只是米德的诠释者。他同样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者。贝克尔曾经评论道:“很少有社会学家在他的思想中不曾论及”。对于社会理论和方法中的大多数谬误,布鲁默都是一位不容忽视的批评者;不仅如此,他的作品实际上还包含了一种以集体行为为核心的公理演绎式理论。(在他去世后不久《符号互动》杂志出版了一期专辑[*Symbolic Interaction*, 1988]评析了他的作品,而我也写过一篇有关他的短论[Plummer, 1998])。

20 世纪 80 年代一开始,就出现了两部重要著作,重新谱写了互动论在芝加哥的这段早期历史,充分考虑了布鲁默在这段历史整体中发挥的作用。第一部题为《符号互动论的形成》,作者是英国一位杰出的互动论学者罗克,他认为“可以不无裨益地将互动论理解成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与一种实用主义认识论的混合产物”(Rock, 1979: 28)。我在本文中主要就是借鉴了这条思路。但第二项研究所提出的说法就引起了许多争议。这是由刘易斯和史密斯合著的《美国社会学与实用主义:米德、芝加哥社会学和符号互动论》。站在所谓互动论伊利诺斯学派(Illinois school)的立场上,这部书提供了一部“修正历史”,认为“尽管符号互动论学者认为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源于米德,但文本的分析表明,布鲁默和米德甚至在元理论的层面上也不属于同一个阵营”(Lewis and Smith, 1980: 25)。刘易斯和史密斯在追溯互动论的根源时,不仅是从哲学的角度,而且还翻检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课程阅读书目与交往关系,结论是:米德是一位唯实论者(与皮尔斯同属一类),而布鲁默则是一位唯名论者(更近于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据称,布鲁默对互动论的重新构建,要比会在米德那里找到的方式具有强烈得多的个人主义色彩和主体论色彩。他们的书出版之后,带出了许多评论和专题论文集,激起了激烈的争议,不过在此无法详述(Plummer, 1991: 卷一,第三部分)。





7.1-3 流行、批判和更新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芝加哥社会学”开始趋于衰落。帕克去世，伯吉斯退休，布鲁默也转往加州执教。但符号互动论的研究传统却延续下来，并且进入一段扩张时期，被称作“探索时代”。曼福德·库恩（被称为正在兴起的衣阿华科学主义互动论学派的领袖）在 1964 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评论，回溯了过去 25 年的情况，就从中找出不少关键性的概念发展——从角色理论到“语言和文化理论”（Kuhn, 1964）。在此之前 2 年，罗斯编辑了一本颇有新意的文集，也已经展示了在这股欣欣向荣的传统里，当时正在开展的一大批题材广泛的研究：从家庭和工作，一直到偏离与健康（Rose, 1962）。显然，到了 20 世纪中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符号互动论都已经留下了自己的深远影响。作为一篇简短的评述，本文篇幅有限，不能对所有这些趋势和发展逐一进行评述。近来，其中的一些趋势和发展已经被视为第二期芝加哥学派（Fine, 1995）。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符号互动论慢慢成为一种深具影响的理论，并且主要是作为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帕森斯理论的一种批判。它有助于重新塑造不少考察领域中的思维（特别是偏离行为、职业、教育、性以及医疗）。从 60 年代中期以来，读本和教材开始以加速度大量涌现，这也有助于树立并在实际上确立了互动论的根基，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正统，至少在社会学倾向的社会心理学方面是这样（有关最近的实例，参看 Herman and Reynolds, 1994）。不过，就像任何正统学说一样，它也招来了攻击。到了 70 年代早期，它已经陷入了来自许多方面的严厉批评。在一部很有影响的社会理论评述著作中，N. 穆林斯与 C. 穆林斯甚至可以这样说（Mullins, N. and Mullins, C., 1973: 98）：

显然，符号互动论中发展出来的那些独到观念，就像标准美国社会学的那些观念一样，在思想和社会的角度上也都有它们自然的演变规律。有些符号互动论学者依然在积极地著书立说，而作为社会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符号互动论也依然受人尊重。但要说是作为社会学中左右局势的力量，作为社会学的总体取向，作为针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坚定抗衡，它却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 1983 年的修订版中，他们稍稍调整了这种立场。尽管如此，丧钟已然敲响。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失败被推到它的头上。人们指责它的理论过于个人化，过于注重主观，忽视了结构和客观的一面。它被认为是极端的相对主义；方法论上混乱一

团；概念阐述上含糊不清，尤其是关于“自我”的概念阐述。它既被指责为过度的唯意愿论，同时又被指责为过度的决定论。更偏心理学取向的人认为，它忽视了情感的生活和无意识的范畴（那其他社会学又该当何罪？）；而结构社会学家则认为它没有能力处理权力、结构、经济和历史。许多学者认为，它太关注短促的、片断的、边际的、奇异的东西，而忽视了群体生活的整体领域。这一切还不够，人们还认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来讲它也不讨人喜欢，要么说它太保守，要么说它太自由，就看批评者自己是什么立场了。考虑到这等令人生畏的接连攻击（梅尔泽等人有所讨论 [Meltzer, Petras, and Reynolds, 1975]，登钦则有进一步的分析 [Denzin, 1992]），再见到 70 年代早期两位穆林斯能来宣告互动论的死亡，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但这场葬礼举行得为时过早。一方面，许多早期的关注已经继续发展成为成熟的正统，在教材、读本、概述和纲领性陈述中得到系统整理；同时，针对批评者的种种指责，也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容小视的回应。实际上，大可以把 70 年代的批评攻击看成是一种前导，引来的正是互动论学者中的根本创新和重获生机。这是因为，在出现这些分裂和攻击的同时，符号互动论也最终“制度化”了。这个过程的开端便是 1974 年在戈里高利·斯通的家中举行的一场小型研讨会，与会者中包括布鲁默本人和库奇（衣阿华大学）、登钦（伊利诺斯大学）、彼得·霍尔（密苏里大学）、法尔伯曼（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梅因斯和佩林巴纳扬甘（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会上确定，建立“符号互动研究学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SSSI），并且有它自己的学术会议、杂志和通讯（*Symbolic Interaction*, 1997）。这标志着理论发展史上一个全然不同的阶段。它已经从 20 世纪最初 50 年中那种很大程度上的“口传文化”，经过世纪中叶的那个“探索时代”和批判阶段，进入了一个制度化时期以及可能的重振时期。迈着前进的步伐，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布鲁默时代”（Fine, 1990）。

在最近的这段时期里，新作大量涌现。与两位穆林斯的预言正好相反，互动论学者们重整人马，再度出击，不仅揭示了批评他们的人自己身上的缺陷，而且还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向、概念及方法。不过，这种“新”也是涵纳了好几股彼此相争的传统的结果。它不再单单是芝加哥学派与衣阿华学派之间的区分了（前者比较偏于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取向，后者比较偏于科学主义和量化分析）。如今，这块园地里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有些互动论学者确实在以一种严守正统的“科学”论调谈问题；另有些学者在寻求建立一种人文主义但仍保持科学立场的学科；还有些学者将“科学”作为核心的攻击对象，进入了“后现代理论”的世界。有些学者继续强调，将“结构”融合进来对于互动论研究至关重要；另有些学者发

■ 展出一些新的概念来贯通微观与宏观；还有少数离群之马完全拒绝承认存在更广泛范围内的社会秩序。有些学者依然坚持纯粹，信守传统互动论作品的正统学说，但也有些学者改换立场，吸取各种最新的欧洲思潮：吸收哈贝马斯，联系福柯，汲取德里达，借鉴布希亚，吸取科胡特，联接吉登斯。与此类似，互动论长久以来都关注着时间性、反思性、对话、文化、沟通、认同、身体、戏剧、符号学以及日常生活之类的事项，这也有助于将理论和许多当前时尚的关注点重新连通起来。因此，对于当代互动论思想来说，支脉众多，并没有单一的立场。法恩在一篇杰出的评论中（Fine，1990：220），可以举出涂尔干主义互动论者、齐美尔主义互动论者、韦伯主义互动论者、马克思主义互动论者、后现代互动论者、现象学互动论者、激进女性主义互动论者、符号学互动论者（semiotic interactionists），以及行为主义互动论者。（我还可以加上“酷儿互动论者”，参见 Stein and Plummer，1996）。也有其他作品给出一些类似的名录（例如 Adler，Adler，and Fontana，1987；Denzin，1992：xix），法恩后来又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互动论已经在以下六块主要领域里做出了贡献：认同理论、拟剧论、集体行为、文化与艺术、社会语言学以及社会问题理论。他并进一步指出了三块正在兴起的领域：民族志的新途径，情感研究，对于组织的符号互动论分析。因此，当代符号互动论研究领域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它的行业杂志（《符号互动》）和年刊《符号互动研究》可为明证。

情感社会学或许是经验研究领域蓬勃发展的最佳例证。在 70 年代后期，人们还指责互动论“忽视情感”，但现在再也不能作这样的断言了。可以很肯定地讲，开创性的研究要算是霍克希尔德的《被管理的心灵》。这部书是有关空姐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类工作的一项核心技能就是情感的交易。这和过去常见的工作不一样，相反，“提供服务的情感方式本身就是服务的一部分”（Hochschild，1983：5）。现在有许多职业需要“情感劳动”，但是从空姐这行职业来看，更具一般性的管理情感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怎样始终控制一些情感，小心显露一些情感，有意“装出”一些情感，巧妙掩饰一些情感。情感不再是我们身上自发产生出来的某种东西，那是心理学家的领地；相反，这东西是在互动当中突现出来的，常常还带有一些小计谋。“我再不能太直露了”，“我得高兴一些”，“我让自己好好哭了一场”，“我不想再爱上一场了”，诸如此类的措辞正表明这类过程在起作用。霍克希尔德的研究已经将情感牢牢地确立在社会学分析之中。但它正像互动论者的理论阐述一贯坚持的那样，也是从经验研究中得来的。从那以后在这块领域里发展出其他许多互动论学说，重点常常放在羞耻（Scheff，1988）、悲痛（Lofland，1985）、同情（Clark，1997）之类的具体情感上。

在过去 10 年间，这块领域里已经有了切实的进展。而这种理论进展是与经验

研究息息相关的。正如互动论整个历史中的情况一样,学者们也念念不忘,不让理论与日常生活的实际活动相脱节。不过,与此类似,互动论者首先贯彻的这些关注,现在也已经散布到其他理论传统当中了:比如说最近的一部重要研究文选,虽然非常明显是得益于互动论传统,但却没有表示出多少敬意,至少在索引中提都没提(参看 Bendelow and Williams, 1998)。(弗兰克斯主编的一部题为《研究情感的社会视角》的年刊[第一卷出版于 1992 年],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7.2 进一步的发展:重归互动理论

否定与忽视

尽管在互动论中涌现出这样的蓬勃发展势头,近来的理论还是表现得有些老套,常常被排斥出当代最新的讨论。尽管它在教材中已经获得了经典的地位,但在当代理论作品中,却常常被放到边缘的位置。“最新的争论”常常会完全将它略过,仿佛它没有任何东西可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确信,即使被人们忽略,它和当代其他理论尝试之间仍然有许多亲和之处。战线延伸、水平发展之后的符号互动论,似乎可以与有关于下面这些理论的观念相提并论:埃利亚斯的“社会型构”(social configuration)、布迪厄的“惯习”和“实践”、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吉登斯的“结构化”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能力”。不仅如此,互动理论还非常适合现今对于认同、媒介和身体乃至于更广泛的“文化转向”等方面的关注:贝克尔和登钦都已经(以明显不同的方式)写出了直接以“文化研究”为题的著作(Becker and McCall, 1990; Denzin, 1992)。与此同时,近来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在心理学中,出现了对于所谓“社会建构范式”的(重新)“发现”,仿佛这是一种新的范式,和符号互动论毫无干系。在这种“新”途径下写作的绝大多数学者,对符号互动论有关社会世界的描述,对她整个漫长的传统,都没有什么了解,并且常常是只字不提。托马斯的原理、标签理论、文化协同因素(cultural coefficients),这些彼此联系密切的观念,都被他们忽视了。偶尔他们会承认米德的存在(例如 Shotter, 1993; Velody and Williams, 1998: 135),但常常带着批评的口吻,至于符号互动论则是根本不提(Velody and Williams, 1998: 135 同样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外)。当林奇尝试撰写社会建构范式传统的谱系时(其实是把这种传统看成一个“有用的术语,用折衷性的表面亲和将多种研究搜罗在一块儿”),在长长的名录中间,只

* 原文误为“兰达尔的‘互动链仪式’”,兰达尔为柯林斯的名。——译者注

在一处提到了符号互动论，一处提到了标签理论（Lynch，1998：24，26）。这种忽视实在是奇怪。

同样奇怪的是，在目前对于实用主义的兴趣重新兴起的趋势中，也照样忽视了互动论。实用主义“开始成为一个核心参照点，除了哲学，社会思想、法学、文论等方面的当代争论也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它提请哲学家们走出分析哲学，提请欧洲理论家们找寻马克思主义的替代选择，提请后现代主义者们为自己对绝对项和普遍项的批判寻找本土的根据”（Dickstein，1998：1）。有各式各样的思想在为这股复兴势头添火加热：从罗蒂的语言学解构，到哈贝马斯重新建构的沟通共同体（参看 Dickstein，1998：222—224）。还有人注意到它与女性主义之间的紧密关联（Siegfried，1996），以及它对黑人知识分子（从杜波伊斯到威斯特）的重要意义。但是凡此种种（“实用主义复归”），我们却奇怪地看到，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与符号互动论之间的联系（不过可以参见 Joas，1998；Wolfe，1998）。

在本文余下部分，我将简要地讨论四个话题，它们或可有助于塑造 21 世纪前期这一传统的研究状态。这些话题是：早就该拆解了的行动—结构之二元对立；发展比较温和、低调的理论，充分重视启发性概念；旧日的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事项之间的必然关联；以及秉承这种研究风格的种种方法、道德和政治主张依然具备的重要性。至于其他一些晚近的发展，只好留待另文探讨了。

7.2-1 摆脱 20 世纪的虚设二元论：微宏分裂之终结

我的第一个主张，就是要完全抛弃一个常被提及的批评意见，认为互动论是一种无结构、无政治、无历史的理论，认为它是一种过于主观、过于微观的理论。但互动论过去不是这样，现在也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它对于经验世界的关注，使它始终认识到诸如行动与结构之类的二元对立的虚设性质；始终看到社会行动的历史依托；也始终认识到自身根植于权力网络之中。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互动论研究都始终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可以说，它能够处理这些关注点，并且常常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像重新读解经典文本这样的举动就常常让人感到目光短浅。单单关注米德的自我理论是有局限的，是有偏误的，忽视了他对历史的关注，对作为总体的社会的关注，实质上也就看不到他内在的社会主义立场。正如巴尔德温所言，“米德的贡献要比通常所认为的大得多。他提出了一套统一的社会理论，整合了微观社会事件与宏观社会事件，并且把这些事件看作是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演变的”（Baldwin，1986：6）。布鲁默的遭遇也是如此：人们指责他过于讲求主观，倾向于

有选择地读解他的作品,仿佛他只关注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但是,梅因斯已经明确指出,这种观点的背后依托着“有关于布鲁默的作品所创造并维持下来的一系列神话”(Maines, 1988: 44)。甚至在对互动论持同情态度的学者那里,这种对布鲁默的选择性读解也忽视了他其他许多问题上远为广泛的陈述:种族关系、工业化与发展、传媒与大众社会,还有劳资关系。

不过,还是在当代互动论学者的作品里,才最明确地将这些对于架通宏观与微观之间裂隙的关注推向了前台。库奇是一位初露头角但非常杰出的互动论学者,我们难以想像还能有谁比他的作品架起了更宽广的桥梁:因为在他分析的一端,他关注了人们一起挤过门口时的互动环节,而在他分析的另一端,则是整个的文明以及构成这些文明的社会形式。两端之间相互贯通。所谓的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之间不可能也不应当相互脱节,而情境性的成分与历史性的成分之间也是同样如此(Couch and Hintz, 1975; Couch, 1984)。与此类似,有关政治过程的分析,也是从面对面决策与协商的小规模层面,一直到决定现实状况的实际政治语言中广阔得多的霸权力量。在有些学者看来,“反复出现的微观情境就是我们所称的社会结构”,确立起社会作为一系列“互动仪式”链的意象,而国家或世界体系之类的“宏观结构”,和它们在微观情境中的相应部分的惟一差别,只是以更大的形式存在而已(Collins, 1983: 184; 以及此后所有进一步发展其互动链理论的作品)。在彼得·霍尔看来,可以通过六种主要框架来理解社会组织:“集体活动,网络,惯例活动,资源,时间性一过程性,基础”(Hall, 1987: 11)。总体而言,采取的途径是把社会组织理解成一种基础框架:互动秩序在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上相互联结。因此,尽管自我以及自我对“他人”的核心关注也许是一种关键的互动单位,但必须把它编织到规模逐渐增大的许多互动层面所组成的厚密网络里:日常偶遇的层面,角色的层面,群体的层面,组织的层面,社会世界的层面,社区的层面,社会的层面,以至文明的层面。所有这些层面都是通过协同行动而构成的;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结,正是协商秩序(negotiated order)的基础。就这样,社会组织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集体活动网络”(这是贝克尔的用语,不过可以参见Hall, 1987)。因此,这些活动及其联结的特征就成为经验考察的出发点。

寻求联结微宏观的一个主要意象,来自于对发生在某种“中观结构”(mesostructure)里的社会组织的认识:通过一系列漫长的协同行动链中人们彼此的协商,“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力量如何与人的活动混合在一起”(Maines, 1982: 10)。有人批评符号互动论学者没有任何工具来分析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回应,出现了“协商秩序”理论,描绘了社会组织通过其成员的积极参与而完成的运作过程,而不是把社会组织当成一个静态的概念。根据梅因斯和查尔顿

的看法 (Maines and Charlton, 1985), 这种理论可以追溯到许多经典来源: 米德关于社会的辩证概念; 布鲁默关于解释过程和协同行为的观念; 帕克有关社会作为冲突、容纳和同化的一种连续过程的概括; 以及休斯对制度弹性的关注。不过, 最明确地提出并发展了“协商秩序”观念的, 还得算安瑟伦·施特劳斯及其同事的作品, 尤其是《精神病学的思想体系与制度》(Strauss et al., 1963), 以及他后来的著作《协商》(Strauss, 1978)。他把社会秩序描述成“这样一种东西, 在其中, 任何社会、任何组织的成员都必然有所作用。因为共享的共识……并不具有永远的约束力……需要重新进行评价……协调行动(社会秩序)的基础必然是持续不断地被构成或者说产生出来”。这个理论强调的是: 突生、变化与时间性; 秩序的根植性与情景性; 特定权力关系的普在性; 以及社会秩序的分割与分裂的持续过程。

施特劳斯最近的作品在他 1997 年去世前不久出版 (Strauss, 1991, 1993), 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套重要的行动理论, 把行动看成“行动的持续重组”(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其中的部分内容就是他所称的“条件性母型”(conditional matrix) 以及穿越这一母型的条件性路径。他把社会范畴描述成多层的嵌套, 每一层嵌套上都需要经验的分析。他绘制出一系列的层面, 从最外层的“国际层面, 包括国际政治、政府管制之类的事项……以及地球环境这样的话题”, 经过国家层面、社区层面、组织层面、亚组织层面、群体层面、个人生平层面、互动层面, 最后到达母型的核心——行动。经验研究者必须在任何一块研究领域里都绘制出发挥作用的具体、特定的母型, 并且绘制出在每一种特定情况下所经由的路径: “长的, 短的, 粗的, 细的, 疏的, 密的, 新颖的, 平常的, 可见的, 不可见的”(Strauss, 1993: 60—65)。互动论学者在此又一次指出, 那些仍将不断地回到“宏观”与“微观”之分的社会学家是愚蠢的, 这是一种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不过我还得加上一句, 互动论之外的几乎每一种社会学理论, 似乎都会成为这种假设的牺牲品。

因此, 对于互动论学者来讲, 理论的现实, 也就是他们的“问题域”, 就在于集中考察这些相互渗透, 抽象的社会(或者各自分离的独特个人)并不在他们的分析领域之内。但是, 这些相互渗透构成了有待考察的大规模社会网络。旧有的“结构/行动”或“微观—宏观”的争论必须设法避免, 办法就是坚定地关注互动。在互动中, 诸如此类的二元对立从经验的角度上说始终是维系在一起的, 这类分裂暴露了一种大有可疑的书斋式的无知。这一切都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努力, 要揭穿大多数社会学中微宏之分的虚假性, 都是要表明“符号互动论中的无结构偏向的问题只是个过时的话题”(参看 Denzin, 1992: 63)。

7.2-2 通过微小概念 / 启发性概念对经验世界作理论阐述

大多数互动论分析的核心都是创造微小概念或者启发性概念,能够捕捉特定经验的流动,提醒理论家们注意到一些**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我认为这是社会理论的核心任务。戈夫曼就是这种策略的大师。当然,他尽管与互动论之间有很强的亲和,但本人并不是一个互动论者。他的作品中满眼是这样的术语:“角色距离”,“前台和后台”,“印象管理”,“生涯”,“总体性制度”,“互动仪式”,还有“框架”(Goffman, 1959, 1961, 1963, 1983)。但戈夫曼并不是尽头。在有关情感的研究中,已经围绕着下面这些概念产生出许多想法:“感情规则”,“情感工夫”,“地位屏护”(status shields),“深度行为与表面行为”,“情感管理”,“情感自我”,“同情的给予”,“同情的经营者”,“同情的礼节”(Clark, 1997; Bendelow and Williams, 1998; Lupton, 1998)。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整个领域可以概括为五个概念:凸现,符号化,认知转型与情感转型,互动式确定,还有流动性(Snow and Davis, 1995)。与此类似,安瑟伦·施特劳斯的作品里也到处都是微小概念,有助于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意识情景”,“地位过渡”,“协商秩序”,“轨迹分期”,“局部概念”,“扎根理论”,“竞争领域”,“策略性互动”以及“社会世界系”(Strauss, 1991)。如果逐一来看这些术语,每一个都能把我们引向一大堆的理论话题、经验洞见和实践关注。

就说这其中最后一个概念:社会世界系。这个术语由来已久,从芝加哥学派,中经保涩谷(今天也已被人遗忘),再到安瑟伦·施特劳斯(Strauss, 1987)。社会世界系的概念意味着超越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解释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里面,成员们都认同对于一种共同参照点的认识。“社会世界系”这个词主要说的就是有潜力统合(以及破坏)多个世界的认同路径和复杂符号。社会世界系是流动的“话语世界系”,有着各自的共同活动、共同意义、共享场所、共有技术以及集体组织。它们会不停地分解成许多子世界,会不停地与其他世界产生相互关联。社会世界系不像“共同体”那样对内包罗万象,对外自我封闭,也不像群体或“场景”那样短促、随意、偶然。社会世界系非常能够体现晚期现代世界的特征。它们通过共同关注将人们维系在一起,哪怕这些人并不处于面对面的互动之中。它们之所以在晚期现代世界如此常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之于现代沟通媒介(印刷品、电话、计算机)的兴起,使得更广泛的话语世界系有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成为例行常规的东西。政治、经济、性、艺术、偏离行为、犯罪、闲暇、宗教等等,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里,都能找到社会世界系。这个概念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了相互关联性、分解过程和流动性。它使我们不再认为,存在一个无所不包、统合一体的社会世界;相反,它突

出了涵盖范围、变化、破裂和分裂,使我们不再把任何世界看得太统合、稳定或固定。尽管这个术语的核心突出了“话语世界系”,但不仅仅是关注沟通的形式,也关注“活动、成员资格、场所、技术和组织”(Strauss, 1987)。社会世界系也许是有限的,是面对面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大规模的,是全局性的,在整个世界上纵横交错,将一系列彼此相异的事业合在一起,而这些事业的范围大大超过了亚文化和共同体之类早先的任何观念。就这一个概念已经塑造了许多的研究。比如说,昂鲁探讨了老年人的“社会世界系”(Unruh, 1980);而克拉克则研究了北美“生育科学”的框架化过程中涉及各个群体之间的斗争,把这些群体看成“实践与话语的共同体”。这些世界“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根本‘基石’,人们通过这些社会世界来组织社会生活。可以把社会理解成由多个社会世界拼成的一幅变动不居的镶嵌画,相互接触,也相互渗透……”(Clarke, 1998: 16)。我还发现,这个观念有助于研究晚期现代世界出现的许多新型的性组合(Plummer, 1995)。

这种不求体系的散落的微小概念,正是互动论研究的一大贡献,每一个概念都能够发挥自己独有的深刻见解。但是,也有些人希望互动论将这类术语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建设一套更具形式性的互动理论**。因此,尽管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互动论必然会趋于未完成状态,趋于零碎和折衷,而回避大多数社会科学所寻求的宏大的绝对项;但同时也有一些互动论学者主张,为了推进理论,需要更有累积性、更系统化、更具有概括能力的研究。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这一点:各种各样尝试规整概念领域的手册;重新兴起的对于“类属性社会过程”的关注;还有旨在改进互动论研究的逻辑的种种尝试。分析上的归纳愈益精致,例举式归纳也更加系统化,扎根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格拉泽和施特劳斯遵循了齐美尔和帕克的形式主义传统,尝试进一步推进形式社会学。在60年代,他们提出了扎根理论和连续性比较的方法论(Glaser and Strauss, 1967)。在他们看来,实质理论关注的是像教室行为这样的某一个特定领域,而形式理论则通过共同过程将不同的实质领域关联起来。以地位过渡为例,可以在教师、老人、男同性恋、濒死者、残疾人等人群当中找到,也可以在秘密教派、政治运动、工作情境、犯罪活动里面发现。尽管它对于各个群体来说意义和经验都是不一样的,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实质研究,但仍然有某种更具类属性的过程在起作用,联接着生活中种种社会变迁机制。因此,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在他们研究濒死现象的作品里,从一块素材丰富的实质研究领域(病房和濒死过程),进到一种针对共同形式(例如地位过渡和意识情景)的更为持久的理论分析。他们以有关一位濒死患者的详尽的个案研究(阿贝尔女士,参看Strauss and Glaser, 1977)为

出发点,能够寻求与其他重要的地位变化作比较,以期发展一种更具“形式”性的地位过渡理论,因为这种濒死过程与其他地位过渡之间有许多共同特征。从扎根性的实质研究中,可以生发出更具比较性、抽象性和形式性的理论。扎根理论始终处在大多数互动论研究的核心,已经在安瑟伦·施特劳斯的一些追随者手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Strauss and Corbin, 1994; Charmaz, 1995)。

洛夫兰德也已经通过他的“分析中断”(analytic interruptus)概念,认识到非累积性的互动论研究的缺陷。他是这样界定这个概念的 (Lofland, 1970):

着手去开展一项特定的任务,但却没能坚持到底,得出具有逻辑意味的结论或必然牵涉到的结论。这个说法意味着未能抵达最初意味的那个顶点……许多(研究)蕴含着对于一些机制、手段、策略之类的东西的分析,(但是)却忽视了真正去这么做。最终看到的研究依然是不成系统,语焉不详,仅仅是一种提示。

洛夫兰德也已经在好几部作品里,系统地组织分析的框架,实质上也是将大量的互动论研究加以综合,试图以此来克服这种不足。所以,在《投入社会生活》这部颇受冷落的书里,他把许多研究成果融合在一个连贯一体的框架里 (Lofland, 1976);而在《分析社会场景》这本方法手册中,他鼓励别人也这样去做 (Lofland and Lofland, 1983)。意识到有这样的任务摆在面前,意识到此前这方面已经有的初步尝试,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未来的互动论研究不能比它过去常常表现出来的更具有累积性和系统性。

再往近来,普鲁斯也就这个方向发出了另一项有力的吁求。他认为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都令人可悲地不足以研究人的处境,并试图就民族志研究应该寻求的东西提出明确的系统性诉求。符号互动论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事实上,人类群体生活始终是主体间性的、多重视角的、反思性的、以活动为基础的、可以协商的、关系性的、过程性的;通过细致地观察这种生活,可以就其根本的形式做出类属性的过程描述。这种努力的关键步骤,就是把握视角,达成认同,积极参与,投身活动,体验关系。一方面,这些步骤在每一块研究领域里都具备了具体的扎根性经验形式,同时也可以看作是跨情景的类属性过程 (Prus, 1987, 1997)。

这当然不是要主张以累积性强、分类严谨的研究为惟一的追求:互动论者自己对于含混的、边际性的、陌生的东西的感受,会与这种追求产生抵触。但是,有些追求以此为方向,也会有助于防止互动论者一代又一代地重复历史。



7.2-3 后现代主义和符号互动论的竞争性亲和?

总体而言,社会学理论对于后现代探索的态度是一种批判性的接受。它似乎不情愿承认后现代社会理论,甚至不情愿承认一种后现代社会秩序的到来(Huber, 1995)。面对其他领域里思想活动的一阵忙乱,绝大多数(年纪更大些的)社会学家仍然坚守属于他们的过去和培训背景的那些传统。但在所有传统社会学理论当中,符号互动论肯定算是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关系最密切的一种。这种理论的许多特征都已经预示了后现代思想:对于记号和符号的关注,通过对于“社会建构”的明确关注而实现的内在的解构趋向,田野调查和写作策略方面的自我反思趋向,对于文化和传媒的长期关注,种种社会认同理论的阐述。这些都预示了后现代的社会思想。实际上,对于一些评论家来说,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符号互动论和后现代思想之间的关联就始终是符号互动论作品中一个坚定的关注焦点。《符号互动研究》(这是一本年刊)近些年来的各卷都把重点放在后现代主义上(尤其参见第10卷以后各卷)。民族志,生活史,电影,身体,乃至更一般层面上的文化,有关这些方面的分析都已经明显地遵循了后现代转向,突出了修辞、写作技术、社会文本、电脑黑客、抵抗叙事等等。在这最新一代的作品中,洋溢着独特的新鲜风味。甚至连互动论的经典文本也开始受到细致的审查,在这种新的批判眼光下遭到解构(例如“街角社会”,刊于《当代民族志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92年号)。

在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里,实用主义社会理论家沙林以清晰连贯的逻辑指出,“这些论题……是符号互动论发轫以来一直大力宣扬的,并由此确立了它在美国社会学中特立独行的地位。它们与后现代思想家所倡扬的那些主题之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相似性”(Shalin, 1993: 303)。他就此举证到这两方面如何都拒绝主客二元论,以及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除了都注重“社会建构的、突生的、多元的”,还都倡导“边际性的、局部性的、日常性的、异质性的、不确定的”(Shalin, 1993: 304)。梅因斯的态度则略有些极端(也远没有那么持同情态度),指出“符号互动论因其解释性的核心蕴涵,很容易在大部分的后现代主义之间找到亲和之处,但也正是由于这种解释性的核心蕴涵,它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亲和”。他倒是认为以下趋势很有价值:对于解释性研究的兴趣重新兴起;写作之作为“方法的内在固有之义”现在获得的重要性;对于多重表现形式的关注;重新宣称价值立场和“批判研究”(Maines, 1996: 325)。但是,对于更广泛也更不羁的后现代研究规划的立场,如果它们还只是开始强调新东西,或者只是宣称抛弃一切对于真理的诉求,他并不会感到满意。

不过,当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亲和性不应当走得太远时,另一些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学者,则已经充分地、热烈地认同了后现代的立场。登钦倡导了这种更加极端的倾向。他已经在符号互动论的传统之下写作了 30 多年,而他在当代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但是自从 80 年代晚期以来,他在许许多多的著作和文章当中,已经采取了一种“后现代转向”。所以现在看起来,他扮演着一种非常怪异甚至自相矛盾的角色:一方面是“早期登钦”,是一位明确的符号互动论者;另一方面是“后期登钦”,立场激进得多,批判意味也强得多。他的作品迫使互动论学者们更严肃地考虑来自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学说以及酷儿理论等方面更为广泛的主张。他继续坚持“一种坦率的人文主义立场,从互动中的个人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社会世界”(Denzin, 1997: xv)。但他现在希望这也是一种道德的研究规划和政治的研究规划,能够将“道德民族志”联系到某种女性主义的社群主义伦理。登钦如何将这种政治主张和自己的后现代转向协调起来,还不是十分清楚。但这种主张看起来确实是他各项主张的核心。

许多互动论学者不同意登钦的路线,在许多情况下,既反感他不怎么具体介绍那些对互动论学者来说很新鲜的东西的做法,也反对他对这类后现代主义者的构想和作品的宏大性质本身很感兴趣。沙林语带嘲讽地说:“(它)里面没有任何不起眼或不重要的东西……其构思之宏大壮阔,结论之横扫千军,对待异见之不依不饶,都达到了一种叙事所能达到的极致”(Shalin, 1993: 313)。实质上,在后现代代的许多见解里,他们都已经“越出了极限”:以至于如果他们的结论直接反诸自身,那么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将顷刻间丧失信任。他们的讲法所提供的叙事之宏大,往往超出了任何一位互动论学者所能平静容忍的限度!有些人会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可以一直发展到“极端的宿命论调、荒诞色彩和虚无主义”(Prus, 1996: 218)。总之,有些评论家认为,后现代转向或许已经走得太远了。不过,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场争论已经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互动理论焕发活力。或许最明显的领域就是关于方法的争论。

7.2-4 “超出理论的”诸向度:方法、道德与权力

互动论学者很早就发现,理论和方法之间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鉴于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并组合关于经验世界具体特性的理论,显然就负有探查这个世界的任务。而这是一个可以运用多种方法的世界,主要是(但不只是)定性的、民族志的、个人生平的。因此,互动论传统中的许多学者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建设适合理论阐述的方法论策略: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扎根理论,曼宁的分析性归纳,

登钦的三角测定 (triangulation) 和解释性生平, 洛夫兰德的策略分析, 《当代民族志杂志》(简称 JCE) 上的许多讨论, 等等 (Denzin and Lincoln, 1994)。方法论与理论密切交织在一起。

尽管如此, 到了世纪末, 这种方法论讨论中的大部分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焦虑。许多争论已经促进了对这种研究途径的正统学说发起的挑战, 使人们愈益关注文本性、反思性、情感性、作者身份、声音与对话、解释性主体性, 还有伦理。在很大程度上, 定性研究工作的种种新体裁发现早期对于“在那里”的东西的描述传统很成问题。这种批判工作中有许多是受到了女性主义的激发 (例如 Krieger, 1983; Clough, 1992; Richardson, 1997)。“认知方式”的问题始终是互动论者的一个关注点, 但这方面已经带来了新的争论和更为激进的立场。登钦勾勒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类探索所历经的五个关键阶段: “传统阶段 (1900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代主义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70 年代中期), (追随格尔兹) ‘体裁混融’阶段 (1970 年至 1986 年), 受后现代感受影响的愈益加剧的 ‘表现危机’阶段 (1986 年至今), 以及第五个阶段 (现在) 乃至第六个阶段 (未来)” (Denzin, 1997: xi)。我认为, 登钦对于年代分期的偏好是过于简单化了, 不过它确实捕捉到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使得有关社会世界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身人性的、互动的、社会的根源。这种认知模式不同于主导的知识模式 (不管是实在论还是实证主义), 带来了许多挑战。它拒绝从已知的/已报道的东西中严格区分出作者/知者 (关于反思性与声音的话题; 参见 Hertz, 1997)。生产出来的各种知识形式必须通过一些方式与伦理、政治和价值观念关联起来, 对于这些方式它也不会忽视 (例如 Josselson, 1996; Denzin, 1997)。它主张, 写作与表现研究成果的那些方式, 与它们不可避免的 “文本性” 有着密切的关系 (Clough, 1992; Richardson, 1997)。它强调研究百姓的主体性, 并且充分地意识到这种研究中涉及的大部分情感性因素 (Ellis and Bochner, 1996)。它主张, 在民族志考察和一个晚期现代社会中的众多新式认知方式之间, 存在着难以胜数、难以消除的关联 (例如 Denzin, 1997; Rainer, 1998)。它甚至承认, “虚构” 有时候或许胜于 “事实”, 新小说, “文献纪录片” (docudrama), 甚至是 “侦探故事” (Denzin, 1997: 第六章) 都有可能比单调乏味的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深刻见解。因此, 这种新的研究风格必须是非常具有自我反思性, 对自身的文本性保持严肃的批判态度, 将自身视为根植在一个全球政治文化的背景之中。它必须认识到, 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任何给定的权利去研究他们想要研究的人与事, 而研究对象们也有一切权利对生产出来的民族志提出质疑 (事实上也正在这么做)。整个过程充满着带有伦理与政治意味的事项, 而对于这些事项, 那么多的社会科学家一直不可饶恕地保

持着沉默或者无知。它正在生产出一系列新式的写作体裁和表现体裁,对象是“凌乱混杂的文本”,包括“行为文本”、诗歌、民族志虚构作品和小说、自传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自传 / 传记、电影、短篇故事、摄影、录像日记 (Ellis and Flaherty, 1992 ; Ellis and Bochner, 1996)。这里,一方面是互动论学者试图捕捉的那些经验,另一方面是重 (新表)现 (re-presents)这些经验时所使用的“写作策略”和“叙事组织”,两方面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分 (Atkinson, 1990)。

古布里姆和霍尔斯坦统揽这些差异,归之为“定性方法的新语言”,认为它们包含了四种风格,应当努力保持相互之间的对话。首先是**自然主义**,旨在以现实自身的语言来描绘现实,也就是“如实”。这是几种风格中最老派的一种,依然认为可以通过充分深入田野来牢固地把握一种现实。它重新确立了“知情者”的丰富描述。其次是**常人方法学**。它研究自然发生的谈话,“以期创造一种认识:社会秩序是通过谈话和互动创造出来的。”它对其成员的本体性存在存而不论,集中考察他们的世界是如何通过谈话建构出来的。它是“关于谈话的谈话”。第三是**情感主义**,认为研究过于讲求理性主义,过于注重认知因素,所以力图深入情感的深处,“对象的灵魂”,从而比此前的各种风格扎得更深。第四是**后现代主义**,强调了“表现危机”,也就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我们所看见、所记录的东西,它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还是我们表现它的方式,都具有文本性 (Gubrium and Holstein, 1997 :第一章)。尽管也许可以将这些“风格”看成在某种历史中依次凸现 (正如上文登钦所做的那样),但更有助益的是看到,每一种风格都有它的危险,每一种风格都有它“特别的感受”。通过检阅这些风格,古布里姆和霍尔斯坦相信它们可以在对话的气氛中彼此交流。因此,比方说,后现代主义的“特别的感受”是挑战“在那里有待研究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难以消除的危险,就是将现实消解为表现。而对于“自然主义”来说,面临的问题则正好相反。将这些差异都拿来参与对话,会有助于改进各种方法论。

但是,已经被列入研究议程的还不仅仅是反思性、表现和对话。互动论学者同时也越来越必须面对伦理、道德和权力方面的问题。这些都不是什么新话题。但是,已经开始形成这样一种主张,就是理论概括和经验研究这两方面的行为本身都陷于深层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理论和研究都是人类生产出来的,始终根植在伦理选择和政治后果之中;或者,就像实用主义者一直在说的那样,诸如此类的“知识”总是有后果的,总是会起作用的。如果说有那样一种东西,属于伦理无涉的研究或政治中立的理论,那么它就会是一种奇怪的无足轻重的东西。因此,越来越多的互动论学者开始更清楚地阐明自己作品的“根据”,开始更坦白自己的“公共”角色或政治角色。法尔伯曼以一种非常轻松的笔调,发明了一个首字母缩拼词:

■ RHHHAAAAAAGEE (天啊!), 来把握一系列的少数人群话语, 它们都“应当被倾听, 同时由此切入现实世界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会扩充、更新并重新莫立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并且能够更直接地使社会科学切合当今重大的社会政策话题”。这个首字母缩拼词代表的是: “种族歧视 (Racism), 对同性恋的憎恶 (homophobia), 残疾人歧视 (handicap discrimination), 无家可归 (homeless), 反犹太主义 (anti-Semitism), 对阿拉伯人的非难 (Arab bashing), 老龄歧视 (ageism), 吸毒成瘾 (addiction), 艾滋病之折磨 (aids affliction), 虐待妇女 (abuse of women), 虐待儿童 (abuse of children), 性别歧视 (gender discrimination), 经济压迫 (economic oppression), 生态灾难 (ecological disaster)……” (Farberman, 1991: 485)。

在此, 登钦又一次冲在了前面。他把自己的主张标明为“女性主义、社群主义的伦理模式”, 强调社群主义、关怀、爱、公共科学、道德认同、增权 (empowerment)、道德涉入的观察者、作为共同参与者的研究对象以及叙事的、对话的转型 (Denzin, 1997: 275)。他主张民族志研究者需要将自己的研究延伸到公共领域当中去, 和新式新闻记者*、诗人、电影摄制者之类的人并肩工作, 产生一种新型的公共民族志。在这一点上, 他似乎受到了罗蒂几年前做出的倡言的影响, 这段话被人广为引述:

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已经一步一步但是稳扎稳打地代替了传道和专著, 为道德变迁与进步树立原则。(Rorty, 1989: xvi)

在纪实性描述城市及其社会问题以供公共政策参考方面, 秉承旧式芝加哥风格的实用主义研究者们扮演了核心性的角色。与此类似, 目前在晚期现代世界里, 电子沟通和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所以, 新一代互动论学者在社会、公共和政治的角色上, 也完全可以成为某种公共民族志研究者。这里有一点令人啼笑皆非: 帕克原先是个新闻记者, 后来成了社会学家; 无独有偶, 21 世纪将会越来越多地看到社会学家去当新闻记者, 到最后, 理论将走出学院的象牙塔。

7.3 面向后现代世界的批判性人文主义实用主义?

在本篇评述中, 我已经提出了 20 世纪符号互动论的一种历史, 并指出了它有可能走向的一些方向。以下两方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 并且体现在理论的根

* 新式新闻记者 (new journalists): 指不拘泥于传统新闻学追求的客观、如实的报道要求, 侧重描写新闻人物或事件的主观一面、内心反应、表现模式。——译者注


源上:一方面是那些“趋于形式主义”的互动论学者,在他们的理论和民族志研究中,依然力图把握社会生活的种种形式与现实(例如 Prus, 1997);另一方面是“趋于新实用主义”的互动论学者,他们采取了更强烈的后现代转向的立场(例如 Denzin, 1997)。但互动论内部很久以来就存在着这种张力,在芝加哥社会学的传统当中,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都表现活跃,根基牢固(参看 Plummer, 1998)。我也确信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互动论还将继续和这两方面的倾向很好地共存。

符号互动论在 20 世纪的命运已是跌宕起伏,但它的成就却是令人敬畏的。它的哲学基础即使充满张力,但总算是丰富多样;它的研究历史纵然遭人忽视,也总算是引人瞩目;并且它始终有能力针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不断重塑自己。有了这些,符号互动论或许已经对 20 世纪的社会学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与此同时,它的许多争论在今天已经被略而不谈,让位给那些更为晚近的“新论时谈”。但不管怎么说,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它至少还能提醒过去这个世纪中许多更追求宏大的理论家们,时刻需要回过头来考察和探索在经验性的社会世界中找到的日常生活,坚定地承认它特别的研究主题:主体间性的、符号的、反思性的、过程性的、“人的”。它大声宣告:不能像研究物理世界那样来研究人的社会世界;要了解人的社会世界,就意味着一种深层的主体间性的反思性,而这种反思性势必使得研究者的理解与那些被研究者的理解关联在一起。它一再要求我们明白一点,谈论什么“个人的与社会的”、“行动与结构”、“观念论与物质论”,只是在重复生产哲学家们弄出来的虚设的划分、二元对立和对偶范畴,不需要把诸如此类的分裂偷渡到社会考察的实践中去。它还告诉我们,我们正在从事的这种研究规划不能不完全地、彻底地带有政治和道德的意涵,这和其他大多数理论的整个见识都截然相反。

参考文献

- Adler, P. A., Adler, P., and Fontana, A. 1987: *Everyday life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217 — 235.
- Altheide, D. 1991: *Media Worlds in the Era of Postjournalis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Atkinson, P.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 Baldwin, J. 1986: *George Herbert Mead*. London: Sage.
- Becker, H.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81: *Exploring Society Photographicall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

- iversity Press.
- 1986: *Doing Things Together*.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and McCall, M. M. 1990: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delow, G. and Williams, S. J. (eds.) 1998: *Emotions in Social Life*, London: Routledge.
- Best, J. 1995: Lost in the ozone again: the postmodern fad and interactionist foibles.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17, 125 — 130.
- Blumer, H. 1933: *Movies and Conduct*. New York: Macmillan.
- 1937: Social psychology. In E. P. Schmidt (ed.) *Man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lmer, M.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s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rmaz, K. 1995: Grounded theory. In J. A. Smith, R. Harre and L. Van Langenhove (eds.) *Rethinking Methods in Psychology*. London: Sage, 27 — 48.
- Clark, C. 1997: *Misery and Company: Sympathy in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larke, A. 1998: *Disciplining Reproduction: Modernity, American Life Sciences, and the "Problems of Sex"*.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lough, P. T. 1992: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 Collins, R. 1983: Micromethods as a basis for macrosociology. *Urban Life*, 12, 184 — 201.
- Cooley, C. H. 1956: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 Couch, C. J. 1984: *Constructing Civilizations*.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and Hintz, R. A. 1975: *Constructing Social Life: Readings in Behavioral Sociology from the Iowa School*. Greenwich, Conn.: Stipes Publishing Co.
- Davis, F. 1981: On the "Symbolic"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5, 111 — 126.
- Deegan, M. J. 1988: *Jane Addams and the Men of the Chicago School, 1892 — 1918*.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Denzin, N. K. 1977: Notes on the crimogenic hypothesis: a case study of the American liquor indus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905 — 920.
- 1989: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London: Sage.
- 1991: *Images of Postmodern Society*. London: Sage.
- 1992: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 1996: Prophetic pragmatism and the postmodern: a comment on Maines. *Symbolic Interaction*, 19(4), 341 — 356.
-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 and Lincoln, Y. S.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 Dickstein, M. (ed.) 1998: *The Revival of Pragmatism: New Essays on Social Thought, Law and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unn, G. 1992: *Thinking Across the American Grain: Ideology, Intellect and the New Pragmat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llis, C. and Bochner, A. P.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London: Alta Mira.
- and Flaherty, M. G. (eds.) 1992: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London: Sage.
- Farberman, H. 1991: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postmodernism: close encounters of a dubious kind. *Symbolic Interaction*, 14(4), 471 — 488.
- Faris, R. E. L. 1970: *Chicago Sociology: 1920 — 193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ne, G. A. 1983: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6, 69 — 70.
- 1990: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 the post-Blumerian age. In Ritzer (1990) 117 — 157.
- 1993: The sad demise,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and glorious triumph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 61 — 87.
- (ed.) 1995: *A Second Chicago School? The Development of Postwar American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 Kleinman, S. 1986: Interpreting the sociological classics: can there be a “true” meaning of Mead? *Symbolic Interaction*, 9, 129 — 146.
-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laser, B.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 and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1961: *Asylums*. New York: Doubleday.
- 1963: *Stigm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83: 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 — 17.
- Gubrium, J. F. and Holstein, J. A.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 M. 1987: Interaction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8, 1 — 22.
- Hammersley, M. 1989: *The Dilemma of Qualitative Method: Herbert Blumer and the Chicago Tra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Herman, N. J. and Reynolds, L. T. (eds.) 1994: *Symbolic Interaction*. New York: General Hall, Inc.
- Hertz, R. (ed.) 1997: *Reflexivity and Voice*. London: Sage.
- Hochschild, A. 1983: *The Managed Hear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ber, J. 1995: Centennial essay: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94 — 216.
- Jandy, E. C. 1942: *Charles Horton Cooley: His Life and His Social Theory*. New York: Dryden Press.
- Joas, H. 1987: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Oxford: Polity Press.
- 1988: The inspiration of pragmatism: some personal remarks. In Dickstein, M. (ed.) *The Revival of Pragmatism: New Essays on Social Thought, Law, and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0 — 198.
- 1993: *Pragmatism and Soci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osselson, R. 1996: *Ethics and Process in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London: Sage.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92: “Street corner society” revisited. Special issue 21(1).
- Kemper, T. D. (ed.) 1990: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 Albany,

- NY: SUNY Press.
- Kuhn, M. 1964: Major trend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in the past twenty-five year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 61 — 84.
- Lewis, D. and Smith, R. L. 1980: *American Sociology and Pragmat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ncoln, Y. S. 1995: The sixth moment: emerging proble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JAI Press.
- Lofland, J. 1970: Interactionist imagery and analytic interruptus. In T. Shibusani (ed.) *Human Nature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Prentice-Hall.
- 1976: *Doing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 and Lofland, L. 1983: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2nd edn. Belmont, CA: Wadsworth.
- Lofland, L. 1985: The social shaping of emotion: the case of grief. *Symbolic Interaction*, 8, 171 — 190.
- Lupton, D. 1998: *The Emotional Self: a Sociocultural Exploration*. London: Sage.
- Lynch, M. 1998: Towards a constructivist genealog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Velody, I. and Williams, R. (eds.) *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onism*. London: Sage.
- MacCannell, D. and MacCannell, J. F. 1982: *The Time of the Sig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aines, D. 1982: In search of mesostructure. *Urban Life*, 11, 267 — 279.
- 1988: Myth, text and interactionist complicity in the neglect of Blumer's macro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11, 43 — 57.
- 1993: Narrative's moment and sociology's phenomenon: towards a narrative sociolog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7 — 38.
- 1996: On postmodernism, pragmatism and plasterers: some interactionist thoughts and queries. *Symbolic Interaction*, 19(4), 323 — 340.
- and Charlton, J. 1985: The negotiated order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N. Denzin (ed.) *Foundations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Supplement 1, 271 — 308.
- Manis, J. G. and Meltzer, B. N. (eds.) 1967: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Reader in Social Psychology*. 3rd edn, 1978.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Matthews, F. H. 1977: *Quest for an American Sociology: Robert E. Park and the*

- Chicago School. London: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Meltzer, B. N., Petras, J., and Reynolds, L. T. 1975: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Genesis. Varieties and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 Mullan, B. 1987: *Sociologists on Sociology*. London: Croom Helm.
- Mullins, N. C. and Mullins, C. J. 1973: *Theories and Theory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erinbanayagam, R. S. 1985: *Signifying Acts: Structure and Meanings in Everyday Lif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Perry, R. B. 1935: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2 vols. Boston: Little Brown.
- Plummer, K. (ed.) 1991: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2 vol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London: Routledge.
- 1998: Herbert Blumer. In Rob Stones (ed.) *Key Sociological Thinkers*. London: Macmillan, ch. 6, 84 — 95.
- Prus, R. 1987: Generic social process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6, 250 — 293.
- 1996: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Albany: NY University Press.
- 1997: *Subcultural Mosaics and Intersubjective Realiti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ainer, T. 1998: *Your Life as Story*. New York: Putnam.
- Richardson, L. 1990: *Writing Strategies*. London: Sage.
-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itzer, G. (ed.) 1990: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ochberg-Halton, E. 1987: *Meaning and Modernity: Social Theory in the Pragmatic Attitu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ck, P. 1979: *The Making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London: Macmillan.
- Rorty, R. 1982: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ose, A. (ed.) 1962: *Human Behaviour and Social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 Saxton, S. L. 1989: Reading interactionist work.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10, 9 — 24.
- Scheff, T. J. 1988: Shame and conformity: the deference-motion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395 — 406.
- Scheffler, I. 1974: *Four Pragmatists*. London: Routledge.
- Seigfried, C. H. 1996: *Pragmatism and Feminism: Reweaving the Social Fabr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alin, D. N. 1993: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and pragmatist inquiry: an introduc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16(4), 303 — 332.
- Shaskolsky, L. 1970: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in America —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terpretation. In L. T. and J. M. Reynolds (eds) *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McKay.
- Shott, S. 1976: Society, self, and mind in moral philosophy: the Scottish moralists as precursors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ural Sciences*, 12, 39 — 46. Reprinted in Plummer (1991) vol. 1.
- Shotter, J. (1993) *Cultural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Snow, D. A. and Davis, P. W. 1995: The Chicago approach to collective behavior. In G. A. Fine *A Second Chicago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88 — 219.
- Stein, A. and Plummer, K. 1996: I can't even think straight: queer theory and the missing sexual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In Steven Seidman (ed.) *Queer Theory/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 Strauss, A.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Creating Sociological Awarenes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 1993: *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and Corbin, J. 1994: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 overview. In Denzin and Lincoln (1994) 273 — 285.
- and Fisher, B. 1978: Interactionism. In T. Bottomore and R. Nisbet (eds)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Hutchinson.
- and Glaser, B. 1977: *Anguish: A Case Study of a Dying Trajectory*.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Stryker, S. 1987: The vitalization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Social Psychological Quarterly*. 50, 83 — 94.
- Symbolic Interaction* 1997: Special issue 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21(1).
- Unruh, D. R. 1983: *Invisible Lives: Social Worlds of the Aged*. London: Sage.
- Velody, I. and Williams, R. 1998: *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onism*. London: Sage.
- Wiley, N. 1994: *The Semiotic Self*. Oxford: Polity Press.
- Wolfe, A. 1998: The missing pragmatic revival 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 Dickstein, M. (ed.) *The Revival of Pragmatism: New Essays on Social Thought, Law, and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 — 206.

深入阅读指南

一、回溯理论发展

关于符号互动理论的经典的正式陈述,见于 Blumer 所编的文选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1969)。(注意:在这部分里,只有在“参考文献”中没有此条时才列出详细书目。)符号互动理论有其自身的期刊 *Symbolic Interaction*, 自身的年刊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其他另有一些重要的立场阐述,参见 H. S. Becker 的文集 *Doing Things Together* (1986); N. Denzin 的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1992); Meltzer, Petras 和 Reynolds 的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Genesis, Varieties and Criticism* (1975); L. T. Reynolds 的 *Interactionism: Exposition and Critique* (1990 修订版, New York: General Hall); S. Stryker 的 *Symbolic Interaction: A Structural Approach* (1980, California: Benjamin/Cummins); Denzin 的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1989); 以及 Strauss 的 *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 (1993)。

在许多学生教材中体现出某种正统脉络,在此谨举最有名的几部: J. M. Charon 的 *Symbolic Interaction* (1992 第四版,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J. P. Hewitt 的 *Self and Society* (1994 第六版, New Jersey: Allyn and Bacon); R. H. Lauer 和 W. H. Handel 的 *Social Psychology: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77, Boston: Houghton Mifflin)。有价值的文选有: N. J. Herman 与 L. T. Reynolds 的 *Symbolic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1984, New York: General Hall); J. G. Manis 与 B. N. Meltzer 的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ader in Social Psychology* (1967); K. Plummer 的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91, 第1、2卷); 以及 G. Stone 与 H. Farberman 合编的 *Social Psychology Through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81 再版, Chichester: Wiley)。以论文篇幅对于符号互动论的概述可见 G. A. Fine 的“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 the post-Blumerian age”(1990); H. Joas 的“Symbolic Interactionism”(1987); S. Stryker 的“The vitalization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1987) 以及“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role theory”(1985), 收于 G. Lindzey 与 E. Aronson 合编的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5, New York: Random House, 页 311—378)。

要想回溯符号互动论的历史, A. Strauss 与 B. Fisher 的“Interactionism”(1979); J. D. Lewis 与 R. L. Smith 的 *American Sociology and Pragmatism: Mead, Chicago Sociology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1980); 以及 P. Rock 的 *The Making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79) 都是很好的起点。有关芝加哥学派方面的背景, 参见 K. Plummer 所编的 *The Chicago School* (1997, London: Routledge) 中的介绍与讨论。有关实用主义方面的背景, 参看 D. Shalin 的“Pragmatism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刊于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卷 51, 页 9—29。关于符号互动论更近当代的支脉, 参见 M. Dickson 的文集 *The Revival of Pragmatism* (1998) 中的论文。* 关于米德, 参看 R. Lowry 的“George Herbert Mead: a bibliography of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with relevant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references”(刊于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1956, 卷 7, 第二部分, 页 459—521) 中所提供的极富价值的书目。而他的著述的编选则可见 A. J. Reck 所编的 *Selected Writings: George Herbert Mead* (1964,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A. Strauss 编的 *George Herbert Mead on Social Psychology* (196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关于晚近的发展, 参看 Fine 的 *A Second Chicago School* (1995)。

以下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开拓视角: H. S. Becker 的 *Art Worlds* (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 J. Couch 的 *Constructing Civilizations* (1984); H. A. Farberman 的“A criminogenic market structure: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75, 卷 16, 页 438—456; J. Gusfield 的 *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 (198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 Molotch 与 D. Boden 的“Talking social structure; discourse, domination and the Watergate hearing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7, 卷 50, 页 273—288; C. Wiener 的 *The Politics of Alcoholism* (1981,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对于符号互动论的通行批评意见有许多争论。关于“结构角度的批评”有两

* 在正文中及前面参考文献中, “Dickson”均为“Dickstein”, 疑为此处误排。——译者注

■ 篇关键评论, 见于 P. M. Hall 的 “Interaction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1987) 和 D. R. Maines 与 J. Charlton 的 “The negotiated order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1985)。G. A. Fine 所编的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专号, 1983, 卷 6, 页 69—122) 提供了一些实例。

符号互动论方法论的主要素材包括 H. Blumer 的 “The methodological position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收于其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69); N. K. Denzin 的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1989 第三版,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和 *Interpretive Biography* (1989, London: Sage); H. Becker 的 *Sociological Work* (1970, Middlesex: Allen Lane); H. S. Becker 的 *Tricks of the Trade* (199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 T. Bruyn 的 *The Human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1967,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R. Emerson 编的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1983, Boston: Little Brown); J. Johnson 的 *Doing Field Research* (1975, Glencoe: Free Press); B. Glaser 与 A. Strauss 的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1967); B. Glaser 的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1978); J. Lofland 与 L. Lofland 的 *Analysing Social Settings* (1983, 1994 第三版); L. Schatzman 与 A. Strauss 的 *Field Research* (1973,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A. Strauss 的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1987); J. Van Maanen 的 *Tales of the Field* (198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 Plummer 的 *Documents of Life* (1983, London: Allen and Unwin); M. Hammersley 的 *The Dilemma of Qualitative Method* (1989)。

有关定性研究的新趋势, 参见 N. K. Denzin 的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1997, London: Sage); C. Ellis 与 A. P. Bochner 合编的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1996, London: Alta Mira); R. Josselson 的 *Ethics and Process in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1996, London: Sage); J. F. Gubrium 与 J. A. Holstein 的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19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 Hertz 编的 *Reflexivity and Voice* (1997, London: Sage); Y. S. Lincoln 的 “The sixth moment: emerging proble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刊于 1995 年版的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JAI Press; T. Rainer 的 *Your Life as Story* (1998, New York: Putnam)。

有关符号互动论的政治意涵, 参见 P. Hall 的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analysis of politics”, *Sociological Inquiry* (1972, 卷 42, 页 35—75); H. S. Becker 的 “Whose side are we on?”, 收入其 *Sociological Work* (1971, Chicago: Aldine); P. Clough 的

“Feminist theory and social psychology”, 刊于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1987, 卷 8, 页 3—23); J. Lofland 的 “My turn: interactionism as anarchism”, 刊于 *SSSI Notes* (1988, 卷 14, 页 5—6); K. Plummer 编的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1981, London: Hutchinson); D. N. Shalin 的 “G. H. Mead, socialism and the progressive agenda”, 刊于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卷 93, 页 913—951); 以及 D. Wellman 的 “The politics of Herbert Blumer’s sociological method”, 刊于 *Symbolic Interaction* (1988, 卷 11, 页 59—68)。

二、经验性理论:从经验的角度回溯符号互动论

绝大多数符号互动理论都是通过研究社会现象来完成的。以下所列仅仅是一些揭示理论与经验世界之融合的实例。

Adler, P. A. 1985: *Wheeling and Deal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theide, D. 1985: *Media Power*. London: Sage.

Becker, H.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Rev. edn 1973.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eer, B., and Hughes, E. 1968: *Making the Grade: The Academic Side of College Life*. New York: Wiley.

Blumer, H. 1933: *Movies and Conduct*. New York: Macmillan.

Clark, C. 1997: *Misery and Company: Sympathy in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larke, A. 1998: *Disciplining Reproduction: Modernity, American Life Sciences, and the “Problems of Sex.”*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lton, M. 1959: *Men Who Manage*. New York: Wiley.

Davis, F. 1963: *Passage Through Crisi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Denzin, N. K. 1977: *Childhood Socializ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 1986: *The Alcoholic Self*. Beverly Hills: Sage.

Emerson, R. 1969: *Judging Delinquents*. Chicago: Aldine.

Fine, G. A. 1987: *With the Bo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laser, B. and Strauss, A.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Goffman, E. 1961: *Asylum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1963: *Stigm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Gubrium, J. F. 1975: *Living and Dying at Murray Mano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ghes, E. C. 1958: *Men and Their Work*.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71: *The Sociological Eye*. Chicago: Aldine.
- Humphreys, L. 1970: *Tea Room Trade*. Chicago: Aldine.
- Krieger, S. 1983: *The Mirror Dance: Identity in a Women's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ofland, J. 1966: *Doomsday Cul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85: *Protes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Prus, R. and Irni, S. 1980: *Hookers Rounders and Desk Clerk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Hotel Community*. Toronto: Gage.
- Scott, M. 1968: *The Racing Game*. Chicago: Aldine.
- Stein, A. 1997: *Sex and Sensibility: Stories of a Lesbian Gene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rauss, A., Schatzman, L., Bucher, R., Ehrlich, D., and Sabshin, M. 1964: *Psychiatric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Unruh, D. 1983: *Invisible Lives*. Beverly Hills: Sage.
- Wiener, C. 1981: *The Politics of Alcoho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Wiseman, J. 1970: *Stations of the Lost: The Treatment of Skid Row Alcohol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Zurcher, L. and Kirkpatrick, R. G. 1976: *Citizens for Decency: Antipornography Crusades as Status Defens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第⑧章

社会学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



P. 阿贝尔

阿贝尔 (Peter Abell) 是伦敦经济学院跨学科管理学研究所所长, 也是该校经济实践中心和社会学系的成员。关注领域为数学社会学和形式模型设计。最近的书为《社会生活的句法: 比较叙事的理论与方法》(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8.1 当代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
- 8.2 社会学中理论问题的性质
- 8.3 解释社会行动
- 8.4 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
 - 8.4-1 按照偏好行事
 - 8.4-2 偏好的形成
 - 8.4-3 结构性说明
 - 8.4-4 虑己
 - 8.4-5 范式上的特许
- 8.5 互赖与社会行动
- 8.6 社会行动与博弈论
- 8.7 建设未来的社会学理论



■ 我们在此可以拿韦伯的话作为一个合适的开头：“社会学……是这样一门学问，试图对社会行动做出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以期由此达成对其进程与效应的一种因果性说明（causal explanation）”。不仅如此，“当行动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由此确定自己进程的方向时，该行动就是社会性的行动”（Weber, 1947）。

理性选择理论或理性行动理论可以理解成对于韦伯研究方案的一种可能的解释，虽然也必须指出，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解释，因为它提请我们采取一种最为简明的社会行动观念，我们可以在分析上借用它来达成“对其进程与效应的一种因果性说明”。它就此摆脱了许多后韦伯主义（而且在这一点上也是前韦伯主义的）理论传统，尤其是属于现象学一派的那些传统。在后面那些理论传统里，宗旨似乎偏于截然对立的方向，也就是要找到一些方式来理解在局部上十分精细而复杂的（社会）行动。至于为什么说理性选择理论采取了这种独具一格的立场，将是我们下文探讨的重点。

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有种种明显的局限，但在那些探讨对于宏观现象或系统层面现象的说明的社会科学当中，比如社会学这样，已经可以证明它是最为成功的理论框架。因此，我们在追随帕森斯那富有说服力的论调（Parsons, 1937），全盘抛弃这种理论之前，也应该慎重几分。尽管我们还要稍后再来比较细致地考察理性选择理论的各项假设，但是，先给出一种宽泛的操作定义（在某些人看来，或许有点儿过于宽泛了），将有助于让我们开始讨论。就其最宽泛的解释而言，理性选择理论引导我们将个体行动者（在特定情景下也可以是某一种集合体）理解成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或者更有可能是以这种方式互动，在这种方式下，可以认为他们在自己那些给定的目标、资源和环境条件之下，为自己尽可能做出了最好的努力，就像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一样。

在此插上一句提醒的话或许是比较合适的。在我看来，要是主张在社会学中完全依赖某种单一性的理论框架，会是一种危险的偏见。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形貌是如此多样化，这样的主张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实际上，在此我期望倡导的无非是，对于解决某些特定的理论难题来说，理性选择理论可能是我们所掌握的理论框架中最不坏的一种（Abell, 1992）。我期望证明的是，这一点有一部分来自于它本身的长处（即便是一些有限的长处），同时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它的竞争对象的短处。就后者而言，将有赖于读者去拿此处包含的这些论点与本书其他各章中的那些主张做些比较。

我首先将简要介绍一些以往的努力，它们的宗旨都是要将理性选择理论提升为社会学理论中一种不容小觑的理论框架。我刻意使之简明扼要，因为很显然，最

为重要的一些发展都是当前正在发生的趋势,对于此前业已发生过的东西,它们只有一些偶尔一现的关联。实质上,在过去十数年当中,我们已经见证到理性选择理论方面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革命。至于它是否会对社会学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什么持久的影响,那就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了。但是,读者如果希望熟悉主流发展趋势,也许更乐于去读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Coleman, 1990)的开头几章;而无论是要看支持意见还是批评意见,也都可以去看科尔曼与法拉罗合编的《理性选择理论》(Coleman and Fararo, 1992),以及阿贝尔的《理性选择理论》(Abell, 1991)。库克与列维合编的《理性的限度》(Cook and Levi, 1990)也是一部有益的读本,而埃尔斯特*写的几乎所有东西也都符合这项标准,不过他的《社会科学的基本要点》(Elster, 1989a)带有浓重的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色彩,有充分的理由充当一部入门文献。

有些读者更愿意让他们的理论不要那么稠密,能够添上一些富于启发的定性经验研究。这些读者会发现甘贝塔的《西西里黑手党》(Gambetta, 1993)令人不忍释手,而赫希特的《群体团结的原理》(Hechter, 1987)则富有说服力。萨基(Sage)出版社发行的《理性与社会》(*Rationality and Society*)杂志具有社会学的取向,现在已经确立了该领域的领袖地位,虽说《数学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也刊载有许多渗透着理性选择视角的文章。

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要体会到,相邻学科的发展趋势长远看来也完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读者也许乐于参考奥德修克的《博弈论与政治理论》(Ordeshook, 1986)和克雷普斯的《博弈论与经济模型设计》(Kreps, 1990)。后一本书以平和的论调,介绍了业已席卷经济学的蓬勃发展的一类技术文献,不过也探讨了许多观念,比如信任与声望,这些观念此前被视为纯属社会学家的领地。

本章旨在向那些尚未入门的读者概要地介绍,在采取一种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时候,会出现哪些论题。话虽如此,就其本质而言,其中许多论题也都只能是点到即止。不仅如此,有一些论题是相当技术性的。然而我根本就不打算从技术的角度来阐述东西,而是在合适的地方,推荐给读者一些更多的文献。但也必须指出,要想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潜力有所领会,最好的办法就是演练几个业已证明成功的实例。从这个角度上说,莫塞尔主编的《行动中的理性》(Moser, 1990)也许会很有用。

* 此处原文为“Elsteral”,应为“Elster”。——译者注



8.1 当代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

尽管不难发现,一种切实可行的系统性社会研究的观念本身的根源,与启蒙运动的理性行为戒律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要说具有强烈的当代韵味的观念,我们还得到19世纪那里去寻找。功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以其各自的方式,利用了关于个体理性行动者的假设,尽管人们只是到了晚近才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贡献(Roemer, 1982; Elster, 1985)。但是,有关行动者之间交换的系统性分析,我们还得到帕累托那里去寻找。而交换这个观念如今已经成为大量当代理性选择分析的核心。不仅如此,如果我的开篇议论还可以当一点真的话,也就可以将理性选择理论看作是韦伯的核心主题之一的典型体现。

虽说让人哭笑不得,但迈向理性选择理论的现代运动的立足点,却正是来自其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也就是来自于帕森斯1937年问世的里程碑式作品《社会行动的结构》。在那部著作里,帕森斯的目的当然是要确立“唯意愿行动理论”的依据,并有所侧重地借鉴了欧洲社会思想传统,尤其是马歇尔、帕累托和韦伯(Coleman, 1986)。受外生的给定价值观念与规范督导的个体社会行动成为社会科学的基本素材。理性选择理论也支持唯意愿行动理论,或者在许多情况下说是唯意愿社会互动理论(参看韦伯)。尽管说理性选择理论还不愿意接受规范与价值观念的外生性(exogeneity),而是要从自身的准则出发,或许还得加上某种习得理论(learning theory)或进化选择,来寻求对这些东西的起源与持存做出说明。

但帕森斯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就是未能以严格的方式,在他1937年的著作中制定的那些微观基础上进一步构筑理论,却宁愿转向竭力构筑宏观社会均衡的分类体系(例如在《社会系统》中的做法[Parsons, 1950])。在这方面,他完全属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产物,主宰着那个时代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渴望,要跨越各门社会科学,构筑一般均衡理论。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用帕森斯《社会系统》的失败,来衡量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的相对成功,会很有一些启发。然而足以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帕森斯之所以会失败,部分原因正是他自己1937年的早期成就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一般均衡分析只有采取最为空疏的个体模型之类的微观假设,才能实现它那精致的思想,那缜密的演绎。但帕森斯在提出自己的唯意愿行动理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曾经主张过一种更为丰富的个体模型。因此,很难搞清楚这种丰富性如何能够融入那些微观假设,从而可以得出关于宏观后果(突出地体现为均衡)的演绎结果。对于这样一种作茧自缚的困境,帕森斯所给出的又是一种招致不良声名的含糊不清的回应。他一方面将注意力转向自成

一体的现象,但也同时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回归微观层面来弥合鸿沟。他采取了一系列含糊不清的主张,所依傍的不是清晰的演绎,而是反复运用层层嵌套的分类体系。从理性选择理论的立场来看,所有这一切都极其不能让人满意。在理性选择理论的立场下,寻求的是对联结各个层面——具体说就是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种种机制的清晰理解。

我们很快便会看到,考察我们关于个体行动者及其互动的微观假设究竟需要何等的丰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理性选择理论倡导“可能有的最简明的模型”,也就使自己与社会学理论中其他几股传统之间格格不入,尤其是符号互动论以及形形色色的现象学。

霍曼斯为了“缅怀齐美尔”而撰写的一篇文章“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Homans, 1958),*在许多方面孕育了晚近交换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霍曼斯力图澄清四套理论之间的关系:“行为心理学,经济学,有关影响的动力的命题,以及有关小群体结构的命题”。他引入了一些观念:可彼此替换的一些行动进程各自具有的收益与代价,边际效应的递减趋势,以及交换中的平衡或均衡的观念。不久便有布劳的著作《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跟进,于1964年出版。尽管此书有一些技术上的欠缺而美中不足(例如可以参见Heath, 1968),但在这个领域,它却俨然成为一部小经典。从那以后,交换理论已经吸引了它的支持者,成为社会学理论当中少数几块两面兼顾的领域之一,既能在大体上具有累积性,同时在技术上又十分牢固。就后一个方面而言,最重要的是与网络分析之间的联系愈益密切,就好比仔细控制的实验与进入实验室的趋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有许多宣称全心效忠理性选择理论的人,现在将网络分析与理性选择理论两者的融合视为迈向系统性社会学理论最有前景的道路。与此同时,交换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的并置,也在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Coleman, 1990)中找到了自己在当代的典型体现。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Olson, 1965)比布劳的书晚一年出版,已经证明是现代社会学理论中最具深远影响的著作之一。它已经孕育出大量有关集体行动的文献,其中大部分基于有关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 game)的分析。这类文献已经将有关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社团物品(club goods)这些此前专属经济学家的论题引入了社会学理论的核心(Coleman, 1990)。

尽管系统地将博弈论视作社会互动的惟一理论还只是比较晚近的主张(Raub-

* 1958年为齐美尔(1858—1918)诞生100周年。——译者注

and Wessie, 1992; Abell, 1993),但在理论分析当中使用某种博弈论框架却是越来越常见的事情了。法拉罗算是一位先行的倡导者(见《数学社会学》,Fararo, 1973)。而我们现在凭借后见之明,可以看出谢林的两部著作,即《冲突的策略》(Schelling, 1960)和《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Schelling, 1978),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有突出的创见。乌尔曼-马加利特的《规范的突生》(Ullmann-Margalit, 1977)将关于规范起源的博弈论分析带了进来。不过,要说对社会学理论产生最深远影响的观念,可能还得算是从强调单次博弈(one-shot games)(比如一次性囚徒困境)转到强调多次重复博弈。在这方面,阿克塞尔洛德的《合作的演进》(Axelrod, 1984)是一个转折点,不过在这里,我们越来越发现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的融合(Kreps, 1990)。

经济学家们已经赋予了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s)相当高的地位,通常是将行动者之间任何协商都化约为一个扩展博弈(extended game)中[即所谓纳什方案(Nash Program)]的前发举动。话说回来,这个策略是否能够表明适合于社会理论家的分析宗旨,那就只有靠时间来证明了。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未来都将在社会学理论的阐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我看来,严肃的社会学理论正处在十字路口上:它不仅必须明确地变成命题性与演绎性的,以此与(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找到的)大部分晚近传统划清界线,而且将会时常需要把社会互动的策略性意涵纳入考虑范围。科尔曼(Coleman, 1990)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具有重要影响的文本,以分析非策略性的互动(竞争性交换),但我的感觉是:策略性交换在未来将会更加处于核心局面。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种感觉的意涵。

8.2 社会学中理论问题的性质

一个理论要达到有效,就得有理有据地推论一种多少有些潜在的机制,以期说明令人难解的“经验”事件或关系。有一种见解常常受到张扬,认为经验事件与关系本身都是以理论的方式得以描述的。对此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毫无理由嘲笑,因为我们手里绝无前理论的事实领域。尽管如此,理性选择理论家们还是刻意压低了“描述性理论”在我们的理论努力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本着我拿来作为起首语的韦伯的研究方案的精神,对这些机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推论,以涵盖个体的社会行动。以下这幅简图(参见图8.1)改自经科尔曼之手普及的一个图表(Coleman, 1990),有助于给出某种初步的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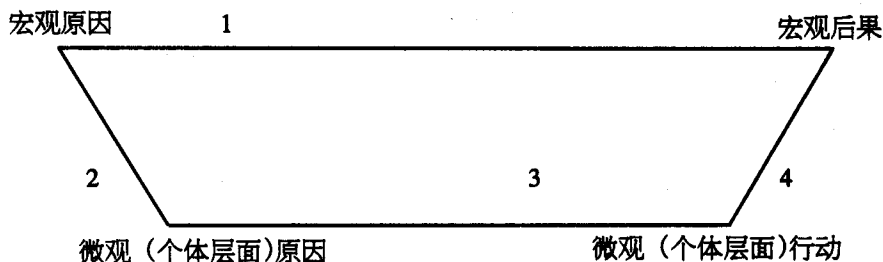


图 8.1 科尔曼-林登伯格图

初看起来,可以认为此图指明了因果关系的四种一般类型,每一种或许都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1. 宏观关系或系统层面关系:例如新教教义如何导致社会的经济组织(各例皆取自 Coleman, 1990, 受惠于韦伯)。
2. 宏观层面(或系统层面)到个体层面(或微观)的关系:例如新教教义如何导致个体价值观念。
3. 微观关系或个体关系:例如个体价值观念如何导致个体经济实践。
4. 微观层面或个体层面到宏观层面的关系:例如个体经济实践如何导致社会的经济组织。

尽管此图简单地让人放下警惕,而且我们应该还会有机会进一步扩充它,不过在此还是可以有几点最初的意见。首先,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对于类型(1)关系的说明通常是通过其他三种类型的结合而得出的。换言之,产生宏观层面令人难解的事件的那些潜在机制,通常被认为是通过微观(个体)层面而运作的。这也就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化约论或方法论个体主义。

其次,此图既可以上向扩展至“更高系统层面”,也可以向下拓展至亚个体〔微微观(pico)〕层面(Abell, 1992)。例如,系统层面可以首先关注社会群体,然后关注组织,再关注社会!

第三,位于关系之起点与终点的那些宏观“变量”可以是同一的,只是在彼此分离的不同时点上表示出来;有关宏观状态维持(也就是均衡!)的观念描述就是由此而来的。

最为雄心勃勃的理性选择理论阐述,就是力求在必要之处(也即当我们为之

困惑时)给出有关类型(2)、(3)和(4)关系的演绎模型,使它们可以组合起来,获得对类型(1)关系之“因果”生成的某种“理解”。不过话说回来,这种雄心勃勃的目标常常超出我们当前的技术把握程度,大多数当代分析都更为有限,集中关注微观到宏观的关系(即类型4)。

我的开场白业已表明,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解释成对于韦伯有关从因果角度理解社会行动的诉求的一种回应。有鉴于此,且让我们回到韦伯。

8.3 解释社会行动

韦伯(本章起首引语)主张,社会学应该关注:

以解释的方式理解
社会行动
以求获得对其进程与效应的因果性说明

而理性选择理论的主张则是:

1. 采取“尽可能简明的”个体行动理性选择模型,以此达成解释性理解;
2. 将社会行动解释为“尽可能简明的”个体互赖行动(或互动)模型;
3. 通过阐明类型(2)、(3)和(4)的机制来确立因果性说明,我们寻求给出说明的那些效应最终是体现在系统(宏观)层面上,而其原因则从图8.1的右上端逐步回溯推得。

本章余下部分将致力于分析这三项目标。尽管如此,在我们着手开展此项分析之前,还需要指出上面的两个要点:首先,是关于“尽可能简明”(the simplest possible)这个使用了两次的用语;其次,是关于“互赖行动”(interdependent actions)的性质。

我们前文已有机会指出,现代理性选择理论之所以与大多数当代社会学理论分道扬镳,恰恰在于它敦促我们找到简明的模型。实际上,它是在双重意义上提出这种主张的,因为它既恳请人们寻找一种关于个体行动者的简明模型,也恳请人们寻找一种关于个体之间互动的简明模型。为什么应该如此?原因就在于整体上的分析目标:在宏观层面上提供一种说明。许多贬损它的人很少会认识到,理性选择理论的提出,并不是作为一种精确描述的(贴近现实的)个体模型或个体互动模型,

而是作为一种简化处理,旨在将那些无法直接观察的高度复杂的机制,表述为理论上可以处理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理性选择理论也可能证明是一种错误的理论简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需要找到另一种简化处理的方式。但是,关键在于,如果真要想让它达到互动论者、现象学家或心理学家所使用的那些具有丰富描述性的语汇,一般来说也是行不通的。当然,如果这些语汇从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是精确的,那么理性选择理论那些空疏的抽象也就必然不能与它们不相吻合。但是,我们又该如何来确定,落实到哪一种简化处理方式上,才会与这些方面的公认之理没有不相吻合之处呢?

林登伯格(Lindenberg, 1992)提请我们注意两项重要的标准:每位行动者所需的最低信息限度;采取一些特定的模型,可以根据所需进行系统的、渐进的复杂化处理(也就是做得更加“贴近现实”)。但是,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所需”这个措辞,又如何知道每位行动者所需的最低信息限度置我们于何处?尽管我并不认为这些论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解决,但我们或许还是可以略作尝试(在这些方面,林登伯格的作品属于基本阅读文献)。

我们又一次回到整体上的说明目标,也就是为某种宏观层面上的后果给个说法。科尔曼(Coleman, 1990: 2)一如既往地给出了清晰的表述:

焦点必须放在有待说明的行为所属的社会系统上。这种社会系统小可以小至两人组合(dyad),大可以大到一个社会,甚或一个世界体系。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说明上的焦点必须放在作为一个单位的系统上,而不是放在组成系统的个体或其他要素上。

现在,从直觉上看来,我们对于个体及其互动所应采取的那些模型,其简明性将会与“有待说明的行为所属的系统”的复杂性呈正比对应。如果系统本身很简单,比如一个两人组合,我们或许就得选择一个比较丰富的模型,反之亦然。但是,除此之外,简明性还与我们期望在系统层面上维持的那些特性之间呈共变关系。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回溯,将这些特性归结为一种约束,它的作用中就包括确定我们模型的最佳简化方式。

不存在任何突生的特性,这是一项核心的原则。也就是说,系统层面(宏观层面)上的一项特性(即一组等价属性的界限),就意味着(相当于充要条件)它在微观层面上的生成机制中(也就是互动中的个体身上)的一项特性。简言之,不存在任何没有与之对应的微观特性的宏观特性。也就是说,不同的微观过程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宏观后果。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并不关心前者。因此,我们会选择有关的

个人及其互动的模型, 绕开对于诸如此类的特性的考察。所以说, 诸如此类的模型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在宏观层面上所需要的区辨程度来决定的。我们应当采用这样一些模型, 它们的复杂性程度符合需要, 足以确定在宏观层面上勾画出的特性。

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对当代大多数社会学理论所提出的一种共同的批评意见, 正是说没有重视上述这一启示。无论如何, 如果想要批评理性选择理论, 重要的是要基于真正薄弱之处 (确实有不少), 而不是对准那些只是不加掩饰的地方。

第二项一般性论题, 涉及互赖行动的观念。韦伯对于社会行动的界定, 只限于说某个行动者的行动“考虑到他人的行为”。而我们需要更精确一些。首先, 纳入考虑范围的常常不是他人的行为, 而是他人的行动或社会行动 (帕森斯会同意这种看法)。其次, 我们需要让这个界定更严格一些。一个行动者的行动可能会取决于他人已经实施 (以及 / 或者未曾实施) 的行动, 正在实施的行动, 抑或期待实施的行动。当行动以这种方式相互依赖时, 个体所做出的行动或选择就可以说是策略性的, 我们也将会看到, 此处合适的分析框架正是博弈论。尽管如此, 策略性互赖 (的社会行动) 显然非常复杂, 极难提取模型, 在求取最简明的模型的精神下, 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 (见下), 才会诉诸这种情形。

在实践当中, 对微观—宏观之桥 (图 8.1 中的右边) 的模型化处理中所涉及的大部分选择, 其核心便是选择适当的社会互动模型, 或者更一般地说, 选择适当的行动互赖模型。

用图 8.2 的图示来取代图 8.1 的图示, 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图 8.2 提请我们注意, 事实上, 产生需要说明的宏观后果的, 恰恰是个体的社会行动 (或互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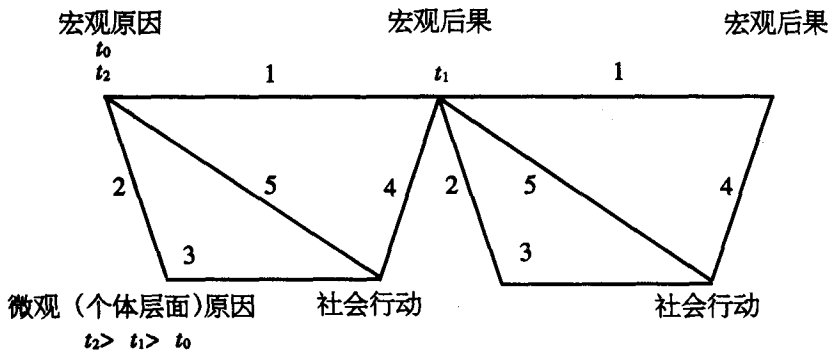


图 8.2 科尔曼—林登伯格图之拓展

的行动)。这里我加上了类型(5)的说明,以便考虑对于社会行动的制度约束(在博弈论中,也就是博弈规则)。

评价理性选择理论对社会学理论所做出的贡献的一种办法,就是逐一指明行动之间可以相互依赖(互赖)的多种不同方式。这样做即可标明理性选择理论能够运用的不同理论框架。不过,我们将稍后再来考虑这些事情,先来更细致地考察理性选择或理性行动的概念。

8.4 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

关于理性选择理论,有许多技术性的概论,感兴趣的读者也会被推荐阅读丰富的文献(Moser, 1990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不过,我们将采用一种不太正规的路子,我相信它将把已经提出的各种观念整合到更具社会学特色的思考方式中去。在这些方面,埃尔斯特(Elster, 1989a)照例成为灵感之源。

出于我们的宗旨,可以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以下列假设为出发点的,虽说我们也会看到,它们一方面依旧忠实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精神,同时也有可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有所松动:

1. **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只有个体才最终采取行动和社会行动,因此,也正是社会行动导致了我们希望予以说明的宏观社会后果或事件。进而,正是通过宏观社会现象对个体(社会)行动的“因果”影响,宏观关联才得以确立(图8.2)。
2. **最优状态 (Optimality)**——个体行动与社会行动都是在个体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各种机会,依照可传递的偏好(transitive preference)(效用,即信念与效果),从最优的角度选择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可以实现的最佳方案)。
3. **虑己 (Self-regard)**——个体的行动和社会行动所关注的完全是他们自身的福利。

在这三项假设之外,我还要再加上一项方法论原则:

4. **范式上的特许 (paradigmatic privilege)**——通过松动假设的某些方面,添入其他的理论要素(尤其是习得观念和进化的观念),塑造社会学理论。



未经入门的读者看到这样一份名单,完全有理由感到彻底的失望。首先,其中包含好些术语尚未界定。其次,即使它们都得到了界定,可以肯定的是,也很容易想到许多情境,其中的行动既不是虑己的,也不是依照最佳状态选择出来的(这样的结果太有可能了),不管所谓最佳状态可能意味着什么。第三,社会学家难道不是常常期望能够在自己的理论事业中涵盖超个体的实体(集体行动者)吗?如果我们稍微更近一些地分析每一项假设,想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出对于这些忧虑的回答。

首先来看个体主义。要在这里重新操演一遍有关方法论个体主义、化约论及一些相关观念——就这些假设来说,是关于平衡的观念——的那些令人厌烦的争论并不合适,对社会学并无裨益(O' Neill, 1973)。尽管如此,有许多遵循涂尔干路线的社会学家无疑希望从一开始就划清界限。这是一种不幸的结果,因为维系着理性选择理论家们的无非就是这样一种主张:宏观的或系统层面上的因果关系[图 8.1 和 8.2 中的类型(1)]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简略地表达了类型(2)、(3)和(4)关系之联结。两种系统层面变量之间令人困惑的联结必然意味着一些涉及更微观层面分析的机制。由于理性选择理论完全符合图 8.2 的嵌套形式,允许在个体与被选择的宏观层面之间再有中间层面(例如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群体),所以,这里所说的“更微观层面”通常就是个体层面,尽管也不一定总是这样。因此,这一视角考虑到了不同的化约程度,当然,假如个体层面之上任一层面的关系被认为难以求解,那么最终就得实施一种直至个体层面的化约。

这里的理论问题就是:个体之社会行动是如何生成了系统层面的关系?理性选择理论的个体主义所要求的立场无非就是这样。而应当予以澄清的便是:与某些批判性的描述恰恰相反,理性选择理论并不否认系统层面关系的重要性,并不断主张一种非社会性的个体模型,事实上,也不否认在说明某种给定的社会后果时群体或制度的外生性“首要地位”。只是话说回来,在持续存在的制度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们通常会致力于说明它们的起源。因此,这些制度本身也就成为需要说明的宏观后果,虽说如果再一次遵照图 8.2 的精神,诸如此类的说明或许还得诉诸此前存在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其他许多情况下,为了确定手头有待说明的问题的性质,设想一种像图 8.2 中那样的(时间上的)回溯会很有效的。

接下来看看“最优状态”:我们不妨这样说,在所面临的这些机会下,如果不存在其他任何(社会)行动,其后果会比某个体所选择的行动进程更为其所偏好,那么,该个体就会做出符合最优状态的选择。

关于“传递性”(transitivity)再说一句:理性选择理论的绝大多数形式化探讨都会对此有所假定,如果 A 选择优先于 B 选择,而 B 选择又优先于 C 选择,那么

A 选择亦将优先于 C 选择。看起来这的确很合乎情理,根据偏好这个观念本身,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是这样。然而,实验证据表明,人们并不总是保持着这种传递性(Kahneman and Tversky, 1990)。不仅如此,人们有时候还没有能力在各种选择方案之间作比较[所谓偏序(partial ordering)],或者即便他们有能力,也不在这些选择方案之间做出选择[所谓弱序(weak ordering)或漠然(indifference)]。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社会学现象中或许俯拾即是,可是给理性选择理论造成了困难;尽管如此,它们也并非不可克服,不会让我们在此止步不前。当然,遵照选择“简明”的行动者模型的精神,即使我们假定行动者自己选择某种行动进程,可以主导其优劣有序的各种选择方案,一般也不算太离谱。

假如说人们的行事方式始终如一地不符合他们的选择偏好,那理性选择理论当然只好缴械投降。几个可供替代的主要假定似乎可以这样表述:

1. 典型的情况是个体不会按照自己的偏好的最优状态行事;
2. 尽管个体可能按照自己的偏好的最优状态行事,但这些偏好本身并不是以最优状态形成的;
3. 个体根本就不按照偏好行事,而是受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力量驱动。

为了判断理性选择理论强令我们接受的有关最优状态的那些强硬主张是否有根据,来看看这些替代假定会有所帮助。

8.4-1 按照偏好行事

如果认为在事情的一般进程中,个体对于行动的选择是故意不能达到满足最大化,这样的主张显然是无稽之谈。当然,许多学者很好地记录了一些案例,尤其是埃尔斯特(Elster, 1989b),其中的意志弱点可以说妨碍了人们在行事时按照自己偏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根据自己更好的判断。不仅如此,有时候我们的行事是出于冲动,事后回顾才发现并非己愿;我们也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把持,从而遮蔽了我们的理智。所有这一切,或许还有更多,都是必须承认的。可是,如果在提炼微观—宏观机制的模型时,将这些边边角角的枝节都提升到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位置,至少可以说,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请注意,至此所说的一切绝不能使人有理由主张,行动者在行事时被认为要依照的那些主导偏好,必然体现着该行动者的最佳行动进程——这里所说的最佳,乃就这些偏好本身是根据最优状态形成的前提而言。我们还只能认为,不管行动者

碰巧拥有怎样的偏好,他或她遵循的行动进程是符合这些选择的最优状态的。而对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说,上面第二个假设才更成问题。

8.4-2 偏好的形成

因此,我们现在不妨来考察一番偏好的形成。有些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认为偏好不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稳定性(尤其与机会相比,机会据说可以说明行动中的变异),而且其形成方式完全无需理性选择理论费心。这些偏好的源起要么毫无意思,要么即使有些意思,也完全不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把握范围之内。然而,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则拒绝接受头一种看法,虽说他们对第二种看法倒还颇有些同感。

显然,驱动着一个行动者的行动的偏好将取决于:(1)行动者关于可行之行动(即机会)的后果的信念或推理(常常以或然性的形式);(2)行动者对于这些后果乃至对于行动本身(最终完成的行动)所持有的内心趋向(affect)。这是一种很明显的社会学语言,但是,就这样将偏好视为源于信念与内心趋向,倒是完全符合效用预期论(例如可以参见 Moser, 1990 中 Luce 与 Raiffa 合著的文章),以某种方式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主体内涵。

因此,当有学者声称偏好并非以最优状态形成时(上述第二项主要假设),可以化约为更基本的一些主张。首先,就其信念与内心趋向而言,偏好的形成并不符合最优状态。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实验室条件下的)证据正在与日俱增,例如可以参见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中发现的那些决策偏见(Kahneman and Tversky, 1990)。不过,这些实验结论是否足以阻止社会学理论家去寻求用简明的个体行动者模型来说明宏观的后果,还有待商榷,虽说林登伯格(Lindenberg, 1993)对于“框架化”(framing)的细致分析已经展现了可以做的事情。无论真理何在,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势基本上符合一种以更宽广思路深入理性选择理论的精神,当然也具备范式上的特许(参见下文)。

第二项主张是,行动者的信念并不是以最优状态形成的。所谓最优的信念形态指的是什么,严格说来是件很复杂的事情(Elster, 1989b),不过它通常的意味有如:在某一行动者给定的内心趋向(需求)下,可利用的/收集到的信息足以使行动者能够形成有关可能利用的行动进程及其后果的信念,从而使得(在行动者给定的内心趋向)一种更好的替代选择不会被忽略。事实上,当代理性选择理论中,有大量分析针对的是不完备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对于社会行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博弈论中尤其如此。更一般地说,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将有关信息

的假定作为核心的分析议题。因此,有些更为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途径的倡导者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家们,似乎都不必在有关偏好之形成的议题上纠缠不清;实际上,颇有一些理由可以让我们乐观地认为,最终有可能综合出一种共同的框架(Abell, 1992)。所有人都会同意,无论是就行动者发现自己身处的或者为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些通行信息条件之性质与原因提炼模型,还是就这些行动者同时持有的那些信念与内心趋向提炼模型,都常常处在社会学探索事业的核心(在这些方面, Boudon, 1989 尤其启发)。归根到底,理性选择理论家所需要坚持的无非就是一种颇为温和的最优状态模型,其中的行动者就是满足因子(satisficers)(Simon, 1982),在自己所认识到的所处给定情境之下,尽其所能。

根据这种思路,最终的外生性因素就是行动者的内心趋向。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有些批评者们觉得,这种理论的缺陷之一就是有关外生性偏好的假定所造成的。然而,即使说方才勾勒的那些论证有什么地方可以支持这些批评者,这种批评意见也应当改变方向,从偏好转向内心趋向。就我所知,有关内心趋向的源起与形貌,尚无任何不错的学说,虽说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倒是往往诉诸某种社会接触(contagion)或习得的模型。实际上,被理性选择理论说服的学者当中,有许多是将博弈论和习得理论之融合特别视为前进的方向(Kreps, 1990)。

8.4-3 结构性说明

最后来看所谓行动并非由偏好所驱动的观念。应当搞清楚的是,要说结构性说明,(图 8.1 和图 8.2 中)类型(1)的说明就是主要备选对象。我们也已经看到,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对于这些自成一体的东西的回应是消极的。不管怎么说,如果在确立通过微观层面的关联时,我们不得不接受所谓行动者只有一种可替代选择的见解,那么就需要有一种独立于任何偏好概念的结构性说明类型。有时候,社会规范或制度被认为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将行动的范围缩减到某种限定的程度。因此,理性选择理论家才会将“结构主义”视为自己理论的一种特例(在这些方面, Elster, 1989a, b 尤其值得一读,而 Roemer, 1982 则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

作为一位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家,在最优状态问题上会准备接受一种相当松动的立场,尽管如此,理性选择理论还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行动者虽说常常处在他们并不充分把握的情境之中,但仍会尽力而为。即便在松动的形式下,也正是这项主要的假设赋予了理性选择理论演绎力与说明力。因此,贬损理性选择理论中这项假设的名声,注定会证明是错误的做法。



8.4-4 虑己

现在且让我们来简单地谈谈关于虑己的假设。尽管标准版本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出发点就是认为,个体的行事就是为了(以最优方式)满足他们出于虑己的偏好,但是,在理性选择理论中绝无任何内在固有的立场,要排斥以个体或集体为导向的虑他(other-regarding)情感。现在有许多尝试,要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中,融入利他主义(altruism)、恶意以及更一般地说的相对效用的考虑(例如 Margolis, 1982)。然而,理性选择理论家在诉诸这类情感时始终非常谨慎,在面对外表上的虑他时,往往会去寻求隐藏的虑己。不仅如此,即使在存在无可争辩的利他之类证据的地方,他们也常常会组织某种基于重复互动的进化“检验”,以揭示虑己的人群是如何通过一种随机变异、选择和复制的过程,产生并维持了利他主义(例如 Frank, 1988)。他们不懈地努力着,将人类提升到几乎发自本能地虑己的地步。这种努力让许多社会学家极为反感,因为他们感到,无论是对于他人的善意,还是对于他人的恶意,都是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内涵。*但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并没有任何内在固有的成分促使我们采取这种立场。所谓真理何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的问题。然而,许多理性选择理论家会强令我们接受的警示是能够转为有利于我们的。面对一样令人困惑的宏观现象,诉诸一种关于个体内心趋向的方便假设,使得说明无异于一种同义反复(Hechter, 1987),这再容易不过了。至少理性选择理论的保守风格会保护我们免遭这种结局。

群体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它使人们有机会为群体服务,还是因为他们服务于虑己的需要,抑或实际上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理性选择理论家会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有独立的证据表明群体的情感,那就构筑一套合适的理论,同时有一套辅助理论来说明这些情感何以源起,或许也说明它们何以延续。而如果缺乏此类证据,就基于简明的虑己原则来构筑理论,并将其演绎性后果交付尽可能广泛的证据检验。只有当这种办法也不成功,才另寻出路。

听起来这似乎有些缺乏新意,但在这里,这还算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我们手头掌握的任何有关虑他情感的独立证据(即独立于我们试图说明的后果)。许多理性选择理论家在热诚地提倡完全依赖虑己立场时,会与这

*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选择了比较“古怪”的“虑己”和“虑他”的译法,而不是更常用的“自利”、“利己”之类用词。利他主义只是虑他的一种。——译者注

一原则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在毫无必要的地方,在应当把说明的焦点转向情感本身的源起的地方,构筑过分精巧的理论。另一方面,我们还得提防轻易诉诸“奇异的情感”。

8.4-5 范式上的特许

最后,我们来看看范式上的特许,尽管这不需要耽搁我们太长的时间。我相信,讨论到这一步,理性选择理论为何可以宣称说明上的特许,应该已经相当清楚了。理性选择理论之所以可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它的排他性,而是因为它宣称是我们在构筑理论时的首选框架,因此,根据它自身的原则,即便在尽力而为的情况下,也需要有辅助的理论。目前来看,这些辅助的理论似乎就在于网络理论、习得理论、模仿理论(mimetic theory)和进化理论的复杂融合。我们在下文还会讨论到其中有些理论。

8.5 互赖与社会行动

如果我们根据韦伯的做法,把社会行动置于万事万物的核心,那么行动者在其中相互依赖的那些方式也就具备了核心的意义。但令人深感惊讶的是,尽管社会学中有许多理论传统明确承认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但我们在理论上却看不到有很多关于互动的类型学说。

就理性选择理论的宗旨而言,区分**独立行动**(韦伯所谓的行动)和两类(相互)依赖的行动(韦伯所谓的**社会行动**),即**参数性(parametric)社会行动**与**策略性社会行动**,会是一种有用的做法。独立行动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评点,只需指出,社会学家很少对个体在其中各自独立行事的情景产生研究的兴趣。

当他人的行动可被视为独立于所研究的核心行动者(focal actor)的所作所为时,社会行动就属于参数性社会行动。此时核心行动者就不必计算他人将会根据自己所作所为或对自己可能作为的预期而做出的反应。行动者可以将他人的行动视为某种给定的东西或其后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环境对其所作所为并无积极回应,只不过其他人有可能随即根据核心行动者的行动(或其后果),做出参数性的行事。如果每一个行动者都将他人当成这种方式上的环境给定因素,那么他们就可能达成参数性互赖。

而在另一方面,当一个行动者需要计算他人依据自己的行动而在当下或将来的所作所为,以决定自己该如何行事时,就出现了策略性社会行动。此时的行动环

境对于该行动者的所作所为会有积极的回应。如果行动者相互之间有着策略性的依赖,那么他们就处在策略性互赖状态中。所谓博弈论,就是关于策略性互赖的理性选择理论。

以独立状态为出发点,然后逐步将图景复杂化,这在理论上是很有助益的。这样做完全符合我们早先对于采取我们能够发现的最简明模型的诉求。

有大量的“社会学研究”事实上是认为分析单位——更多的情况下是个体——以相互独立的方式行事或获得它们各自的特征。比如说,绝大多数基于回归的研究是通过将个体特征回溯至同一个人在个体层面上的外生变量,来寻找个体特征的“原因”。这就实现了最简明的类型(2)说明(图8.1和图8.2)。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宏观层面关系[类型(4)]只不过是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两种分布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可以探讨独立提取的分析单位的聚合(aggregation)。个体出生时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最终地位之间的关系(社会流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将有关个体之“社会环境”的成分融入这一框架,也就引入了理论的原则。事实上,出身时的社会地位也可以照直理解成“社会环境”。不过和前文一样,这里的分析单位并不以互赖的方式行事(或获得特征),而是着眼于某个共同的或不同的环境,视具体情况而定[图8.1中的类型(1)]。如果这种路数中的内生变量描述的是个体行动,那么环境变量就是参数性的,被视为给定因素,对于核心行动者的所作所为不会有积极的回应。只要涉及理性选择理论,它就会表现为揭示在其他条件相等、环境给定的情况下,所得结果如何正是行动者能够为自己做的最佳结果。大体而言,那些研究社会流动的学者并没有找到出生时的地位与其最终地位之间有什么近于普遍的关联,尤其是当通过中介变量来阐释时,情况就愈发复杂,难以保证有详尽的理论探讨。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路数,尽管还留在参数性环境的框架之中,仍可以将行动者的互赖(社会行动)纳入模型。首先,可以举交叉层面(cross-level)模型为例。在这种模型中,个体的行动被视为在抽取个体的那个群体或总体中,内生变量或外生变量[有时被称为结构效应或合成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s)]的平均值(或其他某种参变量)的某一变量。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或许就是个体成就指数(individual achievement score)不仅取决于个体的能力指数,而且取决于个体所属群体或社会环境的平均能力指数和/或平均成就指数。颇有一些理性选择理论家有这种结论(例如De Vos, 1989),通常被认为很让人费解。

结构模型或合成模型为我们相当粗略地描绘了每一个体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环境中他人的参数性依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聚合的作用机制。分析单位依然被视为相互独立,只是带上了源于自己周围众人的个体层面指数。

而内生与外生自相关 (autocorrelation) 的模型 (Anselin, 1988) 则提供了一种更为详尽的个体互赖图景。在这类模型中, 分析单位 (例如行动者) 彼此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 因为它们的内生变量指数是其他行动者的至少某些内生变量和 / 或外生变量之指数的应变量。

内生自相关可以用来提炼个体行动之互赖的模型, 将这种互赖看成是他们在某种“影响结构”中的定位的后果。宏观层面上的聚合依然只能产生某种内生变量分布, 但现在却对微观层面上行动者的关联性模式有着关键性的依赖。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 行动者怎样应对自己周围他人会是理性的方式 (最佳的行事方式), 即所谓理性模仿, 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对这一类“影响结构”特别感兴趣 (Abell, 1991)。诸如此类的模型建构将理性选择理论与社会接触理论联系起来, 也与网络理论联系起来。

尽管这类模型大体上被用来研究某一行动者对于自己所连接的其他行动者的参数性依赖, 并且此时的结构是外生性给定的, 但是, 并没有任何内在固有的理由认为就该如此。旨在揭示理性行动者如何构造与他人之间关联的马尔可夫模型 (Markov model) 是可能的 (Leenders, 1993), 而由此产生的双向互赖便可以获得某种策略角度的解释 (参见下文)。

社会交换的互赖或许是社会学文献中研究最深入的。本着我们的基本区分的精神, 区分参数性模型与策略性模型还是很有助益的。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已成经典源泉, 尽管在其中策略性模型更具根本意义, 但对于参数性模型的研究却更为详尽。参数性交换模型假定那些具有外生资源的个体会在给定的 (也就是参数性的) 交换率 (价格) 下, 遵照帕累托均衡 (Pareto equilibrium) 进行交易, 这样便在很大程度上仿效了经济学理论中的竞争模型。至于达成均衡——也就是宏观后果——的趋向中的细节, 则被抽象掉了。另一方面, 策略性模型则提请我们分析行动者在达成交换率时所采取的策略。在此, 博弈论的原理已经成为理解宏观后果时的核心要素 (参见下文)。

对于那些给其他各方产生了外部性 (也就是不良影响) 的行动与社会行动, 科尔曼也给予了详尽的分析。正是这类外部性创造出对于社会规范的需要。科尔曼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规范的“供需”理论, 不过还是在严格的理性选择视角下操作。同样, 这种理论在结构上也是参数性的。

还有一种可以产生社会行动的方式, 其中的行动者确实有一些 (相互) 依赖的效用 / 偏好。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了虑他的情感。这些类型的效用实际上也将外部性融入了行动者的推理之中。

至此, 我们几乎完全集中于讨论参数性社会行动。尽管如此, 目前的研究却是

强烈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策略性情境。当然,出于我们早先提出的对于简明模型的诉求,有一点始终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搞清楚,在转向策略性模型之前,参数性模型能够把我们带到多远,因为它毕竟在大体上更简明一些。不过,假如参数性模型未能成功,那么策略性情境的复杂因素也是不得不论及的。

8.6 社会行动与博弈论

博弈论扩展了个体理性行动理论的范围,纳入了行动者在自己行事时还考虑其他行动者行动的那些情境。因此,一个行动者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或她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行动者的行动,而行动的后果,作为一系列可能后果中的一种,也是由不只一个行动者所产生的。

有许多微观—宏观机制具有一套复杂的策略结构,我们要想揭开它们的复杂性,就得指望博弈论。尽管博弈论越来越进入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但不幸的是,在社会学理论大餐的各道菜色中,它还没有成为主食,因此,也没有得到多少理解。这就造成了某种困难,因为区区一章篇幅有限,事先就决定了不可能给出完善的介绍。当然,大包大揽也不见得合适。我能够想出的最佳方式就是粗略介绍一下,博弈论利用本文中以黑体标出的各个通行概念,能够发挥出多大的作用。读者们如果已经很熟悉这些概念,期望作更多的了解,可以参考任何关于博弈论的通行教材。我力求列出当代社会理论家要想对该领域略有所知而需要了解的最低限度的概念。而对于那些想要进一步深入的人来说,宾莫尔的《嬉戏与游戏*》(Binmore, 1992)既有可读性,又能把读者带近知识前沿。至于其他读者,或许最好是回到卢斯和莱法合著的《博弈与决策》(Luce and Raiffa, 1957),也可以看看梅厄森的《博弈论:关于冲突的分析》(Myerson, 1991)或者拉姆森的《博弈与信息》(Ramusen, 1989)。汉堡的《作为社会现象模型的博弈》(Hamburger, 1979)能让你感受到实际应用的可能范围。《理性与社会》杂志(*Rationality and Society*)第4卷第1期(1992)集中讨论了社会科学中的博弈论。劳和维希合著的《博弈论在社会学中的应用》(Raub and Weesie, 1992)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该领域的概况。

在最一般的层面上,博弈论可以用来阐明策略性情境的性质,并且尽可能指出一种均衡解决方案[有时候是一种**主导均衡**(*dominant equilibrium*),常常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或其某种改进],能够就每一个理性行动者都会采取的行动

* “game”兼有“游戏”、“博弈”之意。——译者注

(策略)作出预测。就此而言,博弈论的应用既可以是规范性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所采取的行动既可以是**纯粹策略** (pure strategies),也可以是**混合策略** (mixed strategies)。

划分博弈类型的方式究竟什么最合适,学者们的观点因时而异,早先是认为最好分成**零和博弈** (zero-sum games)与**非零和博弈** (nonzero-sum games),但当代的绝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基于**完备信息** (complete information)的博弈与基于**不完备信息** (incomplete information)的博弈之间的区分才是最根本的区分。这种区分使分析者转而关注行动者[**博弈者** (players)]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也符合我们早先的诉求,就是把据以形成偏好和采取行动的各项信息条件明确纳入考虑。学者们通常假定,行动者会假定其他行动者也是讲求理性的,如此等等,这是**共同知识** (common knowledge)的一个方面。至于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可以借用豪尔绍尼的**类型学说**来处理。

博弈可以发生在两个博弈者之间,也可以发生在更多博弈者之间(N方博弈论)。不过当这个N数值较大时,常常通过某种简化,让一个一般化的核心博弈者和 $n-1$ 对剩下的其他博弈者博弈,以这种方法在分析上“完成处理”。

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合作博弈中,博弈各方彼此沟通,由此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定以形成联合;而在非合作博弈中,不会达成任何诸如此类的协定。学者们(尤其是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任何合作性的协商都概括成某种扩大式*非合作博弈中的前发举动,以此将合作博弈化约为非合作博弈。尽管如此,社会学家们已经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合作博弈,关注像**特征函数** (characteristic function)和**核** (the core)之类概念的分析力。

现在学者们认为,以**扩展形式**出现的博弈要比以**规范形式**或**策略形式**出现的博弈重要得多。它们刻画了一次博弈的序列结构(**博弈树**),并且考虑到了具体指明**不完善信息** (imperfect information),也就是说,一个行动者不是准确地了解自己在扩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许多重要的均衡改进[例如**完善均衡** (perfect equilibrium)]也可以从扩展形式图中进一步推出。对于有关完备信息和共同知识的假定的解释之一,就是说博弈所涉各方全都了解扩展形式,包括彼此对于结果的偏好,并且每一方都期待其他各方遵照某种均衡路径——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路径——来选择行动。而如果存在**多重均衡** (multiple equilibria),就需要就均衡选择提出进一步的见解[例如谢林所谓的**核心关注** (focal points)]。

在当代的分析中,**重复博弈** (repeated games)或**累加博弈** (super games)〔包

* 原文为“enlarged”,本章前文用的是“extended”。——译者注



■ **括确定次 (finite times) 博弈和不确定次 (infinite times) 博弈**也有着核心的地位,特别是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与**针锋相对策略 (tit for tat strategies)** (Axelrod, 1984)。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中,学者们可以用相当严密的分析来处理诸如信任与声望之类的概念 (Kreps, 1990)。

博弈论在用于复杂策略情境的时候,并不总是很容易让人信服的,因为即使我们能够理清策略结构,也可能要求行动者做出相当大胆的计算,很难相信他们能够在实践当中实现这种计算。换言之,实际应用中的博弈论可能蕴含着博弈者方面非凡的认知能力。传统上,博弈理论家们假定博弈者通过试错法 (或许也包含某种机遇的成分)来学习把握博弈,找到均衡,用这样的假定来消除这方面可能有的批评。

照我猜想,还有一种类似的思路会在未来的社会学理论里找到安全的居所,它甚至不要求博弈者 (行动者)学会如何去以理性的方式参与博弈,而只要求博弈各方选择可以利用的任何一种策略,然后与其他博弈者 (或者是随意的,或者是有选择的)重复互动。如果博弈者就此转换策略以效仿那些更为“成功”——具体何谓成功则是动态不定的——的博弈者,我们就有了所谓的**进化性博弈 (evolutionary game)** (参看 Weibull, 1996,这是一部不错的概论,虽然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对读者的要求较高)。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理论家来说,将进化性博弈理论的观念与模拟动态机制 (决定论的或随机性的)中的数字模拟相配合,近来已经成了最让人心动的成功前景 (Skyrms, 1997; Bahr and Passerini, 1998)。它使得理论家们有可能考察某些系统的动态行为,这些系统都属于太过复杂,以至于不能求得分析上的解决,从而也使理论家有可能在证明不可能进行真实实验的地方进行准实验。

进化性博弈理论有它自己的均衡概念 (首先是由进化论生物学家阐述的),是从进化稳定策略 (ESS,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的角度入手的。这种策略 (或许混杂在一堆策略之中)是动态机制所导致的,是不能被“外来侵入的”策略所取代的。进化稳定策略与纳什均衡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这方面目前正有许多学者在研究 (Bendor and Swistak, 1995, 1997)。进化性博弈的决定论式动态机制会以**路径依赖的方式 (path-dependent manner)**,选择一种特定的纳什均衡 (如果存在不只一种均衡的话)。令人惊奇的是,随机式动态机制的引入常常会导致路径独立 (参看 Sandholm, 1998,这是一篇比较浅易的评述)。

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最具前景的是这样一种模型,其中 (以一种策略参与博弈)的个体有选择地只与“邻居”互动。尽管分析上的解决方案很难找,但通过模拟可以告诉我们究竟有多少种可能性。

如果要我费心精确地指明有哪一种分析框架可能证明最有助于发展一套切合

真实的社会理论,我就会选择进化性博弈理论。它以模型塑造了这样的情境:(1)具有一种策略结构;(2)不依赖于过度理性的假定;(3)靠动态机制来选择均衡结果。动态机制的模型塑造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甚至可以引入自组织和混沌行为(Skyrms, 1997)。

8.7 建设未来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理论家们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就是一方面提炼出个体社会行动与宏观结果之间桥梁的模型,另一方面提炼出宏观结果与个体社会行动之间桥梁的模型。要达成这两个相伴而生的目标,我们就需要一种关于个体行动者的模型,这种模型要足够的简单,足够的灵活,给我们成功的机会要能说得过去。理性选择的理论家们相信,理性选择理论就符合这种要求。归根结底,这种理论使我们坚持的无非是这样一种假定,个体依据这种假定,基于针对他们所见自己面临的种种机会的偏好,尽力而为。

将个体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果(不一定是合乎意图的)连接起来的机制常常是很复杂的(Abell, 1993),涉及许多行动者,错综复杂的各种模式的策略性互赖与参数性互赖。目前我们所拥有的用来应对这种复杂性的惟一框架,就是博弈论——即使它有着种种的局限。不管怎么说,这些机制各具特色,异常复杂,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我所谓的复杂,指的是有丰富历史基础的个案研究以其独有方式提供的某种序列性素材。诸如此类的个案研究通常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它们常常涉及许多行动者(分析单位),这些行动者的行动表现为策略性互赖或参数性互赖;其次,这些行动者/分析单位可能处在不同的聚合水平上,比如说个体或这样那样的集合体;第三,在叙事过程中这种聚合还有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说创造出一种有实际效力的集合体;第四,可能有许多并行处理的复杂模式,包括许多子线索的分叉和重组;第五,这些并行处理的时间标志可能有着不同的尺度。(Abell, 1993)

如果要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复杂性,我们就必须摸索出一些处理它的方式。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很可能有不少博弈在同时进行,其各自的结果有着参数性的关联。我们需要用一些特定的方式来描述这些复杂的过程,可以将它们处理成“序列性事实”,从而处理成构成这些过程的那些博弈中的均衡路径——但愿如此。

近近年来,学者们已经摸索出一些具体技术,让我们关注作为社会学的事实基础的互动序列(例如 Abbot, 1984 中提出的序列分析; Fararo and Skvoretz, 1984 中提出的生产系统; Abell, 1987, 1993 中提出的叙事分析; Heise, 1990 中提出的事件结构分析)。尽管这些分析技术不一定必然维系着某种理性选择理论框架,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很容易建立起关联的。社会理论界中晚近最重大的转向,或许就是将社会学理论重新引回就互动序列(产生宏观结局)给出说明的方向(Fararo, 1989)。与此类似,从宏观到微观的那些复杂过程,确立起我们的种种信念、内心趋向、规范/价值观念(构成了我们的偏好),并且确定了我们的机会结构,它们也具有明确的序列性,最终也需要作类似的探讨。有了这些种类的分析,我们最终将开始实现韦伯的抱负,即达成对于社会行动的某种解释性理解,以便由此得出对于社会行动的过程与效果的因果性说明。

参考文献

标有星号的书目将为任何社会理论入门课程奠定基础。

Abbot, A. 1984: Event sequence and event duration: colligation and measurement. *Historical Methods*, 17, 192 — 204.

Abell, P. 1987: *The Syntax of Social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1: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1992: I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rational choice of theory? In Coleman and Fararo (1992).

——— 1993: Narrative method: a reply.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6, 253 — 266.

Anselin, L. 1988: *Spatial Econometric Methods and Models*. Dordrecht: Kluwer.

* Axelrod, R.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Bahr, D. B. and Passerini, E. 1998: 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collective behaviour: macrosociology. *Journal of the Maths Society*, 23, 29 — 49.

Bendor, J. and Swistak, P. 1995: Types of evolutionary stability and the problem of cooper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2, 3596 — 3600.

——— 1997: The evolutionary stability of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2), 290 — 307.

* Binmore, K. 1992: *Fun and Games*. Lexington: D. C. Heath.

- Blau, P.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 * Boudon, R. 1989: Subjective rationalit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 173 — 196.
- Coleman, J. S. 1986: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and a theory of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309 — 1335.
-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 and Fararo, T. 1992: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 Newbury Park, CA: Sage.
- Cook, K. S. and Levi, M. 1990: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 Vos, H. 1989: A rational choice explanation of compositional effects on education research.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 197 — 220.
- Elster, J. 1984: *Ulysses and the Sir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 1989a: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b: *The Cement of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raro, T. J. 1973: *Mathema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Wiley.
- 1989: *The Meaning of General Sociolog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Skvoretz, J. 1984: Institutions as production system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0, 117 — 181.
- Frank, R. H. 1988: *Passions within Reason*. New York: W. W. Norton.
- Gambetta, D. 1993: *The Sicilian Maf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Hamburger, H. 1979: *Games as Models of Social Phenomena*.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Heath, A. 1968: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ology. a critique. *Sociology*, 2, 273 — 292.
- Hechter, M. 1987: *Principles of Group Solidar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ise, D. 1990. Modelling event structure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6, 142 — 159.



- * Homans, G. C. 1958: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 597 — 606.
- * Kahneman, D. and Tversky, A. 1990: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risk. In Moser (1990).
- Kreps, D. M. 1990: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l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eenders, R. 1993: Modelling dynamic dependence between network structure and actor characteristics. Mimeo. Groningen: ICS.
- * Lindenberg, S. 1992: The method of decreasing abstraction. In Coleman and Fararo (1992).
- 1993: A theory of relational signalling and some empirical tests. Mimeo, Groningen. ICS.
- Luce, D. and Raiffa, H. 1957: *Games and Decisions*. New York: Wiley.
- Margolis, H. 1982: *Selfishness and Altru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Moser, P. K. (ed.) 1990: *Rationality in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yerson, R. B. 1991: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Neill, J. (ed.) 1973: *Mod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London: Heinemann.
- Ordeshook, P. C. 1986: *Game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1950: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 Ramusen, E. 1989: *Games and Inform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 Raub, W. and Weesie, J. 1992: *Sociological Applications to Game Theory*. IS-CORE Part4. Utrecht University.
- Roemer, J. E.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ndholm, W. H. (1998) History-independent prediction in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0(3), 303 — 326.

- * Schelling, T. C. 1960.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8: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ur*. New York: W. W. Norton.
- * Simon, H. 1982: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kyrms, B. 1997: Chaos and the explanatory significance of equilibrium: strange attractors in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In C. Bicchieri, R. Jeffrey, and B. Skyrms (eds.) *The Dynamics of Nor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llmann-Margalit, E. (ed.) 1977: *The Emergence of Norm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Van Damme, E. 1998: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game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Aumann.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 24, 181 — 210.
- * Weber, M. 194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s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ibull, J. W. 1996: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第⑨章

人类学与社会理论



J. 法比昂

法比昂 (James D. Faubion) 1980 年在美国俄勒冈州里德 (Reed) 学院获得人类学与哲学学士学位, 1990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获得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与学术成就涉及古代与现代希腊, 现代化与现
代性, 社会与文化改良主义, 宗教激进主义以及欧洲社会思想。近些年来, 他一直在大卫教支部存余分子当中从事田野调查, 这个千年末世共同体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已死于与美国政府长期僵持后的玉碎之中。他著有《现代希腊启示录: 历史建构主义初探》(Princeton, 1993), 编有两部文选: 《主体再探: 当代欧洲社会思想文选》(Westview, 1995); 《福柯基本文选》(第二卷《美学、方法与认识论》, New Press, 1998)。目前他是位于得克萨斯休斯敦的赖斯大学人类学副教授。

9.1 相对于现代的他者

9.1-1 马克思主义

9.1-2 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

9.2 现代之中的他者

9.2-1 精神分析、交换与女性的位置

9.2-2 长时段的结构再生产

9.3 他者的现代

社会理论与人类学的关系至今夹缠不清,但绝少成为宏大叙事的素材。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那么无章可循,枝蔓丛生,充满变数,以至于无法融入宏大叙事。它倒是招来了许多小型的故事,但每一种都不可避免地只是片面的说法。以下的故事也没有丝毫的不同。它远不是要提供一幅完整的画面,一幕巨细无遗的描叙。但是,它至少有一点长处,就是以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作为出发点,哪怕它不能再完全以这些老生常谈作结。因此,会有这样的开场白:社会理论家致力于探讨西方的世界,而人类学家致力于探讨其余的世界;社会理论家关注的是现代的东西,而人类学家关注的是原始的、传统的东西。这些对比差异众人皆知,也经久不衰。纵然它们也显得非常精致,但所意味的那种截然分野却不仅仅是表面文章。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理论家里面投身于评述人类学素材的人还是相对较少的。而坚持不懈地运用这些素材的人就更少了,只有三四个令人瞩目的例外。坦率地说,他们这种迟疑倒也颇为令人同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人类学逐渐偏离了曾经驱动着其创始人那种宏大比较的雄心。到了20世纪中叶,如果一项研究方案的范围有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Lévi-Strauss, 1969[1949]),则已经成为学科的异数,就算是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人类学的实践已经离不开田野调查行为和民族志的撰写,民族志写作正以愈益让人惊愕的数量,从学术出版机构中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当代许多民族志具有相当的理论关注,但只有少部分有自身的理论创见,而要说到理论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就更是少之又少了。不妨以文化这个表面上如此基本的概念为例。任何人要想寻求人类学中对于文化的地位——甚至只是文化的界定——的标准评定,都会很快感到失望。文化一会儿是一种具体现实,一会儿是一种解释学的抽象;一会儿富有牢固效力,一会儿又纯属附生现象;一会儿是一种固有风格,一会儿又是一种调适机制;一会儿是稳定的系统,一会儿又是动态的过程。不过,即使说那些所谓的专家从未能够达成某种共识,倒是很可以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尽管如此,长久以来,社会理论家也一直不得不在至少一个方面求助于人类学;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依赖人类学为自己提供至少一个自己切实需要的概念的实证内涵和分析参数。不管是以含蓄的方式还是公开的方式,他们很早就开始求诸于——在很大程度上至今还一直在求诸于——人类学,期望人类学对于他者(the Other)的特性与范围,对于异他性(alterity)的种种变异与主题,从经验的角度给予描绘,并从理论的角度给予阐明。曾经一度,他们确实有某种理由感到满意,感到已经得到充分的帮助。不过,他们也几乎不曾满足于充当被动的接受者。相反,对于异他性,社会理论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自身的目的,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人类学表

述。有时候（故事就这样延续），社会理论家用异他性来衬托现代的东西；另有些时候，则用它作为概念的留存，以追忆那些在现代之中仍被隐藏、忽视或未被征服的东西。他们偶尔也会给出这样那样的人类学理由，表达对他或她作品的错误理解或错误利用的不满。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味强调缺乏和谐的一面，也是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在我们的后殖民主义状况下，那些老生常谈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而那些曾经各具特色的学科，相互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愈益模糊。目前，已经有不少社会理论家对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业已得出的结论表示了赞同，也都认为，异他性不再是原始与现代之间的对垒，他者本身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的东西了。

9.1 相对于现代的他者

细而观之，社会理论依然基本配得上类似于吉登斯和乔纳森·特纳 1987 年得出的那种诊断：没有任何一门单一的学科作为它的家园，在方法论上难以驾驭，在讨论主题上呈现多元化，的确是“一项极富变化的事业”（Giddens and J. Turner, 1987: 10）。不过，再略微离远些来看，还是可以分辨出一种共同的关注，一种稳定的出发点和回归点，现在来看与一个世纪以前同样明显。无论社会理论原本可以有怎样的其他关注，无论它曾经有过怎样的其他关注，反正它始终对现代性倾力关注。因此，也就根本不需要彻底舍弃那些老生常谈。不仅如此，直到最近，也没有比现代性问题域本身能够更明显地表现社会理论与人类学之间的具体差异了。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对于研究的合法权限的惯例划分，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划分。社会理论家们其实是会把“西方”作为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是当旨在确定它与其他土地、其他文明是否存在共同之处时，才会大胆越出它所宣称的界限。而人类学家则会占有“其余的世界”，即便偶尔将他们的目光转向家园，也只是为了探求异国情调的残留痕迹。

因此，也就出现了一种惯例上的思想分工。社会理论家会致力于普遍概括的工作，不仅是出于概括本身的目的，而且也始终是为了进一步发现或确定现代性以及西方世界何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而人类学家则从该宗旨的反题来阐述属于自身的普遍概括。如果说从霍布斯到卢梭的哲学家都转而报道“野蛮人”（savages），以使他们（彼此不一致的）有关自然状态的描述获得鲜活的内容；那么人类学家则游历世界，寻访“原初民”（primitives），认为后者可以作为证据，展现处在肇始阶段或最基本形式上的社会，他们在旅程中，会遇到先知，也会碰上国王；会遇到农民，也会碰上企业家。但不管怎么说，原始人自有其根本上的陌生之处，称得上根本上的他者。他们不曾受到现代性的沾染，绝对算不上现代，当人类学阐释异

他性时,只有他们才能作为地位最重要也是最悠久的主题。

在 19 世纪早期,研究人类多样性的学者们分占了两个结构松散的阵营。其中一个阵营接受圣经在编史学和谱系学上的权威地位,而另一个阵营则不予接受。尽管如此,甚至早在 1858 年发现英国布里克瑟姆洞穴 (Brixham cave) 旧石器时代遗迹,使局面不可避免地转向有利于后者之前,便已经开始了对人类学角度上原初民的汇编整理 (参见 Stocking , 1987) 。 19 世纪 70 年代见证了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Tylor , 1873 [1871]) 与摩尔根《古代社会》(Morgan , 1964 [1877]) 的出版,到 70 年代末,上述这种汇编整理已告大体完成。当然也还存在着分歧,但却是在一种愈益巩固的共识背景下显露出来的。人类被赋予“心理一致性”,被授予共同的知觉官能与思想官能,保有共同的一系列驱力与情绪反应。“文化”不再局限于哪一个精英群体,而是被重新塑造为人类的普遍项。不管是在塔斯马尼亚岛,还是在澳洲大陆,不管是在美洲还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原初民之所以引人瞩目,首先是因为他们在一系列广泛领域里的“单纯”。在经济上,他们只限于狩猎与采集。在技术上,他们只限于从木头、纤维、贝壳、毛皮、石块和骨头中打造出所使用的工具 (参见 Tylor , 1893 , 1898) 。他们的社会结构即便显示出制度上的差异,也是相当微弱的。而在精神上,可以非常容易地在少儿当中观察到与原初民类似的表现。他们很容易耽于想像;他们毫无历史感;他们尽管拥有推理的能力,但其思维的发展充其量不过处于初始状态 (参看 Müller , 1885 [1864]) 。就其本质而言,他们的心智还是混沌未开。

9.1-1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与恩格斯像他们早期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都能够在一种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主义思辨框架中,为人类学原初民的大致原型找到一席之地。马克思十分熟悉他那时最为重要的民族学文献与汇编。恩格斯则投身于更具雄心的工作,将这些素材融合到一个关于经济与政治分层形态的一般性图式之中。在那时候,他又如何能够知道,自己所依赖的素材后来证明是多么的靠不住。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Engels , 1972 [1884]) 深受巴霍芬《母权制》(Bachofen , 1861) 和麦克伦南《原始婚姻》(McLennan , 1970 [1865]) 的影响,这两部著作都展示了乱交状态下游牧部落的那种初始类型的集体组织,也都进一步展示了在“母权制”的牢固掌控之下,游牧部落如何获得了最初的纪律。尽管说诸如此类的假设曾经有过持久的吸引力,但要继续为之辩护下去,也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对于恩格斯来说,游牧部落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典型体现。

然而,在绝大多数人类学家看来,诸如此类的游牧部落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典型地体现了西方动物寓言故事集中层出不穷的关于他者的妖魔化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眼里的原初民面目需要有重新的描叙。但是,在几乎所有曾经关注这方面的人眼里,恩格斯所赋予它的地位始终还是不变的;它始终还是相对于现代的他者。在这个世纪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那些第一流的传人来说,即便对以此等面目出现的原初民有什么兴趣,也是少得可怜。在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普兰查斯、卡斯托里亚迪以及 E. P. 汤普森等人的研究当中,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相互交织的兴起趋势都在分析中骄傲地占据了显要位置,而原初民的缺失也是相当明显的。不过萨特是一个极为显著的例外。在《寻求一种方法》(Sartre, 1963[1960])中,他粗略勾勒了一种“历史的、结构的人类学”,旨在将自己有关人类自由的哲学信念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信条协调起来。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是一种特具决定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法国的情况尤其如此。针对这种局面,萨特采用了一种实践(praxis)概念,既回应了恩格斯所谓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却是在限定他们的一定环境当中创造的”的格言,又大大拓展了这句格言(Sartre, 1963[1960]: 85)。在萨特看来(即便恩格斯的看法不完全如此),实践是人类展示自我超越的能力。它是处在行动之中的一种历史思维:是对于现时的辩证否定,对于一种尚待实现的未来的适当设定或“筹划”(projection)(Sartre, 1963[1960]: 170—171)。它还是揭示人类的人类学独特性的一种过程:揭示出人类并不只是有能力重复自身,而是有能力“成为历史的”(Sartre, 1963[1960]: 167),也就是使自己成为常新的。

但是,原始人相比于和他们对应的现代人,所具有的人类学独特性丝毫不见得少些。他们也同样有能力成为历史的。然而,在萨特方法论的论述范围中,他们归根结底还是处在边缘的位置。这并非因为他们只是天真的共产主义者(naïve communist),而是因为他们身上被赋予的那些历史力量仍有待激活(参看 Sartre, 1960: 203)。在《寻求一种方法》结论部分的一则附注中,萨特有如下评论:

界定人之为人的不应该是历史性——因为有一些社会并无历史,而应该是在面对那些有时会推翻重复单调的社会的崩溃时,始终有可能以历史的方式去经历它们。这必然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后设界定;也就是说,它来源于一个历史性社会的核心,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但它又反过来运用于那些没有历史的社会,就像历史本身复归这些社会,转变了这些社会——首先是外在地转变,然后便是通过内在的东西的内化而转变。(Sartre, 1963[1960]: 167, 注1;黑体为引者所加)

这段评论的语意模棱两可。对于当时“美国微观社会学”和“新文化论”中塑造出来的关于“静滞”的原初民的特色描绘,这段评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犹疑不定的(Sartre, 1963[1960]: 67, 70)。一方面,萨特也愿意承认这些描绘自有其描述上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也对渗透在这些描绘中的观念论与“过度经验主义”大加嘲讽,认为“只有在历史相对较为短暂的国度里”,那种“过度经验主义”才容易赢得人们的信任(Sartre, 1963[1960]: 71)。我们从一些描绘者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们拒斥了辩证唯物主义。但这些描绘者却根本未能以充分的反思性态度,来审视自己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倾向。

综上所述,对于改变看待原始人的时兴观点,或许除了借助一些挑衅的言辞之外,萨特也并未有多少成就。他了解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甚至对此书多有褒词(Sartre, 1963[1960]: 74)。而对于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Sartre, 1960)——《寻求一种方法》充当了此书的引子——列维-斯特劳斯的反应却颇为不同。在《野性的思维》最后一章里(Lévi-Strauss, 1966[1962]: 245—269),他认为萨特对于历史性的本体论评价非但不能予人启蒙,反倒透着种族中心主义的味道,而后者对于编史学的方法论评价也并没有丰富马克思主义,倒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档次。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萨特的“寻求”并不曾实现智识上的突破,而是塑造出了一种“神话”:人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只能在于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即生活的意义与命运最终都属于个人选择的事情(Lévi-Strauss, 1966[1962]: 254)。他揭穿了这种神话的伪装,提请人们注意语言必然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总体化”,是人类理性的存在本身,“有它自身的法则,人类对其一无所知”(Lévi-Strauss, 1966[1962]: 252)。他主张原初民并非“前历史的”,而是具有本真的反历史性,与其说是前资本主义的,不如说是反资本主义的(Lévi-Strauss, 1966[1962]: 263—266)。

影响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前辈形貌各异,从博厄斯(Boas, 1916[1911])和雷丁(Radin, 1957[1937]),到格瑞奥勒(Griaule, 1965[1948])和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 1966[1927]),但还不仅是这些。他卓有成效地将原初民重新塑造成“具体的东西的科学家”(scientist of the concrete)(Lévi-Strauss, 1966[1962]: 1—33),自发地趋于将感官经验的特定素材置入一个自成一体的有序整体。产生原初民之宇宙论体系的那种思维类型尚未受到这样一种要求的沾染,即要求它始终具有成效,始终关注实践目的。它的处理过程充满了数字与类比,它以基本的对立与一系列比拟编织出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它的深层结构便是语言结构,便是意义本身的结构。原初民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原初民让富于洞察力的分析家得以知道,意义与历史(historicity)彼此为敌(Lévi-Strauss, 1966[1962]:

232)。意义要求有一个限定的指称 (denotata) 域, 而历史所包含的领域在理论上则是不确定的。意义只能以片断的方式涵括线性的时间性,* 而历史则可以将时间性延展到所有可以感知的领域之外。因此, 原初民让富于洞察力的分析家进一步了解到的东西, 或许并非所谓历史是资本主义的婢女。初民社会, 即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冷”的社会, 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实践上, 都不能容留它们的对应物, 即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热”的社会, 所具有的那种进步主义、发展主义和实践乌托邦 (Lévi-Strauss, 1966[1962]: 232—233)。对于历史来说,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其现代的最高体现, 关于可以利用的开放未来的历史性即是不言自明的公理; 时间就是金钱, 而金钱就是一切。

这种“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的贡献”, 随后在理论上的命运往好里说也是变幻不定的。萨林斯努力从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来调和萨特与列维-斯特劳斯, 这样的尝试依然赢得了赞赏, 尽管萨特即便在世, 也几乎不会属于赞赏者。萨林斯保留了列维-斯特劳斯“冷”与“热”之间的区分, 并且修整了所谓意义与历史之间存在一种一般性对立的原则, 变其为一种有关语义偏移与扭曲之风险的诊断, 符号在这些偏移与扭曲面前, 只能作为参照的手段 (Sahlins, 1985: ix-x)。即使说他就此部分恢复了萨特曾经赋予事件的那种分析上的优先性, 他也彻底舍弃了萨特赋予自我筹划 (self-projection) 的那种本体论与方法论上的优先性。不仅如此, 在萨林斯自己的“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里, 辩证唯物主义让位于以下各方面之间精致程度远为逊色的相互作用 (interplay): 符号系统, 利益模式, 以及日常生活可变的事件性。而在同样的思想运动中,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中蕴含的形式主义与确定主义, 开始让位于后结构主义有关“游戏” (play) 的分析中的情境主义 (参看 Derrida, 1978[1967]: 278—294)。

9.1-2 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

至少在 19 世纪, 辩证法还独具德意志的特色。而它所隶属的历史主义传统或解释学传统也是既互为同盟, 也相互对立。研究社会与文化的第一流解释学理论家们更愿意采用牢固确立的文献, 而不采用不那么可信的田野报告, 这几乎没有什么让人奇怪的。在高等教育无一例外地要求精通希腊与罗马的往昔时代, 而“民族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出自水手与传教士之手时, 情况就尤为如此。因此, 在

* 原文在此处尚有“而历史所包含的领域在理论上则是不确定的。意义只能以片断的方式涵括线性的时间性”两句, 显系赘文, 故此删去。——译者注

尼采看来,酒神仪式就足以称之为原始的仪式(Nietzsche, 1954[1871])。对于狄尔泰(Dilthey, 1961[1926])、滕尼斯(Tönnies, 1957[1887])、齐美尔(Simmel, 1971[1908]: 251—293)以及韦伯(例如Weber, 1946a[1915]; 1946b[1922])等人,荷马、早期罗马人以及“俗民”(folk)也就足够原始了。而在德国之外,帕累托(Pareto, 1935[1916])也表现出类似的偏好,宁愿追溯古代而不是做民族志描述。

进化论,或多线进化论,尽管在从非人的领域转换到属人的领域中时,可能依然会招致宗教方面的抗拒,但进化的论调在理论的氛围中却是广为传散的。回头看来,19世纪50年代隐然是进化论者至关重要的十年。布里克瑟姆洞穴的发现使得原始人开始享有“深层时间”(deep time)。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1862年,斯宾塞出版了他的《第一原理》,在这部意旨宏远的论著里他主张,从“不致密的”、同质性的到“致密的”、复杂的,是一种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转化,而社会进化只不过是这种转化的一种模态(Spencer, 1898[1862]: 370—373)。正如科塞所注意到的那样,斯宾塞的进化论尽管常被指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与拉马克生物学学说之间的共同点,却不逊于与达尔文生物学学说之间的共同点(Coser, 1971: 104)。斯宾塞的学说既是一种进步主义的理论,也是一种生态主义的学说。不过,二战之前的其他英国社会理论当中,大多数的情况也是这样。事实上,整个英语世界中的情况都大抵如此。在这些理论中,原初民始终符合“simple”这个词各方面的意涵。*

即便斯宾塞离决定论或单线论(unilinealism)只有一步之遥,他也时常偏向具有强烈自然主义色彩的模式与类比。比如说,同质性的有机体处于一种本质上就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只要它的内部构成还处在流变之中,只要它的内在要素大致还能相互交换,它就会把自己的生命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看到,在最简单的有机个体里,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真理。一只低等根足虫,其所包含的实质极具流动性,几近于液体,也几乎始终是同质性的,因为每一个部分都不时地与其他部分、与环境产生新的关联。对于最简单的社会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库克船长在谈及火地岛上那些未定居小群体的成员时说到,“谁都不比谁更受到敬重。”……维达人**、安达曼人、澳洲人、塔斯

* 此词在英语中的意涵丰富,在当时社会理论中指称原初民时,主要有结构简单、生活简朴、头脑单纯乃至幼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等意涵。——译者注

** 维达人(the Veddans):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土著民族。——译者注

马尼亚人,也都可以作为松散组合的例证,各个社会位置之间没有呈现出任何持续性的不同。或者,即便有一些旅行家宣称存在不同,也是非常含糊,其他人可不会承认。(Spencer, 1969[1877—1896]: 84)

斯宾塞的素材或许值得怀疑,他的民族志评判或许十分粗陋,但是,他对“根足虫”式原初民的生动比拟,却揭启了一种显赫的功能主义传统。

在一段如今看来显然不具有代表性的断言中,年轻的涂尔干曾经发现,应该建议“社会学家”将“那些信仰、习俗和律法已经体现在真实可信的书面文献中的社会,作为自己研究入门的基本材料”(Durkheim, 1938[1895]: 133—134)。但他的头一部专著,即《社会分工论》(Durkheim, 1947[1893]),却深入详尽地探讨了民族志报告,其中有许多正是斯宾塞本人所参考的。《社会分工论》尽管具有反斯宾塞学说的立意,但却没做什么努力,来修正斯宾塞本人所塑造的那种原始人模式。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社会”只是由类似之物之间的吸引力维系在一起的,在这种社会模式中,根足虫式的特征仍有大部分保留了下来。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20年间,涂尔干对无文字原初民的研究兴趣不减反增。可以肯定地说,他最后一部论著,即《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Durkheim, 1965[1912]),多多受惠于《澳洲中部的土著部落》(B. Spencer and Gillen, 1899)。即便在此书当中,原初民依然以“简单性”为其标志,通过一个功能上未有分化的集合体当中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本质。

因此,至少就这一点而言,《社会分工论》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两部著作如出一辙,共同归入了功能主义的典范。不过,学者们还是正确地继续争论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乃至相互契合之处。尽管如此,这两部著作都很适于进化论者的解释,因为无论现代本身可能是多么含混,这些解释还是维持了原始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区分。涂尔干系统地阐述了机械性的社会团结基础是如何被其更为“有机”的对应基础所置换,单纯的同伴感是如何被功能互赖所置换。这种系统阐述要比梅因爵士更早些时候所提出的从“地位”转变为“契约”的学说(Maine, 1873[1861])涵括面更广,也比斯宾塞提出的另一种学说更具社会学特色,并且成为帕森斯分化理论的基石之一。至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对这种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毫不逊色,只是其意涵不那么固定而已。不管怎么说,帕森斯后来的思想明显受惠于他的学生之一贝拉。贝拉沿袭了帕森斯自己关于社会组织的进化类型学,成功地探索出关于文化范畴与社会范畴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说法,比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能找到的要精致得多(Parsons, 1937; 参看 Bellah, 1959)。尤其是因为贝拉最初的学位得自人类学,所以他的探讨之中不同

寻常地充满了大量民族志的细节。在他的讨论当中,原初民已经全然褪去了维多利亚时代讨论中所认为的那些简单幼稚的痕迹。不过,尽管他们令人惊奇地表现出种种人们熟知的“此世性”(Bellah, 1972[1964]: 36),但他们依然是相对于现代的他者,其程度与涂尔干本人会看待他们的一样。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帕森斯自己。他眼里标准意义上的初民社会,普遍渗透着“宗教的(以及巫魔的)世界取向”(Parsons, 1977: 28)。从组织的角度上来说,它是由亲属关系所支配的(Parsons, 1977: 29)。至于它在进化序列上的地位,则只能从反面来界定:“在社会、文化、人格的层面上,它都是**未经分化的**”(Parsons, 1977: 28; 黑体系原文所有)。

帕森斯的学说大势已去;取而代之的是种种“新功能主义”、“结构化理论”和“系统理论”,它们建立的控制论体系更为精致完善,但也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就新功能主义者而言,他们对帕森斯有关未经分化的初民状态的概括,所做的修订或替换可谓微乎其微。至于吉登斯,必须说情况也是大抵如此,尽管他坚持认为,不能将自己关于“部落社会”(或“口传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分,化约为进化论者所谓的那种区分,即“系统整合‘尚未’摆脱*社会整合的那些社会”与业已发生此类分离的社会之间的区分(Giddens, 1984: 182; 参看 Giddens, 1981)。系统理论家已经多少有些倾向于重新探讨一个比这牵扯范围更广的问题,即异他性问题,其原因部分在于,帕森斯自己在理论上就险些将分化概括为一种实际发生的过程。比如说,卢曼就一贯不认为,从差异的角度入手来界定进化的最初实例会有什么说服力,因为最初的实例中根本就缺乏差异:“进化理论是从**差异**入手而非从**一体性**入手的理论”(Luhmann, 1990: 428)。他进一步反驳了帕森斯的假设,即所谓无论什么类型或阶段的社会,其整合都归功于规范共识。卢曼转而假定,每一种社会类型都已经表达出或体现出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整合问题的途径(Luhmann, 1990: 423)。当然,有些解决途径是要比其他途径更有效些。因此,“环节社会”(segmentary societies),以及它们时常融入自身的家族、氏族和部落之类“包容性层级”(inclusive hierarchies),可能是在控制论角度上来说最为“自然”的系统形态类型,也是“最初”产生的类型(Luhmann, 1990: 428)。不过,它们还是包含了一种“不平衡的潜在可能”,或者说就是分层,对此它们必须耗费相当大的能量去压服。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但有时也会失败。与此相反,“功能上业经分化”的社会,也就是现代社会,却不受这些社会力比

* 此处原文为“entangled”(纠缠,卷入,未摆脱),但根据上下文意思及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原文,应为“disentangled”(摆脱,解除纠缠)。——译者注

多监督 (socio-libidinal policing) 的束缚。它们转而致力于对环境的技术控制, 致力于“否定之否定” (Luhmann, 1990: 434; 参看 Luhmann, 1998[1992]; 以及 1980: 162 — 234)。最终的结果, 就连斯宾塞也会深表赞同。

在卢曼看来, 功能业经分化的社会不允许有任何核心性的秩序安排: “只有(它的)个体功能系统层面上的功能闭合与对于环境明显的开放性之间达成融合, 才能确保社会的一体性” (Luhmann, 1990: 431 — 432)。不妨说, 它不保有任何共享的文化, 不保有任何整合一体的生活世界。在乐观情绪不那么强烈的哈贝马斯看来, 生活世界固然继续存在, 但已经与政治和经济方面指导社会政策的“制导机制”脱了钩 (Habermas, 1987[1981]: 155 — 168)。技术专家治国; 各种价值观念要么只是在草根运动中吵吵嚷嚷, 要么静悄悄地躲在私人领域里。尽管如此, 还是可能有一种批判。即使现代人已经把对功能业经分化的社会的控制权让渡给了一小群所谓“专家”的骨干, 也仍有能力要求, 哪怕是他们的专家, 也必须遵守以沟通方式寻求共识的过程中固有的行为规则。哪怕是专家也必须讲真话。他们必须在自己的权限之内说话。他们必须本着真诚的态度, 向每一个利益与自己决策有关的人说话 (参看 Habermas, 1987[1985]: 336 — 367)。

现代性的批判潜力也是它最不同凡响的优势。要达到这个结果, 在认知上经历了奥德塞式漫长而艰辛的旅程, 而这个旅程的顶点, 便是主体间性对主体性的征服, 是沟通理性对主体中心理性的征服。而此前则必须先有了其他的征服, 先征服了其他的困惑。主体经验需要与客体外在性相分离。社会范畴, 即“应然”的领域, 需要脱离自然范畴, 即“实然”的领域。意义需要与存在相分离。“现代生活世界里的成员”已经满足了这些需要 (Habermas, 1984[1981]: 48)。而“神话思维”则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事与人之间, 能够予以操纵的客体与行动者之间, 即与有能力言说与行事、我们可以赋予语言表达的主体之间, 在概念上要有一种清晰的基本区分, 这在神话中是不可能的。因此, 只有当巫魔实践未认识到目的论行动与沟通行动之间的区分, 未认识到客观给定情境中目标导向的工具性举措与人际关系的确立之间的区分时, 神话才能继续排除这种区分。 (Habermas, 1984 [1981]: 48)

弗雷泽在《金枝》(Frazer, 1907 — 1915) 的最初数卷中, 对其所谓的“原始人”也大致持有相同的见解, 只是其言辞不甚恭敬而已。哈贝马斯认为, “从涂尔干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家”, 都在反复确认并巩固神话性的“自然与文化之

间奇怪的混同”(Habermas, 1984[1981]: 48)。换汤不换药(Plus ça change)……

9.2 现代之中的他者

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比如结构与历史,冷社会与热社会,关于具体的科学与现代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的科学。尽管他这些二元对立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意味,但他从未主张,野性思维或神话思维“混同”了自然与文化。恰恰相反:

事实上,(原始)分类在各个层面上都有某种共同特征:在所考察的社会里,无论先选择哪一个层面,都必须允许有可能联系到其他的层面,甚或是必然意味着联系到其他的层面,其他这些层面与优先选择的这个层面在形式上类似,只是在整个指涉系统中的相对位置上有所不同。这个指涉系统是借助一对对比关系而发挥作用的:一个是一般与特殊的对比,另一个是自然与文化的对比。(Lévi-Strauss, 1966[1962]: 135;黑体系引者所加)

图腾社会中的工匠(bricoleur)的方法与工具也不曾从现代性中不着痕迹地彻底消失。情况又一次恰好相反。通过将自然的噪音转变为文化的声音,工匠们为我们提供了音乐(参看Lévi-Strauss, 1969[1964]: 16—18)。而通过将养料转变为食物,工匠们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地区与民族风味的烹饪的符码化味觉(Lévi-Strauss, 1965)。他们超出了美学的范围,为我们提供了“结构之岛”,继续漂浮在我们更为广泛的经验领域里那些历史的遗迹残骸之中(Lévi-Strauss, 1966[1962]: 218—219;参看Barthes, 1974[1970];Sahlins, 1976: 166—204)。

列维-斯特劳斯对现代当中的他者的揭示,也许算得上是回应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幸存残迹”(survivals)的兴趣。而如何看待这些“幸存残迹”,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它们至少应该让我们有所提防,不那么轻易重复“野蛮”与现代之间的区分,像哈贝马斯那样,从认知的角度和社会学的角度都把这种区分看得那么重大。它们还应当提请我们注意,以一种与哈贝马斯所继承的方式颇为不同的社会理论关联,去关注人类学的异他性。在20世纪的下半叶,列维-斯特劳斯是这种关联方式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但它的理论视野已经远远超出了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者的分析。它具有双重的批判效力。有时候,对残存在现代当中这样那样的人类学他者的揭示,就是在挑战矫称超越的自大;而现代人自以为已经打碎了所有部落的一切偶像,以理性取代了“迷信”,一劳永逸地将未来从未经启蒙的过去的闭塞

短视之中解放了出来,从而为之沾沾自喜,对于他们,这样的揭示也是一种秉持怀疑精神的嘲弄(参看 Leach, 1976: 32; Douglas, 1973)。还有些时候,这样的揭示又是在挑战有关超越的筹划本身,是秉持怀疑精神,同时对现代启蒙追求的合法性与实用性所提出的质询。不管是以悲剧的面目还是喜剧的面目出现,现代之中的他者总会是一种引发怀疑的形象,让人怀疑现代人并不像他们乐于相信自己已经达到的那么现代,或许永远也不会达到。

9.2-1 精神分析、交换与女性的位置

较之精神分析将人类学带向诊榻,人类学家将精神分析带向田野的时候更多。在这两门学科之间,相互激发的热忱与对抗不相上下。尽管如此,当弗洛伊德从自己病人个体生活中种种错综难解之处,转向有关心理性欲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更宽泛的追问时,他自己就对当时泰勒、弗雷泽及其他许多人类学家的作品发生了兴趣,一方面从中有所借取,一方面也在理论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弗洛伊德在一系列最后结集为《图腾与禁忌》(Freud, 1950[1913])的文章中,还是以原初民与儿童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的常见类比为起点,但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赋予了这种类比新的意涵。弗洛伊德笔下的原初个人,粗朴无文,宛如赤子,身上全无那种压抑机制。初民社会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酷似于孩童。它就此为这位理论家提供了一扇更透明的窗户,可以从中看到那些原初的驱力与压抑,文明由此而诞生。而现代西方所能提供给他的窗户可不如这扇来得敞亮,因为它笼罩着千年文明进程积累下来的尘土。

弗洛伊德依然可以信任经过达尔文与弗雷泽过滤的巴霍芬与麦克伦南的权威,依然可以自信地仿效他们,将社会进化的进化萌芽说成是未曾社会化的游牧部落(Freud, 1950[1913]: 125—126)。但不管怎么说,他并未效仿他们,将缺乏社会化等同于性方面的乱交。他所描述的种系发育(phylogeny)过程更为阴郁。弗洛伊德笔下的游牧部落是一种专制统治,由一位严苛的长者来支配,这位作为原型的第一男性拒绝与自己族内地位较低的男性成员共享女性族裔。这里就产生了俄狄浦斯情境,其中的冲突尚未被局限于在幻想中自行解决。且按弗洛伊德的设想,在一幕弑父的原初场景(Primal Scene)中,迎来了它谋杀的高潮,充满渴欲的谋杀者无法承受面对自己最终所施罪行的压力(Freud, 1950[1913]: 141—143)。压抑成了他们集体性的疗救之道,而文明则以其绵绵不绝的压力,作为一种原初的移置与拒斥而兴起。被弑的长者作为神圣化了的图腾祖先而重获新生,其令人敬畏、不可侵犯的身体将成为每一位随后产生的神祇的模板(Freud, 1950[1913]: 124—

139, 146—151; 参看 Freud, 1957[1939])。谋杀本身激发了最基本、最普遍的人类律法的制度化,即“父亲之‘不’”^{*},也就是乱伦禁忌 (Freud, 1950[1913]: 150)。

现在的人们把《图腾与禁忌》当成一则有些耸人听闻的假设起源故事来读,至少在大多数人类学家看来是这样。尽管如此,它也算得上是对人类学的一个核心难题做出了回答:在如此庞杂的社会文化样式当中,在如此明显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如此明显的社会文化发展当中,却有一两位部落偶像普遍存在于各个文明当中。尽管有各门科学的兴起,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甚至连现代西方也不曾彻底摆脱自身宗教性的过去。甚至连现代西方也不曾废弃乱伦的禁忌。弗洛伊德耗费了自己后期的大部分理论生涯,就为了搞清楚,西方是不是能够或者说是不是应该废弃宗教性过去或是乱伦禁忌 (Freud, 1989[1929]; 1975[1927])。至于他的学生,可不总是像他那样表现得态度暧昧。荣格力主那些“集体原型”(collective archetypes)所具有的生存价值与治疗价值。他认为那些“集体原型”是精神想像的普遍基石 (Jung, 1966[1915]: 90—113)。而赖希则主张抛弃性方面的禁忌,将此作为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样的革命不仅将要推翻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推翻恩格斯本人曾经认为是所有阶级等级秩序中的那种首要秩序,也就是两性之间的分工 (Reich, 1972)。在早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中,颇有一批受了他的激发而成了他的追随者。

大约 30 年之后,人们开始要求人类学家自己来考虑一种方案,以解答关于图腾崇拜与乱伦禁忌的难题,并且足以抗衡弗洛伊德自己的解答,至少作为一种匠心巧思而与之相媲美。这种解答也具有心理学的性质,但同时坚定地表明了反精神分析的立场。涂尔干的侄子莫斯在其《礼物》中 (Mauss, 1967[1925]),以不事声张但却至关重要的方式,推动了有关现代之中的他者的理论概括,而上述这种解答将有赖于这一贡献,并且也拓展了这一贡献。莫斯逐一评点了来自美拉尼西亚到美国西北海岸的民族志记载,精确地指出了初民团结的支点,与涂尔干本人所想的大有不同。既不是类似之物之间的机械吸引,甚至也不是某种神圣帷幕的集体庇护,让莫斯觉得非常关键,足以与原初民对礼物交换的那种无所不在、全心倾注的热情相比。同样一件事情,一个浪漫主义者或许会看作是发乎仁慈本性的友善之举,而莫斯则看到了一种三角规范关系的压力:赠与的义务,接受的义务,以及给予某种回报、回礼或再次赠与的义务。原初民的道德是交互性的道德,原初民的团

* “father's no”,也是“父亲之‘无’”,参见第五、六章有关拉康学说中父亲之法的介绍。——译者注

■ 结是相互受惠的团结。一种如此社会化的经济体系,无疑与现代市场纯粹的功利主义格格不入。不管怎么说,即便在最为自由的现代市场社会里,这种经济体系也不曾完全瓦解。它作为一种边缘化的“节庆”习俗维持了下来,但莫斯希望它可以重新成为诸如社会保险之类现代制度的核心 (Mauss, 1967[1925]: 65)。

但莫斯没有看到,或者不管怎么说,他没有明确指出,在互惠交换的规范结构之下潜藏的逻辑,实际上与最为古老的亲属关系系统的规范结构之下潜藏的逻辑完全一致。他更未能看到,或者至少说是未能明确指出,在那些亲属关系系统以及其他所有亲属关系系统当中的乱伦禁忌所发挥的逻辑功能,完全类似于神话里关于世界的深入思考当中,关于图腾和其社会对应物之间差异的表达所发挥的功能。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尽管各有其具体方式,但所发挥的作用也恰恰在于导致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分,以及与这种区分相伴而生的社会秩序 (参见 Girard, 1977[1972])。

当然,我们必须回到列维-斯特劳斯,是他第一个指责莫斯犯下了诸如此类的疏忽 (Lévi-Strauss, 1987[1966])。在出版后的半个世纪里,《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招来了不少人类学方面的异议,但所赢得的读者面却也是相当广泛。它主张,必须首先将亲属关系理解成 (从而也就是理解亲属关系的“基本”形式) 群体之间联姻的交互神圣化的系统。这一主张业已战胜了早先授予世系传承的那种理论上的优先地位。来自古埃及的证据表明,乱伦禁忌或许并不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设想的那样,完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禁忌 (Leach, 1970: 113—115; 不过也可参看 Lévi-Strauss, 1969[1949]: 9)。不过,他对禁忌的探讨方式依然值得认真考虑。他将禁忌处理为莫斯的赠与义务的逻辑等价物,是一种普遍的“不”,甚至在许多未能贯彻完整的交互联姻规范循环的亲属关系结构 (从而也是“复杂”的亲属关系结构) 当中,它也始终充当了第一原则。即便这样的处理方式欠妥,倒也指出了亲属关系的一种所谓“政治经济学”,历经种种的结构变更,基本的也好,复杂的也好,其根本的不对称却似乎没有什么改变。无论在什么地方,男性都是姻亲关系的执行者,哪怕这并非出于逻辑,而只是一种事实。女性只是此种关系的媒介。男性赠与妻子,接受妻子,又从妻子那里获得回报。而女性只是男性们交易的客体对象 (Mauss, 1969[1949]: 144—145)。

列维-斯特劳斯为了削弱亲属关系系统中男性至上的不对称而煞费苦心,即便他对此着墨不多,却也是他特定的关注焦点,只是收效甚微 (Lévi-Strauss, 1969[1949]: 280—281)。不管说《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的作者个人的感受力如何,这部著作已经为一种关于亲属关系的政治经济批判提供了理论动力,在这股批判的浪潮中,偏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们长久以来一直冲在最前列。

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将原有的理论动力予以翻新:早在19世纪,人类学就已经开始认真地评价女性的位置,到了20世纪初,业已赢得了广泛的听众。这些评价通常的标志性概念,常常也是不确切的概念,就是“父权制”。科沃德已经指出,这些评价所提出来的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在主导着女性主义的思想(参看Coward, 1983;亦可参见Lovell, 1996)。男性天生就占支配地位吗?父权制是否存在具有人类学显著意义的变异?甚至在那些“启蒙”程度最高的社会里,女性是不是也注定居于臣属地位?1949年,也就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出版的同年,波芙娃根据自己屡试不爽的有关初民状况的猜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女性在人的源起之时,已然发现她自己是“第二”性,被动地履行她那具有生殖能力的身体强加于她的那些“天生的功能”。在波芙娃看来,即便生物学特征并不完全属于命中注定,女性的身体本身就会助长几近普遍性地趋向于在社会学角度上次要的、衍生性的角色,而女性也始终发现自己被迫接受这样的角色,哪怕在最为发达的文明当中也是如此(de Beauvoir, 1972[1949]: 93—95)。即使说波芙娃的论著依然流行,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比较起来,她的作品还是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处于不利局面。首先,它的人类学猜想与所有可资利用的证据均不符合。而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东西,随后的研究却只是搞得更清楚些:或许尤其是在“初民”社会当中,女性不仅仅是再生生产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其经济贡献对于日常维存所起的作用一般而言远比男性重要(Lévi-Strauss, 1969[1949]: 38—41)。其次,它的体验性或“存在性”偏向只能指向含糊不清的焦点,而列维—斯特劳斯所捕捉到的就更明确一些:女性的臣属地位的符号性至少与其物质性不相上下。

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内在的男性至上主义的那些“本质论者”和“原初论者”,大多数能够将波芙娃搬将出来作为前例,以断言女性“的确”不同于男性。在这个传统里,你可以注意到形形色色的学者,比如吉利根(Gilligan, 1982)、乔多萝(Chodorow, 1978)、里什(Rich, 1977)以及米切尔(Mitchell, 1974)。尽管如此,在过去20年里,尤其是从福柯《性史》第一卷(Foucault, 1978[1976])出版以来,“建构主义者”就已经在理论上占了上风。最为激进的建构主义者会主张,不仅从生理性别角度上编排的角色与地位(也就是社会性别的基本素材)不是自然给定的,就连生理性别本身也不是自然给定的,无论何时何地,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其实都受到社会与文化的具体塑造。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并不总是她们求助的那位老祖宗的话,那是因为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本身当中,就还残留着某种自然主义。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

女性是一种自然的刺激物,是惟一能够延缓满足的刺激物,从而也只有这

种刺激物,能够在交换行为当中,通过对于交互性的自觉意识,转变为符号,并且通过这一根本的过程,确定了从自然向文化的转型,具备了某种制度的特性。(Lévi-Strauss, 1969[1949]: 62—63)

不仅如此,“兄妹父女之情”的纽带,即兄弟与其姐妹、父亲和他们的女儿之间的纽带,正是乱伦禁忌必须予以压服的自然事实(Lévi-Strauss, 1969[1949]: 42)。但是,在一篇富有创意的文章里,鲁宾第一次指出,诸如此类的假设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掩盖了一种甚至更为根本的文化干预,一种甚至更为根本的禁忌,“女人交易”之所以具有人类学上的普遍性,原因就在于这种禁忌:对于同性恋的禁忌(Rubin, 1975;也可参见 Pateman, 1988)。

按下联姻理论不表。再来看对于业已社会性别化的性本性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在人类学中的先驱是道格拉斯(Douglas, 1966)和鲁宾自己,其立场也比列维-斯特劳斯明确一些。社会性别已经无可争议地与阶级和种族比肩而立,成为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方面最不可回避的指标,有些学者可能认为是普遍的指标(Ortner and Whitehead, 1981;参看 Mitchell, 1974; Irigaray, 1985[1974]; Stoler, 1995),也有些学者可能认为不那么普遍(Strathern, 1988, 1980)。较之鲁宾似乎持有的想法,对于同性恋习俗的禁止本身在人类学的角度上就表现得更富于变异而不那么具有普遍性。福柯对古代希腊的恋童风的考察(Foucault, 1985[1984])就已经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有一些民族志方面的佐证,其中至少有一些已经进入了女性主义研究和男女同性恋研究固定提取的证据库(比如可以参见 Greenberg, 1988; Herdt, 1994)。不管怎么说,福柯对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这种区分的“去自然化”处理(Foucault, 1978[1976]),在建构主义的范围内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积极响应,不管是不是属于人类学的范围。无论如何,当前关于社会性别化的性本性的民族志研究,都以男女同性恋研究中晚近出现的一种坚定的建构主义支脉为自己最亲密的理论伙伴,这股支脉就是酷儿理论,倡导最力的学者中就有巴特勒(Butler, 1990, 1993, 1997)和沃纳(Warner, 1993)。尽管如此,目前在酷儿理论内部还甚少人类学研究,因为在现代当中最明显的他者,正是或许就在你近邻的那个“偏常者”。

9.2-2 长时段的结构再生产

布迪厄和贝拉一样,也是以一位人类学家的身份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同样和贝拉一样,他之所以诉诸民族志记载,尤其是诉诸自己所编纂的那部分民族志记

载,不单是因为栩栩如生的描绘或求得确凿的依据,而是为了理论上的“原初”。与贝拉不同的是,他所提出的人类学异他(alter)并不是作为相对于现代的他者(other),而是作为现代的经过掩饰的缩微模型,这个侏儒以推动各个前资本主义体制杠杆的同等精力,继续推动着现代阶级体系的杠杆。布迪厄的特色用语大部分带着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但他的社会理论赋予权力(或“支配”)的地位,在逻辑上要先于由经济角度确定的阶级,从这一点上说是更近于韦伯的理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说新韦伯主义的标志是这样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即社会范畴与文化范畴无论何时何地都自有其独特的结构特征和动力机制,就像阿切特等人会认为的那样(Archer, 1988),那么布迪厄就几乎不能算作一位新韦伯主义者。他的结构再生产理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相互转换的理论,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虚无主义理论,抹除了社会范畴和文化范畴中几乎所有最为崇高的救赎,而在相当程度上将冲突纳入了社会文化再生产本身的机制中。对于布迪厄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原始的田园牧歌。他的民族志经历所教给他的东西,以及他希望这种经验教给我们的东西,就是所有社会文化事实中首要的一桩便是支配,而在现代性中,支配未曾彻底停止作恶,倒是在结构和功能上越来越具有巴罗克式复杂新奇的诡秘风格。

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来说,布迪厄并不像他对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错误的大力批判所意味的那么具有革命性(Bourdieu, 1977[1972], 第一章; 1990[1980]: 30—51)。他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思路所提出的批评是严厉的,但是,他认为民族志研究者必须首先关注人们实际之所为而非他们承认的规则,这样的主张不过是回应了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原始社会》(Malinowski, 1922: 1—27)里业已确立的原则。当然,马林诺夫斯基追求的是一种“本地人观点”的人类学,而布迪厄则站在执拗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立场上,始终怀疑以本地人的观点来解释自我、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在分析上是否充分。布迪厄眼里的本地人从定义上来讲就有着既得的利益,而他们所展现的全面的利益却无法完全面对,无法完全得到承认,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误识”为规范与价值观念(Bourdieu, 1977[1972]: 19, 66—67; 1990[1980]: 比如第68页)。处在无涉的位置上,置身局外,只有民族志研究者能够看出,本地人的所作所为始终比他们自身可能知道的要“意味得更多”(Bourdieu, 1977[1972]: 79)。因此,民族志研究者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分析上之所以享有优越地位,最大的原因莫过于那种将其与本地人作为本地人而无法摆脱的那些实践当中的必需和出于必需的实践分离开来的距离(Bourdieu, 1977[1972]: 1—2; 1990[1980]: 33—34)。不过也应该添上一句,之所以享有这种优越地位,也无非就是这个原因了。布迪厄眼里的

“反思”人类学据守着两种界限,而这两种界限在英美的反思人类学同道那里,即便不说是被彻底抛弃,也往往更显得可以相互渗透。第一种是科学的观察者与被观察的主体之间的界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称得上人类学性质的知识与仅仅是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界限 (Rabinow, 1977; Geertz, 1983; Herzfeld, 1987; Marcus, 1997a, 1998; Strathern, 1992)。第二种是一种游戏或结构形态与另一种游戏或结构形态之间的界限 (Friedman, 1992; Marcus, 1995, 1997b; Appadurai, 1996)。甚至在他关于法国的研究当中,布迪厄都似乎满足于一种显然是自我封闭式的社会文化绘图法,满足于这种绘图法所铭刻的“内生”与“外生”之间公开的对立。塞尔托指出,尽管表面上有种种相反的表现,但布迪厄所得到的却是“一种最具传统主义色彩的民族志” (de Certeau, 1984[1974]: 56)。不管怎么说,诸如此类的民族志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很难根据跨文化和跨民族的研究而作出调整的。

不过,话说回来,从理论的角度上来说,对于以下这种现象,布迪厄的作用还是消解多过维持。这种现象就是,不管人类学中的他者是相对于现代的他者还是现代之中的他者,始终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上居于“别处”的地方而获得其最完善的实现的。人类学把这样的他者给偶像化了。而布迪厄眼里的他者则只“简单地”体现在一个方面:无论是作为一个行动者还是作为一个社会,他者惟一有效的剩余资本就是符号资本,它缺乏足够的资源,去通过物质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生产和再生产出支配。只有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味来衡量,布迪厄式的他者才是“无阶级”甚或“前资本主义”的。符号资本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支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甚至在缺乏任何物质补给的情况下也能做到:“体面”支配了“不体面”,“优雅”支配了“笨拙”,“美丽”支配了“难看”,男人支配了女人,男性特质支配了女性特质 (Bourdieu, 1977[1972], 1984[1979], 1990[1980], 1998)。不仅如此,在布迪厄看来,西方与其他地方完全一样,“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仿佛是”行动者被持续不懈地激励着去使自己的资本持有量最大化,而完全不必看这些行动者随处会辩称的那些没完没了、五花八门的道德理性化说辞。布迪厄式的他者在现代之中,就仿佛正教的圣者在其各个圣像折射之中,在或粗简素朴或极尽奢华的衣裳虚饰之下,内里却无非都是一躯裸身。

* 这是目前“local knowledge”的通行中译,但如果不限于最初的民族志调查强调本地人特定知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背景,译为“局部性知识”似乎更能全面地传递它的适用蕴味。——译者注

9.3 他者的现代*

人类学的传统立场是支持将他者“视为一个单独的进化物种”，将他者归为这样一种生物，具备本体论角度上独具特色的属征，或者是多种此类属征的汇集，而这些属征有否定性的也有简单的，有完全异国情调的，也有部分为人熟知的。而综上所述，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几乎是抛弃了这种传统立场。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来讲，他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可以说更近于一种唯名论，拒绝以任何单一的名目来统摄异他性的多元显现，而是将每一种显现都作为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可谓独一无二的偶然事件，处在具有历史偶变性的种种力线和趋向所组成的整体局势之中。在这一点上，“非现代的”显现丝毫不逊色于“现代的”显现。尽管如此，布迪厄方案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虽说也透出冷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却使它最终还是走上了那条为更多人所践履的道路上。

在福柯的晚期思想里显露出方法论上的唯名论，给人不少启发。这种观念统辖下的考察，将不把主体——他者或自我——的构成作为一种理论上不容置喙之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而是始终列为经验研究的对象（Foucault, 1997a [1979]: 73—74; 1997b [1984]: 200）。实际上，唯名论的方案选择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它在社会理论领域里的复兴，与其说它是反人本主义的，不如说它坚持不懈地立足于经验。而在倡导这股复兴潮流的学者当中，其实几乎没有一个人倾向于像福柯本人那么具有颠覆性地思考。但是，可以肯定，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趋于衰败、解放学说盛行、合法性危机日重、反抗此起彼伏的时代。战后资本主义与列宁主义两方面的进步主义宏大设计都广受抨击。在法国，福柯、利奥塔以及其他一伙以唯名论为立场的“后结构主义”先锋，都在逐步地舍弃他们与老左派之间最后的纽带。而在美国，年轻一代“激进”（以及不那么激进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在逐步舍弃或至少是重新考虑他们与帕森斯之间的关联。格尔兹最初是不事声张地从自己接受训练的那种帕森斯理论方案中的功能主义与进化主义，转向文化解释的情境论和单元论（*singularism*）（Geertz, 1983）。而在他之前，本迪克斯也策动了一场波及甚广的战役，以拯救被帕森斯放逐的偶变性和历史特殊性（Bendix, 1967, 1971; 参看 Alexander, 1987）。格尔兹和本迪克斯都认为，韦伯给帕森斯造成了莫大的困扰，帕森斯对他的压制多过读解。在社会理论家的经典三巨头当中，所捍卫的主张颇为类似方法论上的唯

* 原文为“other moderns”，比较温和的译法是“其他的现代”，但为了与本章其他标题取得对比效果，我将本小节内容的意旨给进一步“激进化”了。——译者注

名论的,既不是涂尔干,也不是马克思,而只有韦伯。

与韦伯的复兴相伴而来的,是某种模糊,或许这主要不在于各种体裁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而更多地在于人们提出“他者的他者”的口号时,可能会沦入的那种矫揉造作。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人类学当中,初民状态依然还有它的支持者。但当代也有一大帮诅咒者,希望看到初民状态与其余一大堆东方恶魔一道被革出教门。在他们看来,“传统”中的幻觉成分几乎与初民状态中的幻觉成分不相上下,至少只要人们依然将“传统”理解为铁板一块的反题,与同样铁板一块的现代性互为对立,情况就不会改变。而这两方面实质上的多元化,将会构成一种显然带有唯名论色彩的切入方式。任何追寻传统中的普遍构成成分的努力,都将被迫接受各种传统根深蒂固的实质上的多样性。而任何追寻现代性中的普遍构成成分的努力,也都将被迫接受多种“现代性”(modernities)根深蒂固的实质上的多重性。本迪克斯所开创的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切入方式,虽说他并未充分地发挥个中的唯名论结论(Bendix, 1967)。艾森斯塔德及其学生们也已经作出了类似的转向(Eisenstadt, 1987)。

1988年,以乔治·马库斯为主编,《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出版了一期专辑,为一种唯名论的考察类型提供了标尺,自那以后,这种考察类型已经从人类学本身拓展到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即美国的文化研究(参见Gaonkar, 1999)。一方面,它突出了学科中的“好斗分子”在诉求一种“研究帝国主义的人类学”时的主张:西方本身应当与其他任何地方在同等程度上成为民族志的关注目标(Caulfield, 1972; Scholte, 1972)。另一方面,传统上与“臣属者”(the subaltern)打成一片的民族志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会满足于对一些场所和主体置之不理,而这种新的考察类型则开启了一扇大门,使人们能够到这些场所和主体中间进行田野调查,从百货商场(Silverman, 1986)和电脑空间(Escobar, 1993),到物理学家(Traweek, 1988)、企业经理和生物遗传学家(Rabinow, 1997; 参见Nader, 1972; Latour and Woolgar, 1979; Marcus, 1983)。专辑的开篇便是拉比诺的“作为唯名论的人类学”(Rabinow, 1988),接下来便是我本人的“多种可能的现代性”(Faubion, 1988)——请恕我有些不顾脸面地高抬自己。它还收入了其他几位拉比诺学生的作品(Caldeira, 1988; Escobar, 1988; Fuller, 1988; Horn, 1988; Urla, 1988; Yang, 1988),并且预告了几部著作,后来陆续在90年代初期出版(Faubion, 1988; Horn, 1994; Yang, 1994; Escobar, 1995; 参见Rabinow, 1989, 1997)。再往后,康马罗夫夫妇进一步推动多维研究,用于考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重现代性(Comaroff, 1993; 参见Hutchinson, 1996)。他们所加入的,是一批数量日益增多的从事类似研究的民族志研究者,研究的区域从

韩国 (Kendall, 1996) 到法国 (Born, 1995) 和希腊 (Herzfeld, 1991, 1997), 从日本 (Ivy, 1995) 到美国 (Martin, 1994)。

有关“世界体系”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在“世界体系”范围内开展的民族志研究,也以大致相当的势头大量出现。至于此类研究的源泉,可以再一次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殖民帝国崩溃中找到。即便说唯名论者已是自成一家,也依然对马克思的精神保持着更多的忠诚,其公开的纲领与其说源自本迪克斯,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于沃勒斯坦,重振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以及与美国文化研究相对应的英国同道中在过去与现在的领军人物们,比如雷蒙·威廉斯、费瑟斯通、拉什和厄里(见 Williams, 1977; Featherstone, 1990; Lash and Urry, 1987; 也可参看 Lash and Friedman, 1992)。与之密切相关的主题还包括流亡、移民与混血儿(例如 Gilroy, 1993; Nacify, 1993; Ong, 1993; Basch, Schiller, and Blanc, 1994); 接受与消费 (Miller, 1994, 1995; Douglas and Isherwood, 1996); 全球化与地方化 (Friedman, 1992, 1994; Miller, 1995; Gupta and Ferguson, 1997a, b)。它的典型术语有“流”(flows)和“景观”(scapes) (Appadurai, 1990)、“国际”(Lee, 1995)和“跨国”(Hannerz, 1996)、“多元主义”与“后多元主义”(Strathern, 1992)。对于正在兴起的诸多民族志潮流,我们当中把握得最敏锐的学者要算是马库斯,他将唯名论人类学的方法论称之为“多场所的”(multi-sited) (Marcus, 1998: 79—104)。而它的研究程序也属于一种人为的“追随”或追踪。的确,学者们已经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如果想达到最佳效果(例如 Myers, 1992; Steiner, 1994),它所指向的主题,即“流通中的”社会和文化领域里的东西,却将肯定要求未来的研究者(乃至理论家!)投入最为坚毅的关注。

尽管如此,在几乎所有这些掺杂着多种成分的事业——可以互为替换地称之为社会理论性的民族志或民族志式的社会理论——当中,有关传统与现代性——或者更准确地称为多种传统与多种现代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与其说是得到了解决,不如说更多地是被暂且搁置了。如果缺乏实质性的概括,那么,哪一种理念型的概括或探索性的概括,可以最好地把握多种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那些差异,在分析上显得最有说服力,哪怕不能声称在分析上最为根本,这就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这种概括不是反题,那么又是什么? 有一种答案可能是:诸如此类的差异只是一种分析上的(或意识形态上的)幻觉,因此,有关多种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问题纯属分析上转移视线的眼障。这种回答绝不能太当真(参看 Argyrou, 1996),但似乎给人的挫败多过锐利的见解。大体而言,(处在人类学之外的)社会理论家尽量不将人类学上的唯名论者列入自己的阅读书单,但即便是那些抗拒唯名论转

向的学者,也不得不应对这种转向在自己同事中激起的骚动。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在内里的理解还是外在的表述上,都还处在萌芽状态。不过,对于当代社会理论景观的一种“鸟瞰”^{*}会表明,它以某种方式坚持了“反思性”(比如 Blumenberg, 1983[1966]; Benhabib, 1986; Bauman, 1987; Luhmann, 1990; 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 Foucault, 1997c[1984]),而这种特性,是某种角度衡量下的传统所缺乏,也是某种角度衡量下的现代性所拥有甚或夸大的。或许用一种尝试性的类比来说这一点更好些:仿佛传统便是关于自我、社会、世界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目标语言;仿佛现代性便是用来描述传统的元语言。又或者可以说:如果说是传统构成了实在(或者,如果这么说的相对主义色彩太强,那么至少可以说是构成了符号秩序),那么现代性就是有关传统对实在(或符号秩序)的构成过程所做的反思。

在这些固定的说辞映照之下,异他性从何而来,又去往何方?无论如何,异他性已经不再能够寓于一个“主体”之中,不管这主体是个性的还是社会文化性的。它也不再能够寓于一个兼有地理意义和地名称谓的“场所”之中。相反,它必然寓于关系之中。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它必然寓于某种特定的传统与特定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之中(不管这两者是否相互关联)。而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层面:在其中一个层面上,它在于某种传统与另一种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另一个层面上,它在于某种现代性与另一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初看起来,对于社会理论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程序的修正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要求。归根结底,社会理论和人类学都至少是含蓄地诉求某种关系性的知识。社会理论家始终会至少以含蓄的方式想当然地认为,必须针对非现代的背景,来理解和评价他们关于现代性的诊断。人类学家也始终会至少以含蓄的方式想当然地认为,必须针对现代性的背景,来理解和评价他们关于原初民或传统的诊断,而他们自己那些反思性、元语言性的话语之所以能够存在,也须归之于现代性的背景。以上所言诚然如此,但再看一看,就会发现,诸如此类的关系性知识,即某种被关系者(*relatum*)通过与另一种被关系者之间由直觉或科学的方式业已了解到的差异而体现出来的知识,远比另一种知识来得自以为是,在认知上的自许也要夸张得多。这后一种知识,其最初的源泉,也是主要的源泉,则在于以下几方面相互之间对于是否存在差异而产生的疑虑:评论家与其素材提供者之间;评论家彼此之间;素材提供者彼此之间;以及产生诸如此类差异与类似的因素,与维持或未能维持所有或

* 原文为“‘aerial’ overview”,“aerial”在这里既指高人云间而俯视地面,也指虚无缥缈而充满幻念,作者语带双关,所以用了引号。——译者注

其中某种差异与类似的因素之间。这种相互之间的埋怨有时候充满了怀疑,甚至还有点反感,总之不一定配得上旧时的民族志标准——“融洽”。马库斯 (Marcus, 1997) 已经指出,它更典型的基调定为“复杂性”更好些。如果问题属于以唯名论的方式探求异他性,那么它的基调几乎就不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了。在那样一种探求当中,不管我们是属于传统还是属于现代,不管我们是人类学家还是社会理论家,或是两方面各自的某种混合,异他性就只能是一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东西 (entre nous)。

参考文献

- Alexander, J. 1987: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 57.
- Appadurai, A. (ed.)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2(2), 1 — 24.
-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cher, M. 1988: *Culture and Agency: The Place of Culture i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gyrou, V. 1996: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Wedding as Symbolic Strugg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chofen, J. J. 1861: *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ynaik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ösen and rechtlichen Natur*. Stuttgart.
- Barthes, R. 1974 [1970]: *S/Z*. Trans. R. Mill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sch, L., Schiller, N. G., and Blanc, C. S. (eds.) 1994: *Nations Unbound*. Langhorne, Penn.: Gordon and Breach.
- Bauman, Z.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ck, U., Giddens, A., and Lash, S.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llah, R. 1959: Durkheim and hist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447 —

461.

- 1972 [1964]: Religious evolution. In V. Lidz and T. Parsons (eds.) *Readings on Pre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endix, R. 1967: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2), 292 — 346.
- 1971: Two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In R. Bendix and G. Roth (eds.) *Scholarship and Partisanship*.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82 — 298.
- Benhabib, S. 1986: *Critique, Norm, and Utopia: A Study of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lumenberg, H. 1983 [1966]: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rans. R. M. Wall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oas, F. 1916 [1911]: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New York: Macmillan.
- Born, G. 1995: *Rationalizing Culture: IRCAM, Boulez,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Avant-Gar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urdieu, P. 1977 [1972]: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90 [1980]: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Paris: Seuil.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 1997: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ldeira, T. 1988: The art of being indirect: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n Brazil.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444 — 454.
- Caulfield, M. D. 1972: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roposing a new dialectic. In Dell

-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82 — 212.
- Chodorow, N.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maroff, J. and Comaroff, J. (eds) 1993: *Modernity and Its Malcontents: Ritual and Power in Postcolonial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ser, L. 1971: *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Coward, R. 1983: *Patriarchal Precedents: Sexua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de Beauvoir, S. 1972 [1949]: *The Second Sex*. Harmondsworth: Penguin.
- de Certeau, M. 1984 [197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rrida, J. 1978 [1967]: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lthey, W. 1961 [1926]: *Pattern and Meaning in History: Thoughts on History and Society*. Ed. H. P. Rickm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73: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and Isherwood, B. 1996: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Rev.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Durkheim, E. 1938 [1895]: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Trans. S. Solovay and G. E. G. Catli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47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 G. Simps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65 [1912]: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 J. W. Swai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Eisenstadt, S. N. (ed.) 1987: *Patterns of Modernity*. 2 vol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Engels, F. 1972 [1884]: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Escobar, A.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Welcome to Cyberia: 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yberculture. *Cultural*

- *Anthropology*, 35, 211 — 231.
- 1988: Power and visibi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invention of management in the third world.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428 — 443.
- Faubion, J. D. 1988: Possible moderniti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365 — 378.
- 1993: *Modern Greek Lessons: A Primer in Historical Constructiv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eatherstone, M. (ed.)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 Foucault, M. 1978 [1976]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The Will to Know*.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85 [1984]: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The Use of Pleasure*.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 1997a [1979]: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In P. Rabinow (ed.)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Vol. 1.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New York: The New Press, 73 — 79.
- 1997b [1984]: Preface to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In P. Rabinow (ed.)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Vol. 1.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 — 205.
- 1997c [1984]: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 Rabinow (ed.)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Vol. 1.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New York: The New Press, 303 — 319.
- Frazer, J. 1907 — 1915: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3rd edn. 12 vols. London: Macmillan.
- Freud, S. 1950 [1913]: *Totem and Taboo*. Trans. J. Strachey. New York: W. W. Norton.
- 1957 [1939]: *Moses and Monotheism*. Trans. K. Jon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75 [1927]: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Trans. J. Strachey. New York: W. W. Norton.
- 1989 [1929]: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 Strachey. New York: W. W. Norton.
- Friedman, J. 1992: The past in the futur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mer-*

- ican Anthropologist*, 94(4), 837 — 859.
- 1994: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London: Sage.
- Fuller, M. 1988: Building power: Italy's colonial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1923 — 1940.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455 — 487.
- Gaonkar, D. (ed.) 1999: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A special Issue of *Public Culture*, 11(1).
-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London: Macmillan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 and Turner, J. 1987: Introduction.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 10.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roy, P.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rard, R. 1977 [1972]: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P. Greg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reenberg, D. 1988: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iaule, M. 1965 [1948]: *Conversations with Ogotemméli*. Trans. R. Butler and A. Richar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pta, A. and Ferguson, J. (eds.) 1997a: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ds.) 1997b: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84 [1981]: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7 [1981]: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87 [1985]: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 Lawr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annerz, U. 1996: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erdt, G. (ed.) 1994: *Third Sex, Third Gender: Beyond Sexual Dimorphism in Culture and History*. New York: Zone Books.
- Herzfeld, M. 1987: *Anthropology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the Margins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A Place in History: Social and Monumental Time in a Cretan Tow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7: *Portrait of a Greek Imagination: Andreas Nenedak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rn, D. 1988: Welfare, the social, and the individual in interwar Italy.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395 — 407.
- 1994: *Social Bodies: Science, Reproduction, and Italian Moder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utchinson, S. 1996: *Nuer Dilemmas: Coping with Money, War, and the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Irigaray, L. 1985 [1974]: *The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Trans. G. C. Gill.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vy, M. 1995: *Discourses of the Vanishing: Modernity, Phantasm,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üing, C. 1966 [1915]: *Two Essays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Trans. R. F. 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ndall, L. 1996: *Getting Married in Korea: Of Gender, Morality,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sh, S. and Friedman, J. (eds.) 1992: *Modernity and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Lash, S. and Urry, J.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Latour, B. and Woolgar, S.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London: Sage.
- Leach, E. 1970: *Claude Lévi-Strau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6: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he Logic by which Symbols are Connec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e, B. 1995: Critical internationalism. *Public Culture*, 7, 559 — 592.

- Lévi-Strauss, C. 1965: *Le triangle culinaire*. *L'Arc*, 26, 19 — 29.
- 1966 [1962]: *The Savag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9 [194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Rev. edn. Ed. R. Needham. Boston: Beacon Press.
- 1969 [1964]: *Mythologiques*. Vol. 1: *The Raw and the Cooked*. Trans. J. and D. Weightm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87 [1966]: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Marcel Mauss*. Trans. F. Bak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Lévy-Bruhl, L. 1966 [1927]: *The "Soul" of the Primitive*. Trans. L. A. Clar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Lovell, T. 1996: Feminist social theory. In B. S. Turner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307 — 339.
- Luhmann, N. 1980: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Vol. 1. Frankfurt: Suhrkamp.
- 1990: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paradox of system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09 — 440.
- 1998 [1992]: *Observations on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ine, H. S. 1873 [1861]: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London.
- Malinowski, B.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 E. P. Dutton.
- Marcus, G. (ed.) 1983: *Elites: Ethnographic Issues*. Santa Fe: School for American Research.
- 1995: Ethnography in /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95 — 117.
- 1997a: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 as one power/knowledge like, among, and in engagement with others. In E. Long (ed.) *From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New Perspectives*. Oxford: Blackwell, 395 — 425.
- 1997b: The uses of complicity in the changing mise-en-scène of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Representations*, 59, 85 — 108.
- 1998: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E. 1994: *Flexible Bodies: The Role of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 Boston: Beacon Press.
- Mauss, M. 1967 [1925]: *Essay on the Gift*. Trans. I. Cunnison. New York: W. W. Norton.
- McLennan, J. F. 1970 (1865): *Primitive Marriage*. Ed. P. Riviè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ller, D. 1994: *Modernity: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Berg.
- (ed.) 1995: *Worlds Apart: Modernity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Loc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itchell, J. 1974: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London: Allen Lane.
- Morgan, L. H. 1964 [1877]: *Ancient Societ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 Müller, F. M. 1885 [1864]: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 Myers, F. 1992: Representing culture: the production of discourse(s) for Aboriginal acrylic paintings. In G. Marcus (ed.) *Reread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319 — 355.
- Nacify, H. 1993: *The Making of Exile Cultures: Iranian Television in Los Angel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Nader, L. 1972: Up the anthropologist ? perspectives gained from studying up. In Dell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Pantheon, 284 — 311.
- Nietzsche, F. 1954 [1871]: *The Birth of Tragedy*. Trans. F. Golffing. New York: Doubleday.
- Ong, A. 1993: On the edge of empires: flexible citizenship among Chinese in diaspora. *Positions*, 1, 745 — 778.
- Ortner, S. and Whitehead, H. 1981: Introduction. In *Sexual Meaning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 29.
- Pareto, V. 1935 [1916]: *The Mind and Society*. Ed. A. Livingston. Trans. A. Bongiorno and A. Living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77: *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 Ed. J. Tob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Oxford: Polity Press.
- Rabinow, P.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8: Anthropology as nominalism.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355 — 364.
- 1989: *French Modern: Norms and Form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7: *Making PC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din, P. 1957 [1937]: *Primitive Religion: Its Nature and Origin*. 2nd edn. New York: Dover.
- Reich, W. 1972: *Sex-Pol: Essays, 1924 — 1934*. Ed. L. Baxandal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Rich, A. 1977: *Of Woman Born*. London: Virago.
-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 R.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Sahlins, M. 1976.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rtre, J.-P. 1960: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 1963 (1960): *Search for a Method*. Trans. H. Barn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cholte, Bob, 1972: Toward a critical and reflexive anthropology. In Dell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Pantheon, 430 — 457.
- Silverman, D. 1986: *Selling Culture: Bloomingdale's, Diana Vreeland, and the New Aristocracy of Taste in Reagan's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 Simmel, G. 1971 [1908]: Group expan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 D. N. Lev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51 — 293.
- Spencer, H. 1898 [1864]: *First Principles*. New York: Appleton.
- 1969 [1876 — 1896]: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Ed. S. Andreski. London: Macmillan.
- Spencer, W. B. and Gillen, F. 1899: *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London.
- Steiner, C. B. 1994: *African Art in Transi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cking, G. 1987: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toler, A. L. 1995: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rathern, M. 1980: No nature, no culture: the Hagen case. In C. MacCormack and M. Strathern (eds.)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After Nature: English Kin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wis Henry Morgan Lectures, 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önnies, F. 1957 [1887]: *Community and Society*. Trans. C. Loomis. East Lansing, Mic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Traweek, S. 1988: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is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ylor, E. B. 1873 (1871):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Art, and Custom*. 2 vols. London.
- 1893: On the Tasmanians as representatives of Paleolithic man.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3, 141 — 152.
- 1898: The survival of Paleolithic conditions in Tasmania and Australia.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8, 199.
- Urla, J. 1988: Ethnic protest and social planning: a look at Basque language reviv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379 — 394.
- Warner, M. (ed.) 1993: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eber, M. 1946a [1915]: Religious rejec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directions. In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3 — 359.
- 1946b [1922]: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9 — 156.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M. 1988: The modernity of power in the Chinese socialist order.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408 — 427.
- 1994: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第10章 现象学与社会理论



S. 维特库斯

维特库斯 (Steven Vaitkus) 生于1955年,在美国普渡 (Purdue) 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社会学与哲学双学士。他从多伦多大学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领域为社会理论,讨论乔治·赫伯特·米德、古尔维奇和舒茨那里的社会群体观念。曾执教于多伦多大学、(苏东剧变前)波兰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 (Adam Mickiewicz) 大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目前在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社会理论、社会现象学与东欧研究。从1994年至1997年,他是“俄罗斯社会学发展”坦普斯 (Tempus) 项目的主要成员之一 (英国沃里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比勒菲尔德大学,莫斯科大学),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俄罗斯外省的情况。他在许多种国际性与国家性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并著有《社会如何可能》(Kluwer, 1991; 日文本1995), 编有《邻里:在白俄罗斯消失》(即出), 以及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的《社会人》(1934年手稿,即出)。他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有关文化邻接与邻里文化的理论,东欧(危机)灾变的理论,主体间性问题,以及关于新生儿在家庭中的信任态度的社会现象学。

10.1 现象学运动

10.1-1 何谓现象学?

10.1-2 现象学理论、本原“自我活动”以及现象

10.1-3 现象学的支架:自我怀疑、无预设性、成熟的统一性以及生活世界

10.2 社会现象学反思的展现

10.2-1 开启生活世界及其社会结构的“深度”:舒茨与古尔维奇

10.2-2 古尔维奇作品中生活世界的主要社会结构

10.2-3 舒茨作品中生活世界的主要结构

10.3 探索者与拓殖者的一代

10.3-1 生活世界中的反思性自我:那坦森

10.3-2 社会与生活世界:勒克曼

10.3-3 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的身体:奥尼尔

10.3-4 背景与生活世界:格拉霍夫

10.4 结语:未来的图景?

“现象学”这个术语源于希腊语中的“*phainomenon*”，意思是“关于现象的研究”，即研究显现，或将自身呈现为有意义的感觉和知识的东西。尽管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在各自的作品里都曾经使用这个观念，包括这个词本身，但胡塞尔却是以明显不同于他们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方式，就其最一般的意义，当代所知的意义，确立了现象学。人们正确地将他奉为现象学的创始人，是他将现象学确立为一种常存的“第一哲学”，同时确立为“严格科学”。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现象学理解成产生于、源出于胡塞尔，已经视其为 20 世纪的一种新哲学，是分析哲学惟一有竞争力的替代选择，是一种哲学传统、一个学派、一种范式、一种认识论起点或话语，以及一种系统地分析世界的有条不紊的一般性思维取向或思维风格。梅洛—庞蒂、萨特、海德格尔、哈特曼、雅斯贝斯、伽达默尔、利科、德里达，还有列维纳斯，这些自树一帜的哲学家都以各自的风格展现了现象学，这还只是举出西方世界最广为人知的少数几位。最后一点，它已经扩展到多种多样的知识学科当中，从艺术、音乐、文学，到法律、经济、精神分析和医学，一直到社会学、政治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历史学。

10.1 现象学运动

有关现象学的上述所谓“事实”，十分简单，足以定论。尽管如此，当你要更有针对性、更具体地考虑现象学时，事情就变得困难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作者形形色色，涵盖的主题五花八门。准确地说，是因为必须要问这样的问题：“何谓现象学？”

10.1-1 何谓现象学？

一旦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些读者想必就已经有些担心，或者是证实了最坏的期望和疑虑。读者这边是把这个问题视为不言自明的，并且期待有某些系统阐述的答案，而今却这样明确地提出来，那么读者就会推论，惟一可能的结果，就是现象学的秘传，将不会给出答案，甚至比这更糟，根本就不曾为人所知。这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问题很实用，对于展现现象学、理解现象学来说，或许是最好的入门途径之一。

梅洛—庞蒂在他开辟新格局的《知觉现象学》的导言开头，首先这样明确地指出：“何谓现象学？在胡塞尔最初那些著作问世半个世纪之后还在问这个问题，似乎令人感到奇怪”（Merleau-Ponty, 1962: vii）。那段话写于 1945 年。到了 1973 年，那坦

森在他所编的两卷本文选《现象学与社会科学》的导言中,十分令人瞩目地继续声称:“梅洛-庞蒂的问题依然有待回答”(Natanson, 1973:4)。不要忘了,在这些线索发展的同时,胡塞尔自己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多种尝试,不断推出新的现象学入门和概述。

今天,在胡塞尔开创性的著作问世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现象学家们依然在问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它并不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可以说,作为一个始终被探究的问题,它是整个现象学中最核心、最能发挥统一作用的特征之一。它体现了一种根本的、深度的自我反思,使现象学自成一格,有别于绝大多数其他理论视角与立场。这个问题或许是现象学家最常扪心自问的问题,不仅如此,现象学家还始终在问这个问题,并且可以肯定对此念念不忘,想方设法推进这个问题。不过,很有必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作为我们进入现象学的入门途径,作为现象学家自身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指向某些事情。

首先,它所追问的不仅仅是现象学中的学术文献和各种出版作品的历史。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那我们当然是已经了解到现象学是什么了,在任何一座藏书丰富、排放有序的图书馆里,你基本上自己就可以看出来。搜罗胡塞尔著作的《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现在已经出到了第30卷(其中有些还包括数册分卷),并且还在继续出。舍勒全集已经出了15卷,而海德格尔全集甚至已经超过了70卷。德文新版的舒茨全集也是进展良好。这还只是略举数例。整个儿来看这个答案,就使现象学家们居然还有可能不断提出这个问题愈发显得与众不同。

其次,追问何谓现象学,并不是要探究像胡塞尔这样的人的内在动机、精神活动甚至是心理背景。这类狄尔泰式的任务究竟有没有可能性,以及它在哲学上要达到哪些目标,在胡塞尔与狄尔泰的私人通信中就有讨论,并且是被胡塞尔彻底拒绝的(例如可以参见 Vaitkus, 1991:1)。诸如此类的考察在狄尔泰那里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绝不等于诉诸那些极具化约论色彩的社会环境,去探讨那些比较极端的观念史或知识社会学。

第三,追问这个问题,并不是将出发点定在某种已经暗含的、不言自明的东西上,从而定在现象学家会从技术的角度上称之为“素朴”(naive)的理论框架或日常框架上来求取答案。在这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些期望,期望能够得到平滑、基于事实的现象学的呈现,以此作为答案:比如说表现为在目前为人熟悉的、几乎是通用的副标题下出现一些主要概念,表现为一套基于事实的整体历史,甚至是一套给定的系统或范式的概述,或者表现为有关其种种声言与陈述的一种逻辑一致的阐述。后面所有这些期望此前都有可能做,并且也确实有人这么做过。但不管怎么说,在许多学者看来,结果却常常只是进一步证明了他们此前的信念,即诸如先验

自我、本质、还原、无预设性之类的现象学观念从未真正那么至关重要，整个事情无非就是看看我们的日常实践、言说行为和日常语言的使用、我们的身体，以及更一般地说，被理解成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微观”或“生活方式”。这里所产生的惟一的但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任何严肃从事实际研究的现象学家（甚至都不用说现象学哲学家）都会明确地拒绝描述，继而极有可能高傲地忽视描述，因此，让人回想起希普和罗特那篇原本善意的文章“论现象学社会学”（Heap and Roth, 1973）的命运，此文以就职演说的口吻面向主流社会学发言，刊载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

10.1-2 现象学理论、本原“自我活动”以及现象

以上这一切已经可以清楚地表明，当现象学家们自己追问关于何谓现象学的问题时，所探讨的现象学并不是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块界限分明的研究领域，与其他研究领域并立，甚至就是在哲学当中，也不享有类似于伦理学、认识论、逻辑学和美学的类属地位。相反，现象学被视为一种最原初意义上的“做哲学”或“理论化”的方式。胡塞尔在说明他为何将现象学理解成一种“严格科学（*Wissenschaft*）”的时候强调指出，从古希腊的哲学起源开始，哲学或理论（*theoria*）就始终致力于成为一种关于所有事态、所有事情的知识，无所不包，绝对有效，并且可以从理智上证明为正当。不过他也进而明确指出，这种“真正的哲学开端想必已经随着一些实证精神的预设的肇始而无可挽回地失落了。这些预设就像传统的哲学图式那样缺乏对于原初的热情，同时也缺乏最重要的东西：通过本原自我活动（*original self-activity*）获得的一种为哲学所独有的基础”（Husserl, 1962a: 20）。

胡塞尔将这种“本原自我活动”理解为一种直观，通过明确地放弃诸如此类设定的预设，回到“*实事本身*”：这也就是他向现象学理论家发出的著名号召“面向*实事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 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然而，后面这句并不只是号召回到通常所理解意义上的“经验”范畴。胡塞尔有时甚至会说现象学是“非经验性的”，也就是说，它将会追问“经验”的意义本身，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经验”指的是什么。因此，他对于一种面向*实事本身*的本原自我活动的号召，不如说意味着通过某种直观，回到有关我们意识经验的更原初的某种无中介的原始素材或呈现。对于将自身作为“身体呈现”显现在意识之中的东西的这种本原直观或无中介观照，对于我们来说是无需逻辑论证的明证的东西。总之，正是这整块本原经验（*Erlebnisse*）领域或原初现象领域，将会得到现象学家细致入微的描述，从而以这种方式进入理论表述。

因此,现象学的根基归根结底在于某种本原自我活动,要通过直接的自觉来描述给定的意识现象,而不是在于什么单个的概念、原则或命题系统。此前各种科学发展出来的全部方法在此一概无济于事,因为它们总是在实际给予意识的东西之外,还预设了某些东西。因此,对于在无中介经验中显现为现象的东西的诉求,并不涉及任何将导致“原始感觉材料”之类抽象表述的理论概括,另一方面,也不涉及某种神秘的内感知,尚未被特定的原初结构或本质关联所渗透。相反,在此恰恰是在传统的主客二元论和主客关系下向前推进的。更准确地说,关注的焦点在于意识中显现并向意识显现的那些现象之间的本质关系。现象学家们通过积极的直观,必须以描述性的方式,将这种本质关系及其所有的无中介性,所有的现象呈现,予以理论表述。总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才敏锐地指出:“最原初的材料,即直观,正是知识权威(Rechtsquelle)的源泉,无论是什么将其自身以原初形式(仿佛以其身体实在)呈现于‘直观’之中,则完全可作为其自身显露的面目予以接受,虽说这也只是在它呈现自身的那些限制之中”(Husserl, 1962a: 83, 原文黑体为引者所删)。用有些比喻的方式来说,现象学理论关注的是“内视”(insight)这个词最字面上的意义,作为某种“积极的内观”或知觉,按照世界被给予的方式看视世界,或者说看视现象学家常称的“生活世界的无中介性”。

大体上,这种“做”现象学的本原自我活动产生了两点重要结果。首先,就哲学而言,过去那些做法,比如构筑理论大厦,一点一滴地解决逻辑问题或语言学问题,注疏经典,编辑整理古旧手稿,追思往昔的大师,最后还又企望有朝一日能为个人自身哲学的发展设定某种有趣的根本假设,哪怕只是一时兴起或是灵光闪现,但不巧却是至为根本的假设,这些都不再有必要成为哲学探索的惟一道路或必然途径。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活动,现象学业已开启了一整块没有穷尽的领域以供系统描述,现在你甚至可以径直称之为“哲学研究”。

其次,就我们在此关注的社会学这门学科而言,归根结底的理论反思现在已经不再有必要局限于揭启社会理论中形形色色的哲学预设;概括各种社会理论的认识论范畴;探索某种社会科学哲学,其本质就是对各种社会理论进行某种逻辑安排,并最终为后者规定某种逻辑秩序;验证各种假设—演绎模型;本质上属于研究一种关于社会理论本身的各种经验形式的社会学;寻找社会理论中某种尚未得到理论阐述的漏洞或缺陷;甚至等待历史提供某种尚未得到社会角度之理论阐述的新的的发展。就算有人非常希望这样去做,也可以超出以上所有路数,通过现象学,从根本上深入其下,而现象学本身也作为一种探究理论的新的哲学方法(即 *theoria*),以求在社会学中发展一种新的理论化形式,即“社会现象学”。

这并不意味着抛弃过去的社会理论甚至哲学,而是采取一种新的读解方法,着

■ 鉴于针对现在你能够努力去分享、理解和评估的那些有关世界的基本现象经验，做出理论表述和内在省视。在这个意义上，随着处在被正式认可的“涂尔干、韦伯与马克思之圣三一”（取自比尔斯泰特的表述，见 Bierstedt, 1981: 496）之外的无人过问的老旧作品重获生机，“社会科学家的生活共同体”就可以更充分地扩展到过去，而学者自己的社会理论生产则将受到其他志趣相投、训练有素的理论家一丝不苟的审查。比较谦逊的说法是：社会现象学家将会非常乐于在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业经彻底清扫的基础上进行工作。

10.1-3 现象学的支架：自我怀疑、无预设性、成熟的统一性以及生活世界

有了对于何谓现象学的这种最一般性的理解，现在可以来简要地考察一下现象学不那么容易被误解的另外四点一般性特征或特性。

首先，对于“何谓现象学？”之问题的追问始终不断，统领各方，体现了现象学家断然拒绝哪怕只有一次臣服于关于他或她自身理论活动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是对于自身的理论活动，继而对于他人的理论活动，所从事的一种绝对、持续、负责的更高层面的反思和自我省察。从某种彻底化的笛卡尔式怀疑那里生发出来，并从笛卡尔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例如可以参见 Husserl, 1973a），在此意义上，现象学从一开始就始终坚持这种持续不断的自我质询。因此，对于就此成为最根本的被给予的东西，即现象，现象学家在其考察的每一阶段都始终提出如下问题：“哪一种最具严格科学性（*wissenschaftlich*）和根本保证的方式能够深入触及现象，使后者进入一种充分内视的特征概括或理论表述？”（参照 Natanson, 1973: 7）。虽然它是作为一种最具体的、个别的反思行为，但这实际上也等于是在问一般意义上的现象学是什么。从具体实例来说，只是在比较晚近，这种质询才开始引导人们去揭启和分析现象学的另一个主要关注“手中握笔书写这一活生生的身体行为”（例如可以参见 Derrida, 1978），继而引向更一般层面的一种关注“人类及其书写机器”，处理的是个人计算机这一新兴技术（例如可以参见 Meyer-Drawe, 1996）。

其次，现象学的宗旨在于某种“无预设性”（*Voraussetzungslosigkeit*, *presuppositionlessness*），或者说预设无涉（*freedom from presuppositions*）。如果束缚于设定的形式逻辑模式，认为只能通过做出某些特定的逻辑假设陈述，与它们相关的其他陈述才能被揭示成是真的，就非常容易对这种研究纲领做出错误的解释。甚至可以把这种无预设性视为一种遁词，其实是对所有陈述之总体拒绝，是试图从一种绝对的零点重新起步，不带有任何语言、逻辑或思维。不管怎么说，这里必须记住，现象学并不试图为我们的理论学说设置条条框框，或提供逻辑论证或证明，而是努力作为

“真理”，正确地描述在某种不带偏见的观看——从而也不使用任何未经省察的假设——中被给予的**现象**。遵循这些思路，“无预设性”首先意味着努力揭示始终隐藏的预设，以此揭启一般被假定为有效的、真实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可以理解那些处在更高抽象水平上的明证。就形式逻辑而言，这种无预设性涉及到阐明形式逻辑的基本观念与范畴，甚至阐明诸如“判断”与“意义”之类的概念，办法就是归根结底地回溯到这些观念与范畴在前述谓的(pre-predicative)活生生的经验中的“本原”。胡塞尔本人作为一位理论数学家，有着弗雷格和康托尔这样的朋友，*在他的《算术哲学》(Husserl, 1970a)和《逻辑研究》(Husserl, 1970b)中第一次精细入微地展开了这样的考察。

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胡塞尔进而试图确立一套具体实施这种无预设性的步骤，一般被称为“现象学还原”，但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的还原，包括现象学还原与本质(eidetic)还原(参见 Husserl, 1962a)。在最一般的层面上，现象学还原并不涉及任何对于预设的拒绝或否定，而是包含某种对于有关这些预设的“信念的置括(bracketing)或悬搁(suspension)”，同时在具体层面上，则是针对诸如此类的信念与陈述，展开各种各样的视角变更(variations)和变异(modifications)。即便不深入现象学中有关“还原”的漫长争论与繁杂的释义推进，也可以泛泛地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种还原都大大超出了各门科学中那种有限的、单纯否定性的所谓“无预判性”(prejudgmentlessness)和价值无涉。悬搁中不仅从正面维持着一些预设，而且试图触及更深层的预设和本原，即在经验中更直接地明证的东西，在此过程中，先前的预设本身就此奠基于或根植于这一活生生的经验的层面上，从而获得了澄清。在这个意义上说，始终会涉及一种态度的彻底改变，从而更深深地渗透到起先在概念思考上被阻于视线之后的那些意义层面当中，所以，在这里，任何“起点”都始终是有待实现的某种东西。

因此，“无预设性”并不意味着与所有的预设无涉，而只是意味着与那些尚未被悬搁或彻底审察的预设无涉，因此，没有任何据称是自我明证的假设，可以作为未经质询的根据，参与构成某人自己的分析与结论。大体上，这种“无预设性”甚至似乎意味着假定了某人自身工作中的某种东西，只要这种东西业已清楚地(1)得到明确的质询与审察；(2)暂时被推迟留待未来的考察；或者(3)仅仅被视为属于某个

* 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德国数学家、哲学家,现代数理逻辑奠基人。著有《算术基础》、《算术基本法则》。康托尔(Georg Cantor, 1845—1918):德国数学家,创立19世纪数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集合论,奠定了现代数学中的函数论、分析与拓扑,并刺激了数理逻辑中直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学派的进一步发展。——译者注

“他人”的工作领域。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由研究者反思性地、始终如一地牢记于心。总之,当我们开始研读丰富多样的社会现象学作品,第三个意涵就尤其显出其重要性,为胡塞尔将现象学理解为某种“无限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另一层含义。

第三,施皮格伯格在他杰出的两卷本考察《现象学运动》中,在考察了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等重要现象学家的作品之后,在结论部分开始将我们引向现象学的第三点一般性特征,即现象学及那些与现象学“结盟”的学者都关注于考察现象,一般本质,以及对于本质之间本质关联的统握(*apprehension*) (参看 *Spiegelberg, 1976: 659*)。^[1]他的考察基本是方法论角度的,你不难再加上一点,就是对于以下重要主题的难以动摇的关注:意识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严格的现象学还原,以及面向先验范畴与先验自我。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基于一般所接受的胡塞尔对于意识意向性的最宽泛的理解,很简单地说,胡塞尔所谓的意识意向性基本上指的是,所有的意识行为都始终具备某种针对某个对象的根本上的指向性,无论针对的对象是实在的还是理念的,所以说所有的意识都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就这样,传统的观念论与实在论归根结底消解于一种潜在支撑的意识结构之中,这种结构就是内在时间中相互关联的行为的持续编织。此后,胡塞尔一方面沿循相互关联的意向活动的(*intending, noetic*)一面,另一方面沿循被意向的意向对象的(*intended, noematic*)一面,更具体地分析了具有意义的现象的经验。最后,本质在这里被理解成意向对象性的意义统一体,而意识行为则进一步被视为根植于先验自我的构成性活动之中,并在其中有着某种类属本原,就此可以说,意识行为充当了所有现象学考察的绝对的、最终的根基。

这些分析尽管繁复艰涩,但也无可争议地被视为胡塞尔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分析。不过话说回来,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它们的具体特性就毫无争议了,并不意味着对于所有这些观念,现象学家们都达成了某种完全正统教条式的认可。恰恰相反,我们在此期望介绍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现象学中,对于这些观念始终保持着一种难以动摇的核心关注和掺有私见的依赖。更具体地说,无论在某人自己的现象学研究中朝着更远更新的方向前进了多少,对于这些观念也始终允许有根本性的讨论,新的争议,重新的思考,它们也始终充当着一种首要的手段,让人以持续的反思性态度,一再地推进自己的工作。换句话说,简言之,现象学不接受或顺从任何自然科学的进步观念或类似的进步观念。大体上,现象学家在持续不断的反思之中,对于总体上持续增长的现象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视之为一种内在统一的、充满活力的整体,其中每一个主题要素都不仅与其他要素有着内在的分享,而且也持

续不断地共同走向成熟(参见 Natanson, 1973: 3—44 等)。因此,任何预先设定的最终目标都只能是不合法地攫取了正确理解的现象学观念。正如胡塞尔曾经概括的那样,现象学(或者正确理解的所谓“哲学”)“当其不断趋于实现之时,并非作为一种较不完善的科学,以其自然向前推进,亦逐步获得改进。深深确立于其意义当中……有一种基础方面的彻底性……即随着思维的推进,这些反思亦愈益相互交织……最终趋向一门整体科学,一种关于起点的科学”(Husserl, 1962a: 20)。

第四,就其最低限度而言,现象学始终以视域性的方式关注着生活世界。关于生活世界的观念可以回溯到胡塞尔非常早期的作品,而相类似的先导性观念也可以在其他许多现象学家的作品里找到。尽管如此,正是在胡塞尔的《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Husserl, 1970c)中,才第一次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这个观念。在那部著作中,胡塞尔分析了伽利略式科学中尚未被揭示的理论动力,通过在归根结底和类属的意义上将这种理论动力回溯到奠基性的生活世界,而导向具有功能依赖法则的代数方法。这样一来,不仅是自然科学被看作归根结底奠基于生活世界,而且生活世界本身也同时摆脱了自然科学的“概念掩饰”,展现出其最为普遍的一般性(most universal generality)。将此用来考虑特殊的具体研究,意味着在任何现象学式地考察对于某一主题现象的意识时,都始终必须对该主题与某一情境领域的关系有持续的反思自觉。并归根结底导向某个视域,最终导向主体间性生活世界。不过,这些分析还将探讨危机感,探讨“愈益抽象的科学”对于人类生活的非相关性,角度更具一般性,但意义却是同样的重要。更具体地说,这些分析将会在根本上回溯问题的最深层的文化根源,从而指向某种由此导致的盘根错节、日益增长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其政治表现形式便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一种日益在概念上自足的科学,似乎自足地依赖其自身根基,针对世界追求一种愈益抽象的数学化。这将导致科学越来越丧失与任何活生生的世界的关联,而在上述意义上对于生活世界的揭启不仅将为科学提供一种新的根基,而且会将世界重新释放成为我们自己的活生生的世界(例如可以参见 Vaitkus, 1990)。因此,《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的这些分析不管有什么具体的局限,^[2]也极其清晰地表述了现象学的原初立场和必然任务,即“对于人类本身的一种责任”(Husserl, 1962b: 516; 引者英译),在这里,“哲学并非一件私人事务”(Husserl, 1962b: 439; 引者英译),而是始终指向当代世界并介入当代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现象学家会将生活世界作为他们主要的研究主题,进而具体阐明其最生动的细节与具体的一般性(concrete generality),或许也就毫不令人惊奇了。



10.2 社会现象学反思的展现

绝大多数现象学家在受到强烈追问的时候会承认，与上述关于现象学的扼要概述至少也有一些共同点。而对于第一代社会现象学家来说就尤其如此。事实上，原本甚至可以把它归到舒茨和古尔维奇作品的副标题下，只是有一些细小的差异。只不过这样做想必会破坏这篇陈述所具有的不断演进发展的风格。更具体地讲，舒茨和古尔维奇本人在自己的作品里，在进入各自独立的理论发展之前，也都常常就现象学做出许多简述（因为现象学永远也不会是完全预设好的，而始终必须首先求得理解）。正是这一点，常常招来不很光明正大的指控，说他们的作品中有某种重复的味道。就目前这篇叙述而言，我们可以直接略过这一切不谈，现在径直切入他们各自有所不同的著述，并且参照前人的作品来看，这样可以充分地凸现他们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最后一点，在上述所有人那里，对于胡塞尔也只是主要以列举的方式提到，因为胡塞尔的功用就是在现象学充满活力、趋于成熟的统一体中，充当主要的反思性、聚合性的形象；同时，第一代社会现象学家比起其他任何现象学家来，都要更深地依赖胡塞尔的分析。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随后一代社会现象学家中有些学者是如何也转向了萨特和梅洛-庞蒂。但不管怎么说，最一般地讲，社会现象学在根本上将包括某种一般性反思和趋于成熟的演进，其基本的脉络是一种深度社会分析和对于生活世界的具体阐述。

10.2-1 开启生活世界及其社会结构的“深度”：舒茨与古尔维奇

将舒茨与古尔维奇的作品首先合在一起考察，肯定没有丝毫藐视的意思。很明显，这种做法完全可以在具体层面上找到合法根据。总的来说，他们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现象学理论阐述的最高境界，既对孤零零的处境作出理论阐述，同时也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作理论阐述。舒茨与古尔维奇各自都常常使用从两头同时向中间“开挖隧道”的比喻，以描述这种非常深奥的反思活动。尽管没有任何保障让他们有朝一日会在“隧道”之中会合，但对于他们来说，彼此的不断切近本身就有着非常重要的知识意义和切身意义。比如古尔维奇有一次写信给舒茨就很典型：“我自己正在挖一条隧道，听见有敲击声，告诉我另一边有工人”（Grathoff, 1989a: 75）。

从 1939 年到 1959 年，也就是说在超过 20 年的时间里，这两位社会现象学家展开了一场颇具深度的通信，直抵现象学理论阐述最为深邃之处。一度担任胡塞尔私人助手的兰德格雷贝在他为此通信集撰写的长篇“序言”（Landgrebe, 1985: xii-i-xxxviii）中恰如其分地指出，舒茨与古尔维奇在探讨各自的作品时，经常“围绕着”

不在场的胡塞尔,采用深入的引文注释和关键词以及经过缩减的复杂表述。意见时而一致,时而分歧,但就我们目前的行文宗旨而言,重要的时刻就在他们就“生活世界”的概念对胡塞尔《危机》文本做出读解与评注之后来临了。舒茨写道:

生活世界作为共同世界,作为历史文明,作为同时代的私人顾问(contemporary privy councilors)这种特殊群体,作为主体间性共同体,作为共同的**奠基**,作为集体活动的产物,作为精神上的探索(最后落实为反思!);所有这一切杂然相混,有失现象学方法的**尊严**。(Grathoff, 1989a: 246, 黑体为引者所加)

因此,古尔维奇才会说,先验构成现象学(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ve phenomenology)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而舒茨会写他那篇著名的关于主体间性的洛耀蒙论文批评胡塞尔(参看 Schutz, 1970a)。*到最后,舒茨会在写给古尔维奇的一封信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道路已经畅通,可以在生活世界富于成果的‘bathos’当中安心地工作了”(Grathoff, 1985: 401, 引者英译)。有必要指出,“bathos”一词在此用的是其原初的希腊语意义、哲学意义,就像康德曾经用过的那样,意味着“深度”。^[3]因此,这里所谈论的是一条开放的道路,让社会分析得以进入生活世界的那些极富成果的深度。

当然,舒茨与古尔维奇在这一方向上已经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舒茨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世界现象学》中提出一种关于行动的社会现象学,正是将我们的“行动”与“行事”理解为一种“社会世界中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来考察**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Schutz, 1932/1967)。另一方面,古尔维奇在《社会世界中人的遭遇》(授课资格论文手稿 1931/1979)中,从他的博士论文里借取了关于自觉意识的主题域分析,用于分析日常行动,考察我们与背景世界(milieu-world)的“遭遇”,包括那些进一步激发并愈益摆脱反思性对象化(reflective objectivation)的“遭遇”。简言之,他们都主张,对于一个“世界”的任何观念都始终预先设定了对于他人、“你”和“大家”的基本认识,也就是主体间性,或者说有关生活与人的认识的一个主体间性世界。当然,这样的思路颇具新意,很不同于卡尔纳普尝试性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以及其他层面更高的社会理论概括,它们都不重视作为诸如此类“世界”之**奠基**的活生生的主体间性行为与认识,认定它所包含的丝毫无关乎理性与知识(nothing more than

* 指舒茨于 1957 年 4 月底在洛耀蒙(Royaumont)哲学研讨会上发表的“胡塞尔中的先验主体间性问题”。——译者注

irrationality and nonknowledge)。

舒茨与古尔维奇在这些作品里都以当时尚未流行的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分析为出发点,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也很不同于胡塞尔自己在数学与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体验。不仅如此,古尔维奇大大仰仗了自己所熟悉的盖尔布和戈尔特施泰因关于脑部受伤的退伍老兵的研究,而舒茨甚至在自己的作品和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Parsons, 1937/1968)中的工作之间看出了一定的关联。事实上,帕森斯和熊彼得都曾经邀请舒茨去哈佛讲课,而舒茨与帕森斯两个人自己也有相当频繁、有时甚至得说是言辞激烈的通信。不过,大约在30年之后,帕森斯写下了这样的回忆:“对于所争论的问题,我想我比自己在1940年时所理解的要好得多”(Grathoff, 1978: 119)。所以说,舒茨和古尔维奇这些最初的作品不仅探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探讨了社会科学,从而创造性地融入了当时主流社会学中一些非常新颖、令人激动的发展。当然,综上所述,即便在今天回想起来,也可以毫不奇怪地看到,现象学在考虑社会理论时,并不着眼于教条性的概括,而是着眼于对一个现象世界中的共同经验做出可能的深刻洞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舒茨与古尔维奇在试图首次将社会现象学引入英语世界时,也都探讨了詹姆士、米德和库利的实用主义传统。

不管具体情况如何,在对于生活世界及其主要的社会结构贯彻一种社会现象学分析时,一般所探讨的就是对于主体间性的某种特定理解,然后,以此为基础,可以在世界的更高层面的反思领域或范围里,进一步分析主体间性充满意义的、多种多样的表达。最初的解决办法是暂且将主体间性视为一种“世俗问题”,简单地设定存在某种他人,作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自然态度,在前文提及的意义上,将对于这种假设的考察保留为胡塞尔自己作品的探讨范围。例如,舒茨有时会说自己的分析是一种“关于自然态度的现象学”,而不同于胡塞尔的“先验构成现象学分析”,并以后者为基础。不过话说回来,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考察,舒茨与古尔维奇将主体间性确立为完全凭其自身而存在的世俗问题,主体间性现在已经严格作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给定的原初现象,基本的任务也就此变成只是去阐明这样的主体间性以及它的各种更高层面的反思性表达。

在此不可能更深地切入主体间性问题,这是整个现象学中最为复杂、分析最为精妙的问题之一,牵涉一系列广泛的理论问题(比如可以参见 Vaitkus, 1991)。我们只需要指出,首先,主体间性并不像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更好地或者更为亲密地理解他人,而是始终同时包括了亲密性(intimacy)与匿名性(anonymity)的向度;其次,主体间性是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的,始终作为更高层面理论概括的一种归根结底的经验性奠基被探讨;第三,主体间性作为一种有待进一步探究的研究主题,可以理解为一种奠基性的门径,面对那些降低分析范畴

层次的过程,引我们得窥内在体验*、意识以及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多维结构。但不管怎么样,总的来说,只要简略地考察一番古尔维奇和舒茨各自对于生活世界主要结构的突破性分析,就能很好地把握有关主体间性的这种具体认识,充分认识其可能潜力。

10.2-2 古尔维奇作品中生活世界的主要社会结构

在古尔维奇看来,主体间性作为一种给定的现象,本质上始终紧密维系在某种“情境”或“情结”(Zusanmenhang)的结构中。^[4]大体上他试图表明,主体间性尽管始终还是一种原初信念,但在情境的构成或发展的过程本身中所起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乃至从包括传统哲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某种反思性情境的立场来看,甚至都不能够再将主体间性还原为一种现象,尤其是不能够再以它涉入日常生活的那种方式予以还原(参看 Gurwitsch, 1979)。

更具体地讲,古尔维奇首先详细分析了包含有关自觉意识的各种认识论学说和心理学学说的反思性情境,然后分析了自然科学的反思性情境,发现这两类情境所包含的观念思考方式彼此之间的联系都太过松散,以致无法说明主体间性的内在结构。例如,它们假定了一个孤零零存在的自我或者科学性的自我,一个独立的物质客体。接下来,古尔维奇探讨了他称之为“背景世界”的更为一般的情境。

背景世界的情境本质上属于日常生活的世界,由于我们在某个微观背景中的生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行为,所以在理解这种背景世界时,必须首先着眼于组成它的那些微观背景。这个意义上的微观背景主要有三点特征。首先,在微观背景中遭遇到的既不是独立于我的物质属性,也不是独立于我的客体对象,而是某种装备或用具的复杂交织意义上的“材料”,进一步涉及某种与特定他人相互关联的“共在”。其次,我既不是一个孤零零存在的自我,也不是微观背景中与世界相对峙的某个人,而是嵌入其中,以获得某种“环视”(circumspection)。我根据这种“环视”,可以决定自己如何行为以达到某种目标。第三,在一个背景世界中没有任何先验同一的对象,因为那里所遭遇到的“材料”都只有在与背景世界的关系当中才获得其活生生的意义。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的原初信念并非生活在一个主体间性的背景中的信念,而是生活在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里的信念,因此,古尔维奇进一步分析了他所称的我

* 原文为“inner expansiveness”,疑为“inner experience”之误。——译者注

我们在根本上的“默含知识”(implicit knowledge),这种知识处在与其他背景有着视域指涉关系的某个背景之中,最终延伸到包含未知指涉的某个视域之中,涉及一个“周遭世界”(surrounding world),而这个周遭世界又是由“事情”和“人类同伴”的某种相互交织所构成的。古尔维奇就此主张,正是关于这类周遭世界或世界“生活情境”的这种默含知识,说明了我们对于背景世界中主体间性的活生生的原初信念。

所有这一切就这样引导古尔维奇去考察一系列的“背景的根本情境模式”(fundamental contextual modes of milieus),这种世界生活情境的主体间性在这些模式中也得以表达,从而对背景有更加直接、更加相关的影响。他把这些根本性的组织情境称之为“伙伴关系”、“成员关系”和“融合”。

大体上,现在可以说,古尔维奇将生活世界的开放结构展现为以多种方式表达主体间性的各种情境的发展,最终导向那些不再能够从概念上把握主体间性的理论反思性背景。我们已经看到,他分析了我们在世界生活情境中获得的有关主体间性的原初信念,分析了这种信念在伙伴关系、成员关系和融合等根本性的组织情境中的表现,分析了背景本身的主体间性情境,最后还分析了属于传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那些反思性情境。总之,在此基础上,并且不忽视古尔维奇后期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他进一步在更加根本的层面上考察了某种前本我论的(pre-egological)“意识的先验构成功能”,这种功能不仅为科学提供了终极的原逻辑(Urlogik, proto-logic),而且为普遍理性(raison universelle, universal reason)充当了基础。所有的主体间性主体都始终可以这种普遍理性为参照,负责任地引导自身。

10.2-3 舒茨作品中生活世界的主要结构

舒茨在这个方面与古尔维奇大为不同,可以说是先区分了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自然态度下,我们对于他人的三种不同层面的主体间性知识,然后以此为起点,分析生活世界各主要结构。^[5]首先,是我们对于他人之此在(Dasein)的知识,作为我们对于他人之所有知识的奠基性层面,涉及的是任何个体或社会群体在组织其经验时所依据的那些最基本的结构。所以,与任何归根结底关注于有关存在(Sein, Being)之原初问题的哲学本体论不同,这样的问题根本上还停留在社会的层面,必须从“世界”如何获得其最初的组织的角度入手,来处理彼此相互关联的奠基性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与社会结构。在这里,舒茨对以下相互关联的因素展开了详尽的考察:(1)活生生的身体的定位空间,包括“此在”(here)和“彼在”(there),“实际所及之区域”,“潜在能及之区域”,“可复原之区域”,以及“可达致之区域”;(2)意识流中之时间性关联因素,包括记忆[留存(retention)],现在,以及期望[持存

(protections)]; 以及(3)根本性的社会结构,包括纯粹的我们关系,同时代人的世界,先代的世界,还有后代的世界。尽管“纯粹的我们关系”被看作所有社会现实的原初层面,但这里重要的是不仅要理解,只有基于这种关系,才能把握他人的意识流或纯粹的此在;而且还要理解,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纯粹”的关系,一种与随后几个层面相分隔的关系。

其次,是我们对于他人之如在(So-sein)的知识,涉及的是“一个群体相对自然的世界观”,所有的主体以此为基础,组织他们作为该社会群体成员的经验,而“我”也从这个角度将他人理解为我们群体的某个成员。更具体地说,这样来理解他人,在某个社会群体中的“So”,也就是“如何”,或者说社会情境定位,涉及的那种“相对自然的世界观”一般被舒茨界定成“群体生活之文化模式”,理解为包含“在定向和指导方面所有特别的评价、制度和体系(例如民德民风、法律习俗、风情仪礼、流行时尚之类),……标志着(即便不是构成了)任一社会群体在其历史上的某一给定时刻的特征”(Schutz, 1976a: 92)。舒茨在他的“陌生人”(Schutz, 1976a)、“归乡人”(Schutz, 1976b)和“消息灵通的市民”(Schutz, 1976c)等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相对自然的世界观的三种内在主体间性层面,直至不享有它最浅层的那些特征,也就是被想当然地接受的那些共同特征,导致我们总是类型化地——从而始终是片面地——将他人理解为“专家”、“消息灵通的市民”和“路人”。

第三,是我们对于他人行动之具体动机的知识,涉及的是舒茨本人关于自愿社会行动的独特理论,必须用“意图”(in-order-to)动机和“原因”(because)动机来探讨。

总之,所有这三个层面合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commonsense world),我们在其中以一种实践的态度,出于种种实践的考虑,相互达成协调,并促成必要的变化。更具体地说,我们的实践谋划与社会行动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基于对这许多日常生活世界层面进行多种多样、但越来越不想当然接受的类型化处理。*当然,这和韦伯所谓的“理念型”不同,那些出自科学家的思维。而这些类型化或类型则属于我们活生生的日常世界的特征,我们通过它们在这个世界上观看、实施行为并做出解释。因此,在舒茨的作品当中,对于它们的构成本身,它们被社会化了的想当然性,以及它们在社会行动中的具体应用,有关的分析始终是从它们自身的角度出发的,当然也考虑到了胡塞尔本人的本原性现象学考察(比如可以参见 Schutz, 1970b, c; Husserl, 1973b)。

舒茨进一步联系了社会个人,并就此遵循了一种一般性的关联学说,来分析生

* 原文如此:“increasingly less taken-for-granted typifications”。此处“less”疑有误。——译者注

活世界的这三种主要结构或分层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从而进一步考察了生活世界的另一套主要的向度关联 (dimensional articulation)，他称之为“有限的符号意义域” (finite symbolic provinces of meaning)。这里他关注的是在一个具体情境的“此在”与“此时”之中，通过记号、指示、符号与象征生成并融合的人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超越经验。这一点代表了舒茨那里一种一般性语言学说的起点，符号象征的记号被理解成共现关系 (appresentational relations)，着眼于一种具体的反思性知识。

大体说来，有限的符号意义域指的是戏剧世界、艺术世界、宗教世界、幻想世界、梦的世界、科学理论的世界等等诸如此类的世界。尽管舒茨往往主要分析后三种有限案例，但就我们的宗旨而言，重要的是取得以下的认识。基本上，符号秩序不仅建立在现在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理解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而且恰恰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缺乏能力才生出符号秩序，以顺利应对某种根本上的“新颖经验”，我们就此视之为某种“震荡”或“危机”。在此，我们关于这个日常生活世界的那些基本上想当然接受的知识开始作为整体被质疑，我们从整体上开始反思这种知识，认识到“生活世界之根本上的不透明性”，同时努力通过符号象征与创造性的洞察，获取某种更高层次或等级的知识。最后，尽管符号还依然属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某种成分，但符号的意义所指的已经是在另一个有限意义域中的某种先验观念或认识。所以说，符号只能在其含糊的形象中得到适当的理解，只能是参照其他符号的形象予以解释。

最后一点，舒茨还考察了生活世界中各主要结构的又一种关联，这种关联本质上也是具有发展性的。他眼里的符号化过程，归根结底是对被想当然接受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解释过程，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更高层面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然后他将符号化过程作为一种社会成员所实施的关于社会的自我解释来分析。作为社会成员对社会所实施的这样一种自我理解和自我阐明，这一符号化过程据说将使社会的内在结构，包括社会的各个群体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存在本身，清楚地呈现在社会成员的眼前，并且正是作为有关他们的社会的“真理”。符号化过程就此阐明了具备某种意义的社会。沿循这些思路，舒茨广泛地探讨了作为一种符号关联过程的社会的发展，从一种“致密的关联” (compact articulation)，到一种“分化了的符号关联” (differentiated symbolic articulation)；在前者那里，人们经验中的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以同样程度参与了各种符号秩序在整个世界中的某种充分整合；而到了后者那里，就“已经发展出几套符号系统，比如科学、艺术、宗教、政治和哲学，……这些符号系统即使彼此有所关联，也只是很松散的关联，……这是我们努力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发展关于整个世界的某种解释的结果” (Schutz, 1973:332)。

最后, 尽管舒茨与古尔维奇都分析和讨论了具有形式主义特征的科学虚无主义与政治虚无主义, 但舒茨不同于古尔维奇, 古尔维奇是从对于某种普遍理性的趋向中捕捉到我们在世界上的自我责任, 而舒茨则截然相反, 把焦点放在具备自觉意识的个体自我上, 强调在与他人关系中的某种主体间性的、创造性的意义赋予 (sense-bestowing) 能力。因此, 他在写给古尔维奇的信中, 极富洞见地对这种差异进行了如下概括: “我们不得不在我们的世界中努力创造出某种秩序, 而这种秩序却是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中必须舍弃的。整个的冲突……就隐含在强调重点的转移上” (Grathoff, 1989a: 37)。*

10.3 探索者与拓殖者的一代

舒茨与古尔维奇逐步展开了社会现象学的视角, 铺陈了生活世界中各主要结构, 在此之后, 社会现象学中出现了另一“代”现象学家, 在此被称为“探索者与拓殖者” (explorers and settlers)。他们是舒茨与古尔维奇所表述的狭义上的私人助手, 或者是广义上的学生, 并以舒茨和古尔维奇的著作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尽管如此, 他们也是探索者与拓殖者, 继续独立地发展各自的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 包括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之中确立现象学研究。不过, 在我们开始之前, 有三点重要的条件需要预先说明。首先, 我并没有意思拿下文的社会现象学家当这一代的完整名单, 而是作为四位显而易见的“理想的重要实例”, 其作品具备某种社会学的风格, 在该学科中享有国际性的或者广泛的认可。^[6] 其次, 我勾勒出了他们与舒茨和古尔维奇的作品之间某些内在的理论关联, 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现象学家和舒茨与古尔维奇之间就只有这些理论关联。相反, 这里的宗旨在于提供一个进入他们作品的基本的、大致的途径, 以便更有助于展现他们各自独立的发展。第三, 这四位社会现象学家中, 各自的兴趣也相差甚远, 在许多不同的领域著书立说, 尽管如此, 考虑到现有条件限制, 显然只能够考察某些特定的社会现象学特征, 从而也只能是比较简略地考察他们的学说。

10.3-1 生活世界中的反思性自我: 那坦森

从根本上讲, 那坦森在发展自己的理论分析的时候, 可以说参照的是舒茨对于

* 此处原文强调重点有误, 应为先强调“我们的”后强调“世界”, 也就是说, 那种在主体间性中人为创造出来的秩序感在世界的自然化、客观化过程中被想当然接受, 退到了自觉意识的幕后。——译者注

生活世界根本上的不透明性的逐步揭示以及古尔维奇关于意识的先验性的研究。基本上,只有沿循这些思路,才有可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够自成一格地将许多作品融贯在一起:从关于萨特的第一部论文,完成于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关于米德的第二部论文,都是以胡塞尔的先验取向为根本指导,然后才到达他自己独立的立场,这里称之为“生活世界中的反思性自我”。

尽管那坦森有时将自己的作品概括为“存在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但他也承认,这里有着术语上的矛盾,并不是胡塞尔式的现象学的某种替代,根本上只是强调重点的问题,简单地说,“不过是我自己做现象学研究的方式”(Natanson, 1998: 9—11)。因此,他对这个术语的用法,基本上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激发思想的比喻”,或许对于社会现象学家们来说尤其如此。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所谈论的“存在”,就是舒茨所谓的日常生活世界带有其被想当然接受的全部类型化的世俗存在。事实上,“有一种类型化似乎超越了世俗世界的情境本身”(Natanson, 1974: 92, 黑体为引者所加),因此,他后来所探讨的现象学本质上就是对于所有类型化中的这一种的先验分析,更一般地说,是对这一“实存的日常世界”的可能性本身的先验分析。

在那坦森看来,这一视角主要涉及三块领域。首先,就社会现象学的工作而言,它从未仅仅被视为一种职业行当,好像要想理解这个工作,必须首先被承认是一位有实践经历的现象学家。相反,必须将这一工作视为以一种更为原初的方式发生,这样来理解它:我们的生存或存在始终是首先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之中,在这样的生存或存在之中,我们的自我(self)以及这个世界的发展本身也始终依赖于自我(ego)的漫游能力,就是通过意识的有关活动,介入并直面世界的世俗存在,以此凸现这个世界本身的轮廓(例如可以参见 Natanson, 1970a)。

其次,任何社会理论建构或社会学都始终必须超出社会系统、理念型、所谓的拟剧性,甚至是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者的常识知识的相应图式,以便通过诉诸自愿的、意向性的意识活动所具备的纯粹类型化、抽象性的能力,向后一层面业已实现了的先验可能性,阐明前一层面的理论结构。在讨论到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的时候,那坦森不仅贯彻了这个理论,而且进一步具体分析了“匿名性”与“认识”之间根本性的、交互缠绕的动态关系。他人就是通过这种动态关系,以多种不同方式被把握,而巨大的社会世界也被看成既维持了它的事实性,也维持了它的自由(例如可以参看 Natanson, 1974; 亦参看 Natanson, 1994)。

第三,首先集中考察“实事本身”,包括它们的社会性体现,通过现象学还原,找出生活世界中的先验成分。接下来就将考察带着可感情绪之外观的呈现给意识的现象。而这又意味着继续考察意识情境的氛围或支点,以便捕捉那些处在边界上的

经验,这些经验不仅难以为自觉意识所把握,而且导向整个的世界视域。至于后者,那坦森本人具体地分析了“持续不断的世俗生存”,着眼于一种存在的流,一种时间性的脉动,着眼于意向性角度上的熟悉的东西和奇异的东西。这其中的“本质”如今被理解为从未隐藏的“未受拘束的分散因素的统一体”(unity of uncontained dispersion),而“可能性”则大体上被理解为事关意识的想像能力。他将日常生活世界的世俗性理解成“可能性”,然后通过本质,通过意识的想像性活动、构成性活动,意识从根本上开始发现自身游荡在这个世界中被想当然接受的东西的界限上。不管怎么说,尤其是为了触及那些捉摸不定、含糊不清的感觉经验(比较舒茨的“不透明性”),那坦森最后提出运用文学性的比喻,指的是“在这种语言的浓缩中,语词开始……摆脱它们的界限,颠覆我们关于何谓实在的知觉”(Natanson, 1998: 132)。总之,那坦森在根本上关注于我们自身,从未忘记生活世界内在相互缠绕的“observe side”,* 当它的被把握的认知被带入社会世界时,会导向一种处在那个社会世界中内在统一的负责任的主体性,拥有某种兼具光明与黑暗的具体眼光。

10.3-2 社会与生活世界:勒克曼

要解释勒克曼的作品,一般首先可以参照舒茨对于世界(cosmos)的简要分析,以及他提出的关于社会之符号表达的简要分析,还有古尔维奇从先验意识的情境域(context field)理论出发,为科学寻求一种原逻辑的作品。诚然,在他早期与伯格合著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使用了探索一门“知识社会学”这样的标题,但即便在这里,也很有必要指出,“标签中没有任何既得利益”,相反,这是一种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更为根本的理解(Berger and Luckmann, 1967: 18)。同时,在勒克曼的作品里,也的确可以找到人类学的一些预设和哲学人类学的许多引证。哲学人类学探讨的是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的独特性,因为自然中这一部分不仅有能力理解“自然”,而且有能力理解作为这一部分的自身。哲学人类学并进而回应了进化论生物学和人种学之类所激起的对于哲学的挑战。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人类学成为勒克曼的核心关注。不过话说回来,他也写道:“我们在此的知识是不确定的,深深地困惑于……种种方法”(Luckmann, 1983: 3)。不仅如此,他似乎对从历史学到生物学的任何“认识论上的麻烦制造者”都感兴趣,而且发自内心地将自己的思想向各式各样的社会学理论家开放,并满怀同情地为其在自己思想中确立一席之地,从韦伯、涂尔干、马克思到米德,还有其他一些杰出学者。在此我们建议,要想最好地理解这

* 原文如此,存疑。——译者注



许多不同的方向如何整合在一起,可以从他关于“社会与生活世界”的可以说更具一般性的视角和分析入手。

勒克曼首先从整体上理解宇宙论以及神话、宗教与科学等符号性的宇宙论体系的特定发展,并以此为起点,揭示了当今的某种“宇宙论危机”(Luckmann, 1979: 200; 亦参 Luckmann, 1983: 3—39; 1967)。在这场危机之中,自然科学就像其前辈一样,不仅不能够基于批判性反思来理解其自身对于宇宙的理解,而且更有甚之,不再能够回答对于人类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有关我们人类在世上的生存本身的意义。勒克曼承认“没有任何确定的解决之道”,并主张社会科学并不试图要成为宇宙论体系,那超出了它们的限度。但他在这里也看到了,在科学与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一道宽阔的裂缝,并就此独立地摸索出一条新的内在道路,旨在将作为一门经验学科的社会学与作为一种对于生活世界的彻底反思的现象学联结起来。

更具体来讲,他主张,既然社会学说(Gesellschaftstheorie)依然受制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式世界观的宇宙论模式与方法,就需要有一种关于生活世界的现象学,能够提供方法上具备必要的反思性与形式化的社会学说,从而能够充分反映生活世界中的人类结构,并且奠基于这些结构。另一方面,对于形形色色的历史社会的社会学分析(与其他学科的分析一起)就此可以不仅产生新的问题,而且有助于确保在这些奠基性的、普遍构成性的生活世界分析之中,避免贯彻和仰赖基于单一社会的偏颇概括(例如可以参见 Luckmann, 1983: 40—67)。

建构某种科学“形式”语言或通用符号系统而不丧失意义,并且将这种活动理解为基于从生活世界现象学中得出的概念和母型(Luckmann, 1979: 202—204; 1983: 3—39),这会有助于奠定社会学与现象学之间的这种特定的统一。但是,这永远也不能是这两者里面有哪一方消融到另一方当中,哪怕对于在世界中行动的人类,可以负责任地提供给他们关于世界的一种无所不包的阐明和理解。换言之,纵然这种科学语言到那时或许可以用来表达、比较和阐明不同的历史社会现实,也只有社会学可以对这些具体客观的社会形式展开适当的分析,而现象学则针对在这世界上的主观取向的普遍结构,进一步推进其自身独立的考察。因此,勒克曼自己会将他最重要的文选题名为《社会与生活世界》(Luckmann, 1980; “Gesellschaft und Lebenswelt”),关于社会的理论可以视为根植于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但从未彻底归入后者。同时为了确保避免任何因误导而产生的困惑,他进而将相关的现象学分析称之为一种“原社会学”(proto-sociology),从而舍弃了“现象学社会学”的名目(参看古尔维奇的“原逻辑”观念)。

在这个整体理论视角内,如今已经能够预料得到,勒克曼的作品角度多样,层面众多,不可能在此充分地挖掘,哪怕只是点到即止,更不用说那些丰富的具体经

验研究了。不过,几个面上的观点还是可以说一说的。就更具体的研究而言,区分勒克曼在做的两种研究始终是很重要的:一种是有关“**社会现实的建构**”的阐释性的社会学分析,涉及客观历史社会的种种特性;另一种是严格的描述性的现象学分析,针对的是奠基性的生活世界中主观取向的那些不变的普遍结构,包括在主观的人类经验中实现的“**社会世界的构成**”。理解他所谓的两种情况之间的“平行行动”(Parallelaktion, parallel action),对于充分把握社会与生活世界之间的一般性关系来说至关重要;更具体地讲,是充分地把握社会与生活世界之间那些分析节点或基本媒介,最终将导致在社会行动中建构某种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先验客观现实。沿循这些思路,对于勒克曼来说,发展一套关于语言和沟通的学说就变得尤为关键了,原因有二:(1)“声音”在互动的角度上作为最主要的“客观的”和被客观化的表达形式,以及它在语言方面对于社会随之产生的意味,即意义之赋予与实在之构建的特征;(2)为了从现象学的角度上阐明社会科学的反思性问题,这些社会科学将某种业经解释的沟通性日常生活作为客观对象,同时在它们自身的反思中却又预先将这种日常生活设定为主观过程(例如可以参见 Luckmann, 1972; 1983: 68—91; Luckmann and Silbermann, 1979)。在上述的相互关系当中,其他重要的研究主题还有许多,比如个人认同、社会化以及制度,所有这些都关注主体性的一种奠基于具体范畴的发展,关注其如何延伸到各历史社会中那些匿名性的领域当中,也关注诸如此类社会的交互建构本身。最后一点,勒克曼更新近的作品(例如可以参看 Luckmann, 1995)关注的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很好地论证了这些主题,在考察这些主题的时候,着眼于它们在不同的历史社会中相互关联的各色表达,着眼于沟通过程中的经验建构和重构的方面,着眼于它们共同的奠基性“本原”,将其作为生活世界之普遍结构中的一种主体间性构成来分析。

总的来看,可以说勒克曼在根本上关注的是发展最具科学性(wissenschaftlich)、涵盖一切、但仍然奠基于反思性的考察,从而最终提出的不仅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成功在望的解决方案,而且是有关人类在生活世界中行动取向的一种充分的“认识”,尽管始终还必然是不成整体的,但至少尝试要做到涵盖一切了。

10.3-3 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的身体:奥尼尔

考虑到奥尼尔的作品中那些现象学的特征,可以说他的研究已经偏离了“主要的影响……梅洛—庞蒂和舒茨”(O'Neill, 1972: xiii)。当然,不能忘记的是,从历史上来看,梅洛—庞蒂不仅听过古尔维奇在巴黎的讲课,然后每半个月去一趟古尔维

■ 奇家私下探讨；而且反过来，古尔维奇也很乐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梅洛-庞蒂有些早期作品的“教父”（参看 Grathoff, 1989a: 338）。总体上可以说，奥尼尔一方面基于舒茨论述关于世界之常识知识和行动者之实践态度的有关观念，另一方面基于梅洛-庞蒂关于活生生的身体与语言的分析，以此两方面作为出发点，继而独立提出了我们在此所称的“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的身体”。

有必要一开始就指出，对于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的身体的这些考察，所牵涉的虽说就是社会学的研究途径，但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学研究途径。奥尼尔将自己第一批论文题名为《作为贴身行当的社会学》(O'Neill, 1972)，从而将社会学视为一种基于活生生的身体的无中介性而和人打交道的“行当”或“手艺”，以共生的方式，允诺将最初取自人们的东西还诸他们。这样一来，这种“贴身行当”(skin trade)就会始终通过诸如调查与访谈之类步骤，避免陷入任何职业社会学实施的净化过程。在职业社会学的净化过程中，行当的主顾们在某种职业窥视之前，个个都是全盘招供。这种职业窥视所使用的理论行话和技术语言将“意义剥离语言，而将世界推向它引我们去的方向”(O'Neill, 1972: 9)。总的来看，社会学家在投入并实施社会学研究任务时，不是为了努力恢复人的整全，却只是为了表述以下两方面之间的种种关联：一方面是个体经验，另一方面是将我们人类的情感放在生活世界里技术、科学和政治之类的制度当中来理解，进行重新评价。简言之，这种研究途径不仅分析活生生的身体，而且将生活世界中的身体看作和他人一起“共同寻求意义”(O'Neill, 1974)的场所和共同体，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向，尝试重新思考社会及其各项制度。

因此，奥尼尔的出发点不是科学观察者居高临下的眼光，而是从内心深处基于身体的将社会学家的所见所闻和心智思考结合起来，以他人之回眸中“人的注视里那份关切……的神秘”为基础，考察和发展了一系列观念，例如根本关切(fundamental care)、关注、在场、开放性、自我与环境的肉体合成、有限反思性以及对于他人的信任。所有这些又都导向对于“社会叙事”、讨论和对话的一种相互关联的核心考察，在这些考察对象中，身体忍耐着有序和无序的生活的亲密性，根本上被看作是“世界的肉身，而世界也就此以肉身的形式融入人与社会的意义与无意义”(O'Neill, 1974: 48)。换句话说，正是通过我们的“言说”本身，我们自己才被看作是语言的物质真理，进而，正是通过我们的身体这种自然语言，我们可以谈论世界，而世界也反过来在我们身上发言（参见 O'Neill, 1970 等；并请参看 Merleau-Ponty, 1962, 1964, 1973）。因此，尽管言说被理解成语言在参与通过活生生的身体表达及设立新的意义时所获得的那种确切内涵，但还可以加上一句，这永远也不会是关于世界的一种纯粹散文化的描述，而只能是有关我们的在世生存的诗学。沿循这些思路，奥尼尔果不其然，坚持将生老病死、成家立业之类他所谓人类生活中重大的寻

常之事 (great commonplaces) 作为一种更加具体的定位焦点, 这些重大的寻常之事最终被视为在现在被重新构造, 并被实际生产出来, 然后以未来为取向。总之, 可以发现, 这种社会现象学不仅仅依附于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是“我们的环境”, 在其中, “看与被看……都是人的自然眼光”(O'Neill, 1974: 80)。而知识则是开启了道路, 他人可以大体上遵循“聚合我们的生命的义务”, 在这些道路上走下去。因此, 可以称之为这种“身体化社会学”(incarnate sociology) 的思考始终会进一步涉及奥尼尔所谓的“一种意愿, 具备一种共同体的外观, 成为一座生存的居所”(O'Neill, 1974: 80)。

奥尼尔在《五种身体》一书里(O'Neill, 1985), 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活生生的身体现在联系生活世界中的社会, 在社会历史角度上的具体化过程。以“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实践”为起点——这一般会让人想起对于人的形象的某种投射, 奥尼尔进一步将这种投射理解为人, 理解为人形塑本身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创造性力量, 包括人类的社会及其形形色色的制度。显然, 这与长久以来的思考传统截然相反, 并颠覆了这种思考传统。在这种思考传统下, 我们从二元论的角度, 开始将社会理解成在我们的心智之中, 理解成一种更高层面的知识—道德秩序, 而我们的身体则是社会的物质材料, 并且常常无奈地成为社会的仆役。现在, 奥尼尔把活生生的身体重新界定为“沟通性身体”(communicative body), 集中考察身体的符号性表面, 论证人类如何首先用他们的身体来思考自然、社会和世界。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巨大的身体, 它的分划也就会产生某种解释性、符号性的形象。奥尼尔指出, 我们一方面“将社会化到骨子里”, 同时又将社会与日常生活“身体化”。然后他结合经验例证, 进一步分析了各种大小秩序的这类拟人化生产是如何不断地支撑着我们有关世界的观念, 有关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医疗等制度的观念, 具体地表现为“五种身体”。不过, 这种拟人论随着历史发展而明显呈现衰落趋势, 抽象社会系统, 现代治疗国家(therapeutic state), 生物工程和医学上关于“可修补的人”(prosthetic man)的形象(包括器官移植和基因技术)等皆为明证, 其代价是我们的人和人性不断地丧失。因此, 奥尼尔提议, 将首先属于人的身体体现的历史以及他们的社会诗学(作为理性主义的奠基性本原), 与当今世界被割裂开来、本质上没有身体体现的历史, 这两种历史重新融合, 办法就是引入“作为生物文本的历史”(代表前一种历史)和“作为社会文本的历史”(代表后一种历史)等一般层面上的启发性概念。参照这种具有固定框架的重新融合, 理论上和具体研究上就都有可能更广泛地甚至是更深入地从身体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历史和家庭(即人类的最初形貌), 从而有助于在人类的未来形貌中, 恢复我们人性失落的形貌。“历史作为社会文本”这一一般性观念, 如果从批判的角度来理解, 可以说根本上属于那些人的科学(human sci-

ences)所造成的结果,这些科学业已抛开生物文本来描写人的身体。这一观念可以说是奥尼尔在《尝试蒙田》(O'Neill, 1982)一书中的研究之自成一体的理论进展。在那部著作里,文学大体上被视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表达与理解的一种根本性的身体艺术。总之,无论如何,奥尼尔大体上认为沟通性身体是所有社会科学与社会的道德基础,这种彻底的拟人论是“常识的历史根基,而这样的常识对于任何更高层次的人类统一体而言都被视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成就”(O'Neill, 1985: 150)。

10.3-4 背景与生活世界:格拉霍夫

要解释格拉霍夫的社会现象学作品,可以首先从非常整体性的角度上,参照古尔维奇关于背景世界的观念,以及舒茨的一个相当深邃的观念,即我们关系本身只能从符号角度上予以把握。不过也应当随即指出,在格拉霍夫看来,舍勒*关于背景对象的基本界定——从而我们也可以加上一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尔维奇的基本界定——也大致适用于生活世界。这就使他从概念上首先将背景从诸如此类的给定界定中解脱了出来。他同时也发现,舒茨有关生活世界中的符号的理论遵照了图式的预定性,而没有澄清后者在构成性类型化中的源起。因此,简言之,在格拉霍夫的作品中,“背景”展现为一种“研究对象”(Forschungsgegenstand, research object),本身确立为其作品中一种一般性的稳定主题,该主题大体可以理解为我们在此所称的“背景与生活世界”,而他的德文著作之一《*Milieu und Lebenswelt*》(Grathoff, 1989b)的题名本身就如实反映了这一点。

然而,即便是有了这样的大致理解,也得指出,只有回到格拉霍夫的处女作《社会多变性的结构》(Grathoff, 1970),才能恰切地理解其作品中那些非常复杂地绞缠在一起的社会学特性。这部著作尽管哲学味道颇为浓厚,但关注的正是生活世界中的社会类型化。更具体地说,这里是把类型化放在日常行动与行事的含糊情景当中来分析,此处的含糊性则正是通过类型化图式的变异与分化来克服,而无论怎样变异与分化,总是包括新类型的构成。这个涉及社会类型化和多变性的过程被视为在更深层面上具有某种“不明推论式结构”(abductive structure),即在皮尔斯的一般意义上从后件(consequent)推出前件(antecedent)。而从整体来看,可以说格拉霍夫不仅借鉴了皮尔斯的作品,而且还在必要之处汲取了米德、韦伯、戈夫曼、帕森斯以及类似一些学者的作品。换言之,对于现象学哲学最为艰深的主题之一,即生活

* 原文如此。——译者注

世界中知觉意识 (perceptual consciousness) 的类型化构成特征, 以及其中迄今完全未经阐明的那些社会性特征或主体间性特征, 格拉霍夫的探讨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现象学和社会理论相互交织的双重结构。

舒茨运用“初阶构造”(first order constructs)与“二阶构造”(second order constructs)(也就是日常构造与科学构造)只是出于更深层的论证目的, 而格拉霍夫对有关这两种构造的整个方法论争论都提出了质疑, 并且主张对于生活世界的整个理论诉求都必须保持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尽管如此, 他继而甚至提出, 社会学家通过他们对于“经验的”东西的理解, 颠覆了传统的形式主义虚无主义, 通过他们这种颠覆, 后面这种“诉求”可以被放弃了。这样一来, 他便继续就方法论规则写道, 任何此类“规范性规定都只不过是研究条例中未经形式化(比如被分划成某种操作逻辑的形式性的条条块块)的某种‘特性’”(Grathoff, 1989b: 235; 引者英译)。最后, 格拉霍夫的社会现象学关注焦点始终将会以哲学与社会学之间内在的生活世界性的“中间领域”(Zwischenreich, in-between realm)为出发点, 从而会去捍卫一种“方法论主观主义”, 作为主体间性情境中一种指引理论形塑的创造性环节。这会使他在实践当中探讨, 如何在有关背景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中, 遵循定性的思路, 探讨某种“方法丛”(Methodenbündel, methods-bundle)的塑造与使用(例如可以参见 Grathoff, 1989b: 434; 1991)。

现在, 要理解背景本身, 首先是从根本上着眼于一种“正常性”观念, 其次参照类型化与生活世界。格拉霍夫主张, 一方面, 有关正常性的经典论述坚持认为, 可以通过职业、市场和公共领域对于整个社会所产生的作用, 充分阐明社会性互动的正常化过程, 从而只是将“理性化”与“正常化”混为一谈, 忽视了正常化生活世界情境的特定性质。而在另一方面, 过去的哲学现象学将“正常性”融合到在意识的构成活动中形成的“类型”之中, 业已导致一系列关联着单个行动者的多重生活世界, 难以处理其他世界系统。

胡塞尔关于在先被给予每一个人的那个、也是惟一个生活世界的最初界定, 不曾考虑有任何的多重形态。格拉霍夫再一次依赖了这一界定, 从一种“熟悉感”(sense of familiarity)的角度来理解“典型性”(typicality), 视其为生活世界的一种先验假定, 而“正常性”就其本源而言, 则被理解成一种更具个人性的“熟识感”(sense of acquaintedness), 被视为仅限于背景。所以, 当从一种“正常化的熟识程度”的角度来确定背景的界限, 而将正常性视为人类背景的一种不断趋向完成的社会性组织机制, 那么符号也就被理解成与在一个背景之中确立的那些“类型化图式”有关, 视背景为其重新构成的一项指标, 在其正常化的特征中不断地导向“异常状态”, 而这些“异常状态”则是生成于与下一层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后面这些

情境所包含的种类,可能从周围的其他背景,到日常生活规范结构之完全未经阐明的情境,再到社会系统。最终,格拉霍夫这样写道:“社会与自然尽管持续不断地呈现出来,但并不比天气的变化更具有自我明证性。自然只有在其与背景之间的相对关系中,才首先成其为‘自然的’;而社会也通过相对自然的世界观,成为一种现时的社会实在”(Grathoff, 1989b:413,引者英译)。

沿循这些属于一种“前阐明”(pre-clarification)的思路进行更加具体的经验研究,此后在对背景进行研究的时候,就会更广泛地视其为一种有着明确界限和情景定位的行动情境与体验情境,包含对于“桌子”、“床”和“活生生的身体”之复合的共享参与。与此同时,在探讨诸如获得补充或舍弃之类背景“修补工作”的时候,完全是从与社会系统之间某种专门的“联结”(Kopplung, coupling)的具体角度入手的。在这个意义上,诸如此类的经验性社会情境,从家庭,到老年之家、心理诊所、修道院、学生公寓之类的情境,都已经得到了专门的研究。

总而言之,格拉霍夫的研究阐明了社会(Gesellschaft)与背景之间的决定性差异。尽管社会本身从未被当作生活世界似的情境来探讨,^[7]但社会与背景之间的关联始终必须付诸具体研究,因此,也特别应该作为具体研究的东西。不仅如此,从这种视角出发,并以有关背景的分析为支撑,生活世界本身就被展现为一种特殊的情境,尽管单成一体,但却面目多样,至少包括了以下六种“意义维度”,组成格拉霍夫极为宽泛的研究方案:(1)行为与社会行动结构;(2)个人;(3)主体间性;(4)作为历史意义的代际单位;(5)现时性(actuality)与现实性(reality);(6)科学理论的基础与形态,比如处在科学背景中的科学理论。他有关后面所有这些主题的研究近来已经导向了关于邻里和文化邻接的分析(例如可以参看 Grathoff, 1994),尤其在最近,导向了有关脚本(即文化符号系统)和历史纪元的研究。大致可以说,这里的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就在于,通过重新回到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性自我,并且这种自我还始终包含着与他者之间的关联,从而坚持反对形式主义虚无化的社会科学,反对常常与之相关的虚无主义式的社会系统失序。

10.4 结语:未来的图景?

本章以适用于多门学科的对于现象学的某种一般性理解开篇,至此已经可以看到,社会现象学反思或社会学反思是如何地围绕着生活世界而逐步展开。具体而言,是将社会现象学看作在根本上包含对于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中各主要社会结构的分析与揭启,就像舒茨与古尔维奇最初所贯彻的那样。在这一传统内,接下来可以看到追随着被称为探索者和拓殖者的一代,体现在那坦森、勒克曼、奥尼尔和

格拉霍夫等人的作品之中。他们分别探讨了生活世界中的反思性自我、社会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的身体以及背景与生活世界。

尽管这四位社会现象学家的作品在本章中是彼此独立地探讨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之间除了对于生活世界的共同的探讨，就不存在任何相互关系。实际上，如果将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深入研究，常常会深切地感到宛如置身于一间“镜室”，形形色色的主题相互映射，彼此体现，然后再有所不同地折射回来。因此，这里的棘手任务常常就在于，尝试确定谁的作品中某一项主题最为重要，以便逐渐勾画出各个视角在最一般层面上浑然一体的理论轮廓，并通过实例予以证明。当然，这不仅仅是要刻画相当独立的探究，而且是要给出理论上的背景，以便把握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中确立下来所依据的那些基础。

如果上述的分析根本上要求立足于这些作者与舒茨和古尔维奇此前作品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已经比较详细地考察了他们各自独立的作品，新出现的要求也就在于基于他们所奠定的基础本身，在此行文结束之际，略作一二评点，以有助于达成某种类型的对于未来图景的勾勒或勘察。当然，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惟一可能的途径就是运用有限的符号比喻，旨在避免对于具有根本上的创造性与生命力的现象学之“观念”本身，出现任何观念论或形式主义式的非法使用。

大体说来，就探索者与拓殖者的著述而言，首先可以指出的是，根本上的整个探求范围大致如下：北至那坦森的研究，他探求的是反思性自我对于生活世界努力予以先验把握与阐明；南至勒克曼的研究，他试图通过一套在反思性角度上充满意义的新科学符号体系，涵盖生活世界，直至对于社会的社会建构；西至奥尼尔的研究，他考察了活生生的身体，包括其实践感知向社会的投射；最后是东至格拉霍夫的研究，他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我们确立生活世界中任何较高层面的秩序的过程中，一些必要的限定框架，比如一个背景。当然，提出这些方向坐标只是出于符号比喻的目的，但可以认为它们指出了生活世界中社会分析可以依据并作为起点的多种认识向度。显而易见的是，对于这些各自独立的向度中任何一种的采纳与不懈的追求，都有可能进一步导向社会现象学整体上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根本进展。

当你开始来刻画这些新拓领域的视域，就会面对愈益丰富的学术研究作品，有的更近于眼前，有的则愈发的遥远，其中贯彻着相当独立的理论研究和具体经验研究，但都会各自进一步延伸，发展出愈益专门的主题，诉诸专门的概念。不过可以肯定地认为，无论这些视域的“专门性”(specificity)如何发展，只要研究工作依然是社会现象学性质的，就永远不会转变成通常“学科性的”社会学理解下的“专业性”(speciality)。由于社会现象学根本性、一般性、持续性的自我反思，你只会对被普遍

接受的专业分工中那些愈益狭隘的视野分割感到困惑。正如舒茨当时曾经深感窘迫与困惑地被问到“您是做城市的还是做农村的？”，今天令人惊讶的问题依然在继续，只是形式变成了“你是搞宏观的还是搞微观的？”社会现象学家所集中研究的任何一种特定的主题现象，都始终包括一种对于生活世界的相关的横向理解，必然有助于消除眼光的这种狭隘化。在这个意义上，坚定地贯彻这样的方针或许确实可以导向更多有意思的发现。

第三，可以说，既然这些拓殖点并不是壁垒森严或相互交战的阵营，也就可以同时在其中从事研究，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奋力突入或漫游进入新的方向，进入全然未经标示的地域。

最后，在这些探索者的基础上，始终有可能更具体地进一步回顾现象学运动的流变。在此，尽管依然依赖于舒茨、古尔维奇、胡塞尔和梅洛-庞蒂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并以这些基础为研究对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现象学哲学家也被视为仿佛逐个瞄准这里的各位先驱，透过一只极其清晰的意义万花筒在观看。这个方向的任务包括从根本上探索并揭启生活世界中其他全新的特征，从而承担一种当下主体间性的与他人之间富于穿透或宛如镜射的确认。所有这一切的指向都不在于如日中天时的启蒙运动，而在于某种给定的“棱镜般的”(prismatic)文化现实。大体说来，施鲁巴所谓社会世界之某种“符号世界”(symbolic cosmion)的观念，索夫纳关于日常生活世界之某种“全景知觉”(panoramic perception)的观念，以及维特库斯关于生活世界中某种“信用态度”(fiduciary attitude)的观念，都可以算是遵循这一方向的几个实例。

显而易见，在社会现象学中，还可以有并且很可能有其他尚未得见的探求进路和至关重要的探求步骤，因为诸如此类用符号含糊标记的图景及其轮廓永远也不会包含如实描绘的制图，更不用说一种科学了。比如说，对于崭露头角的“新观念”，就永远也不能真正地说明。不仅如此，还必须始终牢记，社会现象学就其起源而言，本质上包含着在具体现象的生活世界中，与他人之间的一种本原的知识“自我活动”。

本文从理论上概述了现象学与社会学，具体而言，是从整体上概述了一种充满活力并正在走向成熟的社会现象学。行文结束之际，惟一合适的终篇便是努力点出社会现象学中那些至深至隐的问题，那些最重要的活生生的方面。我们发现，这种道路就在于舒茨与古尔维奇私人通信时交换的三点富于洞察的论述，尽管它们散见各函，但根本上却有着深层的关联：

1. “如您所知，在我看来，对于胡塞尔的‘正确的’即正统的解释，相比于真

正的事态,始终是次要的问题。”(Grathoff, 1989:6)

2. “舍勒正确地指出,只有和朋友们在一起,才能在根本上进行哲学的思考。”(Grathoff, 1985:247;引者英译)

3. “顺便提一句,您搞错了:我们并不属于自觉意识的领域,而是完全完全、彻底复杂的存在。”(Grathoff, 1985:402;引者英译)

作为一种普遍象征性的指引形象合而观之,舒茨与古尔维奇所提出的各项原则确保了这种理论视角的思想之门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与任何富于洞察力并从事反思性思考的社会理论家进行讨论对话。

注 释

[1] 法贝尔的《现象学基础》(Farber, 1968)和寇克曼斯编的《现象学》(Kockelmans ed., 1967)是另两部目前已成为经典的对于胡塞尔作品及现象学整体的英语介绍,在实际阅读胡塞尔和其他现象学人物时参照研读极有帮助。

[2] 尽管我们会看到,舒茨与古尔维奇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批评了这部著作,但在此应当特别指出,他们也都认识到,根本上说它还尚未完成,由各种各样的手稿所组成,胡塞尔溘然去世,没有能够将其整理成书。

[3] 根据编者在通信集中的附注(Grathoff, 1989a: 263, 注2),由 B. Waldenfels 所提供的信息 A204,对于“深度”的援用出自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4] 以下有关舒茨与古尔维奇作品中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各主要社会结构的阐述,乃基于本文作者之《社会如何可能?》(Vaitkus, 1991)中对于这些社会现象学家更为广泛深入的考察。有关任何引出的具体问题,皆应进一步查考此书。

大体而言,对于古尔维奇作品的入门要说条理有序、精选得当,可以参考以下作品:古尔维奇《社会世界中人的遭遇》(Gurwitsch, 1979);古尔维奇《现象学与心理学之研究》(Gurwitsch, 1966);古尔维奇《意识的领域》(Gurwitsch, 1964)。亦参恩布里所编的《生活世界与意识:古尔维奇纪念文集》(Embree, 1972)。

至于舒茨的著述,类似的精选入门可以包括以下作品:舒茨《舒茨选集》(1970—1976):第一卷《社会实在的问题》;第二卷《社会理论研究》;再就是第三卷《现象学哲学研究》。然后可以读读舒茨的《社会世界现象学》(Schutz, 1967),但不幸的是,必须始终将其与此书的德文原版《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 Schutz 1974)相对照。也可参看那坦森所编的《现象学与社会实在:舒茨纪念文集》(Natanson, 1970b)。

[5] 参见注4。

[6] 这里的情况之所以复杂,不仅仅是因为表面上显见的篇幅所限以及理论家们整体

上的结构相关性,而且还因为,事实上,目前缺乏对于这个阶段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和生平研究。当然,下文中最明显的疏漏便是伯格的研究。在这篇比较笼统的分析中,伯格之所以最初未被收入,完全是出于一种敬重之心压倒了他其他考虑,因为他在理论上期望不再被视为一位现象学家。更广泛深入的分析显然必须涵盖他的著作,深入地考察分析他的这一声音。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在现象学的角度上研究他们的重要性依然是最高的,在社会学的角度上显然也是这样。

英语世界中涵盖社会现象学研究的主要相关期刊中包括《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人与世界》(*Man and World*)、《人的研究》(*Human Studies*)、《现象学研究》(*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文化解释学》(*Cultural Hermeneutics*)以及《胡塞尔研究》(*Husserl Studies*)。

[7] 格拉霍夫在一项富于洞见的主张中论证道,这恰恰是哈贝马斯与卢曼都不合法地做了的事情(参见 Grathoff, 1989b: 413—433)。

参考文献

- Berger, P. L. and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 Bierstedt, R. 1981: *America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Derrida, J. 1978: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icolas Hays.
- Embree, L. (ed.) 1972: *Life-World and Consciousnes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Farber, M. 1968: *The Foundation of Phenomen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Grathoff, R. 1970: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Inconsistencie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ed.) 1978: *The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Schutz and Talcott Pars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ed.) 1985: *Alfred Schutz-Aron Gurwitsch: Briefwechsel 1939—1959*. Munich: Fink.
- (ed.) 1989a: *Philosophers in Exile.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Schutz and Aron Gurwitsch, 1939—195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9b: *Milieu und Lebenswelt*. Frankfurt: Suhrkamp.

- 1991: Reality of social worlds and trajectories of working. In D. Maines (ed.) *Social Organis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1994: Von der Phänomenologie der Nachbarschaft zur Soziologie des Nachbarn. In W. M. Sprondel (ed.) *Die Objektivität der Ordnungen und ihre kommunikative Konstruktion*. Frankfurt: Suhrkamp.
- Gurwitsch, A. 1964: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1966: *Studies in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79: *Human Encounters in the Social World*.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Heap, J. L. and Roth, P. A. 1973: On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354—367.
- Husserl, E. 1962a: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New York: Collier.
- 1962b: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Husserliana. Vol. 6. Ed. by W. Biemel.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0a: *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 Husserliana. Vol. 12. Ed. by L. Ele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0b: *Logical Investigations*. 2 vols.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 1970c: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73a: *Cartesian Meditation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3b: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Kockelmans, J. J. (ed.) 1967: *Phenomenology*. Garden City: Doubleday Anchor.
- Landgrebe, L. 1985: Einleitung. In R. Grathoff (ed.) *Alfred Schutz-Aron Gurwitsch: Briefwechsel 1939—1959*. Munich: Fink.
- Luckmann, T. 1967: *The Invisible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 1972: The constitution of language in the world of everyday life. In L. Embree (ed.) *Life-World and Consciousnes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79: Phänomenologie und Soziologie. In W. M. Sprondel and R. Grathoff

- (eds.) *Alfred Schütz und die Idee des Alltags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 1980: *Lebenswelt und Gesellschaft*.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 1983: *Life-World and Social Realities*. London: Heinemann Books.
- 1995: On the intersubjective constitution of morals. In S. G. Crowell (ed.) *The Prism of the Self*. Dordrecht: Kluwer.
- and Silbermann, A. 1979: *Sprache Künst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 Merleau-Ponty, M.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 1964: *Sign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73: *The Prose of the World*.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Meyer-Drawe, K. 1996: *Menschen im Spiegel ihrer Maschinen*. Munich: Fink.
- Natanson, M. 1970a: *The Journeying Self*.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ed.) 1970b: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ed.) 1973: *Phenomen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2 vol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74: *Phenomenology, Role, and Reason*.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 1994: On seeing and being seen. In W. M. Sprondel (ed.) *Die Objektivität der Ordnungen und ihre kommunikative Konstruktion*. Frankfurt: Suhrkamp.
- 1998: *The Erotic Bir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Neill, J. 1970: *Perception, Expression, and Histor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72: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74: *Making Sense Togeth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82: *Essaying Montaign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5: *Five Bod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arsons, T. 1968: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2 vol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chutz, A.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70—1976: *Collected Papers*. 3 vol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0a: The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in Husserl. In I. Schutz (ed.) *Collected Papers*. Vol. 3.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0b: Type and eidos in Husserl's late philosophy. In I. Schutz (ed.) *Collected Papers*, Vol. 3.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0c: Som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In I. Schutz (ed.) *Collected Papers*. Vol. 3.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3: Symbol, reality and society. In M. Natanson (ed.) *Collected Papers*. Vol. 1.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4: *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 Frankfurt: Suhrkamp.
- 1976a: The stranger. In A. Brodersen (ed.) *Collected Papers*. Vol. 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6b: The homecomer. In A. Brodersen (ed.) *Collected Papers*. Vol. 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76c: The well-informed citizen. In A. Brodersen (ed.) *Collected Papers*. Vol. 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Spiegelberg, H. 1976: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2 vol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Vaitkus, S. 1990: The crisis as a bankruptcy of trust: the fiduciary attitude, human nature and eth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5, 287—298.
- 1991: *How is Society Possible?* Dordrecht: Kluwer.





第①章 第二波女性主义



T. 洛维尔

洛维尔(Terry Lovell)是英国沃里克(Warwick)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自1972年以来讲授社会学、妇女研究与文化研究。她发表的作品包括《现实的图景:政治、美学与快乐》(BFI Publications,1980),《小说的消费》(Verso,1987),以及与S. Andermahr和C. Wolkowitz合著的《女性主义理论词汇》(Edward Arnold,1977)。《词汇》一书并有简明平装版。她编有《英国女性主义思想》(Blackwell,1990)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Edward Elgar,1995)。在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和文化社会学方面她已有广泛的著述。目前她正在研究布迪厄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关系。

- 11.1 不同的女性主义、女性的差异和符号暴力
- 11.2 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霸主地位
 - 11.2-1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 11.2-2 男权制
 - 11.2-3 强迫性异性恋
 - 11.2-4 母性女性主义——新的本质主义?

11.1 不同的女性主义、女性的差异和符号暴力

在涵盖面更广的社会理论当中,女性主义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还是一块隔绝的区域?参考书这样的社会产品,可以有助于固定各门学科的界限,确立或是颠覆典范。它们属于这样的过程,所谓的“文献”(“所有已出版的书籍”)借此转化成雷蒙·威廉斯所称的“选择性传统”——即某一特定领域中的那套文献。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中的那些参考书,可以很好地表明包容与排斥的种种模式,表明画地为牢、自我隔绝的模式。当从前被排除在外或边缘化的东西得门而入,是不是也同时被隔绝,进入了一块密闭的孤立空间呢?这东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产生什么样的交换呢?在这方面,参考书的索引表现得特别明显,从征引的姓名,到涵盖的论题,皆是如此。这些索引可以揭示交流与吸收的程度。那么,女性主义对于社会理论的贡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被很好地整合了呢?读者必须自行判断。

女性主义也同样有着自身的选择性传统:典范与反典范(Stacey, 1997)。它也不乏布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即文化合法性的维护。本书序言中举出社会理论由四大块领域组成(其中有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分析),而女性主义与此三块领域皆有不同,在于它来自20世纪的重大社会运动之一。但是,妇女运动也有其包容与排斥的界限。不是所有的妇女都已经感到自己被纳入了或者说被平等地纳入了姐妹身份的诉求。

女性主义理论享有特殊地位,因为它声称所具有的知识理当在学术领域中获得认可。而种种处在草根的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主义,则始终对理论抱有相当的戒备。理论家们常常被指为精英主义,故弄玄虚,是行家里手之间的交谈,存心不让外人明白:简言之,她们被指为在行使符号暴力。女性主义的学术圈,有时候要比我们可能会相信和希望的更加近似于布迪厄所描绘的作为学术界及其他场域特点的那些实践活动(Bourdieu, 1990)。

学院里面的女性主义,就是一块享有特殊地位的场域,生产出被当作女性主义知识的东西,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学院中的女性主义学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有它的两面性。它奋力赢取自身在其间实践的那些学科与制度的认可。但是,它的社会基础依然是那些女性选民,传统上女性主义的宗旨就是要增权,增这些女性选民的权。而在学院外,在所谓“女性主义反公共领域”(Felski, 1989)中组织起来的女性主义,则是评判女性主义学术的另一种足以对应的标准。

符号暴力的第二个焦点,内在于学院女性主义思想自身,关注的是一种女性主义研究途径如何与作为对手的其他研究途径或此前的那些研究途径保持距离。区

■ 隔 (Bourdieu, 1986), 也就是学术生活中的竞争孜孜以求的东西,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将自身的立场与其他竞争对手的立场相区别而得到确保的。在此所谓的竞争对手, 有个人, 不过更多情况还是自我确定或由他方确定的学派。这种惯例有碍于差异之间的团结, 也有碍于认识到相互的受惠以及共享的问题。

在本书里, 初版中的单章已经拆成了两章。这样的分解本身就蕴含着风险, 佐证了目前对女性主义思想发展历程的惯常描述, 将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性主义与更为成熟的 90 年代变型相区别 (Gross, 1986; Weedon, 1987; Kristeva, 1989; Brown, 1991; Barrett and Phillips, 1992)。90 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涉及到社会理论中的“语言学转向”, 后者启发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这种发展趋势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加深了草根女性主义与学院女性主义之间的鸿沟。不过我希望在这两章里表明, 在这场转型当中也有一些延续之处: 90 年代的女性主义是以 70 年代的女性主义为基础的, 而困扰早期女性主义的一些难题, 尽管被后期女性主义宣称业已“巧妙解决”(用弗蕾泽的话来说, Fraser, 1997), 也依然产生着问题。

亚历山大论述当代社会理论史的著作表明, 在旧者与新者之间始终会有一种复杂纠缠的关系, 经常包含这样一条原则: “我敌人的敌人即为我的朋友”(Alexander, 1995)。他回溯了新出现的那些社会理论, 是以怎样的方式, 在一心贬损自身期望取而代之的理论时, 时常与更早些的一些研究思路挂上钩, 而此前它们对这些思路是弃之不顾的。前后相继的种种社会理论, 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方式, 并不像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那些前后相继的岩石地层。更贴切的比喻是螺旋似的回旋, 在这种形式下, 旧的永远不会一成不变地回来, 而新的也只是在有所转化的同时, 重复了前一轮回旋的许多变动趋势。伊万斯在有关当代女性主义的颇有启发的介绍中 (Evans, 1997), 不把米莉特算在自己笔下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典范当中, 因为她的作品属于一种更早的传统, 即“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传统 (Evans, 1997: 15)。事情就是这样。可是, 要将当代女性主义思想与这种传统相分离, 做出清晰的区分,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有巴什拉尔的说法, 但思想史就如正闹离婚的夫妻之间, 一刀两断的情况十分鲜见。

所谓“一刀两断”的说法, 常常包含着将一批原本相互有别的思路和立场归拢一处或是说“包裹起来”, 并且常常满怀热情地做这件事情, 在包裹的封皮上贴上单一的标签, 然后便对整个儿的内容不加理会了。在这些带着化约论色彩对“70 年代女性主义”所做的后现代描述中, 最常使用的标签便是“平权女性主义”(equal rights feminism) 或“平等女性主义”(feminism of equality): 也就是说, 这些女性主义是同质化、普遍化的, 无法处理“差异”问题。对于平等的认同被理解成力图消除差异, 创造“同一”, 用伊莉嘉瑞的话来说, 这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同一的另一方”, 即规

范性男性特质的苍白映像。[参看本书第12章第4节中伊莉嘉瑞的讨论(Irigaray, 1974)。]有关“同一化”(samings)和“他者化”(othering)的详尽精微的论述,参看朔尔的文章(收于Schor and Weed, 1994)。

这都是些严厉的指责,我们首先必须界定清楚所讨论的“差异”,才可以来看看,女性主义理论中各种不同的研究途径是如何很好地或拙劣地逐一处理这些差异的。业已困扰着整个当代女性主义社会理论的那些差异,首先是生理性别的差异和社会性别的差异;其次是鉴于实际上,女性由于其阶级、“种族”、*民族和文化的不同而散布在社会场域的各个位置,因此而产生的差异;第三,是性本性方面的差异;最后,是“差异”本身,在关于语言和认同的后结构主义论述中,它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Barrett, 1987)。

本文的余下部分以及接下来的一章,将会审视1968年之后这段时期里的女性主义社会理论,不过同时也认识到,在此所界定出的这些女性主义并非全然自成一体,独具特色,而是相互碰撞、交融及发散,只是以复杂的方式再次聚合一处。本文将集中探讨主宰我所称“社会结构论女性主义”(social structuralist feminisms)——这个词主要用在英语世界——的那些困境与论题,而所探讨的“结构”就是“男权制”和“资本主义”。而本书第12章的论述起点,则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女性主义,这期间的转型所突出表现的过渡性发展趋势。它将从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的角度出发,重点讨论结构主义留下的遗产,既包括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也包括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它还将大致介绍信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女性主义所采取过的不同形式。

20世纪的女性主义历史,包括了一系列努力,要将自身的知识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确立在认识论上赋予女性的某种特殊地位上。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Hartsock, 1983; Harding, 1987b)以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为样板,后者赋予了工人阶级的立场以特殊地位,至少在原则上如此。

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很快就发现自己左右碰壁。“工人阶级”已经证明只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社会行动者,四分五裂,缺乏任何统一协调的认同,能够产生出某种单一的“立场”,以便为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至于作为女性主义知识与实践的假设根基的所谓“女人”,情况也是这样。女性主义立场的理论层出不穷,孕育出与妇女之间存在的差异一般多的立场,催发着形形色色的“认同政治”,没有能力避免相对主义(Alcoff and Potter, 1993)。在女性主义理论开始感觉到那些反认识论性质的

* 本章作者为了凸现所谓自然天成的“生物特征”也有其社会建构的一面,在所有的“种族”(race)上都加了引号。——译者注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之前很久,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黑人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对霸权式的白人异性恋女性主义的嘲讽抨击,就已经挫败了关于一套协调统一的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规划。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是关于差异的女性主义,但是,关于差异的女性主义的出现却要早于后现代女性主义。

所以说,无论是单数的“女性”(woman)还是复数的“女性”(women),都不是内在一体的范畴。要考察 20 世纪下半叶的女性主义社会理论,重要的是一开始就搞清楚这一点。不过,或许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不同的女性范畴之间常常是一种共生性的关系。吉尔曼在一篇不负盛誉的文章里(Gilman, 1987),讨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对一位女性的执迷,当时她被称为“霍屯督的维纳斯”(Hottentot Venus),名叫芭特曼。在 19 世纪早期的英法两国,这位不幸的年轻妇女被带到沙龙和舞台上展览。尤其吸引男人目光的便是她那突耸的臀部。吉尔曼在他的文章里还分析了马奈所绘左拉笔下的娜娜,驳斥了一种观点,即所谓在 19 世纪绘画的构图里,常常会有一名黑种仆役的形象,以意指处于前台的(白种)人物那有违寻常的性本性。他问道,在马奈的娜娜像中,为什么就没有诸如此类的形象呢?他认为那种形象或许会是多余的,因为表现白种妓女娜娜的方式里,就已经把握到了想要表达的黑人性本性的特征。娜娜既展现了夸张的臀部,也展现了具有退化特征的“达尔文之耳”,而那是被归为霍屯督人的,这种人据说是“存在之巨链”上最低一等的人类。*

不过吉尔曼未能注意到,芭特曼是赤裸身体的,而娜娜却是身着衣裳。娜娜那束得紧紧的腰,更映衬出无所拘束的胸臀。这种视觉上的沙漏效果当然是那时流行时尚的作用,严格说来,当时所有的白种女人都趋从这种效果,心仪这种效果——就连工人阶级的衣着都会塑造同样的基本形象。因此,在 19 世纪的欧洲,黑种女人的性本性和白种女人的性本性,“正经体面的”和“有违寻常的”,都被拢到一起,在一套分化与同一的共同塑型中被调控。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下半期开始,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者对白人女性主义的批评,指责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犯有种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以及(将其他范畴)边缘化等错误,并且指责她们从自身的处境出发进行普遍概括和理论阐述,而不曾认识到这种处境的独特性。这些指责与女性主义者曾经对男性提出的毫无二致。西方男性主义文化是将(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混同于全体“男人”(也就是人),**同

* 霍屯督人,是第一批欧洲探险者在偏僻的非洲大陆腹地发现的南部非洲居民,其自称“科伊科伊人”(Khoikhoen)正是“人中人”的意思。——译者注

** “man”既专门地指称男人,也普遍地指称所有的人。——译者注

样,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者是将自身等同于“女人”。这样的批评此后在整个女性主义当中不断激起回响。

女性在社会上的位置多种多样,我们在文化中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这是毫无问题的,已经获得了从国际性视角进行的女性研究的认可。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研究当中,许多就是从某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写就的,这种视角关注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以及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在许多受制于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社会里,那些不符合当地原本获得的关于社会性别的理解被塑造、巩固,进入各种制度、法律条文、财产权等等,常常使得妇女丧失了古老延续下来的那些本土权利,进一步剥夺了她们的权力,从而重新安排了社会性别角色结构。有一大批作品探讨了这些重塑性别角色结构的方式,并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增长。

第一世界的文化,包括女性特质的文化,也是经由某些方式,以殖民遭遇为场所和渠道,抑或像在美国的情况中,在与奴隶制的关联中,被锻造出来的,或者至少说是被重新塑造了。我们(作为第一世界的白种中产阶级女性)已经开始学会认识到其中的一些方式,认识到“种族”的社会性别化的这种特定源泉在当代所留下的遗产。我们已经开始更自觉地意识到,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方面的各种意识形态是以哪些方式被用作殖民冒险本身的比喻和合理化说明。被殖民的男人有时会被去势,以服务于他自己的征服者。比如辛哈就描绘了孟加拉男人在英国对印度实施殖民统治期间的“非男人化”(Sinha, 1995)。

关于奴隶制,包括美国南方的奴隶制(hooks, 1981; Davis, 1981)和雅典的奴隶制(Spelman, 1990),学者们也已经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论点。男奴与女奴之间不允许保持一种像自由民与自己妻子那样的关系。已有学者指出,有鉴于此,一种普遍性的“男权制”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男奴以及其他被剥夺权力的人,所处的位置并不能确立或维持对妇女的男权制关系。

所以说,在女性主义当中广泛分辨出的那种异性恋主义男性支配的兄弟身份,绝对不包括所有的男人。彻底消解社会性别的区隔以确保妇女解放,这样的号召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者那里屡见不鲜。但是,即使社会性别的生产和表达,确实是通过拓展以生理性别为轴线而产生的种种区隔和特权,考虑一下这些去社会性别化(de-gendering)的实际情况,也许会使我们看到,一些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标志是被强行撤除的,并不一定会改善妇女的地位,倒是有可能彻底拒弃了最基本的人权与公民自由权利。

斯佩尔曼、戴维斯和胡克斯都注意到,事实上,那些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文献都缺乏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从而使人们看不到女奴和被殖民女性的特殊处境。原因即在于,用社会性别和性本性作为帝国主义统治的合理说明,就为妇

女创造出一种特别不利的处境，压制了被殖民妇女的声音，将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的介入方案转译成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话语与借喻。利德尔和乔希 (Liddle and Joshi, 1986) 就此提到了梅奥写于 1927 年的《印度的母亲》，其中对殉夫自焚 (sati) 和童婚现象的揭露，被用来将帝国主义者表现成妇女和儿童的保护者，而印度人是不胜任自我治理的。(印度的女性主义有丰富的文献讨论了殉夫自焚的意涵，既有它与帝国主义历史的关系，也有它对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活动所提出的挑战，参看 Mani, 1989; Sangari and Vaid, 1990; Loomba, 1993; Sunder Rajan, 1993)。

在今日的英国，依种族而分隔的共同体里的妇女的处境，也有着几分类似的逻辑。萨加尔 (Saghal, 1989) 审视了反种族主义和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以哪些方式结合起来压制了“共同体”内外妇女的声音，巩固了男权原教旨主义日渐增长的权力。“共同体”是一个强有力的合法化概念，对于左派和右派都是一种硬通货。但是，这些话语中所称道的那些面对面互动的小型共同体，也许正是不平等与压迫的潜在场所。一方面，是对于种种带有压迫性的社会性别关系，采取一种缺乏敏感、过于普遍化、种族中心主义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一种自鸣得意的相对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为了有利于与种族主义作斗争，可能会视而不见共同体内部对妇女的压迫。要在这令人左右为难的两方面之间作出协调，可以说困难重重。

有些形式的后现代主义，比如说罗蒂之类作者的新社群主义，在这方面无甚助益。因为它们将本地的、特定的共同体作为政治、文化与历史分析的基线，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些共同体本身也有可能被纳入支配的结构 (Rorty, 1989)。扬 (Young, 1990) 借鉴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手法，提出了一种强有力的批评，称道现代城市和“陌生人的共处” (togetherness of strangers)，而不是面对面互动的小型共同体。不过她依然与罗蒂颇多共识，或许也会赞同罗蒂的主张，即人与人之间要发展起团结，可以通过跨越差异的同情，而非来自一套一体性的跨文化学说 (Rorty, 1989)。跨越差异而形成的局部性、暂时性的联合，这样的政治活动原则上有一个前提，就是在那些各个相异的人群之间，必须要有真诚的对话，相互的交流：坚持切实地相互倾听，而不是把我们自己的解释图式强加于他人。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尤其坚持这一点，对此理当给予充分的赞赏。

在社会图谱的全球一端，我们会问：“跨国公司又属于什么共同体或社会呢？”对于大多数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都可以解读成向本地的、人际的层面的回退，支配这些理论的是有关差异与同一的问题，是哲学的话语而非社会学的话语。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覆亡以及与之共命运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覆亡，曾经充斥着我们的

“宏大叙事”的那些成问题的行动者,包括国家、社会阶级、产业集团、金融机构、军队,就和“男权制”一样退出了前台。在大多数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里,它们即使在整个构图中还有位置,也已经不再是那么突出了。有关全球的与本地的之间相互关系的这些问题,在各种全球化理论中当然占据着核心位置,但是,因为女性主义理论实质上撤出了曾在政治经济学中讨论的那些话题(Waylen, 1996),所以社会性别分析对于整体而言的全球化理论几乎没有触动,而那些参与并推动了这些争论的女性主义者,又常常不介入女性主义哲学话语的那些主导形式所关注的论题。几乎没有什么思想交流(参看第12章第7节第二部分)。

毫无疑问,关于妇女和社会性别的女性主义分析,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的情况,都必然由于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的结果而各见差异。这不仅仅是“添上”对于女性之间“种族”及其他维度上的差异的考虑,因为学者们广泛认为,社会性别、阶级和“种族”并不是各成一体、前后积累的压迫形式,社会性别就是以“种族”和阶级方面的差异为场所和渠道而构造出来的,反之亦然。吉尔曼所举的霍屯督维纳斯的例子就能看出这一点。

斯佩尔曼主张,由此可知,关于所有女性的任何普遍概括,都有可能是虚假错误的,要不就是没什么重要意义的。9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表现出不那么操心如何去界定“女性”(Battersby, 1998),同时劝告说要关注“差异”,防止过度概括。即如斯佩尔曼所指出的,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话说回来,人们也同样认识到,即使单数的“女人”和复数的“女人”,以及社会性别与性本性,都彻底被解构了,将女性主义全盘消解也是带有危险的。90年代一些“颠覆理论”的变化趋向(Barrett and Phillips, 1992)还是很有价值的,只要不把女性主义整个带向一种完全臣属于社会变迁的事业。如果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活动要维持核心的东西,同时又承认女性之间的那些根本差异,那么离心的力量与向心的力量就都很重要了。

11.2 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霸主地位

第二波中很早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立场,常常是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前面加上某种修饰语来界定,比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之类。有一个例外,就是激进女性主义,因为这个修饰词并不指向其他某一块理论领域或政治活动领域,而是助长了孤芳自赏的立场(“激进女性主义……惟独它可以声称‘未曾’受到父亲之名的玷染”,Gatens, 1996: 60)。从许多方面来看,激进女性主义同时为女性主义思潮与女权主义运动制定了规程,因此,对于任何有关第二波

女性主义的讨论,都必须由此出发。它已经指明的某些论题,是任何女性主义理论都必须讨论的,包括:性本性与性实践;同性恋与女同性恋;性暴力与性支配,包括强奸;家庭暴力;文化上普遍存在的对于女性与女性特质的歧视。

那些听任自身由其他某种东西限定的女性主义,常常会特别推重以下这些概念上的伙伴,即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妇女、社会性别或女性主义甚少留意的男性知识宗师。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推重并不适当,因此加以拒斥。激进女性主义者尤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是一种“男流理论”(malestream theory)。在诸如此类的“婚配”中,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只有一种声音,而这个声音就是马克思主义(Hartmann, 1981)。

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逐渐进入学术界,随之也变得愈益复杂和精致,招来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指责,即精英主义和蓄意的晦涩做派。而激进女性主义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则比较困难,这样的排斥倒是有助于它在更长的时间里保持自身平易浅近的风格、激进勇毅的性情。早期的激进女性主义宛如刀耕火种,这使它尤具刺激和效力,令人恭坐倾听。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萨利·亚历山大说它是“对于两性关系的一种胆大非凡的理解”(Alexander, 1984: 127)。不管怎么说,在有关思想的事情上,我们始终会是已经上手了的。没有人会从一张全新的白纸开始做理论。激进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即男权制,就有着漫长的历史。女性主义理论必须针对既有社会理论中一些最显要的支脉,将自身定位在其间。而在 70 年代早期,最重要的支脉之一便是马克思主义。当女性主义进入学界之时,正是马克思主义鼎盛之日,就某些方面而言,在社会学中取得了支配地位,而这门学科恰恰是对女性主义的介入最为开放的。科沃德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包含着对于女性主义的积极参与:“不仅是两性平等成为社会主义正式信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理论工作中,也始终有一种投入,要去理解两性之间臣属关系的各种起源与形式”(Coward, 1983: 131)。因此,女性主义理论家一开始就会向马克思主义求诸她们的概念,也并不令人奇怪。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其核心便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商品的买卖,而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因为劳动力有能力生产出超出生产力本身——在劳动之外,还有工具和原材料——所含有的价值之外的额外价值。

马克思曾经提出,直接生产者在一给定时期内向资本家出售的劳动力,会在劳动的消耗中用尽,必须在一些周期性的时段中得到补充或再生产,至于时段的长短,则有工作日、周、年乃至整个一生。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就是在这种再生产的概念中——主要是参照了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有些

女性主义者指出,在“再生产”的名目之下,社会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人类再生产或生物再生产,这些需要保持分离的东西却混为一谈,这是不可取的(Edholm, Harris, and Young, 1977)。这些形式的“再生产”,许多都是发生在马克思的理论所概括的社会生产关系之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要关注的制度并不是塑造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生理性别区分,而是家庭/家户(family / household),在其中,除了工人补充精力以恢复“耗尽”的劳动力之外,同时还进行着生物再生产、养儿育女以及儿童的初级社会化。这种“再生产”的概念使马克思主义不会只关注生产而不关注其他任何领域,为“妇女问题”的切入留出了空间。但是,正如科沃德随后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联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关性本性的问题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都被纳入家庭制度与经济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讨论,纳入家庭制度与阶级关系的维持与传承之间关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就像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样,实际上是将人类再生产与性本性放在了社会领域之外:“工人阶级的维持与再生产是甚至必然是资本再生产的一项必然条件。但是资本家可以放心地将其实现留给工人自我继续与繁衍的本能”(Marx, 1887: 572)。

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推动了人们去研究劳动过程与劳动力的社会性别化、工作与雇佣关系、家庭劳动与家户分工,但是,还是有一些极其关键的东西被忽略了,那就是关于性本性、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一套社会理论。没有这套理论,不仅会模糊家庭和人际关系中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方面的种种关系的实质,而且也会模糊工作场所以及工作本身的生理性别化——而不仅仅是社会性别化(Adkins, 1995)。

因此,人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这样描述家庭/家户,入手点是它在确保物质生活再生产当中,在阶级成员资格、阶级关系和所有权等方面的传承上,所发挥的作用。可是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家庭还是激进女性主义著作中指明的各种性压迫的场所,包括针对妇女的暴力、性支配、对于性本性的控制与管理,这些都表现为社会性别化的劳动分工,表面上来看,这种分工与资本主义的各种需要并无多少关系,或者与阶级再生产的动力机制并无多少关系。就“妇女问题”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里面的政治要务的核心便是抨击家庭与婚姻的经济基础,认为它把原本自然从而也是良性的两性关系给扭曲了。

不过话说回来,在70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受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不仅是通过对恩格斯的关注,而且还通过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重新梳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关于性行为、男性特质的行为的问题,关于性本性的控制与表达的问题,关于女性自主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受到压制的(Coward, 1983: 169)。那些希望探讨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就不得不

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胜任此项任务的理论工具。尽管阿尔都塞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议论甚少,但是,他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朝向精神分析的一种新转向,仿佛法兰克福学派早年寻求综合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一样。在 60 年代与 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往往是通过阿尔都塞来读解马克思,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又是通过拉康来读解弗洛伊德。阿尔都塞代表了一个转折点,从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各种社会理论形式,转向以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看法为基础的社会理论。“语言学转向”影响了所有的社会理论,也包括女性主义。在第 12 章,我们将再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以结构主义为中介的这种过渡。

在第二波的早期,正是激进女性主义将这些关于性本性与男性暴力的论题放到了研究议程当中。而这些论题是极少进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思考范围的。但不管怎么说,沟通这两者的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这种立场在女性主义社会史学家当中尤为普遍(Davis, 1965; Rowbotham, 1972; 1973; Walkowitz, 1980; Taylor, 1983; Alexander, 1984)。

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马克思煞费苦心地区分了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们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有关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探索上所设下的种种约束,并且漠视所谓非正统的指责,一心要通过那些保障和鼓励激进社会实验的左派乌托邦思想传统(Taylor, 1983),来探讨这些问题。妇女的地位,两性的关系,家庭生活的组织,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研究议程中都具有重要位置(至少在原则上如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并未刻意与激进女性主义保持距离,这在英国女性主义史学家罗博特姆的作品里可能看得最清楚(Rowbotham, 1972, 1973)。英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在不牺牲激进女性主义的前提下,塑造与男性左派的关联。她们主张,从女性运动中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教训,了解更为开放、更为通畅的政治组织样式(Rowbotham, Segal, and Wainwright, 1979)。

现在我打算来考察一些早期第二波女性主义理论的关键词,其中许多出自激进女性主义思潮,但也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当中流传。

11.2-1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和激进女性主义者双方都提供了一个最初的牢固基点,为英语世界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包括法语在内的许多语言里,这种区分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提供了研究对象,即女性特质的社会建构。通过女性特质的社会建构方式来说明,妇女如何在社会中确立在低

等和从属的位置上。在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当中,至少从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就已经暗含有这一区分,又由心理学家斯托勒在1968年做出了简洁概括,其确立的区分,一方面是生物学上的“既定事实”,包括染色体、外生殖器、激素水平等等(即生理性别),另一方面则是附加在这些生物差异之上的心理和文化角度上的意义(即社会性别)。

这个区分后来被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所借鉴,比如米莉特(Millett, 1971),格瑞尔(Greer, 1971),奥克利(Oakley, 1972),并很快进入奠定英语世界女性主义理论基础的概念库藏。它关联着两端,一端是妇女的生活,另一端则是生物科学的理论概括中的女性生物学,非常不利于妇女。女性的生物功能一再被用来使我们臣属性的社会地位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

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将生物差异视作给定不变的东西,对此奥克利之类的女性主义者敏锐地提出了挑战,给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生物特征并不是给定的,而是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之中形成的。因此,即便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物差异,也不能当作是普遍的或不变的。然而,在早期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那些彼此差异颇大的派别之间,也有一种普遍流传的共识,就是在生理性别的生物差异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社会性别区分更具有可塑性,更容易受到有意的社会政治干预的影响。当代的基因诱变实验已经证明,生物机体及其机能确实是可以变化的;与此同时,大多数人也相信,社会关系和文化当中建构出来的东西,更容易被重新建构。

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一样,也对生物学的侵蚀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在大多数早期女性主义思考当中,都有意贬低了生理性别之间生物差异的重要性,担心那种强大的普遍信念,即至少对女性而言,生物特征是命中注定的。也有些令人瞩目的例外,最著名的有菲尔斯通(Firestone, 1971),更叫人想不到的还有波芙娃(Beauvoir, 1949)。尽管波芙娃有一句最常被引用的说法,即“人非生为女人”,尽管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她是一位生物决定论者,但是,她的作品却连篇累牍地深入讨论了女性必不可少的生理需要,并且还带着反感。

按照斯托勒的说法,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分当中,社会性别的差异“相当独立于(生物性)生理性别的差异”。从原则上来讲,这两种性别的区分会产生一种模式,在这样的模式当中,我们或可称之为生物差异“相对常项”的东西,也就是多少可以说为所有社会共享的东西,与那些在它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巨大差异的社会性别分化体系构成鲜明对照:每一种社会秩序之间,每一种社会秩序内部,都有着不同的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其中还有其他许多差异轴线,包括“种族”与阶级,也相互交缠在一起。

人们疯狂地翻寻人类学文献,找寻各种社会的证据,其中附加在男性与女性之

上的文化意义,相当不同于西方典型的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体制和刻板模式(人们反复不断地引用玛格丽特·米德)。尽管如此,在这些早期第二波作品中,也有一种明显的趋势,要夷平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呈现出一幅单一的、一体的社会性别系统画面,好似通过一种强力胶,紧紧束缚在生物性的生理差异上,至少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是如此。“男权制”被用来概括这种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混融一体的现象。有的时候,学者们更喜欢用更为中立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sex-gender system)”来表述(Rubin, 1975)。但不管怎么说,女性主义者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在生物性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文化性的社会性别之间嵌入的这个分裂因素,使得生物决定论者的反驳成为男性支配状况的合理化证明。不过,在彼此差异甚大的各种有关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之间,普遍存在着那种令人沮丧的男性支配状况,这既推动了妇女解放的需要,也表明了生物因素必然与此有所关联。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若非如此,又何以说明男性支配的普遍盛行呢?

在女性主义内,对男权制有如此单一的一套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有些人感到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她们)不得不更严肃地考虑社会性别塑造过程的多样性,而在女性主义理论阐述中,已经在某些方面忽视了这些人群自身在社会性别上的特殊性,包括黑人女性主义者,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以及第三世界中的妇女组织,她们有时候完全拒绝接受女性主义标签(Kishwar, 1990)。在女性主义论著与政治主张里能够找到的那些关于社会性别的描述,都是从具有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特征的生活中得出的普遍概括,也就是由那些(相对)处于特权地位的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妇女所谱写的生活。在这些范畴之外的妇女,是在社会性别方面的那些建构之内尽力应对自己的生活的,而这些建构明显不能脱离“种族”、阶级或者性本性。但白人女性主义者眼里看不到这些关联,就好像看不到自己的白种特性(whiteness)一样(Dyer, 1997)。

即使是波芙娃那部开创性的著作,虽然比其后许多作品要更敏锐地注意到在妇女内部再行区分的那些阶级与“种族”方面的差异,但也未褪去它的出身的痕迹。她在书的第二部中刻画了一位“女性”的生活,此人孩提时代备受呵护,享受不到她兄弟所拥有的那种自由。只有通过婚姻,她才逃脱了父母的家,逃脱了母亲对其的“不良”影响。她的第一次性经验就发生在新婚之夜,往好里说也是疼痛不堪。此后一生的职业也就是操持家务、养儿育女了。往后的生活里,她或许会投身慈善事业,从事些志愿工作,但似乎很难进入劳力市场。在这部大著里,没有任何专章来论述妇女与工作,绝大部分篇幅都不加掩饰地以法国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处境为探讨核心。

早期妇女解放运动中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如她们所公开宣称的一样,宗

旨是彻底拆解社会性别角色,只留下以多种方式分化的身体。在此期间,皮尔西的小说《时间边界上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透过想像的景观,捕捉着对于去社会性别化的社会的想望。卢西安(Luciente),一位时间旅行者,造访了女主角康妮(Connie),一开始被后者误认为是个男人。后来康妮跟着卢西安一起做时间旅行,回到乌托邦共同体马塔博塞特(Mattapoisett),发现根本找不到社会性别的社会标尺,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当康妮参观“保育箱”后,才了解到在马塔博塞特是如何组织生育方面的社会关系与技术关系的,也看到了任何一个共同体要实现全无社会性别分化所需的一个根本前提。婴儿在这种人工的环境里完成怀孕过程,而负责它们的“哺育”(mothered)的除了生物学上的女人,也同样有生物学上的男人,他们也能哺乳。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社会性别的彻底废除似乎有一个条件,就是同时拆解了(生育意义上)生理性别方面的差异。

充满革命精神的女性主义者菲尔斯通也曾同样主张在生育的社会关系与技术关系方面来一场革命,子宫将被搁置一旁,让位于一些新技术装置,后者由共同体控制,而不只是由男人或男性支配的医学职业所控制。

在科幻小说的狂想与女性主义者构造的乌托邦之外,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极其系统地致力于分析生育方面的社会关系,不过不是单就这些关系本身来考虑,而是放在与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阶级的关系当中。不过,也有一种让人不很舒服的认识:妇女在其与男人的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当中,常常遭受暴力的压迫。在激进的女性主义思想和政治主张中,这一点属于最前台的明确关注;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这一点却是很难容纳和说明的。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什么要求,甚或是因为深陷于与身体力量更强壮的那些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妇女容易遭受侵害,这样的说法似乎太过泛泛,也未免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一种资本主义体系需要有一支有所分化的劳动力大军,那么,男女之间的结构不平等或许可以发挥良好的效应。但是,对于妇女的性支配,针对妇女的男性暴力的程度,代表的只是一种理论上未经解释的过度的东西,或可称之为“剩余压迫”(surplus oppression)。

激进女性主义者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框架的这一点缺陷,也同样指出,对于妇女的宰制与压迫要先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尽管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利用了男权制的概念,但激进女性主义者想要挑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优先考虑社会阶级分化的做法,主张存在一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更早出现、更为根本的社会支配原则,对这个概念有自己的用法。对于激进女性主义者来说,性压迫是自成一体的(sur generis)。各个男权制社会性别体制之间的相似性被大加强调,而其间的差异则被尽量抹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至少都自觉地意识到(不过在激进女性主义看来,也只不过是表面如此)那些将妇女彼此区分开的阶

级差异,而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来说,诸如此类的差异相对而言只是表层的。所有的妇女都遭受男权制这种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的压迫,只是苦难的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当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重点转向激进女性主义的关注重点,也就同时转向了绝对属于女性主义理论核心的关注重点,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所无法论及的,但此时所考虑的那些“差异”已经不再是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外的,而是深深地隐含在其中。

11.2-2 男权制

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坚持认为,社会性别的支配有其独立的存在,不能被化约为其他任何支配形式。这种主张是激进女性主义思想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但也会产生困境,无论在政治见解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如此。在激进女性主义的论著中,男权制几近无所不在。它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过程中那些重要的历史差异与文化差异有时反倒溢出了人们的视线。悖谬的是,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分,却面临着退回完完全全的生物差异的危险。在非常早期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当中,很难不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对于女人来说,事情始终就是要多糟糕就有多糟糕,并且还在越来越糟。这是一种反向的潘格罗主义。^{*}“女人”开始成为永恒的受害者的形象。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男权制概念上产生了分歧。那些利用这一概念的人,试图根据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图式,将这个概念历史化、分期化。社会学家沃尔比(Walby, 1990)试图拯救这个概念的活力,办法是细致打磨这个概念,将其改造成一种有所区分的工具,用作历史性的、跨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男权制常常被作为一个驳杂的术语,用来指男性对于女性的所有支配体制。^{**}但有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比如米切尔(Mitchell, 1974)和巴蕾特(Barrett, 1988),则宁愿维持更有限的意义:父亲对于一家之中的女人、孩子以及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其他受自己抚养的家属,所享有的那种支配。

沃尔比则选择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界定。她把男权制概括为:“男性支配、压

* 潘格罗主义(Panglossianism):即凡事乐观派。潘格罗系伏尔泰小说《天真汉》中的人物,过于乐观,相信世上万物终将臻于至善。所谓反向的潘格罗主义就是凡事悲观派。——译者注

** 可以看出,虽然“男权制”的译法古怪,并且也不能充分体现前节所述被殖民男性的处境,但它可以涵括父权制、夫权制等比较习见的称谓的意涵。——译者注

迫、剥削女性的一套社会结构与实践的体系”(Walby, 1990: 214)。不过,她又将这种体系细分成六部分组成结构:丈夫对于自己妻子劳动的剥削;雇佣劳动当中的关系;国家;男性暴力;性本性;最后是文化。作为一名称职的社会学家,她拒绝赋予生物学任何角色。男权制完全属于社会秩序。

像米莉特这样的早期理论家,将形形色色的男权制权力场所都关联在一起,聚合成一套单一的、系统的支配结构。相反,沃尔比自觉地意识到了当代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的那些批评,对上述各部分都给予了一定的自主性,宣称正是这些结构之间多种可能出现的可变组合,使得男权制这个概念具有相当的弹性,而这种弹性是避免某种非历史的普遍主义(ahistorical universalism)所必需的。她还明确指出,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寻求造成男权制的一种单一根源,因为男权制是受多种不同方式决定的,这些方式具有历史的特定性,依赖于具体的情境。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说明上的多元主义也使我们愈发地困惑,要不是至少有某种根本性的潜藏的预定因素,浩浩时空当中,如此纷繁多样的各个社会,又何以在男女之间具有一种共同的压迫性等级关系,哪怕这种关系的形式与内容可能差别甚大?如果说所有的社会性别秩序在现实状况上与发展方向上都表现为等级支配,那就需要某种说明。如果说男人之所以能够到处都大获全胜,只是多重偶然因素的结果,那这又何以可能?沃尔比煞费苦心地避免的那种生物学主义,或许正在她那套关于男权制的社会学理论的掩映之下,耐心地等候着她。

激进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某种综合并非不同寻常,在这种综合里,关注的重点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分转向了生理性别差异本身,转向了生理性别决定的身体本身的特殊性。这种发展将留待第12章讨论。不过,在结束对于男权制的考察的时候,我还要提一提佩特曼的作品(Pateman, 1988),她以一种不同于沃尔比的方式,参与了这种特定的综合。

佩特曼集中考察了欧洲现代早期的一些变迁,梅因把这概括为从“地位”到“契约”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男权制家庭中父亲的绝对权力渐成明日黄花。她考察了17世纪与18世纪早期的哲人们关于某种原初社会契约的种种说法,对这些说法进行了解构,指出其中有关订约人的生理性别常常有未经明言的隐含之义。她自己写出了据她说在这些叙事中心照不宣的神话。有关通过某种社会契约创立市民社会的故事,有助于遮掩被压制的另一个故事:订立性契约的故事。佩特曼认为,继古典时代男权制之后,是其兄弟情谊形式,在这种形式里,男人们作为男人而非作为父亲,以其兄弟身份勾结起来,赢得对于女性的性权利。契约论者掩盖了一桩事实:男人在成为父亲之前,首先得成为丈夫。原初契约并不是将个体(可以解读成男人)维系成一个众人皆兄弟的市民社会,而是一项性优先契约,确立了男性对于他们妻

子的夫权。佩特曼的神话是一则恐怖故事,比照弗洛伊德说的儿子们对父亲集体犯下的弑父罪行的故事,是父亲对母亲的强奸,通过这样的强奸,他成为日后杀死自己儿子的父亲。她声称,性的暴力侵犯是兄弟情谊形式的男权制隐而不彰的创建神话。

佩特曼对于现代市民社会中兄弟情谊形式的男权制的说法,与同性恋女性主义的“强迫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概念取得了谋合。佩特曼引到了鲁宾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Rubin, 1975),但只是拒绝鲁宾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的术语代替男权制的做法。不过在其他方面,她的主张与鲁宾非常相近。因为鲁宾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有关妇女交易的研究(Lévi-Strauss, 1969),主张在列维—斯特劳斯和弗洛伊德那里看到的关于乱伦的普遍禁忌背后,还潜藏着关于同性恋的一种更根本的禁律,它是优先考虑的,隐而不彰的,或者不言自明的。

11.2-3 强迫异性恋

因此,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与性本性有着密切的关联。究其核心,便是异性恋的社会制度。不久以前,社会学还几乎不曾涉及性本性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性本性成了社会学话语中一项成熟的论题,但在它感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之前,关于性本性的社会学就如同身体社会学一样属于稀缺商品,原因如出一辙。科沃德已经指出,这是因为在社会学的典范当中,性本性被不言自明地归入自然,因此,也就属于生物学,或者最多属于社会心理学,而不是属于适合社会学分析的决定因素。物质身体及其性本性离自然太近了,让人不舒服,最好别去沾惹这些东西,最好把它们留给生物学。

哈拉维对进化生物学史的解构表明,这种忽略可能更为复杂,由多种因素决定,是社会理论与生物科学在这方面的共谋所致(Haraway, 1991)。她回溯了长期以来框定了两门学科的主导范式的那些共同假设,也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那些假设。尽管社会学热诚地捍卫社会范畴的自主性,不懈地驱除生物学对其领地的任何侵入,但在社会学对于妇女和性的沉默当中,却是其对立学科就这些问题做出的假设在不受限制、不受挑战地流通。如果说在社会学话语里不曾论及男性支配,那么在进化生物学的话语里,男性支配的东西可谓是充耳不闻了。

早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相当关注性本性和性实践的问题,而首先关注的主要就是异性恋的问题。在那些早期的岁月里,许多异性恋女性主义者是在是否承认同性恋的性本性与女性主义有所关联的问题上犹疑不决。而反女性主义的男男女女感受到了女性主义兴起所造成的威胁,也反指女性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女人”。女性

特质的要害,就在于“真正的女人”装扮得美丽典雅,让自己对男人有吸引力。我们已经放弃了这样的追求,因为我们无法达到理想标准。我们是一群腰腹臃肿、腿毛粗重的女同性恋(Allen,1982)。

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挑战,最强烈的声音来自于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内部。“激进女同性恋者”(“Radicalesbian”, Koedt, Levine, and Rappone, 1973)书写并颂扬了“认同为女人的女人”(woman-identified woman)。柯特利用了性学家的研究,尤其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驳斥了阴道性高潮的神话。女性的性快乐只需依靠对阴蒂的充分刺激。而阴茎则是多余的。在女人爱女人的道路上,只有意识形态和心理上的障碍。性偏好是可以选择的,而一个合格的女性主义者当然就会更喜欢去爱女人。

性本性的政治迅速成为女性主义会议上的首要议程,并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冲突。英国每年都要举办有关会议,但在1978年的伯明翰年会上,就这项议题爆发了激烈的对峙,此后,这项例会戛然而止。利兹革命女性主义小组(The 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1979年在《幕后势力》(Wires)上发布了一份文件,控诉了同性恋,说明为什么女性主义者必须摒弃它,招来了一些激烈的回应(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s, 1981)。

法国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维蒂希认为,女同性恋已经驳倒了“女人”这个范畴本身,因为“女人”只能是在与“男人”的关系当中来界定的。在维蒂希(Wittig, 1981: 20)看来,正是同性恋的制度确立了男人与女人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区分。

女同性恋是我知道惟一超越男人的各个范畴的概念……因为使一个女人成其为女人的,正是与男人之间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女同性恋者通过拒绝成为异性恋或保持异性恋而摆脱了这种关系。

后来人们所知的“政治女同性恋主义”(political lesbianism),有强烈的分裂倾向和好斗精神,将早期女性主义带有霸权色彩的社会建构论调推进到了极致,直至与唯意愿论融为一体。女同性恋的身份认同被重新塑造,成为一种体现政治选择的行为。

11.2-4 母性女性主义:新的本质主义?

对于同性恋女性主义最具影响力的贡献之一,出现在美国诗人里什的一篇散文当中(Rich, 1980)。在里什笔下,成问题的不是同性恋,而是异性恋。她提出,异性恋是一种社会制度,由一大堆令人畏惧的社会约制所维持,这些约制中既有正面的

■ 约制,也有负面的约制。如果说面对如此强大的异议,女同性恋的性本性依然顽强凸显,那就可以说,它以很强的说服力,表现了某种更为有力的潮流,以对抗这种登峰造极的强制力。女同性恋主义被精致但悖谬地表现为对于女人来说更“自然”的选择,而异性恋倒成了强大的约束所造成的非自然的后果。

里什将自己关于女同性恋欲望的理论建立在对象关系精神分析 (object relations psychoanalysis) 的基础上。产生女同性恋的不是某种特殊的生物怪癖,而是一桩几近普遍的事实,即女童也好,男童也罢,都是“女人生”、女人养的 (Rich, 1977)。正如弗洛伊德本人在其晚期著作中开始认识到的那样,(几乎)每一个婴儿,最初的、最投入感情的爱恋对象,都是一个女人。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强制作用之下,小女孩开始完全拒绝这最初的爱恋对象,转向父亲 / 男人那里寻求拙劣的替代。对于这个问题,精神分析从未给出过令人满意的回答。

里什的理论也面临一些困境,尤其是它使男同性恋变得无法解释。但是,它也促成了将女同性恋的性本性,尤其是女同性恋的母爱,置于女性主义的中心。尽管里什的强迫性异性恋概念使她与佩特曼和巴特勒站到了一方,但她针对养育制度与体验的相关研究却使她站到了完全不同的一个阵营里:包括乔多萝 (Chodorow, 1978)、迪娜斯坦 (Dinnerstein, 1977)、吉利根 (Gilligan, 1982),在某些方面,至少也与伊莉嘉瑞 (Irigaray, 1974) 的作品及其大力推动奠立的肉体女性主义 (corporeal feminism, 参看第 12 章) 立场一致。

母性女性主义不同于第二波最初十年左右的那种带有霸权色彩的社会建构论,而是一种建立在生理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女性主义,重视并凸显妇女及其身体的独特性。在当代有关女性而非女性特质的女性主义当中,普遍出现了重新评价的趋势,里什的作品为此做出了贡献。这种总体趋势已经被贴上了多种不同的标签,如“母性女性主义”或“文化女性主义”:之所以有前者的称法,是因为在这派女性主义思想里,养儿育女与为人之母都被赋予了核心的位置;而之所以有后者的称法,则是因为所设定的是一种女人的文化,与可归入男权制的支配性的女性特质文化截然相对。依据里什有关制度与体验的区分,可以把女人的文化理解成围绕着女人独有的共同体验塑造而成,而这些共同体验由于通过了包括异性恋制度在内的各项男权制制度的中介,已经被歪曲和异化了。

乔多萝也借鉴了对象关系精神分析,来说明女童对母亲的欲望的再生产。所谓的“对象”就是在婴儿的世界里四处活动的那些家庭成员,正是在与这些“对象”的关系当中,女童开始形成自己的主体性和性认同。乔多萝非常强调男婴与女婴之间与其最重要对象即母亲之间的关系的失衡,因为事实上,女婴共享了母亲的生理性别,而男婴则没有。

乔多萝似乎比法国后拉康主义女性主义者更容易遭到这样的异议：她将自己要说明的东西当作了事前的假设，也就是孩童生理性别化的主体认同。但是，乔多萝在对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研究兴趣中，关注的是某种关系而非某种婴儿状态。在这种关系中，对于关系的一方即母亲来说，生理性别分化体现得非常明显。乔多萝十分注重母亲的态度与举止在确定男婴与女婴很早期即有所分化的体验中的重要作用。正是这种母亲的姿态，为日后随生理性别不同而分化的自我奠定了基础，而不只是生物性的生理性别差异本身。生理性别差异的效果由于受到母亲的中介作用，可能会在幼儿知道什么是生理性别之前很早就被感受和表达了，也就是说，意识到有两种生理性别，或者说生理性别的身份认同可能意味着什么。

根据乔多萝的说法，母亲一般是认同她们的女儿，发现很难允许女儿们完全脱离自己。与此相反，她们和自己的儿子之间有一种“心力依附”(anaclitic)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对他们另眼相待，因此，也让他们脱离自己生活。一旦基于生理性别而分化的认同得以实现(诚然，对于这种认同——这种主体定位——是如何形成的，乔多萝未置一辞)，这种差别就更是加大了。因为事实上，女孩对于她母亲身上体现出来的何谓女性特质，有一种呈现出来的、很容易把握到的具体模型。而对于小男孩来说，自己生理性别的社会意义充满了更多的神秘，因为他父亲的男性特质是在家庭领域之外施行的，至少在重要的方面是这样。所以说，与女性主义者中的拉康主义者的主张相反，特别难以实现的并不是女性特质，而是男性特质。不过，男孩至少学会了一点：要想成为一个男人，他肯定就不能像个女人一样。因此，他有强烈的动力要脱离自己母亲，而他自己也乐于认识到自己的不同之处与自主地位，从而加剧了这种动力。他的姐妹还将被锁定在与其母亲/他者(mother/other)之间的融合关系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伴其一生。这也说明了女孩渴望成为母亲之欲望的再生产：在她与自己孩子的关系当中再生产出早期的融合体验。

人们已经批评乔多萝不仅将基于生理性别的身份认同视作给定的东西，而且将异性恋也当成给定的东西。她所提出的是一种关于社会性别的心理社会学说，告诉我们通过母亲养育的过程实现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继替。但不管怎么说，她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性恋女性主义中已经有一派借用了乔多萝的对象关系女性主义(Ryan, 1983)，这派思想就像里什的理论一样，将女同性恋的爱奠立在女孩最初的爱恋关系的基础上。里什自己则批评乔多萝未能领悟到自己关于母亲养育过程之再生产所具有的逻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在这里成为问题的并不是对于女孩和女人的同性之爱，而是异性之爱(Rich, 1980)。

吉利根关于道德推理方面的社会性别差异的新颖论著，也是建立在乔多萝对于母亲养育的阐述基础上的(Gilligan, 1982)。吉利根明确区分了两类道德推理：第

一类的核心概念是权利、义务、正义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抽象概念，而第二类的核心概念则是关系性、情境性的，关注的是会带来什么后果。吉利根主张，这些往往分别体现在男孩和女孩身上的差异，是与男孩女孩分化了的对于养育过程的经验分不开的。按照乔多萝的描述，这种分化了的对于养育过程的经验会在男孩与女孩身上分别产生抽象的与关系性的道德推理形式。

也有学者以非常类似于吉利根的方式，独立描述了非洲的文化。比如说，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sm）的倡导者阿桑特就断言，“在非洲习惯法中，法律的首要考虑并非罪行的成立与否，而是共同体如何恢复平衡从而是和平”（Asante, 1987: 65）。这个例子所体现出来的概念，更切近于吉利根归于女性的“关系性思维”，而不是她认为属于男性特点的正义这种抽象概念。正如哈丁所指出的那样，这里就凸显出一种令人熟悉的双重约束。从逻辑上来讲，我们无法将这些特征指派到女性和非洲人身上，因为这些范畴并不是互不兼容的。如果说有哪一种概括抑或是两种概括都切近于现实，那么它想必是涉及别的某种东西，而不光是生理性别上的差异（Harding, 1987a）。

还有学者基于别的理由对乔多萝提出了批评。任何女性主义的学说，只要是基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基于单数或复数的“女人”的特殊性，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即如何同时保持在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的框架内，比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所彰显的阶级方面的差异，以及“种族”方面的差异。斯佩尔曼就是基于这些理由，对乔多萝提出了全面的批评，因为后者优先考虑了生理性别 / 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而忽视了“种族”方面的差异。斯佩尔曼主张，即便是在分析上，我们也不能单独谈社会性别而脱离“种族”（以及脱离阶级，虽然对于这个角度的差异她自己也没说什么），因为即使是在同一个“种族”和阶级背景中来考察婴儿的社会性别塑成过程，其他这些差异也并非不在社会性别的社会形塑过程当中留下任何痕迹：

我们是不是要假定，他（黑人男孩）的男人属性，会被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的姐妹、他自己乃至于其他任何人视为可以与他的黑人属性（Blackness）相脱离？（Spelman, 1990: 99）

文化女性主义与母性女性主义都已经被指责为本质主义而备受困扰，而本质主义这样的指责正是当代女性主义学说挥之不去的忧惧（Segal, 1987）。往窄里说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往宽里说是所有的社会建构论者，都深深地怀疑过去的做法是试图要将妇女所谓的道德特征与社会特征和她们的身体、身体机能与体验

联系起来,哪怕这些都受到心理过程的中介作用。在其批评者看来,“心理本质主义”(Wilson, 1981)即便比生物本质主义有所进步,也好不到哪里去。里什、乔多萝、吉利根、迪娜斯坦以及她们的盟友们的论著,都给人一种奇异的似曾相识的感觉(déjà vu)。在“女性文化”中得到颂扬的那些特征,看起来也非常类似于那些传统上归之于女人的特征,虽说当然是做了重新评价的。

早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尤其是激进女性主义,始终有上面提到的这种倾向,就是沦为生物本质主义或心理本质主义。我们在有关母性女性主义的简短评述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正如塞加尔所言(Segal, 1987),在有关男性性本性和男性暴力的讨论当中,这种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在讨论男人的女性主义论著里,社会建构论远不是那么明显。在指明男权制和男权权力的种种武器的时候,尤其是在提请人们注意男人针对女人的暴力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倾向是从社会性的男人转向生物性的男人,以至于宣泄暴力的冲动逐渐像是男人的一种本质属性,而不是一种具有社会偶变性的属性或习得行为。尽管如此,激进女性主义在这一点上也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上一样,必须说是处理了这个问题,并且是态度明确。在早期第二波女性主义产生的种种分支派别里面,对男性性本性与男性暴力讨论最少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而着墨最多的正是激进女性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都没有能发展出一些概念工具,可以用来推出关于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说明。

我现在要回过头来谈谈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对立,尤其是谈谈鲁宾关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的那篇影响深远的论文(Rubin, 1975),以此结束这篇文章,并且指明本章与接下来的第12章之间的关联。

早期第二波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主张,生理性别是由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荷尔蒙、生殖器官等决定的,而社会性别,或者说社会与文化赋予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那些意义,则是在社会互动中并通过文化的决定机制获得的,而不是由生理性别所产生的。因此,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始终有可能出现不相适配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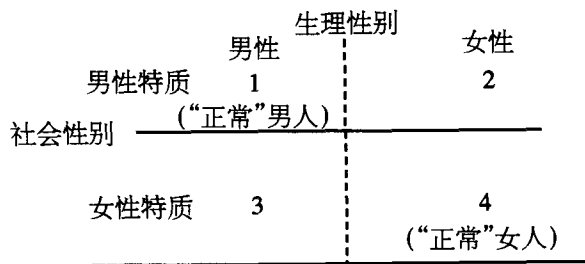


图 11.1

现在我想暂且停一下，以便指出这种双重二元对立已经产生的很大的复杂性。巴特勒 (Judith Butler, 1990) 弄出了一个术语叫异性恋范型 (heterosexual matrix), 而维蒂希主张女同性恋者算不上一个女人, 因为她摆脱了异性恋制度内的界定 (参本章前文第 2 节第 4 小节)。这两位在这这么做的时候, 都引入了第三个方面: 性本性。实际上, 关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的探讨始终假定, 这种区分的背景就是性本性的背景。但是, 即使当我们依然留在鲁宾 1975 年研究时所遵循的那种结构主义二元论中, 这第三个方面也会使所产生的区分数量翻番。

		生理性别		
		男性性本性		女性性本性
		异性恋	男同性恋	异性恋 女同性恋
男性特质	1	2	3	4
社会性别				
女性特质	5	6	7	8

图 11.2

为了表明我们的分析范畴的复杂性水平原则上可以无限扩展, 我还想再加入一点考虑, 就是当我们打破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本性各自的二元对立, 认识到这三个范畴都可以再从**多于两类**的角度来思考, 看看会出现什么结果。比如说, 对于“什么(生理)性别?”的问题, “自然”有时候会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以至于只能得出这样的答案: “或此或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Epstein and Straub, 1991), 时至今日, 承认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本性皆多于两种可能已是寻常之见了。

如果承认剩下各轴——包括性本性与社会性别——存在三种乃至更多类别, 还会产生更多的范畴, 读者们自己也可以铺排出来。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及其产物酷儿理论里, 倡扬的正是这种潜在的多元主义: 多种可能性混融一处, 喧嚷狂欢, 其间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本性都不再以整体的、固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在生物性的生理性别偏向基础上形成的严格认同之间游移跨越, 这样的可能性被人们愉快地享受着。而多元主义的后现代形式的对立面即是“男权制”, 它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本性之间的某种对应缝合在一起, 使得种种的束缚都表现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所谓异性恋范型就是这个意思。有两种可能性, 也只有两种可能性, 被接受为正常的、恰当的, 这两种可能性就是合乎习俗的异性恋配对中的伙伴双方。换言之, 异性恋范型与男权制这两个术语, 是被用

来描述一种社会建构,从我们的第三幅图所揭示的丰富的可能性当中,接受一对也只接受一对作为规范,而其他所有的都属于偏离,令人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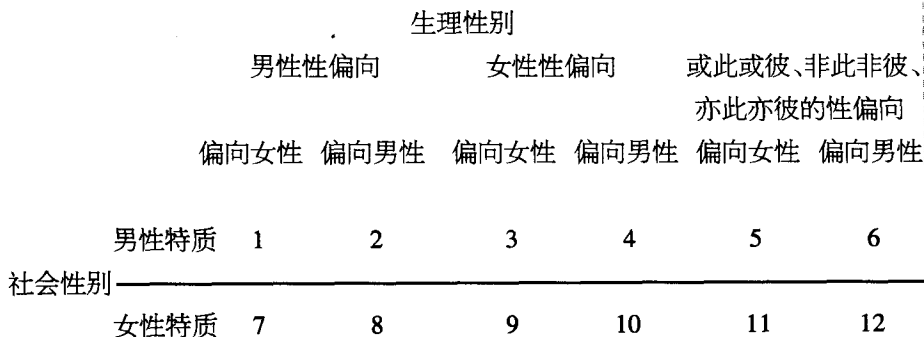


图 11.3

尽管“酷儿理论”在女性主义内部引发了许多争议,但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是如何从那里(也就是社会建构论者关于男权制的分析)走向酷儿理论的,也就是说,是如何从那些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学说走向后现代的流动性的。所有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都致力于拆解异性恋男权制的束缚。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宗旨表现为针对基于社会性别的分化的解构。其效果可想而知。当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被系统地拆解或解构,就像在酷儿理论中那样,那么生物性的身体就开始“不再要紧”,即如乔多萝所称(Chodorow, 1985):

我们无法得知,在一个没有社会性别的世界里,或者在一个不是通过生理性别组织起来的世界里,孩子们将会如何理解它们的身体,将会发展出哪一种对于社会性别认同的性别结构化过程。但是,对于生物性的生理性别差异,或者对于不同的性本性,也不一定就明显有重大后果。还可能会有形形色色的生理性别组织、认同和实践,甚至还可能有形形色色的社会性别本身。身体还将是身体……但是,特定的身体属性将不一定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所是,我们之所为,决定着别人如何理解我们,而谁又将是我们的性伴侣。

有些女性主义者既欢迎解构社会性别差异,也欢迎解构生理性别差异。这种解构的快乐已经明显体现在许多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论著里(关于70年代早期激进女性主义者的一些宣言,参看 Koedt, Levine, and Rappone, 1973)。包括后结构主义者伊莉嘉瑞在内的其他女性主义者,则采取了一条迥然不同的思路,不过在基于女性

身体之特殊性的早期激进女性主义那里,已经预示了这条思路。我将在第 12 章探讨关于生理性别差异的女性主义中已经强调的这些问题。但在某些形式的后现代主义解构里,这些问题已经丧失了它们的对象,即特别的**女性的**身体(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肉体女性主义”截然相反)。因此,种种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中出现的这些分野,在 70 年代的女性主义论著里已经有所预示了。

不过话说回来,值得指出的是,鲁宾要想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一并消除,就只能忽略自己讨论的出发点,即具有再生产能力的女性身体的社会需求。在 1975 年,除了拉康的精神分析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她还浸淫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范式里,也利用这种范式,创造了被称为“双重体制理论”(dual systems theory)的女性主义形式。在结构主义之前,就有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而在双重体制的思想里,就可以察觉到功能主义者主张的痕迹。鲁宾的文章开篇即认识到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的社会需求,通过婴幼儿时期的心理过程,将生理性别差异的生物给定因素,传输到亲属关系之类的社会文化形式中,是这些形式组织了生产与再生产中的生理性别分工。尽管如此,当她在文章中得出结论时,却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出发点。

米切爾在《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中的主张,也突出地表现了同样的忘性。米切爾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说法,用阴茎 / 婴儿的移置作用来说明对于母亲的欲望,但她也同时预见了“逐渐消失”的过程,也就是对性本性的调控逐渐消失,对家庭的调控逐渐消失。按生理性别分化的主体性的获得所通过的那些心理戏剧,原本是在核心家庭的框架内进行的,而米切爾主张,在现代社会,核心家庭已经过时,乱伦禁忌也是一样。可是,她从未谈及什么可以取代弗洛伊德指出的那种机制,来负责后资本主义和后男权制的社会里对于母亲的欲望的再生产。

只要人类再生产还是惯常地通过现有的生理性别分工来实现,那么我们就无法知道该如何来回答乔多萝的问题,即在一个没有社会性别的世界里,孩子们将如何来理解自己的身体。这是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可以不按照其新成员的生理性别来对它们进行分类,以此赋予这些生理性别上的差异以社会意义,或者说将这些差异社会性别化。尽管要支持严格两分的社会性别体系,两种生理性别之间的生物性差异不一定需要非常大,当然也不一定非得用后者来支持前者,但我们还是很难想像,不管是在哪一个持续运转、充满生机的社会秩序里,能够在怎样的具体情况之下,完全不考虑生理性别的差异作为其成员分类的基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至少可以想像出这样一些社会组织机制,以不那么严格的方式,以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本性为轴线来加以组织。皮尔西的《时间边界上的女人》就是这样的一

种想像,而在另一块不同的领域里,可以说菲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也是如此。这两本书都预想了社会激烈转型的图景,其中的社会性别已经不再重要,而受生理性别决定的身体也“不再要紧”。它们都以生育方面的技术与社会关系的革命为基础。我们应该重视这些想像,因为它们具有女性主义无法忽视的重要意涵。由于缺乏生育方式方面的革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所有社会都将面对的生育方面的社会前提都能够得到满足,生理性别还将是社会中的重要差异标尺。但是,女性主义对于新的生育技术的反应并不像菲尔斯通那样乐观。我们无法既解构了社会性别,还不用面对这些关于人类生育及其相关的生理性别分工方面的问题。

由于缺乏生育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这样一场革命,异性恋的惯例尽管已经不一定是制度化的或舍我其谁的,但还有可能继续下去。当然,从原则上来讲,可以想像捐赠精子或宫外孕成为完成生育的惯常方式。这正是科幻小说的素材,是对于包括克隆在内的新生育技术的道德恐慌的由来。但是,如果想要支撑诸如如此的惯常做法,并且其方式要有利于女性,就还需要有相应的一些变革。实际上,女性主义者的设想过于激进了,菲尔斯通和皮尔西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绝大多数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社会对于生育的强制要求想必都意味着,对于大部分人口来说,无论其有着怎样的性偏向,异性恋的惯例就是强制性的。是婴儿们使这个世界持续流转。我们都需要婴儿,尽管我们并不都需要或想要生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婴儿。如果社会想要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就必须拥有社会学家所谓的“新成员”。不仅如此,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地方所面临的具体环境下,作为个体的女性,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当中的女性,都有着同样急切的需要想自己生孩子。

这一点非常明确地体现在布伦娜和拉马斯的研究中(Brenner and Ramas, 1984),其中分析了约束着19世纪欧美工人阶级家庭的那些她们称之为“生物性急切需求”(biological exigencies)的东西。她们提出了一种我相信是无法回答的说法,就是对于作为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家庭特征的生理性别分工,不存在其他任何有生命力的替代途径。个人的性偏好如何实际上无关紧要。她们也承认,作为整体的女性所面临的后果相当黯淡。但是,对于作为个体的男男女女来说,不组建一个异性恋的家户,不养儿育女,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时至今日,对于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讲,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在现代西方社会里,没有哪一个特定的个体男女需要以类似于布伦娜和拉马斯所描述的那种方式拥有孩子。因此,尽管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依然需要有足够多的妇女来生育足够多的孩子,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在全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是我们当中一小群地位特殊的人,而且大量的男男女女也都有权自由地放纵我们自己的性偏好,

将性本性与生育保持相当的距离，要么是发展出一些不带生育后果的同性间或跨性间*性交的形式，要么即使我们选择异性性交也采取避孕措施。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生下来是不是具有一副有授精能力或怀孕能力的身体，这一点也还将继续作为给社会的“新成员”分类的标准之一：这些“新成员”如洛克所言，就像那些“初次来到一个对其毫无所知的奇异国度的旅行者”。

这一点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凯勒说得很明确：

无论好坏，有一个生死攸关的(vital)过程已经证明相当重要，足以迫使整个历史和所有文化中的各色人等将一些身体与另一些身体区分开来：我指的当然是能够生产出新生命的那个生死攸关的过程。(Keller, 1989:36)

矛盾的是，如果说异性恋的确像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基因上是正常的、自然的、受生物因素决定的，那么它原本也无需强制。因此，里什正确地指明了那些制约着——或许实际上是生产出——强迫异性恋的社会强制。如果说异性相吸是自然的，那么原本无需如此悉心地培育，而对于男女同性恋这样的性本性也该不会有多少关注了(无论如何，在这方面你啥也干不成)。

因此，总而言之，早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引出了三项彼此相关联的任务：

1. 我们如何能够承认两种生理性别之间的差异，但不把生理性别理解成一种根本的差异，其重要性高于阶级、“种族”和性本性等方面的其他差异？
2. 如果说目前生理性别的差异与社会性别的差异都是不可根除的，我们又如何能够维持这样的差异，而不产生通常伴之而来的那些权力和支配方面的等级秩序？
3. 最后，我们如何能够确定性本性方面的那些社会组织过程与更广泛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之间，那些有着历史特定性和文化特定性的关联方式——这两方面之间的关联正是鲁宾在其文章行将结束时提出的设想？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来自 70 年代女性主义的问题，已经被继续带入了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更为新近的第二波女性主义。

* 原文为“Cross - sex encounters”，指兼同性性交与异性性交的“杂交”形式。——译者注

参考文献

- Adkins, L. 1995: *Gendered Work: Sexuality, Family and Labour Market*.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Alcoff, L. and Potter, E. (eds.) 1993: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Alexander, J. 1995: Modern, anti, post and neo. *New Left Review*, 210, 63—101.
- Alexander, S. 1984: Women, class and sexual differences in the 1830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writing of a feminist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
- Allen, H. 1982: Political lesbianism and feminism—a space for sexual politics? *m/f*, 7, 15—34.
- Asante, M. K. 1987: *The Afrocentric Idea*. Philadelphia: Temple Press.
- Barrett, M. 1987: The concept of difference. *Feminist Review*, 26, 36—39.
- 1988 (1980):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London: Verso.
- and Phillips, A. (eds.) 1992: *Destabilizing Theory*. Oxford: Polity Press.
- Battersby, C. 1998: *Phenomenal Woman: Feminist Metaphysics and the Pattern of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auvoir, S. de 1949 (1988): *The Second Sex*. Trans. and ed. H. M. Parshley. London: Picador.
- Bourdieu, P. 1986: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 1990: *Homo Academicu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renner, J. and Ramas, M. 1984: Rethinking women's oppression. *New Left Review*, 144, 33—71.
- Brown, W. 1991: Feminist hesitations, postmodern exposures.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3(1), 64—84.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hodorow, N.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5: Gender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 in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In Eisenstein and Jardine (1985).

- Coward, R. 1983: *Patriarchal Precedent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Davis, A. 1981: *Women, Race and Class*. London: Women's Press.
- Davis, N. Z. 1965: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nnerstein, D. 1977: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Colophon.
- Dyer, R. 1997: *Whit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Edholm, E., Harris, O., and Young, K. 1977: Conceptualizing women.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9 and 10.
- Eisenstein, H. and Jardine, A. (eds.) 1985: *The Future of Differenc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Epstein, J. and Straub, K. (eds.) 1991: *Body Guar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Evans, M. 1997: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elski, R. 1989: *Beyond Feminist Aesthe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irestone, S. 1971: *The Dialectic of Sex*. London: Women's Press.
- Fraser, N. 1997: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Gatens, M. 1996: *Imaginary Bodies: Ethics, Power and Corporeal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man, S. L. 1987: Black bodies, white bodies: towards an iconography of female sexuality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rt,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In H. L. Gates Jr (ed.)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eer, G. 1971: *The Female Eunuch*. London: Paladin.
- Gross, E. 1986: What is Feminist Theory? In C. Pateman and E. Gross (eds.) *Feminist Challeng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Haraway, D. J. 1991: *Symians, Cyborgs, and Women*.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Harding, S. 1987a: The curious coincidence of feminine and African moralities. In E.

- E. Kittay and D. T. Meters (eds.) *Women and Moral Theory*. Totowa, NJ: Rowman Allanheld.
- 1987b: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artmann, H. 1981: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L. Sarge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Hartsock, N. 1983: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 Harding and M.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Reidel.
- hooks, b. 1981: *Ain't I a Woma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Irigaray, L. 1974 (1985):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Trans. G. C. Gill.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ller, E. F. 1989: Holding the center of feminist theor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2(3), 313—318.
- Kishwar, M. 1990: Why I do not call myself a feminist. *Manushi*, 61, 2—6.
- Koedt, A., Levine, E., and Rappone, A. (eds.) 1973. *Radical Feminism*. New York: Quadrangle.
- Kristeva, J. 1989 (first published 1981): Women's time. In Kristeva, J. 1986: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 Moi. Oxford: Blackwell.
- 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s 1981 (1979): *Love Your Enemy?* London: Onlywomen Press.
- Lévi-Strauss, C. 196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Trans. J. H. Bell et al., Ed. R. Needham. 2nd edn.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 Liddle, J. and Joshi, R. 1986: *Daughters of Independence*. London: Zed Books.
- Lomba, A. 1993: Dead women tell no tale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6, 390—402.
- Mani, L. 1989: Contentious traditions: the debate on sati in colonial India. In Sangari, K. and Vaid. S. (eds.)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Indian Colonial History*. Delhi: Kalifor Women, 392—415.
- Marx, K. 1887 (1970): *Capital*, Vol. 1. Trans. S. Moore and E. Aveling.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Millett, K. 1971: *Sexual Politics*. London: Hart-Davis.
- Mitchell, J. 1966 (1984):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In her Women Revolution: Essays in Feminism,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Virago.
- 1974: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London: Allen Lane.
- Oakley, A. 1972: *Sex, Gender and Society*. London: Temple-Smith.
-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Oxford: Polity Press.
- Rich, A. 1977: *Of Woman Born*. London: Virago.
- 1980 (1984):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London: Only-women Press. Also in A. Snitow, C. Stansell, and S. Thompson (eds.)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London: Virago.
- Richardson, D. and Robinson, V. (eds.) 1997: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2nd edn. Basingstoke: Macmillan.
- Rorty, R.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wbotham, S. 1972: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London: Allen Lane.
- 1973: *Women's Consciousness, Men's Wor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 , Segal, L., and Wainwright, H. (eds.) 1979: *Beyond the Fragments: Feminism and the Making of Socialism*. Newcastle Socialist Centre and Islington Community Press.
-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 R.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Ryan, J. 1983: Psychoanalysis and women loving women. In Cartledge, S. and Ryan, J. (eds.) *Sex and Love*. London: Women's Press.
- Saghal, G. 1989: Fundamentalism and the multi-cultural fallacy. In Southall Black Sisters (eds.) *Against the Grain*. London: Southall Black Sisters.
- Sangari, K. and Vaid, S. (eds.) 1990: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Indian Colonial History*. Delhi: Kali for Women.
- Schor, N. 1994: This essentialism which is not one. In N. Schor and E. Weed (ed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egal, L. 1987: *Is the Future Female? Troubled 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Feminism*.

- London: Virago.
- Sinha, M. 1995: *Colonial Masculinity: 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Spelman, E. V. 1990: *Inessential Woman*. London: Women's Press.
- Stacey, J. 1997: Feminist Theory: Capital F, Capital T. In Richardson and Robinson (1997).
- Sunder Rajan, R. 1993: *Real and Imagined Women: Gend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Taylor, B. 1983: *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Soc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Virago.
- Walby, S. 1989: Theorizing patriarchy. *Sociology*, 23(2), 213—234.
- 1990: *Theorizing Patriarchy*. Oxford: Blackwell.
- Walkowitz, J. 1980: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 Women, Clas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ylen, G. 1996: *Gender in Third World Politic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Weedon, C.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Wilson, E. 1981 (1986): Psychoanalysis: psychic law and order? *Feminist Review*, 8, 63—78. Reprinted in E. Wilson, with A. Weir, *Hidden Agendas*. London: Tavistock.
- Wittig, M. 1981 (1992): *One is not born a woman*. In *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arvester-Wheatsheaf.
- Young, I.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第 12 章

已转型的女性主义?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T. 洛维尔

- 12.1 后现代性:何谓、何时、何处?
- 12.2 阿尔都塞、拉康和结构主义阶段
- 12.3 后拉康法国女性主义
- 12.4 欲望系统:伊莉嘉瑞
- 12.5 物质论女性主义和抑郁的主体:身体的物质
- 12.6 肉体女性主义
- 12.7 一种新的女性主义政治?
 - 12.7-1 身体政治
 - 12.7-2 女性主义政治理论

12.1 后现代性:何谓、何时、何处?

雷蒙·威廉斯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讲演中如此问道:“何时算得上现代主义?”(Williams, 1989;在其去世之后,由英格利斯根据笔记重新编排)。这篇演讲的日期本身就表明,雷蒙·威廉斯是想间接地批评“后现代性”的概念。他把“现代”说成是一种“选择性传统”,声称“在现代主义成为典范之后,……开始有了这样的假定:既然现在是现代主义,那么在这个特定的阶段或时期,就没有任何超越于它的东西”(Williams, 1989:51)。

围绕着“现代”这个观念,有一大堆的术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美学领域中流通。史学充满自信地谈论着“现代早期”,并且这显然不仅指一个时代,而且指一个地区,也就是欧洲。社会科学家则谈论作为一项规划和一套理论的“现代化”,将各个社会按照一条或数条发展轨迹顺次排列,这里的轨迹本质上就是从彼处演变到此处,即发展到20世纪晚期的西方社会。而雷蒙·威廉斯主要关注的文学与艺术方面的话语,则已经将“现代主义”奉为圭臬了。

“后现代性”并没有解决这些含糊不清的地方,而是重新塑造了它们的形象。它是不是从“现代性”发展而来的一种社会实况?还是继“现代”社会理论之后而来的一种社会理论?它是否不单是针对“现代”——针对新颖的、现时的东西——的一种新词儿?是否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后现代性?它的用法变化多端,使其前身的那些复杂用法显得黯然失色。甚至还不如说,这个术语进一步加剧了雷蒙·威廉斯骨子里带着讥讽地谈论的那些困扰。

后现代性与它的伙伴后结构主义关系密切,哪怕说这种关联很成问题。但是,后结构主义就和它所继承的结构主义一样,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为社会理论的形式之一,而这种形式也正在逐步让位于作为更具包容性的术语的“后现代主义”。不过,被尊奉为雷蒙·威廉斯所谓选择性传统的“现代主义”,是在“现实主义之后”构造出来的,而正处于典范化过程之中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和现代主义、美学现实主义(realism)及认识论上的实在论(realism)一同汇聚、一同发展起来的。即使我们没有被搞糊涂,我们也应当处于这种混融的状态之中。

“后现代主义”在常识的那些话语中业已获得的用法,也就是表明了与现代性之间某种继替关系的用法,对于那些一心要驳斥有关继替序列和因果关系之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是成问题的。而由于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被定位在西方世界,因此,又在双重的意义上出现了问题。周蕾指出,对于处在南方与东方世界的殖民地各民族来说,“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并没有沿循诸如此类规整

有序的序列。她就克里斯蒂娃的《论中国女人》评论道：“她所提出的，与其说是向一种不同的文化借取一点经验，不如说是从西方世界内部出发的一种不同的读解方法”（Chow, 1991:7）。

研究后现代性的社会科学家中有几位主要的人物已经指出，后现代性更宜于指称在现代性之内的一种批判性的姿态，而不是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继替关系（参看第 16 章）。但是，这种避免继替序列的有关问题的举措，却又反过来产生了其他的问题。它将强调的重点由当代社会的现状转回到理论的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理论家被人指为后现代主义的先知或者先驱，从被贴上“现代主义”标签而遭受冷落的惨淡遭遇中解救出来，要区分现代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也变得极其困难。它并没有解决定位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在于何处”。或许它依然是“从西方世界内部出发的一种不同的读解方法”，以一种悖谬的方式，只限于将（后）殖民主体锁定在某种（前）现代的“本真性”姿态上（Chow, 1991）。

无论是“现代主义”理论的结构，还是现代 / 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都具有逻辑一致性：各种社会形态整合一体，在其间生活的人类主体也是内在统一。对于这样的认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如出一辙地拒绝接受。后现代性的主体是断裂的，逻辑上不一致的，不稳定的，如实地反映着后现代社会的状况。出于这些原因，后现代主义有时已经证明有某种东西可以吸引一些特殊的群体，它们都在某些社会主义似乎不再能够提供有竞争力的选择的情况下，遭受过边缘化、他者化和符号暴力。有一些皈依新女性主义的学者已经主张，在后现代主义与 / 或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规划之间，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Weedon, 1987），或许这种被察觉出的亲和与女性作为他者的地位有关。不管怎么说，在这些新的思路波及女性主义之前，至少在法国以外，持有不同倾向的女性主义者都感到了需要一种关于主体性的理论，即如何可以获得、接受并且践行一种压迫性的女性特质社会认同。关于主体性的种种后现代理论，就是在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发展中得出的，而这种发展，或许在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关于男权制的社会建构论学说，及 / 或第 16 章讨论的男权制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距离中也能捕捉得到。

12.2 阿尔都塞、拉康和结构主义阶段

首先，女性主义者借鉴了“社会调控”这类语焉不详的观念，借鉴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或者是相关的社会学概念“社会化”，来说明女性（以及男性）是如何难以变更地附着于所获得的社会性别角色与受生理性别决定的主体性。意识形态的概念属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里利用得尤其充分。但是，女性主义在运

用时,还找不到一种令人完全满意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说法可以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概念是结合有关阶级与阶级意识的理论发展出来的。在法国的“物质论女性主义”里,争论着女性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阶级(Delphy, 1984)。尽管如此,阶级意识的有关概念与形成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转换到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有关概念与形成过程,后者贯穿着各个阶级范畴,并且打乱了这些范畴,最初也不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中确立起来的,而是在儿童于家庭中最初的社会关系的动力机制中确立起来的。

对于寻求一种关于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的理论的女性主义者来说,最初的极其强有力的影响就是阿尔都塞(Althusser, 1970)。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遵循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将“男权制”或“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归为“意识形态实践”。阿尔都塞的“一般意识形态”(ideology in general)概念被融入了两股更进一步的相关发展趋势,它们席卷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一股是现代语言学说,另一股是拉康精神分析。

阿尔都塞自己对拉康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他所界定的“特殊意识形态”(particular ideologies)的领域类似于葛兰西划出的地带,而“一般意识形态”则是以广泛得多的方式,说明了人的主体性本身的生产,也就是体验的中介,这是所有社会形态的本质要素。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借鉴了拉康。

“双重体制女性主义者”(Mitchell, 1974; Rubin, 1975)遵循了阿尔都塞给出的线索,向马克思主义寻求分析社会生产所需的理论工具,而社会生产的主要场所就是工厂、经济与国家。同时,结合新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说,再配上拉康的精神分析,就能提供一种完美的补充,说明在“男权制”内部受生理性别决定的主体性的生产。女性主义的分析将会揭示特定历史局势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传统上,女性主义是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为男权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废除,而不是视为理论上阐述男权制意识形态时所运用的工具。而米切尔那部影响巨大的论著,即《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Mitchell, 1974),则经由拉康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将弗洛伊德引入了英美女性主义,引入了关于男权制的女性主义理论,以补充关于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参看第5章第5节第1小节)。

米切尔的作品此时依然明显表现出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特征,后者曾经影响了米切尔最初的开创性文章:“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itchell, 1966)。米切尔在其《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的终篇以乐观的口吻提出,在现代生产条件之下,家庭及其相关的生理性别分工已属多余(Mitchell, 1974)。尽管如此,在许多人看来,这种令人愉快的女性主义结局颇有些强以为辞。遵照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思路,她所描述的那些过程成功地叙述了社会性别方面的那些分化与压迫,只不过这种叙述太成功

了,都说成是非常普遍、不可避免的东西。威尔逊(Wilson, 1981)从中发现了某种形式的心理决定论。她认为,被儿童早期心理发展中塑造出的种种束缚拘束着手脚,意味着几乎没有在生物决定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罗丝在回应威尔逊对米切爾的批评时指出(Rose, 1983),精神分析被人错误地解释成这样一种学说,研究的是男权社会里女性如何在心理上被诱发成女性特质。她的主张恰恰与此相反,认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 1992)、波芙娃(Beauvoir, 1953)、弗里丹(Friedan, 1963)和格瑞尔(Greer, 1971)等人的笔下形象地表达了女性的不满,而精神分析揭示了这种女性之不满在无意识领域的深层根源,可以用来为女性主义者的反抗助一臂之力。精神分析以它关于无意识的学说,揭示了不可能成功地将女婴转变成具有女性特质的小女人。女性永远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接受女性特质。

在罗丝看来,双重体制理论家尝试用精神分析来概括男权意识形态之内化过程,是对精神分析的误解,没有能够认识到拉康有关主体性、生理性别化认同以及性本性的阐述的充分意涵。这些方面都是那些从未完全成功的过程变化莫测、难以确定的后果。诸如此类的误用导致了弗洛伊德的某种“社会化”,精神分析实质上被剥离了它最为有力的概念,即无意识。对象关系女性主义中的情况就是这样。

拉康通过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重新塑造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在已有的框架内,关于凸显出来的生理性别化主体性的戏剧有了许多新的说法。

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孩童及其母亲对于婴儿来说形成了某种尚未有多少分化的对偶统一体,然后再与世界融合在一起。拉康将分化与定位过程的第一阶段称为“想像界”。在大约六个月时发生的所谓“镜像阶段”,婴儿将自身与其母亲的双向映射理解成某种整全一致的理想化自身形象,掩盖了在某种外部形象中,在为确保该形象而对于他者/母亲的依赖中,自我生产过程本身的异化。

前俄狄浦斯的阶段被表现为一段充实、丰富和融合的时光,是婴儿与母亲的融合。但是,在拉康看来,欲望和语言是一种不在场的功能,而不是在场的功能。是丧失与缺乏产生出通过形象与符号表达的对于欲望对象的欲望与表现。

主体性与认同也是以类似于语言中生产意义的方式,通过不在场、缺乏、区分和断裂生产出来的。根据拉康的说法,生理性别化的认同是在一场危机之中生产出来的,这场危机蛮横地把孩子赶出了丰富丰满的想像界,扔进了符号界,而主宰符号界的不是丰富与在场,而是不在场、缺乏和禁止。根据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这场危机就是遭受阉割的威胁,为生理性别之间的身体差异赋予了不祥的意义,从而创造出生理性别化的认同。

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孩童对于丧失和缺乏也并非一无所知,因为事实上,母亲也

会不明所以地来来去去,乳房 / 母亲也不总是想要就有。婴儿最初的表达就是在尝试应对这些不在场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但是,这些并不构成生理性别的差异,因为诸如此类的丧失 / 缺乏对于两种生理性别的婴儿来说都有。

这些不在场激起了对于母亲的欲望,导致婴儿被粗暴地从想像界抛入了符号界。母婴对偶体的封闭世界被第三方即父亲突然打断,他优先占有了母亲,禁止孩童对其产生欲望。对于生理性别之间最为明显可见的差异,婴儿在发现之后所给予的意义就是阉割,这一极其吓人的威胁支撑了这种禁止,也就是父亲之“不”,至少在孩童的想像之中是这样。小男孩接受了某种男性特质的定位,并且希望保住自己的小鸡鸡,因此,其认同也就迅速地由母亲转向了父亲。将禁止予以心力内投(introject),也将父亲所代表的社会法则心力内投。而小女孩则采取了女性特质的定位,从而发现最糟糕的事情已然发生,因此,也就在一片失望与气恼之中,弃其母亲而去,开始自己第二次的也是不那么强烈的与自己父亲的恋爱。

人们普遍会将无意识的领域形容为一处场所,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可能被压抑进去的一处内在场所。而拉康经由现代语言学来读解弗洛伊德的理论,从表现的角度来阐述无意识领域。所谓无意识,无非就是为了塑造一种协调一致的自我,至少是这样一种幻觉,而被贬斥并被赶出自觉意识的那些符号与形象。但是,偏偏是在母亲身上,汇聚了这么多必须被拒斥和压抑的东西,被激烈指责的那些意义都围绕着她而聚集起来,她成了所有那些同时遭受贬斥、业已丧失和深深欲求的东西的汇聚场所。因此,在女性主义的拉康主义者看来,无论是(主观性的)生理性别上的分化,还是男权社会中赋予这种分化的那些意义,都是在这一过程中确立的,既形塑了自觉意识的自我,也形塑了无意识的自我。

12.3 后拉康法国女性主义

在法国,有些女性主义者在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用到女性主义时,已经超越了拉康。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伊莉嘉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在1974年出版《另一个女人的窥镜》之后,就被弗洛伊德学派*开除了。

克里斯蒂娃用另一对彼此相关的概念改造了拉康关于想像界与符号界的区分,就是符号域(the semiotic)与符号界(the symbolic, Kristeva, 1986)。女性主义者们

* 由于长期与法国乃至世界的精神分析主流不合,拉康于1964年组建巴黎弗洛伊德学派(Ecole Freudienne),1980年宣布其解散,另成立巴黎弗洛伊德事业学派(这两者皆介于思想学派与实体学校之间),次年去世。——译者注



最感兴趣的便是她的符号域概念。克里斯蒂娃与伊莉嘉瑞和西苏立场相似,同样受到米切尔和罗丝之类更为正统的拉康主义者指责,被认为是预先设定了自己原本打算说明的东西,也就是生理性别化的主体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假定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女婴与男婴之间已经形成了分化,而这只能归之于生物学因素。这样一来,身体上的差异就被归于俄狄浦斯阶段之前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后果,而在拉康主义者看来,正是这个阶段创造出了心理层面上的差异。对于米切尔和罗丝而言,身体上的差异没有任何必然的后果,直至它们在俄狄浦斯危机及其解决过程中被赋予意义。莫伊(Moi, 1985)同意这样来批评伊莉嘉瑞和西苏,但为克里斯蒂娃做了辩护,认为她充分意识到了在符号界之外不存在任何语言和主体性,或者说(生理性别化的)认同。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域合奏”(semiotic chora),指的是婴儿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甚至胎儿环境下她所谓的“脉动”与“律动”。这些脉动与律动源自母体。对于婴儿来说,它们是异质性的,持续不断的。而要想产生意指作用,就必须分裂、拆解符号域合奏。当主体进入符号界时,符号域合奏会受到压抑,但在符号界的边缘地带尚留有痕迹,以矛盾、沉默、不在场和律动等形式,对主体实施扰乱性的压力。符号域合奏的这些业已分裂的残余物被标示为“女性特质的”,这是因为考虑到它们的来源,并且因为在拉康的学说中,女性特质就像符号域一样,占据着语言与文化的边缘地带。

以莫伊为代表的学者批评克里斯蒂娃混淆了多种不同的边缘地位,将颠覆归为边缘地位本身。在莫伊首要关注的克里斯蒂娃的文论中,克里斯蒂娃评价了欧洲先锋派作品中的“边缘”形式和“女性特质”形式。但是,边缘地位与政治行动的关系、与能动行为的关系依然是语焉不详。而克里斯蒂娃的作品给许多女性主义学者还带来另一点困难:她所界定的那种使符号域的脉动得以扰乱符号界、因此可以称之为“女性特质”的写作,却常常是体现在男人的作品当中。众所周知的是,克里斯蒂娃在她的批评作品里为男性先锋派现代主义者的作品大唱赞歌:乔伊斯,波德莱尔,洛特里阿蒙,还有卡夫卡。巴特斯比(Battersby, 1989)比较了克里斯蒂娃与浪漫派美学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后者将“女性特质”与完全属于男性的创造天才联结在一起。巴特斯比指出,对于“女性特质”的正面肯定绝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对于实际生活中妇女的地位,也不会带来任何必然的改进。她把这类立场称为“女性特质主义者”(femininist)而不是女性主义者(feminist)。

但是,法国理论家对于女性主义之魅力,恰恰在于她(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不仅正面评价“女性特质”,而且正面评价某些即便并非为女性所专擅、但却比男性更常展现出来的特性。在这一点上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说生理性别(男性与女性)和社会性别(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那么男

人也可以利用和重估“女性特质”,就像后结构主义理论和浪漫派学说中的情形那样,而不一定给女人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带来什么更多的好处。但是,如果坚持认为一个女人的身体及其功能运作与这些“女性特质”的特性之间,与作为社会性别的女人属性(femaleness)的那些体验方式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那么这些新近得到赞誉的特性也就不能够和“女性特质的”男人勾连在一起。可是这样我们似乎就是在支持生物决定论,支持某种解剖学,它在根本上预先规定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命运。

12.4 欲望系统:伊莉嘉瑞

对于“本质主义的危险”,女性主义社会理论一向来保持着警觉(de Lauretis, 1989)。往小里说是那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往大里说是所有的社会建构主义者,都深深地怀疑所有那些企图将女性身上据称的道德特征和社会特征与她们的身体、身体功能和体验联系起来的尝试,哪怕是说以心理过程为中介,而不是生物必要条件的直接表达。“文化”女性主义者和“母性”女性主义者的作品,比如里什(Rich, 1977),乔多萝(Chodorow, 1978),吉利根(Gilligan, 1982),迪娜斯坦(Dinnerstein, 1977)等人,常常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女性文化”中倡扬的那些特性看上去和传统上归之于女人的那些非常相似,尽管它们正在得到重新的评价(参看第5章第5节第2小节)。^{*}

伊莉嘉瑞的作品已经引来了一些类似的保留意见,尽管她的思想源泉很不一样。伊莉嘉瑞和所有的后拉康主义者一样,都认为在女性及其生物性身体之间,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中介因素,就是语言。但她依然一再地被指控为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设置了某种二元论、本质论的模式。不过,正如惠特福德(Whitford, 1991)所言,这会使她成为“前拉康主义者”。惠特福德指出,她的研究规划就像精神疗法本身的研究规划一样,也是旨在介入、影响变迁,而不只是限于精确地表现某种(内在的)事态;也就是说,旨在通过戏嘲和模仿“塞入”(jamming)体制。

伊莉嘉瑞第一部重要作品《另一个女人的窥镜》甫一开篇,就有力而睿智地解构了弗洛伊德论述女性特质的文章,占据了全卷三分之一的篇幅。她借鉴了德里达和拉康的方法,对弗洛伊德的文章进行解构和精神分析。她的案例分析的主旨是说,弗洛伊德的文章是在某种“同一系统”(economy of the same)的框架内铺陈的,这种同一系统在这里的典型特征,可以说是塑造西方思想结构的再现系统

* 本段与第11章的11.2-4的图11.1上数第四段基本一致。——译者注



■ (economy of representation)。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儿童身上设定了某种原初的双性倾向(bisexuality)，因此，也就设定了一种共同的力比多系统。米切尔在批评伊莉嘉瑞和克里斯蒂娃的时候，用了一个单一原初流的比喻，说这种单一原初流后来分离成分别具有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两类后俄狄浦斯力比多结构(Mitchell and Rose, 1982)。她还主张，“双性倾向”这个词本身会引起混淆，仿佛每一种生理性别都包含着一点儿另一种生理性别的成分。米切尔设身处地地指出，从婴儿的角度来看，生理性别方面的差异只有在面临被阉割的威胁时才会浮现出来。在此之前，严格说来，既不存在专门属于女性特质的认同或体验，也不存在专门属于男性特质的认同或体验。

米切尔的主张是要指出，伊莉嘉瑞设定某种双重的、异质性的生理性别系统，这种解决办法只是徒具其表。因为在这里，必须假定生理性别方面的差异业已先于某些事件而存在，而那些事件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看来恰恰是构成了这种差异。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说法是误解了伊莉嘉瑞想要提出的观点。用来描述这种原初双性倾向的那些术语，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被用来概括男性特质的，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此直言不讳。他写道：“小女孩就此成为一个小人。”*伊莉嘉瑞就此做出如下评注(Irigaray, 1974:27)：

一个人(man)减去将自身表现为(再现为)一个男人(man)的可能性，就等于一个正常的女人。在这种不断增生的对于同一的欲望中，死亡将成为某种外部、某种异质性、某种他者的**惟一代表；而女性将承担再现死亡的功能……交媾所带来的磨难历练将作为目的论般的衡量标准，在生育儿子，也就是生育具有生育能力的父亲之同一者的过程中，迎接再生的挑战，迎接蔑视死亡的同一者之再生产的挑战。

根据惠特福德的解读(Whitford, 1991)，伊莉嘉瑞的研究规划可以看作是在激起人们想像和表现女性，想像和表现女性特质。这项研究规划旨在通过对西方文化之符号秩序的批判，定位在符号界之中，并非试图描述在前俄狄浦斯的想像界中业已存在的，或者从生物性的生理性别差异中自然生发的某种东西。因此，“男性特质的”和“女性特质的”力比多在弗洛伊德那里被表现为一种力比多，也就是男性特质

* 原文为“a little man”，这里的“man”用“男人”指代了包括男女两性的“人”。——译者注

** 原文此处的“of an of an”应为“of an”之误。——译者注

的力比多。但要这么说,除非我们就是选择这样来想像某种注定无法通过假设(ex hypothesis)去触及的东西,也就是前俄狄浦斯阶段孩童的力比多体验。如果说纯粹从成年男性的性本性和关于男性特质的文化建构的角度出发,来描述分裂之前的力比多流,那就很难说这种流会在孩童作为生理性别分化的主体进入符号界时发生分裂。这是因为,整个流可以说都预留给了男孩,而女孩则孤立无援,被抛弃了,只是从缺乏、丧失、不在场等角度上得到负面的界定。

或许我们可以不再把伊莉嘉瑞解释成设定了某种双重力比多系统,使她的学说陷入本质主义的困境,而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出发点:她没有设定任何可以触及的前语言经验。她的真正假设是认为可以发展一种丰富的、更为分化的方式,来表现女性身体的快乐,提供更为正面的术语给女孩,让她开始向自己表现自身。

伊莉嘉瑞和早期探讨差异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一样,也对女性的性自主、性快乐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在这一点上,她在《另一个女人的窥镜》一书中如此说道:

就好比阴唇,任何一瓣阴唇,还有外阴,虽然所有这些都完完全全可以触及,小女孩不可能发现不了她们的敏感之处……从触碰、抚摸、分拨阴唇和外阴中获得的快乐,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根本不存在。(Irigaray, 1974: 29)

伊莉嘉瑞所反对的,就是各种文化表现方式中给予女孩和妇女的是如此的贫乏,就是所有正面的形象都为男性性本性所征用。

我还记得在美国,卡梅伦和她的学生们做的一项有趣的小练习(Cameron, 1992)。她要求学生按照生理性别分成两组,分别列出表示阴茎的词。女性可以开出50个词,而男性可以举出惊人的144个词。而要是让他/她们回想或创造表示女性生殖器的词,又该会有多少?在女同性恋文化而非异性恋文化当中,才能找到那种恣意纵情、挥霍用词的对于女性生殖器的文化欣赏或倡扬:一处纤毫毕现、红润饱涨的丛林(Brown, 1973)。即使通过诸如此类的想像、创造、模拟和“塞入”,伊莉嘉瑞提出了一种想像中的前俄狄浦斯想像界,这或许也不是为了从理论上概括一个已经被社会性别化的前俄狄浦斯婴儿,不是为了设定前语言经验的可能性,而很有可能是要介入符号界,旨在丰富女性性本性的符号形象,使西方文化可以突破沉闷单调的“同一系统”。弗洛伊德不仅分析了这种系统,而且代表了这种系统,它是如此地限制女性:

这个错失,这个匮乏,这个“空洞”,不可避免地只能提供给女性少之又少的形象、图景或表现,可以用来表现自身。并不是因为她缺少某种“主导能指”,

或者说并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指强加在她身上……她确实借来了能指，但却不能在这些能指上留下自身的标记，或者对它们重新进行标记。
(Irigaray, 1974: 71)

12.5 物质论女性主义和抑郁的主体：身体的物质

在后结构主义中有一种独特的研究途径，格罗斯称之为“肉体女性主义”^{*} (Grosz, 1994)。在这种研究途径的形成过程中，伊莉嘉瑞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物质论的女性主义，不过其基础并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是形态学，是某种关于身体的物质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理论与哲学理论中就有了一股实质上的潮流：“身体的复活”。它的基础在于那些奉尼采为其谱系传承中一员的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哲学学说，包括福柯、拉康、梅洛—庞蒂、德勒兹等人的学说。这些“桀骜难驯的哲学学说” (Grosz, 1994) 的出发点就是拒斥一直以来主导着西方思想的身心二分，并且将这种二分消解于一种具有不可化约的肉体属性的主体性概念之中。

学者们采纳注重肉体存在的哲学学说时贯彻的方向，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差异。福柯的作品更坚定地趋向制度性视角下的社会范畴与历史范畴，而不是梅洛—庞蒂所探究的现象学与人际性情境。而社会学家布迪厄的作品则通过“实践”的概念转换了身心二分，主导这些实践的都是某种“实践逻辑”，而不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心智过程 (Bourdieu, 1990)。斯嘉莉研究病痛中的身体的那部非常新颖的作品，也是定位在现象学传统中的，不过不属于后结构主义的框架。她所提供的素材极其有力，就像福柯等其他人的作品——当然福柯本人不属于女性主义者；不同于福柯作品的是，她的这些素材尚未被女性主义学说所触及 (Scarry, 1985)。

但是，在这堆学说中^{**}复活的只是“那种”身体：其实也就是男性的身体。因此，发展一种肉体女性主义的规划也就不得不在有所借鉴的同时也有所批评。但是首先，重要的是理解女性主义者出于哪些原因对这些哲学学说产生了兴趣。

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肉体女性主义不仅借鉴了福柯、德里达及其他一些后结构主义者，而且也建立在 20 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思想及妇女解放运

^{*} 原文为“corporeal feminism”，之所以不译作似乎文雅一些的“肉身女性主义”，是因为不想带上神学的意味。让我们就用最“粗鄙”的“肉体”。——译者注

^{**} 原文此处为“this corpus of theory”，“corpus”兼有“一大堆”、“作品全集”、“躯体”尤其“尸体”等意。——译者注

动的历史中打造出的一些基本准则上。但肉体女性主义学者中很少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受惠因素,博尔多就是其中一位:

既不是福柯,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位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揭示或者创造出了这样的观念……即对于身体的“界定与形塑”是“对于权力形貌的争斗之焦点”。这样的观点是女性主义揭示的,很久以后它才和后结构主义思想联姻。(Bordo, 1993: 17)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们满怀热忱地将诸多新近学说视为一种崭新的起点,同时倾向于将“1970年代女性主义”的大部分成果一笔勾销。那些更为年轻的学生们通过学术之门而不是妇女运动之路进入了女性主义,从这些语带轻视的描述中读解1970年代女性主义,也就不觉得需要更直接地切入这股思潮。

这样一来,在有些更年轻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学者的作品当中,也就有某种重新发明轮子的成分在里面。*她们用最简约的语调叙述“1970年代女性主义”的故事,许多情况下似乎对之没有什么直接的认识。例如,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看法)欢欣鼓舞地告诉我们一种据说是新的研究强奸的思路:强奸作为一种语言。萨龙·马库斯(Marcus, 1992)指出,认识到强奸中的语言以及强奸作为一种语言,使我们得以转换强调的重点,不再把女性呈现为“始终是已经被强奸或者具有可被强奸的内在固有属性”,从强奸之后的分析转到对于强奸的预防。她借鉴了福柯,提请我们注意,潜在可能的强奸者需要将自己潜在的受害者定位在某种相配的身份认同之中。强奸并不是对于一个不幸的女性受害者身体所施行的独奏,而是有赖于通过恐吓,使女性进入切合强奸者谱写的乐谱的合奏。作者将1970年代女性主义对于强奸的分析概括为一种“陈旧、拙劣、现代主义的”研究途径,仿佛后者对于那些发现自己遭受威胁的女性的建议就只是“别打算反抗了——要不你会弄伤的”,从而将女性固定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而这正是强奸的成功施行所依靠的。

马库斯指出,早先的女性主义学说将强奸者建构成压倒性的体力的占有者,当然这不难找到例证。但是,她原本可以选择强调连续性,强调1970年代女性主义对于她主张的立场所做出的贡献,办法就是选出1970年代女性主义中更富斗争性的文本,而这也同样不难找到。倘若她回溯到1970年代女性主义的老骨干代表,1972年初版、至今仍然在版的《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想必会发现有一章谈论自

* 参见本书“第一版序”第11页译者注。——译者注

卫,虽然不是从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说的角度来谈的,但在潜在可能的强奸场景中模拟采取的抵抗策略,也与马库斯所建议的极其相似:“如果你还来不及踢他就被他抓住了,就用你的膝盖猛撞他的腹股沟……亦有人士还提议抓住他的睾丸,并猛力往下拽”(Boston Women's Health Collective, 1972: 164)。这丝毫也不意味着男人的压倒性体力,或者将女性定位成始终是已经被强奸的和可以被强奸的。

根据肉体女性主义学者的主张,大多数的女性主义思想其实是复制了各种后结构主义与现象学哲学学说所解构的那种身心二元论。最重要的是,这种二元论是在生理性别(自然,或生物特征)和社会性别(思维,或文化)之间的对立中再生产出来的。而将对于这种二元对立的问题化工作完全交给后结构主义哲学来承担,也同样是一种错误。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分始终是不稳定的,第11章第1节第1部分的讨论或许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系统而连贯地运用这种对立几乎是不可能的。两个术语都不太牢靠,不时相互混融,而合在一起成对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对立的批评意见的出现还早于肉体女性主义对于这种二元区分的解构,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在《女性主义问题》杂志(*Questions Féministes*)周围的法国物质论女性主义学者的作品里(Leonard and Adkins, 1996)。

法国物质论女性主义就像英语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样,也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但女性主义中借鉴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方式非常不同。马克思主义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的“物质论”是一种唯经济的物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它所剥削的劳动力的两种生理性别来说原则上没有分别。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并不新奇,而是资本主义从早先的生产方式中继承下来的某种意识形态残余,并按照自身对劳动力分化的需要加以塑造(Beechey, 1977)。社会性别体制也是文化建构出来的(Barrett, 1988)。在这种研究途径中,没有一种关于(生理性别化的)身体的物质论的一席之地,这样的身体实际上是被存而不论,或者被当成某种给定的生物属性,无论说明社会生产关系,还是说明意识形态实践中的社会性别差异的生产,情况皆是如此。

因此,法国物质论女性主义既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物质论相分别,也与以互为竞争对手的政治精神分析团体(Psychoanalyse et Politique, 简称 Psych et Po)为核心的法国后拉康主义女性主义相分别,在肉体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影响甚巨。德尔斐(Delphy, 1984)之类的法国物质论女性主义者将女性概括成一种阶级,从差异性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女性与男性的关系,这种权力使男性不仅可以剥削女性在劳动意义上的身体,而且可以剥削女性在性和生殖意义上的身体。生理性别并不被视为一种自然的身体差异,然后再被转换至活生生的社会性别关系。相反,是社会性

别通过社会性别分化的权力体制的物质运作,生产出生理性别化的性和生殖意义上的身体。

行文至此需要暂缓片刻,因为正如伦纳德和阿德金斯业已指出的那样(Leonard and Adkins, 1996),英语国家的女性主义学说相对忽视了这种特定的法国女性主义传统;同时也因为它已经开始在后现代主义学说的某一特定分支那里激起了回响,该分支与肉体女性主义的规划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巴特勒的学说。巴特勒认可了法国物质论女性主义学者维蒂希作品的重要性,并且其融合的方式不同于其他许多关注女性身体之特殊性的肉体女性主义理论家。巴特勒和维蒂希都认为,制度化了的同性恋既确立了生理性别,也确立了社会性别(Wittig, 1981)。

巴特勒将生理性别差异从社会性别和性本性中区分开来,从而动摇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对立。尽管如此,揭示这种对立的非牢靠之处还比较容易,而要尝试绕开这种对立,却常常无法成功地维持一套始终如一的术语体系,能够避免诸如此类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遭到解构的时刻却一再被再生产出来。

巴特勒批判性地借鉴了维蒂希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自己的学说(Butler, 1990)。她与维蒂希的共同点在于都肯定了制度化同性恋在确定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维蒂希将女同性恋设定为一种革命性的形象,拒绝被安置在这些二元对立之中;而巴特勒则主张,女同性恋关系也暗含在这些二元对立之中,特别是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对立。

一种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的身份定位要想维持自己的外表始终一致,也就必须让异性恋保持在那个被拒绝、被贬斥的位置。(Butler, 1993:113)

避免这些二元对立的唯一道路,就是彻彻底底地“摧毁”*它们,包括摧毁女同性恋关系本身。

巴特勒借鉴了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提出如果说婴儿要想实现他或她的主体性,就必须在生理性别的二元对立中选择非此即彼的定位,那么可以说,这种过程从来没有完成过,因为选择从来也不是从这些绝对排斥性的角度做出的。所谓抑郁症患者,就是拒绝哀悼的男女,也就是拒绝放弃业已失去的心爱对象的他或她。相反,这个失去了的心爱对象被心力内投,融入了自我的身体本身。所有抑郁症患者中最厉害的一种,肯定是完全将自己定位成异

* 原文“queer”在此有双关之意。做动词讲为“摧毁”,做名词讲则为同性恋者,而“queer theory”中译为酷儿理论。——译者注



性恋者的男性或女性。物质性的身体本身根据制度化异性恋的种种要求加以生产和分类。只有根据这一调控性规范而物质化的那些身体,才会被视作“至关重要的身体”(Butler, 1993)。但这个过程本身既是一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排斥的过程,创造出了“卑贱的他者”(abject others):那些身体无足轻重,但在创造异性恋身体的过程中却必然会产生出来,*它们是被丑闻化的卑贱的同性恋身体。所以说,同性恋者的存在进一步巩固了作为抑郁症患者的异性恋者内心深处暗藏的某种同性恋:也就是作为生产异性恋身体、异性恋主体性的前提条件,已经遭到贬斥的他者的身体,他者的性本性。

法国物质论女性主义与巴特勒的酷儿理论有着共同的政治规划:挑战规范性的异性恋,肯定那些与规范无涉的(nonnormative)或“倒错的”性本性。它们都把生理性别化的身体看作是一些社会文化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生物学上的给定之物。不过,它们也都承认,社会建构的这些生理性别化的身体(至少)具有两种形式,这倒是和生物学理论的看法一样。

两者中无论哪一种理论,都从未非常充分地挑战或说明这种二元论。女性主义学说,包括社会建构论学说,需要仔细地关注人类生殖的急切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生理性别分工(至少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如果说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一样都是以社会的方式生产出来的,那么两种生理性别普遍一致的生产当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的”身体或许不得不借文化之力,通过“纪律化”而获得存在的地位。但生殖意义上的女性身体并不能在社会的范围内被使用。巴特勒拒绝应对这一必要前提。在接受《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杂志的一次访谈时她被问到这一问题,但她对此置之不理,理由是身体在生殖能力角度上的生理性别化只是“某种规范带有欺骗性的强加,而不是对于生物学约束的某种中立描述”。她借鉴了弗洛伊德的《哀悼与抑郁症》,从而得以摧毁异性恋者的身份认同本身,即男性与女性。但这种摧毁还有赖于认识到,两种生理性别和性本性,两种身体形式,即父亲的身体形式与母亲的身体形式,是相互纠缠的:

因为俄狄浦斯困境的解决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在生理性别上与己相对的父母的禁令既可以导致与不再拥有的父母的生理性别的某种认同,也可以导致对这种认同的拒绝,从而引起与异性恋欲望之间的某种偏差。(Butler, 1990:63)

* 原文此处为“engendered”,一般意思是“生产出来”、“引起”等,偶尔亦有“生育”的意思,但这里也可径直理解成“使……具有社会性别”。——译者注

所以说,异性恋在产生了非同性恋的主体*的同时,也产生了酷儿。但是,异性恋的根基何在?在巴特勒的学说中,生物学差异的“给定因素”为制度化异性恋所取代,而后者属于社会范畴而非生物范畴,但同样保持着无法解释清楚的“给定性”成分,按照社会规定的脚本重复着表演,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我们的子孙后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女人是否生儿育女,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其生存和幸福与我们所有人都是利害攸关的事情。因此,女性的生殖意义上的身体也与我们所有人有所关联。有鉴于此,对于女性身体的“特殊性”的这种坚持立场,使肉体女性主义成为女性主义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向。但是,对于女性主义来说,要达成对于母性身体的确认,同时又不将女性化约为她们的生殖能力,又谈何容易。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在这条特别的钢丝索上,肉体女性主义是否能够保持平衡,又是如何漂亮地保持了平衡。

12.6 肉体女性主义

基于女性生理性身体之特殊性的那些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学说,它们的哲学基础绝大多数也是和有时对这种特殊性视而不见的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学说相一致的,都是来自巴特勒(Butler, 1990, 1993),布拉伊多蒂(Braidotti, 1991, 1994),哈拉威(Haraway, 1991),以及许多研究易性癖的理论家(Castle, 1993; Doan, 1994)。加滕斯(Gatens, 1996)和格罗斯(Grosz, 1994)继承了梅洛-庞蒂的立场,主张物质身体并不是一种中立的或被动的客体,任由社会自我的社会性和特征铭刻其上。因为这等于设定了一对范畴:一种原初的中立性身体,一种受文化和历史限定的积极的自觉意识。肉体女性主义不遗余力地予以解构的,正是这种二元对立。

后结构主义的肉体女性主义的前提,是需要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哲学中通行的新的人类身体体现模式。它更喜欢的模式是强调流动的边界,强调关联而非分裂,强调互赖而非自治。它和关注差异的那些女性主义学说(母性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都以确认女性身体的独特性为共同的任务,不过同时宣称避免将这种差异物化,认为这种做法引入了“他者化”,可以被指为本质主义。这是一项充满危险的事业。

伊莉嘉瑞(Irigaray, 1974)在批判西方哲学时指出,这种哲学不能够从与某种男性特质的差异的角度出发,来承认或认识女性“他者”,这种男性特质已经被许可垄断了(认知的、行动的)主体的定位。除非赢得这种认可,消解被误当作知识的阳具

* 原文为“straight”,有“径直”、“纯粹”、“正派”、“庄重”、“诚实”、“非同性恋”等多种相互关联的意思。——译者注



中心主义基础原则,否则女性将永远不会实现充分体现生理性别特定性的主体性,而男性也将继续错误地自认为仿佛努力地与自身身体和女性身体保持了距离。

除了伊莉嘉瑞,巴特勒(Butler, 1990, 1993)、哈拉威(Haraway, 1991)、博尔多(Bordo, 1993)、布拉伊多蒂(Braidotti, 1994)、格罗斯(Grosz, 1994)、加滕斯(Gatens, 1996)和巴特斯比(Battersby, 1998)等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发展了这种确认由生理性别决定的思想与主体性之肉体基础的研究规划。其中最为关注女性身体体现之特殊性的是巴特斯比、博尔多、加滕斯、格罗斯和伊莉嘉瑞。关注女性特殊性的女性主义学说往往会对异性恋感到满意(虽说并不一定满意于它的各种制度化形式)。而倾力于解构规范性异性恋的那些关注身体本身的女性主义学说,则往往寻求避开对于女性特殊性的强调,避免将女性过于密切地束缚在她们的生殖性身体上。这样便导致这种特殊性趋于消失(Gedalof, 1999)。在巴特勒的作品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坚持女性身体形式之特殊性的肉体女性主义已经招致了一些批评意见:首先,认为它并没有摆脱本质主义;其次,认为它将社会性别置于其他差异轴线之上,尤其是置于“种族”和阶级的差异轴线之上。

肉体女性主义的捍卫者们已经反驳了这两种批评(Whitford, 1991; Schor, 1994)。她们声称,所探讨的差异不再是容易物化的,因为有待确认的正是差异本身,这种差异是绝对的、难以通约的,并且原则上是可以无限繁生的:

同性恋的身体,异性恋的身体,禁欲者的身体,自恋者的身体,性倒错的身体,母亲的身体,运动员的身体。这些身体都有其各自特殊的快乐与权力。(Gatens, 1996:43)

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系列问题。如果说可能有的差异的基础是无限的,比如“种族”、阶级、社会性别、身体能力、年龄和性本性等(这里我们遇到了斯佩尔曼[Spelman, 1990]所谓的“‘和……等等’的问题”),那么在任何一个点上,都不缺乏具有独一无二的身体体现的个体。我们有可能陷入“无限性化约”(reduction to infinity)的危险:“处处皆成视点”(Haraway, 1991)。对于任一给定的情境,我们需要限定与之最最相关的那些差异。这种需要既有助于分析时突出强调重点,也有助于政治上分出轻重缓急。

受惠于德勒兹的那些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形式促请我们以讲求实际效用、立足具体情境的方式来评判观念想法,不是将它们置于“真理”的审判台上,而是着眼于它们的效果:“观念是被抛向时间当中的物体”,并无真假对错可言(Braidotti,

1991:125)。因此,我们可以像后现代实用主义者罗蒂那样探问:“信这个对我们有好处吗?”纳拉扬已经指出,在男性支配的社会文化世界里,对女性差异的每一点确认都很容易被用来加剧女性的不利处境(Narayan, 1989)。而她得出这一观点所依据的具体情境则是第三世界的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在这些情境下所需要的,有时或许是某种“策略性的非本质论”(strategic inessentialism)。因此,在那些情境中盛行的都是一些能够在社会性别化的全球结构背景下表现阶级压迫的女性主义形式,也就并非偶然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这些情境下生存得最好,而在对这些共同体和社会做理论概括的女性主义者当中,后结构主义肉体女性主义迄今为止也没赢得多少影响力(Gedalof, 1999)。

这种主张注重具体情境。而对于社会实在论者,它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有可能激起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面前“女性主义者的踌躇”(Brown, 1991)的那种根本上的保留意见,自有其道理所在。有一种女性主义希望从理论上阐述在社会自我的发展过程中积极主动的生理性别化身体,这种女性主义的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也存在某种危险,将生理性别方面的身体差异的意义扩展到适用范围之外。肉体女性主义的启发价值在于号召人们去“寻找活生生的、生理性别化的肉体的意义”(与之相反的是像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寻找社会生产关系”)。而它的危险所在也正好对应着马克思主义予人启发之处:我们或许过于从生理性别化的肉体的角度来确定社会关系与过程,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那样过于扩展生产概念的适用范围(Nicholson, 1987)。在肉体女性主义者的一些阐述当中,这种危险跃然纸上:

只要男人和女人在身体上有所差异,诸如此类的差异就会对应地体现于每一类身体能够拥有的特殊类型的快乐和痛苦。(Gatens, 1996:130)

这种观点或许可以由另一提法来补充,即:“只要男人和女人在其身体体现上还有相同之处,那么她/他们所能够拥有的快乐与痛苦也就会有类似的地方”。为了避免将主导权完全交给她们在女性主义中的批评者,交给那些可能将肉体女性主义对于生理性别化的女性身体之特殊性的坚持立场最终推向保守主义的人,审慎细致地勾勒这些差异的范围与必要性,就绝对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反女性主义者很久以前就成功地论证了,恰恰是借助了这些身体上的差异,对于女性能力的种种限制才得到了说明和合法化解释。社会建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说或许对两种生理性别之间的身体差异强调得不够,可是肉体女性主义就像早先强调差异的激进女性主义一样,也陷入了过分强调这些差异的危险。这种特定的棘手处境的出路

或许在于坚持这样的立场：只要所提出或倡导的讨论根据生理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什么时候诉诸生理性别之间的差异，都必须证明这样的差异切合于所讨论的特定情境。这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可以说并非完全全、彻彻底底地不同。

与此相关的一个论点是：尽管肉体女性主义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女性身体的特殊性上，但它迟早也会产生关于男性身体的特殊性的问题。这种问题对于女性主义所意味的危险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要想安全地确认女性身体的特殊性，或许就得同时清醒地记住，有一些特性和能力，是她们和男性的身体所共同拥有或者相当于共同拥有的。而女性的性本性 / 感官性本身也是多种多样的。“逝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女人或许能够成功完成一向为男人所专有的一些活动，包括武装格斗这样的暴力活动，并且还能从中得到乐趣(Wheelwright, 1989)。当然，男人和女人已经学会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过活”他 / 她们生理性别意义上分化的身体，也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他 / 她们的能力。但是，除了再生产的角色，目前将男人与女人区分开的那些能力在根本上是或然性的，而女人的怀孕生产能力则不是这样。男人的能力之所以专为男人所保有，只是借助了社会对于女人的排斥，而不是男人身体本身的特殊性。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强调文化的身体体现会打破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任何牢不可破的区分，但这样的对立或许需要重新塑造成文化内部一种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区分。我们或许有可能考虑，生殖意义上的身体是否并不属于巴特勒所谓的“必不可少的社会建构”。巴特勒在她 1993 年写的《事关重要的身体》中坚持认为，人们误解了她在自己早先写的《令人困扰的社会性别》中的立场，认为她主张我们都是自由自在的生产者，不受拘束地生产出我们自身选择的身份认同。她指出，不能认为被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虚假的、可以抛弃的。

12.7 一种新的女性主义政治？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最常遭到的批评是说它们是非政治性的。对此的一种回应是对于“政治范畴”本身的解构与重新界定(Butler and Scott, 1992)。除了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也已经对当代女性主义政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Benhahib and Cornell, 1987; Young, 1990; Fraser, 1997)。在这两种情况中，都仰仗了福柯的权力概念的说服力。

* 作者在此特意用了引号，用“passing”一词既指线性时间上的“过去”，也指历史记忆和记载中的“消逝”。——译者注

福柯的《纪律与惩罚》(Foucault, 1977)回溯了在现代时期出现的一些新方式,对(男性)身体实施纪律与监管,以生产“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ies)。他关注的重点在于权力的“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这样的权力既不以“国家”或“统治阶级”为中心,也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关系性、过程性的,散布在各个话语领域中,尽管这并不是一种均匀的散布。在福柯看来,权力并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的”。这不是一个分配性的概念,也就是说不是一种有些人占有、有些人不占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各方都参与其事的关系。前文讨论的那篇萨龙·马库斯论强奸的文章(本章第5节)堪为佳例。潜在的强奸犯的权力并不是他所占有的某种东西,他的男性身体中内在固有的东西,而是必须在互动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具有不可化约的话语性、互动性。如果他的权力要在强奸中释放出来,那么他的受害者也必须出自己的一份力。她的反应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让她有可能看到,有机会积极主动地打断这个过程,防止这种后果。不仅如此,强奸者所利用的权力并没有唯一的来源,肯定不在于施暴者的体格或歹意。它散布在一系列社会网络和制度中,我们对于男女两性的性本性的理解就是在这些社会网络与制度中生产和实施的,包括法院、医疗与生物方面的话语和实践、性学(sexology)等等。我们或许可以找出许多权力策略,但却找不到一位协调全局的策略家。

新近的女性主义政治学已经以多种不同的方式采取了这些观念。福柯在《纪律与惩罚》中描绘了欧洲自18世纪以来在监狱、教室、军队和医院中发展出来的权力体制(regimes),而支撑着这些权力体制的,是一套迅速增长的观察、监管与控制的机制。但是,如果考虑到他的论点,即这些新型的权力实践构成的是一些没有策略家在后调度的策略,那就不得不说,纪律体制是单凭自己的思维生产它们的效应的,至少在《纪律与惩罚》里描述的那些纪律体制是这样。但是,福柯在这部关键文本中所借取的素材并不是有关“信条式的”(doxic)社会实践的说明,就像布迪厄所做的那样(Bourdieu, 1990),对于这样的社会实践的后果,没有人能够完整地预见或想像到。福柯引用的是一些策略家们撰写的手册,他们的思虑体现在监狱、学校、医院的设计本身之中,也体现在它们的物理组织形式与社会组织形式之中。斯嘉丽的素材和《病痛中的身体》与此类似。她所分析的折磨行为并不是毫无章法、不假思索地肢解、摧毁受文化塑造了的身体,而是一种惯常的实践做法,其效应是有意而为的,贯彻着大量的深思熟虑。

12.7-1 身体政治

正是因为这种含混性,可以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某种一

脉相承之处,尤其一开始往往如此。但他的后期作品更强调权力的散布,并且强调抵抗之无所不在,这就意味着女性主义者借用他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Bordo, 1993:38)。就微观政治层面而言,研究饮食、时尚、锻炼等各种“社会性别之文化体制”中对于女性身体的纪律化过程的作品,已经把重点放在了这些体制是如何卓有成效地生产和再生产出“驯顺的”、正常化的、符合女性特质的身体。事实上,这些体制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强加的,“没有人是被一杆枪逼着去做电疗去毛手术的”(Bartky, 1990:75),参与这些体制的妇女们的体验就好像令人兴奋的锻炼,感受到权力与控制。但这并不会使这种分析站不住脚。它主张,这些体制的效应是要再生产出一种男性支配的系统。

博尔多明确反对那些站在比较乐观的立场上来借鉴福柯的思路,她将这些思路归之为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而不是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她认为这种形式将女性主义混同于玩闹,混同于女性的快乐/权力和能动性。博尔多反对这种乐观立场,认为它既看不到女性及其快乐/权力的具体根植背景,看不到她们情愿或不情愿地服从的那些对于身体的纪律,也看不到这些或许令人快乐的选择又是通过哪些方式,与种种正常化和同质化过程纠缠在一起:“在福柯看来,现代……权力是非权威性、无关阴谋也未经协调的;但它生产着身体,对身体实施正常化,使之服务于盛行的支配与服从关系”(Bordo, 1993:26)。

在此还可以再指出一点。这里所探讨的体制,无论是它们对于女性的施力范围,还是它们可以提供的快乐,都散布在整个社会领域之中。追究一下那些拒绝或者没有能力通过纪律将自己塑造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常态”的妇女会遇到什么后果,会给人很多启发。在社会领域中,何处的越界最易遭到惩罚,何处的越界又最易逃过惩罚?对于这些问题,布迪厄的思路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福柯的尝试,斯克兹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Skeggs, 1997)。

斯克兹研究了一群英国工人阶级年轻白人女性,她们都就读于一所地方学院的护理课程。她把阶级作为自己分析的正面对象,而这种强调方式在借鉴福柯思路的绝大多数关于女性身体纪律化的女性主义作品中付之阙如。斯克兹的作品进一步巩固了后结构主义肉体女性主义者提出的某些观点,因为她认识到,在女性的特质、魅力和诱人性欲的风情的生产当中施加在身体上的文化作用,积极地生产出一种体现着艰辛而显著的投资的身体。这些投资既可以提供权力,也可以提供快乐,但在斯克兹看来,这些年轻女性之所以付出这些投资,本意并不在此,而是为了给自己的处境打底:不让事情变得更糟。她所研究的那些女性感觉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选择是否为自己投资,选择用什么形式来做那些投资。

对于被纪律约束的身体的投资或许真的可以产生快乐与权力。但这种权力是

受具体情境限定的,也就是说是在一个给定的场域里多少比较有效地运作的。在这些场域受到限制的地方,它们所助长的那些能力与权力就不能转成“符号资本”之通用货币。对于身体的纪律约束所导致的那些权力并不一定能够在不同场域之间转换。因此,这些权力不仅可以增加各色人群在自己位置上行动的权力,还有助于让这些人群“各安其位”。而当场域本身发生变化时,那些在场域中感觉自如的人或许空剩下不再值钱的资本。随着重工业走向衰亡,传统工人阶级男性中许多成员的遭遇正是如此(Charlesworth, 1997)。

斯克兹所研究的那些人表明,有些东西在工人阶级去夜总会宵夜的情境中“合适”,如果阶级情景发生改变,就不合适了。如果对一个场域太过适应,反而会限制了在该场域之外有效运转的可能性。受文化塑造的身体的能力将身体自我(body-self)与其所适合的那个场域紧密结合在一起。斯克兹从她所研究的那些年轻女性的投资方式入手,探究了这些两难困境。这些投资方式的作用正好与在女性主义及其政治活动中投资相反。因为在后面这块“场域”里,她们的进入非常不具备有利条件,进入该场域会使她们先前的文化投资面临风险。这些妇女实在太穷,无法承担将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投资一笔勾销。除了锁链,她们还有些东西会失去。*

对于那些处在某种位置上,足以拒绝为女性特质、为一种中产阶级的外表做投资的女性,接受斯克兹研究的那些人提供了一些很说明问题的见解:

要是你很穷,或者至少不是那么阔绰,可就不敢弄得挺邋遢,因为谁都会知道,你是多么的缺钱,所以说,其实只有很阔的人才能不管不顾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不过是另一种维持群体差异的方式。你得是真正有钱了,才能真的邋里邋遢,要不你的感觉肯定就很糟,自己觉得丢脸极了,可她们不会,她们不用管这些。(Skeggs, 1997:91)

斯克兹对此评论道:

试一试不扮中产阶级,并不会威胁到她们使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利用其谋利的能力……她们的亚文化是在不扮中产阶级中确立起来的……而中产阶级对于自己能够如何,选择要多得多。(Skeggs, 1997:91)

* 马克思有言: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他们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有锁链,但他们将赢得整个世界。——译者注



12.7-2 女性主义政治理论

为 20 世纪 70 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贡献卓著的那些学者中，许多人的笔调始终如一。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激进女性主义已经被更为新近的关于身体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接过并予以改造（尽管激进女性主义留给后者的东西并不总能得到充分的认识）。与此相反，在新的气候下，在共产主义崩溃的余波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遭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 那些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着力良多的学者，有许多已经非常明确地宣称，她们已经告别了自己这一段过去。

不过，尽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浪潮中遭到普遍拒斥，却还有些残存的痕迹。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在其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有时甚至是折衷主义——的立场中，也有些迹象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乐意容纳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作为业已有所借鉴、有所改造的众多理论之一。解构主义的设计师德里达已经撰写了关于马克思的作品 (Derrida, 1994)，翻译德里达《论文字学》的斯皮瓦克也依然像坚持女性主义那样奉行社会主义 (Spivak, 1987)。而哈拉维最负盛名的文章题目全称则是“电子人宣言：20 世纪 80 年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人们一般忽视了副标题）。

继续借鉴社会主义思想要素的那些“继承人女性主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参照批判理论来界定自身位置的那些学者 (Benhabib and Cornell, 1987; Nicholson, 1989; Young, 1990; Fraser, 1997)。在这些政治理论家当中，已经爆发了一场关于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政治与承认 (recognition) 政治的争论。

后现代主义已经拒斥了所有种类的“认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以推崇一种（灵活多变的）合纵连横的政治 (Young, 1990; Haraway, 1991; Butler and Scott, 1992)。我想谈谈女性主义批判理论中的论争，来看看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政治在多大的程度上允许我们处理早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中的那些核心问题，尤其是关于“阶级的隐秘伤害”的问题 (Sennett and Cobb, 1993)。

我们所谓的阶级指的是什么？这个概念在过去 20 年间已经被彻底解构了，但它依然顽固地拒绝拆散自身，分散到关于社会分化的其他范畴中去。对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来说，这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早先推动了人们自觉意识到将妇女们彼此分隔开的那些差异中的至少一种。在此之所以引入阶级，是因为“关注差异的女性主义”一再被指控没有能力处理阶级差异问题 (Coole, 1996; Reay, 1997; Skeggs,

* 原文应译为“特别严重地打击了”，与上下文不符，疑脱漏了被动态。——译者注

1997)。

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库勒在质疑那些围绕阶级这一术语展开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学说时问道:阶级是否是“一种起作用的差异”(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Coole, 1996)。她的结论是,社会阶级是这样一种差异,避免了当代种种差异学说所采用的那些范畴与分析途径。她给出了一种最低限度的阶级定义:

阶级指的是人的各种群体之间的**物质差异**,这些差异会在一定时间里保持稳定,并在一个群体中得到再生产,而这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也是比较稳定的……物质差异包括那些可概括为**生活机会**的可测指标(收入、财富、职业、保险、死亡率等等)。此外,这些物质差异有时候也**对应于文化差异**,如价值观念、视角、惯常做法、自我认同,**尽管这一方面不那么关键**。但是,我希望与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现象,还是**结构化了的经济不平等**。(Coole, 1996: 17; 下划线为原文所强调,黑体为引者所强调)

这里强调的重点是非常明确的。库勒期望关注在可以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资源之获取渠道与利用方面的系统差异(Doyal and Gough, 1991)。这些物质资源成了必须从差异性分配的角度来理解的东西,这使她涉身承认与再分配之论争。扬(Young, 1990)仰仗了福柯的说服力,强烈反对分配正义的模式。与此相反,库勒非常关注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从而也是正义与权力的不公平分配的问题,这和扬在论争中的对手弗蕾泽一样。

扬区分出五种压迫形式:剥削、边缘化、无力、文化帝国主义,还有暴力。她对这些压迫形式的界定个个都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话语中通行的界定大为不同。例如,她就剥削给出的界定包括了对于劳动的剥削,但很有意思的是也采纳了法国物质论女性主义者作品的立场(参见本章第5节)。在剥削范畴下包括了将养育与性的能量转给男人。剥削就在于人群之间“系统的、非互惠的权力转置”(Young, 1990: 30)。她对于边缘化的界定则着眼于那些被阻止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社会群体,在这一点上与库勒相似,都是关注所谓的“底层阶级”。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术语和萨伊德探讨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支配的作品联系在一起(Said, 1993)。扬延伸了这个术语,包括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所实施的所有形式的“他者化”(othering),这样一来,就得对这些他者化形式下的种种界定、文化价值以及观念看法提出质疑了。在这一点上扬还借鉴了克里斯蒂娃的“卑贱”(abjection)概念(Kristeva, 1992),并很切近布迪厄的“符号暴力”概念(Bourdieu, 1990),尽管她并未直接援用。扬的无力(powerlessness)概念诉诸了福柯,以提请人们关注关系性、过程

性的权力,而不是权力的差异性分配。她在这一点上的讨论关注的是这样两类人之间的差异:一类人作为专业人士,对于影响自己及他人的工作生活的那些决策有更强的控制力;另一类人则缺乏此类控制力。在暴力这一概念下,她讨论了那些全面地暴露在来自其他群体的暴力或暴力之威胁下的群体——“对于其人身或财产的无缘无故的随意攻击”(Young, 1990: 61)。

对于扬的研究途径,“社会群体”的概念至关重要。她所采取的策略就是针对每一个区分出的群体,女性、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种族化群体、残障人士(她不认为这些范畴相互排斥),去探究她/他们遭受了其中哪一种压迫,以何种方式遭受压迫,又是出自何人之手。这使她可以拆解“男权制”和“种族主义”之类压迫中那些君临一切的结构形式,这样的结构形式已经使学者们很难考察结构与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弗蕾泽在批评扬时指出,扬所区分的不正义类型中至少有两类,也就是与社会阶级关系最明显的两类,其补救的药方在于物质资源的再分配(Fraser, 1997)。虽说物质资源的再分配并不会自动消解其他类型的不正义,但弗蕾泽主张,经济剥削与边缘化产生并再生产出阶级之间的物质不平等,不能通过某种承认政治和对于差异的尊重予以解决。在这一点上,弗蕾泽更近于库勒而不是扬。

实际上,扬似乎也发现很难将关注重点始终维持在隐秘或不那么隐秘的阶级的伤害上。她充其量只是涉及到这些伤害,很轻易地接受了重新修饰的需要,却不曾认真地考虑一种再分配政治可以包含哪些内容。她在涉及这种不平等类型时,几乎立刻就越过了这一点。比如说她写道:

物质上的剥夺可以由再分配社会政策予以处理,但边缘化所导致的伤害并不仅限于此。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分配之外还有两类不正义与边缘性紧密联系……(Young, 1990: 54; 黑体为引者所加)

或许她本应当暂缓片刻,考虑一下处理物质剥夺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将会需要多大程度的全球性和地方性的激进社会变迁。支撑她的研究途径的,是后现代主义针对有关平等的女性主义的批评(参见本章第1节),这种批评已经引出了对于女性主义理论家当中那些平等主义目标的警觉——值得注意的是,在她所区分的那些压迫形式中,不包括不平等。

在这一点上,弗蕾泽是两人中更激进的一位。她在《被破坏的正义》一书中(Fraser, 1997),收入了自己1995年写的关于再分配与承认的文章,还有一章是评论扬关于差异政治的书的。她指出:

扬对于“分配范式”的种种异议,没有一项构成具备说服力的论证,以反对从各种社会安排如何分配经济优势与劣势的角度来评估这些社会安排正义与否的研究思路。(Fraser, 1997: 191)

弗蕾泽继续区分出三种不同的差异。第一种在于“有碍才干与技能发展”的那些压迫之中。尽管不是全部,但其中确实有一些是根植于阶级差异之中,而这种差异在她看来是应当予以消除的。她指出的第二类差异在于那些文化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当中,与之相维系的是被占据支配地位的那些群体 / 文化轻视或拒绝承认的一些正面属性(比如哺育、关系性等等)。这些差异是不应当被消除的,倒是应当普遍化。无论何人拥有,它们都是些好的品性。不应该只把它们留给那些“专门适合”这些品性发展的人,最典型的便是女人,让这些人承担这些品性的全部重担、全部义务。弗蕾泽区分出的第三类差异只在于文化变异中。她指出,这些差异既不当予以消除也不应当加以普及,而是应当尽情享受。这第三类差异使弗蕾泽与扬的“承认政治”走得最近:欣赏差异,颂扬差异。(还得加上一句,在处理实践政治方面她和扬一样乏善可陈。她求诸“生产关系的深刻重构”[Fraser, 1997: 27],仿佛这是一项不成问题的简单任务。)

弗蕾泽和库勒的学说都明确区分了物质的范畴与文化的范畴,而扬也正是基于这些理由确立了她对弗蕾泽的批驳(Young, 1997)。我们已经看到,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对立的讨论中,已经尖锐地抵制了“自然”范畴与“文化”范畴之间的二元对立(参看第 11 章)。

库勒的作品形象地体现了扬所指出的危险。作为其论证的核心,库勒重新恢复了物质范畴与文化范畴之间的对立。她对于阶级的界定,主要是着眼于物质差异,在“不那么关键的”程度上也包括“相对应的”文化差异。

反对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理论家当然不只是后结构主义者和 / 或后现代主义者。“文化唯物论者”雷蒙·威廉斯的观点是:一旦我们采纳了这种二元区分来看待社会生活,就会深陷困境(Williams, 1977)。他从骨子里反对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物质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建立的对立。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也属于文化,不能拿来和“文化范畴”相对立。

话说回来,正如我在别处曾经指出的那样,文化是一个贪婪扩张的概念(Lovell, 1995)。它吞噬并接管了包含人群、事物、行动与实践的整个世界。我们已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一再看到,人们尝试诉诸“文化范畴”来整饰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化约论所带来的那些问题,就必须让“文化范畴”不能只是被视

■ 为上层建筑的东西,与“物质范畴”相分离。因此,在这一点上,有必要探问,把所有**被制造**而不是**被发现**的东西,所有受制于概念化的东西,简言之,也就是所有东西,统统揽入“文化”的单一范畴,会对社会理论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我认为,这种效应并不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唯物论学说当中提出的问题,而是重新塑造了这些问题。因此,承蒙肉体女性主义研究的努力,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身体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文化性的——说到底,“物质文化”的观念只是人类学话语中一个老掉牙的说法。经济资源的差异性分配也同样是一种文化现象。马克思比谁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资本论》中,他深入系统并且富于启发地描述了货币的历史。将身体、物质的东西与经济资源统统归入“文化范畴”的所指范围,并没有解决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将所有东西都归入一个名目,并不等于就扫清了战场,并不等于把所有东西都搞得没有分别。所以,可以以存在争议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二元对立为例:要承认人类的生物特征(及其研究,即生物科学)也属于文化,也就是说,在很重要的方面是被塑造出来而不只是被发现的,并不等于说这样的区分就纯属多余。具备再生产能力的身体的生产或许要求有文化的介入,但没有什么身体可以这样通过文化的培养就获得再生产能力。

我们的文化培养总是有所限制的,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常常不具备充分的自觉意识,也正是我们经过文化培养的身体使我们得以接触世界。布迪厄和肉体女性主义有很多共同点。两者的研究都有这样一种理解:自我是体现在身体上的。正是作为有感觉力的物质的身体,我们才能通过学习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参与向我们开放、先我们而存在的那些社会实践,从而成为人类主体。正是通过学习这些实践,我们才获得了我们的社会身份认同,布迪厄称之为我们的惯习(*habitus*)。梅洛-庞蒂将这种体现在身体上的世上生存称之为“较之思维更为久远的一种与世界的沟通”。而他的作品无论是对于布迪厄,还是对于加藤斯和格罗斯之类的肉体女性主义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布迪厄对于这个共同出发点所产生的不同的反应或许源于其学科背景:他有着难以遏制的社会学想像力。向个人开放并在此过程中发展主体性的那些实践,将会受到她/他在社会场域中与生俱来的位置的高度限制,比如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地域以及国家。

尽管不曾借鉴布迪厄的概念,但扬(Young, 1990)依然深深地意识到符号暴力的种种作用过程,她关于“身体的等级量度”的一章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她提请人们关注的是,通过哪些方式,可以将某些特定的人群范畴的他者化表述为某种厌恶感;这种感觉告诉我们,哪些种类的身体是令人恶心或丑恶的。但她并没有追问,这种经文化培养出来的厌恶感除了可以联系到关系性、过程性的权力形式,是否还可以联系到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布迪厄也使我们得以看到,社会场域中的各种位置

既是分配性的,同时也是关系性的。

巴特勒在《让人兴奋的言语》(Butler, 1997)一书中简明扼要地响应了布迪厄的理论。但是,就像 20 世纪的妇女运动这样的社会变迁运动,会受到根深蒂固的一层层制度化、身体化实践的阻碍,对此她的作品丝毫没有必要的认识,而这种自觉意识是那么深刻地启发了斯克兹的作品。

新近的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的根子是女性主义哲学,而不是社会学理论。尽管如此,悖谬的是,她们所指向的目标,并且常常是非常明确地号召的目标,却是一些具有历史特定性和文化特定性的分析,这可不是哲学考察能够轻松得出的。

不过,也正是一种哲学,启发并激励了女性主义史学和社会政治分析,在后殖民研究中尤其如此,包括“定位政治学”(politics of location)中的女性主义流派(Braidotti, 1994; Brah, 1996)。表面上看来,有关主体性和社会身份认同的这种断裂性、非统一性的种种学说,似乎将会在理论上概括威斯特所谓“双重意识”之类的现象,而这些学说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各有差异。这种差异已经被认为相当于布拉赫研究的定位政治学与布拉伊多蒂研究的定位政治学之间的差异(Gedalof, 1999)。两位学者都勾勒了自己个人的失位(dislocation)与再定位(relocation),以摸索有关流离失所的、游牧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替代性论述。但是,布拉赫的个人史细致地关注了游历的各种空间以及度过的时间的特殊性,关注它们对于既被种族化又被社会性别化的流离失所的特定主体性的影响,而根据戈达洛芙的观点,布拉伊多蒂的个人史宣扬的是旅程本身,而不是什么与所游历的土地风貌之间塑造出的密切的个人关系。戈达洛芙将这一欠缺归之于布拉伊多蒂未能充分地关注自己作为中产阶级白人学者的身份:

置身于将白种和西方变成不可见、未标示的规范的世界,被自己的种族或民族标示成有色的、“后殖民的”女性,她们被“定位”的方式,是布拉伊多蒂笔下的游牧民从不曾经受的。(Gedalof, 1999:174)

类似的论点亦见于莫亚(Moya, 1997),她同时批评了巴特勒与哈拉威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的考虑对于莫拉加(Moraga, 1987)与安扎尔杜阿(Anzaldúa, 1983)作品的利用(误用)。这些反复出现的批评理当使我们产生警觉。在两类断裂之中存在着某种差异:一类是出于任何自我的塑造过程之必然属性的自我的断裂,另一类是特定人群范畴的社会身份认同之定位在社会中的系统性断裂,也就是他者化、卑贱和符号暴力等作用机制。



最后还应当承认,新近这些女性主义学说已经把注意力放到了地方性、人身性的一面,放到了主体性和活生生的身份认同上。这已经成为她们的力量之所系,魅力之所在,在此基础上也足以声称,她们为一项规划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这项规划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口号便是:“人身性的便是政治性的”。不过,对于全局领域的东西的分析,她们的贡献就不是那么显著了。

对于我们的行为和伦理与政治决策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如果认识太过强烈,或许效果适得其反。而像福柯那样关注“微观政治”,强调局部性而非全局性,强调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而非我们面临的困难,强调“积极公民权”(Deem et al., 1995),这在许多方面来看都大有帮助。当然,全局性政治依然延续,女性主义理论也需要介入其间。有些后现代主义 /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也正是这样做的(Spivak, 1987; Haraway, 1991)。女性主义发展研究这块领域也同时兼顾着地方性视角与全球性视角。虽然它曾经被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学说相继主导(Parpart, 1995),特别是成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奋力维存的领域,但也已经开始引起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关注(Marchand and Parpart, 199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很少有身处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者接纳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立场。晚近女性主义中这种立场接纳上的差异表明,罗蒂的问题“信这个对我们有好处吗?”(参见 Rorty, 1989)必须这样来回答:“这就得看‘我们’是谁,得看我们在国际性社会世界中处在什么位置”。

最后,对于地方性的强调丝毫不能保障女性的增权:“地方性空间的断裂程度与国家性空间或全球性空间一样。它在运作中有其自身的权力等级秩序,拥有捍卫既存权力关系并扑灭异议的各种资源。因此,它也是需要组织民主斗争的空间,本身并不是一种民主生活的方式”(Rai, 1998)。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已经对女性主义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研究途径提供了绝大多数女性主义理论目前所采纳的框架和用语。它们对于形塑现代社会思想所具备的力量和产生的影响,已经促进了女性主义理论保持生机活力。这些哲学思潮目前正遭到强烈反对(Brodribb, 1992; Sokal and Bricmont, 1998)。而在反驳与拒斥的欣快之中也带有危险,老一套的所谓“真理”和成问题的二元对立将会在碍女性主义规划的未经重建的形式当中得到恢复。我们必须吸取新近的女性主义所提供的教益,同时也承认它们以多种方式建立在早先的女性主义所奠立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 Althusser, L. 1970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 Barrett, M. 1988 (1980):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2nd ed. London: Verso.
- Bartky, S. L. 1990: *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Oppress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Battersby, C. 1989: *Gender and Genius: Towards a Feminist Aesthetics*. London: Women's Press.
- 1998: *Phenomenal Woman: Feminist Metaphysics and the Pattern of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auvoir, S. de 1953 (1988): *The Second Sex*. Trans. and ed. H. M. Parshley. London: Pan.
- Beechey, V. 1977: On patriarchy. *Feminist Review*, 3, 66—82.
- Benhabib, S. and Cornell, D. (eds.) 1987: *Feminism as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rdo, S. 1993: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ston Women's Health Collective 1978 (1972): *Our Bodies Ourselves*. 2nd edn, by A. Phillips and J. Rakuse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Brah, A. 1996: *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Contesting Identi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Braidotti, R. 1991: *Patterns of Dissonance*. Trans. E. Gould. Oxford: Polity Press.
- 1994: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rodribb, S. 1992: *Nothing Matters: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 Melbourne: Spinifex.
- Brown, R. M. 1973: *Ruby-Fruit Jungle*. London: Corgi.
- Brown, W. 1991: Feminist hesitations, postmodern exposures.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3(1), 63—84.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 and London: Routledge.
-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1997: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and Scott, J. W. (eds.) 1992: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ameron, D. 1992: The naming of parts: gender, culture, and terms for the penis among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American Speech*, 67, 367—382.
- Castle, T. 1993: *The Apparitional Lesbian: Female Homosexuality and Moder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arlesworth, S. 1997: *Changes in Working Class Culture in Rotherham*. Cambridge: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 Chodorow, N.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ow, R. 1991: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oole, D. 1996: Is class 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Radical Philosophy*, 77, 17—25.
- Deem, R., Brehony, K. J., and Heath, S., 1995: *Active Citizenship and the Governing of School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e Lauretis, T. 1989: The essence of the triangle, or taking the risk of essentialism seriously: feminist theory in Italy, the U. S., and Britain.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1(2), 3—37; reprinted in N. Schor, and E. Weed (eds.) 1994: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Delphy, C. 1984: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London: Hutchinson.
- Derrida, J. 1994: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Dinnerstein, D. 1977: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Colophon.
- Doan, L. 1994: *The Lesbian Postmoder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oyal, L. and Gough, I. 1991: *A Theory of Human Need*. London: Macmillan.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by A. Sherid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raser, N. 1997: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Friedan, B. 1963: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 W. Norton.
- Gatens, M. 1996: *Imaginary Bodies: Ethics, Power and Corpore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edalof, I. 1999: *Against Pur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forthcoming).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eer, G. 1971: *The Female Eunuch*. London: Paladin.
- Grosz, E. 1994: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araway, D. J. 1991: *Symians, Cyborgs, and Women*.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Irigaray, L. 1974 (1985):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Trans. G. C. Gill.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risteva, J. 1986: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 Moi. Oxford: Blackwell.
- 1992: *The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in Abjection*. Trans. L.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onard, D. and Adkins, L. (eds.) 1996: *Sex in Question: French Materialist Feminism*.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 Lovell, T. (ed.) 1995: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Marchand, M. and Parpart, J. L. (eds.) 1995: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Marcus, S. 1992: Fighting bodies, fighting words: a theory and politics of rape prevention. In J. Butler, and J.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Mitchell, J. 1966 (1984):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In her *Women and Revolution: Essays in Feminism,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Virago.
- 1974: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London: Allen Lane.
- and Rose, J. 1982: Interview. *m/f*, 8, 3—21.
- Moi, T. 1985: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Methuen.

- Moya, P. M. L. 1997: Postmodernism, "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Cherríe Moraga and Chicana feminism. In M. J. Alexander and C. T. Mohanty (eds.)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and Democratic Futur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Narayan, U. 1989: The project of feminist epistemology: perspectives from a non-Western feminist. In A. M. Jagger and S. Bordo, *Gender/Body/Knowledg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Nicholson, L. 1987: Feminism and Marx: integrating kinship with the economic. In S. Benhabib and D. Cornell (eds.) *Feminism as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d.) 1989: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Parpart, J. L. 1995: Postmodernism,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J. Crush (ed.) *Power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Rai, S. 1998: Engendere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Age? Warwick Universit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isation. Working Paper No. 20/98.
- Reay, D. 1997: Feminist Theory, habitus, and social class: disrupting notions of classlessnes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2), 225—233.
- Rich, A. 1977: *Of Woman Born*. London: Virago.
- Rorty, R.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 J. 1983 (1986): Femini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Feminist Review*, 14, 5—21. Reprinted in J. Rose, *Sexuality in the Field of Vision*. London: Verso.
-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 R.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Said, E.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Scarry, E. 1985: *The Body in Pai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or, N. 1994: Introduction. In N. Schor, and E. Weed (ed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ennett, R. and Cobb, J. 1993 (1977):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W. W. Norton.
-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London: Sage.
- Sokal, A. and Bricmont, J. 1998: *Intellectual Postures*. London: Profile.
- Spelman, E. V. 1990: *Inessential Woman*. London: Women's Press.

- Spivak, G. C. 1987: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 Weedon, C.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Wheelwright, J. 1989: *Amazons and Military Maids*. London: Pandora.
- Whitford, M. 1991: *Luce Irigaray: 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London: Routledge.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When was 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175, 48—52.
- Wilson, E. 1981 (1986): Psychoanalysis: psychic law and order? *Feminist Review*, 8, 63—78; reprinted in E. Wilson, with A. Weir, *Hidden Agendas*. London: Tavistock Press.
- Wittig, M. 1981 (1992): One is not born a woman. In *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arvester-Wheatsheaf.
- Wollstonecraft, M. 1992 (1792):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Press.
- Young, I.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7: Unruly categories: a critique of Nancy Fraser's dual systems theory. *New Left Review*, 222, 147—160.





第 13 章

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科学



S. 康诺尔

康诺尔 (Steven Connor) 是伦敦伯克贝克学院 (Birkbeck College) 现代文学与理论教授, 文化与人文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他写有大量关于 19 世纪与 20 世纪文学、文学活动与文化理论的文章以及以下著作: 《查尔斯·狄更斯》(Oxford: Blackwell, 1989), 《萨缪尔·贝克特: 重复、理论与文本》(Oxford: Blackwell, 1988), 《后现代主义文化: 当代理论引介》(Oxford: Blackwell, 1989), 《理论与文化价值》(Oxford: Blackwell, 1992), 《英国小说史: 1950 年至今》(London: Routledge, 1995)。他还编有《贝克特戏剧二种: <等待戈多> 与 <结局>》(London: Macmillan “New Casebook” 丛书, 1992), 《查尔斯·狄更斯》(London: Longman “Critical Reader” 丛书, 1995), 以及新人人版 (New Everyman Edition) 的狄更斯《奥列佛·退斯特》(London: Dent, 1994) 与《埃德温·德鲁德的神秘》(London: Dent, 1995)。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关于皮肤的文化现象学以及口技表达的历史。

- 13.1 文化社会学: 作为文化的社会学
- 13.2 现代性的文化
 - 13.2-1 齐美尔
 - 13.2-2 本雅明
 - 13.2-3 阿多诺
- 13.3 文化研究的兴起
- 13.4 文化、消费和后现代性: 贝尔与布希亚
- 13.5 文化价值: 布迪厄
- 13.6 女性主义与文化
- 13.7 文化和后殖民性
- 13.8 结语: 朝向虚拟文化

13.1 文化社会学:作为文化的社会学

以最狭义、最明确的方式界定,文化社会学意味着对文化的、人为的各种形式和实践所做的社会学考察。整个 20 世纪有形形色色的学者做了这方面的努力,例如齐美尔、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雷蒙·威廉斯、斯图尔特·霍尔、贝尔、布希亚以及布迪厄。这类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以一种特定的社会学眼光,去关注艺术、文学,关注更一般意义上的美学生活、文化生活,并且努力超出这些现象本身,从它们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更宽泛的意义来说明这些现象。

但是,几乎从社会学创建伊始,各个美学的、文化的领域就已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稳定的、自明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而且也表现为社会理论中一种更具实质性的问题。即使说“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分离出来,就意味着有必要区分“文化”与“社会”,但是,使用怎样的术语,可以确保这种区分,或许更重要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阐述文化,必须采取哪些特定的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对于这些问题,却几乎没有什么共识。而这也不单纯是一种局部问题或附带问题。实际上,在 20 世纪最为重要、最具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当中,有许多人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关注有关文化的问题,才能以明确的宗旨、饱满的动力,推进关于社会的研究。对这些理论家来说,问题与其说是有关各种社会形式和过程的考察如何可以启迪文化的、美学的活动,不如说是正好相反:在理解和解释艺术作品和美学效应时所使用的种种批判性、哲学性的技术,如何能够对整体社会生活的研究有所助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就出现了一种转向,文化从作为一种社会学的考察对象,转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的”或美学的社会学关注形式。如果说,我开始提出的文化社会学的狭义界定意味着,社会学只需拓展自身的操作领域,而无需质疑或改变自身,就可以对文化作出说明,那么,这第二种界定则意味着这样一种社会学,它与其研究对象的遭遇会改变甚至破坏它的问题域。

13.2 现代性的文化

13.2-1 齐美尔

据说社会组织正在转向一种特定的后现代形式,其特点就是社会结构和经验的美学化,詹明信已经把这种转向说成是文化向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规模庞大的扩张(Jameson, 1984: 87)。在许多学者眼里,与这种转向相伴而来的,是对社会理论

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关系转变的非常急迫的要求。但这种为了回应文化化的社会生活而产生的对于“文化化的社会学”(culturized sociology)的要求,其实在 20 世纪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体现在社会理论家为了解释现代性的意义与经验而做出的种种尝试上。近些年来,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 20 世纪前期的一些社会理论家的研究,尤其是齐美尔、本雅明和阿多诺的作品,他们对现代社会生活形式的分析所包含的社会学恰恰是从这些论题上入手的。

在这些学者当中,齐美尔的作品最先根据社会学阐述现代性文化的能力,来确定社会学本身的范围和各种可能性。齐美尔的作品所针对的,就是 19 世纪后期、20 世纪早期在德国、英国和法国逐渐成型的那种社会学,即把描述一般性的社会结构、制度和系统作为自身的目标,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履行社会学的诉求:以“社会范畴”为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与之相反,齐美尔的作品强调的是社会互动中的种种过程与经验,而不是在他看来固定为形式的社会之物化表现:

如果我们期望根据能够赋予形式的种种生成性社会力量来把握社会网络,我们就再不能认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编织起的精细而不可见的脉络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此前的社会学在留意描绘这种网络时,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根据它最为明显的层面上已经充分创造出来的那些定型模式。(Simmel, 1907a:1035)

齐美尔宣称,自己在方法论上倾向于社会互动当中偶变、具体、短暂易逝的东西,倾向于与客观结构相对的主体经验。在齐美尔看来,这种社会学对于处在现代的现在(modern present)尤其显得不可或缺,因为那种现在的经验正是心理范畴优先于物质范畴的经验。齐美尔在他 1911 年的《文化哲学》里宣称:“现代性本身的实质就是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就是从我们的内在生活的种种反应出发对世界的经验和解释”(Simmel, 1911:196)。这是因为,现代性就其本身性质而言,就会使个别经验着的主体无法利用社会理论提供的那些总体化的视角;而在齐美尔看来,这种纯概念性的视角正脱胎于对现代范畴之实质的背叛。如果社会学不仅要说明现代性,而且要表现现代性,那么它就必须要更密切地关注现代经验中强烈的情感和相对的性质。

关于这一点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异议:社会学的角色恰恰是要说明而不是表现,即便会牺牲栩栩如生的刻画。如果从几何学的角度来描述一个三角形,没有任何义务表现三角特性本身。当然,齐美尔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以表现替代说明,但他所主张的社会学是要能够维持它试图说明的经验特性,这就使他的同时代人

中有许多对他感到困惑并与之疏远。而到了晚近,齐美尔作品的印象风格,还有他对追求完善结构和总体说明的社会学所持的怀疑立场,都让批评家们震动不已,视之为某种特定的后现代社会批判的前驱,避免了社会科学传统上刻意追求的抽象和保持距离的说明(Frisby, 1992; Weinstein and Weinstein, 1993)。

换一个角度,可以把这说成是齐美尔以一种美学的方式而非科学的方式来把握社会关系。这不仅仅是说,齐美尔不想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阐述社会意义,而是要在作品当中唤起这种意义,并且实施这种意义;更确切地讲,这里说的是,在齐美尔眼里,现代社会生活种种特定的问题和冲突本身就已经表现为一种美学的形式。要想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得着重来谈谈齐美尔在自己的作品里发展出来的文化概念。这是因为,他作品里的冲突不仅仅在于美学经验和科学说明之间,而且在于文化和美学功能方面的不同概念之间。

齐美尔指出,人类文化是通过两种本质上相互对立的方式表现自身的。首先,文化事关各种实现(realization)形式。在各种作品、结构、技术和传统当中,人类文化的潜能生产出自身,表现出自身,而这些东西也会逐渐超出最初生产出它们的那些个人与社会,获得某种客观的存在。在这些外在的形式中,齐美尔归入了艺术品、宗教、法规、各种形式的科学理解、道德体系,还有其他许多东西。要想赋予人类发展中的种种生机力量以客观表达,就必须得有这些形式,即便如此,它们却有这样一种趋势,会在一定时间之后,对那些力量构成束缚乃至阻碍。而文化又力图抗拒或躲避这些限制,就会强使自己更新,就是说成为所谓“客体文化”的新形式。在“生命”与“形式”之间,或在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之间,蕴含着常演常新的冲突,而这种冲突逐渐展开的动力,也就生发出文化的历史,乃至文化具有历史这件事本身。齐美尔在分析这个展开过程的时候,除了当时盛行的尼采和柏格森的生机论(vitalism),也明显大量借鉴了黑格尔的历史动力说。而其中令人瞩目的就是它捕捉到文化的两种形式或维度之间那种永不停息的冲突。齐美尔如此写道:“生命只有通过形式才能表现自身,实现其自由;但形式也必然会窒息生命,阻碍自由”(Simmel, 1921[1968a: 24])。齐美尔相信,尽管文化的所有阶段上都典型地体现出这种辩证的张力,但在现代性中,张力达到了一种非常张显的强度。在齐美尔最系统的社会学分析作品,即其《货币哲学》(Simmel, 1907[1907b])中,他广泛而精细地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书中,齐美尔指出,当代社会生活中交换结构越来越复杂,劳动分工也在大量繁衍,这使得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产生了根本分离。在这种分离下,“每时每刻,各方各面,客体文化的财富都在不断增长,但个体心智要想丰富自身发展的形式与内容,却只能更进一步地远离那样的文化,以远为缓慢的步伐,来发展属于自身的文化”(Simmel, 1907b: 449)。



面对这种处境,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神经衰弱式的个体存在感的丧失,或是与坚持具有不受拘限的主体性力量相抗衡。因此,齐美尔可以在不同的时候,宣称现代性既典型地体现为客体文化的极度发展,也典型地体现为主体文化的极度发展。客体文化的极度发展,就是逐渐演变成“相互联结的闭合的世界,在其中,主体性的灵魂越来越找不到可以加上自身的意愿和情感的地方”(Simmel, 1907b:460)。而主体文化的极度发展,就好像表现主义绘画中所表现的那样,齐美尔从中看到了生命原则突破了形式的约束,在画布上创造出景象,“代表的是内在生活的直接凝缩,在其展开过程中,不允许任何表面的或异己的东西进入”(Simmel, 1921[1968a:16])。之所以会有这种明显的矛盾,是因为在“自我积极推进到向其屈服的客体对象的过程”(Simmel, 1907b[1990:460])中,客体文化和主体文化之间那种完满的交互性,在早先各时期尚有可能出现,而今已渐渐丧失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下,现代主体性的强化只是一种“困守一隅的敏锐”(retracted acuity)(Simmel, 1896[1968b:68]),表现出的是一种残缺无力,而不是无所拘束的自我认定。事实上,现代文化的独特之处就是文化的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之间的距离,齐美尔认为它愈益悲剧性地陷入无法转换的境地之中。

这种说法的核心是将社会生活看作从美学的角度安排的。早在1896年,齐美尔就在有篇题为“社会学美学”的文章里,指出美学类比存在于许多有关国家的政治理论中,尤其是那种颇具权威主义色彩的理论,不过也体现在当时他心仪的社会主义学说里。他写道:“社会追问……不只是一种伦理的追问,还是一种美学的追问”(Simmel, 1896:74)。《货币哲学》里在阐述有关劳动与其产品之间的异化时,似乎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异化阐述借鉴良多,但只是以强化的形式,再现了马克思大部分思想中美学的一面。齐美尔基本上是把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看作表现性关系,按照艺术实践的模式来思考这些关系。在劳动分工压倒一切的地方,“人就再也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自己;工作的形式开始与主体的心智不合,似乎只是我们的存在中一个高度专门化的部分,与人的整个总体毫无关系”(Simmel, 1907b[1990:455])。与此相反,艺术品是未异化的生产的典范,使齐美尔充满希望地看到,不管是在个体经济产品中,还是在整个社会生活里,诸如此类的主体与客体都有着统一的可能性:

在人的所有产品当中,艺术品是最彻底的自主整体,自足的总体,甚至有甚于国家(State)……艺术品只需要一个单个的人,但需要这个人全面地投入,直到他最隐秘的内心。而它给予这个人的回报,就是它的形式成为这个人最纯粹的反映,最纯粹的表现。作品的自主总体性与精神的统一性之间的关联,

既是对劳动分工的彻底拒弃的结果，也是它的症候。(Simmel, 1907b[1990: 454—455])

齐美尔在阐述社会生活时，对断片(fragment)的美学性质津津乐道。但这种对美学性质的感受和运用独具特色，强调的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表现性对应。早在他的“社会学美学”一文中，齐美尔似乎就已经主张，对于现代社会中各自分隔的具体之处，社会学的分析能够给予的关注本身的特性，就使社会学分析有能力修复部分与整体、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社会学的分析揭示出，这些方面在现代性的驱动之下已经变得分崩离析了。齐美尔在谈及“美学沉思和关注的实质”时，似乎就是在确定他后来实施的那种社会学的性质：

独特凸现了典型，偶然似乎就是正常，而表面和短暂也代表着本质和根本……只要我们充满爱意地深深投入哪怕是最普通的产品，那些孤立来看会显得陈腐不堪、让人厌憎的产品，将使我们同样能够把它当作万事万物之最终统一的光与影来体察，从中流露出美与意义。(Simmel, 1896[1968b: 69])

齐美尔有许多对其仰慕不已的学生，其中就有年轻的匈牙利人卢卡奇，他后来根据这种美学的理念，发展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形式之一。在卢卡奇看来，文化意味着具体与一般、个体与社会、偶然与普遍的统一。资本主义带来了高度的劳动分工，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全面的异化，使真诚的(authentic)文化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尽管在某些文化形式当中，尤其是在小说里，还有可能找到某种补偿性的重新整合。卢卡奇一直到晚年还坚持主张，整合一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整合一体的艺术品之间存在着类比关系，比如说，他认为，特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有能力通过小说的形式，发展出他发现19世纪巴尔扎克作品中隐约显现的那些性质，在后者的作品里，“整体始终呈现在部分之中……各种各样极其复杂的动机、相互关系和组合，都根植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之中”(Lukács, 1957[1963: 99])。甚至可以说，卢卡奇对社会矛盾的分析本身想要给出的东西，就像是对现实主义小说的某种安慰性的调和。伊格尔顿尝言：“卢卡奇的确是思考了矛盾的范畴，但始终表现为统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由多种矛盾组成的总体，因此，规定各个矛盾的是该矛盾与其他矛盾结成的统一体；有关矛盾的真理也就此体现为统一体”(Eagleton, 1990: 330)。



13.2-2 本雅明

本雅明对现代生活各种特定形式和能量的敏锐把握,似乎大多得自齐美尔。和齐美尔一样,本雅明也认为,对于文化的解释基本上是一种美学的东西。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此后开始与以法兰克福为中心的社会研究所交往,这个研究所的领袖人物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本雅明和他们一样,都强调由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发展起来的文化社会学,特别是通过他对阿多诺的影响,为研究所的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从未完全参与研究所的活动。和齐美尔一样,对本雅明来说,采用美学哲学所特有的那些关注技术与关注形式,采用艺术和文学批评,可以最好地理解现代文化的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种种政治经济形式已经将现实转变成美学表象,正是这种感觉驱动着本雅明,这一点也和齐美尔相似。不过,本雅明坚定地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现代文化的状况,这和齐美尔有着明显的分别,即使这只是意味着,本雅明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传统形式上,创造出新颖的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改进,在渐已堕落的现在状况中捕捉到发生革命性转型的可能性。在本雅明的眼里,现代性既是一场噩梦,也有可能走向一种乌托邦。从根本上说,现在的可能性之所在,恰恰是被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仅仅是从某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基础”中游离出来的那些次生的或属于“上层建筑”的经验。

本雅明对现在的分析的核心,就在于对未曾被吸纳的断片的高度关注。他和齐美尔一样,都密切留意现代生活中的附生现象,留意大众文化中那些典型但总是短暂即逝的经验:人群、街道、购物以及时尚。本雅明从齐美尔那里继承了对社会学想像中形式业已限定的整体的怀疑,但在社会理论的美学重塑方面走得比齐美尔更远。这是因为,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悖谬性质,本雅明的感觉更复杂,更深入。对本雅明来说,美学理论无法为现代生活的异化提供任何简单的补偿,因为这种异化中有那么多成分正是以美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生活受制于商品交换致命的魅力,一切都始终是同时处于狂热的交换过程和市场铁律的严格控制之下,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已经向本雅明揭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实际存在的社会过程和政治关系都被冻结为事物之间,也就是供售卖和交换的客体对象之间,各种关系的幻象形式。本雅明认为,现代商品消费会使自觉意识陷于麻木,以幻象的满足(fantasy-gratifications)替代实际的欲望,以此废除所有的政治冲突和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学的历史本身在像齐美尔和卢卡奇这样的批评家眼里,会被视为对现在的种种过剩的矫正,但却会被商品资本主义利用来产生虚假的总体化,以此将社会生活转变成一种梦想或神话。在纳粹党对文

化的利用中,这一过程获得了一种特别具有潜力的形式,本雅明将之描述为著名的政治美学化(Benjamin, 1970: 243),即从美学展示和景观的角度来重新构建社会生活,以感觉替代理性,以强度替代复杂性,以形象替代结构,以大众的遵从替代批判性对立。至于齐美尔,迟至1917年,他还极力赞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可能起到去浊扬清、化零为整的作用,认为这会“为文化的客观要素提供一种新的动力,重新纳入新的范围和激励,挣脱那种刻板与促狭——它们业已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一片混沌,充斥着相互脱节的个体要素,没有任何共同的风格”(Simmel, 1917[1976: 264]),这表明齐美尔本人未能完全摆脱被美学化了的法西斯主义强力的诱惑。

本雅明作品的宗旨,就是要拆解这些包含着文化的虚假总体性形式,就是要拆解总体化的文化观所导致的历史连续性的梦想。齐美尔和卢卡奇从文化中看出能够提供被现代性撕裂的一体性,而本雅明则从文化中看出现代性本身那些单调沉闷的整合中蕴含的更大暴力。针对这些认识,本雅明着手对文化断片进行研究,而他的分析总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总有可能带来一种让人震愕的崭新意识,或是难以忘怀的印象。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一直到1939年他英年早逝之时,本雅明在自己最庞大的作品上默默耕耘。弗里斯比详细记叙了这个过程。但这部作品本身依然是断片式的,是未完成的。所谓的“拱廊街计划”(Arcades Project),就是有关19世纪巴黎“现代性前史”的研究,核心是豪斯曼理性化影响下创建起来的这座城市的建筑及给人带来的体验。*本雅明从未完成过这部书,这似乎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因为书的形式似乎有意从开篇起就贯穿着非连续性的原则。本雅明自己曾经写道,这部书是想尝试“把蒙太奇的原理带进历史”(Benjamin, 1982: 575,引者英译)。本雅明作品中对具体的东西的这种敏锐把握,曾经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为阿多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例。但即便是阿多诺,最初也被自己读到的此书早期手稿中不成篇章的断片性质弄得灰心丧气,虽说他后来也开始相信,断片性本身就属于这部书的根本雄心,要“舍弃一切表面外在的构思,让它的意蕴从对于素材的震愕式蒙太奇中浮现出来”。阿多诺对此的评断是:“断片式的哲学也停留在一种断片的形态上,或许是它所使用的方法的牺牲品,对于这种方法,它还尚未确定究竟可不可以纳入思想的媒介”(Adorno, 1970: 26)。

* 豪斯曼(Haussmann, Georges Eugène, 1809—1891): 法国行政官员,将巴黎从古代格局改建成现代形貌的主要负责人。其城市规划理念对世界许多大城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拿破仑三世的军事专制统治下,他对巴黎实施了庞大的公共工程建设,特别是在严格规划下建造了许多宽敞直通的大路,既改善了交通,又使传统上巷战多发的巴黎适应了现代集权国家军事治理的需要。——译者注

在本雅明看来, 社会理论家既不是先知, 也不是技术专家, 而是残片遗迹的搜集者; 这些残片遗迹为官方历史和文化所拒绝吸纳, 从而面临湮没的危险。搜集活动从对象所处的表面上自然确定的背景中, 把对象一一捕捉出来, 并在一些令人震愕但也予人启示的新的型构 (configurations) 下, 或者用本雅明自己提出的术语, 在新的“格局” (constellations) 下, 和其他对象并置, 这样的处理方式正符合超现实主义的蒙太奇实践。搜集和蒙太奇的原则有助于实现这样的雄心: 拆解关于文化的各种总体阐述或普遍历史所蕴含的连续性。本雅明认为, “思辨的”历史徒劳无益地将具体的东西编入平滑、连贯的序列; 他对这种历史深表怀疑, 转而倾心这样一种分析模式, 可以“从时代的实体化了的**历史连续性**中剥离出时代, 从时代中剥离出生活, 又从生活的工作中剥离出工作” (Benjamin, 1979: 351—352)。对于人类的文化成就, 长久以来的观点一直未能充分认识到始终参与艺术生产的所有那些压制性、矛盾性的社会条件。本雅明对这种观点也同样刻意提防, 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没有一个文化记载不同时是对野蛮 (barbarism) 的记载” (Benjamin, 1979: 359—360)。

因此可以说, 本雅明的文化分析模式让两种美学相互对峙: 一种是超现实主义的震愕美学, 另一种则是整合美学、调和美学。本雅明文章中后来最具影响力的一篇, 即 1936 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就着重刻画了这种特殊的冲突。在这篇文章里, 本雅明集中探讨的是, 20 世纪通过录音、摄影和电影之类形式明确显现出来的复制技术的极度扩张, 对艺术产生了怎样的效应, 而艺术又是如何接受这些效应的。本雅明认为, 此前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中, 最根本的是两种特性: 一是它们的距离特性, 他指的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一种超验的疏离; 再就是新颖性 (在此前各个时代, 艺术作品或许可以被复制, 但这些复制品始终会回溯到原创作品那无法复制的独特性质)。这两种特性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本雅明所谓的艺术作品的“气韵” (aura)。复制的种种形式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多能, 它们的发展既意味着现存艺术作品和艺术形式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力量和权威逐渐消散, 也意味着在新兴的艺术形式中, 新颖性的观念已非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 本雅明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电影。把电影看作是复制了某种单个的表演, 这种表演曾经在什么地方发生过, 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是同时发生的。但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相反, 必须把电影看作是通过剪辑重组的过程, 对一种现实进行的构造, 而剪辑重组就是构造所采用的技术手段 (Benjamin, 1970: 232)。

本雅明把“气韵之枯萎” (shriveling of the aura) (Benjamin, 1970: 233) 看成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但对此他的看法很是含糊。一方面, 它在艺术领域产生了一种广泛

的去神秘化和民主化的效果,人人都被推到技术专家的位置上。在本雅明看来,大众文化形式的消费者在分析上所具有的资格能力,无异于这些形式的技术所产生的震愕效应。从电影中,本雅明发现了某种布莱希特所称的“异化(Verfremdung, alienation)美学”,认为电影这种艺术中断而非促进了连续性现实的幻觉。电影积极干预了现实,而不是顺从地呈现现实。它把摄影机变成了一种修辞技巧;通过“它的升降起落,它的中断和分离,它的延伸和加速,它的放大和缩减,它向我们揭启了无意识的眼界,就好像精神分析向我们揭启了无意识的冲动”(Benjamin, 1970: 239)。本雅明把电影的特征概括为从技术上体现了达达主义的核心所蕴含的那种对于气韵的革命性冲击。

但是,随着他的文章的推演,本雅明这些关于大众文化形式在转换情感与知觉方面所具有的潜力的主张,调子又开始缓和;他发现归根结底,电影在分析上所产生的冲击会在重复和愈益增长的熟悉性之下变得麻木。电影的观看以及整体上的大众文化都典型地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中的接受”(Benjamin, 1970: 242),这就使充满气韵的艺术作品传统上要求的那种特定的关注性质趋于消散,使可能产生的革命性觉醒趋于迟钝:“公众确是审查官,但却是心不在焉的审查官”,本雅明做出了如此判断。对于大众文化形式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在这篇论文的结尾处表现得尤为明显。本雅明在文章结束时,以阴郁的笔调,思考了“美学引入政治生活”(Benjamin, 1970: 243),他将这个过程看作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本雅明的结论是,共产主义理应通过将艺术政治化,来抗拒美学的诱惑。但行文至此,已不再能够清楚地说明,是否可以认为,大众文化的种种形式——在本雅明撰写此文的时代,纳粹党无疑是非常娴熟地运用着这些形式——提供了美学资源,以滋养这种反美学的自觉意识。

13.2-3 阿多诺

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态度是鲜明的。他认为本雅明对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的区分过于简单,并在1936年的一封信筒里就此提出了批评;至于本雅明主张的电影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中的新技术所蕴含的颠覆潜力,他也不以为然地评论道:“一个顽固守旧的分子会凭借对卓别林电影的专业知识而转变为先锋派的成员,这种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观念实在让我惊讶”(Bloch et al., 1980: 123)。在同一封信里,他还批评本雅明把高雅艺术或自主艺术说成是不具备充分的辩证性质,换句话说,是未能充分地关注此类艺术中的种种悖谬状况与可能性,认为这样的阐述过于悲观。“一件自主艺术品的核心本身并不属于神话……但却具有辩证的本质;它自

身当中便同时蕴含着神秘的因素和自由的观念”(Bloch et al., 1980: 121)。我们已经看到,对本雅明立场明显模棱两可的文章的解读,阿多诺却以如此缺乏辩证态度的方式,来指责本雅明对当代文化状况的解读,对此可以说阿多诺本人要负责任。但是,这两种批评正预示了此后 30 年阿多诺有关文化问题的著述中的两大关注焦点:一是在《启蒙辩证法》中题为“文化工业”的一章里,对于当代大众文化提出的激烈批评;一是在他规模宏大但未能完成的《美学理论》中就阐述美学价值的性质所作的艰苦尝试。

阿多诺有关大众文化的阐述是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时与霍克海默合作提出的。他俩的《启蒙辩证法》初版于 1944 年,书中两位作者认为,艺术和文化已经深陷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发展起来的那种深重的困境。最初在 18 世纪兴起的那种启蒙运动的冲动,是要将人类从无意识地受自然支配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理性、真理、科学和技术主宰,这些都是人类精神挣脱受本能奴役的无反思状态所仰赖的手段。这种解放性的驱力必然要通过一种支配意志 (will-to-domination) 来表现自身。这种支配意志开始是施加在自然世界上的,但越来越扩展到人类世界,因为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对社会生活施加越来越广泛的控制。因此,理性从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扭曲成一种计算性支配 (calculative domination) 的工具。虽然代表支配性社会关系最发达形式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尽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著作明显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们却认为,比资本主义剥削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表现出的朝向理性化或行政操纵化社会的驱力。《启蒙辩证法》中“文化工业”一章试图揭示的就是:即便是艺术及其感官愉悦所代表的那些具有一定形式的自主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已经受到理性化资本主义的支配。文化工业所证明的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对社会关系的理性化构成反证: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快乐,尤其是电影和流行音乐所带来的快乐,提供了一种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的幻觉,而实际上发挥的功能却是延伸了工厂和办公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大众文化中无所不在的欢笑声斥之为“对快乐所实施的欺诈手段”(Horkheimer and Adorno, 1944 [1986: 140]), 代表着自我批判意识陷于麻木呆钝,而只有具备这样的自我批判意识,才能让现代世界里患有幽闭恐惧症和自我认同,向可供选择的其他观念和经验开放。在他后来的著作里,阿多诺开始越来越悲观地相信,被愈益压制性地整合起来的社会所吸纳,这样的危险会影响到艺术实践的所有形式,哪怕是那些似乎与社会经济过程相对立甚或干脆就不相干的实践形式,因为“通过牺牲它与实践 (praxis) 所可能产生的关系,文化概念本身就成为了组织机制的一种具体体现;文化中原本因其一无益处而恼人不已的东西,而今已转变成可以容忍的否定性,甚至是从否定的角度上说有益的东西——它成了系统的润滑剂”(Adorno, 1991:

102)。

面对这些整合愈益严密的情势,艺术的惟一希望并不在于以齐美尔和卢卡奇所赞同的那种方式来提供调和的途径,而是在于强化并利用它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矛盾位置。阿多诺集中探讨了艺术相对于日常社会生活所享有的自主性的问题。这种自主性是在18世纪发展起来的,在1790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被提升为有关艺术本质的一种不容置疑的准则。而在阿多诺看来,艺术从实际生活中分离出来,这样的状况既蕴含着可能,也预示着无力。正是社会生活的愈益商品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之中心地位与内蕴宗旨的失落,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如果艺术不关注收支利益,那它就必然会表现得越来越外在于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恰恰是受这些必要条件主宰的。因此,艺术作品就会纯粹从否定的角度来确定自身,作为从社会生活中滤除杂质光线的过程。但恰恰是这种与世俗关注的距离,也可以确保批判的可能性:处在一个以愈益强大的整合力量为基础的系统之中,又遵循着一种愈益涵括一切的“同一性原则”(identity-principle),艺术之所以还能是强有力的,正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缺陷,或者是某种难以理解性的原则。在阿多诺眼里,或者从某种角度上说,在本雅明眼里,艺术和真诚的文化体现的是“对特殊高于一般的永恒诉求,只要后者尚未与前者取得调和”(Adorno, 1991:98)。《美学理论》里用更为哲学化的术语如此表述:艺术的宗旨就是“协助非同一性的东西抗御主宰现实的压制性同一化迫力(repressive identification compulsion)”(Adorno, 1984:6)。

但是,就像阿多诺思想中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对于这一点,也有一种与此对立的隐秘真理。这是因为,艺术在远离商品化和理性化支配的种种力量的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在自身的性质中再生产出了这些作用机制。艺术作品以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专门化的方式,沉湎于自身的各种作用机制和技术,以此来衡量自身与这个世界之间的距离。这种严苛的自足对抗着商品关系的一个特征,即世间万物皆可不加分别地相互交换;但它又验证了商品关系之规则的另一面,即商品在创造出自己的那些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面前,却似乎享有一种令人难解的自主地位。就这样,艺术技巧的拜物教既与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商品拜物教相抵触,又不折不扣地反映了后者。艺术作品只有在不真实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只有在最有可能沦为意识形态的时候才最为切近真理:“艺术作品摆脱了交换、利益和人的虚假需求等肢解性的势力,成为万事万物之全权代表”,阿多诺如此宣称(Adorno, 1984:323)。但他还是提请我们记住:出于同样的原因,“作为不可交换之范畴的意象(imago),艺术与意识形态相汇合,因为它让我们相信,世界上的确有些东西不是拿来交换的”(Adorno, 1984:

123)。与此类似的是,不管是在抽象绘画里,还是在勋伯格及其追随者的十二音音乐中,*艺术作品越来越关注它自身的技术问题,这既与现代社会关系中的支配规则相抵触,也验证了后者。作品对其自身形式的控制,是对经济关系的理性原则的否定,哪怕说它是一种极端的主宰,模仿了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作用的那种理性化的权力意志。在阿多诺看来,艺术“是世界除魅过程的要害……它与理性化过程相互绞缠,难以分解”(Adorno, 1984: 80)。

有鉴于此,艺术的功能就必然不只是在于否定,而且还始终在于自我否定。在同一性原则那毫无特征的表面上,艺术能够成功地撬开意外的裂缝,就此而言,它肯定不能按照自己的美学角度被统一或整合:“艺术作品中使作品得以超越现实的那个因素……并不在于实际上实现的那种和谐,不在于形式与内容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某种可疑的内外统一,而要那些出现歧异的特性中去找:就在于对同一性的激情追寻之中”(Horkheimer and Adorno, 1944[1986:131])。艺术通过表现自身注定的失败,甚至是坚持这样的失败,就可以指向在未来某个乌托邦社会中,特殊与一般之间某种更为真实、更少支配性的综合。

阿多诺的作品之所以意义重大,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敏锐地把握了艺术作品的形式与这些形式在其中成形的那些社会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20世纪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文论都持有这样一种假定,认为进步的艺术应该能够朝向一种更为统一的文化,对抗和弥补现代社会生活中缺乏人性的分裂与异化。而阿多诺则强烈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关系当中整合原则的核心地位,有时甚至言过其实了。这就使他更加关注艺术在联结自身与现实方面的失败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涵。这还使他在分析艺术形式的社会意涵方面比别人更为精细。卢卡奇在“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文中,将现代艺术和文学中的形式主义斥之为复制了发达资本主义所推进的那些分裂(Lukács, 1957[1963:17—47])。而阿多诺所主张的则可以说是艺术表面上对自身的关注所具有的社会意涵。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作品表现得与日后有关文化的各种社会分析关联最为密切。

* 十二音音乐(12-tone music)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按十二音作曲法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一般认为系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首创;其他不同程度按此技法创作的重要作曲家还有斯特拉文斯基、韦伯恩、贝尔格(后两人皆为勋伯格学生)等。在这种创作体系里,全部12个音之间的特定关系本身(而不是某一个或几个音本身)成为创作中起统一作用的中心原则。——译者注

13.3 文化研究的兴起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就在于它赋予艺术和文化相对于种种社会政治作用机制的重要性。法兰克福学派中的这一关注重点传给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英国发展起来的文化社会学，并在随后几十年，进一步扩展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文化研究”的学科名目之下所进行的研究当中。至于这项工作的根源，则在于 20 世纪 40、50 年代，以《细察》(Scrutiny) 杂志为核心，由利维斯为首的一个群体，就大众文化和少数文化(minority culture)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颇有些操之过急的分析。但此类研究最具决定性的推动力，还是来自雷蒙·威廉斯的早期著作。雷蒙·威廉斯的研究所借取的强大的文化批评传统，至少可以一直回溯到阿诺德，并融合了马克思与滕尼斯(Tönnies, 1955)的作品所代表的德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一股传统；这股传统的典型特征就是针对理性化、断片化的现代文明社会，设定了一种有关真诚的人类文化或者有机共同体的理念。但雷蒙·威廉斯在其早期作品《文化与社会：1780—1950》(Williams, 1958)中，尤其是在《漫长的革命》(Williams, 1961)中，将这种文化理念和一种视野宽广、界定明晰的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后者可以区分出文化的不同意义和功能，并且加以精确的评价。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有关文化的社会学分析最终得以在英国兴起时，是出自受训于文学作品分析的一批学者的研究，而不是出自社会理论本身。这期间的部分原因或许在于，英国知识生活中传统上一直存在着文人文化和社会分析传统之间的深刻分野，前者按照自身的主张，坚持文学传统的自主性和力量，而后者则往往比欧陆的同道们更多地扎进错综复杂、充满细节的经验研究和统计调查之中。再有部分原因，则想必在于至少从一战以来，甚或从战前开始，文学和文学研究就在英国享有凛然的声望。这种局面所导致的结果，佩里·安德森曾经描述为相比于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种种雄心勃勃的社会理论，在英国缺失一种总体化的社会学想像力，而这也使得他们一直用来提供总体化阐述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理念只能派此用场(Anderson, 1992)。

在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里题为“文化的分析”的重要一章，起首便试图协调有关文化的三种不同定义，即“观念的”(ideal)定义、“文献的”(documentary)定义和“社会的”定义。“观念的”文化就是在特定的时期中，在特定的社会里，那些可能永恒地或普遍地为人类所应用的价值观念的发现过程。“文献的”文化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和想像产品中，对各具特色的文化成就的记录。而“社会的”文化就是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如字面所言，它不仅仅通过不朽的艺术创作来表现，而且还经由各种社会制度和实践来表现(Williams, 1961[1965:57—58])。坦率地讲，这

■ 些范畴有些混乱,因为它们彼此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都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把它们看作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出“永恒的”价值观念如何能够完全从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社会的活动,由于这种社会在时间上必然是有限的,所以这些价值观念也应该受时间限制)?或者,是不是可以认为,它们是人类生活中同一种本质特征的不同侧面或不同看待方式(但这样的话,由于文化的“社会”定义必然包含了其他一切东西,又很难看出这种定义如何能够单作为整体的一个方面,可以简单地和其他方面加到一起)?对此,雷蒙·威廉斯的回答独辟蹊径:他先区分出不同的区域或方面,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种种关系和相互作用,再根据这些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完整性和独特性来确定文化。“无论这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有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努力把这个过程作为整体来看,将我们的具体研究联系到……实际存在的复杂的组织”(Williams, 1961[1965:60])。

在本书以及他更早写的《文化与社会》里,雷蒙·威廉斯具体关注的是第二种范畴和第三种范畴之间的关系,而他的创新之处在于要求从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来看待这两者。历史分析的传统是把艺术、文学和文化成就单单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各种实际利益的附属或延伸,而特定的文学分析形式则将艺术作品看作形成了一种自主的传统,而社会生活只是其单纯的背景。针对这两种传统思路,雷蒙·威廉斯主张“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把艺术和社会联系起来,而在于考察所有的活动及其相互关联,不允许我们可以选择抽取的其中任一方面具有优先地位”(Williams, 1961[1965:62])。

事实上,这方面雷蒙·威廉斯的立场比他早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更为强硬,原因只是在于他一心想要通过或者遵循自己偏好的具有历史包容性的分析形式,坚守某种特定的有机联合的文化理念。尽管雷蒙·威廉斯对一个社会中的冲突和矛盾十分关注,但他还是从自己称之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生活”(general life)或“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角度来确定该社会的文化。对于后一个术语的界定,雷蒙·威廉斯颇费思量。一个文化的情感结构就是该文化对自己拥有的连续性和深刻性所具备的那种直接而精微的感觉。据称,具有客观特性的界定范围与组织机制,以及难以捕捉、需要通过直觉直接把握的那种经验,在情感结构中融为一体。但雷蒙·威廉斯几乎马上就陷入了与这个概念的对立之中。比如,当探讨到19世纪的整个英国文化时,甚至是19世纪40年代的整个英国文化时,雷蒙·威廉斯本人开始提供纷繁复杂的例证,包括各种阶级、世代、亚文化以及其他相互竞争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冲突和内部歧异,此时再将情感结构视作“对一种本土特定风格的颇为独特的感觉”,视作“我们相当亲近的一种生活方式”(Williams, 1961[1965:64]),这样的观念几乎经不起片刻的对照。雷蒙·威廉斯的独到之处,就是将“情感结构”概

括为“普遍组织中所有要素之特殊的、活生生的成果”(Williams, 1961[1965: 64]), 并且持有一种强烈的规范性认识, 将整体性当作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 并且以上述立场作为出发点。这样一来, 有些文化似乎就比其他文化具有更多的“整体性”, 而作为一种文化的那个整体的某些要素, 也有可能比其他要素更真实地表现出它的“普遍生活”。重要的是, 即使说雷蒙·威廉斯拓展了理当视作任一特定社会中各种形式的创造性表现或“心智所及”的界定范围, 比如说提请我们注意到, 与艺术和文学一样, 工业和各种社会制度也都发挥着表现性功能(Williams, 1961[1965: 88]), 但他的早期著作却倾向于把艺术和文学尊奉为直接表现了一种根本上的整体, 即“整个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实际生活”(Williams, 1961[1965: 65]), 从而相应地限制了上述界定。

虽然如此, 雷蒙·威廉斯有关艺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点还是相当有影响的。他的研究和霍加特(Hoggart, 1958)与历史学家汤普森(Thompson, 1963)的研究合在一起, 标志着一种独具英国特色的文化社会学形式开始出现, 在随后的 25 年中又发展成“文化研究”的学科。这项工作的核心重镇最初是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64 年开始由霍加特领导, 1968 年后转由斯图尔特·霍尔主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聚集和影响的那群人的研究之所以令人瞩目, 在于它们认真地关注通俗文化特定的各种形式和价值观念, 这些特定形式与价值观念不仅体现于利维斯作品代表的依然占主流的文学批评十分蔑视的电影电视之类大众技术, 而且体现于各个世代和亚文化所独具的自我表达风格, 例如服饰、发型和音乐(参看 Hall and Jefferson, 1976; Hebdige, 1979)。即使说雷蒙·威廉斯所持共同文化的理念中那种浪漫主义的念头不时偏离这项工作, 但是, 对于文化, 它也还突出地表现了非常循规蹈矩、具有传统“社会学”味道的认识, 认为文化处在社会权力的复杂关系限制之中。这种立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阿尔都塞的研究, 后者对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等地的文化研究极具影响。阿尔都塞曾经指出, 文化既不是什么社会整体的表现, 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中“实存的”经济关系次要性的发散, 而是一种相对自主的结构, 与其他诸如此类的结构共处在一个型构之中。阿尔都塞借鉴了结构主义学说, 力图确定主宰社会生活不同区域之间关系的一种特定的“结构因果性”(structural causality)。具体而言, 这背后还仰赖于这样一种观念, 就是说各种社会文化制度会发挥作用, 生产和再生产出个体与群体之间想像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正是这些关系维持着各种阶级支配模式。在阿尔都塞的作品里, 或许最富特色、最具影响的

* 常简称 CCCS 学派。——译者注



是它的这种主张：社会生活不仅围绕着经济关系的再生产而组织在一起，而且还围绕着社会文化关系的再生产而组织在一起，后者的过程与经济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具有同样的“物质性”。而这个过程的核心，便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这里所理解的“意识形态”，不单是作为某些社会群体特有的信念模式，而是作为个体与群体解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时所借助的那些被普遍化了的¹理解结构和情感结构（Althusser, 1971）。阿尔都塞既认为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支配几乎是总体性的，但也同时相信可能有一种意识形态分析的科学不受制于其效应。部分根据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解释，阿尔都塞对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借马舍雷的作品（Macherey, 1966）为中介传播的，后者似乎提供了一种颇具启发性的方法，凭借它可以考问文学作品是通过哪些方式，既再生产出意识形态，同时又在内部与意识形态相远离，或者是把它展示出来，以供批判性的细察。

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逐渐远离雷蒙·威廉斯早期著作中对文化的有机统一的强调，转向对文化的各种社会形式和意义进行更为严格的结构分析。这个运动事实上受到了雷蒙·威廉斯自己日后的文化分析当中发生的转向的推动，比如《马克思主义与文学》（Williams, 1977）和《文化》（Williams, 1981）。后一部著作承继了《漫长的革命》中的那种观念，即两种看待文化的方式之间的明确张力，一种是从包容性、人类学性的角度，把文化界定为“整体生活方式”，另一种是从更具观念性的角度，把文化看作是艺术产品和思想产品中对于那种生活方式里富于启示的精神的表现（Williams, 1981: 11—12）。但是，雷蒙·威廉斯早期作品里认为这两个层面是通过将文化视为表现的观念统一起来的，而他的后期作品则利用并同时自己也发展了这样一种文化观念，从一般性的角度，把文化看成“**表意系统**”，社会秩序必然要通过它（尽管还有其他一些方式）来得到沟通、再生产、体验和探求”（Williams, 1981: 13）。不仅把握文化中的表现性成分，而且是把握作为一种沟通形式的整个文化秩序，就能够在把握文化实践的时候，不仅仅视其为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表现，而且视其为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构建。这似乎也使雷蒙·威廉斯的作品愈益敏锐地感受到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动态不均衡性，这与他早期更为静态的文化观，即认为文化系由单一的情感结构统一在一起，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有一段摘自《文化》的阐述，反映了雷蒙·威廉斯有关文化社会学的性质与宗旨的成熟观念（Williams, 1981: 29）：

文化社会学家或文化史学家所研究的就是这样一些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它们所生产的不仅是“一种文化”或“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些动态的实际状况和作品，其中不仅有连续性，有一以贯之的决定作用，还有

种种张力、冲突、决断与无所决断、创新,以及实际的变迁。

13.4 文化、消费和后现代性:贝尔与布希亚

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的文化分析中有许多是以现代性状况为分析核心的。诸如此类的分析时常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出发点:文化的问题就是整合的问题。在齐美尔那里,就是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的整合;在本雅明那里,就是艺术作品与技术复制之间的整合;在阿多诺那里,就是艺术与商品交换之间的整合;在雷蒙·威廉斯那里,则是精英文化与有机的整体生活方式之间的整合;而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整合,则几乎是整个这段时期内的普遍共识(参看 Huysse, 1986)。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一些社会理论家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关注战后普遍富裕和无所拘束的消费的时代中急剧变化的文化状况。在这些理论家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一股颇有些不同的视角。詹明信观察到,在20世纪下半叶,商业贸易稳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现代主义所担忧的所谓文化的衰减和灭绝,而是“一次爆炸:文化在整个社会领域里迅猛扩张,以至于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一切,从经济价值和国家权力,到实践活动,乃至心理本身的结构,都可以说成为‘文化的’”(Jameson, 1984: 87)。这样的见解可谓极其简洁地概括了这些变化了的状况。如果这种情形诚如其言,那么文化的问题也就不再可以是整合的问题了,因为消费社会的增长对文化机制和经济机制的同化程度,已经使得几乎无法再把这两种作用机制区分开来。这不仅仅意味着真诚的文化业已被商贸的过程所吞噬,因为根据许多理论家的说法,也明显存在着反向转型的迹象,在这种转型当中,销售、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过程都逐渐“美学化”了。如果再把此类过程单单作为抽象的结构来考虑,与它们所引发的欲望和满足的体验相脱离,就无法理解这些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有关消费社会的分析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丹尼尔·贝尔和布希亚两位。尽管他们的研究就消费社会的性质和效应得出的结论相当不同,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途径却比较类似。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初版于1976年,指出发达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受到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脱节的困扰。一方面,是工作、勤俭、责任等与资本主义维系在一起的“正式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是大众消费社会所释放出来的种种能量与欲望,在这样一类社会里,大部分人口开始可以享用到种类急剧增多的商品与服务。就生产而言,资本主义似乎依然要求某种新教伦理的自我约束性格结构,以及分化的、理性化的社会关系,韦伯曾经分析,这样的社会关系既是这种性格结构的忠实反映,也是其造成的后果。

■ (Weber, 1976)。但就消费而言,占据至高地位的是不受羁绊、自我扩张的人格的价值观念,以及它那种兴奋、强烈、易变的欲望。因此,当代生活中在以下两方之间存在着彻底的脱节:一方面是这样一种技术秩序和经济秩序,主宰这种秩序的是“从效率和功能理性的角度界定的经济原则,通过对物——包括作为物的人——的安排来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则是这样一种文化,“挥霍无度,来者不拒,受一种反理性、反理智的性情所主导,在这样的性情下,自我被当作文化评判的检验标准,而对自我能产生怎样的效应也就成了经验的美学价值的衡量尺度”(Bell, 1979: 37)。贝尔的分析的力量就在于它不是简单地把这种情形认作现代性中的一种矛盾,而是认作现代性中的一种双重约束。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会产生出矛盾的对立双方,作为自身性质的一种必然要求。

就消费社会中社会范畴与文化范畴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贝尔描绘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历史。20世纪前数十年所经历的,似乎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与艺术上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之间一种显著的对抗。真诚的文化或先锋派的文化宣称自己坚定地对抗资产阶级狭隘的物质主义理性。尼采、劳伦斯、伍尔芙、乔伊斯,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的作品所体现的那种现代主义,是凭借着贝尔所谓“自我无限膨胀的自大狂”(megalomania of self-infiniteization)来维持的(Bell, 1979: 49)。在尼采的引导下,现代主义文化把欲望和自我无限扩张所具有的美学价值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奇怪的是,这股现代主义的挑战绵亘良久,对此贝尔深表兴趣。有些人会宣称,现代主义已经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而贝尔则针锋相对地主张,艺术当中表面上看来那种独特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其实只不过是现代主义美学原则的一种强化,以至于某些早期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比如通过艺术形式来安排欲望和本能,本身也受到了挑战和颠覆(Bell, 1979: 51—52)。不过,在他的分析当中,更重要的是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对于大众社会本身而言的普遍渗透以及合法化过程。贝尔这里指的是,商品化和消费的兴起会通过这样一些渠道,使此前作为文化少数派所持有的对立理念的流动、变迁和自我极度扩张等经验,成为可以普遍享用的经验。因此,在贝尔看来,后现代主义所意味的并不是对现代主义理念的克服或逆转,而是这些理念普遍渗透到整个社会中去:“在艺术中实现的文化的自主性,而今开始渗透到生活领域当中。后现代主义的倾向要求,此前在幻想和想像中表现出的东西,也必须同样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艺术与生活之间没有任何分别。任何在艺术中可行的东西,在生活当中也同样是可行的”(Bell, 1979: 53—54)。因此,根据这样的说法,现代主义在针对处在资产阶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来确定自身时,也就不自觉地与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未来结成了同盟。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现代主义最终都表现为这种未来的必要前奏。

布希亚的早期作品在风格和立足点上都与贝尔相当不同，但在不少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契合。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布希亚写出了一系列著作，以此发展出一套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后者认为，文化领域里的价值观念多少是直接受某一特定社会中获得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在这些著作里，尤其是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Baudrillard, 1972)和《生产之镜》(Baudrillard, 1973)中，布希亚主张，原本据称，经济过程以及使用价值是根本性的，支撑并生产出文化领域里的价值观念，但事实上，后者已经获得了相对于前者的首要性。如今最为重要的不是劳动和生产的“现实”，而是主宰着价值之生产与流通过程的语言和符码(codes)所具有的自主调控力量。对于文化范畴与经济范畴之间关系的这种理论分析，其大部分内容早在布希亚初版于 1970 年的《消费社会》中有关消费社会的阐述里就已经有所预示。这种分析的核心观念在于，消费社会将经验和商品美学化或者“文化化”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消费社会的基础不是短缺，而是过度生产。如果对于一样产品没有任何一致的或明显的需求，就必须借助广告和市场营销策略，积极地刺激诸如此类的需求。而这些广告和市场营销策略在活力和多样性上，都有压倒实际生产过程的危险。一种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会紧密围绕着物品的生产，以满足已知的、既存的需求；而一种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则会紧密围绕着尚未存在的需求的生产，以确保据称会满足这些需求的物品的市场。布希亚集中以杂货店的制度为例，说这种制度“实行着一种符号的杂合(amalgamation of signs)，把各式各样的物品都看作符号的普遍消费中一块局部的领域”(Baudrillard, 1970[1988:32])。这种杂合使以往各自独立的各个艺术领域或真实文化领域与商贸领域之间产生了互惠性的相互交换：“文化中心就此成为巨型商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不是说文化在这里被‘丧失品格地出卖了’；这么说太简单。它是被文化化了。结果，商品(服装、食品、餐饮等等)也被文化化了，因为文化被转换成在种种可消费的东西的普遍展示中，处在其他东西当中的一种独特而闲置的实体，一种奢侈，一样物事”(Baudrillard, 1970[1988:32])。

这样一来，在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经验之角色的扩张或者说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的美学化，这两方面之间的关联上，布希亚与贝尔取得了实质性的共识。至于 20 世纪早期先锋派的艺术倾向和政治倾向所产生的强烈的对立挑战，如今是重整旗鼓还是气数已尽，他俩也有着共同的认识。不过，要说到如何评价这种情形，他们还是有着明显的分歧。贝尔认为自己所诊断出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蕴含危险，令人沮丧，因为它剥夺了当代社会继续生存下去所必需的那种连续性和稳定性。贝尔的诊断的核心，是把文化看作一种本质上具有整合作用的现象。与此相

反,布希亚却看不出会有什么迫在眉睫的灾难,因为在他看来,消费逻辑的强化是与资本主义逻辑完全契合的。布希亚相信,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构上的必要条件;与此相应的是,他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状况下,消费观念本身已经经历了根本的转型。传统上的经济分析强调的是,在一样产品的消费过程中,能够产出快乐或满足,哪怕这种快乐或满足只是属于人为刺激出来的需求。而布希亚则主张,从一次性用尽一样产品中的价值的意义上来谈消费,已经不再触到问题的点子。他写道:“需要作为一个系统……与快乐和满足有着根本的不同。需要是作为一个系统的各个要素生产出来的,不是作为一个个体与一个对象之间的单一关系生产出来的”(Baudrillard, 1970[1988:42])。在布希亚看来,消费欲望的系统性,或者在同样的意义上说,对于系统性(systematicity)的欲望,也就是消费,就意味着个体欲望的实现已不是问题之关键所在:“如果我们承认,需要并不是对一样特定对象的需要,因为它是对差异的‘需要’(也就是对社会意义的欲望),我们才能理解,满足是永远也不会得到实现的”(Baudrillard, 1970[1988:44])。因此,20世纪80年代有英国广告宣称,凭一张信用卡,就可以“让需要无需等待”(take the waiting out of wanting),此时暗指了一种总体性的满足;与此恰恰相反,在布希亚的眼里,消费社会则是让消费永无终结(takes the consummation out of consumption)。重要的不在于满足被传递给了消费者,而在于消费者被传递给了需求和需求生产的动力机制,它同时是一种经济系统,一种文化,以及一种政治控制与整合的技术。

13.5 文化价值:布迪厄

在布希亚以夸张的调子,表达自己对消费的社会的悲观态度时,他的作品里也同时发展出一种对文化与经济之分离的更为尖锐的批判。在初版于1972年的《实践理论大纲》里,布迪厄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用来理解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根本性的动态统一,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往往容易把这两个领域割裂开来讨论。布迪厄的作品所依据的是对阿尔及利亚卡比尔(Kabyle)人的民族志考察,该项考察旨在描述形形色色的社会实践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而不把这些实践化减为经济关系的单纯附属现象,或者是结构严密的符码与符号规则的具体落实。和这些处理方向不同,布迪厄的目的是要描述实践的动态结构过程。这使他发展出两个分析程式,在日后有关现代文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一是惯习(habitus),一是符号资本。他所谓的惯习,就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特有的、基本的那些特定的理解结构和习惯性的理解方式。惯习不是一套抽象的行为规则或对于世界的表现,而是社会性情或倾向的结构,是它组织了实践,但并没有主宰实践。最

好是把惯习看作一个文化中的“策略生成原则”(strategy-generating principle),而不是事先主宰各种策略形式的原则(Bourdieu, 1972[1977:172])。这又使布迪厄开始分析符号资本,他把符号资本界定为诸如荣誉、声望之类非物质性的形式、特性和价值观念,以经济性的方式发生的聚合、交换和流通。一方面,有些形式的分析不承认这些符号性、文化性的形式和作用机制有什么特殊性,把它们简单地看作颇为狭义的经济利益的掩饰或次生效应;另一方面,又有些形式的分析认为这些形式和作用机制自主于各种经济动机和利益,和后者不相关。对这些形式的分析,布迪厄都提出了批评。布迪厄在卡比尔人中进行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经济范畴和文化范畴相互之间即便不是不可区分的,也始终是难以分解的:

事实上,在一个受(狭义上的)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的互兑性主宰的世界里,指引行动者策略的**经济计算**必然会将一些特殊的收益和损失也纳入考虑范围,而这些东西会被狭义的经济无意识地视为**难以思考、难以形容**的东西,即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非理性的东西,从而加以拒绝。简言之,与将“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文化”领域)天真地表现为牧歌田园截然不同,实践从未停止过对经济计算的遵从,哪怕是它通过摆脱(狭义上的)利害投入的计算的逻辑,竟夺不那么容易量化的非物质性利害,从而在各方面表现出**毫无利害投入**的样子。(Bourdieu, 1972[1977:177])

布迪厄对文化社会学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初版于1979年的《区隔:对品味评判的社会批判》,书中的核心便是否定存在以下两方面之间的区分:一方面是艺术与文化据说是直接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这些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交换价值。布迪厄此书开篇便描述了对以下区分的全面逾越:一方面是在康德的传统下被说成是无利害投入的艺术与文化的经验,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当中庸俗的经济利益和动机。书中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中不同阶级所具有的各种品位、偏好和文化评判,揭示出艺术以及鉴赏艺术所需要的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格能力,各自具有非常明显和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实际上,这些资格能力的占有就构成了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那些有闲阶级或有闲阶级,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教育和财产,恰好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原则上本是所有人都可享用的文化经验和美学经验。这是因为,在康德眼里,艺术按照界定享有先验的特殊地位,否定了庸俗的东西,而这正是艺术在阶级社会中的性质与功能的关键所在。马克斯兄弟中的葛老丘不打算加入任何一个会接纳他的俱乐部

部，* 他的原则正适用于此：如果任何人都有接触艺术的“途径”，那它也就不再是什么“艺术”了。所谓美学经验具有与众不同的性质，这种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阶级社会中财富与特权的平等分布所产生的效应，而且还是它的具体实施和切实保障。这类经验相对于日常社会生活的独特性，也就确证了规定并维持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那些区隔结构。

13.6 女性主义与文化

在有关文化的问题上业已引入的所有社会政治思潮当中，最为重要、最具影响的当属女性主义，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更具一般性的关于性和性别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是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规定性权力，另一方面是艺术和文化所具有的次生效应或衍生效应，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似乎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将这两方面割裂开来。而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期间，掀起女性主义批判之重大回潮的米莉特、格瑞尔等人则认为，重要的是主张，各种文化形式通过某些方式，不仅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的现实，而且也构成了这种现实。各种文化形式和实践被贬到了次要的地位（对更具根本性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力关系的如实反映，要不就是对这些关系的意识形态掩饰），这本身就成为女性主义要追究的一个问题。关于文化形式的分析之所以会成为女性主义的基本内容，恰恰是因为据说妇女们就生活在“文化”里。

关于文化与自然之间以及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的差异，有一些强有力的假设。而女性主义就是致力于考察并且拆解这些假设。因此，根据某些说法，在男人的文化中，女人始终扮演着自然的角色。女人负责生殖，富于孩子气，受本能控制，生活在循环时间而非渐进时间里，生来就体现着(embodiment)缺乏反思的有机生活；而男人则从这样的生活中超拔出来，实现文明，担当义务，创造历史。换句话说，一旦文化被等同于文明，女人也就很容易被看作文化的母体或阴面，而不是文化的积极行动者。有人主张，随着现代性中大众文化的兴起，女性开始不再和自然维系在一起，而是和同一个大众文化所代表的伪自然维系在一起，后者表现为越来越温驯、阴柔、幼稚。而高雅文化，不管是主流文化中的高雅文化，还是先锋派里的高雅文化，则保存了男性的气概。

* 马克思兄弟中的葛老丘 (Groucho Marx, 1890—1977)：马克思兄弟是在舞台、银幕和广播界受欢迎长达 30 年之久的美国喜剧团体。以对道貌岸然的认识和上流社会的别出心裁的讽刺而闻名。葛老丘为老三，是俏皮话大师，表演常常不合逻辑，出人意料。——译者注

针对这种否定性的逻辑,女性主义已经做出了一些回击。也许最简单的一种已经被称为“女性形象”的研究途径。这种途径旨在探知并且驳斥那些带有贬低色彩的成见,质询各种文化形式都通过哪些方式呈现了女性和女性经验。另一种回击是针对全面排斥或损毁女性对文化生活与历史的贡献——不管是在文学上、绘画上还是在其他艺术生产领域里——的趋向,给予抗击和补救。而这种重建女性文化经验的工作,就其更为强化的形式而言,则可以表明存在专属女性的传统和美学,它们是自主的,或者是可以成为自主的,肖瓦尔特颇具影响的文章“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Showalter, 1985)即为例证。其他女性主义批评在回击带有贬损意味的将妇女与大众文化相等同的做法时,则要么试图伸张一种女性的或女性化的先锋派风格,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克里斯蒂娃和西苏;要么力求宣称,妇女与通俗文化中的“女性形式”——比如各式各样的肥皂剧、情节剧、浪漫小说以及市井小说——的牵连并不简单,确有其价值所在,由此揭示出,在妇女对通俗文化的参与当中,也蕴含着坚持异见的先锋派能量(Schwichtenberg, 1993; McRobbie, 1994)。与此相反,其他像夏赫(Shiach, 1991)之类的人,则已经从对文化知识之宗旨的抛弃态度中看到了令人不安的因素,并且批评女性主义与消费的愉悦之间的认同,一种兴高采烈的认同。

诸如此类的研究途径典型地体现出,有关文化形式和经验的分析在女性主义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且也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80、90年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在西方之所以会取得显著胜利,或许有原因在于,它已经如此明白无误地把自身界定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政治,为种族、性、残障和年龄等方面的文化政治奠定基础。但是,女性主义也产生出对这种“文化主义”本身的有力批判。这些批判中许多依靠的是精神分析的有关论点,即文化这个观念本身从一开始就被社会性别化了。而这些论点的核心主张则是,文化依靠着一种以排斥女性为基础的符号秩序。奇怪的是,即便是那些以最具决定论色彩的方式,对语言、逻辑和概念形式的男性编码和构成过程所进行的解读,最终在取代或颠覆男性价值观念时,也可能依靠那些功能本身。

不仅要找到女性在各种文化形式里受排斥和压制的例证,而且又要依靠这些文化形式来逆转这些排斥和压制的状况,这样的尝试会导致明显过分强调文化的观念,甚至是米尔娜所描述的“美学化救赎政治”(aestheticised redemptive politics),尽管这种政治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欣然领受各种凡俗的、世间的快乐,但它却大大倚重于“典型的现代主义观念,即现代生活确实可以通过高雅文化求得救赎”(Milner, 1994: 127)。吕莉也已对她所谓某些女性主义著述中“文化本质主义”的倾向表示反对。由于“未能将文化的范畴历史化,不积极考察其与社会的范畴之间的

关系……因此,文化往往会具备一种总体化的说明力,它无所不能,可又难以把握”(Lury, 1995:41)。

13.7 文化与后殖民性

近几十年来,在社会学角度的文化分析当中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是不仅愈益清晰地意识到文化和阶级权力模式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且愈益清晰地意识到文化与殖民权力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观点使人们开始看到,对异文化——换言之即非西方文化——的民族志考察,与在试图说明自己所属的“本”文化时起作用的那种自我理解的演练,两者之间必须有更多的沟通。事实上可以说,这两种学术活动之间的交流始终不太顺畅。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Arnold, 1869)里,针对他视之为商业精神和激进政治中蕴含的让人堕落的能量,试图捍卫一种关于人类文化的理念,这种理念的理解范围大大缩小,并且更具有内生性;仅仅两年之后,泰勒的《原始文化》就对文化做出了著名的包容性界定,即“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等等在内的复合整体”(Tylor, 1871, 卷一:1)。如果从上面的观点来看,这似乎就不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了。从此以后,描述或促进某种特定文化的自足统一体——其实就是把文化说成是统一原则本身——的种种尝试,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在抗御下面这种认识:在一个殖民和后殖民的世界里,不可避免地纠缠着多种不同的文化和文化界定。

没有任何一位批评家比萨伊德更倾力于阐释文化与殖民权力之间的关系。他的《东方学》(Said, 1978)就是试图揭示,西方殖民化国家为了分析和理解其他文化,尤其是东方各伊斯兰文化,所借助的种种知识形式和表现形式,最好是看作文化建构的行为,其中的表现活动和权力运作是很难区分开来的。萨伊德后来在《文化与帝国主义》(Said, 1993)里,集中探讨了文化形式与殖民权力之间更为复杂的绞缠形式,从而延伸并在某些方面扩充了这种理解。萨伊德首先是把文化界定为“相对自主于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那些实践,就像各种描述、沟通和表现的技艺”(Said, 1993: xii),其次又界定为“包括精炼成分、提升成分的一个概念,即各个社会已有最精华的知识和思想的储存库”(Said, 1993: xiii)。这两种文化认识都使文化成为集体认同——不管是阶级认同、宗教认同、种族认同还是国族(national)认同——的一个强大源泉,也许第二种认识尤其如此。和布迪厄一样,萨伊德也力主文化分析学者或文化史家应该拒绝人文主义者的信念,即所谓文化与日常世界相分离,或者文化超越于日常世界。按照萨伊德的说法,需要做的是把在过去 250 年

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并规定了这个世界的种种跨文化支配的关系,与叙事之类的文化形式联系起来。萨伊德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驳斥诸如此类的文化作品和形式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存有共谋关系。文化分析学者更宏大的工作必须是“解读伟大的经典文本,也许还有现代和前现代欧美文化的所有文献,努力勾勒、延伸、强调和伸张这些作品里保持沉默或呈现在边缘的东西”(Said, 1993: 78)。因此说,萨伊德后来的作品是在回应有关《东方学》的某些批评意见,即所谓它把被殖民的他者化约为一个被动无助地建构出来的对象。而萨伊德后来的作品更广泛地认识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形塑各自认同的过程中,彼此相互依赖,哪怕这种相互依赖始终还是不平等的。这样,他就更接近霍米巴巴作品(Bhabha, 1994)里以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相互依赖状况所做的分析了。

这种工作有助于揭启 20 世纪文化社会学的一种发人深省的“另类”历史,它往往不是将分析文化的工作视为一种推动自我认识的实践,而是让人疏远的实践,旨在揭示西方各国文化生活中似乎熟悉亲近的那些东西的任意性和奇异性。这股传统包括涂尔干,他在初版于 1912 年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宗教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功能做出了重要分析;包括莫斯,他在初版于 1923 年的《礼物》中对赠礼文化做出了颇具影响的分析;还有巴塔耶,他的超现实主义杂志《纪录》(Documents)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吸引了一群作者,并在 1937 年组建了关系松散的社会学学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这股传统在当代英国的分支就是大众观察运动,*该运动系诗人兼制片人詹宁斯和记者马奇、人类学家哈里森一起,在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一起构想出来的。它旨在创立关于当代英国生活的一种内部人类学。**根据雷娜对此的描述,大众观察这项技术,是用来记录“民族的集体心智中潜意识的波动;通过诸如广告、流行歌曲、报刊主题以及人们身边物事(比如在自己的壁炉台上搁的东西)之类的东西凸显的形象而反映出来”(Raine, 1967: 47—48)。在 1937 年 1 月《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刊登的一封宣言信中,哈里森、詹宁斯和马奇三人列出了一封拟欲调查的主题的清单:

* 原文为“Mass Observation movement”,多译为“民意调查”,这个词也更令人感到熟悉。但它无法与基于现代抽样统计技术的民意调查相区别,也不能凸现民众参与撰写自己历史的特性(而非技术专家通过严格“科学”手段“整理”民众意见的那种民意调查)。——译者注

** 原文为“interior anthropology”,指将人类学考察的目光从“远方”“异”文化转回“熟悉亲近”的“本”国、“本”民族文化,从线性历史时间在远方地域表现出的“古代”转回当下处境,深入透视周遭环境的隐秘本质,挖掘其陌生之处,并由此揭示熟悉之为熟悉的构建过程。——译者注





战争纪念仪式上人们的行为；
 人们在开车时的喊叫和手势；
 蜘蛛抱蛋崇拜(The aspidistra cult)；
 洗澡时的行为；
 胡子、腋窝、眉毛；
 反犹主义；
 黄色笑话的分布、传播与意涵；
 葬礼与殡葬业者；
 女性进食禁忌；
 接生婆的私人生活。

(引自 Friedman et al., 1986:57)

最重要的是，大众观察是根据成百上千非职业性的观察者所提供的报告汇编而成的。它融合了清醒健全的颖悟和去除熟悉的荒诞，并明确认同某种集体作者的理念，致力于塑造一种特定的社会知识，从而避免那些置身社会生活之外的社会理论和人类学理论所产生的客观化、总体化暴力。

克利福德把这种传统称为“民族志超现实主义”(ethnographic surrealism)，对其赞赏不已，指出它对于一种更具当代色彩的文化分析意义重大，这样的文化分析将关注一种文化的内部与它所殖民的外部之间各种相互依赖的形式(Clifford, 1988: 117—151)。克利福德自己就在《文化的困境》(Clifford, 1988)中发展了这种分析。而他的研究也融合了其他一批所谓“后现代民族志”的倡导者，后现代民族志强调文化的交互性质，或如克利福德本人所言，“文化”其实始终是关系性的，是权力关系中存在于各主体之间的历史性沟通过程的一种铭刻(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15)。

13.8 结语：朝向虚拟文化

根据文化社会学自身的诊断，是文化和社会之间一种让人困惑、充满痛苦的脱节，孕育了从社会学角度考察文化的冲动，而这种脱节正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甚至可以说是确定现代性之为现代性的特征。无论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何理解，究其根本，描述这种关系的必要性或可能性本身就表明，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历史割裂，以及它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都是难以根除的。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 的宗旨,难道就是对文化现象做出说明,把它们整合成从更大层面上来阐述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并有可能就此不幸地仿效了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本身的理性化趋势,将文化过程化约为单纯的社会功能?或者,这样一种关于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应该自视要确保文化的自主性,确保其不被化约为社会功能?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倒真有可能再生产出对于艺术和文化的拜物教,而那正是20世纪的文化社会学所一直驳斥的。我们是要去说明文化还是表现文化?社会学是倾向于文化还是倾向于社会?最重要的是,可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它之所以成其为一种文化的社会理论,不仅仅是说它属于一种文化,而且是说它能够导致这种文化中的变迁和更新?

20世纪后半期种种剧烈变动的状况,更加强烈地提出了这些问题,虽说它们也似乎坚持有必要对提问的角度作出更新和扩充。与阿多诺等人所预测的恰好相反,各种社会经济力量渗透到文化领域的过程,似乎并没有使文化彻底被同化到商品状况之中;正相反,它也同样使得文化的各种力量、能量和经验回流到政治和经济的制度结构之中。文化质询和文化问题的这种扩张出人意料,其结果是有充分证据表明,各种文化和文化价值大量滋生,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不同的文化少数群体的竞争能力都越来越强,而形形色色的“认同政治”也越来越重要,它们的基础不再是较为传统的那些社会经济经验,而是种族、社会性别、性本性、年龄、生态之类的关注。诸如此类的政治组合大量滋生,对文化社会学构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挑战。具体而言,它们似乎要求发展一种更具弹性、更为包容的语言,来描述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描述方式既不低估文化塑造社会现实、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也不放弃说明和勾连各种文化形式的任务。

本章业已探讨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理论和分析,基本上是现代世界中文化与社会之间绝对难以调和的性质这一问题所产生出来的。而当代有关文化的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则相当不同,因为文化范畴与社会范畴而今已经以种种难以预计的精细方式相互交织。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表明,社会理论此后已不再可能就文化的性质和可能性设定任何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原则。这是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文化社会学将继续关注似乎将愈益普遍的多元文化处境所揭开的那些描述性问题和规定性问题,而不是阐述“文化”在“社会”当中所担当的角色;这里所说的多元文化处境,指的不仅仅是许多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归属形式共存于某个社会里的事实,而且还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指这样一种处境:文化的各种意义和界定本身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文化和社会之间断裂的问题在现代已经变成了(多)文化多元性的问题。

从经济、技术、政治和环境等方面来说的全球化,通过某些方式,与文化的持续

转变取得了配合(甚至从某种悖谬的意义上来说是产生了这种持续转变)。而如何理解这些方式,对于有关各种文化形式的理论和分析来说,也许要算是最紧迫、最棘手的问题。有关文化的社会学正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文化转变和流动方面新出现的规范性状况,从而面临了齐美尔和本雅明所面临的现代问题的后现代形式,也就是如何在关注日常生活零散、微观的具体性质的同时,既不放弃说明的任务,也不表现得像要简单地取消这种具体性,归入可理解性。对于“日常生活”的文化分析,是从勒费弗尔(Lefebvre, 1947)和德·塞尔托(de Certeau, 1984)的著作里汲取动力的,似乎既要求将经验主义贯彻到极致,同时又要求将自我意识发挥到极致。新近有些作品竭力想要应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困境,比如格罗斯伯格的《我们要摆脱这地方:大众保守主义与后现代文化》(Grossberg, 1992)。此书分析的是晚近美国摇滚乐的复杂历史,出于其分析的目的,创造出一套富于弹性和启发的术语,将社会结构与短暂多变、激情强烈的情感经验关联在一起,以图描述“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具有固定结构的特定流动形式、一种严格约束的动员机制的转型过程”(Grossberg, 1992: 294)。在詹明信的《时间的种子》(Jameson, 1994)里,从更为理论性的角度思索了同一种困境,以复杂的、严格的方式,思索了当代文化中各种悖谬处境所体现出来的认识论上的挑战。不过他仍然顽固地主张,必须利用此类处境,“在考察时,将其作为症候而非起因,证明了有关思维本身或思维语言在结构上的某种无能”(Jameson, 1994: 8)。其实,有关文化的社会学所能提供和实现的最大限度,也就是持之以恒地勾连经验与说明,维持零散分布在当代生活中的具体化事件和情感与它们所意味的规模更大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关联。

信息技术迅猛而持续的发展也提出了令人瞩目的此类挑战。各种信息网络、沟通网络的发展,有希望废除那些空间和场所的特定结构,它们迄今为止一直是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相关因素;取而代之的是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所具有的人为操纵或虚构出来的虚拟空间。与此相称的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股趋势,就是越来越关注发生文化活动的空间,关注勒费弗尔在其《空间的生产》(Lefebvre, 1974)中界定的那种意义上的文化之空间生产。在哈维(Harvey, 1989)和索加(Soja, 1989)的作品里所体现的那种关于文化空间的社会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全球经济中空间的重新配置和全面转型,而且包括空间和场所的经验通过哪些方式不断在局部背景中生产出来并保持活力。有关文化的考察横跨了一系列不同学科,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到地理学、心理学和性别研究,而如今关于文化空间的社会学已经成为这种考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变动不居的对于时间的社会文化经验也同样成为文化理论家考察的主题(Jameson, 1994; Osborne, 1995; Greenhouse, 1996; Connor, 1997; Frow, 1997)。这些理论家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各有不同,但都集中探讨了一个悖论:

一方面,时间经验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全球范围内同质化,即时间都统一为现代性无情的嘀嗒声,统一为即时性的“实时”(real time)沟通技术(Virilio, 1997);与此同时,很大程度上作为这些发展本身的结果,随着不同的对于时间的文化安排和时间经验相互结成关联,时间经验又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发生复杂的转换、循环和时间错合的冲撞。

我们已经看到,就艺术和文化的各种社会形式发展一种科学的研究,这样的追求已经产生了一种附带效果,就是越来越深切地怀疑科学的理解模式和话语模式所具备的权威。这种怀疑主义的依据,是始终感到在科学文化与审美文化之间的那种对抗。例如,女性主义之所以会把自身塑造成一种咄咄逼人、系统全面的文化政治,原因之一就在于要回应这样一种认识:男性特质的科学技术理性的支配地位正愈益增强。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科学里还是在社会理论里,晚近的思想中都开始明显表现出关注重点方面某种耐人寻味的重大转换。技术发展的突然加快,尤其是与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关的发展突然加快,更由于以下事实而得到增强:这些发展并不像此前各个时代迅猛的技术增进那样,集中于工业领域或军事领域,而是深深地渗入日常生活的经验。结果可以称之为科学的“文化化”。文化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这种混合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文化就曾融合了玩乐、景观和娱乐方面美学和文化性的愉悦,尽管规模要小一些(Stafford, 1994)。但思维的关注与身体的能量方面这种新型的混合是令人瞩目的,在它到来之时,也是科学、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对抗时代终结之日。它在19世纪“文化”的观念和理念的形成过程本身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针对科学理性之侵入所做出的矫正和防御。

近些年来,一大批文化批评家不仅转向分析科学对社会文化生活所产生的后果,而且转向分析特拉维克(Traweek, 1988)称之为科学的“没文化的文化”(culture of no culture),转向分析科学文化或“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在这种文化化的科学或科学化的文化里,科学事业所产生的种种机会、问题和激情,都是作为图景、叙事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情感投入来实践或体验的。

如果说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技术会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巨大的效应,就好像现代主义时期的技术已经做到的那样;那么,有关这类技术也会形成属于自身的文化的主张,则只是到了最近才开始被认为有些道理。以下两类研究者之间的差别,正是科学的文化化的明显例证。一类是探讨20世纪70、80年代不断发展中的技术社会的学者,他们认为新技术的连带效应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经济、工作和生产等领域中;另一类是更为晚近的研究,集中探讨的是数字文化的各种想像性表现,以及它在自己所影响的那些领域里激起的激情强烈的投入。数字技术的领域已经从工作和技术专业,转到了文化工业(音乐、录像和电子

游戏)和因特网上分散性的互动文化。作为工作的技术范式已经被作为玩乐的技术范式所取代。

在此过程中,各种电子形式的社会沟通、表现和互动本身已经开始构成一种存在方式,而不只是一些特定的实践形式,属于旨在构成一种文化或社会存在之表达方式的那些实践的一个子集。塔克尔就属于一位颇有先见之明的早期评论者。她着手考察计算机都是通过哪些方式,转变了其使用者对自己思维和自我的比喻性理解。她认为自己是在描述一种“形成之中的文化”(Turkle, 1984: 18)。更晚些时候,则有许多学者主张,文化人类学家有必要严肃地考虑数字文化的诉求。埃斯科巴便是这些学者当中的一位,他如此写道:“任何一项技术都体现了一种文化创造,因为技术引出了一个世界;它们从特定的文化处境中浮现出来,又转而有助于创造出新的社会文化处境。”他敦促文化人类学去探问如下问题:人们和他们建构出来的技术世界是怎样联系起来的?这些技术世界是如何随文化框架的不同而各有差异的?这些经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电脑文化(cyberculture)的政治经济学是什么?

不管怎么说,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如果想要恰如其分地把握自己的新的研究对象,也许需要对自身的操作假设和操作方式做实质性的修改。此前,人类学角度的文化观念的核心是一种地点确定的生活方式,是一整套符号实践,根植在所占据的特定场所当中,共同享有相近的(proxemic)条件(气候、语言、历史、物质技术);而根据 A. R. 斯通的说法,数字文化使得“社会世界的构成和演化得以……基于一些特定的符号交换,其中邻近性只是一种次要的效应”(Stone, 1996: 87),文化实践的形塑过程逐渐摆脱了“有关置身何处的过度膨胀的知觉”(Stone, 1996: 90),后者既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也是现代性所发展出来的各种文化界定的典型特征。

从借助数字技术形成的“虚拟共同体”的立场上,已经提出了大量的主张(Rheingold, 1993),而把握此类共同体的性质和可能性的努力,则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一些概念,比如在 20 世纪社会理论中一直很重要的共同体和团体与文化公共领域之间的对立(Poster, 1990, 1995; Porter, 1996; Shields, 1996)。人们或许会略有些惊讶地发现,迄今为止,尽管夸张地说,我们已经深陷各种数字文化形式的包围之中,但有关“网络文化”的讨论却大部分集中在一种具有奇特的保守色彩的高度专门化的电子互动形式上。在线新闻组,20 世纪 80 年代从“龙与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发展而来的在线幻想游戏,聊天室,以及其他种类的多用户领域——在这些电子互动形式中,参与者实时相互“键入”,或以键入与传送所允许的速度尽可能地接近实时,在一个想像环境中相互沟通,而这种环境正是他们的沟通行为本

身创造出来的。这就仿佛电报技术已经发展到互动性的形式,越过了电话、广播和电视。书写行为或键入行为的这种核心地位,也许能使人们理解电子沟通乍看起来有些古老的形式内在魅力。这是因为,在多用户领域的物质形式和某种特定的学术文化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其核心都在于趴在他或她的键盘上苦干不息或玩耍不息的那些孤独的个体,都在于写出来的文本的交换与流通。从这样一种文化的内部角度来看,多用户领域似乎将要具体落实有关话语权力塑造社会世界的那些主张。不过,无论是网民,还是研究琼斯称之为“虚拟文化”(Jones, 1997)的有些理论家,他们对于自平衡的欲望也都有可能使他们产生出一种数字版的“文化本质主义”,后者正是吕莉之类女性主义学者所警示的。迄今为止,有关数字文化的讨论往往会出现截然相对的两派意见,一派认真考虑有关此类文化具有自平衡性或自我形塑性的主张,另一派坚持认为对于数字技术的接触渠道存在着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约束。热心倡导虚拟文化的人们更善于留意虚拟文化在现象学意义上的“世界性”,而不是读解这些虚拟文化零零碎碎的所谓语法。这些表意形式和互动形式本身在文化的角度上的定位方式和中介方式,影响了其他种种自我界定和社会认同的实践方式,并为后者所影响。

这段时期的特征是文化、科学和社会各领域的复杂化,必须越来越把这些领域理解为相互交织、交互组织的系统,而不是相互分割的既存领域或层面。在这些情形下,再要诉求一种客观的、方法论上连贯一致的关于科学文化的科学(science of the culture of science),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站不住脚。如马丁所言:“科学和文化相互竞争的那块‘空间’太过破碎、断裂、扭曲、多变,任何地图都派不上用场。要穿越这块空间,我们需要一种过程的图景,允许有陌生的盟友,奇特的组合,断续的关联”(Martin, 1996: 107)。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令人瞩目的角色:首先是在哈拉维的著作里,已经预见到并在一定程度上例证了这种“断续的关联”。她站在属于“电子人”^{*}的认同和政治的立场上满怀热情地提出来的那些主张,否认了固定的、基础性的自然观和文化观,以利于即兴的杂凑(improvisatory hybridity)(Haraway, 1991)。她更晚近的研究探索的是灵活可塑的“见证”形式,要求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调的文化理论,影响颇为可观(Haraway, 1997)。

可以说,这场争论是以另一种形式,体现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僵持不下的态势,它规定了现代性的经验,也规定了作为对这种经验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社会理

* 电子人(cyborg)亦译半机械人,注意不是机器人,而是人本身,只是为了适应特定的困难情境(比如勘探、军事、太空探险等),借用电子装置或电动机械装置代行部分人体功能(也可以是其他生物体)。——译者注





理论的诸多形式。因此,技术文化已经注定是要以数字的形式表现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跨接,而这种跨接从一开始就是有关社会的考察的特征: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和分析虚拟文化,就是把一种以预先自我表现的自身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虚拟文化采取了属于自身的数字形式(超文本、虚拟现实、网络实时互动、类分社区),以此把自身想像为存在。情况似乎不只是社会生活瓦解为各种文化形式和过程,而是电子文化明显表现出,文化形式和关联越来越多元化,要维持一种单一的视角来看待“文化”观念十分困难。


参考文献

- Adorno, T. W. 1970: *Über Walter Benjamin*. Frankfurt: Suhrkamp.
- 1984: *Aesthetic Theory*. Trans. C. Lenhard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91: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on. Trans. W. Blomster. In J. M. Bernstein (ed.)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h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nderson, P. 1992: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In his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 Arnold, M. 1869: *Culture and Anarch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London: Thomas Nelson.
- Baudrillard, J. 1970 (1988): Consumer society. Trans. J. Mourrain. In M. Poster (ed.)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72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 C. Levin. St. Louis: Telos Press.
- 1973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 M. Poster. St. Louis: Telos Press.
- Bell, D. 1979: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2nd edn. London: Heinemann.
- Benjamin, W. 1970: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his *Illuminations*. Trans. H. Zohn. London: Fontana.
- 1979: *One-Way Street*. Trans. E. Jephcott and K. Shor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82: *Das Passagen-Werk*. In R. Tiedemann (ed.).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V. Frankfurt: Suhrkamp.
- Bhabha, H.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Bloch, E., Lukács, G., Benjamin, W., and Adorno, T. 1980: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Trans. A. Bostock et al. London: Verso.
- Bourdieu, P. 1972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9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 N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Certeau, M.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 F.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nor, S. 1997: Raymond Williams's time. In *Raymond Williams Now: Knowledge, Limits and the Future*. Ed. J. Wallace, R. Jones, and S. Nield. Basingstoke: Macmillan.
- Durkheim, E. 1912 (1976):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 J. W. Swai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Eagleton, T. 1976: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90: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lackwell.
- Friedman, T., Gooding, M., Remy, M., and Robertson, A. 1986: *Angels of Anarchy and Machines for Making Clouds: Surrealism in Britain in the Thirties*. Leeds: Leeds City Art Galleries.
- Frisby, D. 1992: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A Reassessment of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 Frow, J. 1997: *Time and Commodity Culture: Essays in Cultur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reenhouse, C. J. 1996: *A Moment's Notice: Time Politics Across Cultu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rossberg, L. 1992: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Hall, S. and Jefferson, T. (eds.)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 Haraway, D.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1997: *Modest-Witness @ Second Millenium. FemaleMan (c) Meets_OncomouseTM: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Soci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 Hoggart, R. 1958: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orkheimer, M. and Adorno, T. W. 1944 (1986):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 Huysen, A. 1986: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Jameson, F.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3—92.
- 1994: *The Seeds of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S. G. (ed.) 1997: *Virtual Culture: Ident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Cybersociety*. London: Sage.
- Lefebvre, H. 1947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S.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 1974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 Nicholson Smith. Oxford: Blackwell.
- Lukács, G. 1957 (1963):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Trans. J. and N. Mander. London: Merlin Press.
- Lury, C. 1995: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culture: issues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B. Skeggs, (ed.) *Feminist Cultural Theory: Process and Produc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cherey, P. 1966 (1978):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Trans. G. Wal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artin, E. 1996: Citadels, rhizomes and string figures. In S. Aronowitz, B. Martinsons, M. Menser, and B. Rich (eds.) *Technoscience and Cyberculture*. New York

- and London: Routledge.
- Mauss, M. 1923 (1990): *The Gift: The Forms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 W. D. Halls. London: Routledge.
- McRobbie, A. 1994: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ilner, A. 1994: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 Osborne, P. 1995: *Th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and the Avant-Garde*. London: Verso.
- Porter, D. (ed.) 1996: *Internet Cul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Poster, M.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5: *The Second Media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aine, K. 1967: *Defending Ancient Spring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heingold, H.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Schwichtenberg, C. (ed.) 1993: *The Madonna Connection: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Subcultural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Theory*.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 Shiach, M. 1991: Femi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Critical Quarterly*, 33, 37—45.
- Shields, R. (ed.) 1996: *Cultures of Internet: Virtual Spaces, Real Histories, Living Bodies*. London: Sage.
- Showalter, E. 1985: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In E. Showalter (ed.)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London: Virago.
- Simmel, G. 1896 (1968b): Sociological Aesthetics. In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K. P. Etkor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1907a: Soziologie der Sinne. *Die Neue Rundschau*, 18, 1025—1036.
- 1907b (1990):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Ed. D. Frisby. Trans. T. Bottomore, D. Frisby, and K. Mengelber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1911: *Philosophische Kultur*. Leipzig: W. Klinkhardt.
- 1917 (1976): The crisis of culture. In P. A. Lawrence (ed.) *Georg Simmel*: 

-  *Sociologist and European*.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 1921 (1968a):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In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K. P. Etzkor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Soja, E. W.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 Stafford, B. M. 1994: *Artful Science: Enlightenment, Entertainment, and the Eclipse of Visual Educ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tone, A. R. 1996: *The War of Desire and Technology at the Close of the Mechanical Ag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MIT Press.
- Suleiman, S. R. 1990: *Subversive Intent: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Avant-Gard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E. W.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 Tönnies, F. 1955: *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 Trans. C. P. Loomi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Traweek, S. 1988: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is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urkle, S. 1984: *The Second Self: Computers and the Human Spiri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Tylor, E. B. 1871: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 Virilio, P. 1997: *Open Sky*. Trans. J. Rose. London: Verso.
- Weber, M. 1976: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 Parson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Weinstein, D. and Weinstein, M. A. 1993: *Postmodern(ized) Simmel*. London: Routledge.
- Willett, C. (ed.) 1998: *Theorizing Multiculturalism: A Guide to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Blackwell.
- Williams, R. 1958 (1963):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61 (1965):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1: *Culture*. London: Fontana.

深入阅读文献

- Agger, B. 1992: *Cultural Studies as Cultural Theory*. London: Falmer Press.
- Aronowitz, S., Martinsons, B., Menser, M. and Rich, B. (eds.) 1996: *Technoscience and Cybercul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Barrett, M., Corrigan, P., Kuhn, A., and Wolff, J. (eds.) 1979: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London: Croom Helm.
- Barrett, N. 1996: *The State of the Cybernation: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London: Kogan Page.
- Bataille, G. 1985: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A. Stoekl. Trans. A. Stoekl, C. R. Lovitt, and D. M. Leslie J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enjamin, A. (ed.) 1989: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Adorno and Benjamin*. London: Routledge.
- Bennett, T., Martin, G., Mercer, C., and Wollacott, J. (eds) 1981: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 Process: A Reader*. London: Batsford/Open University Press.
- Berman, R. A. 1989: *Modern Cul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Art, Politics, and the Legac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Bernstein, J. 1992: *The Fate of Art: Aesthetic Alienation From Kant to Derrida and Adorn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illington, R. 1991: *Culture and Society: A Sociology for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 Bocock, R. and Thompson, K. (eds.) 1992: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Open University Press.
- Brantlinger, P. 1990: *Crusoe's Footprints: Cultur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Brunt, R. and Rowan, C. (eds.) 1982: *Feminism, 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Calder, A. and Sheridan, D. (eds.) 1984: *Speak For Yourself: A Mass-Observation Anthology 1937—1949*. London: Jonathan Cape.
- Carey, J.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Unwin Hyman.



- Collins, J. 1989: *Uncommon Cultures: Popula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Connor, S. 1996: *Postmodernist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 1992: *Theory and Cultural Value*. Oxford: Blackwell.
- Eagleton, T. (ed.) 1989: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Polity Press.
- Easthope, A. and McGowan, K. (eds.) 1992: *A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Reader*.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llis, R., Thompson, M., and Wildarsky, A. 1990: *Cultural Theory*.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 Featherstone, M.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 Fiske, J. 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 Fowler, B. 1997: *Pierre Bourdieu and Cultur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Sage.
- Franklin, S., Lury, C., and Stacy, J. (eds.) 1991: *Off-Centre: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HarperCollins.
- Frow, J. 1995: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Valu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ldberg, D. T. (ed.) 1994: *Multicultu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 Grossberg, L. and Nelson, C. (eds.) 1988: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 , ——— and Treichler, P. A. (eds.) 1992: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all, S., Hobson, D., Lowe, A., and Willis, P. (eds.)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 Harrison, T. and Madge, C. 1939: *Britain by Mass Observ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irschkop, K. and Shepherd, D. (eds.) 1989: *Bakhtin and Cultural The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ollier, D. 1988: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Texts By Georges Bataille et al.* Trans. B. W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omer, S. 1998: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Hermeneutics, 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Huyssen, A. 1986: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Inglis, F. 1993: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 1995: *Raymond William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Jameson, F. 1971: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L. 1979: *The Cultural Critics: From Matthew Arnold to Raymond William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Kellner, D. 1988: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Oxford: Polity Press.
- (ed.) 1994: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 Levin, C. 1995: *Jean Baudrillard: A Study in Cultural Metaphysics*. London and New York: Prentice-Hall/Harvester-Wheatsheaf.
- Lunn, E. 1982: *Marxism and Modernism: An Historical Study of Lukács, Brecht, Benjamin and Adorno*. London: Verso.
- Lury, C. 1993: *Cultural Rights: Technology, Legality and Personality*. London: Routledge.
- McRobbie, A. 1991: *Feminism and Youth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 Mannheim, K. 1992: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2nd edn. Ed. B. S. Turner. London: Routledge.
- Milner, A. 1994: *The Polity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O'Connor, A. (ed.) 1989: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s, Culture,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 Postman, N. 1992: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Knopf.
- Ridless, R. 1984: *Ideology and Art: Theories of Mass Culture From Walter Benjamin to Umberto Eco*. New York: P. Lang.
- Rosaldo, R.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 Rose, G. 1978: *The Melancholy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Theodor W. Adorno*. London: Macmillan.
- Sardar, Z. and Ravetz, J. R. (eds.) 1996: *Cyberfutures: Culture and Politics on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London: Pluto.

Schroeder, R. 1992: *Max Weber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London: Sage.

Schwartz, 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orey, J. (ed.) 1994: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2n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Prentice-Hall.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ass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urkle, S. 1997: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ondon: Phoenix.

Waters, M. 1996: *Daniel Be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Wolff, J. 1981: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Art*. London: Macmillan.

——— 1990: *Feminine Sentences: Essays on Women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Wolff, J. and Seed, J. (eds) 1988: *The Culture of Capital: Art, Pow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ddle Clas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Žižek, S. 1997: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London: Verso.

Znaniecki, E. 1952 (1980): *Cultural Sciences: Their Origin and Developmen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Perspectives on Time and Space

第四编

时间与空间视角种种





第14章

历史社会学



J. 曼达利奥

曼达利奥 (John Mandaliios) 1958 年出生于亚历山德里亚, 在澳大利亚莫纳什 (Monash) 大学接受教育, 成为一位成熟的社会学与政治哲学学者。他的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从文明的视角考察认同与文化形成, 目前正在撰写以此为主题的一部著作。他曾在澳大利亚的数所大学教授过批判理论、历史社会学以及国际理论 (international theory), 并有文章收入有关社会正义的文集。目前他正在为印第安纳大学 S. Sanderson 主编的即将出版的《文明与世界体系》一书撰写论文。现任格里菲斯 (Griffith) 大学讲师。

- 14.1 跨学科研究: 历史与理论的结合
- 14.2 世界体系分析
- 14.3 权力中心的去中心化
- 14.4 晚期现代性的四种逻辑
- 14.5 现代性与全球性
- 14.6 全球化还是文明分析?
- 14.7 文明分析: 切近全球性因素
- 14.8 世纪末之困境



在这一章我考察四种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路向,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是:从根本上讲,现代性是否就意味着标准化?我的分析关注的是:世界体系理论、有关权力的社会理论、全球化理论以及文明分析,对理解存在多种不同文化的世界中的“现代化”过程,做出了哪些有关的贡献。在讨论世界体系理论之前,我将简要地考察战后一段时间内以历史为基础的社会理论兴起的状况。在第一节,我探讨沃勒斯坦所做的工作,以及一种系统化的理论框架的发展,这种理论框架旨在采用一种整体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变迁,并从根本上挑战那些支撑着自由派现代化观念的假设。第二节论及迈克尔·曼与吉登斯具有丰富历史意涵的权力理论,以及他们为了从根本上重建 19 世纪有关社会与社会变迁的理论而付出的努力。第三节关注全球化理论是如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占据了突出位置,又是如何与世界体系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有所分歧。最后,在末尾一节,我将转而探讨两位分析文明的现代学者埃利亚斯与尼尔森的著作,考察一种“文明分析”的研究路向如何可以表现出更加有助于理解社会文化现象。本章以世纪末的困境作结,我们简要地看看有关全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后西方化主张。

14.1 跨学科研究:历史与理论的结合

经典的社会理论家维柯、马克思、韦伯都十分透彻地把握到了“历史范畴”与“社会范畴”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只是到了实证主义科学开始占据主宰地位之后,社会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这种亲和才突然显得很成问题 (Adorno and Horkheimer, 1972)。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历史社会学一直非常薄弱,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对它的批判视角怀有深深的敌意”(Smith, 1991:1)。在现代大学中,无数学科界限和分支学科的专门化使得人的科学四分五裂,这使得历史社会学看上去颇有些“总揽全局”的味道。像今天的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一样,历史社会学已经超越了主流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哲学家建立起来并加以维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界限。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后的观察家们在建构理论来全面理解变迁的主要根源或现代性的各项制度时,再也不能不涉足社会发展与不连续性方面的理论了。跨学科研究使从事比较研究和有历史倾向的社会理论家们能够更充分地追问当代规范、自我理解与行为模式中的历史偶变性特征。换句话说,要想认识到原本想当然的意义与行动所具有的历史性(historicity),就要求我们从时空两方面来考察“我们如何从这儿到那儿”。到 20 世纪末,惟一能够确定下来的结论就是社会世界是一种社会建构;宏观的历史性社会研究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这在实质上促进了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在 20 世纪的一些学者作品里,出现了倡导用跨学科视角来研究理论、文化与社会的主张,这些学者中有马克·布洛赫、布劳代尔、沃勒斯坦、福柯、哈贝马斯、埃利亚斯、吉登斯、迈克尔·曼、罗伯逊和尼尔森。

以下几位理论家的详尽研究清楚地表明,那种认为历史学而非社会学是“关于人类诸社会的研究,这种研究强调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与它们彼此所历经的变迁”(Burke, 1980: 13)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些理论家包括: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 1963),摩尔(Moore, 1969),佩里·安德森(Anderson, 1974a; 1974b),蒂利(Tilly, 1975),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1989),布迪厄(Bourdieu, 1984)和埃利亚斯(Elias, 1939)。无论是经典社会理论,还是现代社会理论,都一直表现出敏锐的历史意识感,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以下事实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历史社会学只不过是涓涓“细流”,到 80 年代被称为“潮流”(Burke, 1980: 28),而在今天已经变成十足的湍流了。除了斯梅尔塞的《工业革命的社会变迁》(Smelser, 1959),贝拉的《德川宗教》(Bellah, 1957),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制》(Eisenstadt, 1963),蒂利的《论旺代》(Tilly, 1964),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Elias, 1939 初版)和福柯的《疯癫与文明》(Foucault, 1965)以外,最近其他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也被归到以历史为基础的社会理论中来。其中包括:佩里·安德森的经典研究《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与《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Anderson, 1974a; 1974b),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Wallerstein, 1974—1989),斯考克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kocpol, 1979)、《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Skocpol, ed., 1984),本迪克斯的《国王还是人民》(Bendix, 1978),蒂利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Tilly, 1984)和《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0》(Tilly, 1990),吉登斯的两卷本著作《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Giddens, 1981; 1985),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Mann, 1986; 1993),盖尔纳的《犁、剑、书》(Gellner, 1988),以及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Elias, 1978; 1982)。

这些作品具有一致性的核心观点:要对当代社会结构与社会互动模式提出恰当的追问,就不能脱离历史的视角。我所谓“历史的”不仅仅是停滞不变的去:事件、纪念日、朝代、国族发展里程碑;它还代表更多丰富的内容。与自然主义恰好相反,历史的理解能够使个体对特定的具体实践与制度所具有的历史性有所反思。比如: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解释,常常被视为自古有之的“商品”,实际上是体现在身体上的人类活动与现有社会权力关系的历史产物。事物本身的秩序会随时间(历史局势)与场所(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对社会世界以及所进行的考察选取一种更具反思性的位置。自我反思与历史意识可以说是同步发展的。

因此，任何研究社会的理论都必须有能力描述它自身的起源与发展，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社会面对其主导条件的内部发展历史来阐明它的出发点。关于现代性的任何反思的与“批判的”社会学，都势必“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关注过去，而这恰恰是因为它们都关注未来”（Marcuse, 1968: xvi）。要设想未来的事情会有什么不同，就必须理解我们是如何到达目前特定的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立足点的。尽管当代大多数社会理论都拒斥目的论式的历史哲学，但仍然在努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世界或我们的自我的观念理解是以何种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而，为什么它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变化？对此，有一种观点咄咄逼人地宣称，随着意识形态的消失，随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出现了“历史的终结”，以及“最后的人”的到来（Fukuyama, 1992）。

在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哲学家们一般都会追溯到德国观念论哲学家康德等思想家为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哥白尼式革命。现代哲学家们认为，启蒙时代以来理性对于迷信和信仰的胜利，已经宣告了一种观看世界的新方式（Habermas, 1971）。有人主张，现代性就其种种独特之处而言，完全可以归之为西方而上学中的一次范式转换。然而，绝大多数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家都对这种主张提出了激烈的质疑。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到来仅仅是向现代性突破的潮流之一。他们更愿意去强调工业化（盖尔纳，贝克）、资本主义（布劳代尔，吉登斯）、革命性政治活动（斯考科波尔）、国家形成（埃利亚斯，迈克尔·曼）、社会宗教制度（艾森斯塔德）、黩武政策（J·霍尔，蒂利）以及禁欲的理性主义（阿多诺，尼尔森）对于人类处境的有关影响。

对于这种里程碑式转变的准确性质，争论的焦点主要是那些认为现代化（现代科学、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具有进步性的现代自由主义假设具有多少效验。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学术界和政治军事圈子里，结构功能主义与现代化理论地位显赫。有鉴于此，其后涌现出的大多数作品大多表现为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双重批判形式，一方面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Anderson, 1974a, 1974b; Giddens, 1981; Mann, 1984, 1986），另一方面则批判立足于亚当·斯密学说的现代化理论（Frank, 1967; Wallerstein, 1974—1989: 卷一）。因而，当引导 19 世纪如斯宾塞和马克思等自信的观察家的那种传统思路彻底受到质疑时，具有丰富历史意涵的社会理论就开始了复兴之途。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与黑格尔左派或右派的单线进化论失去权威地位有关。

因此，就像今天的文化科学，大多数的历史社会学都渗透着对于政治范畴的一种特定的敏感，而在有关国家—市民社会复合体的分析中，则充斥着针对支配、授权、解放和不平等的问题。这种趋向绝非偶然。福柯对关键性的纪律控制制度，如监

狱(Foucault, 1977)、收容所(Foucault, 1965)和诊所(Foucault, 1973),进行了一系列深度历史研究,而这还只是**文明分析**——即对文明形式与认同结构的考察——中体现社会理论与权力之相互交织的一个晚近范例。至于文明分析的先行范例,则可回溯到20世纪70、80年代到来的“历史社会学的黄金时代”(Collins, 1985: 107)以前。先是出现了施本格勒的研究《西方的没落》(Spengler, 1926—1928),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Weber, 1920—1921)中有关世界宗教与西方理性的文明分析,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Freud, 1930),在此之后,欧洲大陆上产生了两部从**超国家**视角出发研究权力与历史的重要作品。这两部作品,即布劳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均强烈主张有必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生活,而不是照例仅从现代民族国家入手。关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文明(或多种文明)的这些研究,一起成为历史社会学黄金时代发展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复兴(Anderson, 1976; Gouldner, 1980),进一步推动人们从一种特有的长时段文明视角来研究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形式。我们在考察文明分析的意义时,还将回过头来重新讨论这个主题。

14.2 世界体系分析

一般认为,对“现代化”的自由派理论(Rostow, 1960)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一种颇有几分马克思主义意味的批判,这种批判开创了世界经济体与核心社会—边缘社会研究。在沃勒斯坦著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研究出现以前,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劳代尔已经开始考察物质生活和文明与地理和权力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为了理解各个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和文明的不均衡发展,布劳代尔的分析范围就必须超出传统的民族史学的界限。他的**全局史**(*histoire globale*)可以看作是文明分析与全球性社会学的先驱。在他那里,对于社会的等级制度、国家、文明和城市的考察,都是在以**局势史**(*histoire conjoncturelle*)(历时的)与**结构史**(*histoire structurale*)(静态的)为焦点的框架中建立起来。因而可以说,是布劳代尔的理论视角支撑了宾厄姆顿(Binghampton)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研究中心,*支撑了世界体系理论及其所属杂志《评论》(*Review*)。他早期考察了地中海生活,出版了《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自那以后,就很难在他的“全局史”所蕴含的长时段视野之外,来理解时

* 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长期担任设在宾厄姆顿的纽约州立大学布劳代尔中心的主任。——译者注

间绵延(*durée*,即日常生活)的结构。

不仅如此,我们需要具备比民族国家更为宽广的分析单位,以便探讨资本主义文明的复杂性质,这样一种敏锐的见解是与布劳代尔和沃勒斯坦从他们的非洲经历中所获得的洞见分不开的。沃勒斯坦的理论旨趣最初在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在于它们对北方发达国家财富和权力中心即所谓大都市的**新殖民依附**(*neo-colonial dependency*)。他后来的工作集中考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大量得益于依附(*dependencia*)理论家的奠基性工作,尤其是巴兰(*Baran, 1957*)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Frank, 1967, 1969*)两人的著作。关注非西方国家欠发展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这一主题大大推动了历史社会学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而作为国际社会学的先驱,研究第三世界欠发展状况与帝国主义的社会学也勾勒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域,人们现在普遍称之为全球化。在后一个问题域下,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与女性主义等方面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形式中,“没有历史的人民”的观念里体现出的那种殖民主义思想支配地位遭到了猛烈抨击。

像巴兰、弗兰克、雷伊(*Rey, 1971*)和其他研究新殖民依附的理论家一样,沃勒斯坦激烈地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假设: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张至非欧洲的社会,扩张至西方帝国的许多前殖民地,必将带来有益的效应。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相信,所有(后进的)社会在经济发展上都将经历单一序列的各个线性阶段,这些阶段将推动这些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可以理解为前进)。而沃勒斯坦在阐述欧洲世界经济体的成长时却彻底抛弃了这一观点。他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必将扫除其他所有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原理,宣称世界体系包含许多其他的生产方式。与此类似,他拒弃了现代主义者根深蒂固的假设,认为欠发展和边缘依附的研究主题就足以证明,工业资本主义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前进。

对于沃勒斯坦而言,1557年的衰败*不仅标志着哈布斯堡王朝与瓦罗亚(*Valois*)王朝的崩溃,还代表了世界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断裂,即欧洲世界体系的开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持续存在下来,西欧帝国的挫败就标志了与过去时代的明确决裂。至此,所有世界经济体都已转变为帝国。沃勒斯坦基于非连续性立场的叙述分离出一个特有的文明竞技场,视其为孕育现代性的源泉:一个政治上富于异质性的欧洲世界经济体,宣告了在西方扩张型资本主义文明的到来。

不过,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的对象并非解释现代性本身,而是西方所取得的

* 有关1557年前后的诸王室争战与财政危机,详参《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四章。——译者注

独一无二的成就,即打破过去向僵化的官僚帝国发展的定势,赢取其他任何帝国都无法确保的东西,即世界性的支配地位。到 20 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已经成为真正的全球体系。换言之,他的《现代世界体系》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什么逻辑的作用下,众多文明中的惟一一支得以在当今时代占据了支配地位。

在沃勒斯坦基于不连续性的立场对欧洲的解读之下,隐含着怎样的特殊逻辑?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会重新以生产方式作为首要的分析单位,这绝非偶然。沃勒斯坦告诉我们,直到公元 1500 年,“世界的历史仍是三种生产方式并存一时的历史,一种没有文字记录,称为微型体系;另一种不甚稳定,因而其存在也很短暂,称为世界经济体;再者则蔚为壮观,无所不包,是为世界帝国”(Wallerstein, 1984:65)。构成微型体系的是从事不平等剩余交换的直接生产者。世界帝国经历了扩张与收缩的循环,以军事官僚为后盾的帝国统治阶级由此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抽取以贡赋形式出现的剩余。同时,军事官僚又始终对世界帝国的统治阶级构成威胁。帝国还被界定为一种政治单位,其政体机构既强大有力,又非常脆弱。中心的统治力保“经济通过武力(贡赋和征税)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从边缘流向中心”,以此奠立帝国大厦(Wallerstein, 1974—1989,卷一:15)。因此,政治帝国可认为是“一种原始的经济支配方式”(Wallerstein, 1974—1989,卷一:15)。

在整个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不同的世界经济体,比如中国、波斯、罗马,它们都通过征服而成为世界帝国。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只有一个“社会体系”摆脱了这种模式,从而得以前进而不是衰退,这就是欧洲世界体系。但为什么是欧洲?因为“只有欧洲踏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它得以超过其他世界体系”,并抗御了“转变为帝国的种种企图”(Wallerstein, 1974—1989,卷一:17,349)。尤为特殊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现代科学的工艺”之间的结构关联,使欧洲世界经济体“在没有出现统一的政治结构的状况下仍能不断产生、繁荣、扩展”(Wallerstein, 1974—89,卷一:16)。这是因为,世界经济体与世界帝国的区别,并不在于存在“广泛的劳动分工”或“文化多样性”,而是缺乏单一中心的政治体制,即在其绝大部分空间上,存在着多重中心的政治结构(Wallerstein, 1974—1989,卷一:348—349)。因此,欧洲世界经济体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存在了五百年之久,却仍未变为世界帝国,这种独特之处正是它力量的奥秘所在”(Wallerstein, 1974—1989,卷一:348)。

这种发展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来说是无二无一的。在“漫长的 16 世纪”出现于欧洲的世界经济体,是“一种以前从未为世界所真正认识的社会体系,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质”(Wallerstein, 1974—1989,卷一:15)。现代世界体系并不像帝国那样本身就是政治实体,尽管其多重中心的国家体系依然增强了它的这一性质。它像一个庞大帝国一样领土广袤,也具备了帝国的许多普遍主义特征。同时,由于“它的

体系各部分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性的”，因而它“比任何通过司法确定的政治单位”，如帝国、城市国家和民族国家，“范围都更为广大”（Wallerstein, 1974—1989, 卷一:15）。在其界限之内，它包含了民族国家、帝国与城市国家，容纳了为数众多的阶级与地位群体，涵括了形形色色的宗教群体与文化群体，以及根据核心—边缘—半边缘的地区与国家来确定的地理上的劳动（及权力）分工。

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主张是：考察任何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的性质，都必须基于该现象与给定的社会“总体”的关系加以理解和说明。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理解民族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各个国家与社会是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空间关系所形成的复杂型构中彼此相互作用的。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领域之外，来解释不同群体与个人的行动、价值观念乃至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就会犯 19 世纪实证社会学的错误，那种社会学天真地信仰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沃勒斯坦着力于揭示自由派现代化理论中体现社会学物化认识的种种实例：“大多数经常被描述为社会体系的实体，如‘部落’、共同体、民族国家，实际上都不是总体性的系统”（Wallerstein, 1974—1989, 卷一:348）。由此看来，惟一可被合理称之为社会总体的社会体系，就是世界帝国、世界经济体和独立自给的经济体。

因此，关于阶级、国家和社会的传统理论丧失了其作为社会学范式所特有的启发价值。在这一点上，沃勒斯坦告诉我们，他“全盘抛弃那种采用主权国家或民族社会这一更为模糊的概念作为分析单位的观点。我认为两者均不是社会系统，而我们只能在社会系统中来谈社会变迁”（Wallerstein, 1974—1989, 卷一:7）。这里包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只有更为宽泛的理论框架才会具备所需的解释力，以便根据空间、政治、社会不平等的现有格局，理解从而说明社会变迁。照此看来，“整体”的各部分，如亚民族的、民族的与超民族的阶级力量或忠诚情感，一旦被放在社会总体之内，就会成为更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我们下文将看到，埃利亚斯在考察欧洲国家的形成时，也采用了与此相似的思路。

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版后，方方面面都出现了对沃勒斯坦所构建的这种“社会总体”的批评。尽管佐尔伯格（Zolberg, 1981）、斯考克波尔（Skocpol, 1977）和吉登斯（Giddens, 1981）都大体认可沃勒斯坦的主张，即世界社会的结构方式也是等级制的，基本上划分为各个分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地区与国家，但他们都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还原主义假设提出了批评，认为沃勒斯坦赋予政治权力与文化的地位无足为据。尽管批评沃勒斯坦的学者们对究竟是哪些因素构成了“政治”和“文化”并未达成一致，但他们仍一致认为，潜在的唯经济主义妨碍了世界体系分析的创新潜力。佐尔伯格承认，在世界体系分析里也表现出了政治分析，比如分析核心与边缘国家的兴衰交替，但是，他认为这同时也“显示了一种还原主义倾向，将政

治过程看作附属于经济因果关系的现象”(Zolberg, 1981: 255)。斯考克波尔(Skoepol, 1977: 1080)也认为,沃勒斯坦的社会总体,即世界体系,并未认识到国家的“独立效验”,也不能认识到现代国家体系独有的战略逻辑。

再往后,分析的焦点转向文化的维度,考察世界体系理论是否充分地考虑到了文化的因素。沃勒斯坦当然从未宣称他的世界体系分析全无文化解释。“漫长的16世纪”中新诞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实际上主要源于罗马—基督教文明。伯格森(Bergesen, 1990)、罗伯逊(Robertson, 1992)、博伊恩(Boyne, 1990)和梅尔科(Melko, 1994)等学者已经强调了这些文化的根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明的根据。最近这些批评论调可以说有一个先导,就是由布劳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中有关“符号秩序”的更为系统的探讨。这些批评的大体意思是说:尽管这种分析里并不能说完全没有文化的维度,但却只限于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上层建筑——即法律、宗教、政治和道德——的合法化功能。换句话说,人们指责道:如果世界经济体中的交换关系凌驾于日常生活其他领域之上,文化就必将始终沦为阶级决定因素的附属品。

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90)在为他关于社会生活与变迁的整体论观点辩护的同时,坚持认为在他最初的阐述当中,“文化”实际上并不那么无关轻重,并试图改变其立脚点,以平息某些批评意见。要想论证世界体系分析确实注重了“文化”的特殊作用,比较有力的例证可能就是,沃勒斯坦敏锐地注意到:各种文明在遏制或重新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动力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其形式常常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复兴或狂热的浪漫主义反现代化运动(Wallerstein, 1984)。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例证则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及其相伴而生的空间与社会方面的等级秩序来说,要想发挥作用并维持生存,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这一对孪生的“普遍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具体来说,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被视为“卓有成效的保守(或反动)意识形态”,以坚持抗拒无论是群体、城市、国家还是单个个体的不可避免的衰退(Wallerstein, 1990: 50)。沃勒斯坦虽然避免了博伊恩(Boyne, 1990: 59)自己设定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方向,即科学主义的极其“冷酷且超然的客观主义”,但是,他却重蹈覆辙,回到那些陈旧的虚构二分对立上去:“观念的一实在的”,心—身,物质的一符号的,高雅文化—低级文化,“我们—他们”(同一与异他)认同,内部—外部,等等等等。我们就此看到,世界体系理论明确废弃了“单一文化”的人类学观念以及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高雅文化”论调,因为以上两种观点均被“怀疑属于某种意识形态伪饰,旨在为某一‘群体’或者‘社会体系’里上层……的利益作辩护”(Wallerstein, 1990: 34)。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沃勒斯坦再次返回到一种特具决定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

模式中, 尽管这并非偶然: “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所谓‘文化’, 即**观念体系**, 来自于我们为了应付这个特殊体系的种种社会政治现实状况所包含的诸多矛盾、模糊与复杂情况, 而付出的种种集体的、历史的努力”(Wallerstein, 1990: 38, 黑体为引者所加)。虽然沃勒斯坦正确地否定了那些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批判与文学批判支柱的二元对立, 如低级文化与高雅文化、地方自治主义与全球主义、内在实存与外在实存, 然而却依然没能说清楚他下列断言的依据: “正如我们所知, 科学是‘现代性’在思想方面的首要表现”(Wallerstein, 1991: 115)。* 为何科学如此独特? **现代性**这个概念又是如何适合于他笔下更为“具体的历史现实”, 如微型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 换言之, “现代性”是否是个超历史的概念, 处于它优厚有加的那个社会总体即世界体系之上、之下或者与其并行?

14.3 权力中心的去中心化

在英国历史社会学中, 社会的互赖性问题先于全球化理论的兴起而成为研究的主题。其入手角度主要是地缘政治学的时空维度, 以及迈克尔·曼(Mann, 1986)所谓意识形态、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权力来源”。这一“学派”独特的理论贡献之一, 就是明确关注民族主义(Smith, 1981; Gellner, 1983)、国家政权建设(Anderson, 1974b; Hall, 1986)、强制(Giddens, 1985), 以及此前被忽视的权力与联盟的跨社会网络等等政治现象(Giddens, 1981; Mann, 1984; Hall, 1985)。在今天关注全球主义之前, 对民族国家及其地缘政治位置的重新发现就已经有助于拓宽现代社会理论的分析范围, 以涵盖他者(外人)这一角色, 涵括陌生性的不祥形象。同时, 这样做还涉及到了战争与地缘政治竞争的领域, 而这样的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忽视的, 不仅在社会理论中如此, 在相当程度上, 甚至在世界体系理论中也是这样。主要受韦伯、帕森斯、拉铁摩尔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盖尔纳与吉登斯的一些影响, 迈克尔·曼批评了主流社会科学一直坚持的一个神话, 即我们生活在多少近于密闭的有机社会中。

与当代学者如列维纳斯和德里达对于**总体**这个范畴的指责相似, 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也试图重新思考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 以便超越 19 世纪“社会”概念的种种局限。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 盖尔纳已经反对将现存的或时兴的概念偏好——主要是与民族国家相关的一些预设——强自塞进有关前工业社会的分析当中。在新的民族身份形式出现以前, 农业文明的生活在根本上是沿着许

* 此段引文后的出处为原文所无, 系根据本书第一版所附出处添加。——译者注

许多多水平与垂直的层次分裂,造成了“横向上相互隔绝的农业生产者共同体”与他们的水平断裂的文化政体之间的脱节(Gellner, 1983:9)。换言之,文化与国家不完全是一回事。

迈克尔·曼认为,要使我们摆脱更具有机论色彩、本质上属于种族中心论的道德成员资格或“共同体”观念的束缚,首先必须清除纯以社会为中心的认同模式。这一置换的理由是社会“远比我们已有的社会理论混杂”(Mann, 1986:4)。如果社会不再被视为真正齐整致密的社会总体,而是一些疏松多孔的集合体,那我们就不再能够讨论“层次”、维度、子系统,以及“最终”或“归根结底”可化约为决定因素的东西。正相反,迈克尔·曼主张我们的研究目标应该是认识到,“社会是由相互重叠、彼此交错的权力的多重社会空间网络构成的”(Mann, 1986:1)。包容或文化自足的神话,来源于19世纪理解自我与“文化”时,赋予种族的符号意义,以及像赫尔德(Herder, 1969)这样的观念论哲学家在著作中极力提取一个独具特色的日耳曼文化,对民族文化(Volk Kultur)的日耳曼式称颂。权力与其社会基础结构的来源都是弥散性的,这就使得我们无论何时都很难将其简单地还原为界限明确的各个社会——或者说是帕森斯所谓的各个“社会系统”——的进化阶段(Parsons, 1966)。迈克尔·曼并没有去描绘社会总体的各个进化阶段,而是像福柯在《事物的秩序》(Foucault, 1970)和《纪律与惩罚》(Foucault, 1977)中那样,通过分析重叠交错的权力的社会空间网络,来界定人类历史上权力的主导边界。根据迈克尔·曼的说法,人类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双重结合,不断地重新界定他们在相互重叠的权力与联盟网络中,所具有的属于自身的自我形象,并重新商定他们自身所处的位置。

迈克尔·曼含蓄地主张:认同的相对流动性是广泛延伸或者说无所不在的社会空间权力网络的自然功能(如宗教信仰的弥散权力)。而这些网络又导致了以下这些普遍性的轴心关系,并就在其中发生作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平等与等级制、世界主义与一致性、分权与集权、文明与黩武政策。每一条主要的轴线都体现在包含了集约的结合性力量与广泛的弥散性网络的辩证关系之中。这里,历史的主体在社会的封闭(极权主义的基础)和社会的异质性(全球主义的基础)之间摇摆不定。由此看来,历史主体的身份界定从来不是简单地由阶级、国族或特定政体成员资格所决定。迈克尔·曼一方面承认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同时又坚持认为,国家权力由于同经济、军事以及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来源相联系,因而不仅仅是深入密集的,而且也是弥散的,其界限划定是有隙可乘的。

因此,迈克尔·曼关于古罗马与世界宗教研究的核心就是考虑,对于社会认同的发展,以及多国构成的文明或帝国这样的社会复合体的发展,“超验性意识形态”

与“内在性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他运用涂尔干式的社会学来说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整合力或凝结力(Turner, 1991), 其中的“意识形态”作为内在精神增强了联结的纽带, 从而也增强了权势群体或国家的权力。与宗教的权威权力观点相对的是, 超验性的意识形态(包括神圣的与世俗的)是弥散性的, 它们往往穿越阶级、国家、种族与性别的界限, 比如说宗教伦理、个人主义崇拜、科学的客观性。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来源, 而且是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来源, 都具有弥散性与混杂性, 这便有助于我们理解迈克尔·曼反对传统的分析范畴, 反对韦伯和福柯对制度化的强调。迈克尔·曼明确表示: 由于人类从根本上“是社会性的, 却非社会的”(are social, not societal)动物, 所以, “人类社会的驱动力并非制度化”(Mann, 1986: 14—15)。因此, 我们可以说, 无论是韦伯的民族国家概念, 还是福柯的监禁社会观念, 在认识论角度与历史角度上都有所缺陷, 都错误地坚持用一种过于制度化的、一元性的观念来理解社会生活。

14.4 晚期现代性的四种逻辑

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单线进化论进行了双重批判, 和迈克尔·曼的立场不无类似, 都明确地拒弃有关社会变迁的一元因果解释, 以及各种拘守社会发展与道德发展均遵循单一持续路线的神话的历史哲学。在《社会理论中的核心问题》里, 吉登斯已经着手勾勒一套“结构化理论”, 该理论将同时超越现象学社会学与结构功能主义(包括阿尔都塞的学说)的局限性。而且, 它还将为各种目的论色彩的历史哲学提供替代选择。他有关社会行动(agency)与结构的替代性理论, 即结构化理论, 致力于综合两种近乎互斥的学术取向——解释学的解释与结构主义的分析——的优点。

吉登斯抛弃了正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理论与历史理论, 以及舒茨式的“解释社会学”。与此同时, 他的非连续性的分析框架注重于所谓的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分开来的断裂(Giddens, 1981)。在吉登斯看来, 现代社会与此前一切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之间的区别, 就在于通过向充满活力的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体系过渡, 权力资源(即权力的容器)发生了空前的飞跃。他告诉我们: “现代世界被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的相互交叉作用所形塑”(Giddens, 1985: 5)。然而, 他却又步福柯之后尘, 界定了另外一种权威性的权力来源: 集约性社会控制。这给现代性添加了新的权力容器, 体现在被认为用来界定现代性的以下四种“制度丛结”中: “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生产以及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的不断巩固”(Giddens, 1985: 5)。要把握这些独具现代特色的权力制度, 必须

通过“分析普遍隐含在人类互动相互作用中的结构特性”：意义的沟通（符号的意指），权力的运作（支配），以及各种规范性约制或合法化的模式（Giddens, 1981: 46—47）。这些人类普遍项中的第二点（即权力）是“由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的交叉作用所产生的”。由此，权威性权力促成了“时空社会控制的拓展”，而配置性权力则是控制自然的能力（Giddens, 1981: 105）。

马克思更注重物种演化中的配置性权力，而吉登斯却极为重视人类主体相互控制的能力。一些社会控制形式发端于权力的权威性资源（如书写）扩张，并经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在吉登斯的结构化与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主要归功于“时空伸延的主要载体”是权力的权威性资源（Giddens, 1981: 92）。因此，与马克思相反，国家的权威性权力使得（1）（各种）文明产生；（2）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监控与领土权增强。吉登斯抛弃了简单（冷）社会与复杂（热）社会的虚假对立，转而立足于融合三种普遍性差异环节，即时间性、空间性与结构化，来分析社会形态。他的结构化理论并不是要为各种社会形式构建一幅连续性量表，而是强调，要理解“情节片断的转变”（episodic transitions），比如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欧洲成为多国资本主义文明所经历的那种转变，就很有必要考察“时空边界”（time-space edges）。考虑到所有的社会都将时间与空间“束结”起来，即内在于社会系统的构成性的“在场与不在场的相互融合”，那么，就该用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概念来解释进化论者通常试图说明的那些现象：与社会再生产和治理能力相关的各项制度不断趋于复杂和增强。鉴于所有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跨越时间和空间，那么，社会系统及其各自的意指形式、支配形式和合法化形式也就都可以根据它们在“长短不一的时空跨度”上拓展的能力进行分类（Giddens, 1981: 90）。

这似乎是另一种更为间接的从理论上概括社会复杂性的方式。只是这一理论才把强调的重点放在权力的基础结构上。吉登斯借用了布劳代尔的长时段概念，以求把握长期发展中的四种关键性的制度丛结，是它们界定了现代世界，并脱胎于现代化的四种主导逻辑：工业化、资本化、民族国家的形成、监控机构的垄断化。如果不用这种长期的、宏观的观点来看待权力与历史，结构化理论就将滑向舒茨这样的解释社会学家一贯所犯的错误，他们分析行动的现象学就未能考虑到这些问题。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吉登斯进一步考察了这些长期过程，并分别对应与其自身相对而成的运动：资本主义产生阶级斗争；工业主义产生生态保护运动；黠武政策产生裁军团体与裁军协定；而国家监控权力则促成了公民权利团体。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各卷中，他都明显对任何有关性别认同过程的主导逻辑不置一辞。结果，妇女运动，这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会政治运动，没有任何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发展特定逻辑。不幸的是，在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研究中同样存在这种空

白。尽管如此,吉登斯社会理论的优点之一就是:对上述现代性的主导逻辑的理解并不局限于与全球视角相对的社会中心视角。他认为,促成社会整合的各种社会闭合形式“从来也不是无懈可击的”(Giddens, 1981: 91)。相反,他主张不应把时空边界还原为动态社会力量的日渐开放,也不应该还原为赋予任何内生或外生的社会动力机制的优先性,这一主张的核心观点是“实际上所有社会都存在或已经存在与其他社会相互关联的性质”(Giddens, 1981: 91)。

14.5 现代性与全球性

在吉登斯将其注意力转向爱与亲密关系在晚期现代性中的位置之前,他宣称所有的“现代性的四种主要制度轴线都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Giddens, 1985: 338)。因此,一旦全球性公司、传媒、人权和生态退化极大地凸显了这种看法,那么**全球化**观念的广为传播也就势所必然了。罗伯逊可以说是全球化论题最早的倡言者,他与世界体系分析的共识甚多。尽管对于整体而言的吉登斯社会学,罗伯逊始终保持批评态度,但是,他与吉登斯秉承非连续性立场的现代性理论仍有一定的共通之处。罗伯逊虽然不像吉登斯那样坚持关注对社会与国家暴力的批判,但也正确地指出了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社会中心的社会理论的某些空白。他与内特尔(参看 Nettl and Robertson, 1968)较早开始社会学分析的国际化进程,其时适逢西方开始从深深的麻木中警醒,认识到正是自身的新型殖民支配造成了“不发达国家”的困境。因此,我们可以说,全球化理论的根源在现象上是现代化,同时在理论上又是对社会变迁的片面描述与现代化所进行的批评性争论。

同沃勒斯坦和吉登斯一样,罗伯逊也承认全球体系中的国际经济过程与劳动分工具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破坏力。与此类似,像沃勒斯坦、盖尔纳和吉登斯一样,他也认为现代西方孕育了现代性及其相伴而生的全球空间,而整个人类就是从这当中浮现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分析主题。与吉登斯的结构化观念相近,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设定了“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具体结构化过程”,其入手点是考察个体与社会两方面如何将它们自己定位于一个**全球域(global field)**中,而这个全球域将同时规定并重新表述它们各自基于特殊主义而产生的利益及认同(Robertson, 1992: 5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同于**全球主义(globalism)**之处,就在于它表达了这种被视为超民族或超社会的结构化现象的**过程性质**。从否定的方面来说,它既非“国际主义”(支撑各种国际团体的统一体),也不同于“世界社会”,因为这种理论并不努力辩称世界大同的**市民社会的正当性**甚或其存在的实际可能。

正相反,这一理论是通过两种(几乎)对立的逻辑或“倾向”加以限定的。其一是

“趋向同质性和普遍主义”，其二为趋向“异质性与特殊主义”（Robertson, 1989: 63）。前者关注“现代世界的‘系统性’和人类的整体性”的新凸显的感受，而后者“核心是概括出文明与社会的独特性的价值”（Robertson, 1989: 63）。以下表述可以展现出这二者的互相依赖：“全球的与地方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正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我们或许应该讨论生活世界的全球制度化和全球性的地方化”（Robertson, 1992: 52—53）。要说明这种相互联结，可以通过重新构造经典社会理论中沿袭已久的一些泾渭分明的问题域，在那里，社会的变迁（societal transformation）表现为从共同体（Gemeinschaft）过渡到社会（Gesellschaft），而现在讨论国家社会时也必须牵涉到“Gesellschaft”式的全球主义性质。用来界定“全球形势”的四个组成部分是：“单一国家构成的社会；跨国家构成的社会体系；个体；人类”（Robertson, 1992: 175）。

罗伯逊注意到，“全球化”可能会与某种微弱的（温和的）普遍主义形式相混淆，因此，尽力突出了文明之间与国家之间的差异在形式与实质两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他站在“文化主义者”的立场上，批判了世界体系理论和吉登斯的现代性形象，从中就可以捕捉到这一点：如果全球性等同于一种不断扩张的现代性，那么它“完全忽略了‘非西方’现在究竟意味着什么”（Robertson, 1992: 14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是早些时候针对现代化的自由派倡导者及其潜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而对于各种后现代的理论也可以做出同样的批评。因此，全球性，而非世界体系、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成了当代理论阐述与社会研究的焦点。

有关全球化中特具文化性质的维度的阐述，见于罗伯逊对宗教运动、“世界神学”与市民宗教的研究（Robertson, 1989），以及他在更具比较性的视角上对日本的宗教与现代化所做的研究。罗伯逊充分利用了滕尼斯著名的共同体—社会区分，深入阐释了全球性的概念、全球性所具有的文化密度以及全球性的时空压缩所可能造成的文明冲突。例如：东方学学者看日本的文化与社会，会比他们那些秉承现代主义和物质主义立场的西方同行们看出更多的“传统的”、“精神性的”因素，这时的他们是在诉诸一种滕尼斯式社会分化宏大图式的语言（Robertson, 1992: 168）。宗教复兴运动，甚至地区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复兴，也都可以看作是人们对更为抽象的“Gesellschaft”式全球主义社会形式，旨在重建“Gemeinschaft”的种种努力。实际上，用罗伯逊的话来说，整个世界对于根本法则的追寻，正是“世界的压缩”——这是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的“最意味的特性”（Robertson, 1992: 166）。

对此可以做出两点批评，它们都反映了有关全球性的理论概括上存在的某种方法论上的含糊性。首先，尽管罗伯逊正确地指出了吉登斯有关晚期现代性的叙述中潜在的文化上的短视，但他自己的理论却缺乏吉登斯在阐释全球性的核心主题

时使用的**时空伸展**概念的解释力。全球化理论缺乏某种主导性的“非连续性逻辑”（吉登斯）或者“相互交错的社会空间权力网络”（迈克尔·曼），而这些概念原本可以有助于阐明，关键性的制度从结是如何得以产生并在后来逐步全球化，而“世界”的压缩又是如何突破经验角度的局限，在社会理论的角度上也成为可能的。全球化理论为此而留下了缺陷。它未能逐一考察社会权力多种多样的来源（而在有关各个文明的考察中，符号资本的多种来源也未能得到详细考察），全球主义只能把它们看作是既定的东西，然后简单地把自己独特的可压缩性的动力机制加诸其上。

第二种见解源于理论上某种方法论的含糊。追随法国人类学家迪蒙（Louis Dumont），罗伯逊（Robertson, 1989: 65）把“社会科学家的任务”理解为“在一种价值无涉的科学与恢复价值的恰当位置的必要性之间寻求平衡”。如果全球化实际上与有关世界秩序的建构性形象同义，那么罗伯逊所谓的全球性就肯定是多维度的，在文化上是有所差异的，并且充分考虑到“地方性的因素”。尽管如此，在他对全球性的概念阐述中依然存在一种根本上的二重性。似乎只要从经验上把握了“世界”的可压缩性，就可以识别出“全球空间”的独特性。另有一种主张与此呼应：全球化分析更近于“宏大的经验叙事”，而不是哲学话语的宏大元理论（Robertson, 1992: 31）。但不管怎么说，罗伯逊主张，全球化分析的的确投入了“制作历史、塑造传统的后现代游戏”，在这样的游戏里，社会理论家尽管自己身为对话者，却不得不费力“弄清楚这庞杂混陈的对话”（Robertson, 1992: 31）。他这样说的时候，全球化分析的解释学一面就更清晰地体现出来。那么，面临针对全球化理论的那些反调，全球化理论家又何以自处？更明确一些，全球化理论家以何种关系面对全球化的破坏效应，即“‘叙事’的相对化”？（Robertson, 1992: 141）

如果全球主义者被认为占据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位置，那么他或她如何给出这种超越的理论基础？全球主义者自以为把握了地方性因素借助全球性媒介的表达，因为他或她已经超越了历史形成的道德（*sittlichkeit*）的局限。而且，正如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理解当代生活的关键，而利奥塔或布希亚认为**后现代性**是理解当代生活的关键，对于罗伯逊而言，全球的形势或位置则是理解当代生活的关键。恰如亚里士多德宣称政治学为构造全局性的（*architectonic*）人的科学一样，“全球域”也将一切纳入其普世的眼界，惟有地球之外的东西不在其力场之内。由于全球化不仅早于后现代性的到来，而且早于“漫长的 16 世纪”的现代性，它便具备了世界历史先驱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理论的构造框架以一种颇具还原论色彩的立场，将我们引向具体的实例：后现代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现代化都转变为全球化进程的诸多具体体现。

14.6 全球化还是文明分析?

如果断定全球框架与所谓的**文明分析**针锋相对,那便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看法。而要是认为布劳代尔的世界体系分析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截然对立,这样的观点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承认,在全球资本主义下,表现出文明之间充满活力的联系与传承。我们注意到,全球化理论也寻求将“文明带回到”社会变迁的图景中来,以此超越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理论,并且主张,宗教性的意义来源的复兴,以及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全球人类处境的核心内容(Robertson, 1992: 3)。事实上,罗伯逊十分关注作为社会变迁的关键原因的“文化”,这种关注超越了现代国家体系的政治—战略逻辑,从而有可能考虑这样的观念;文明“作为一种合法观念”,与基于“近乎全球的基础”的那种“主导性全球化过程”所呈现出来的“根本形式”息息相关(Robertson, 1992: 116)。

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的主要特色,就是欧洲国家形成与宫廷理性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明观念以及各种形式的礼貌。早在布劳代尔有关物质生活与文明的史诗般的著述之前,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Elias, 1939)就对有关(欧洲)国家形成与西方礼貌文化史的历史社会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尽管埃利亚斯关于社会型构(social figuration)〔惯习(habitus)〕的社会学对全球化或现代性这两个问题域的理论概括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他的作品并没有以这两个问题域为中心。埃利亚斯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雄辩而有力的方式,把各种社会形式〔管制机器的**社会生成**(sociogenesis)〕和人类主体性的转型〔个体自我约束的**心理生成**(psychogenesis)〕这两方面的分析融合在一起。这是国家形成与认同形成之间一次非同寻常的联姻。埃利亚斯追随弗洛伊德(Freud, 1930)与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 1920—1921),进一步分析构成文明分析的更为精细的部分:考察人类主体性与权力型构(即弗洛伊德所谓的权威)之间的相互绞缠。与他同时代的潮流相反,埃利亚斯非常早就开始批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这样一个“激进”的观点:“暴力方式的垄断或定向方式(知识)的垄断……作为权力的来源之一,其所发挥的作用不比对生产方式的垄断来得少”(Elias, 1987: 230)。而且,虽说有论者主张,埃利亚斯对文明化进程的诊断堪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观点相比拟(Bogner, 1987),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埃利亚斯对于自己所论述的文明诸过程抱持了一种欣然领受的态度,尽管具有悲剧色彩的是,此时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已在修造之中。

埃利亚斯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区分与社会互动中暴力的根除孕育了人类情

感结构的转型。伴随着早期现代欧洲骑士的衰亡与贵族阶层的兴起,符合宫廷礼节的行为形式迫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根本的转换:个人情感与冲动的节制。不管怎么说,正如弗洛伊德早先提出的主张一样,一种更为严厉的心理节制会使人们更有能力进行社会合作、预见、工具性的计算,以及发展出日益精细的符号。埃利亚斯认为,根据某个特定社会形态[部落、阶级或任何类型的“生存单元”(survival unit)]内的权力比率的具体型构,人的这些能力也会随之扩张或收缩(Elias, 1982),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是那些社会控制的垄断机制,比如王室宫廷或其后绝对主义国家中的调控机构,能够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将难以计数的个人、阶级与生存单元统统纳入由各种功能和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复杂链条之中。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垄断组织的文明化力量并非西方的独特现象:“不仅在西方的文明化进程中,而且在像东亚这样的其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在宫廷巨室中,在这些税收和暴力方面关键性垄断机制的行政中心里,行为所接受的形塑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Elias, 1982:258)。因此,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主张,这就避免了一种特定的问题,而无论是从更为严格的欧洲中心论立场出发所理解的现代性形象,还是更普遍意义上的研究东方的学者的经典社会理论,都会生发出这样的问题(Turner, 1978)。至少就其潜在意涵而言,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过程(或**多重过程**)理论不会把其他非欧洲文明描述成驯服或停滞的。实际上,他的理论承认:在文明化过程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可能走在了西方的前面。

关于对身体机能的制约所发生的变迁,埃利亚斯的研究深入探索了“礼貌的历史”(Elias, 1978)如何表现了西方对于身体的理解的重大变化:自我约束的贵族式礼仪逐渐扩散,宫廷理性也随之向“下层阶级”扩散。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社会互动中纯属跨社会或文明层次的部分。贵族统治的型构与更“文明的”举止形式的扩散都具备了独特的跨国性质。埃利亚斯告诉我们,“在中世纪末期慢慢形成的,并不是这里一个宫廷社会,那里又一个宫廷社会,而是以巴黎为中心,形成了包含整个西欧在内的宫廷贵族统治”(Elias, 1982:6)。对于埃利亚斯而言,无论是“个体文明化进程”,还是将针对身体表达或情感表达的约制内化的动力,要勾勒它们的发展路径,都必须以“社会总体”为着眼点(Elias, 1982:46)。因此,对埃利亚斯而言,构成社会领域的总体的,只是欧洲的文明,而非沃勒斯坦的欧洲世界经济体。文明化进程的考察具有“较大的辐射半径”,因此,需要一种长距离的视角,考察整个结构的社会生成,不仅仅是一个单个的国家社会,而且包括由特定的相互依赖的一组社会形成的社会领域(Elias, 1982:287—288,黑体为引者所加)。与迈克尔·曼早期反对运用“社会”的总体化概念的态度相反,埃利亚斯认为,“社会领域的整体型构”(即欧洲)的边界,可以通过驱使文明化前进的“相互依赖状况的边界所决定”(Elias, 1982: 288—

289)。简言之,文明化进程关注的是驱力和情感的秩序、自我控制的秩序以及社会约束的秩序这三者的同时发展。这种发展超越了阶级、性别、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但并非与它们毫无关系,因此,在本质上属于文明的层次。

14.7 文明分析:切近全球性因素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埃利亚斯的文明形成观倒也无甚新意,因为它趋向于重新引入古老的一元性社会概念,只不过现在是在文明的层次上而已。也就是说,埃利亚斯所说的“欧洲”、“中国”或其他文明,似乎都存在于某种社会真空中,从没有与其他帝国、世界经济体或宗教产生遭遇或交流,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欧洲曾经扮演过居于统治地位的局内人的角色,而其殖民地则充当了(满怀嫉羡的)局外人。除了这种作为特例出现的局内人与局外人关系(Elias, 1982),很少能看出他认识到了文明之间的遭遇对于理解各文明的自我形象的重要性。

研究科学与宗教的美国社会学家兼历史学家尼尔森(Nelson, 1981)在一系列论文里,也正是从同样的角度透视了文明之间的关系,以此卓有成效地探讨了这一问题域。尼尔森从来不把“欧洲”或“亚洲”当作是有机的社会整体,也就是密闭的社会总体。在这一点上,尼尔森的工作弥补了而不是反驳了迈克尔·曼有关相互交叠与弥散的权力网络的概念。当然,对于埃利亚斯和布劳代尔对漫长的谱系历史的强调,尼尔森也会报以赞同。他还敏锐地意识到,需要说明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与中国、中国(或印度)与欧洲之间曾经有过的大量交换,包括经济的、军事的、技术的,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尼尔森关于文明的历史社会学超越了韦伯的世界历史比较,着力发掘文化形态的多重层面,翻寻种种他者的、“异在的”文明踪迹。因此,韦伯是站在欧洲独特性的立场上,来考察非西方的城市、宗教、科学、财富和政治的形式,而尼尔森则不仅致力于比较牛顿式的科学与中国的经验科学之间的相对差异,而且还比较了文明之间的遭遇对其各自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相对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想说明某一种文明的上升,就既要研究某个文明复合体(civilizational complex)的历史构成,也要考察它与其他部落、帝国或国家之间的遭遇或交流。

尼尔森更喜欢用多维度的“文明复合体”,而不是“文明”(哪怕是多种文明),来指称“包含了民族、阶级、制度和各种文化经验等无数内在分化的政治社会”或社会复合体的符号架构和工具性生产(Nelson, 1973: 82)。尼尔森将涂尔干与莫斯不引人瞩目的合著(Durkheim and Mauss, 1913 初版)译为英文后,十分赞成他俩书中的主张:现代社会学错误地将国民生活看作“社会现象的最高形式”,并默认其“确定的轮廓”,推广至对历史上其他社会的解读(Durkheim and Mauss, 1971[1913]:

809)。因此,他对各个文明复合体与过程所进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正是致力于指出,涂尔干与莫斯所主张的东西(Durkheim and Mauss, 1971[1913]:809)“是一些还没有这样明确界定的限制的现象,它们超越了政治上的边陲,扩展至不那么容易确定的空间。”尼尔森避免了埃利亚斯在重新引入总体性观念时所犯的错误,宣称文明复合体由符号性的边陲所标明,不存在排斥性的“铁壁”。因此,欧亚大陆甚至在全球化之前就已经极其充分地表明了,货币、神话、语言和工具能够以怎样的路线,坚持不懈地穿越不同的政治与文化空间。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要用“边陲”(frontiers)而不是边界(borders)的原因,因为边陲并不属于能明确清晰地描述包含在内与排除在外的领土。因此,人们指责现代社会理论不适当地忽视“国际生活”的重要性,而这一点对于涂尔干和莫斯而言,“无非是更高级的一种社会生活”(Durkheim and Mauss, 1971[1913]:810),罗伯逊也会同意说这是“社会学需要了解”的东西。

作为对“将文明引回分析”感兴趣的历史兼社会理论家,尼尔森不仅懂得一元性“社会”理论的缺陷,而且认识到,当代分析忽视了当代生活的大部分“构造特征”。尼尔森认为,“我们时代的重要过程与生产”,绝大多数都“发生在那些极少被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系统研究的层面与场景上”,如“**社会层次、文明层次和跨文明间场景与遭遇**”(Nelson, 1973:80)。早在后现代主义使信息时代与视角革命成为众所瞩目的争论焦点之前,尼尔森就已经指明了几种根本性的变化,它们不仅出现于“西方文化”中,而且超越了文明的边陲,也就是说,成为全球化的东西。在以下几个决定性的转变作用下,当代社会生活的构造特征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型:时间与空间的革命,科学、技术与视角的革命,理性化的革命,民主运动的革命,还有意识/良知(consciousness/conscience)结构方面的世界范围的革命(Nelson, 1973)。简言之,这些革命指的是:人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的知识革命,以及各种通讯、控制和运输方式,都有了更高的速度、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影 响;理性化社会组织的扩展;更具包容性的政治权利和共同体的全球性表达;以及在现代化、理性化与西方化等论题方面世界上不同社会范畴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所发生的斗争。

14.8 世纪末之困境

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今天已是老生常谈,全球化理论今天也与这项主题交相呼应。总而言之,战后这些革命的暂时中断已经见证,“目前,在不断的摩擦性接触中,一个世界被迫走向痛苦的磨合,并且处在急速的收缩之中”(Nelson, 1973:80)。哪里有现代科学、工业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满分子发泄性地破坏具体历史处境下的

社会的“一切论域”(Nelson, 1973: 85),哪里就会出现政治与文化上的极端主义,这绝非偶然。尽管从无数历史交流来看,文明之间的接触本身并不特别成问题,但它同时将推动主体走向无序性与不确定状况。尼尔森这位理论家同时也关注那些支撑世界与自我的符号图式的**意识结构**(也包括无意识结构)所发生的转型,因此,他有能力指明这些全球化进程的心理后果。他认为,复杂社会“几乎总会在与其他巨大的社会复合体之间产生决定性接触时,感受到高度的威胁、狂迷甚至眼花缭乱”(Nelson, 1973: 81),在世界观的层次上尤其如此。而且,时空革命和现代化或西方化进程已经导致了“人口的爆炸和内爆(implings)以及不和谐的种族亚文化”(Nelson, 1973: 80)。在全球体系的半边缘与边缘地区,流离失所者的困境是全球化潮流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由于全球主义存在才为人们关注的现象。对于这些起到不稳定作用的进程的现实,这一早在现代性和全球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现实,我们无法加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相反,无论是从理论上概括社会世界,还是实际参与其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都是努力去了解而不是忽视社会的变迁、文明的变迁与全球的变迁之间的关联。

面对这些潜在的削弱力量,全球化自身很少提供什么清晰的解决矛盾与失常现象的办法,并且,正是全球化过程本身助长了这些矛盾和失常现象的产生及维持。尼尔森的观点是,一旦个体被切断了与他们的符号立足点的联系,无论是通过明确的还是隐含的“遵从论”(标准化)形式,他们都极易陷入各种失范状态。任何时候,只要工具性与技术性的控制和组织体系超越了吉登斯所谓的“本体性安全”的领域,就会导致与这个世界产生异化。由此观之,可以认为全球化进程所包含的潜在威胁远远超出我们平常的设想,包括有可能彻底清除那些原先只是被认为粗野和“原始”的文化形式,比如亚马逊地区印第安部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山民们的文化。这些风险的全球性扩散会带来一种“自食其果的效应”,但这在贝克有关“风险社会”(Beck, 1992)的论述中却依然不幸被遗漏了。这种效应不仅仅是动物王国中特定物种的灭绝,还包括那些试图定居在工业与科学文明的边缘的人类成员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对于那些生活在由商品、符号和“除魔了的”价值观所构成的世界经济体边缘的人们来说,他们所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在现代科层机构(尤其是国际组织)的行政管理力量以及科学—工具理性的肆意扩张面前,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有些人类共同体不仅仅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被剥夺了权利,而且在文化上也被逐渐挤到边缘。对于这些共同体来说,面对现代化、大众消费主义和旅游业残酷无情的压力,可能遭遇的这些风险就更加深重。在那些共同体里,全球主义可能仅仅是加利福尼亚、东京或布鲁塞尔的化名而已。

尽管社会生活具体体现了与自然界和社会世界的某种特定关系,然而从文

■ 明比较的视角来看,海德格尔清楚地认识到“世界解蔽”(worldly-disclosure)具有各自不同的面貌。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从两个方面承认了这一突出要点。首先,这个理论主张,“每一个独特的文明都拥有对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一种观念,以此作为自身符号传统的一部分”(Robertson, 1992: 133)。而且,这些构成性因素实际上也形塑了它们对于世界的特定取向,因此,可与其他文明相沟通。所谓“全球化理论是文明分析的一种深入”(Robertson, 1992: 129)的说法,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这也使得全球形势中的独特性或“单一性”(unicity)观念出现了问题。

其二,从第一点出发,这一理论承认“考察有关现代全球形势的不同文化解释的重要性”(Robertson, 1992: 68—69)。与此同时,它却仍然没能弄清楚:对于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对于更普遍意义上的人文科学,所谓的“核心解释原则”为何恰恰是全球性而非文明之间的联系(Robertson, 1992: 52)。大致可以说,对于分析不同的世界观取向、文明认同和文明之间(包括文明内部)的冲突,埃利亚斯与尼尔森研究文明的视角提供了一种较为精确的分析框架。罗伯逊的下述观点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点,他认为“世界体系在经济与政治意义上的扩张并不会带来均衡关系之中的世界文化的扩张,能够使全球场景中所有的主要角色都共享一套假设”(Robertson, 1992: 69)。一旦工具性与功能性的依赖关系似乎已经超出了哈贝马斯所称的现存各种“道德—实践知识”形式,日常存在的生活世界其实也就已经是被技术理性所压缩(所殖民),而不是什么扩张了(Habermas, 1979)。

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即卡沃利斯(kavolis, 1985)所称的“研究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其任务即在于阐明关于自我与(多个)“世界”的文化理解的解释学维度。如果忽略考察所探讨的实际主体或文化群体的符号架构和解释图式,我们就有可能将自己对于世界、社会秩序和“好社会”的观念强加给他人。换言之,如果没有注意到,主体自身会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体察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把构成符号行为的意义赋予该行为,那么,现代化将会成为暗中为害的标准化逻辑的先兆。为防止现代化或全球化变成另一种主导性的形式,或者更糟的是,成为普遍化了的一致性,伽达默尔(Gadamer, 1975)《哲学解释学》的核心观念“意义的视界”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否则,认同形塑将沦为驱动自身前进的系统进程以及特定技术的某种效果。因此,任何“中心解释原则”都必须转而依靠这些形式的自我认同和“世界解蔽”,它们彼此歧异,某种程度上还相互重叠。如果我们在理解这种由“现代化”刺激造成的巨大变迁时,忽视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就有将现代化简单归为西方化的风险。* 罗伯逊的全球性观念旨在强调在全球地方化概

* 以下完全是作者为第二版增写的内容。——译者注

念(glocalization, Robertson, 1995)中所体现出来的,“地方的”与跨国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力量之间的相互渗透,以此彻底克服上述这种归并的谬误。这是一种相当正确的宗旨。对于我们来说,不再可以用19世纪的术语来思考,是该选择做一个“同质化因素”还是“异质化因素”,这原本就是个虚假的两难,却在后现代反基础主义面目之下得到了重新表述。而全球性则就此使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成为哲学角度上的冗余。

产生同质性趋势的因素,不仅有资本积累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全球过程(即帝国主义),而且还包括关于欧罗巴帝国征服的理性阐释效力的种族中心主义元理论假设。而在更为晚近的时候,学术界中后殖民主义的介入则进一步推动了遏制这种趋势的斗争。萨伊德批判了18及19世纪东方学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Said, 1978),而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和普拉卡什最初正是受到这种批判的激发,现在则从一种独特的文学视角入手,成为对臣属(subaltern)处境进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核心阐释者。“臣属”这个术语具有特别的马克思主义味道,取自意大利历史唯物主义者葛兰西,指的是被剥夺、被辖制的那些主体,而造成剥夺与辖制的原因也不仅仅在于阶级、性别或政治上的支配,而尤其在于殖民剥削。关于臣属的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Moore-Gilbert, 1997)都力求突出臣属者社会生活与共同体形式(及其各自的忠诚情感)的特性,而不带有通常会犯的符号暴力,后者一般会伴随着欧洲中心主义对其他社会(也就是非欧洲社会)的解释与表现而产生。欧洲哲学的那些宏大叙事与概念图式,“多元决定着”相对于西方诸形而上学范畴中心性而言的被殖民臣属者的认同与谱系,而前面提到的各位作者所要实现的目标,就在于将这些宏大叙事与概念图式置换掉,对于斯皮瓦克来讲,也就是对它们进行解构。西方学术界对于认同、归类乃至最终融入“西方”知识系统等方面的各种普遍化逻辑,抱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偏向。而要在根本上将臣属者从这种偏向中解放出来,正是一种规范性的旨趣,这样的旨趣进一步增强了上述的这种置换。

学者们认为,西方眼光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对有关非欧洲生活方式的人类学考察与历史考察施加一种认识论,不过这种认识论未必是限制性的。而在现实当中,这些生活方式是杂多的而非一致的,混合的而非单一的,偶变的而非固定的(Spivak, 1990; Bhabha, 1994)。后殖民主义者倡扬的是前三项特征而非后三项特征,力图拆解一些有害的二元对立,它们标志着历史、比较文学、政治科学和女性研究等“学科性知识”的特征,包括文明与野蛮、内部与外部、自由与奴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同一性与他者性、先进与落后、认识论上的确定性与虚无主义的唯我论以及在场与不在场。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本体特性,从先锋的、宗主国的、女性主义的立场所做出的界定,霍米巴巴提出了福柯式的质询,而斯皮瓦克也做

出了德里达式的解构,对于他们两位来讲,上述二元对立的最后一种意义相当重要,仅次于下面这种。可以说,论证主张上的总体转换是从空间性转向时间性(Featherstone and Lash, 1995),同时也从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转向跨学科的、反基础主义的、铭刻性的“书写差异”方式,以对抗那种一般会抹去多重“文化位置”的概念霸权(Bhabha, 1994)。将时间性的因素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根本上就是以福柯的方式,将一种非连续性的断裂,插入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都典型地体现出来的关于自由、知识或进步的叙事,要不是这种断裂,这些叙事会被认为是无所不包、整合一体的。

不管是表现为各种区域史,还是表现为高等的理论,后殖民主义的置换几乎始终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后结构主义倾向,要拆解有关相对于西方存在的他者的此类二元对立式思考模式与表现模式;某些特定的西方总体性理念,比如精神、理性、意识、自由、国家、进步、权利与支配,都已成废墟,废墟之下,显露出在这些二元系统中,存在一些颇具效力的空间,而这些空间彼此之间尚有空隙。在这些空间里,就会发生属于自身的“铭刻与重新铭刻”、“命名与重新命名”等新的混合形式。在这里,与晚近的法国哲学思想一致的是,重点在于倒转规范的知识政治关系,朝向殖民的对象,从而使后者不再表现为驯服的话语(或多种话语)对象,而是积极参与那些特定的话语实践。对于印度人、东非人或克里奥耳人*,维多利亚式的帝国主义假设原本替他们设定了“什么是对他们好”或“因为了解土著人和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一定是属于异国情调的”,而这些话语实践则确立了他们独立于这些假设的生活的有效性(可以理解为特殊性)。就前一项假设而言,过去那些傲慢的声言,说有一个他者能够替你说话,既“了解”你的需要,又从道德的角度规定了你应当如何生活,如今这种庇护主义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傲慢声言的明确拒弃(参见Spivak, 1990)。而就后一项假设来讲,差异目前也进入了人们的眼界,但却只是瓦解了原本认可的对差异的认识(与多元性相对):单单承认有一种他者,并不一定是要将他们外在的差异化约为缺乏属于自身的或某种限定的实质(ousia, substance),而一旦能够去除附着在这种异在性质上的神秘色彩,也就是说,一旦能够借助冰冷的理性予以除魅,就可以了解这种实质。霍米巴巴避免任何从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或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来认识殖民主奴之间的关系,而是探讨了一种混杂性,它所产生的是(殖民权力的程度或土著的差异性上)的含混性而非确定性。混杂性“提供不了深度或真理之类的视角;它不是……在某种辩证的‘承认’游戏下……释

* 克里奥耳人(creole):常指出生于美洲的欧洲人及其后裔,也指这些人与黑人的混血儿以及美国中南部的路易斯安纳人。——译者注

解两种文化之间张力的第三方”(Bhabha, 1994: 113—114)。相反,它被认为是扭转了殖民主义的必然要求,以至于(一旦)受辖制的知识进入殖民主义话语交战的领域,就只会破坏“其权威的基础,也就是承认的规则”(Bhabha, 1994: 114)。当代社会学对于含混性当然不是一无所知(参见 Bauman, 1991),对于记号的重新铭刻与不确定性就更不用说了。

但不管怎么说,从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眼光来看,有关这一点可以提出两点批判性的意见。尽管后殖民主义理论宣称它“提供不了深度或真理之类的视角”,但它本身不也是涵纳了某些实质上的真理诉求,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就是它对殖民主义话语的倒转与置换是可取的(也是有效的)吗?比方说,当霍米巴巴(Bhabha, 1995: 330)这样来推行他的解构主义矫治方案:“行动需要有一种奠立根基的过程,而不需要对那些根基的总体化;它需要运动和调遣,而不需要时间上的延续或累积;它需要方向,需要偶变性的结束,而不需要目的论和整体论”,此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种反哲学(anti-philosophy)的伪装之下,伸张的是一种对抗哲学(counter-philosophy),诉求一种元理论的真理,同时却忽略了去质询那种观照点,从那种观照点出发,理论家便有能力辨识出话语分析的首要性,或者作为一种统一化总体的“西方”的首要性。“西方”,这个起组织作用的核心范畴,也有助于凸显后殖民主义论证的矛盾性质,因为它屡屡宣称弃绝“总体化的概念”、统一体或超历史的整体论。与此相反,以历史的、比较的视角开展的社会学考察一般都会发现,反认识论的哲学关注作为起点而言不那么有用。历史社会学的宗旨不是要玩哲学家的真理游戏,而是要找出那些决定意义与行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特定因素。它由此便可以更好地把握知识分子所参与的那些意义框架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从而有可能将她或他以及当前的争论定位在更广泛的背景之中,即去殖民化、多元文化化以及在全球化状况下西方女性主义的相对缺陷等方面所产生的效应。从历史的、比较的角度进行的科学社会学,甚至能够有助于萨伊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推翻认识论普遍项在欧洲视野及其相关的学科传统里的特殊地位。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一种社会学将不会确认普拉卡什所提出的主张(Prakash, 1995: 11),即在“殖民主义的场所”里,“各门学科既获得了主宰的地位,也同时被消解”。

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站在一战和二战之后帝国主义的视角上都看到的那种“全球状况”,那么,萨伊德所命名但未深入探讨的那种“帝国主义方法论”(Said, 1993),就不仅需要考察欧洲与美国的帝国主义历史与预设,而且也需要考察涉及到内部殖民或者外部殖民的任何权力政治,比如伊斯兰在非洲,日本在东亚与南亚,苏格兰与伦敦之间的关系,苏联与前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次,即

如列宁 (Lenin, 1968) 借用罗得斯* 的见解,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揭示的那样, 帝国主义还与将无产阶级涵纳在宗主权力本身内部有着莫大的关系。第三, 如果我们本着这个方向来利用萨伊德的有益概念, 即**彼此交叠的地域** (overlapping territories), 就有可能识辨出具有不同文明特性或民族特性的权力 (而不只是国家) 通过哪些方式, 彼此共谋, 从其他群体或地区那里攫取权力。在这里, 文化他者性和支配作为核心组织概念, 证明是有欠缺的。殖民化也可以是通过“跨民族/文化/种族”的安排与合作而发生, 而在通常情况下, 这些安排与合作会在有关理解殖民情势时存在或明或暗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面前趋于消失。不仅如此, 从批判色彩稍弱的角度来说, 有关法律与科学、有关权利与司法体系的比较社会学, 完全可以确定出某些更占比较优势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表现形式, 而它们恰恰都是基于**普遍主义**的说教与构成性规则而确立的。如果研究各项制度与实践的社会学还想继续找出那些突生的共同体形式和制度化形式, 那么它就几乎无法承受抛弃所有普遍项的代价, 不管它是“西方的”、全球的, 还是来自耶路撒冷以东。这种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找出, 通过哪些多重的方式, 可以考察社会、历史、地理与思想等彼此绞缠的演变轨迹——第一代年鉴史学者就已经把握了这种洞见。

参考文献

- Adorno, T. W. and Horkheimer, M. 1972: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Anderson, P. 1974a: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74b: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Baran, P. 1973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auman, Z. 1991: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London: Sage.
- Bellah, R. N. 1957: *Tokugawa Relig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endix, R. 1978: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罗得斯 (Cecil Rhodes, 1853—1902): 南非金融家与政治家, 一生正值英国帝国主义全盛时期, 为帝国创业人之一。所经营的矿业公司一度垄断了世界钻石生产的 90%。1890 年成为好望角总理, 后努力向北扩张, 权力由今南非扩及今赞比亚 (原名即北罗得西亚)、马拉维、博茨瓦纳一带, 新拓领地统称罗得西亚。——译者注

- Bergesen, A. 1990: Turning world-systems theory on its head.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1995: In a spirit of calm violence. In G. Prakesh (ed.) *After Colonialism: Imperial Histories and Postcolonial Displace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gner, A. 1987: Elia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4(2—3).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oyne, R. 1990: Culture and the world system.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 Braudel, F. 1973 [1967]: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London: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 1981—1984: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1: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Vol. 2: *The Wheels of Commerce*. Vol. 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London: Collins.
- Brewer, A. 1980: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urke, P. 1980: *Sociology and His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Collins, R. 1985: *Thre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rkheim, E. and Mauss, M. 1971 [1913]: Note on the notion of civilization. *Social Research*, 38(4).
- Eisenstadt, S. N.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Elias, N. 1978 [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New York: Pantheon.
- 1982: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lackwell.
- 1987: The retreat of sociologists into the present.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4(2—3).
- Featherstone, M. and Lash, S. 1995: Globalization, modernity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and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 Foucault, M. 1965: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New York: Pantheon.
-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rank, A. G.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dern Reader Paperbacks.
- 1969: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eud, S. 1961 [1930]: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adamer, H. 1975: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 1988: *Plough, Sword and Book*. London: Collins Harvill.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London: Macmillan.
-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Vol. 2 of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uldner, A. W. 1980: *The Two Marxisms*. London: Macmillan.
- Habermas, J. 1973 [1971]: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9: Moral development and ego identity. In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Hall, J. A. 1985: *Powers and Liberties*. Oxford: Blackwell.
- (ed.) 1986: *States in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 Herder, J. G. 1969: Ideas for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n F. M. Barnard (ed.) *Herder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volis, V. 1985: Civilization analysis as a sociology of culture. *Sociological Theory*, 3(1).
- Lenin, V. 1968: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Imperialism*. Moscow: Moscow

Publications.

- Mann, M. 1984: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natur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5.
-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cuse, H. 1968: *Negations*. Boston: Beacon Press.
- Melko, M. 1994: World systems theory: a Faustian delusion? I & II.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30, Spring.
- Moore, B. 1969: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oore-Gilbert, B. 1997: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Nelson, B. 1973: Civilizational complexes and intercivilizational encounters. *Sociological Analysis*, 34(2).
- 1981: *On the Roads of Modernity*. Ed. T. Huff.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 Nettl, J. P. and Robertson, R. 1968: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etie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Goals and Attitud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Parsons, T. 1966: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Prakash, G. 1995: Introduction: after colonialism. In G. Prakesh (ed.) *After Colonialism: Imperial Histories and Postcolonial Displace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ey, P. P. 1971: *Colonialisme, néo-colonialisme et transition au capitalisme*. Paris: Maspero.
- Robertson, R. 1989: A new perspective on religion and seculariza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 In J. K. Hadden and A. Shupe (eds) *Secularization and Fundamentalism Reconsidered*. New York: Paragon House.
-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 1995: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 Feather-

- stone, S. Lash, and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 Skocpol, T. 1977: 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 1984: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elser, N. J. 1959: *Social Chang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A. 1981: *The Ethnic Revival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D. 1991: *The R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pengler, O. 1926—1928: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Spivak, G. 1990: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Ed. S. Harasym. New York: Routledge.
- Tilly, C. 1964: *The Vendée*. London: Edward Arnold.
- (ed.)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4: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00—1900*. Oxford: Blackwell.
- Turner, B. S. 1978: *Marx and the End of Orient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1991: *Religion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 Wallerstein, I. 1974—1989: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 2: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Vol. 3: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 World-Economy, 1730—184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84: Civilizations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conflicts and convergences. In R. B. J. Walker (ed.) *Culture, Ideology and World Order*.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 1990: Culture as the ideological battleground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 Weber, A. 1939 [1920—1921]: *Fundamentals of Culture-Sociology: Social Process, Civilizational Process and Culture-Movement*. Trans. G. H. Weltner and C. F. Hirsh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7.
- Weber, M. 1920—1921: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3 vols. Tübingen: J. C. B. Mohr.
- Zolberg, A. R. 1981: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a missing link. *World Politics*, 33(2).





第 15 章

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



J. 厄里

厄里(John Urry)生于1946年,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1970年以后在兰开斯特(Lancaster)大学教授社会学,1981年晋升高级讲师,1985年晋升教授。1983年至1989年担任社会学系主任,1989年至1994年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1994年以后任研究院院长。他的专著与合著有十数本之多,包括《资本主义之终结》(Polity, 1987),《旅游者之凝视》(Sage, 1990),《符号与空间诸系统》(Sage, 1994)以及《场所的消费》(Routledge, 1995);合编了四部文集,包括《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Macmillan, 1985),《场所、政策与政治:地方性重要与否?》(Unwin Hyman, 1990)以及《构造旅游理论》(Routledge, 1995)。他目前的兴趣领域在于服务业、中产阶级、乡村、都市社会学、环境社会学、休闲以及旅行。他还参与编辑《社会学诸思潮》(Edward Elgar)和《国际社会学文库》(Routledge)两套丛书。

- 15.1 引介
- 15.2 时间与空间简史
- 15.3 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
- 15.4 时空社会分析的发展
- 15.5 结语

15.1 引 介

本章我将重点讨论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对于社会学的重要性,更一般地说是对于社会理论的重要性。我将指出,这些理应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具有核心意义的观念,只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从某些方面来看,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但我也将指出,这种缺失的局面是不可能全面维持的。时间和空间总会在某一个地方冒出来,扰乱某些既存观念,而这些既存观念原本是围绕着一些主要旨在构筑一种无时间和空间向度的社会学的区分而形成的。人们一般是把社会看成内生性的,有其自身的社会结构,而这些社会结构既不是时间结构,也不是空间结构。不仅如此,人们还把社会看作彼此分离的,而规范共识、结构冲突或策略行为的种种作用过程,绝大多数也被理解为内在于各个社会,其边界是和民族国家重合的。除了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某些内容,对于内部的空间分化过程,几乎没有什么认识。20世纪大多数社会学所考察的,是一个由彼此独立的社会组成的系统,它们的社会结构被认为在各个空间上都是一致的,至于构成这些社会的不同的时间性,也几乎没有什么分析。

更有学者认为,这种学术上的忽略在空间观念上比在时间观念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索加(Soja, 1989)指出了—个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约30或40年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彻底的技术变迁和文化变迁,改变了当时生活的空间基础。这些变迁中包括电报、电话、X光、电影、广播、自行车、内燃机、飞机、护照、摩天大楼、相对论、立体主义、意识流小说以及精神分析(参看Kern, 1983)。但索加认为,这些变迁在当时大多数社会理论里并没有反映。诸如此类的空间变迁主要是成为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这是一门愈益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独立科学,确立并维持着与其相近学科之间严格的分界和学术分工。索加认为,一种历史意识已经深深地铭刻在社会理论中,以至于“历史的‘想像力’似乎已经根除了地理的‘想像力’”(Soja, 1989: 323)。纵使如此,在20世纪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里,这种历史想像力也始终是比较漠视时间的确切意涵,尤其是看不到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当中,是如何蕴含着不同的社会时间的。

在本章的第二节,我将简要地概括某些有关时间和空间的早期“经典”著述。而在其下一节里,我将揭示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这一局面有哪些改变。接下来,我将转而分析过去二三十年可称之为“时空”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案的兴起。我将集中讨论其中某些主要著述,它们已经开始探讨,社会结构和文化过程是如何必然受到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安排的;这些时间安排和空间安排又是如何成为

■ 此类结构和过程之权力与效果的固有因素。最后有一个简要的结语。

15.2 时间与空间简史

大多数社会科学阐述都假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是社会性的,从而与自然的时间相分离并且相对立。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Durkheim, 1968)中认为,只有人类具备某种时间概念,人类社会里的时间是抽象的、非人格性的,而不是单纯个人性的。而且,这种非人格性还是以社会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它就是涂尔干所谓的“社会时间”。因此,时间是一项“社会制度”,时间范畴不是一种自然范畴,而是一种社会范畴。时间是这样一种客观给定的社会思维范畴,它在社会中生成,因此,也随社会的不同而各有差异。社会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后者也有可能不是惟一的),也与后者相对抗。

索罗金和默顿(Sorokin and Merton, 1937)进一步根据是否具有独立的钟点时间范畴,来区分各个社会,而钟点时间的范畴是不同于社会时间的观念的。社会时间是以“自然地”确定的社会活动为基础的(比如那些围绕出生与死亡、黑夜与白日、种植与收获等组织起来的时间);还有些时间则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由时钟以“非自然”的方式强加的。大多数有关时间的人类学著述都关注了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Gell, 1992)。例如,努尔人(the Nuer)似乎并不把时间看做一种类似于钟点时间的资源。时间不被看作某种流逝而去的、可以浪费也可以节约的东西(Evans-Pritchard, 1940)。时间可以有多种表达,因为可以诉诸以周期性生态变化为基础的种种社会活动。那些缺乏重大社会活动的时期,似乎就这样不诉诸时间地度过去了。

不仅如此,尽管绝大多数社会都有某种“周”的形式,这一周也可以从3天到16天不等(Colson, 1926; Coveney and Highfield, 1990: 43—44)。没有其他任何动物表现出将一周作为一种时间单元,或者已经发展出一种如此独立于天文划分的单元。以7天为一周期的一周源自巴比伦人,而他们又继而影响了犹太人的星期观念,后者包括6天,外加一个安息日。曾经有过形形色色改变一周长度的流产尝试,比如在1789年大革命后的法国,采取了十进位的10天一周,而在苏联,推行过5天一周。

总的说来,人们认为,钟点时间在现代社会的组织机制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也在构成这些组织机制的各种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中居于核心地位。这类社会的核心是时间(和空间)的空洞化,是对时间的计算发展成为抽象的、可分的、可以通用标准度量的。现代机器文明的首要特征,就是通过时钟加以组织的时间规律

性,而时钟这项发明,从许多方面看都比蒸汽机还来得重要。汤普森提出了一种著名的观点,他认为在以最大限度地主宰自然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至关重要的特征是对时间的取向,而不是对工作任务或社会活动的取向(Thompson, 1967)。

这个观点依据的是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揭示道,对劳动时间的调控和剥削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商品的交换其实也就是劳动时间的交换。资本主义必然要求资本家做出一些努力,要么延长工作日,要么加大工作强度。马克思说“人什么也不是;他充其量不过是时间的躯体”(Marx and Engles, 1976: 127)。即使工人阶级没有能力抵抗这样的压力,竞争也会迫使资本家将工作时间延伸到超出其社会限制和生理限制。不管怎么说,这种功能需求并不能确保工作日的长度真的缩短。资本主义竞争必然受到资本利益的限制(当然也受到劳动力利益的限制)。因此,在第一个工业强国英国的历史上,在防止工作日持续延长、引导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面,工厂时间立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也就是马克思将之与较为“疏松”的长工作日比较,称为“较致密的”工作形式,导致生产率取得令人震惊的增长。

后来的学者们已经证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多少冲突的核心是时间,是资方组织和延长工作时间的权利,以及劳方限制那些时间的努力。所有这些争端的焦点,都是标准化的钟点时间单元,它们已经将工作与其社会背景和生理背景割裂了开来。时间被商品化了。它开始成为一种衡量工作的尺度,构造了劳动分工,限定了人们与其物质环境关联方式的结构。

不过,马克思并不曾详细阐述,时间是如何内在化,将人们构成为时间主体,既受钟点时间的纪律约束,又培育出对于这样一种时间的倾向。韦伯、福柯和芒福德都主张,这种主体性的根源在于本笃会修道院中和谐采用的多种时间体系。曾经一度,整个欧洲散布着四万座这样的修道院(Adam, 1995: 64—65)。这类修道院里的计时体系最初在6世纪引入时具有革命性,用年、周和日为周期的例行常规,来统一协调各种社会活动。闲散可是不允许的。根据韦伯的说法,新教伦理也具有类似的效果,使人们免于依赖“自然冲动”,把自己培养成以节约时间、尽可能提高活动效率为导向的主体:“因此,时间的浪费是首要的罪,原则上也是最致命的罪。要想确保自己成为上帝选民,人的一生实在是太短暂、太珍贵了。在交际、闲聊、享乐甚至是超出健康之所需的过多睡眠中流失的时间……值得遭到绝对的道德谴责”(Weber, 1930: 158)。资本主义精神更为这种正在兴起的主体性加了一把劲。富兰克林坚持认为“时间就是金钱”。他说,浪费时间无异于浪费金钱(weber, 1930: 48)。因此,人们会认为自己的职责就在于吝惜时间,不要浪费时间,充分利用时间,

尽可能勤勉地安排好自己和他人的时间。

齐美尔也以颇为相近的方式,描述了新兴“大都市”里的生活是如何包含着高度的计划和精确,以便使社会生活和商贸生活能顺利进行。都市生活的种种关系与事态是如此地复杂,以至于“若无允诺中和服务中最大程度的严格守时,整个结构将会崩溃”(引自 Frisby and Featherstone, 1997: 177)。如果没有各种社会活动按照精确的时间整合成一套稳定而非人格化的时间表,那么都市生活就是不可想像的。齐美尔揭示了钟表的广泛使用是如何地有必要,以便使人们的旅行安排和约会有效运转,从而避免“负担不起的时间浪费”(引自 Frisby and Featherstone, 1997: 177)。

在这种理性主义的时间分析之外,还发展出一种更具现象学取向的关于时间的社会理论。这一点反映在时间哲学中所谓时间 A 系列和时间 B 系列之间的区分上 (McTaggart, 1927)。行文至此,我主要考察的还是 B 系列,即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把时间看作是“此前与此后”。事件被看作是彼此分离的,沿着(时间的)第四维度延伸开去,如此便可以按照彼此间或前或后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参看 Gell, 1992)。B 系列中的各个事件都被看作是相互分离的,与其他所有事件的关系也从不会改变。时间被当作许多彼此同一的瞬间的无限接续,而每一个瞬间都可以确定为“前于”或“后于”另一个瞬间。因此,倘若我们考察事件乙,它是在事件甲之后发生的,那么它现在依然是在事件甲之后,将来不管会发生什么,也始终是在事件甲之后。所以,关于这类现象的陈述也将是永远正确的。许多研究者已经假定,可以通过 B 系列的“空洞而均质的”钟点时间来透视物理世界。

这种时间可以和 A 系列相区别,即奥古斯丁的时间观,表现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在这里,过去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在现在里,然后又被带往未来。而且,现在不是被视为一个瞬间,而是有一段持续时间。过去并不是单纯地在此之前,而是融入了现在,也体现了对于未来的某些期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海德格尔将死亡预见为人的时间性的超验界限。在 A 系列里,可以从事件的过去性、现在性和未来性的角度来区分各种事件;也就是说,时间有赖于情境。已经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深入探讨了 A 系列。

乔治·赫伯特·米德 (Mead, 1959) 始终坚持了一种“时间”视点。他集中讨论了时间是如何根植在行动、事件和角色之中,而不是把时间看作一种抽象的框架。米德认为,时钟和日历的抽象时间,即 B 系列的抽象时间,只不过是一种“言说方式”。在米德看来,只有现在是“实在”的;因此,他论述时间的主要著作就是《关于现在的哲学》:“现实存在于现在之中”(Mead, 1959: 33)。我们当作过去的东西必然是于现在中重新构造的;过去的每一刻都会在现在中重新创造出来。所以,在这儿之

外,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儿之前,并没有任何“过去”。只有现在,在现在所处的情境下,过去被持续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只有参照不断浮现出来的现在,过去才能有它的位置。正是这一浮现,改变了过去,并为未来提供了意义和指向。这一浮现源自人与环境的互动,在米德的理解里,人是自然不可分解的组成部分。这种浮现始终不只是促成它的那些事件。而且,现在被视为实在的,而过去和未来则是观念性的,或“假想的”,只有经由思维才能向我们开放。

与此类似,海德格尔的关注点在于证明人的存在中不可化约的时间特性。他在《存在与时间》(Heidegger, 1962[1927])里强调指出,哲学必须回到关于“存在”(Being)的问题,而西方世界对认识论的过度关注已经遮蔽了这个方面。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的核心就是时间本体论,是时间表达了人类主体的性质。人类在根本上是时间性的,在时间性中找到自身的意义所在。存在是在其时间特性中显现出来的,尤其是在从生到死的运动中显现出来的。所以不应该把朝向死亡的运动看作某种边缘的东西,而应当看作某种必然会渗透在人的存在之中的东西。生与死必然是相互联结的,形成一个统一体。此在(Dasein)便是“之间”。存在必然包含从生到死的运动,或者说是未来、过去与现在相互之间的伸展和敞开。当然,不能把时间的性质与人们习惯用来测量它的那些方式混为一谈,比如间隔或瞬间。他说,在西方文化中,可测量的时空已经被强加在存在与时间之上。

女性主义批评家已经指出,这种海德格尔式的此在观念,即“向死而生”(being unto death),表明了一种男性取向的时间研究途径,强调的是对于所有人来说,朝向死亡的不可避免的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照她们的说法,这样的观点是排斥了妇女对于出生的关注,对于生育中明显具有的时间生成能力的关注,对于需要保护环境以利后代、以利“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关注(Adam, 1995:94)。

我最后来谈谈柏格森。他致力于将时间分析与空间分析整合为一体。他区分了时间(temps)与绵延(durée),前者所认识的时间是量化的,可分割为空间单元的(即上文讨论的B系列:Bergson, 1910)。但柏格森反对这种空间化的时间观,而主张时间是一种绵延,或所经历的一段时间(duration),彻头彻尾都是“时间性”的。绵延,或者说正确理解的时间,就是生成(becoming)的时间。应当把人看作是处在时间之中,而不应当把时间认作某种分离的要素或外在的显现。时间包含着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些据说是相互分离的时刻之间的“渗透”;随着过去和未来在现在被创造出来,它们各自融入其他两种时刻。

不仅如此,时间与身体之间还有着不可分解的关联。人们并不怎么太去思考实际的时间,其实是以感觉的方式、以质的方式经历着时间。柏格森主张,不应把一个人的记忆看作一个抽屉或一座仓库,因为只有不正确地以一种空间的形式来理解

时间,才会得出诸如此类的观念。而时间并不是“空间性的”。因此,记忆永远也不可能只是过去的简单表现,而应该从时间的角度来考虑。记忆是过去在过去之上的叠积,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成分是纯粹现在的,而是随着新成分无穷无尽地积累起来而发生着变化。在哈布瓦赫有关集体记忆的考察(Halbwachs, 1992)里,可以找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柏格森观点的修正。他着重指出了过去通过一些特定的社会制度、纪念制度和节庆制度,为现在,特别是为了当前的一代,而储存下来,并且获得解释。

现在我要转到空间简史。社会学经典确实探讨了空间,但探讨的方式却很不明晰,很不充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关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如何产生了工业城镇极其迅速的增长。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那些固定的、凝结的关系是如何被扫除一净,一切新形成的关系是如何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是如何都烟消云散了,而一切神圣的东西又是如何都变得凡俗了(Marx and Engels, 1888[1848]; Berman, 1983)。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瓦解了将人们束缚在其“天然首长”上的封建纽带;它迫使资本家阶级在整个地球的范围內寻求市场,这便破坏了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市场;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工厂,这样便汇聚起一个无产阶级,形成了一个自为阶级;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交通与沟通的改善,促进了工联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里,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是怎样建立在时间对空间的消除基础上,而这又如何进一步产生了农业、工业和人口方面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令人惊奇的转型。

在涂尔干那里,也分析了一些类似的过程,只是他对这些过程所带来的后果看法相当不同。在《社会分工论》(Durkheim, 1984)里,他提出社会及其相维系的团结形式可分两类。一类是机械的(以相似性或相近性为基础),一类是有机的(以差异和互补性为基础)。而造成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型的,便是劳动分工的增长,就是专门化的急剧增大。而劳动分工的这种增强,则是物质密度(material density)和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增加的结果。所谓物质密度的增加,包含某一特定地区内人口密度的增加,尤其是出于新的沟通形式的发展以及城镇的成长。而道德密度的增加指的则是社会互动密度的增加。随着个人之间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密切,社会的不同部分也丧失了它们的个体性。这便产生了相互依赖的一种新型有机团结,尽管有些时候城市也会变成社会病理现象的中心。总的来看,涂尔干提出了一项关于现代化的命题,其中,一种基于职业的新型劳动分工的增长,会逐渐破坏原来基于地理因素的地方忠诚关系。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Durkheim, 1968)里,涂尔干还提出了一种关于空间的社会理论。其中主要有两部分内容:首先,既然一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这就意味着此类观念有着社会性的

起因；其次，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各种空间表现会如实折射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

马克斯·韦伯几乎没怎么讨论到空间，这可是个悖谬的现象，因为他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是工业区位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在他有关城市的分析里，对于一些运用空间观念的尝试是持较为批评的态度的。他不接受从规模和密度角度进行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如何构成了对周围的封建制度的挑战。城市的典型特征是其自主性，正是在城市当中，人们第一次可以作为个体公民聚居在一起（参看 Weber, 1958）。

对于空间社会学，最重要的经典作家无疑算是齐美尔。他论述“大都市”的经典论文应该放在他讨论空间的更具普遍性的著述背景当中（Frisby, 1992a, 1992b）。有些社会互动能够将空洞的空间变为有意义的空间，他就分析了这些互动中找到的空间形式的五项基本属性。这些属性就是：一块空间的排他性或独特性；空间可以由此划分成具有空间化“框架”的片断和活动的那些方式；社会互动可以在空间里局部化的程度；邻近/距离的程度，尤其是在城市里表现出来的程度以及视觉的角色；变动不居的定位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尤其是“陌生人”的到来。总的说来，齐美尔倾向于认为，随着社会组织开始脱离空间，空间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

在“大都市与城市”一文里，齐美尔就空间与城市提出了更具体的主张。首先，由于大都市中有着丰富而多样的刺激，人们不得不养成一种冷淡和迟钝的态度。如果不养成这样一种态度，人们将无法应对人口的高密度所导致的这类体验。城市人格就是冷淡、超然、腻烦。其次，与此同时，城市还确保个体具有一种独特的个体自由。与小规模的共同体相比，现代城市为个体、为个体内在发展与外在发展的独特表现都留出了余地。正是大城市的空间形式，使置身于极其多样化的接触背景中的个体有可能取得独特的发展。第三，城市建立在货币经济的基础上，货币经济是城市的理性和唯智主义的源泉与表现。货币和理智都对人和事抱有一种讲求实际的态度。是货币为情感和态度提供了一种平衡尺度。第四，货币经济促使人们关注精确和准时，因为它使人们更多地去计算他们的活动和关系。

因此，齐美尔并不怎么太多地从城市空间形式的角度来说明城市生活。他的有关著述更像是关于“现代”流动模式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效应而做的一项早期考察，堪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相比拟（Berman, 1983; Frisby, 1992a, 1992b）。齐美尔分析了现代生活的分裂化和多样性，揭示了那种体验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特征：不息的运动，多样的刺激，从视觉上对于场所的占用。

不幸的是，这些分析当时并没有就此带来专门的学术研究的兴起，来考察诸如此类的大都市，也就是所谓的“城市社会学”。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芝加哥

大学建立的。这项事业中尽管也发展出一些研究采取民族志方法,但大部分还是在尝试发展一些城市研究的生态途径,如同心圈(concentric ring)理论。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作品是沃斯的“都市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Wirth, 1938; 接下来是雷德菲尔德的“民俗社会”, Redfield, 1947)。沃斯主张,城市地区与乡村地区之间在社会模式方面的种种差异起因有三:一是规模,规模的差异产生了隔绝、淡漠和社会距离;二是密度,密度的差异致使人们根据特定的角色相互关联,因为城市在这些角色的占据者之间形成了隔绝,正式规章也更多些;三是异质性,意味着人们参与不同的社会圈子,没有任何一个圈子要求个人的完全投入,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地位各个不同,也缺乏稳定。因此,沃斯(还有雷德菲尔德)宣称,是空间的组织,主要是规模和密度方面的组织,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模式。

然而,沃斯的分析奠定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而雷德菲尔德的 analysis 则奠定了乡村社会学的基础。大部分的精力都消耗在验证这样一项假设:存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各自源于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相应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程度。但不管怎么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并不存在这么简单的城市模式和乡村模式。其中有一点首先可以明确,城市地区也包含一些常常是结合致密的社会群体,比如伦敦贝萨纳尔绿地的都市村庄,北美某些城市里的移民贫民窟,以及其他地方不同程度存在的矿区。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甘斯(Gans, 1986)也已经对下述命题提出了质疑: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是相互隔绝的、个人化的、自主的。城市的差异程度其实要比这更大,有些城市中心区地带可能是一套复杂的社会交际网的核心,围绕着类似中产阶级重新移居城中区之类的过程而形成。其他城市地区可以具有相当的郊区特征,活动的中心就是家庭居所,而主要的活动形式都是以轿车为基础的。在这些例子里,重要的是流动的形式,而不是城市地区的规模和密度。在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里,都能找到郊区性的生活模式。

不仅如此,乡村生活也不单纯是围绕着以农场为基础的共同体组织起来,人们在那里频繁相见,以多种方式发生关联,并且往往会了解彼此都有哪些朋友(参看 Frankenberg, 1966)。有关乡村共同体的研究已经表明,在诸如此类的地方,也有可能存在着可观的冲突和对立,尤其是围绕着地位,土地和居所的获取,以及“环境”的性质。在英国,许多乡村地区的聚居人口已经越来越由农场从业者变成新从城市里迁来的住户,是他们挤走了现有报酬菲薄的农场雇工及其子女(Newby, 1979)。雷蒙·威廉斯(Williams, 1973)业已揭示道:城市据说是肮脏危险、充满黑暗,与此截然相反,乡间则是稳定不变,一派田园牧歌,这样的理解是多么地诱人!社会学在它的探索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承袭了这些简便可用的对比,来构筑一种受空间确定的乡村生活方式分析。

有一项理论话题已经注意到了“共同体”的概念。C. 贝尔和纽拜有效地区分出三种不同的认识(Bell and Newby, 1976; 亦参 Savage and Warde, 1993: 104)。首先, 是地形学角度的用法, 指的是一个特定住区的界限; 第二, 是把共同体理解为一个地方性社会系统, 意味着本地人群和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相互关联; 第三, 是具有一种“共享感”(communion), 一种特定的人际关联, 意味着人际纽带、归属感和温暖。C. 贝尔和纽拜指出, 其中第三种用法并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住区类型都必然会产生, 实际上, 即便是全然缺乏常规性的相邻状况, 也有可能产生这种“共享感”。还可以从第四种意义来理解共同体, 即视其为意识形态, 通过种种努力, 把存在共享感的观念附着在某些建筑物、区域、地产或城市等, 而在此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则掩盖了实际发现的一些非共享性的关系, 并且有助于维持这些关系。

在这里, 最后还得指出, 现有文献中大多数往往不仅复制了乡间与城市这一广为流行的区分, 而且还复制了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这一对立。诸如此类的二元对立已经受到了批评。斯马伦巴赫(Schmalenbach, 1977) 加上了第三个术语, 即同盟(bund)。同盟包含着共同体, 但这种共同体具有自觉的意识, 是基于共同的情感和充满感情的体会而自由选择的。与韦伯的看法不同, 在这类同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情感并不是非理性、无意识的。对同盟的情感投入是自觉的、理性的, 并且也是非传统的。诸如此类的同盟(Bünde)和共同体式的社区(gemeinschaftlich communities)不同, 不是持久不变的, 或者说, 不一定是稳定的。赫瑟林顿主张: “同盟中的人反思性地积极监控群体团结, 由此以一种符号性的方式维持了同盟, 换言之, 同盟具有高度的自我指涉性……同盟是自我闭合的, 产生出一种关于实践和符号的符码……在同盟中, 其成员生活的公域与私域界限趋于模糊”(Hetherington, 1994: 16)。在产生形式多样的类似同盟的结合团体方面, 城市和乡村地区所具有的能力就是不一样的。

在下一节里, 我将概述针对这种关于城市与乡村的社会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批判。

15.3 20 世纪 70 年代的批判

首先, 卡斯泰尔的作品有助于我们具体把握对于现有“空间社会学”的一些反对意见, 这些意见是基于一些对“城市”和“乡村”做出理论阐述和经验调查的尝试而形成的。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基于“城市”和“乡村”的这些主题已经在思想上陷入贫困, 发展不出什么富有创见的作品。卡斯泰尔部分借鉴了巴黎等地的 1968 年事件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创新, 主张任何具有科学性的学科都需要有一种

正确构成的“理论对象”(Castells, 1977, 1978)。他坚持认为,城市社会学(也暗指乡村社会学)并不拥有这样一种理论对象。应该深入摸索这样的对象,而这种对象的基础则是以一种独特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关系中逐渐展开的矛盾。这些关系越来越在一种国际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赋予城镇和都市特定的角色,后者已经不仅成为生产的中心,而且成为“集体消费”的中心。这个术语指的是劳动力能量和技能的“再生产”所必需的那些服务,一般是由国家来提供的。

卡斯泰尔为城市社会学确定了一种适宜的“理论对象”,即“集体消费”,用这个词来说明一些特定种类的随空间不同而发生变异的政治活动。他认为,集体消费的提供不可能是毫无问题的,因为国家很少有能力和(愿望)征收到足够的税收。关于供应的形式和水平,比如公屋的质量、健康照顾的定位、公共交通的性质等等,都激起了形形色色的争议。这些服务个个都“政治化”了,因为它们都是以集体性的方式提供的。以这些集体消费形式为核心的城市政治领域就此兴起。

卡斯泰尔特别重视对于“城市社会运动”的分析。这些社会运动一般会包括许多不同的城市群体,但是,由于它们都关注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往往会接受工人阶级组织的支配,实际上变成一种新的阶级政治。因此,卡斯泰尔强烈地反对从“文化/生活方式”的角度或某种空间决定论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城市已经成为新型政治活动的中心,因为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变迁,已经要求通过各种集体消费形式来再生产出劳动力。根据这种说法,变动中的社会生产关系似乎可以说明各种城市反抗模式所采取的“空间”形式。

卡斯泰尔的作品迅速激起了各种新的争论和分歧。其中有批评指出,在集体消费的有关话题上,事实上有许多持保守倾向的反应——在美国和英国,这些反应已经通过在较为富裕的地区维持相当低的住房密度之类的措施,导致了明显的空间不平等;服务设施也不一定是“城市”的了,随着人口经历了反向城市化,有些服务设施已经可以在别的地方定点了;已经发展起这样一种服务社会学,它与发展“城市”社会学不会有什么关联;各种活动的空间分布并不被视为由社会结构所决定;变动中的生产关系其实也对城市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变动中的集体消费关系(Saunders, 1982)。

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中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此处最后一点批评的具体发展。社会学围绕着城市/乡村的区别来组织自己对空间的理解,而地理学特定的空间关注则集中在“区域”(region)上。马希在70年代晚期对这个概念提出了批评。但不管怎么说,她依然认为“空间很重要”:

种种过程是在空间里发生的,距离、闭合、不同地域之间的地理差异、特

定的场所和聚集点各自具有的特性和意义——对于社会过程本身的运作来说,所有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Massey, 1984: 14)

因此,马希把空间性看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积极特征;除了区域,空间性还具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特征,包括距离、运动、邻近性、专门性、知觉、象征以及意义。在实在论者所谓的社会实体(例如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男权制)实现其因果力量的程度方面,空间能造成明显的差异(Sayer, 1992)。

具体来讲,马希主张,社会分工会采取一系列不同的空间形式;而这些重塑结构的形式之出现孰先孰后,彼此之间并无任何特定的历史安排;资本与雇佣劳动力之间的具体斗争决定了发展的方向;空间结构重塑的一个重要模式,就是某些较为常规的生产要素重新定位,逐渐远离总部和配送部门;空间重构的这些多样化的模式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模式,不仅仅是社会不平等,而且还包括空间不平等;随着地方层面上开始兴起更为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曾经结合得比较致密的区域经济也开始消解。照这种说法,特定的地方性是被看作基于不同积累周期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结构重塑“层面”所造成的结果。至于这些层面是如何在一些特定的地方组合在一起,特别是国际资本、国家资本和地方资本如何组合在一起,生产出特定的地方性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这些问题已成为20世纪80年代英国一项重大研究项目的主题(Bagguley et al., 1990)。

这种对空间分化的强调的效应之一,就是挑战下述观念:社会阶级毫无疑问属于**国家**现象,阶级本质上是由民族国家的界限确定的。在有关结构重塑的文献中,对地方/区域差异的强调已经使研究者透过空间来重新思考社会阶级(再往后,社会性别和种族也被纳入同一分析)。因此,就出现了下述主张:在一个民族国家之内的社会阶级关系也有受到国际性决定因素的影响;在一个社会里的地方分层结构也会有相当大的差异,以至于国家模式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地方企业、国家企业和国际企业的组合,有可能在地方层面上产生阶级利益之间出乎预料、有悖常理的相合与冲突;在阶级的空间汇聚程度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某些阶级冲突其实是由空间冲突造成的,或者说是被空间冲突所取代了;在某些情况下,具有独特力量的地方利益的兴起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

第三,人们越来越关注二战后生产如何趋于国际化。具体而言,“新型国际分工”命题就包含了一种已臻成熟的尝试,对这种新型空间形式做出理论阐述(Fröbel, Heinrichs, and Kreye, 1977; Savage and Warde, 1993: 第3章)。该命题主张,有三点因素特别使一种新型国际化分工得以发展。第一是发展中世界农业的某些方面生产率迅速提高,使得发展中世界城市中的工作岗位可以用到相当多没有土

地的劳动者。第二,某些特定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技术变迁与组织变迁,使“概念孕育”工作从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得以与“实际执行”工作相分离。第三,通信技术方面的发展,尤其是电话线路和计算机的发展,大大便利了即时性的信息流在国际间传输,因此,也使一个全球化公司的各个部分有可能相互传递信息,接受控制,并置于细致的监控之下。这三点因素意味着发展起一套复杂得多的“空间分工”,常规制造业岗位有相当大一部分从“第一”世界转到“第三”世界,尽管研究开发和经营管理的职能部分还留在第一世界。新的通信技术多少使得资本可以在任何地方安置,因此,各地为吸引和留住日益流动的资本,彼此之间的竞争也趋于热化。

关于这一新型国际分工命题,已经出现了多种基于经验研究的批评意见,不过从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理论角度来看,有这样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人们看到,在信息(以及其他符号)传递中包含的时间的即刻性,转变了国家和地方的形态,它们必然会被纳入一系列的全球化过程。而诸如此类的过程又逐步破坏了个体“社会”的紧密结合。时间的即刻性转变了空间,使表面上彼此分离的各个地方无法再维持原状[参看下节有关即时性时间(*instantaneous time*)的论述]。其次,该命题没有考虑到有大量的人口流入发达世界,这个过程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种理论要想恰如其分,就必须说明国际资本流、信息流、人员流之间的关系,而影响最后这种流的一个因素便是形象(*images*)流[尤其是关于西方消费主义的形象流;关于这些“流”(*flows*),参看 *Lash and Urry, 1994*]。最后,该命题过分强调了新型空间形式生成过程中的经济决定因素,而忽视了同样决定着空间结构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这项命题类似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出来的其他一些命题,都强调时间和空间方面变动中的政治经济关系。哈维着重分析了资本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进入土地和人工环境的“次级循环”,从而弥补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初级循环中的“过度积累”和利润下降(*Harvey, 1982*)。

最后,我来介绍一下吉登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参看 *Giddens, 1979, 1981, 1984*)。他主张通过在场与不在场的相互渗透,来把握个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运动,而这种相互渗透的性质的起因,则在于人的身体的定位,以及身体与更为广泛的社会之间不断变动的相互交流方式。每一种新的技术都转变了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相互融合状态,记忆的储存方式和影响现在的方式,转变了长时段的重大的社会制度被吸收到偶变性社会行为中时,所借助的那些方式之间的相互融合方式。

吉登斯提出了一大堆概念。首先一个是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即根据例行化的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时空分区。比如说,在一座房子里,各个房间同时在时间上和

空间上都有分区。其次有一个在场可得性 (presence-availability) 的概念,指的是在 某人所处的社会情境里,人们共同在场的程度和所借助的形式。具有高度在场可得 性的共同体包括了刨去最近这几百年之外的几乎所有社会。在过去一两百年间,通 过新兴交通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通过沟通媒介与交通媒介的分离,在场可得性已经 发生了转型。第三个是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ng):指的是各个社会在长短 不一的时空跨度上“延伸”开去的各个过程。诸如此类的延伸反映出,事实上,社会 活动越来越依赖于与时空中不在场的那些人之间的互动。第四个是时空边界 (time-space edges),即根据不同的结构原则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类型之间多种多 样的接触或遭遇。重要的是考察跨社会系统(intersocietal systems),它们属于这样 一些时空边界,由此,像一个部落社会就会与一个阶级分化社会(class-divided soci- ety)相对峙。第五个概念是权力容器(power containers),即不同社会的储存能力,特 别是跨越时空的储存能力。在口传文化里,人类的记忆事实上就是信息储存的惟一 宝库。而在阶级分化社会里,尤其是随着书写的发展,城市成为权力的首要熔炉或 容器。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具有限定地域的民族国家成为主导性的时空 权力容器。城市丧失了自身独有的特性(城墙已逐渐坍塌)。

最后一个概念,是时间与空间从社会活动中的脱离(disembedding),即时间的 “空洞”向度的发展,空间与场所的分离,脱离机制的兴起,将社会关系从局部投入 中拔离的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兴起。专家系统采取了各类技术知识,其所受到的 评价独立于具体使用这些知识的实际从业者和委托人,专家系统也就此置括了时 间和空间。诸如此类的系统依靠信任,依靠有关时间和(或)空间中不在场的质性的 跳跃或认同。脱离机制中的信任所施加的对象并不在于个人,而在于抽象系统或能 力,特别是关系到时间和空间上不在场的东西。

尽管这种观点给人印象深刻,但学者们也已经发现了其中一些缺陷。首先,对 特定场所或社会中具体的时空组织机制几乎没有什么分析,所有的传统社会和所 有的工业社会都多少被看作是一模一样的。同时,他还倾向于把时间和空间的组织 看作是给定的,一定程度上根植于标志整体上的现代社会的各种规则和资源的结 构过程当中。不仅如此,时间还被看作测度年代距离和储存信息的一种手段,是测 度跨越各社会的延伸的一种手段。但在现代社会里,时间也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资 源发挥作用,或者如勒费弗尔所指出的那样,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活生生的时间也 消失了。时间不再具有可见性,被测量工具所取代,被钟表所取代,与社会时间和空 间相分离。时间成为一种资源,与社会空间相分离,被消费、采用、耗尽(Lefebvre, 1991:95—96)。

这又进一步关系到吉登斯的阐述中更深一层的一个空白,即时间和空间的运

用对于旅行的重要意义。他根本没有分析人们为什么要旅行,从而也根本没有分析为什么“节约”时间或覆盖更多“空间”会是“兴趣”之所在。旅行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为了快乐——它使人们得以造访其他的环境、地方和人民,并且以一些具有特定风格的方式来完成(Urry, 1990)。旅行是一种实际的履行,要理解它,或许需要一些审美判断的范畴(Lash and Urry, 1994: 第10章)。进而,许多种类的旅行都有关键的一面:人可以进入一个阈限态空间,例行生活的规则和限制有一些为之松动,被其他的行为规范所取代,特别是那些适于和陌生人相处的规范。这就有可能带来新鲜刺激的交际形式和玩乐形式,包括假日里可称为“即时行乐”的形式。*

就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依次出现了四类注重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的作品:可以把它们概括为“集体消费”、“结构重塑”、“新型国际分工”和“时空伸延”。这些概念奠定了建构一种新型话语的基础,即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发展起来的“时空社会分析”。

15.4 时空社会分析的发展

在此我先谈谈时间社会学。近来有人主张,社会科学里传统上对时间的理解大多数是根源于一些陈旧而不适当的观念。当涂尔干、索罗金、默顿之类的学者坚持主张,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的时候,这就是基于一种对自然界里的时间不充分的理解。亚当指出,有必要彻底地重新考察时间,从当代物理学和生物科学当中吸收见解和主张,它们已经转变了“自然时间”的观念(Adam, 1990)。研究时间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事实上也包括研究时间问题的现象学家,被他

* 阈限态(liminaloid)空间:这是一个连《牛津英语大辞典》都不曾收入的词。与心理学中的“阈限”(liminal)有关。最初见于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关于朝圣的研究。他发展了范格内普(Van Gennep)的过渡仪礼(rite of passage)理论,将朝圣之仪礼描述成“阈限态现象”。当朝圣者来到神圣的中心,也就暂时摆脱了日常的社会角色与结构,沉浸在充满神圣符号和仪礼的神秘氛围之中。但朝圣与普通的过渡仪礼有五点不同。首先,它一般是自愿的奉献而非义务的仪式,主体是世俗性的个体而非仪式性的集体。其次,它带有游玩的性质,是一种令人愉悦的闲暇活动(好似观光旅游)而非庄严肃穆的仪礼。第三,它的功能不在于转换个体的社会定位(比如婚礼的过渡仪礼将个体的单身身份转为已婚者),而是培养个体的自主性,使朝圣者免除自己日常的社会角色和期待,寻求更具民主性和非等级性的结合形式。第四,它具有一种“反结构性”(anti-structural),在这个地方,会产生新颖的观念型构,滋长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反教权主义的社会批评。第五,它酝酿着一种共同体的体验,一种普世团契的纽带感。在此我们已经看见了阈限态概念与空间、角色、认同等范畴的关联方式,今天,有关电脑空间之虚拟现实中的网上朝圣旅行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阈限态概念的分析潜力。——译者注

们作为特别具有“人”的性质来处理的,其实大多数是体现着自然世界的特征。

与此同时,已有学者指出:“钟点时间,不变的测度,封闭的循环,完美的对称,可逆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们的创造”(Adam, 1990: 150)。事实上,钟点时间就是时间中惟一不能推广到整个自然界的要素,它属于人的创造。但也正是这种时间,随着在历史上逐渐与社会时间相分离,被社会科学当作了自然时间的确定特征(参看Elias, 1992)。所以,社会科学运用的是自然科学中一种不合适的时间观念,一种几乎是非时间性的时间(nontemporal time),可以说是牛顿式的时间或笛卡尔式的时间。

之所以说它是牛顿式的时间,是因为它基于绝对时间的观念,即“就其自身本质而言,它均衡地流动着,而不涉及任何永恒的东西……绝对时间的流动是不太会改变的”(牛顿,转引自 Adam, 1990: 50; Coveney and Highfield, 1990: 29—31)。这样一种绝对时间是不变的,可以无限划分为空间般的单元,其长度可以测度,可以数量的形式表述,再就是可逆的。这种时间被看作本质上是空间,包含着不变的可测度的长度,可以沿循它而移动,可以朝前移动,也可以朝后移动。而之所以说它是笛卡尔式的时间,是因为它基于以下二元对立:心与身,重复与过程,数量与质量,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等等。

但不管怎么说,20 世纪的科学已经改变了对于自然中种种时间的理解。霍金概括道:“空间与时间现在都成了动态的属性:当一个天体移动时,或者是一个力作用时,它便会影响空间和时间的曲率。而时空的结构又会反过来影响天体移动和力作用的方式”(Hawking, 1988: 33)。社会科学未能认识到,时间在“自然”科学里已经发生了这种转型。因此,很少有人听从埃利亚斯的主张,即如果我们对时间进行反思,就会看到“自然、社会和个人”是如何“根植在彼此之中,并且相互依赖”(Elias, 1992: 16)。不仅如此,这还意味着,20 世纪科学中一些极其出色的洞见未能以原样或比喻的方式融入社会科学,后者依靠的还是一些已经广受怀疑的时间观念。

20 世纪有许多科学“发现”已经转变了对于自然界中时间的理解(Prigogine, 1980; Prigogine and Stengers, 1984; Hawking, 1988; Adam, 1990; Coveney and Highfield, 1990)。首先,爱因斯坦(年方 26 岁之时!)向世人揭示道:不存在任何独立于所指涉系统的固定时间或绝对时间。时间是某一观察体系和测量体系的一种局部内在特性。爱因斯坦还进一步指出,时间和空间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融合到一个四维时空之中,而在质量的影响下,这个时空会发生弯曲。这样就会产生许多效应,其中包括:过去有可能追上未来,可以钻入一个虫洞(wormhole)进行时间旅行,要制造出最初创造宇宙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时空想必发生过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弯曲。

量子学说更进一步地批判了正统的因果观念。业已证明,物质不能与构成它的

■ 那些活动相分离。量子物理学家描述了一种虚拟状态,其中的电子似乎要在固定成特定的模式之前,在即刻之间尝试出所有可能出现的未来。量子行为具有一种神秘的即刻性。因果观念不再适用于这样一种不可分的微观整体。任一电子的位置和运动都无法精确地探知。实际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远远要比这些要素本身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学者们称这种现象为没有舞者的舞蹈。

时间生物学家已经指出,体验到时间,或者沿循时间来组织自己的生活的,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节律性已经被证明是自然界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既体现在有机体内部,又体现在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上。人类与其他动物并不只是受到钟点时间的影响,它们本身就是钟表。所有的动植物似乎都具有某种时间系统,以 24 小时为一周期来调控内部机能。晚近的研究事实上已经揭示出了计时基因。因此,生物时间并不限于年龄的增长,而是表达出生物体时间性、动态性和周期性的性质。

在更一般性的层面上,热力学已经揭示出存在一种不可逆的时间流。时间并不是对称的,甚至也不像在经典物理学里那样具有可逆性,而是可以清楚地区分出什么是过去,什么是未来。热力学更符合 A 系列时间观而非 B 系列时间观。这个时间之矢的起因,也造成了所有系统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组织机制的丧失和随机性或失序的增长。这种失序状况的积累被称为正熵(positive entropy),是由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造成的;而负熵(negative entropy)则涉及到热力不均衡,其标志是具有进化意义的增长和复杂性的增强。所有的能量转换都是不可逆的,具有一定方向性的。

在“大爆炸”这一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之后,通过宇宙的时间之矢,实现了宇宙扩散,这个实例最明确地体现了不可逆性。但在自然界里,还有许多很普通的不可逆性的例子:咖啡总会放冷,有机体总会变老,冬去总会春来,等等。走过的路无法原路折返,散出的热量无法重新吸收,逝去的青春无法再次挽回,而春天过后冬天也无法复临人间,等等。自然界的法则则是历史性的,蕴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关于时间,重要的是它在进行之中”(爱丁顿,* 转引自 Coveney and Highfield, 1990:83),与此同时,“(时间的)不可逆性就是从混沌引出有序的机制”(Prigogine and Stengers, 1984:292)。

混沌理论和复杂理论都否定了有序与无序、存在与生成的简单两分。看起来,物理系统并不表现出乃至维持一种结构上的稳定性。所谓原因上的微小变化会导致结果上的微小变化,这种常识观念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误解。正相反,在作为整体

* 爱丁顿(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1882—1944):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最大成就是研究恒星的运动、内部结构和演化。第一位用英语诠释相对论。——译者注)

的系统的各个属性中表现出决定性的混沌、动态的生成和非线性的变化,而不是什么特定要素内部的转型。从这种视角来看,时间具有高度的不连续性,有许多非均衡的状况,在这些状况下,由于参数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也会发生许多不可预期的突发变化。即便遵循一系列完全决定论的规则,也会产生出尽管有规可循但却不可预期的结果。著名的蝴蝶效应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说的是在非常特定的情境下,某个地点产生的微小变化会在别的地方引起大规模的天气效应。某些反直觉后果(counter-intuitive outcomes)会在远离似乎最初孕育出来的时间和空间上发生,它们典型地体现了诸如此类的复杂系统。复杂理论强调的就是,复杂回馈循环是如何加剧了系统中最初的紧张,使系统无法以简单的方式吸纳震荡,以此重新确立最初的均衡。在一个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可以看到有相当强的相互作用发生,缺乏一种核心性的等级结构。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祖海尔和 I. 马歇尔(Zohar and Marshall, 1994)深入探讨了量子社会(quantum society)概念的意涵。经典物理学的标志是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严格范畴,由相互作用的“弹子”组成的不可渗透的固体物质以及确定的运动法则。而在他们的描述中,经典物理学中这些陈旧的决定因素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量子物理学的奇异世界,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那些几乎是怪异的法则,破坏了时间、空间和物质的界限”(Zohar and Marshall, 1994: 33)。他们特别在波粒二重性效应(wave / particle effect)和社会生活的突生特性之间建立了类比:“量子实体……既有可能呈现出粒状,也有可能呈现为波状。粒子就是个人,定位在时间和空间里,并且可以在时间和空间里被测量。它们要么在这里要么在那里,要么在此时要么在彼时。而波是‘非局部性’的,它们跨越所有空间和时间而传播,并且其即时效应无处不在。波同时在各个方向上延伸,和其他波相互重叠和融合,以形成新的实体(新突生的整体)”(Zohar and Marshall, 1994: 326)。

理论争论的第二块领域关注的是时间与空间对于“后现代”的发展所具有的含义(这方面有关内容,参看 Hayles, 1991)。鉴于本书另辟专章讨论了“后现代”方面的主题,我将只强调与时间和空间有关的三个方面。

首先,有学者主张,艺术、高雅文化、学院,与日常生活和通俗文化,这两方面之间的符号界限已经趋于消解。单就与空间的关系而言,文图里(Venturi, 1977)有过著名的论述:建筑应该“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应该发展一种玩乐性、拼凑性的“路景随拾派”(roadside eclecticism)风格,抛弃将建筑物视为体现高尚品位或道德权威的观念。祖金特别研究了都市景观和民俗景观之间的这种融合;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我们如何组织自己在城市里的所见,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工业生产的逻辑加速了空间与时间的视觉消费,而这种消费也正是从这样的逻辑中抽取出来的。这已经导

致城市普遍被重新建造为后现代消费的中心——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景观，一种“视觉消费的梦幻景观”（Zukin, 1992: 221）。她揭示了房地产开发商是如何自觉寻求建造这些新的权力景观，为消费的演绎搭建场景布置。这些梦幻景观给人们的认同带来了一些重大问题，因为历史上人们确立认同的基础是场所，人们可以从那里来，或者移到那里去。而现在，虽说后现代的景观也都是和场所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欧洲迪斯尼乐园的主街，世界博览会，或伦敦的柯文花园*，但是，这些都是些模拟出来供消费用的场所。人们几乎不会说是来自于它们这些场所，或是在那里生活，或是提供了大部分社会认同感。与此颇为相似的是，塞内特（Sennett, 1991）指出，在当代城市里，不再有与众不同的建筑物行使着某种道德功能——更为显要的得算是那些基于消费和旅游的新型空间。那样的空间是特别设计来维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距离，将人们的内在生活与其公共活动分离开来的。

其次，有学者主张，相比于现代时期传统上固定不变的认同（尤其是那些以工作、职业生涯和家庭为核心的认同），后现代带来了更开放、更流动的社会认同。有学者主张，在后现代时期，时间和空间迅速加快，将消解那种明确的认同感。对于这些主张来说，有一项特定的活动很是关键，那就是看电视。电视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时间组织和空间组织。“电视自我是一种典型的电子个人，将媒介拟像（*simulacrum*）中发出的东西照单全收；它是一种作为景观社会中一位消费者的市场认同”（Kellner, 1992: 145）。在后现代电视里，能指据称业已解放，图像已经优先于叙事，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观看者为过剩或不间断冲击的图像的自由游戏所引诱。据称，这会产生效应的衰减，后现代自我将没有任何深度或实质，表象之外没有任何自我。诸如此类去中心化了的自我特别容易受到祖金所描述的那种后现代城市环境的引诱。

第三，也是与时间更有专门关系的一点，据称钟点时间正在一定程度上被所谓“即时性时间”所取代。人们广泛认为，那些负责决策的人必须对这个愈益复杂而充满风险的世界即刻做出反应。就像 1987 年全球股市交易崩盘的情况一样，单个事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效果被大大放大了。反应的这种日益增强的即刻性根源还在 20 世纪早期。比如克恩（Kern, 1983）就指出，那时兴起的新技术对既有的外交艺术产生了巨大破坏，后者是建立在反思、协商、和解的习俗时间基础上的。再往后，

* 柯文花园（Covent Garden）：历史上曾是英格兰最大的蔬菜水果市场。现在这座意大利风格的巨型广场成为伦敦首屈一指的娱乐消闲中心，每年三千万游客造访。商店、酒吧、餐馆、咖啡馆、戏院林立，来自欧洲各地的街头艺术令人目不暇接，更有皇家歌剧院坐落于此。可谓后现代“拼贴”风格的典型。——译者注

即时报道的普及，一系列会在许多年间造成难以确定甚至不可确定的后果的新型环境风险，它们所产生的效应，加之以依然锁定在工业钟点时间内的调控框架，促成了治理中一系列“复杂”的危机。

当代的技术和社会实践所基于的时间框架，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自觉经验。电传、电话、传真机将人的反应时间从以月、周和日计缩减为以秒计，而计算机则已经将反应时间缩减为以毫微秒计，即十亿分之一秒的事件时间（参看 Adam, 1990: 140; Negroponete, 1995）。在此之前，组织时间的速度从来不曾超出人类意识的可行范围。而计算机则在毫微秒的时间里做出决策，因此，“计算机世界里被处理的事件，其存在的时间跨度是我们永远无法经验到的。新的计算机时间所体现的，是时间的最终抽象，是时间与社会经验和物理世界的节律相隔离”（Macnaghten and Urry, 1998: 第5章）。这种即时性时间根源于从原子到比特的转换。以信息为基础的数字时代“是无重量的比特以光速进行的全球运动”（Negroponete, 1995: 12）。信息可以多少成为在任意一地都可即时且同时加以利用，尽管还不是所有地方都真正这样。

这又似乎摹拟了大众传媒的逻辑。一种三分钟文化业已兴起；比如，那些看电视和录像的人往往会从这个频道跳到那个频道，很少会花时间一直看完一个长时间的节目。实际上，现在许多节目在制作时就是模仿了这种模式，包含了一系列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的拼凑，一种“声音比特”流，每一个都只延续相当短的时间，并且与此前此后的那些东西毫无特定联系。这种即时性时间感可以重新概括为“录像时间”，在这种时间里，自然世界里的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与多重“文化”形象并置在一起（Cubitt, 1991）。晚近对日本的研究表明，时间的这种重构正在年轻人中产生新的认知官能。所谓的第五代，即计算机青年，“能够同时在录像屏幕上看好几个节目，还能把握其叙事结构；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游戏，其规则允许把按钮不停地切来换去，以及融合速度和同时性的时间知觉模式”（Nowotny, 1994: 39）。蒂勒尔（Tyrrell, 1995: 24—25）则推断，在未来，基于时间的同时性的此类“多媒体”技能，可能会比基于线性时间观的传统技能更为重要。

这些发展使得评论家们纷纷主张，未来人们将会表现出信任趋于下降。被延迟的满足使人们必须对未来抱有一种信任关系，那些在社会结构里位置确保无虞的人将会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征（Adam, 1990: 124—125）。尽管如此，也有些人声称，此类被延迟的满足的重要性也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制度令人很难信任，就像我们现在从改善后的信息流中得知的一样。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在以充斥着一大堆不安全性为特征的世界里，未来已经成了一个异己的概念。即时性时间消解了未来——就像 T 恤上说的一样，“未来我现在就要”。

下面这份单子（根据 Macnaghten and Urry, 1998: 151）开列了一些主要的指标，

■ 表明等候型文化(a waiting culture)趋于崩溃,即时性时间渗透各处:

- 使黑夜与白日、工作日与周末、家庭与工作、闲暇和工作之间的区别陷于瓦解的那些技术变迁和组织变迁;
- 离婚及其他家庭解体形式的比率趋于上升;
- 对于信任、忠诚和隔代之间家庭义务等的意识日趋溃漠;
- 在一个“抛弃”社会里各种产品、场所和形象越来越可以一次性使用;
- 各种时尚、产品、劳动过程、观念和形象越来越反复不定,转瞬即逝;
- 各种产品、工作、职业、性质、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越来越具有一种“暂时性”;
- 新产品、灵活可变的技术形式以及数量巨大的废品大量滋生;
- 短期劳动合同——即所谓“招之即来”的劳动力——愈益普及,这又如何产生新型的不安全因素;
- 24 小时交易逐渐推广,如此可使投资者和交易商从不必为证券和外汇的买卖焦急等待;
- 产品的可获取性急剧提高,人要想消费某种新的风格或时尚,也不必等到去什么地方旅行;
- 越来越感到“生活节奏”变得太快,与人的经验的其他方面形成对抗;
- 政治偏向越来越变幻不定。

我再谈谈时间、空间和技术的关联方面近来发生的某些变化,它们从理论上和实质上支撑了即时性时间。哈维(Harvey, 1989)力图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资本主义是如何包含了不同的“空间定位”(spatial fixes)。在每一个资本主义时段,空间的组织方式都是要有利于生产的增长,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利润的最大化。正是通过对此类时空的重新组织,资本主义克服了自身的危机时期,为新的资本积累时期奠定了基础,也为空间和自然随时间推移而发生进一步转型奠定了基础。

哈维审视了马克思有关时间消除空间的命题,试图证明该命题是如何能够说明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这一复杂的转换。后福特主义包含一种新的空间定位,最重要的是,包含着一些体现时间和空间的新方式。其中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种种经验与过程方面所发生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结合身体的流动可以很形象地说明这一点。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作一次旅行,在 18 世纪需要靠步行花两年,19 世纪需要坐马车花四个月,20 世纪初需要乘火车花四天,而到了 20 世纪末,则只需要搭飞机花不到四小时(Giddens,

1984:231)。哈维则具体阐述了这种“压缩”是如何产生出某种不祥的预感,就好像铁路最初改变了乡间时一样。乔治·艾略特、狄更斯、勒内(Reine)、波德莱尔、福楼拜,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思索了一些新颖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下,时间和空间现在都让人觉得有所不同,并且存在一种经过转型的“情感结构”,而这又是由这种迅速转型的流动性所引发的。在过去几十年里,即时性流动已经进一步走向极端,以至于时间和空间的的确确是被压缩了。哈维主张:“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把世界展现给自身的方式……空间似乎缩减成一个电子沟通的‘地球村’,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的‘宇宙飞船地球’(spaceship earth)……由于时间范围缩短到这样一个点,使得现在就等于一切……我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去应付那种势不可挡的感觉:我们的空间世界和时间世界的压缩”(Harvey, 1989:240)。

这种压缩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转型。生产的周转时间越来越短,时尚的变迁步伐越来越快,寿命也越来越短。产品、场所和各色人等都走马灯一般进出时尚,与此同时,同一产品也几乎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即时获取,至少在“西方”可以实现这一点。决策的时间范围大大缩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这些决策在数分钟内即须拍板。货币及其他交易的速度大大加快(Castells, 1996:434)。各种产品、关系和合同越来越成为暂时性的,因为短期行为已成风气,因为所谓的“等候型文化”已趋衰落。变化迅速的媒体影像产出又传播,模拟出融合不同时期或地方风格的建筑和自然景观,这样的技术也越来越方便可用了。有意思的是,社会生活的这种加速趋势,大部分在1950年就被海德格尔预见到了。他谈到了时间和空间距离的“缩减”(shrinking),广播中“即时信息”的重要性以及电视是如何化天涯为咫尺,从而将人和事都“去距离化”(un-distancing)了(Zimmerman, 1990:151, 209)。

虽然为了能够实现新一轮资本积累,出现了这些剧烈的时间和空间压缩形式,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意味着场所的重要性必然也随之降低了。当然,由于资本所具有的“创造性破坏”力量,确实会有些重要性降低。但是,在更一般的层面上,人们似乎已经更加敏锐地感到了世界上不同地方所包含的东西或可以指示的东西之间的那些差别。在这个世界上,始终有一种东西在敦促人们去寻根:“在这个世界上,形象的流动越来越快,越来越没有固定的场所。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空间/场所?我是这个世界的公民,这个国家的公民,还是本地的公民?我在电脑空间里能有一种虚拟的存在吗?……”(Harvey, 1996:246)。因此,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越不重要,流动资本、移民、旅游者和寻求庇护者对场所的变异就会越敏感,而各个场所标新立异的动力也就越强。

卡斯泰尔(Castells, 1996)深入探讨了“网络社会”中信息与时间之间一些更精细的关联。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北美发展起来的“信息社会”,具有以下

■ 关键特征：构筑社会的基石是以电子形式传输的信息比特；新技术无处不在，因为在差不多所有形式的人类实践中，信息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分；信息发展的种种模式十分复杂，在时间上难以预计；诸如此类的技术通过安排松散、富于弹性的网络而组织在一起；不同的技术逐步地汇入信息系统（尤其是原本分离的生物技术和微电子技术）；这些系统使组织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以实时运转；而这些即时性的电子脉冲则为各种流的空间提供了物质支撑（参看 Castells, 1996: 第 1 章）。电子信息产生出一种“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资本挣脱了时间的束缚，文化摆脱了钟表的影响，这些都受到了新的信息系统的决定性影响。

在哈维和卡斯泰尔的这些阐述中，场所的性质还只是一项分主题。另有些学者已经努力汲取了其他的社会理论传统，从理论上阐述场所和地点的性质。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尤其具有影响的是对某些早期文本的重新挖掘，特别是巴什拉尔、本雅明和勒费弗尔。

巴什拉尔（Bachelard, 1969）力图发展一种质性的、异质的空间概念，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静态的空间概念。他主张，现象学关注的是从形象的“回荡”（reverberation）角度对形象的经验，而不是从该形象的视觉效果入手。通过声波的比喻，他就此采取了一种听觉而非视觉的比喻。这种回荡的观念指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破坏了两者间任何明确区别的运动。这个比喻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直接性，之所以会具有这样一种直接性，在于从视觉上对记忆的占用。巴什拉尔把自己的作品描述成“回荡”的本体论（Bachelard, 1969: xvi）。

其次，巴什拉尔特别地考察了“居所”的性质，指出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单纯的物理对象。具体而言，它是这样一种场所，人们可以在这里想像，做白日梦，可以自由自在（Bachelard, 1969: 6）。家也是私密性的一种比喻。居所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居住在居所里。尤其是各种空间，比如某人在那里诞生的居所，充满着记忆的痕迹。这种从属感来自于所讨论的特定地点的这种物质性。赫瑟林顿描述了这种巴什拉尔式的立场：“餐柜上台布的气息，地下室台阶的坡度，孩童百无聊赖时从窗台边缘抠去的漆斑，这些都成了构成我们记忆的物质实体……栖居*……就是通过白日梦和记忆，从过去中重新拾回长久遗忘的东西，生活在那被忆起的私密性的回荡之中”（Hetherington, 1995: 18）。

不仅如此，巴什拉尔还指出，时间的跨度本身就取决于这种空间的具体性。空间是时间获得性质所不可或缺的。或者照盖姆的说法：“空间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转

* 此处原文为“to dwell”，注意英文中该词及其词组搭配还有“存在于……状态之中”、“长久凝视”、“出神怀想”等意涵。——译者注

换了时间,使得记忆成为可能”(Game, 1995: 201)。因此,像一处居所这样的一块空间,对于记忆的形成和维持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为白日梦提供了庇护之地。它是一块比喻性的空间,在其中流转着柏格森式的时间。

第三,巴什拉尔提出了一种特别的记忆观念,认为身体不可化约地体现在记忆之中。具体来讲,我们的身体并不曾忘记我们最初遭遇到的那处居所。巴什拉尔谈起了身体和这处最初的居所之间“充满感情的交契”(Bachelard, 1969: 15)。它的特性会以一种物理的方式铭刻在我们身上。根据巴什拉尔的說法,记忆在物质的角度上局部化了,因此,记忆的时间性也在空间上扎下了根。他将记忆的时间性空间化了。房屋通过人的身体及其记忆而活着(Game, 1995: 202—203)。如果没有活生生的空间,也就不可能有活生生的时间绵延。

有关场所的记忆体现着身体。在所记住的东西里,就包括坐与立、看与躺、聆听与期待、回味与回想的种种方式,它们都体现着身体。康纳顿(Connerton, 1989)指出,在特定社会里生活的人的身体姿势就有着那种沉积下来的记忆,它们既融入了实践,也铭刻着实践。因此,记忆包含着—系列感觉。过去“传递”到我们身上,不仅在我们之所思或所为之中,而且,其实也在我们的行事方式之中。场所不只是像“观光客”的视觉安排方式那样被观看,而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感觉,可以让我们为着可能去往别处而心痒难搔,或是想到要呆在原地而颤抖不已(Jay, 1993)。普鲁斯特表述了记忆的这种体现身体的特征:“我们的手脚都充满着蛰伏的记忆”(转引自Lowenthal, 1985: 203)。

本雅明(Benjamin, 1979; 也可参看 Buck-Morss, 1989)就人们如何“阅读”城市做了更广泛的分析,其中也涉及到类似的—主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思想性或实证性的观察,而包含着幻想、希冀和梦。城市是人们记忆的存储地,是过去的留存处,它的功用中还包括储存着各种文化象征。这些记忆体现在建筑物上,而这些建筑物就此具备的意含便可能与其建筑师原本的意图大为不同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解释的问题,因为建筑物表明了集体性的神话。要理解这些神话,就得解开或摧毁现有解释和传统,把种种相互冲突的要素并置—处。即便是废弃的建筑物,也会留下种种痕迹,揭示出以往各时期的种种记忆、梦和希望。赖特的《废墟之旅》(Wright, 1992)堪称运用本雅明方法的佳例,他就是从伦敦东区达尔斯顿街(Dalston Lane)的一处旧厕所里开始其旅程的。

本雅明还关注艺术感知和对都市文本的阅读之间的相似之处。而艺术感知的吸收既可以是“聚精会神”的,也可以是“心不在焉”的。本雅明指出,人们对建筑物的欣赏,一般都是在移往他处的过程中,以匆匆掠过的方式,心不在焉的方式。这和人们在美术馆里对绘画“聚精会神”的吸收截然相反。而这种心不在焉的感知有

助于人们拆解那些保守的文化传统。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本雅明对浪荡子（flâneur）角色的分析，这种人在城市里四处闲荡，以心不在焉、丝毫不带盘算的方式，拾取着生活的片断（参看 Buck-Morss, 1989）。与都市的遭遇带有偷窥成瘾和心不在焉的特性，意味着某种正在发生的事件可以点燃有关过去的记忆。只有凭借心不在焉的感知，过去与现在之间才会发生这种偶然的联结，可以破坏过去传统重负的压迫。本雅明还分析了那些只与娱乐相关的地点，比如巴黎的那些展览会；当参观者进入一个真正的“光怪陆离的世界”（phantasmagorical world），也就被转变成商品的层次。

这里探讨的第三位社会理论家是勒费弗尔。他在《空间的生产》（Lefebvre, 1991）里指出，空间不是一种自然的、被动的几何现象。空间被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此体现着斗争的场所。不仅如此，各种不同的空间现象，比如土地、地域、场所等等，都应理解为属于空间或空间化的同一辩证结构。传统上，这些不同的现象作为基于学科的支离破碎的分析而各自分离，需要纳入到一套统一的理论结构中去。这个结构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是各种“空间实践”，从个人的例行常规，到各种地带和区域的系统创造。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此类的空间实践会具体落到人工环境和风景景观上。其中最具意义的空间实践是那些房地产及其他资本形式的实践。其次，是各种空间表现，即组织和表现空间的种种形式的知识和实践，尤其是通过规划技术和国家之手来进行的那些知识和实践。第三，是表现的空间，或者说是空间的集体经验，包括围绕空间的符号分化和集体幻想，对主导实践的抵抗，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形式的个人和集体越界。

勒费弗尔特别关注资本主义状况下的空间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空间形式相继出现。从自然空间，到绝对空间，再到抽象空间，这种接续的效果是越来越把自然从社会范畴中驱除出去。抽象空间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最高体现，会导致与众不同的“创生空间”。但他想要告诉人们，在每一段时期，都有必要考察以上概括的不同空间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席尔兹（Shields, 1991）对社会空间化的分析，颇具创意地运用了勒费弗尔的研究途径。他用这个概念来指空间范畴在根本意义上的社会建构，既包括对环境的具体干预这个层面上的建构，也包括社会想像这个层面上的建构。他指出，勒费弗尔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空间本身，而是各种文化观念与空间实践的生产过程。席尔兹力图考察的就是这种空间的文化建构，特别是通过场所神话（place-myth）这个深入一步的概念，后者又组成了一系列场所形象。不仅如此，场所神话也是富于竞争、可以改变的，经常有好些个神话彼此遮盖，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空间。他用这一批概念考察了海滩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空间化过程，即从一种医疗区域到一种消遣

区域;布赖顿*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场所神话的社会建构;英国“北方”与“南方”的建构;以及有关加拿大北方的各种相互竞争的空间神话(有关其他例证,参看 Urry, 1995)。

15.5 结 语

在过去几年里时空分析的发展中,还有三项意义重大的主题:时间与空间的社会性别化特征;时间与空间和种族与国家的关联;以及人们越来越透过时空来看待“自然”的那些方式。我分别来简要地谈谈这些主题,并以此结束全文。

在有些学者的阐述里,认为女性更有能力抵抗即时性时间,发展一种极其缓慢的时间(*glacial time*)以为替代。其部分原因在于女性一般会发展出一些隐蔽时间,这些时间在钟点时间的阴影下发展而来,但却与后者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区别。已经有学者指出,养育者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开放性的,处在商品化的钟点时间之外。而男性的时间就不太好这么说了。诚然,女性作为养育者,不仅仅要及时,而且必须要付出时间。但学者们同时指出,有鉴于女性在生儿育女的“自然”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她们更有可能在钟点时间之外,发展出富有竞争能力的替代时间。归根结底,钟点时间是以不变的重复和完全的可重复性这样的原则为基础的。亚当指出:“它本质上就显然不符合我们的(妇女的)身体和‘自然’的环境的节律,在后者那里,变异和暂时性原则是创造性和演化的源泉”(Adam, 1995: 52)。在更具体的层面上,福克斯就生育行为指出,生产中的妇女“被强烈的收缩迫使着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上面,失去了她与钟点时间之间日常的、私密的关联”(Fox, 1989: 127)。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女性主义者也指出,考虑到绝大多数女性在繁衍后代、生儿育女中所扮演的角色,她们必然会维系着一种更为长期性的时间感,必然会把时间当作是跨代的。

就空间而言,有学者主张,男性和女性的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在空间上的分布差异非常大。大部分社会科学都错误地只关注男性的有偿劳动及其空间特性和时间特性。再有,男性和女性与“城市”的关联也似乎有所不同,支配城市的时常是男性的利益和主导性的表现形式,比如纪念碑、纪念性建筑、历史遗迹等等,这些都记录着男性的活动。自然景观与城市景观并非只供注目观看的中立客体,而是具有不可化约的社会性别因素。不仅如此,对于女性的安全居住和流动来说,城市规划也显得尤为重要(Wilson, 1991; Ardenner, 1993; Wolff, 1995)。

* 布赖顿(Brighton):英格兰东南海滨度假胜地。——译者注



在种族方面,也已经发展出类似的主张,不过还有三点得提一提。首先,大多数关注的是揭示不同种族群体的变动中的空间分布,尤其是美国黑人底层阶级的发展(W. Wilson, 1987)。威尔逊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起因是黑人中产阶级的空间流动,即大批流出黑人区。这种趋势助长了社区生活基础的瓦解,与此同时,随着工作岗位向美国南部和西部移动,向城郊外移,这些地区在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过程之下陷于荒芜。出现了“贫民区的空洞化”或“遭受重创的贫民区”(Wacquant, 1989; Lash and Urry, 1994: 第六章)。

其次,与此相关的一点,各种种族群体都已被“建构”为特别易于犯某些种类的罪,尤其是偷窃、抢劫以及种种和毒品有关的罪行。这已经使学者们开始注意研究对犯罪的担忧在社会和空间角度上的模式分布。城镇和都市里的某些地区已经被人们视为具有非常高的犯罪率,对犯罪的担忧也特别突出。都市现象中有“种族化”的倾向;与之相反,白人乡郊获得了较高评价,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前者效果的发挥。

第三,国家认同和其他认同(种族认同、地区或地方认同之类)通过充满矛盾的多重方式,不可分离地维系着特定种类的空间。对这些方式的分析也越来越多。萨马(Schama, 1995)指出,特定的景观是如何成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树木、山水等相似种类的物理特性上,倒是可以加上极其不同的“国家”意义。

最后,与这些论题关联甚密的,是目前有关如何理解“自然”的争论。我们是不是该把自然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实体”,对社会生活模式发挥着因果力量?或者,我们该在物理范畴之外,再把一些社会范畴也纳入某种新近重构的自然?有关空间和时间的社会理论中,哪些种类的理论分别适合于这些不同的自然观念?这些理论话题和实践话题当然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有关时空的分析目前正围绕着这些话题,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可以肯定,它们将会坚定地认为,对于有关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富于竞夺的自然”的发展中的社会理论来说,时空具有核心的位置(参看 Macnaghten and Urry, 1998)。

参考文献

- Adam, B. 1990: *Time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Timewatc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rdener, S. (ed.) 1993: *Women and Space*. Oxford: Berg.
 Bachelard, G. 1969: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Bagguley, P., Mark-Lawson, J., Shapiro, D., Urry, J., Walby, S., and Warde, A.

- 1990: *Restructuring. Place, Class and Gender*. London: Sage.
- Bell, C. and Newby, H. 1976: Communion, communalism, class and community action: the sources of new urban politics. In D. Herbert and R. Johnston (eds.) *Social Areas in Cities*. Vol. 2. Chichester: Wiley.
- Benjamin, W. 1979: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Verso.
- Bergson, H. 1910: *Time and Free Will*.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Berman, M. 1983: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 Buck-Morss, S. 1989: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astells, M.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78: *City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Colson, F. 1926: *The Week*.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veney, P. and Highfield, R. 1990: *The Arrow of Time*. London: Flamingo.
- Cubitt, S. 1991: *Timeshift. On Video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Durkheim, E. 1968 [1912]: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1984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 Elias, N. 1992: *Time. An Essay*. Oxford: Blackwell.
- Evans-Pritchard, E. 1940: *The Nu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x, M. 1989: Unreliable allie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ime. In J. Forman and C. Sowton (eds.)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 Frankenberg, R. 1966: *Communities in Brita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risby, D. 1992a: *Simmel and Since*. London: Routledge.
- 1992b: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London: Routledge.
- and Featherstone, M. (eds.) 1997: *Simmel on Culture*. London: Sage.
- Fröbel, F., Heinrichs, J., and Kreye, K. 1977: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me, A. 1995: Time, space, memory, with reference to Bachelard. In M. Feath-

- erstone, S. Lash, and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 Gans, H. 1986: Urbanism and suburbanism as ways of life. In R. Pahl (ed.)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Oxford: Pergamon.
- Gell, A. 1992: *The Anthropology of Time*. Oxford: Berg.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 Hawking, S. 1988: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London: Bantam.
- Hayles, N. K. (ed.) 1991: *Chaos and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degger, M. 1962 [1927]: *Being and Time*. Oxford: Blackwell.
- Hetherington, K. 1994: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Schmalenbach's concept of the bund. *Sociological Review*, 42, 1—25.
- 1995: Technologies of place. Division of Labour Conference, Keele University.
- Jay, M. 1993: *Downcast Ey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ellner, D. 1992: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identities. In S. Lash and J. Friedman (eds.) *Modernity and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Kern, S. 1983: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Lash, S. and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 Lowenthal, D. 1985: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naghten, P. and Urry, J. 1998: *Contested Natures*. London: Sage.
- Marx, K. and Engels, F. 1888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 , ———1976: *Collected Works*. Vol. 6.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Massey, D. 1984: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London: Macmillan.
- McTaggart, J. 1927: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Vol. 2, Book 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ad, G. H. 1959 [1932]: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 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Newby, H. 1979: *Green and Pleasant Land?* London: Hutchinson.
- Nowotny, H. 1994: *T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rigogine, I. 1980: *From Being to Becoming: Time and Complexity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and Stengers, I. 1984: *Order out of Chaos*. London: Heinemann.
- Redfield, R. 1947: The folk socie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293—308.
- Saunders, P. 1982: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Hutchinson.
- Savage, M. and Warde, A. 1993: *Urban Sociolo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London: Macmillan.
- Sayer, A. 1992: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Schama, S. 1995: *Landscape and Memory*. London: HarperCollins.
- Schmalenbach, H. 1977: *Herman Schmalenbach: On Society and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nnett, R. 1991: *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Shields, R. 1991: *Places on the Margin*. London: Routledge.
- Soja, E.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London: Verso.
- Sorokin, P. and Merton, R.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615—629.
-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56—97.
- Tyrrell, B. 1995: Time in our lives: facts and analysis on the 90s. *Demos Quarterly*, 5, 23—25.
- 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 1995: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 Venturi, R. 1977: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Wacquant, L. 1989: The ghetto, the state and the new capitalist economy. *Dissent*, Fall: 508—520.
- Weber, M. 1958 [1921]: *The C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30 [1904—1905]: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Williams, R.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 Wilson, E. 1991: *The Sphinx in the City*. London: Virago.
- Wilson, W.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rth, L.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1—24.
- Wolff, J. 1995: *Resident Alie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right, P. 1992: *A Journey Through Ruins*. London: Paladin.
- Zimmerman, M. 1990: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Zohar, D. and Marshall, I. 1994: *The Quantum Societ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Zukin, S. 1992: *Landscapes of Pow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深入阅读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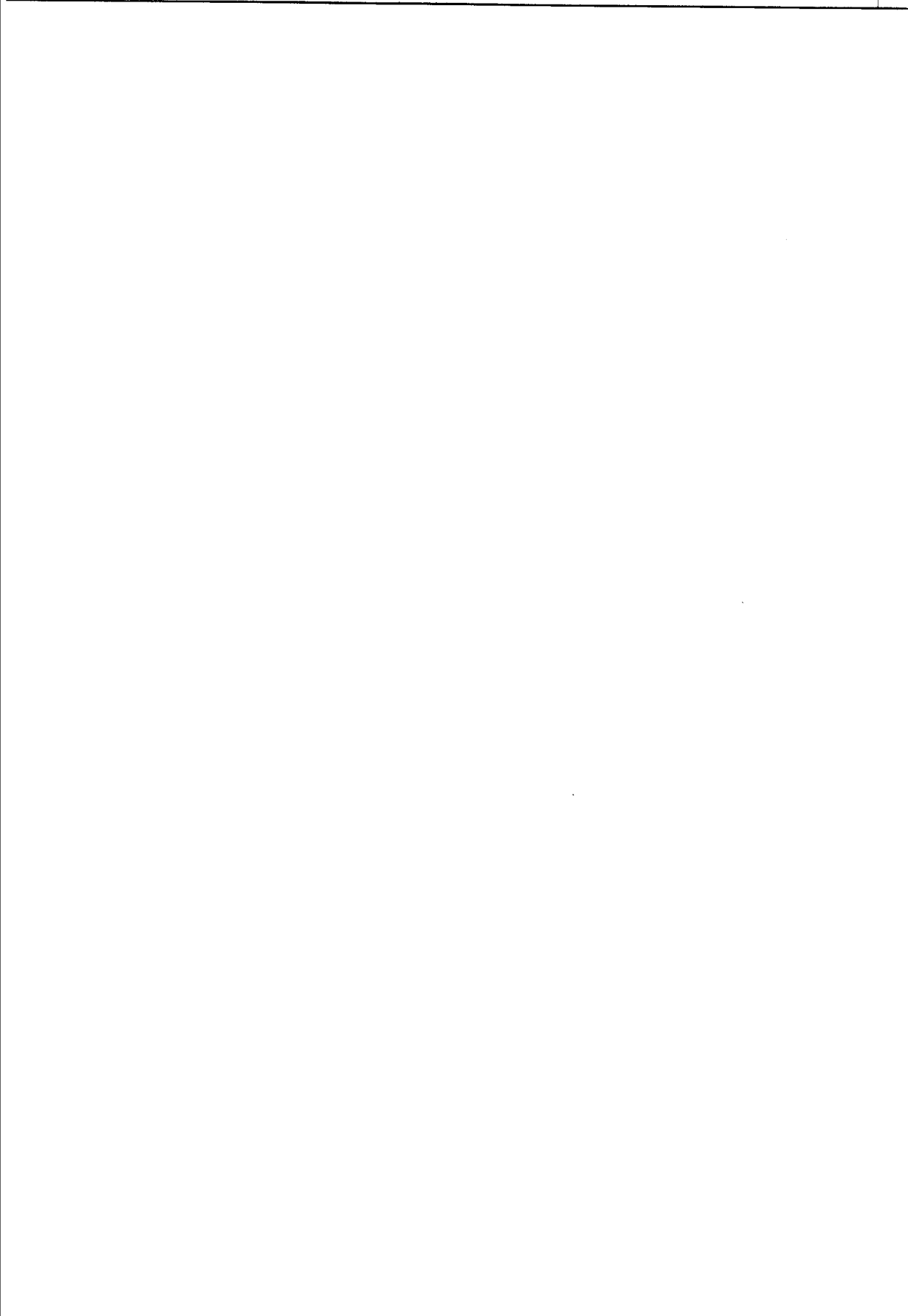
- Adam, B. 1998: *Timescapes of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Anderson, K. and Gale, K. (eds.) 1992: *Inventing Places*.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 Bell, D. and Valentine, G. 1997: *Consuming Geographies. We Are Where We Eat*. London: Routledge.
- Brunn, S. and Leinbach, T. (eds.) 1991: *Collapsing Space and Time*. London: HarperCollins.
- Carter, E., Donald, J., and Squires, J. (eds.) 1993: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Cilliers, P. 1998: *Complexity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Davis, M. 1990: *City of Quartz*. London: Verso.
- Diken, B. 1998: *Strangers, Ambivalence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Ashgate.
- Forman, J. and Sowton, C. (eds.) 1989: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 Keith, M. and Pile, S. (eds.) 1993: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Leyshton, A. and Thrift, N. 1997: *Money/Space*. London: Routledge.
- Rifkin, J. 1987: *Time Wars. The Primary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Thrift, N. 1996: *Spatial Formations*. London: Sage.

Young, M. and Schuller, T. (eds.) 1988: *The Rhythms of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in Social Theory

第五编 社会理论的当代发展





第16章 后现代社会理论



B. 斯马特

斯马特(Barry Smart)曾在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日本等国的多所大学执教。目前,他是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出版的作品包括《米歇尔·福柯》(1985),《现代处境与后现代争论》(1992)以及《后现代性》(1993)。他是“社会之未来”丛书的主编,也编辑了《米歇尔·福柯评论第一辑:考古学、谱系学与政治学》(1994)和《米歇尔·福柯评论第二辑:理性、权力与主体性》(1995)。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包括有关当代日本的一部合著,有关社会性别与认同的一项课题,以及关于义务、差异政治学以及道德社会学的一系列相关研究。他最近出版的作品包括《现代性与道德含混》(1999),并编辑了《抵抗麦当劳化》(1999)。

- 16.1 引介——后现代的足迹
- 16.2 后现代名人
 - 16.2-1 福柯
 - 16.2-2 德里达
 - 16.2-3 利奥塔
 - 16.2-4 布希亚
- 16.3 后现代论题
 - 16.3-1 反思性现代化
 - 16.3-2 关于现代性之终结的羸弱思想
 - 16.3-3 解放与伦理
- 16.4 结语:后现代性之后的理论阐述



16.1 引介——后现代的足迹

从理论上将“社会范畴”阐述为一块独具特色的现实秩序或形式，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相沿日久的成见，可以回溯到18世纪的一系列话语对往后发展所具有的影响，这些话语也就是法国和苏格兰“启蒙哲人”的著述，它们所开启的时代，后来以“启蒙时代”闻名。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社会范畴第一次成为抽象知识或推理的对象，成为理论思考和系统分析的焦点，同时也成为一些技术的目标，而这些技术的宗旨，就是要对那些使日常生活被迫臣服的变幻难测的现象实施控制。也正是从这一复杂背景之中，发展出了社会理论，它开始在现代性的规划中找到一席之地，并随之开始对现代性的规划进行反思。

锲而不舍地信奉某种形式的科学理性、普遍主义，并追求着进步，都表明“启蒙哲人”们著作中生发出来的那些观念、假设和目标所组成的研究方案，相当程度上一直在影响着现代社会理论的宗旨与目标(Bauman, 1987)。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从启蒙运动中生发出来的现代规划以及现代社会理论和分析的许多（哪怕不是所有的）假定和既定目标或目的，都愈益遭受到质疑，暴露出问题。这是因为，人们要么基于技术上的理由，如今认为它们不易于转化为现实或者说贯彻落实；要么基于道德和政治上的理由，认为它们即便不说是不可接受，也称得上是不适宜的。正是在对现代规划诸如此类的局限与限制的诊断上，被笼统认定为“后现代”的各色介入方案聚合在了一起。

现代规划问题化所发生的领域与渠道，是一种确立已久的批判性反思和考察的传统，这种传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探索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复杂、失衡和难以预测的后果，实质上是和现代性本身的范围一致的。正是在这里，在确立已久的一批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当中，已经刻下了一些早期“后现代”的足迹。比如说，在尼采、海德格尔、齐美尔、韦伯和阿多诺各自的著作里，都显著表现出一种关注，质疑现代理性及其后果。有鉴于此，这些分析家已经被视为“后现代”介入的始作俑者，尽管还未有定型(*avant la lettre*)。齐美尔分析了现代文化的危机和各种现代文化形式的生机之耗竭，不仅被说成是“一位极具洞察力（或许是最具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Bauman, 1991: 185)，而且被认为是“第一位研究后现代性的社会学家”(Stauth and Turner, 1988: 16)。而韦伯则以批判性的立场，考察了受现代理性的克里斯玛魅力支配的人类所面临的前景，卓有成效地激励我们重新考虑，“哪些种类的克里斯玛魅力与理性化将会左右‘后现代’世界的面目？”(Roth, 1987: 89)。至于尼采和海德格尔，作为“差异哲学”的奠立者，消解了进步与征服的观念，

以此将现代思想的形上基础给世俗化了,从而“为至少是更接近于确定后现代哲学可能的面貌奠定了基础”(Vattimo, 1988: 176)。由于阿多诺勾勒出了对现代哲学、“同一性思维”及总体性之理解可能性本身的激进批判的大致轮廓,因此,有学者主张,他的作品“预示了许多后现代的主题”(Best and Kellner, 1991: 225),在“《美学理论》、《否定的辩证法》和《最小限度的道德》等书里……都能感到有一种预示着后现代的成分……即便这种成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缄默不言,或者是难以接近”(Lyotard, 1993: 28)。诸如此类的见解证明,对于现代理性的种种局限与限制,一直都存在着一种批判性的关注。晚近某些评论家已试图表明,这是因为当代知识分子去除了幻觉(Callinicos, 1989; Berman, 1992)。但单单诉诸这一点,可能简单地打发这个问题或是干净利落地说明所有的因素,因为学者们捕捉到的那些关注和勾勒出来的那些批判都是由来已久的。简言之,对于启蒙运动将理性的增长等同于“正义、德性、平等、自由和幸福”(Bernstein, 1991: 34)等方面*的进步,早已有了一种不曾明言的怀疑,绝不仅限于那些只是在比较晚近才被派定为“后现代”的分析。

如果说这些见解似乎都还未成定论,那是因为后现代这一观念还充满了含糊与争议。含糊是因为事实上可以认为后现代这一观念意味着时序性,是继现代之后而来的某种东西,其实有些分析家也一直是这么用这个术语的。但所谓后现代并不一定就指我们已经告别了现代:恰恰相反,这个术语可以用来指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批判性关联,在这么用的时候,它与现代之间的关联看起来即便不说是不可分离的,也是十分密切的(Vattimo, 1988)。比如说,已经有学者将现代/后现代概括为单一的丛结,同时包括了“调和/断裂”这两个不可化约的要素(Bernstein, 1991: 309);对于“那么何为后现代?”的问题,利奥塔的回答是“它无疑属于现代的一部分”(Lyotard, 1984: 79);再举一例,有学者将后现代性描绘成“以一种宏远、周至和冷峻的眼光审视自身的现代思维……作为一种业已成熟的现代性……一种自我监管的现代性”(Bauman, 1991: 272)。反过来,由于事实上,现代社会思想中几乎所有备受珍视的分析上与政治上的假定,即知识的进步性、积累性、整体性、普遍性与理性,都成了值得质疑的问题,也就带来了争论。造成这种问题化的是现代性反思潜能的激进化,而这种激进化的趋向也有助于我们对现代规划的局限与限制保持警觉,并且有时也列在了“后现代”的名下。

那么,在这场复杂而混乱的现代/后现代之争中,关键的论题又在什么地方?问题并不只是说不可能彻底完成现代规划,虽然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面。人们越

* 原文此处为“repect”,显系“respect”之误。——译者注

来越明显地看到,对于现代性复杂而失衡的“现实”,即便不说存在自我挫败的死结,在评价上也有重大的缺失,而且(或者)存在根本的误解。关键的问题在于认识到,现代性的实际后果似乎一直与其纲领性的承诺不相和谐,在于认识到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有关的政治技术:

自信在叙述着**必然性**,但却充满了**偶变性**;自信在叙述着**普遍性**,但却充满了特定的**局部性**;自信在叙述着超地域、超时间的真理,但却充满了受传统束缚的解释;自信在叙述着明晰性,但却充满了不定性;自信在叙述着世界的确定性,但却充满了人的处境的暂时性;自信在叙述着自然的**秩序**,但却充满了人为设计的**含混**。(Bauman, 1991: 231 - 232)

一种后现代状况之兴起的症候,判定的依据恰恰在于它有能力对现代性做出细致核查,也就是说,有能力对现代性的核心假设、实践(包括分析实践)和成就或后果做出批判性的反思。

争论不仅是围绕着**后现代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理念本身,而且还在于该如何确定,哪些分析立场与关键人物足以体现**后现代**的精髓,我在下文将要着力揭示这方面的争论。在整个 20 世纪,许多领域里的考察已经采用了明确的后现代观念,比如文学批评、历史分析、建筑描绘、神学叙事乃至社会和哲学方面的话语(Smart, 1992, 1993a)。在社会理论的领域里,是米尔斯在讨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宏大叙事的崩溃时,最早明确引入了一种有关后现代的观念,这些宏大叙事把这两种主义说成是“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充分说明”(Mills, 1970[1959]: 184)。韦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各自著作里都能找到与现代理性之间的批判性关联,米尔斯回应了早期的这些关注,主张现代关于理性与自由之间内固有关联的假设再也站不住脚了,因为“理性与自由这两种价值观念已是身处险境,虽然还比较微妙,但也算很明显了”(Mills, 1970[1959]: 186)。米尔斯进一步指出,我们发现,鉴于现时代已经转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关于社会和自我的观念已经不适于和无助于理解新兴起的种种现实,“说到底,我们有太多的旧有期待和图景受着历史的束缚;……我们在思维和情感上有太多的标准范畴既常常有助于说明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同样经常使我们迷失方向;……我们有太多的说明是源自从中世纪到现时代的巨大转型;……而当它们今天被用作普遍性的东西时,就会变得使用不灵便,要害抓不住,说服力不够”(Mills, 1970[1959]: 184)——实际上,现在该是“启蒙思想”、践行社会学想像力的时候了。^[1]

16.2 后现代名人

米尔斯认为,在一种现代工具理性的左右之下,社会学想像力已经在分析上、政治上和道德上都陷入一种贫乏的境地。他因此努力要将社会学想像力拯救出来,而他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预示了业已由一群各具特色的分析家所论及的一系列主题。人们之所以经常将这些分析家的作品视同后现代,要么是因为它们的影响推动了后现代社会思想与哲学思想的产生,要么是因为直接有助于一种后现代的理论(Huyssen, 1984)。以罗兰·巴特、布希亚、德勒兹与瓜塔里、德里达、福柯和利奥塔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分析家,对他们各自著作的接受情况,首先尤其是在美国的接受情况,正是一种有关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观念兴起的源泉。这里所说有关后现代社会理论观念,指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富于争议的论题,都关注被归为“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的各种思想考察形式之间的跨文化差异,于桑在试图勾勒后现代在美国与欧洲彼此相对的发展轨迹时,对这些论题已经做了细致的记述(Huyssen, 1984)。

将罗兰·巴特、德里达、福柯与利奥塔等人归入一种共同的“后结构主义”取向,是想要提请人们注意到,在他们各自的著作里,共同体现出对于以下一些论题的一种批判性关怀,尤其是:(1)表现的危机及与此相关的意义的不稳定性;(2)知识的确定的基础的缺失;(3)语言、话语与文本在分析上的核心地位;(4)关于理性自主主体的启蒙运动假设是不适当的,与此相对的是关注个人被构成为主体的种种方式(Smart, 1993a: 20 - 23)。反过来,一种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构成据说也为各种后现代分析奠定了基础,与这些分析的发展相互交织、彼此叠合或混融一处(Lemert, 1990)。的确,尽管有一些人尝试要区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的两类分析形式,但显然后者现在被认为涵括了“文学理论、哲学与历史中的后结构主义研究”(Boyne and Rattansi, 1990: 10)。

已经颇有一批分析家指出,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其间的时代已经具有显著的差异(Hall and Jaques, 1989; Beck, 1992; Castells, 1996);而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那些转型了的情势,可不仅仅是像詹明信(Jameson, 1991)所认为的那样,将那些“确立已久、备受珍惜”的观念重新翻检出来使用。如果要寻求为后现代社会理论阐述找到一种正当性,或许就能在下面这种观念中找到,即认为关于社会生活的既有现代观念与分析即便不说是彻底错误,也越来越开始表现出不足与不当。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考察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地位,还是考察学者们企望借以把握我们如今遇到的复杂社会状况的那些社会分析与哲学分析形式的地位,在推进时都有必要

小心谨慎。在这方面,于桑有一点主张值得回顾。他说:“我们必须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法国理论所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理论……而主要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考古学,关于处在耗竭阶段的现代主义的理论”(Huyssen, 1984: 39)。被派定为后现代的一批分析家的作品里所表现出的关注与采取的研究路向,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了这一主张。

我们如何来理解后现代社会理论这一观念?尤其有那么四位当代名人,已经与后现代社会思想与哲学思想这一富于争议的观念密切相连。后现代的观念提请人们注意现代的社会考察形式中那些值得追问的特性,从而构成了一种激进的分析上的挑战,有鉴于此,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和布希亚都已经在事实上成为末日预言般的人物,分别传递了各自的黑色故事:预示主体之死;“文本之外别无它物(*Il n'y a pas dehors-texte, nothing beyond the text*)”;宏大叙事可信性的丧失;社会范畴之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一项启蒙运动假设的消解,即理论最终的形态要么是对实在的东西的一种思考,要么是对它的批判性的否定。^[2]他们的立场有所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彼此对立,但冒着过于简化的危险,我们还是可以这么说,在他们各自的著作里作为一个共同点凸显出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正生活在西方形而上学的终曲之中并与之相妥协,它“以其最终形式,即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主宰着整个世界”(Schirmacher, 1984: 607)。或者,换句话说,从他们各自的分析中,似乎浮现出一种观念,将现代性理解成“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样一来等于是说,后现代主义这个有争议的观念,成为“单纯是这种终结的比喻性表述,在此之后,将不再有任何新的开端”(Schirmacher, 1984: 605)。

16.2-1 福柯

对于福柯来说,现代启蒙运动的知识型(*episteme*)“业已在人的名义下构成了一种存在,它在各种理性的同样一种相互作用之下,必然成为知识的一块实证领域,而不能是科学的一种研究对象”(Foucault, 1973: 366-367),这个形象在精神分析、人种学之类“反科学”(counter-sciences)的作用下,不断地发生彻底的变化,而随着语言的重新兴起,又将注定“走向终结”。在福柯看来,“随着语言的存在越来越明亮地照耀在我们的视界上”(Foucault, 1973: 386),现代知识型也就开始瓦解了。也正是在这里,在对人的科学的考古学分析中,分析家们已经指出,可以找到一些初期的痕迹,表明福柯正逐步演变,“趋向一种不与理性和启蒙径直对抗的后现代主义”(Hoy, 1988: 20; 也可参看 Hekman, 1990)。这种分析形式与哈贝马斯所说的(Habermas, 1987)恰恰相反,并不是在为非理性大唱赞歌,而是试图探索关于启蒙

运动及“各种形式的理性与技术的发展和确立”的问题(Foucault, 1986a: 95), 以及它们相互关联的复杂后果; 业已有人主张, 这种分析形式揭示了后现代的足迹。

更有主张称, 福柯的作品后来采取了尼采式的谱系学, 并不宣称对不可思的东西享有优先触及的渠道, 也就更清楚地展现出一种后现代的取向。霍伊在考察福柯后来的作品后指出:

我们不再带着现代事业关于人的本性的形上假定, 关于一些先验不变的范畴的认识论假定, 去积极投入这种事业。后现代的方法是一种谱系学性质的批判历史。谱系学所描述的无非是我们如何成为我们如今之所是……如果后现代谱系学说到底属于自我知识, 那么由此途径而了解到的自我, 也就证明不是单一的、统一的、完全的和完整的, 而是复杂的、分散的、分裂的和脆弱的。(Hoy, 1988: 36 - 37)

转向谱系学分析后, 就可以认识到, 如果试图在“关于自我、欲望、无意识之类是什么的所谓科学知识”中, 为现代道德找到一个基础, 就会带来一些很成问题的后果(Foucault, 1986b: 343)。也正是在诸如此类的基础付之阙如的背景下, 伦理的主题以及某种“生存美学”之类的相关观念, 即“自我并非我们身上的给定属性”, “我们必须把自身创造为一件艺术品”(Foucault, 1986b: 351), 就成了福柯作品里一种日渐突出的特征。他后期的作品里明确探讨了关于伦理及其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生发出一种无须基础(foundationless)的观念——“政治作为一种伦理”, 这些便愈发使人们确认福柯属于“后现代”(Richters, 1988)。但不管怎么说, 这样一种解释尚有待推敲, 因为如果更细致地阅读福柯对伦理主题的思考, 就会发现它一直体现出一种具有典型现代特征的对于自我的关注, 其结果表现为在道德上对他人相对淡漠(Smart, 1995)。

有观点认为理论分析与伦理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关联, 或者用更让人熟悉的话来说, “正确”的理论将会确保伦理和政治上的选择与实践的“善好”。但这样的观点福柯是不赞同的。利奥塔主张, 没有任何元语言或理论话语可以“为政治决定与伦理决定确立根据”(Lyotard and Thebaud, 1985: 28), 他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已经错误地声称在政治事务上享有合法的特殊地位; 无独有偶, 福柯也以类似的方式, 主张“伦理问题与科学知识发生关联根本不是什么必然的事情”(Foucault, 1986b: 349), 因此, 现代知识分子也不再代表“普遍价值观念的承载者”。不过话说回来, 福柯也认为(Foucault, 1980: 132), 尽管他们的角色也许已经缩减, 但还可能通过参与一些特定的“解释”争斗, 来继续对伦理与政治事务发挥重大作用。至于争

斗的对象,既包括构成和区分“真实的东西与虚假的东西”的那些规则,也包括作为真理体制必然结果的那些权力效应。福柯所采用的解释性思想分析策略,由于间接反对了现代“立法”性的世界观及其内在的权力/知识综合症,也就被认定为属于后现代了(Bauman, 1987)。尽管福柯自己承认并不了解“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者”之类的用语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如今无论是批评的一方还是拥护的一方,却都广泛地把他看作是后现代范典中一位关键的人物(Hoy, 1988; Callinicos, 1989; Hekman, 1990; Best and Kellner, 1991)。

16.2-2 德里达

德里达和福柯情形相仿,主要是因为他把西方形而上学说成是在实质上拆解自身,所以被归到了后现代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在德里达看来,西方思想的典型特征就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也就是这样一种欲望,想要克服意指与解释之间的封闭循环,直接地、无须中介地触及现实。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理性必然负载着语言,不可能抵达纯粹的、自我确证的真理。不可能有一种无须中介的通往现实的渠道,因为分析的逻辑本身就是通过形形色色的空间比喻和视觉比喻而构成的。所以说,理性无法驱散混浊的互为文本性。德里达的观点“文本之外别无它物”(Derrida, 1967: 227)广受称赞,也备招嘲讽,还屡遭误解,其中也包括这种读解方式。但这种解释并未穷尽这句颇有争议的话的意义,实际上它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有限的读解。

要恰当地理解德里达所谓“文本之外别无它物”的观念,就必须细致地考察文本(text)的观念。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会清楚地看到,文本的观念及其相关的解构实践并不仅限于书本、话语以及概念上、语义上的内涵。相反,文本的概念被重新塑造,“几乎无所限制”地扩展开去,不仅涵括了各种思想系统,而且涵括了把它们关联起来的那些社会政治制度;也就是为什么“‘文本之外’别无他物”(Derrida, 1986: 167)。对于世界,对于有关的各种知识形式以及它们各自的社会政治背景,我们的理解必然是“文本性”的;这些理解所体现的解释事务会反过来(重新)产生文本,并引发和(或)构成更新的文本。在德里达看来,传统上文本与解释之间的区分,或属于“现实”的关于世界的种种表现与属于“说法”的其他表现或知识形式之间的区分(比如科学叙事与艺术叙事),都充满了含糊不清的地方,因为世界与我们关于它的知识形式之所以成其为两个互相分别的东西,是靠了那条习惯上的分界线,而互为文本性的观念则消抹了这条分界线。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澄清文本观念,就有可能认识到解构实践中通常被忽视的政治性。即如德里达所言,“因为解构所关注的始终

不仅是所指内涵,所以也不应该脱离这块政治一制度方面的问题域,而应当寻求一种对于责任的新的考察,对承自伦理与政治的那些准则提出质疑”(Derrida, 1984: 42)。[3]简言之,解构必然带有政治性:它构成了一种伦理一政治批判,反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固有的一些假设,比如“核心结构”、“根本依据”的观念,又比如存在一种“让人放心的确定性”的可能性(Derrida, 1978)。德里达后来又说,作为一种“激进化”的解构,在对马克思相沿已久的思想遗产的一系列反思之中,坚持了“批判性的观念或质疑性的立场”(Derrida, 1994: 92; 亦可参见 27—28, 88—90)。

德里达的作品普遍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解构,针对西方形而上学借以构成并仍在继续借以构成的那些值得怀疑的(aporetic)比喻和假设,做出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入的思考。但不应该将这与对形而上学的超越混为一谈,因为要想解构形而上学的语言,就必须对这种语言本身有所借取,就此而言,我们始终会遭遇一种无法躲避的“重新被形而上学利用的风险”(Derrida, 1982: 58)。因此,可以把解构描绘成一种介入策略,可以借此将那些形而上学的假设交付暴露、质疑与边缘化。

根据德里达的描绘,西方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系列比喻性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其中有一个要素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其中与他的论点关系最密切的一种对立,就是在场的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中固有的书写/言语的对立。解构就是要挑战言语被赋予的首要性,倡言书写是语言的有效前提,以拆解西方形而上学。简言之,德里达反对认为言语更近于“内在于心理的东西(本身就通过自然的类似而反映了世上的事情)”(Kamuf, 1991: 30),而书写则只是言语的一种映射,只是声音的转述。德里达具体指出了一系列比喻,它们都有助于赋予言语以特殊地位,使人们不注意意指系统,而言语其实是通过意指系统构成并维持的。在此之后,德里达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书写观,认为书写是一种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因素,内在于沟通,内在于“意义的无尽置换中,既主宰着语言,又将语言永远置于一种稳定的、自我确证的语言范围之外”(Norris, 1982: 29)。

除了提出新的文本观念,德里达还提出了一种新的书写概念,这种书写“不仅限于你用自己的文字笔迹(graphism)所覆盖的那张纸”(Derrida, 1986: 167)。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语音书写的模式,以及索绪尔将书写从语言学领域里排除出去的做法。德里达论证道,既然“并没有任何纯粹的语音书写……那么语音学家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整个逻辑就都是有问题的”(Derrida, 1982: 25—26)。德里达力图颠覆和置换声音的(时间的)因素相对于书写的(空间的)因素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但在这方面也主张,如果只是简单地倒转不对称的方向,赋予书写以特殊地位,那就仍然会使我们面对言语/书写之间的二元对立,所以说这种做法本身的问题也毫不逊色。德里达认识到所有意指过程中内在固有的各种差异(difference)与“痕迹系统”

■ (economy of traces)之间的游戏,就此引入了作为延异(differance)的书写概念。没有任何概念要素可以凭其自身即可意指:相反,“一个要素只有诉诸痕迹系统中过去或未来的另一个要素,才能发挥作用,意指对象,具备意义或者传递意义”(Derrida, 1982:29)。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延异过程,即“差异之间的系统游戏”,意指过程才是可能的,并且是无尽的。

总而言之,德里达所采取的立场是,“西方在形而上学、科学、技术和经济上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的中介(即语音书写),都具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限制”(Derrida, 1978:10),实际上,也正在逐步走向终结。德里达反对西方形而上学中的逻各斯中心性,和福柯一样认为,(重新)引入语言的那一时刻,也就标志着西方形而上学开始瓦解;在这个时刻必然开始认识到,没有任何固定而永恒的中心或根基可供援用。实际上还不仅如此。种种现代分析形式似乎一刻不停地渴求有一种中心或根基,可以提供让人放心的确定性,哪怕这些分析形式的运作恰恰使盛行的确定性的东西趋于不稳定。但这样的中心或根基从来也不曾有过。德里达充分估量到,语言是很复杂的,尤其是不可能通过不可渗透的明确界限,区分出词与物,能指与所指,各种知识形式与它们声称构成从而把握了的那些世界,这使他十分关注始终存在的意义问题,关注始终有可能引起争议并确曾经常引起争议的意义特征。差异观念卓有成效地捕捉到的,正是意义的延迟与无尽的解释的隐含过程,即“差异的游戏”。

德里达的举措并不意味着彻底摆脱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尚未成为两元中否定的一极,其中后形而上学的一极享有特殊的地位。恰恰相反,在形而上学的语言中工作依然是一种必然的事情。惟一的推进道路就在于积极从事一种“警觉的文本实践,清醒地意识到它自身也有沦变为形而上学的可能性”(Norris, 1982:67)。用德里达的话来讲,目标就在于“既避免简单地中和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也避免简单地居于这些对立的闭合领域里从而确认了形而上学”(Derrida, 1982:41)。不过话说回来,这种立场是一种反思性的现代立场,还是一种后现代的立场,哪一种说法更合适,还有待商榷。

福柯和德里达都已经紧密地与后现代社会思想与哲学思想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如此,在他们各自的作品里,并没有持之以恒地探讨后现代问题。就此而言,或许他们的地位尚不及利奥塔和布希亚这两位人物重要。后两位都是直接关注关于后现代的问题,只是方式有所不同。利奥塔的形象经常被等同于后现代的观念,因为他关于知识状况方面种种转型的报告已经对当代的论争产生出极其重大的影响。尽管如此,布希亚对后现代地位的主张的重要性也毫不逊色,尤其是当参照框架不限于学术界的传统范围,而是扩大到涵盖当代文化、沟通乃至种种路人皆知的街头

符号标记时,就更是如此。

16.2-3 利奥塔

利奥塔关注的是愈益增长的知识理性化过程及其效应,就此而言,他的作品《后现代状况》(Lyotard, 1984)就可以相比于其他许多分析家的作品,他们都批判了现代理性的发展业已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不良后果。比如说,米尔斯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就已经讨论到,现代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关联是成问题的,与此相关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也随之崩溃。这样的讨论虽说不曾明确地展现知识的“后现代”状况,但已经在大致上预示了这种状况的概貌。利奥塔研究报告核心的基本假设是,“随着社会进入如人所知的后工业时代,文化进入如人所知的后现代时代,知识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Lyotard, 1984: 3, 黑体为引者所加)。利奥塔的分析所指向的关键问题,就是知识是如何发生改变的,又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值得强调的是,这套特定的研究规划有着相当明确的关注焦点,即对“各门科学知识在发达社会中的状况”做出评述。与此后的作品不同的是,它主要关注的不是明确的哲学问题,而是社会学、历史学和认识论性质的问题(Lyotard, 1988b)。从那以后,利奥塔已经从对于后现代知识状况的社会学探求,转向以更明确的哲学关怀,探讨理性及有关公正和政治的相关问题(Rojek and Turner, 1998)。

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命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核心假定,就是“宏大叙事已经丧失了它的可信性,不管它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统一方法,也不管它是一种思辨叙事还是一种关于解放的叙事”(Lyotard, 1984: 37)。批评家们已经对利奥塔的命题迅速做出了回应,认为一方面,怀疑态度与元叙事紧密相伴,可以说“至少从启蒙运动以来就已存在”(Callinicos, 1989: 10);另一方面,这个命题本身不仅暴露了一种主导叙事的痕迹,而且似乎也有必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宏大叙事(Best and Kellner, 1991)。对于前面一种批评意见,利奥塔本人也是承认的,他问道:“忧心忡忡也好,兴高采烈也罢,‘我们’是不是在谈论关于宏大叙事之终结的宏大叙事?”(Lyotard, 1988a: 135)。

对于元叙事的怀疑态度即便不说比启蒙运动本身更为古老,也可以说从启蒙运动开始即已有之。这样的观念所激起的争论并不那么多,不像另一种见解那样众说纷纭,就是把利奥塔的分析视同对前现代之过去的浪漫主义理想化(Callinicos, 1989)。利奥塔的作品中明确承认:“关于堕落(decadence)的宏大叙事在西方思想肇始之时,在赫西俄德和柏拉图那里即已有之。它如影随形地紧跟着关于解放的叙事”(Lyotard, 1992: 40-41)。当然,我在前文业已指出,至少从 19 世纪末开始,以批

判性的立场关注启蒙运动被遮蔽的一面，就已经成为欧洲思想中一种持续不懈的特征，而到了晚近，这个特征也愈发显得突出。对上述判断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尽管如此，利奥塔主要关注的还是二战之后，随着各种宏大叙事越来越趋向衰退，实质上已经不能切合当代状况，对于它们的信任与信念也就随之失落。在这一点上还有必要指出，利奥塔固然是强调“各种技术与工艺之蓬勃发展所产生的效应……已经将重点由行动之目的转向行动之手段”（Lyotard, 1984: 38），推想这种效应可能维系着一种“对于极度精致化……（或）复杂化的含糊欲望”（Lyotard, 1989: 21 - 22），提请人们注意到“发达自由资本主义的重新部署”（Lyotard, 1984: 38）所一直具有的重要意涵，但他还是彻底否认，单凭这样一些因素就可以说明知识地位的转型。相反，根据他的主张，我们需要去追问，为什么当代科学已经变得很容易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他给出的答案便是：“在 19 世纪的宏大叙事中就已经埋下了‘去合法化’和虚无主义的种子”（Lyotard, 1984: 38）。正如我在前文业已指出的那样，在尼采、海德格尔、韦伯、齐美尔和阿多诺各自的作品里，都可以明确地找出现代理性反作用于自身或反过来反对自身的种种迹象，这些早期的痕迹后来在理论上被概括成一种反思性现代性的发展（Giddens, 1990; Beck, 1992）。

但是，所谓宏大叙事有不同的类型，必须在其间做出区分，这种批评意见又该如何理解呢？贝斯特与凯尔纳的批评认为：“利奥塔往往将所有大的叙事都混为一谈，从而粗暴地对待了我们文化中叙事的多样性”（Best and Kellner, 1991: 172）。他们相应地提出，需要区分两类叙事，一类是与总体化理论意涵相似的主导叙事，即讲述了一个“大故事”的宏大叙事；另一类是处于知识的根基上的元叙事。但他们诸如此类的批评与建议，只是把事情弄得更加含糊而不是澄清了事情。利奥塔关注的是特定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的衰落，这些叙事标志着现代性，通过诉诸一种“有待实现的未来”，一种普遍的“有待实现的理念（Idea）”，来寻求合法性（Lyotard, 1992: 29 - 30）。诚如利奥塔所言，对于此类宏大叙事的信任的丧失，以及与之相伴的此类叙事的衰落，并没有“阻止其他数不清的（微小的和不那么微小的）叙说继续在编织着日常生活”（Lyotard, 1992: 31）。实际上，我在前文业已指出，利奥塔也承认，自己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叙事或许也属于那些“不那么微小”的叙说之一，它们以一种悖谬的方式，趋于成为一种“关于宏大叙事之衰落的宏大叙事”（Lyotard, 1992: 40）。

现代思想与行动一直在关注“解放理念”，而这个理念一向是通过各种历史哲学或宏大叙事来组织表达的。但是，自从二战以来，关于解放的种种宏大叙事就已经逐步丧失了效力。利奥塔认为，纳粹大屠杀驳斥了思辨叙事中将存在即等同于合理的思路；1968 年五月风暴及其余波有效地瓦解了议会自由主义；而反复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也使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及其“后凯恩斯主义变体”失去了效力

(Lyotard, 1988a: 179)。这些解放叙事的每一个都已经不再为人所确信,从其失去信用的方式可以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欧洲人——即便不说是西方人——的意识里已经深深地刻下了一种无法修补的怀疑:普遍历史并不像康德所设想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趋向更好’,或者更准确地说,历史并不必然有一种普遍的终极目的”(Lyotard, 1992: 62)。现代规划与其说是被历史的潮流、事件的流逝所抛弃或遗弃,不如说是在现代性本身发展的作用下,大大降低了价值,丧失了信用。对于现代规划的核心假设与目标的信心、信任与信仰皆遭侵蚀,这正是现代实践及其失衡了的效应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实际上,现代性的“他者”,也就是那曾经被描绘成“含混、不定、犹疑的灰色区域”(Bauman, 1992a: xvi),挥之不去地始终在场,以一种反思性的方式,侵蚀着现代性的发展。

利奥塔主张,关于解放的宏大元叙事的衰落,已经表明了知识分子不再能够“以‘不容置疑的’普遍性为名义开口言说”,意味着他们的权威已经丧失,不再有能力“以面向公众的方式说‘你们必须这么做’”(Lyotard, 1988b: 301)。知识分子的形象与实践两方面的地位都发生了诸如此类的转型,这项重大主题不仅体现在利奥塔的著作中,而且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也体现在福柯的作品中(Foucault, 1980, 1988),并且以更为极端的形式体现在布希亚的作品里(Baudrillard, 1989a, 1989b)。该主题已经被认定为后现代状况的关键标志之一(Bauman, 1987)。其含义之一便是,普遍知识分子,即分析“一种被赋予普遍价值观念的主体”的存在状况并为之声言的那种形象,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逝去。事实上,有鉴于如今的思想已经缺乏“普遍性”或一种“总体化整体”,知识分子这种观念本身也被利奥塔说成是深陷危机,注定覆亡(Lyotard, 1993: 5—6)。但不管怎么说,从这种判断并不一定能够推出,批判思维或政治活动已经被不可挽回地调和、中立或是归于沉寂;或者,由于理性如今被交付批判性的分析,就等于“非理性主义”备受青睐了(Callinicos, 1989; Best and Kellner, 1991)。这两种指责都未能认识到,“后现代状况”必然会导致一些环境条件的改变,并且带来一些新的责任与机遇。即使无论是“可供替换选择的伟大形象”,还是“伟大的基础合法性”,都已经被消抹,也会同时有一种与此相关的将“思想与生活从总体化迷恋中”解脱出来(Lyotard, 1993: 7, 169)。

利奥塔认识到自己的作品为根基的危机更助上了一臂之力,总结道:“理性的危机向来完全像是个澡盆,科学理性已经在其中浸浴了一个世纪,而……对于理性的这种持续的质询,也肯定是周遭最为理性的事情”(Lyotard, 1988b: 280)。福柯和德里达都赞成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分析任务,就是继续以批判性的态度质询理性,揭示出它不是“关于一种巨大而独特的理性的问题”,而非是一些理性,或者是多种合理性的多重复合体(plurality of rationalities)。但没有任何正当依据,可以把这种

活动等同为倡言“非理性主义”；恰恰相反，它正是以一种理性的立场，去挑战既定的思想，挑战正统的观念，挑战被广泛接受的见解。它是一种以批判性立场进行反思的知识政治的固有特性。在有关解放的宏大叙事贬值之后，这种有关抵抗的知识政治依然存在，并且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是一种必然性。它的实施场所与实施渠道就是写作，是写作让人们得以抵抗“那些已经做成的事情，那些人人都这么想的事情”（Lyotard, 1988b: 302）。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种政治并不仅限于写作的实践，而是包括了语言转变成一种商品后的后果，特别是包括了在生产领域中引入语言机器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所产生的影响（Poster, 1990）。伴随后现代的实现而来的这种政治，不再宜于简单地将语言视为一种“沟通工具”。语言构成了各个相互异质的用语系统的复杂组合，其中一种系统里的用语不能简单地转译为另一种系统里的用语（Lyotard, 1988a: xii; 1993: 27—28）。简言之，没有任何根据可以确保一定能从关于“真”的描述中推演出关于“善”或“公正”的规定，因为它们相互之间不可通约。

对语言的转向（或回归），伴随“现时代形而上学教义”的销蚀而来的普遍主义话语和判断规则的贬值或衰落，愈益加剧的“对‘理论’的厌倦，以及随之而来的可悲的随意（新这个新那个，后这个后那个，如此等等）”，凡此种种，促使利奥塔提出，现在该进行哲学化，“在‘知识分子’的政治和政客的政治之外，确立一种哲学的政治”（Lyotard, 1988a: xiii）。这种政治学既认识到，政治范畴里面已经不再有任何可能存在救赎性或解放性的目的（同样也不再有任何可能存在从中产生政治计算和批判的权威形式的认识论依据），同时也认识到，始终存在着不同用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简言之，这是一种关于异质性的批判政治学，证明了歧异（differends）的存在。

以多种方式提出来的关于差异的问题，已经成为关于现代状况与后现代状况之争论的显著特性之一。但是，诉诸他者性、多元性、延异、歧异和分裂，并不只是争论的一个特性；它们还反过来构成了“对于何者业已构成‘现代 / 后现代’生活形式之事实的思考”（Bernstein, 1991: 312）。德里达采用延异的观念来反对西方形而上学及其伦理—政治意涵，同样，歧异的观念也使利奥塔得以进一步深入阐发早先粗略勾勒的“一种同时考虑到对于正义的欲望与对于未知的欲望的政治”（Lyotard, 1984: 67）；也就是说，提出对于政治的追问，尤其是探讨关于“各种用语及其判断之间的冲突”的问题（Lyotard, 1988a: 141）。

关于合法性的宏大叙事是西方现代性的构成要素，对于这种叙事之衰落趋势的认定，并不一定会在实践中阻碍利奥塔在一些特定问题上给出一些叙事，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比如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科学的复杂化，理解资本

主义的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尚未走到末路”,但问题在于,“今天我们为何非得去读马克思?”(Lyotard, 1988a: 171; 1989: 23; 参看 Derrida, 1994 所给出的一种回答);比如关于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学;再比如关于正义与理性危机的问题(Lyotard, 1988a, 1988b; Lyotard and Thebaud, 1985)。所勾勒出来的核心命题并不妨碍产生一些关于当代处境的叙事;相反,它描述出了已经越来越难以否认的一种状况,一种现实,也就是当关于解放的论调还可能维持的时候,现代启蒙的理念却已经被玷污了。科学、技术、艺术与政治中的进步,会产生出一种被启蒙、被解放的人性,摆脱了贫困、愚昧和专制等种种堕落的束缚,这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内在固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不仅至今尚未实现,而且越来越受到质疑,因为一向作为现代性之必然结果的“进步”,已经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困境,“爆发总体战的可能性,各种极权主义,富裕的北方与深陷贫困的南方之间愈益扩大的鸿沟,失业与‘新贫’,普遍的去文明化以及教育中的危机(知识传承方面的危机)”(Lyotard, 1992: 98)。这是让人们们对进步本身产生怀疑,还是仅仅提请人们注意到实现进步的过程中的困难?解放现在有着怎样的地位?进而,当利奥塔(Lyotard, 1984)邀请我们激活差异时,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所有形式的他者性和差异都值得倡扬”? (Bernstein, 1991: 313)

在利奥塔的作品里,很难找出对于此类问题的直接回答。例如,利奥塔说到,我们可以“继续为解放而奋斗”,但这已经不再成其为“一种理想的替代选择,可以用来对抗现实……(因为它已经成为)系统可以追求的许多目标中的一种而已”(Lyotard, 1993: 113)。这个观点与德里达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坚持认为,“对于解放的欲望”是“重新政治化的一种条件,或许也是关于政治范畴的另一种概念”(Derrida, 1994: 75)。在相当程度上,利奥塔关注的是提请人们注意,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那些困境与差异;比如说,共同体的分裂愈益加剧,在现代政体里导致了一种日渐增长的“对于所谓我们的认同的不确定性”(Lyotard, 1992: 60)。不管怎么说,利奥塔一方面挑战了各种普遍项,区分出种种文化差异以及“现代性的衰颓(defaillancy)的迹象”(Benjamin, 1989: 318);另一方面他也强烈地暗示,可以推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对于“彼此不可通约的各种生活形式与词汇”(Bernstein, 1991: 313),采取普遍的宽容,是一种可取的态度。不仅如此,利奥塔还考察了“资本主义向语言的渗透”,这种渗透体现在相对廉价的语言机器的愈益推广上,而这些机器并不能“消化拖着我们的那种庞大的过度投资”,不能削减对于雇佣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处境,其中对于政治中正义的追求将使人们有必要采取“一种国际间的协作,以便在削减劳动时间的同时,不丧失购买力”(Lyotard, 1993: 28—29)。当利奥塔在考虑这个高兹曾经深入探讨过的话题(Gorz, 1989)时,他难道不是更近于从描述中推断出一种规定,或许还同时意味着,说到底,在野蛮的全球



■ 资本主义市场之外,还有可能存在一种社会替代的前景?诸如此类的见解无疑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形象还没到那么容易就注定“寿终正寝”的地步。

16.2-4 布希亚

在被认定为现代性的考古学家或后现代话语的创建者的四位分析家当中,布希亚或许是最富于争议的一位。他是一位文化名人,一个饱受媒体追捧的形象,一个愈益晦涩难解的分析家,几乎成了一位后现代的偶像。他的著作在深思熟虑之下,溢出并挑战了所有的学科界限。布希亚一度曾很可以算作是一位社会学家,但他的作品不再能够与某种社会科学学科轻易取得调和,哪怕是与其中最为分裂、内部最富歧异的学科(Baudrillard, 1984a)。

如今与后现代的关联最密切的,就要算是布希亚的作品了。在某些批评家看来,他的作品尤其与后现代中末日启示的基调关联甚密(Callinicos, 1989)。布希亚已被说成是“后现代文化与社会的倡言者”(Kroker et al., 1989: 265),是“提出了关于后现代性最震撼、最极端的理论”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后现代先知”(Best and Kellner, 1991: 111, 141)。布希亚的作品涉猎宽广,涵括了思想、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我并不打算详细地追溯布希亚的演变轨迹,从早期关于消费社会的讨论,中经从批判性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对摹拟和超级现实之新时代到来的分析,一直到更为晚近的作品(Kellner, 1989; Gane, 1991a, 1991b)。我将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布希亚与后现代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但要完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对他的分析路向的发展略作考察。

布希亚的作品最初是从相对符合传统的预设中发展而来的,和其他许多当代法国社会思想形式一样,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种种影响(Poster, 1988; Gane, 1991a)。布希亚先是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消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并又试图将一种激进的语言理论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上去。此后,《生产之镜》(Baudrillard, 1975)一书反映出布希亚的一个关键转变,开始远离马克思。在这部书里,布希亚主张,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依然是关于生产力的一种恣意浪漫的作派……尚未触及生产的原则”(Baudrillard, 1975: 17)。正如该研究的题名所示,马克思的批判据说无非只是反映了生产力论者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假设,反映了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只不过是提供了另一种依然属于生产力论的话语,仅限于再生产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源”(Baudrillard, 1975: 65)。布希亚认为,无论是“生产”的形式,还是“表现”的形式(“符号的地位,指引所有西方思想的语言的地位”),马克思都并未将其交付批判性的分析;更有甚者,迄今为止

所有存在过的社会的种种复杂历史，都被马克思简单地从生产方式的历史的角度入手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思想束缚于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所依赖的概念“依据的是笼统而言的市场经济的形而上学，具体而言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概念并未得到分析，或者说其面纱尚未被揭启(但却被移植到它们并不适用的原始社会)，却预先代替了所有更为深入的分析”(Baudrillard, 1975: 59)。实际上，布希亚还进一步主张，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提请人们注意，与马克思主义话语相维系的关于普遍性的假设是如何的不适当；而且还要注意，对于理解西方资本主义“从商品形式到符号形式的过渡”，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与概念已不再有意义。

布希亚所关注的不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而且，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还包括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以怎样的方式，把自身构建为一个“存在于普遍范畴中的文化”，其他所有文化都已经“作为西方文化自身形象的残迹，进入它的博物馆”(Baudrillard, 1975: 88 - 89)。为了理解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人们发展出许多的概念和分析，而它们的应用范围却都已经超出了最初产生它们的那块领域。为了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或非西方社会，有人尝试通过生产方式的观念(马克思主义)，有人尝试通过无意识的观念(精神分析)，而在布希亚看来，这些尝试都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西方思想自我偶像化(self-fetishization)”(Baudrillard, 1975: 50)的例证。简言之，它们体现了对于其研究主题的一种重大误解，即如布希亚所言，“误解了另一种文化的文化，对其自身也必定有所误解”(Baudrillard, 1975: 107)。要想重新前进，就“必须打破体现着所有西方形而上学的生产之镜”(Baudrillard, 1975: 47)。在布希亚看来，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告别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告别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这样的告别能推动人们就符号结构和先后出现的几种拟像秩序(orders of simulacra)做出一系列更为彻底的深思，与此相关的是分析沟通所带来的有欠体面的迷狂(obscene ecstasy)都会造成怎样的连带效果，这种迷狂是“所有信息与沟通网络之间持续的相互关联”的必然结果(Baudrillard, 1988a: 27)。正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说，在布希亚摆脱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转向对新的一种(第三种)拟像秩序的探求中，分析家们已经看出了一些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关注点(Poster, 1988; Best and Kellner, 1991; Smart, 1992)。[4]

布希亚的作品是否足以配得上“后现代”这个描述，已经酿发了诸多异议与争论。一方面，他的作品被归纳和评论为“后现代理论”，提供了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分析”(Best and Kellner, 1991)；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被说成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新式理论，是“反后现代主义”的(Gane, 1991b)。可以肯定的是，布希亚确实提供了一种在根本上有所不同的分析风格，在他的著作里，也有一些明显诉诸各种后现代形式的论述。但是，他的作品是否构成“后现代社会理论”(Kellner, 1988)，却是一个争

议良多的话题。布希亚晚近接受一些访谈,当被问及对自己被赋予的“关于后现代的理论家”或“后现代主义权威”的地位作何感想时,冷静而审慎地声明:“对于这种‘后现代’的阐释,我无能为力。”又说:“应该先问问,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是不是有什么意义,然后才能够说哪个人是后现代主义的权威”(Gane, 1993: 21, 157)。诸如此类的看法表明,布希亚对于自己“后现代”的名分充其量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有时候,他还表现出对后现代这个观念本身持有一种明确敌视的立场:“根本就没有什么后现代主义之类的东西……关于后现代主义所谈论的一切东西,都是在这个词存在之前就已经说起过的……一旦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个词并没有给我们增添什么新东西,那么最好就是对其不闻不问”(Gane, 1993: 22)。尽管如此,显然布希亚本人也发现,要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都对后现代不闻不问是很困难的,因为不仅在他的访谈答复中,而且在他其他的著作里,都有一些重要的地方提到了这个词。^[5]

在布希亚文化分析的研究路向里,后现代的观念当然还是有一席之地的。比如说,在“论虚无主义”的短论里,布希亚区分了“19 世纪的真正革命,现代性的真正革命,……表象的彻底消解,世界的除魅,屈从于解释的暴力、历史的暴力”,与“第二次革命,20 世纪的革命,后现代性的革命,这是意义之消解的巨大进程,堪比于此此前表象的消解”(Baudrillard, 1984b: 38—39)。布希亚提到,他所注意、接受、担当以及分析的,都是这第二次革命。与此类似,在此后的一次访谈里,布希亚撇清了自己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宣称“后现代里面颇有些让我感兴趣的東西……(尽管)我并不确切地了解一种后现代文化会是个什么样子”(Baudrillard, 1984a: 20)。但是,并不确切地了解一种后现代文化会是个什么样子,或许也不会妨碍布希亚在此后的作品里继续采用这个词。比如说,在早先一次会议上,布希亚讨论过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过度状况”(参看 Baudrillard, 1989b),当他后来对此深入阐发,并探讨“‘现代’……超越其自身限度的运动”之扩展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时,提到了“由处境本身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法则……各种体裁与各种社会性别的混融的法则(超越了政治、生理性别和审美)”,他明确指出,这个法则“我们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法则**”(Baudrillard, 1992a: 10, 黑体为引者所加)。布希亚所提出的观点是:我们正生活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解放运动的余波之中,“在狂欢之后”,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重温场景。他指出,我们生活“在各种理念、幻象、形象、梦境的无尽再生产之中,从今以后,这些东西还都将跟随着我们,我们必须去再生产出它们,不过得抱着一种致命的漠然(fatal indifference)”(Baudrillard, 1992b: 22)。这里的言外之意,就是现代性的失败,就是所有伟大理念的抽空:“进步依然在继续,但那种进步理念业已消逝。生产依然在继续,并且始终会越来越快,但作为财富之源的那种生产理念业已消失。这

就是所有伟大理念在所谓**后现代性**之下的庸常 (banal) 命运” (Baudrillard, 1992b: 236, 黑体为引者所加)。

布希亚所描绘的社会世界, 漠然、偶然、不定、自恋。在这个世界里, 实在的东西让位于摹拟、符码和超级现实。在这块领域里, 意义、意涵、讯息和所指“流通得如此迅速, 随时可能消失”。在这里, 传媒与信息的大量滋生直接导致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形成, 对于后者来说, 无为或中立的策略是惟一可能的反应。在这里, 在缺乏“确切形象”或世界之镜的情况下, 理论只能是“游来荡去, 傍依无定” (Baudrillard, 1984a)。正是这种处境, 这种试图“赖所余之物以为生”的处境, 这种“搬弄碎片”的处境, 被布希亚说成是后现代的。

无论将布希亚看成是一位后现代理论家是不是合适, 有一点不容争议: 在他关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兼具批判性与分析性的思考中, 已经有相当一批采用了后现代这一观念。因此, 人们很难接受他的声明, 说“自己与‘后现代主义毫无干系’” (Gane, 1991b: 158)。而对于“布希亚的**整个努力**就在于与后现代主义做斗争, 而**绝非拥戴后现代主义**”的评价 (Gane, 1991a: 55, 黑体为引者所加), 也同样令人难以苟同。布希亚就后现代主题所发表的见解, 远没有诸如此类的回答所承认或允许的来得明确。布希亚在对现代与后现代的观点方面, 远远谈不上始终如一。在讨论现代性主题的一篇文章里, 他指出, “在一个没有传统或者没有中世纪的国度里, 比如美国, 谈论现代性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Baudrillard, 1987: 64)。大约一年之后, 在一部更具实质分析色彩的著作里, 布希亚却屡次将美国说成是现代性的上佳范例, 而欧洲, 却为其过去、其传统所拖累, 只能是“非常不情愿地…… (迈向) 现代” (Baudrillard, 1988b: 97)。如我在上文所努力证明的那样, 在布希亚论及后现代的地方, 也能找到与此程度相仿的不相一致之处。不过, 诸如此类的见解依然未能彻底解决关于布希亚作为一位“后现代分析家”的名分问题, 这个问题即便可以彻底解决, 也不能只是通过从其作品文本和访谈回答中寻章摘句来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果说真有什么根本的依据, 可以将布希亚独具特色的分析路向视同一种后现代的观念, 那么这种依据或许就在于他努力发展一种替代性的理论概括形式, 一种作为挑战的理论, 即“致命理论” (fatal theory) (Smart, 1993b)。

自启蒙运动以来, 人们就接受了这样一种有关理论概括之目标的观念, 即理论可以体现实在的东西的真实。但在布希亚看来, 这种观念已经不再能够维持下去了。其原因就在于, 在拟像的推进态势之下, 一种独立的、外在的所指或客观现实已经不能享有任何特殊的地位诉求。在这种背景下, “实在的东西不仅就是可以被复制的东西, 而且**始终是已经被复制出来的东西**” (Baudrillard, 1983a: 146), 也就是说, 是一种“超级现实”的背景, 理论不再能够声称把握世界的任何客观性, 不再能

能够声称揭示任何深刻的真理,如此一来,理论能够“享有的地位无非就是挑战实在的东西”(Baudrillard, 1987: 125)。布希亚推想,“我们的‘社会’或许正在将社会范畴推向终结,正在将社会范畴埋葬在社会范畴的摹拟之下”(Baudrillard, 1983b: 67)。他又认为,理论也将发生相关的转型。有鉴于此,社会理论的目标也就出现了问题。布希亚的回答是主张,理论在今天的功能必然是“去诱引(*seduce*),将事物从它们的处境中抢夺出来,强使它们进入一种与实在的东西的存在状况不一致的多元存在(*over-existence*)”(Baudrillard, 1988a: 98)。理论必须摹仿它的对象与策略,成为一种“凭其自身而存在的事件”(Baudrillard, 1987: 127)。这个世界已没有更多的超验,因为“每一样东西都一览无余”。布希亚主张,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就必须用致命理论来代替批判理论。致命理论所构成的这种理论形式,将事物推向其极端,不仅如此,还刺激世界,使世界“更具客体性,讽喻性,诱引性,更为实在或不实在”(Baudrillard, 1988a: 54, 100)。甘恩反思了布希亚是如何在分析上应答了超级现实的摹拟秩序及其复杂效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不得不走入一种虚构理论”,走入“一种名分归属上的变化,从社会分析走向形而上学、伦理学、文学与诗学乃至文化批评的丰富融合”(Gane, 1991a: 194)。那么,布希亚作为一个理论家,又处在什么位置上呢?

名分归属的变化意味着彻底摆脱了主体哲学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鉴于世界一直在抗拒着自主主体的有序设计,所以布希亚提倡要颠覆关于主体显要地位的形而上学假设,转而承认——即便不是完全听命于——“就在那里静待我们的客观的讽喻……客体具有讽喻性的在场,它的漠然,它的那些漠然的关联,它的挑战,它的诱引,它对符号秩序的不服从”(Baudrillard, 1990a: 182)。简言之,理论是站到了客体的一方,但这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呢?——会超越辩证法,因为世界不再具有辩证的性质,但注定要导向极端,导向彻底的对抗,而不是调和与综合;要走向贝斯特与凯尔纳所谓的“后现代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已经舍弃了主体哲学,不再认为存在一种独立的实在,成为一种“充满了讽喻……并受到……荒诞玄学(*pataphysics*)的影响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Baudrillard, 1991: 129)。^[6]

布希亚在回答“为什么还需要有理论”这个问题时,已经指出,无论是反映实在的东西,还是“切入与实在的东西之间的一种批判否定性关系”,都已经不再能够成为理论的最终目标(Baudrillard, 1988a: 97)。理论不再能够从既存的事实中导出自身的合法性。理论的价值现在“不在于它可以启示的过去的事件,而在于它所预见的那些事件的冲击”(Baudrillard, 1990b: 215)。虚构理论刺激着世界更加极端,使自己远离所有的所指,只得意于未来,体现了一种最终可以视作后现代的缩影的观念,尽管体现的方式带有讽喻的味道。

16.3 后现代论题

16.3-1 反思性现代化

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与当代关于反思性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两者之间颇有些意味深长的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就是关于科技发展的矛盾性质,尤其是当“从科学的角度上,对于科学本身的固有基础和外在效果产生了怀疑情绪”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也就是说)……**它的真理诉求与它的启蒙诉求都被去神秘化了**”(Beck, 1992: 155, 黑体系原文所有)。不过话说回来,这里还是存在关键性的差异,尤其明显的是,贝克一方面非常有力地主张,风险的生产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个固有特征,正是科技发展本身,应该为风险生产的规模与程度的急剧增长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他最终却出人意料地拥护现代性规划的重生,指望通过引发一种替代性的科技实践,以自我控制和自我限制为取向,即便不能完全避免科技发展后果的不可预期性,也可能会有所缓解。但考虑到现代性各项制度的持存性,很难预想诸如此类的后果如何得以实现(Bauman, 1992b)。

现代科技“动力”有必要加以彻底的人本化,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认可。但是,根据吉登斯的说法(Giddens, 1990),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需要超越现代各项制度,需要前文所指明的那种质的转型,这种转型代表着潜在的后现代社会未来的维度之一。与此相反,对于贝克来讲,这样一种转型无异于一种“新型现代性”的兴起与发展,即一种富有前景的替代性科技实践的兴起与发展,这种实践被描绘成有潜力重振启蒙的活力,有助于现代性规划摆脱其“工业时代对科学与技术的僵化理解”(Beck, 1992: 157)的束缚。但不管怎么说,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取决于政治方面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表现为愈益失去权力,解除此前业已定型化的政治形式的束缚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化。其言下之意便是,随着一种“不同的现代化纪元”的发展,逐渐兴起了一种越来越去中心化的政治,它的显著特点是反思性、去分化以及弹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其他一些分析家把这一点说成是后现代的(Lash and Urry, 1987; Harvey, 1989; Soja, 1989)。

贝克令人信服地指出,现代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根源,“现代性规划需要得到急救,(因为)它让自身的种种异常扼制了生息”(Beck, 1992: 179-180)。但他接下来却出人意料地转向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规划以寻求彻底解决。贝克表现出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的立法性角色依然抱有认同和挚信,主张“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可以控制,都成为人类努力的产物,致歉的时代业已过去”(Beck, 1992: 234)。这种说法所体现出来的,无非是现代性的核心神话之一又被回收利用

了,对此我们可以说,被称之为“反思性现代化”的仍然是这样一种现实,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其中时,还是没有确定性或控制,而是偶变性,这种状况越来越被认为是现代性本身的必然后果(Giddens, 1990; Bauman, 1991)。现代性的悖论就在于,对于控制与秩序的追寻不断地揭示出种种在不同程度上依然无法控制的客体对象和作用机制,只要被我们视为现代性的生活形式还在大行其道,那有助于各种有效而充分的自我控制和自我限制形式的替代性科技实践所需要的前景就必然还是一种幻想。我们的生活有许多方面还远没有达到可以控制的程度。人类努力的产物既有可能超出计划、预期或欲望的限度,也有可能达不到这些限度。致歉的时代还在持续。现在的差异在于,在表达歉意的时候,时常是从直接或间接地诉诸风险计算与管理方面的“失误”来入手的。承认风险计算中的失误;被接受为风险计算时的合法依据的知识库存内部的变化乃至其本身的变化;未能充分和(或)适当地公布据信与行为的某种产品、过程或形式维系在一起的风险水平;以及蓄意隐瞒风险,这些都有助于提请人们注意,致歉的时代远未过去。

贝克主张,自我控制与自我限制必须“辅之以自我批判的机会”(Beck, 1992: 234)。但不管怎么说,所蕴含的机会似乎恰恰在于那些习惯上归之于现代科学实践的东西:“只有当医学对抗医学,核物理对抗核物理,人类遗传学对抗人类遗传学,或者是信息技术对抗信息技术,目前正在试管中孕育出来的未来才有可能为外在的世界所理解、所评估。让所有形式的自我批判都得以实现,……或许是预先探查出那些迟早会毁灭我们世界的错误的**惟一途径**”(Beck, 1992: 234)。自我批判已经被认为是现代科学实践的一项核心特征,就此而言,我们不是很清楚,贯彻贝克给出的建议如何就一定能够使我们的前景有所改善。不仅如此,这也绝不能够推出,“所有形式的”自我批判都将会防止错误的发生,因为彼此对抗的范式与反科学本身就不见得更能避免失误。

贝克指出,“专门职业与组织中批判的权利……应当是努力争取公共利益,并且为公共利益所保护”,“**自我批判的制度化**极其重要,因为在许多领域里,如果没有适当的**技术诀窍**,那么无论是风险,还是避免这些风险的替代性方法,都不能得以认识”(Beck, 1992: 234,黑体为引者所加)。不管怎么说,制度化的过程涉及到对于处在“可认识、可预测的模式”中的各种具体活动形式进行选择、组织与有序安排(Berger and Kellner, 1982: 110),这也就必然同时对其他活动形式进行了排斥、压制或非制度化。在某一个特定的共同体内,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上,被认为可接受的和(或)适当的自我批判,或者是被认为“适当的技术诀窍”,恰恰是一些有可能发生变异并富于争议的事情,通过这些事情,会有可能产生——或者没有可能产生——对于风险的存现、程度或水平的一种评价。对于批判权利的**制度保护**是一个必要的

因素,但其本身并不会缓解“专业人员或业务管理的主宰地位”(Beck, 1992: 234),而这种主宰地位的前提正是对于所谓“适当的诀窍”长久以来的垄断地位。要想做出富有见地的决策,还需要彻底开放获取信息的渠道。利奥塔在讨论伴随社会的计算机化而来的风险时,对这个问题做过简短的探讨(Lyotard, 1984)。更深入的探讨见于伊利赫,他讨论了整体上现代工业社会中遇到的种种负面效应和风险,以及具体层面上“衰落中的职业精神”所引发的问题,和与此相关的知识的垄断化(Smart, 1992)。

贝克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同意,人们必须“告别这样的观念,即行政机构与专家始终确切地了解或者至少是更好地了解,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并且认为需要有一种“专业技能的去垄断化”(Beck, 1994: 29),从而间接承认,他先对反思性现代化的讨论的确有一些局限。除此之外,还有姗姗来迟的对于“含混”的认识,这是在反思性现代化的余波中生活所必须的,鲍曼已经将这种状况认定为后现代(Bauman, 1991)。

16.3-2 关于现代性之终结的羸弱思想

布希亚关于当代文化的那些咄咄逼人的言论中内在的一些主题,重新出现在瓦蒂莫全面彻底地思考“晚期现代性”有关问题的更为连贯的尝试之中。比如说,布希亚(Baudrillard, 1984b)谈到了“关于透明性的虚无主义”(nihilism of transparency),“摹拟出来的万物之透明性”(simulated transparency of everything),以及理论上和批判上的任何基础皆付之阙如;而瓦蒂莫则深入研讨了尼采与海德格尔各自的著作,认为它们预示了社会分析与哲学分析的一种后现代形式,并提请人们注意“‘新的东西’这一范畴的消解”,历史作为一个一元过程的观念的终结,以及我们将现实视为一个“客观给定物”的认识的销蚀——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各种不同的“形象、解释与重构”的大量滋生,而后者又是由沟通媒介所产生的。瓦蒂莫把这些统统集拢在对“形而上学危机”的不懈深究之中。尽管如此,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点重要的差异:当布希亚最终似乎放弃了他对后现代的迷恋时,瓦蒂莫却力主“羸弱思想”(weak thought)、“实现了的虚无主义”以及“解释的伦理”的优点,用强有力的例证,揭示了采用一种后现代观念的切题性和重要性(Vattimo, 1988, 1992)。

在每一位“现代性考古学家”的作品里,都贯穿着对终结或揭启西方形而上学的关注,而在瓦蒂莫从“后现代”的立场上,对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社会思想与哲学思想的深入阐发中,上述关注也构成了一项核心主题。而由于所谓“进步性‘启蒙’越来越彻底地占有其自身的‘基础’”的观念主宰着现代性,不仅如此,现代性还“被界

定为征服的时代”(Vattimo, 1988: 2, 166), 有鉴于此, 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征服显然也就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述。只要我们仍然既是现代性的主体(subject of modernity), 又臣服于现代性(subject to modernity), 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替代性思想系统或语言, 可以借之征服现代性的种种失误; 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更为真实的替代性基础, 可以由此着手对西方思想及其所具有的基础、“稳定结构”和“坚实的确定性”发动批判。因此, 西方形而上学就不能“弃如敝屣, 因为它依然构成着我们的‘人性’……; 我们臣服于它, 我们从它那里寻求慰藉, 我们顺从于它, 拿它当一种注定落到我们身上的东西”(Vattimo, 1988: 52)。但是, 尽管我们没有能力抛弃我们的形而上学遗产, 我们与它的关系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型。后现代哲学开始应对“形而上学的失误, 体现为既非批判性的征服态度, 也不是恢复它、延长它的接受态度”(Vattimo, 1988: 173)。简言之, 后现代哲学体现出形而上学的逐渐削弱; 因此, 就出现了“羸弱思想”(il pensiero debole)的观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将这个观念说成是“后形而上学的”。

瓦蒂莫的羸弱思想观念还蕴含了一系列相关的观念, 即虚无主义、解释学和差异。在对形而上学真理的追问中, 居于核心的便是一种“实现了的虚无主义”。处在最高级的那些价值观念(我们的宏大叙事)已经丧失了合法性, 就此而言,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但不管怎么说, 这并不等于被其他享有特殊地位的叙事或价值观念所取代。在这一点上, 学者们已经诉诸对历史之终结和(或)现代性之终结的一种愈益增强的感受或经验。我们所认识的那种一元的、线性的历史已经被一系列多元的历史所取代; 现代性内在固有的那种进步观念已经世俗化, “进步被剥去了一种终极的目的, 世俗化消解了进步观念本身”(Vattimo, 1988: 8)。最终人们认识到, 一元历史的观念只是一种虚构, 一种叙说, 这样的认识提请人们注意到一些特定的修辞策略, 所有的历史都经由这些修辞策略而构成。世界其实已经成了一个虚构的寓言(fable)(Nietzsche, 1968)。

与世界转变为虚构寓言的过程关联在一起的, 是“现实”的削弱, 是单线历史感观念的消解, 是进步理念的瓦解以及一种必然的结果, 即作为一项规划的现代性行将终结的前景。瓦蒂莫警示人们(Vattimo, 1992), 这种转型过程并不仅限于理论与分析; 抑或相反, 随着被殖民民族各式各样的抵抗与反叛, 欧洲的诸项理念和假设所享有的霸权地位逐渐瓦解(“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终结”), 并且随着信息技术与电子传媒的成长(“沟通社会的到来”), 生存的状况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 生存状况的一些独特性质, “从体现为一种总体化的‘摹拟化’(simulacrization)的商业化, 到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崩溃, ……都

显示出一种可能出现的新的“人类经验”(Vattimo, 1988: 26), 一种有可能令人找不着北的经验, 即滋生出大量的世界观以及与此相关的多种解释“不可抗拒的多元化”, 在这种经验下, 关于信息传媒所产生的这种形象或摹拟与实在世界之间对应一致的假设, 也不再能够站得住脚了。瓦蒂莫指出: “可能表现为形式繁多的现实的信息越来越多, 使人们越来越难以设想一种单一的现实。也许, 在一个由大众传媒所组成的世界里……真实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虚构的寓言”(Vattimo, 1992: 7)——或者更恰当地讲, 是一系列的虚构寓言, 因为后形而上学的世界是一个由众多差异、众多解释组成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解释学成了“关于现代性及其圆满完成的思想”(Vattimo, 1992: 115)。

尽管我们可以把世界看作是彼此对抗和冲突的种种解释或差异的一个源泉, 但仍然很有必要认识到, 各种差异之间从一开始就在彼此调和, 并不是浑然不觉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只是以批判性的立场, 勾勒出话语和对话以一种怎样的方式, 往往会被“推入欧洲观念的领域”(Heidegger, 1971: 14), 而是认识到, 西方现代性的各种价值、假设、实践和制度的全球扩散, 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各种文化在根本上的异他性”这一观念本身也已经出现了问题。但不管怎么说, 即便说文化早已失去了它们的“真实性”, 它们也尚未在西方现代性的重压之下彻底消失; 相反,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系列混生形态”(Pieterse, 1994: 167)。用瓦蒂莫的话来讲, 我们体验到一种“混合现实”, “一种广泛蔓延的混杂状况”, “一处满是痕迹与残余的巨大的建筑工地”(Vattimo, 1988: 158—159)。瓦蒂莫提请人们注意, 现代性各项制度的扩散产生出种种复杂的后果, 尤其是提请人们注意到, 混生化(hybridization), 也就是各种全球性过程与地方性和(或)区域性实践、习惯及传统之间那些难以预期的关联模式。他就此得出结论, 认为“属于我们传统的那些文本……正在逐步失去它们作为典型的说服力, 成为满是痕迹与残余的巨大建筑工地的一部分, 就好像各种作为他者的文化在根本上的异他性这种状况被揭示为一种或许从未实现过的理念, 一种对于我们来讲当然不可能实现的理念”(Vattimo, 1988: 161)。而被人们认定为后现代之症候的, 正是这种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 对于现代的批判性反思已经开始侵蚀了以下观念, 即现代就是“其他所有价值皆以之为旨归的那个根本价值”(Vattimo, 1988: 99)。

像布希亚一样, 瓦蒂莫也对大众传媒所造成的影响给予了充分重视。实际上, 在促进世界观的大量繁生, 以及伴之而来的“中心化视角的消解, ……利奥塔称之为‘宏大叙事’的视角的消解”(Vattimo, 1992: 5)的方面, 手段多样的大众沟通的兴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观之, 此处所意味的信息与沟通方面的增长并未使得社会“更趋‘透明’, 而是更为复杂甚至更为混沌”(Vattimo, 1992: 4); 不过, 正是在在

这里,在让人迷失方向的过度混沌之中,瓦蒂莫似乎发现了“解放”的希望。这里所引出的解放观念尚待具体澄清;不过此处所蕴含的自由感却不能与经典的解放观念混为一谈,后者“与普遍项的命运有着紧密的关联”(Laclau, 1992: 132);与此相反,瓦蒂莫的解放概念却等同于从一种普遍现实的原则导出的自由,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讲,它指的是“差异的解放”。随着“一种居于核心地位的历史理性的观念”(Vattimo, 1992: 9)的瓦解,局部性的要素、理性和构成成分被重新发现、重新激活。在这种复杂的多元背景当中,瓦蒂莫认为会有可能出现一种“后现代”解放经验或机遇。人们认识到存在多种不同的文化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所有的生活形式,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形式,都突出地表现了一种鲜明的“历史性、偶变性与限定性”。认识到了这些,就有可能认识到存在一种机遇,可以成为不同的样子,如福柯所指出的,不同于我们目前之所是(Foucault, 1986b)。在这些情况下,解放就成为一种可能性,而造成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我们关于“归属与迷失”、关于熟悉与陌生的动摇不定的体验。而这种解放的可能性的实现与否,则取决于我们的反应,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回应它。我们是不是能够克服我们个人身上乃至集体性的“根深蒂固的寻求慰藉的恋乡情怀”,是不是能够正面地回应偶变性,“视其为一种(或许到最终)成为人的方式的机遇”(Vattimo, 1992: 11),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回答。这个问题困扰着属于现代的感觉,同时也刺激着属于后现代的理想(Heller and Fester, 1988; Bauman, 1991; Smart, 1993a)。

16.3-3 解放与伦理

在面对偶变性与含混性时,把它们当作无时不见、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特征,当作提供机遇而非显露失败的内在特性,这样的态度在鲍曼看来,正构成了后现代性的状况。于桑指出,对于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和布希亚之类所给出的分析,也许更合适的看法是认为它们为一种关于现代性的考古学作出了贡献,而不是提供了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理论;与此不同的是,鲍曼的著作则对当前的处境给予了批判性的诊断,包括坚持不懈地分析现代性的缺失(aporias),细致周全地考察了被认定为后现代的状况,据说我们如今已不得不与这些状况共处。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在他的作品里对后现代性有着直接而持续的探讨,但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将鲍曼界定为一位“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家,下面这段阐述即为明证:“后现代的现实……在后现代主义者的叙述里,只能找到苍白、片面和极度扭曲的反映”(Bauman, 1998: 101)。置身于后现代的状况之下,鲍曼力求采取一种批判性的分析策略,旨在“让模糊的成为透明的……揭示那些将可见的个体生平与不可见的社会过程维系

在一起的纽带,……(以及)搞清楚是什么推动着社会发挥作用,目的就是为了让社会以一种更具‘解放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如果可能的话”(Bauman, 1992a: 111)。尽管诸如此类的目标似乎比较切合社会学研究中一种确立已久的批判传统,但需要分析的焦点仍必须对准我们目前所遭遇的业已发生转变的情势,对准可能有的新的研究对象,以及以下方面之间的复杂关联:为了回应具有显著不同的各种社会状况,并在这些状况的背景下,出现的种种行为风格与模式,产生的种种经验、理解和形式说明。鲍曼认定后现代性同时是“充满机遇的场所与充满危险的场所”(Bauman, 1991: 262),他兼具伦理与政治维度的对于现时的反思性、批判性诊断,提供了对于现代思想、状况与雄心的一种批判,并把强调的重点放在道德自我和道德责任,认为对于“后现代性中一种真正具有解放意味的机会”(Bauman, 1997: 33)而言,道德自我与道德责任居于核心地位。

现代性中的种种矛盾,具体而言,便是含混与不确定,失序与无组织,这些都已经被越来越被认为是现代对秩序的追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一向形影相随的现代思想与立法雄心的种种欠缺;道德主体与道德行为所造成的复杂的社会政治后果——对于所有这些矛盾的认定,都是鲍曼分析中突出的关注点。他指明了现代规划中的限制与局限,与此相关的是认识到,“各个现代权威机构,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科学方面的,从它们的种种有序努力中,却未能生发出一个摆脱了含混性的世界,一个由理性选择构成的透明世界”(Bauman, 1991: 230),原因并不在于失误或设计上的缺陷,而在于现代规划本身内在固有的矛盾。鲍曼进而深入探究了,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增进“社会生活的‘道德化’”(Bauman, 1997: 3)的机会,究竟具有怎样的前景。

通过诉诸现代理性的计算性和立法性特征,我们已经看清了许多困境与难题。鲍曼如实记叙了这些困境与难题,指出我们发现自己“重新回到我们古老的道德感与同胞情的根源——就我们之共同存在的方方面面而言——并以此指引着我们日常的道德选择”(Bauman, 1995: 287)。现代对于普遍规则和无可置疑的基础的追求并未彻底解决种种不确定性:恰恰相反,人们现在认为这项使命本身就是被错误引导的,充其量不过是证明,在实践中不可能实现一种“无所欠缺、无所含混的道德,一种普遍的、‘客观确立的’伦理”(Bauman, 1993: 10)。在这一点上,鲍曼借鉴了伦理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作品(Levinas, 1988, 1989; 也可参见 Levinas and Kearney, 1986),进一步从以下角度勾勒了我们现在遭遇到的复杂伦理状况的独特性质。据他主张,道德的含混性是人类的一种构成性特征,因而就道德行为而言,不可能有任何确定的根据。道德现象被说成是“本质上‘与理性无涉的’(non-rational)”,而道德则是“具有难以补救的缺陷”,“无法普遍化”,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正视晚期现代

伦理—政治生活中“难以补救的含混性”，促使鲍曼(Bauman, 1993)探讨“后现代伦理”，探讨道德上有责任能力的自我之获得解放的前景。在鲍曼所描述的所谓“后现代”状况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伦理的困惑与不确定并不算一种虽略有些不便的例证，展现在适当的时候将会得以解决的现代失误；相反，诸如此类的特征始终存在，并构成让人困扰的情境，而操习道德选择与责任的机会正是从这种情境下产生出来的。普遍化、立法性的现代道德规划原本承诺，要“用得到社会支持的伦理准则”来取代“捉摸不定、难以信赖的道德冲动”，但这种规划即便不是已经彻底失去了信誉，现在也是一片混乱，而自我则“发现自身独自面对道德困境，全无好的选择（更不用说显而易见的选择），面对不曾解决的道德冲突，以及要成为有道德的人就必须面对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困难”(Bauman, 1993: 248 - 249)。后现代解放的机会，正在于自我如何回应的方式里。后现代的“解放”需要我们放弃“喋喋不休地死抱着关于普遍性、确定性与透明性的希望（或决心）”(Bauman, 1991: 234)，适应不确定性与困惑，直面含混性与偶变性，视之为无法逃避的日常生活特征。接受了“作为命运的偶变性”，就有可能设定并操习道德责任：它促进了接受他者、敬重他者并团结他者的前景，不是把这些作为有待确保的成就，而是作为始终不确定并可能不稳定的与解放之间的种种后现代关系。

16.4 结语：后现代性之后的理论阐述

围绕着富于争议的后现代社会思想与哲学思想观念所发展起来的讨论，有一些颇令人好奇的性质，其中之一便是：与后现代观念最脱不开干系的那些分析家，却或许最好是将其描述为犹疑不决的参与者。实际上，后现代理论或后现代社会思想与哲学思想的观念似乎更多地受惠于备受困扰的批评家们莫大的兴趣与基本的权力，而不是已经被赋予暧昧不清的“后现代”地位的那些分析家各自的著作中，某种始终共享的、具有独特创新性的理论策略或规划。这种说法并不是要否认，在利奥塔、布希亚、瓦蒂莫和鲍曼的作品里，后现代都是一项关键议题：更准确地说，它是要去追问这些人各自的作品都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它是要提出下述问题：将这样一些分析家说成是“后现代”的，从哪些方面来说——如果有的话——在分析上是合适的和(或)富有启发的？

现代性的规定性特征之一便是其反思性。反思性不仅仅限于日常社会生活，例行性的社会实践，平凡的思想形式和行动形式，或是“非思想性”的实践：恰恰相反，可以说正是在抽象的社会分析与哲学分析的实践背景下，反思变得最为明确，并转向现代性本身。在吉登斯笔下“完全是通过反思性应用的知识而得以构成”

(Giddens, 1990: 39)的那个世界里,要想彻底地区分出哪些是表现(社会知识),哪些是社会现实(所分析的那些过程与背景),即便不说是不可可能,也是越来越困难了。社会知识与社会现实之间是一种互为循环的关系,事实上,社会知识构成了一种源泉,不可避免也不可预期地推动着所分析的社会背景的转变。这就意味着,知识必然总是要得到修改,从而不再以确定性为典型特征。^[7]由于反思本身的性质已经被交付反思,它也就越来越难以确定了。而前文所探讨的这些分析家,他们的作品正是属于这种复杂的背景;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现代规划的核心假设、实践与后果的批判性反思,已经促使人们更加注意西方而上学中存在问题的性质,同时也推动了一种广泛共识;我们正在遭遇着现代性的尾声或终结,而这种理解是作为偶变性来体验或经历的。

在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希亚、瓦蒂莫以及鲍曼等人对现代性所做的分析当中,通过一种“全盘的反思性”,种种现代思想形式与政治形式中内在的那些假设都受到了质疑与挑战,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种“全盘的反思性”将特定的一系列分析主题与政治信念不当作单纯给定的、毋庸置疑的或是享有特殊地位的东西。最主要的是,这些分析家在自己的分析实践中就体现出一种彻底的反思性。他们将内在于现代分析形式的各种复杂假设、观念和步骤,都交付一种坚持不懈的批判性反思来处理。有鉴于这一事实,他们各自的介入措施都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性态度”(Foucault, 1986c)的复苏——即便不说是激进化——做出了显著贡献,虽说也引发了许多争议。正是针对这种实践,即对被广为接受的那些观念、形式和假设做出带有根本反思性的分析上的挑战,利奥塔祭出了后现代这一观念,主张该观念无疑构成了现代的一部分,体现出现代的新生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始终存在的”(Lyotard, 1984: 79)。鲍曼也曾以相类似的方式指出:“后现代性就是步入成年的现代性……对自己之所见不是完全满意,觉出有改变的冲动。后现代性就是开始面对自身之不可能性的现代性,就是一种自我监控的现代性,对自己曾经不自觉地做过的事情会自觉地抱以蔑视”(Bauman, 1991: 272)。这样来阐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关系,会有效地使那些认为后现代就是对现代的取代或超越的陈腐观念不再为人所信;尽管如此,事情还没有完。

在以现代 / 后现代这一丛结为核心而发展起来的争论过程中,已经表达出了许多关注,其中之一便是关于批判性思想与政治的前景。无论是对于现代社会思想,还是对于与之相关的假设,就是说在理论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决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都出现了批判性的质询;有鉴于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开始重新考虑有多大可能采取批判立场、不人云亦云、表明自己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绝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考虑或关注,它们只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

式,与社会思想在这整个世纪里一起并肩发展,而在社会分析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它们还表现得尤为突出。^[8]而今天的差异在于:在一些认识论方面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发展之下,陷入被质疑的局面的,并不仅仅是现代激进社会思想与政治的具体哪一股支脉,而且包括现代盛行的种种进步主义话语本身(Jay, 1988)。缺乏某种有利的认识论立足点,可以基于这种立足点而提出对总体性知识的令人信服的诉求;表现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危机,后者不仅体现在认识论与美学的有关问题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利益’的政治表达”上(Boyne and Rattansi, 1990: 13);出现“对抗的多重化”以及社会政治斗争的多重化,这其实是“规范认识论”和“普遍话语”的时代终结所造成的必然结果(Laclau and Mouffe, 1985);再加上合乎惯例并被普遍化了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及其相关的立法性策略等趋于瓦解,伴随而来的便是强调更具专门性的知识分子角色及其相关的解释性策略(Bauman, 1987)——以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销蚀了旧有的确定性,或者说揭示出它们只不过是——或许一向都是——关于某些分析立场和政治立场享有特殊地位的毫无根据的假设的产物。

从现代 / 后现代之丛结的争论中明显表现出,“从一种超验秩序中也没有生发出任何更让人确信的基础”(Laclau and Mouffe, 1985: 187),从而使得伦理信念与政治信念都只能在形而上学当中找到虚假的慰藉(Bernstein, 1991)。随着反思的权力应用到现代反思自身的过程当中,那些古老的确定性也就真的崩溃了。这个世界上的社会理论与分析不再能够以某种可信性,为政治实践和伦理决策提供立法性的担保。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我们发现自己无所适从。但这既不意味着理论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对于政治与伦理的一种批判性分析旨趣的终结。恰恰相反,政治责任与伦理决策的有关问题,在表达与追求自我利益和促进与充分提供公共领域之间做裁断时的困难,以及日常社会生活中做出选择或采取立场时所遇到的问题,从分析的角度上来讲,这些都变得更为重要;也正是在这个广泛的富于争议的背景中,各种反思性的社会理论概括方式开始占据了更显著的位置。即如鲍曼所言,重大的伦理议题和政治议题,“比如人权,社会正义,和平合作与个人自我决断之间的均衡,个人行为与集体福祉之间的协调——这些都丝毫不曾丧失其主题性”(Bauman, 1993: 4)。发生重大改变的,是背景,是种种状况——社会状况、政治状况、文化状况、经济状况以及思想状况,这些复杂的议题就是从这里生发出来并需要得到探讨的。诸如此类的理论概括形式的宗旨并不是要提供立法性的方案,试图实现将“他者”同化入“同一”,而在于培植“解释与重新解释”(Bauman, 1992a)的自我反思过程。尽管认识到,多元主义,即“种种传统、视角、哲学取向的多元聚合”(Bernstein, 1991: 329),正是鲍曼所谓我们的“后现代居所”(postmodern habitat)的一个基本特

性,但这些自我反思过程却还是把培育不同的、有时是具有根本不同的旨趣、传统、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对话,乃至共同面临的理解与对话,作为自己永无止境的任务,作为一项必要的前提,以求构成一种负责任的主体性,有助于培植“自我”与“他者”之间宽容与团结的关系。

注释

[1] 一直以来,社会学话语的反思的特征之一,就是以不同的形式来再现米尔斯所提出的总体批评意见。例如 Stein and Vidich 有关社会学丧失其“批判意识”的评论(1963);霍罗维茨的观点“从 1940 年到 1960 年这过去 20 年美国社会学的普遍趋向已经将这门学科推入了死胡同”(Horowitz ed., 1965:3);古尔德纳提请人们警惕社会学中一场日渐深重的危机,提倡一种彻底贯彻反思性的社会学(Gouldner, 1972);吉登斯提供的看法,认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社会理论的传统源泉让我们对此毫无准备——尤其是那些与自由主义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维系在一起的社会理论形式”(Giddens, 1987:166);卡斯泰尔在概括有关当代种种变迁过程所带来的眩晕体验的看法时语焉不详的评论,即“直接或间接地生产了我们依然用来思考——不充分地思考——我们世界的那些范畴的宏大理论……业已证明完全过时了”(Castells, 1992:94—95)。社会学已经陷入了立法角色之困局,有一系列相关的努力试图通过借鉴并吸收“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的‘解释学’主题和灵感”(Bauman, 1988:229),将社会学拯救出这一困局,指出了一种方向不同的探究前景,将分析的重点放在“社会意义的共享世界,社会行动通过它……生产出来并得到解释”(Filmer et al., 1972:4)。正是在社会学研究中这些解释性模式的发展当中,鲍曼随后捕捉到了一种后现代社会学的可能性(Bauman, 1988)。这种形式的社会学力求促进多重复合的传统与共同体之间的沟通与传译。

[2]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代研究和分析形式的激进质疑并不限于以上这些人物,也不仅仅限于后 1968 的法国社会哲学话语。例如,在哲学(Rorty, 1991)、人类学(Rabinow, 1986; Tyler, 1986)、文学批评(Hassan, 1987)、政治学(Derian and Shapiro, 1989)以及社会学(Denzin, 1986)中,现代的研究途径已经受到了形形色色后现代介入形式的影响。

[3] 本段译自法文原文:“parce qu’ elle n’ a jamais concerné seulement des contenus de sens, la déconstruction devrait ne pas être separable de cette problematique politico-institutionnelle et requérir un questionnement nouveau sur la responsabilité, un questionnement qui ne se fie plus necessairement aux codes hérités du politique ou de l’ éthique.”

[4] 布希亚最初区分了三种拟像秩序:

- (1) 基于价值的自然法则的仿制(counterfeit)秩序——“仿制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时代的所谓‘古典’时期的主导图式”;
- (2) 基于价值的商业法则的系列生产——“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导图式”;





(3) 基于价值的结构法则的运算摹拟(operational simulation)——“摹拟是符码控制的现行阶段的主宰图式”(Baudrillard, 1983a:83)。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布希亚又添上了一种“拟像的微观物理学的新粒子”,也就是第四种拟像秩序,对应于“价值的分形阶段(fractal stage)”。在第三种秩序里,“符码与价值参照某种模型聚合体而展开自身”,而在第四种秩序里,根本就没有所指(Baudrillard, 1992a:15)。

[5] 例如可以参看以下有关后现代主义 / 后现代性的论述(Baudrillard, 1984a, 1984b, 1989b, 1990b, 1992a, 1992b)。

[6] 布希亚将“荒诞玄学”说成是一种“关于想像性解答的科学,是对于一个精确、真实、客观的世界及其普遍法则的摹拟或超级摹拟”(Baudrillard, 1983b:33—34)。


[7] 吉登斯深入阐述了现代性的反思性,指出“关键并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可以去了解,而在于关于那个世界的知识赋予了它不稳定或可变幻的特征”(Giddens, 1990:45)。这或许不能准确地表达吉登斯期望在这方面提出的观点,但却是他有关现代性之难以驾驭性的分析所必然导致的结论之一。鲍曼所描述的后现代性,正是这些复杂聚合的不确定性,偶变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于这些东西的无处不在的自我意识(Bauman, 1991)。

[8] 詹明信(Jameson, 1984, 1988, 1989, 1991)与哈维(Harvey, 1989)各自分析了现代生活形式如何受到种种变迁过程的影响,提供了适当的当代例证,以体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如何始终还在探讨批判性思想与激进政治学的前景。詹明信坚信,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当中”(Jameson, 1984: 63),承认“过去在谈论文化与政治时合用的”那些语言“在这一历史时刻似乎真的不合用了”,从而似乎认可了理论创新和发展的需要(与 Stephanson 的谈话, Stephanson, 1988: 12—13)。尽管如此,通观詹明信的著作,在实践当中,仍有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上与政治上的框架和语汇的认同延续不断,未受质疑。尽管哈维认识到存在一种危险,“我们的心智地图将配不上目前的现实”(Harvey, 1989:305),但在他的作品,却明显体现出很不情愿反思后现代状况对于马派分析与政治可能具有的意涵。

参考文献

- Baudrillard, J.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St. Louis: Telos Press.
——1983a: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 (e).
——1983b: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New York: Semiotext (e).
——1984a: Game with vestiges. *On The Beach*, No. 5, 19—25.
——1984b: On nihilism. *On The Beach*, No. 6, 38—39.
——1987: *Forget Foucault*. New York: Semiotext (e).

- 1988a: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Semiotext (e).
- 1988b: *America*. London: Verso.
- 1989a: Politics of seduction. Interview in *Marxism Today*, January, 54—55.
- 1989b: The anorexic ruins. In D. Kamper and C. Wulf (eds.) *Looking Back on the End of the World*. New York: Semiotext (e).
- 1990a: *Fatal Strategies*. New York: Semiotext (e).
- 1990b: *Cool Memories*. London: Verso.
- 1992a: Transpolitics, transexuality, transaesthetics. In W. Stearns and W. Chaloupka (eds.) *Jean Baudrillard: The Disappearance of Art an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 1992b: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Utopia. In W. Stearns and W. Chaloupka (eds.) *Jean Baudrillard: The Disappearance of Art an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 Bauman, Z.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88: Is there a postmodern sociolog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2—3), 217.
- 1991: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2a: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1992b: The solution as problem.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November 13.
- 1993: *Postmoder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 1995: *Life in Fragments—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Oxford: Blackwell.
- 1997: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Oxford: Blackwell.
- 1998: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1994: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U. Beck, A. Giddens, and S.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njamin, A. (ed.) 1989: *The Lyotard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 Berger, B. and Kellner, H. 1982: *Sociology Reinterpreted—An Essay on Method and Voc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erman, M. 1992: Why modernism still matters. In S. Lash and J. Friedman (eds.)

-  *Modernity and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Bernstein, R. J. 1991: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st, S. and Kellner, D. 1991: *Postmodern Theory—Critical Interrog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Boyne, R. and Rattansi, A. 1990: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In R. Boyne and A. Rattansi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 Callinicos, A. 1989: *Against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astells, M. 1996: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1992: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Socialism of the Future*, 1(1), 86—96.
- Denzin, N. K. 1986: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4(2), 194—204.
- Derian, J. D. and Shapiro, M. J. (eds.) 1989: *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Derrida, J. 1967: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1982: *Posi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4: MOCHLOS ou le conflit des facultes. *Philosophie*, 2, 21—53.
- 1986: But beyond . . . (open letter to Anne McClintock and Rob Nixon). *Critical Inquiry*, No. 13, 155—170.
- 1994: *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Filmer, P. et al. 1972: *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 Foucault, M.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80: Truth and power. In C. Gordon (ed.) *Power/ 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y Michel Foucault*. Brighton: Harvester.
- 1986a: Kant on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15(1), 88—94.
- 1986b: 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 an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 In P.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86c: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88: The concern for truth. In L. D. Kritzman (ed.) *Michel Foucault ?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Gane, M. 1991a: *Baudrillard—Critical and Fat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1991b: *Baudrillard's Bestiary—Baudrillard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ed.) 1993: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London: Routledge.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etz, A. 1989: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Verso.
- Gouldner, A. 1972: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 Habermas, J.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ll, S. and Jaques, M. (eds.) 1989: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 Hassan, I. 1987: Pluralism in postmodern perspective. In M. Calinescu and D. Fokkema (eds.) *Exploring Postmodern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eidegger, M. 1971: *On the Way to Language*. London: Harper and Row.
- Hekman, S. 1990: *Gender and Knowledge: Elements of a Postmodern Femi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ller, A. and Feher, E. 1988: *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orowitz, I. (ed.) 1965: *The New Sociology: Essays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Theory in Honor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y, D. 1988: Foucault: modern or postmodern? In J. Arac (ed.) *After Foucault—Humanistic Knowledge, Postmodern Challenges*.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Huyssen, A. 1984: Mapping the postmoder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3, 5—52.
- Illich, I. 1978: *The Right to Useful Unemployment: and its Professional Enemies*. London: Marion Boyers.
- 1985: *Tools for Conviviality*. London: Marion Boyers.
- Jameson, F.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 *Left Review*, 146, 53—92.
- 1988: Cognitive mapping.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 1989: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No. 176.
-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Jay, M. 1988: *Fin-de-Siècle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amuf, P. (ed.) 1991: *A Derrida Reader—Between the Blind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Kellner, D. 1988: Postmodernism as social theory: som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2?), 239—269.
- 1989: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roker, A. Kroker, M. and Cook, D. 1989: *Panic Encyclopedia: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the Postmodern Scene*. London: Macmillan.
- Laclau, E. 1992: Beyond emancip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3(3), 121—137.
- and Mouffe, C.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 Lash, S. and Urry, J. 1987: *The End of Organis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emert, C. 1990: The uses of French structuralism in sociology. In G. Ritzer (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vinas, E. 1988: The paradox of morality: an interview. In R. Bernasconi and D. Wood (eds.) *The Provocation of Levinas: Rethinking the Other*. London: Routledge.
- 1989: *The Levinas Reader*. Ed. Sean Hand. Oxford: Blackwell.
- and Kearney, R. 1986: Dialogue with Emmanuel Levinas. In R. A. Cohen (ed.) *Face to Face with Levina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i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88a: *The Differend—Phrases in Dispu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88b: Interview.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2—3).
- 1989: Complexity and the sublime. In L. Appignanesi (ed.) *Postmodernism: ICA Documents*.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1991: *The Inhuman—Reflections on T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2: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to Children—Correspondence 1982—1985*.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 1993: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UCL Press.
- and Thebaud, J.-L. 1985: *Just Gam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ills, C. Wright 1970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Nietzsche, F. 1968: *Twilight of the Idol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Norris, C. 1982: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 Pieterse, J. N. 1994: Globalisation as hybridis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9(2), 161—184.
- Poster, M. (ed.) 1988: *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abinow, P.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ichters, A. 1988: Modernity—postmodernity controversies: Habermas and Foucault.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4), 611—643.
- Rojek, C. and Turner, B. 1998: *The Politics of Jean-François Lyotard—Justice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Rorty, R. 1991: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th, G. 1987: Rationalization in 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 in S. Whimster and S. Lash (eds.) *Max Weber, 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London: Allen Lane.
- Schirmacher, W. 1984: The end of metaphysics—what does this mea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3(3), 603—609.



- Smart, B. 1990: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the present. In B. S. Turner (ed.)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Sage.
- 1992: *Modern Conditions, Postmodern Controversies*. London: Routledge.
- 1993a: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1993b: Europe/America? Baudrillard's fatal comparison. In B. Turner and C. Rojek (eds.) *Forget Baudrillard?* London: Routledge.
- 1995: The subject of responsibil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1(4).
- Soja, E.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 Stauth, G. and Turner, B. S. 1988: *Nietzsche's Dance*. Oxford: Blackwell.
- Stein, M. and Vidich, A. (eds.) 1963: *Sociology on Trial*.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tephanson, A. 1988: Regarding postmodernism—a conversation with Fredric Jameson. In A. Ross (ed.)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yler, S. A. 1986: Post-modern ethnography: 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ttimo, G. 1988: *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2: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第17章 普通身体社会学概述



B. 特纳

特纳(Bryan S. Turner)是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曾先后在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1982—1987)、荷兰乌得勒支大学(1987—1990)、埃塞克斯大学(1990—1993)以及迪金大学(1993—1998)担任教授。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身体社会学(尤其是老年化与代际传承角度)、政治社会学(尤其是公民身份与自愿团体角度)以及宗教社会学(尤其是伊斯兰教与东方主义角度)。他与费瑟斯通合编有《身体与社会》(*Body & Society*)杂志,并任《公民身份研究》(*Citizenship Studies*)杂志主编。他与罗杰克(Chris Rojek)合编有《利奥塔的政治学》(1998),并编有《马克斯·韦伯评论集》(1999)和《塔尔科特·帕森斯读本》(Blackwell,1999)。

- 17.1 引介
- 17.2 探求身体社会学研究规划
- 17.3 当代身体社会学研究领域
- 17.4 身体社会学
- 17.5 身体体现、政治和社会
- 17.6 结语:身体和人权





17.1 引介

本章我的目的是要将身体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联系到更广泛的对于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关注,特别是把有关人权的研究定位在身体体现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mbodiment)中(Turner, 1993, 1997a)。分析上的目标是要通过纵览晚近身体社会学,摸索出一种身体体现伦理学。推动本章写作的,还包括对于社会学中晚近一些我称之为“华而不实”的发展趋势的批评。大多数现代社会学都可以看作是华而不实的,因为撇开别的缺陷不谈,它仅仅是对有关身体的文化表现做了描述,从而未能涉及身体的政治学,比如有关酷刑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有关“活生生的身体”的社会学和现象学,身体政治学,身体体现伦理学,这几个领域相互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本章作为对华而不实的社会学的一个批评,带有论辩的性质,因为我想要捍卫一种奠基性的身体社会学的观念,它将使我们能够处理人类的一些重大话题(衰老、死亡、暴力、苦痛和酷刑)和重大情感,比如爱与恨。在这个意义上,斯嘉莉的《苦痛中的身体》(Scarry, 1985)可谓一种充实的身体社会学的典范。

这种奠基性理论具有三个核心要素:作为人,我们的特征是本体性脆弱(ontological frailty);作为社会存在,我们居住的世界从政治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安定的。尽管我先要谈的是本体性脆弱的话题,但同时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始终是、已经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人具有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特性,这是一种既存的社会现实,是它生产出我们,也束缚着我们。这一理论框架来源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Heidegger, 1958),格伦的哲学人类学(Gehlen, 1980),以及伯格与勒克曼的知识社会学(Berger and Luckmann, 1966)。本章一方面对当代身体社会学做了整体概览,同时也发展了一种奠基性视角,对有关身体的所谓结构主义解释或反人本主义解释提出了批评,但不是批评它们原有的意图,而是批评它们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根据的是那些据称受福柯作品启发的社会理论(Jones and Porter, 1994)。

17.2 探求身体社会学研究规划

为了批判华而不实的社会学的描述性本质,为有关身体的研究准备好一种框架,我来简要地评述一下当代背景下的身体社会学。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里,特别是在有关现代文化的社会学里,10年、20年之前,身体这项主

题还是全面而严重地被忽视的。但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慢慢开始出现一小批著作,既把身体问题化,成为社会理论的组成要素,同时也认识到身体是当代政治和文化中的一项重大话题。对于身体社会学的兴趣之所以开始兴起,其社会背景包括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围绕试管受精的医疗新技术而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虚拟现实的有关技术的发展,电子人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军事和工业的目的以及消费文化中一种身体美学的发展。在社会学家这方面,对于身体的兴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以这样一些著作为标志:奥尼尔的《五种身体》(O' Neill, 1985)和《沟通性身体》(O' Neill, 1989),巴克尔的《弱小的私人身体》(Barker, 1984),阿姆斯特朗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Armstrong, 1983),约翰逊的《身体》(Johnson, 1983)以及布赖恩·特纳的《身体与社会》(Turner, 1984)。而费赫主编的《人类身体史话》(Feher, 1989),就是 80 年代这方面学术研究质量的一个体现。

影响这些研究的理论传统和哲学传统可谓多种多样,但在有关身体的整体性分析的发展当中,福柯的研究(Foucault, 1981, 1987, 1988)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Peterson and Bunton, 1997)。从空间与身体,欲望与性本性,古典希腊罗马时期的快乐,基督教会中的纪律实践,到国家及其局部机器(local apparatus)的调控作用,关注这些领域的整个一代研究者,都受到了福柯对医学、纪律和身体的研究的启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彼此各异的研究趋向依然集中在与医学和权力有关,特别是与社会医疗有关的事项上(Porter, 1997)。

福柯研究了监禁社会中的身体纪律,与这种视角形成对比的是,社会理论还借鉴了舒茨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1962)的现象学视角,只是借鉴的程度不那么严重。不过,应该认为,对于身体现象学的关注,正是对于理解日常生活世界和生活关联(life-nexus)的更为广泛的关注所引起的,而对于后者的有关研究影响深远的,则是海德格尔对存在之形而上学的批判(Dreyfus, 1991),胡塞尔对笛卡尔哲学的评论(Husserl, 1991),以及狄尔泰哲学中“生活关联”概念(Lebenszusammenhang)的类似发展。至于胡塞尔、海德格尔、福柯与有关身体体现的社会分析的发展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尚有待充分的探究与理解。在德国社会哲学中,对于身体的关注还是历史主义危机所留下来的,在历史主义危机之后,开始转向生命体验(Erlebnis)的概念(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直观把握和感觉),将此概念作为一个可以把握的基点。日常世界之所以可以被理解,是通过一些想当然的假设,现象学就是试图理解和揭启这些假设;而当代对于身体的关注则密切联系着从后现代立场出发,对社会理论中普遍主义抽象的反感,从而也就关注专门性、局部性、小范围以及作为自我之定位的具体日常世界。由此观之,如我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后现代社会

理论的特征之一就是试图综合现象学、解释本体论和文化人类学，瓦蒂莫的《现代性之终结》(Vattimo, 1988)和《差异的历险》(Vattimo, 1993)即为例证。

显然，我们已经不能再说身体在社会理论中的不在场了，在社会科学中形形色色的分领域里，都已经出现了大量有关身体的著述。至于关于身体的社会学分析，现在更始终受到有关日常世界的社会学分析的保障，后者系统地启迪了关于社会性别、健康和衰老的研究(Nettleton and Watson, 1998)。我们还可以很有根据地指出，身体社会学已经深深影响了情感和社会结构方面研究兴趣在晚近的回升(Barbalet, 1998)。尽管在涂尔干和莫斯的作品里，就已经对情感的社会学意涵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大体而言，身体体现和情感在经典社会学里是被忽视的。近来对自我观念、身体体现和情感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兴趣，可以看作属于对身体社会学的一种更广泛的兴趣。

《身体与社会》杂志创办于1995年，从以下方面确定了新的身体研究规划的范围：身体的符号意涵；身体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组织过程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后者对身体的影响；围绕各类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范畴所产生的身体体现的分化；发达信息社会里技术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年龄与衰老的社会学；有关身体的健康、病患、幸福和舒适的议题，这些在医学社会学领域里都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研究如何系统地安排身体的锻炼、培养和发展，作为体育运动中的一种规划。此外，《身体与社会》杂志还指出了正在兴起的身体社会学具有以下这些重大理论主题：对围绕身体体现的一些分析主题的深入探讨；身体体现如何融入有关行动、互动、交换和交互性的社会学中的一些根本范畴；就日常世界以及身体体现在日常生活互动情境中的位置，发展一种基础性的现象学；最后，是深入细致地理解人类身体体现的历史。出于一些再明显不过的原因，社会学家一直忽视了身体在社会中位置的历史变迁。与此相反，塞内特在《肉体与石头》中，结合政治理论和各项制度，出色地阐释了城市空间和人工环境中的身体的历史，为社会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一座里程碑(Sennett, 1994)。

本章之所以力图对身体社会学的研究制定出一套明确的方案，是因为认定，如果没有一套充分的研究规划和分析方案，身体社会学将成为社会学时尚中又一段短暂流过的时期。我在以往一些著述里(Turner, 1992, 1994, 1997a-c, 1998a)，已经努力勾勒了身体社会学所面临的首要的研究焦点和分析困境，这将使社会学家能够更清晰地区分身体体现、身体和身体形象。尽管有这些纲领性的阐述，社会学还尚未形成一套连贯而全面的身体理论，能够处理与社会和各种人类身体体现模式有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而本章的这种探讨，也只是为勾勒诸如此类的全面理论有可能涉及的领域提供了另一个讨论基础。

17.3 当代身体社会学研究领域

目前,身体社会学在以下三块经验领域里有很大的发展:身体的文化表现的政治学;性本性、社会性别和身体;健康与病患中的身体。在第一个方面,晚近有关身体的大量研究已经切入了表现方面的主题,考察身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隐喻所具有的符号意涵。对于身体的表现特征的研究主导了文化人类学的大部分传统,其中,道格拉斯在《纯洁与危险》(Douglas, 1966)和《自然象征》(Douglas, 1970)中的有关研究,为围绕着身体各个孔口的危险和风险创造了一种学术研究的范式。身体被解释成一种载体,表现了围绕社会生活中一些过渡点所产生的危险。因此,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里,五官感觉就是灵魂的门窗,危险可以由此进入,威胁到个人的精神存在;捍卫这些开口也就很重要了。嘴是一扇门,恶魔由此进入身体城堡(Pouchelle, 1990)。对于有关禁忌和污染的传统观念,道格拉斯的研究是一种颇具启发性和原创性的贡献。在这种文化人类学里,身体基本上是一种象征系统,体现着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那些很成问题、意义含混的社会关系,比如孪生子之间的关系。

道格拉斯对宇宙观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延伸了其他一些作者的工作,比如莫斯(Mauss, 1973)和赫兹(Hertz, 1960),他们探索的问题是神圣与凡俗之间的区分,因为这种区分关系到将身体建构为社会分划的表现。赫兹在他的《死亡和右手》(Hertz, 1960)中,考察了右手的神圣性质,指出了身体在一系列二元区分和对立中的重要性。身体是一种概念图式,包括像内部与外部这样的基本观念。赫兹紧扣神圣(右手)和凡俗(左手)的区别研究了偏手性(handedness),对于有关人身体的不对称性的研究已经产生了普遍的重要影响,对于右半身和右手的文化偏好,单边性(sidedness)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Coren, 1992; Turner, 1992)。在艺术史领域,在政治主权性质的历史分析方面,这些侧重于表现方面的研究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沃尔夫林主张,可以把艺术形式理解成通过身体来经验世界的一些特定模式,他就此确立了一种激进的途径来研究艺术和建筑(Wolfflin, 1950)。再有,坎特罗威茨有关国王的神圣身体和凡俗身体性质的历史研究(Kantorowicz, 1957),为理解身体在政治话语中的符号角色做出了重大发展。马兰分析了法国有关国王的叙事和国王身体的权力(Marin, 1988),也可以视为这种主权研究途径的典范体现。

以人的身体为核心的表现性话题的政治学一般以男人和女人之间在解剖学上的差异为关键。因此,有关女性身体的表现经常表明了妇女在社会中所承担的矛盾

角色:通过再生产,她成为具有创造性的行动者;而通过男性的男权权力,她又居于从属地位。在一种宗教框架内,上帝的男性特质与神的普遍属性发生冲突,此时,这些彼此矛盾的女性形象经常是被夸大的。在基督教里,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玛利亚这个形象上。玛利亚一方面遵从了上帝的意志,一方面也生育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耶稣。处女受孕的观念很重要,表明了玛利亚作为一个女人的世俗存在并不玷污作为一个神圣形象的基督。因此,在圣母研究中,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把玛利亚看作和基督一起的救世主。这种关于玛利亚权力与地位的模棱两可的说法,给中世纪的艺术带来了许多表现方面的问题,其解决办法是通过各种象征性的手法,把玛利亚表现成处女兼母亲(Miles, 1986)。耶稣的肉身与血成为教会祈祷仪轨中的构成要素,但玛利亚的乳汁也成为仁慈与健康的重要体现。作为女性神性的典范,玛利亚最终在一些对立运动中,靠着反抗祈祷仪轨中男权制度的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禁食就是对教会斗争的一个要素(Brumberg, 1988)。

身体社会学发展中的第二个主要关注点,在于以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和性本性等问题为核心的女性主义理论(以及更晚近的酷儿理论)。有关身体的女性主义写作和男同性恋写作,已经促进了对权力的社会性别化性质的质疑,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中,对于身体体现的女性主义研究途径和其他取向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当代身体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中,女性主义的成分和非女性主义的成分之间始终缺乏明显的互动和交流。该领域中女性主义作品的发展,大部分依靠的是以下作者富于创见的研究:克里斯蒂娃、哈拉威、伊莉嘉瑞和格罗斯(hooks, 1984; Moi, 1987; Crownfield, 1992; Cranney-Francis, 1995)。在当代有关机器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女性主义争论中,哈拉威关于技术与身体关系的研究尤为重要(Haraway, 1989)。

大多数女性主义争论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观念:一些简单的两分(男性或女性、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产物,未能把握性本性方面实际的复杂表现。晚近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这些研究,关注身体之作为一种社会性别化的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把女性身体表现为一种偏离的或异常的身体。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力图从地点和文化的角度,在具体背景下来考察女性身体的病理化过程。女性主义理论还注意研究,把女性塑造为弱者*的社会建构是如何在医学和自然科学中合法化的;最后,女性的心态是如何在科学的精神病学中病理化的。从

* 原文为“weaker vessels”,典出圣经《新约·彼得前书》3章7节,“vessel”专指承受生命之恩、得蒙上帝之宠的选民。英文新版圣经有直接改译为“weaker sex”的,而中文圣经也有直译为“弱的容器”的,耐人寻味。——译者注

这个意义上说,生理性别有它被宗教、医学和法律等有权力的话语建构的历史。大体而言,这些形式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和激进精神分析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与主流社会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共同点。有关服饰和时尚是如何助长了对女性身体的虚构,也有着相当的研究兴趣(Gaines and Herzog, 1990)。

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里,福柯有关性本性的历史建构的研究再一次在该领域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福柯最初研究的是使身体受到训诫的各种制度、实践和技术,但他后期的研究领域愈益转向自我如何通过身体的生产即通过自我技术而得以构成(Martin, Gutman, and Hutton, 1988)。福柯的作品激发了一批重要的历史研究,深入探索身体、政治与性本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拉克尔的作品(Lacqueur, 1990)。他在自己的《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生理性别、身体和社会性别的塑造》一书中,揭示了中世纪有关性的理论是如何促进了一种特定的教义:单一的生理性别,二分的社会性别,其中的女性身体只是男性身体的一种弱化或倒转的形式。解剖学的经验考察也无法将这种刻板的意识形态观念转变为另一种替代话语,这种状况一直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出现才有所改观,但解剖学往往也只限于一种关于灵魂的道德话语,而不是一种关于身体的科学。因此,当代学术研究中有一相当一部分深入到这样一种历史分析:对于将社会性别差异表现为某种道德秩序的差异,基督教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不良影响(Ariès and Béjin, 1985; Rousselle, 1988; Cadden, 1993)。尽管大部分此类分析关注的是男性和女性之间差异的历史形塑过程,但在当代工业社会里权力和权威的表现过程中,社会性别差异依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Martin, 1987)。

身体社会学已经在社会科学中发挥了理论上的重要作用的第三块研究领域,要算是医学。在为病患、疾病、病痛等范畴提供某种社会学角度的观照方面,身体社会学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Turner, 1987)。对于有关医学范畴的社会建构的整个争论,身体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争论里,传统医疗科学那种幼稚的经验主义已经受到了下述观念的挑战:疾病自有其历史,受到种种科学话语在文化角度上的塑造,自身的存在也归之于权力关系。当然,社会建构主义者的争论极富争议,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分析,未有定论。但这种争论也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范式,以挑战医学中大多数想当然的传统常识。阿姆斯特朗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Armstrong, 1983)很有效地说明了,通过关注于人的身体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散布,新的知识社会学对有关医学的历史分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再有,女性主义分析和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与神经性厌食症之类的状况相关的分析和理论,也促进了对于医学中想当然的范式的这种历史批判(Bell, 1985; Brumberg, 1988)。

17.4 身体社会学

因此，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倾向，从后现代的争论 (Baudrillard, 1993)，到呼吁“研究宗教的社会科学中重新把人物质化”(McGuire, 1990)，广泛地转向对身体社会学的深入探讨。尽管主导身体社会学早期研究的是有关社会性别、性本性和身体的女性主义分析，但近年以来，有关电子人和新生物学的研究已经开始重新确定争论的焦点。早期对于电子人的军事用途的关注 (Levidow and Robins, 1989)，已经扩展成在政治监控、医学和环境等领域有关身体与计算机之间相互关联的研究 (Featherstone and Burrows, 1995)。尽管如此，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关于身体的现有社会理论有一个局限，就是未能超出文化表现和社会建构的观念，达成对于社会交互性的真正理解，而这是任何一种社会学视角的核心议题。对于身体的表现的分析，尚未超出有关身体之社会建构性的一些例行主张。因此，需要从下列方面对身体理论做一整体概观：

1. 深入理解有关身体体现的基本观念，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身体的肉体性、感官性和客体性出发，系统地探索身体的复杂特性；
2. 有关社会行动 (social action) 的理论中，一种体现身体的社会行动 (social agency) 观念；全面把握身体形象在社会空间中如何发挥功能；
3. 真正从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社会身体在长时间内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达成对于身体体现之集体性的理解；
4. 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身体及其文化形态；
5. 从政治的角度，理解身体与治理的关系，尤其是参照我们可称之为肉体公民权 (corporeal citizenship) 的方面，即国家立法在生育技术、流产、收养、抚养等方面对身体实施的性调控和监控。

在我想来，这些分析领域是有一种等级秩序的：从涉及社会存在状态问题的身体体现的性质，到社会行动者的性质，到交换和交互性的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再到最具整体性的历史形态、文化形态的层面。晚近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方面的发展，或可满足这些理论目标 (Law, 1992; Latour, 1993)。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些早期发展关注的是理解物质世界在社会互动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但近来这种研究兴趣已经扩展到身体。行动者网络理论有两个重要成分。首先，出于方法论而非本体论的原因，它把“行动因子” (actant) 界定为有能力做事的任何实体，从而消解了人的

行动(agency)和非人的行动之间的区别。其次,实体或行动因子之所以有能力完成事情,是因为它们属于网络,而网络包含了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文化世界之间的复杂关联(Latour, 1993)。各个身体在行事时,从来也不是彼此隔离的,它们始终属于包含了其他身体、技术和文化现象的网络。社会行动永远不能化约为简单的一些作用力,世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复合网络的某种效果。

在我发展身体社会学的尝试中,我所谓的“相互关联性”(interconnectedness)只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网络观念,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渴望,也并不像斯宾诺莎那样强烈。正如德勒兹的研究所解释的那样,我理解斯宾诺莎是在说,各个身体存在于一个本质上反应很敏感的物质环境里,行动总会引发反行动(counter-actions)和调适,因此,进化过程也是“网络性”的。斯宾诺莎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考察了苍蝇和蜘蛛的进化。它们的进化“命运”是维系在一起的,尽管在事实上,只是蜘蛛捕食苍蝇,而苍蝇并不捕食蜘蛛。要想理解身体体现的脆弱性,就必须结合这样一个观念:在我们的生物—社会—文化世界里,我们始终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命题把我们带向有关激进生态学的争论,只是本章限于篇幅,无法论及。在此只须指出,斯宾诺莎式的社会身体体现观是抗衡笛卡尔遗产中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一种方法。

笛卡尔的遗产不仅强调了个人主义,而且强调了对环境的主宰以及认知能力的支配地位。与此相反,斯宾诺莎强调了身体,强调了所有存在物在其环境中的相互依赖性,为一种身体体现社会学提供了更为适当的基础。人们经常将资本主义的精神界定为个人主义的、禁欲的、理性主义的以及纪律严格的。也许我们应该把笛卡尔主义看作是霍布斯社会契约论的一个附属品,并且提出这样的主张,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霍布斯式的政治行为规范、笛卡尔的心理学和新教各教派价值观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笛卡尔学说接受了心身之区分、个人主义、世俗理性、经验主义以及将科学界定为工具理性主义。这种混合的最好描述,也许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Weber, 1930)中的“世界主宰的伦理”。身体社会学已经对整个心身二元论提出了批判,对作为笛卡尔遗产的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基础提出了质疑。当代社会学已经承认身体体现观念,认为这种途径更适于研究精神生活、生理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必然存在的相互关联性。这种立场可以用讽喻的方式概括为这样一句口号:“我食故我在”(I eat, therefore I am.)。此类立场吸收了欧洲诸语言在客观身体、主观身体和活生生的经验之间所共同作出的区别。这些发展中有许多直接或间接地诉诸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以之替代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以及有关世界主宰和工具理性的观念。斯宾诺莎拒绝了心身二元论,转而推崇心身并行论(心与身具有密切的相互关联,并且在同一个环境中运作)。他提出了一种社会契约

论,让君主承担以下责任:促进共同福利,倡导对于差异和多样性的公民宽容,拒绝先验性的属人一神论而接近泛神论。他的哲学影响了当代的激进生态主义。因为任何东西都与其他所有东西有所关联,所以责任是集体性而非个人性的。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皆关联”。

笛卡尔的理性行动者这一思想遗产,是19世纪社会科学中各实在模式的基础,并且通过韦伯的行动社会学,通过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有关唯意愿论社会行动的一般理论,一直延续到当代理论中。而当代对于斯宾诺莎的研究兴趣,正是对这种思想遗产的整体不满所造成的结果。现象学传统已经尝试就客观的工具性身体与主观的活生生的身体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更站得住脚的观念,在德语里,“Körper”(身躯)和“Leib”(身体)之间的区别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Honneth and Joas, 1988)。身体体现的观念表明,概念、感知、评价和判断,所有这些根本性的过程,都涉及到人是体现在身体上的社会行动者这一事实。它不仅仅是说人有一副身体,而且,在人自身的生命周期里,他们的身体还都有所发展,而他们就和这种发展牵扯在一起。由此观之,他们就是一些身体。身体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场所,任由各种社会信息铭刻其上,而是社会本体论的积极要素。不能只满足于单单指出身体体现在文化中,或是指出它提供了一系列文化表现的模式。身体是一种感觉性—实践性的行动因子,形塑着文化,生产着文化。人们尽可以谈论一种客观的身体,但是,作为社会学家,我们需要集中探讨作为身体存在性(experientiality)的肉体性(corporeality)或身体性(bodiliness)。必须把人的身体理解为感觉的、感官的。

肉体性和身体体现的性质直接引向了有关自我和社会行动者的问题。如何概括社会行动者的特征,这个话题一直主导着社会科学整个的发展,包括有关社会行动理性的问题,情感因素、感情因素的重要性抑或相反,社会自我的构成中符号和文化的作用。必须在一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就社会行动者断然作出一种本质主义界定,而是必须去探究社会自我肉体性的历史情境。事实上,晚近有关身体的著述已经将有关身体的争论的兴起,与后现代自我或高度现代性中反思性自我的重要性的增长联系在一起。例如,辛诺特就已断言,“身体也是自我,它根本上就是自我。我们都体现在身体上”(Synnott, 1993: 1)。席林遵照吉登斯研究当代私密关系形式的途径(Giddens, 1991),也以类似于辛诺特的方式指出,现代社会中自我的规划其实就是身体的规划:“身体倾向于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的核心”(Shilling, 1993: 1)。

医学技术的转变已经使人们有可能通过整容手术、器官移植和变性手术,将人体塑造成一种个人规划。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饮食控制、健康农业、运动科学、营

养科学,它们的关注焦点都在于养成一个符合审美标准的瘦身。辛诺特和席林都已经指出,现代的感觉能力和主观性都把焦点放在作为自我的表现的身体上,以至于身体在当代社会里成为灵魂的一面镜子。这其中涉及到一种深刻的世俗化过程,通过该过程,饮食从针对灵魂的纪律控制转变成性本性的表现机制,而这又是现代自我人格的核心(Turner, 1984)。传统饮食形式压抑欲望以服务于灵魂的救赎,而在当代消费社会里,饮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核心,是性本性的一种深入或扩充。自我的规划密切维系着身体的性质、文化角色及公共领域定位等方面所发生的这些历史转型。尽管社会学家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把整容手术理解成通过身体转变重塑自我的技术,但在当代医学和社会工作中,仍然有一种重要的复原体系,既有助于重建自我,也有助于使身体正常化(normalizing)(Seymour, 1998)。

尽管如此,由吉登斯(Giddens, 1991)所做出并由席林所采纳的主张,即自我反思性的发展是高度现代性的突出特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成问题的。自我反思性的历史必须回溯到12世纪时忏悔实践的转型(Morris, 1987),通过宗教改革中基督教纪律和灵修指南的发展,转变到新教的虔敬传统和新教徒的日记,再到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巴洛克精神的深入发展。其中特别是17世纪对人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观念,把人看作是一种塑造或人造物,是社会干预和文化组织的产物。个人作为种种社会安排和历史安排的创造,是可以修正的。世界是个大舞台,众生男女都不过是演员,这样的观念绝妙地表现了上述观点。对于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事实上,身体/自我作为一种规划的可能性现在已经为大众所得闻,而不再只是一群宫廷精英或高雅资产阶级文化所持有的目标或理念。节食、慢跑、锻炼、大众体育运动、体育,这些都把完美身体的观念带给了大众听众。由此观之,吉登斯有关自我反思性和爱的民主化的主张当然还是有道理的,因为通过身体的美来追求个人满足如今已是一种大众理念了。

显然,在一个由个人消费所主导的社会里,自我观念、身体形象和消费偶像之间会存在密切的关联。身体的装饰在大众消费主义和广告宣传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法尔克在《消费身体》(Falk, 1994)中的研究途径的意义,就在于将现代自我的兴起与消费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法尔克承继了坎贝尔有关浪漫主义和消费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Campbell, 1987),主张在当代社会中,自我的感觉与不受拘限的个人(食品、符号和物品)消费的观念之间有着深深的关联。我花故我在(I consume, therefore I am.)。可以肯定,现代广告工业已经将整个消费自我的观念发展为现代人的理想形式。

但不管怎么说,社会学不只是有关表现性意义的一种分析,而是有关行动、互动和交换的一门科学或学科。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的交互性和交换的层面上,在

行动和互动的过程中，来理解身体。法尔克研究饮食和消费的途径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式，从有关消费身体的分析中发展出社会团结的观念。你可能会注意到，“社会学”这个词本身就来自拉丁文中的“socius”，意思是朋友关系或伙伴关系；社会学就是研究交互性的一门科学，后者确定和生产出朋友关系和伙伴关系。而伙伴关系的字面意思正是以共享面包为基础的一种共同体。我们可以很有用地把社会学理解成有关圣餐共同体的分析，也就是考察基于共享饮食情境下各（已经是并始终是社会性的）身体间之交互性而形成的各种团结形式。社会学家一般基于共享价值观的观念来铺陈社会团结，但也可以有一种更为原初的共同体观念，即一种饮食共同体。嘴在这里又一次成为人体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征，是一系列含义模糊的实践的场所，包括咀嚼和啮咬，亲吻和叫喊，吮吸和交谈。词语和食物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词语和食物是交互性和交换的关键手段。有关自我形塑的观点现在经由对饮食的探讨，和作为一种饮食共同体的社会自身的形成联系在了一起。

在原始社会的仪式性饮食和现代社会的个人化饮食形式和消费形式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历史对照，它所标明的正是具有重要分析价值的共享与交换之间的对照。家庭(hearth)这项制度创造了古代罗马社会的基础，壁炉边(hearth)是家庭聚集在一起进行例行活动的中心，而这些例行活动又创造了社会根本纽带。家庭的灶神带有特殊主义性质，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守护神。这种饮食共同体和仪式性饮食奠定了诸如此类社会形态的框架。在基督教里，这种仪式性饮食已经通过仪式性地消费基督的肉身与血，转换成与上帝的一种正式交流。^{*}正如母子之间这种感情纽带是通过母乳哺育而形成的，作为社会之基础的亲密情感纽带，也是通过以某种仪式化饮食模式为核心的共享食物消费而形成的。因此，对于法尔克来说，现代社会所发生的转型是从集体性饮食仪式转向私人化的饮食。在此，社会的历史又是与身体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是和饮食重组过程中发生的味觉转型联系在一起。

通过现代化的种种过程，仪式性饮食的共享纽带最终被现代社会中各种私人化消费形式所取代，但这种历史转型同时也是从开放的身体 / 封闭的自我转向现代社会中封闭的身体 / 开放自我。在原始社会里，自我处于不发达状态，但与之相反的是，身体却是开放的；而在当代社会里，自我过度发达，身体也就相应地封闭了。开放身体 / 封闭身体的这种区分就此折射出集体饮食模式与个人化饮食模式

^{*} “communion”一词既指心灵之间的交流感应，也指教徒之间的团契。而“Communion”更特指领受圣餐的仪式。——译者注

的观念。形塑现代食物消费的,不仅仅是餐馆里饮食的商业转型,而且包括通过饮食学和营养学,应用科学来生产出富有效力和效率的饮食手段。

里茨尔在晚近对食品工业中福特制和泰勒制的影响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麦当劳化,视其为韦伯的理性化和除魅学说的一个例证(Ritzer, 1993)。麦当劳连锁店的运作是用固定的食谱,精确的食物计量,标准化的配送体系,以求实现效率、赢利和可信任性。麦当劳化去除了生活中的一切惊奇之处;它的生产手法去除了饮食中不可预期的因素,包括食物中毒的风险。就这样,在麦当劳连锁店里进一顿短促而匆忙的午餐,与原始饮食里狂欢式的仪式性进食截然相反。传统的家庭饮食有着资产阶级式的礼貌和欢宴,它与麦当劳连锁店里私人化的午餐之间的差距,或许绝妙地捕捉了传统生活世界与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系统之间的区别。

17.5 身体体现、政治和社会

当代身体社会学有着如下局限和特点。对于大多数身体社会学来说,经常很难看清楚其中什么是社会学性质的东西,而它们的关注焦点也时常局限在身体的表现性和文化性特征。身体体现的观念是不清楚的,甚至是缺失的,与社会学研究的其他一些属性,比如政治学和伦理学方面的内容,也缺乏系统的关联。强调身体之为文化表现,造成了一种悖谬的后果,就是现象性的身体从考察的视野中逸出,也没有人注意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身体。过分注重身体的文化符号,就模糊了甚或预先排除了另一种关注:日常世界里要吃饭、要睡觉、要工作的现象的身体、经验的身体。只有当身体由衰老和疾病而开始衰退,引出苦痛和不适的时候,身体才成为日常生活中关注的焦点;而在其他时候,它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Leder, 1990)。

女性主义者在政治上渴望否认妇女是由解剖学所决定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体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这一观念。“女性特质”(femininity)和“女性”(female)被视为社会范畴,是由异性恋体制的霸权效应生产出来的。激进的女性主义政治接受了结构主义和(或)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来攻击有关妇女本质天性的男权制假设。这种立场尽管颇具说服力,但作为一种排他性的理论策略,它却悖谬地否认了身体体现的物质性。我们不妨以分娩为例。大体来说,妇女在分娩中经验到的是“不适”,但对于分娩过程这种体验,却是结构主义无法处理的。这是一种将生活世界作为体验的现象学,对此文化相对主义和结构主义毫无兴趣或利益。而对分娩的感性经验抱以兴趣,也不是要排除另一种同等重要的关注:男性控制分娩过程的历史以及助产士职业的历史。



其次,之所以由妇女来生儿育女,原因很显然,她们有合适的生殖器官。如果强硬地主张身体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出来的,就必须否定下述命题: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可以根据各自的生殖器官加以区分。不过,社会建构论还有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主张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受到诸如医学专家的活动之类文化实践的形塑或影响。这种温和的社会建构论就不会与有关妇女分娩苦痛的现象学描述格格不入。简言之,认识论角度上温和的文化相对主义并不一定会与我想随瓦蒂莫称为“解释学本体论”相抵触。在伯格与勒克曼的作品里就已经发展了这种立场。他们在经典作品《现实的社会建构》(Berger and Luckmann, 1966)中,用借鉴格伦哲学人类学(Gehlen, 1980, 1988)的基础主义本体论,发展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借鉴了曼海姆和舒茨这样的作者)。因为人类是尼采所谓“未完成的动物”,所以必须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建构“现实世界”。人类生物特征的局限要求有社会建构为弥补,在此过程中,社会制度逐渐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为非习惯性的社会行动提供习惯性的背景(Berger and Luckmann, 1965)。

我们不妨来看看对我这些例子的一些强硬的反对意见。显然,对于苦痛的认识会随文化、阶级和社会性别不同而大有差异。实际上,区分苦难(suffering)与苦痛(pain)也许很重要,前者随文化不同而大有差异,而后者则不是这样。苦难涉及到自尊的丧失,社会也认为它是虐待所造成的;而苦痛则可以界定为身体在遭受伤害、疾病等打击之后所感到的不幸。尽管苦难不一定与分娩联系在一起,须视与做母亲有关的种种社会态度而论。就非法子女而言,婚外怀孕的污名化通常会带来灾难。我试图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哲学命题(尤其是温和的建构论和社会现象学),也认识到其他一些事情,比如月经来潮的症候在各文化之间变异甚大。洛珂的研究(Lock, 1998)告诉我们,月经热潮出现的情况,美国与日本的成年妇女之间差别很大。但妇女逐渐成熟、最终停止生育,这也是事实。男人和女人都体验到绝经期(更年期)的生理效应,但在许多社会里,根本就没有能够界定或认识此类事件的词汇(Hepworth and Featherstone, 1998)。

这样来看文化经验之间的关系,也符合以下事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对解剖学的理解是宗教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的产物,解剖学上的各个部位并不只是经验观察的产物。这些部位揭示的是有关身体内部的不同图景,因为眼睛是透过社会价值观念来察看的(Cunningham, 1997)。然而,男人就不可能通过阴道分娩来生育,因为他们在解剖学上不具有适当的配置。其他例子不胜枚举。莱昂(Lyon, 1997)指出,尽管呼吸的具体方式具有重大的文化意涵(作为灵魂的指示),但呼吸作用却是生存所必需的。调息练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呼吸,但完全停止呼吸作用却将最终导致并确实导致生命的终结。因此,呼吸这个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莫斯

的“身体技术”观念,因为它一方面是具有文化特定性的习得行为,又需要有某种共同的解剖结构(Mauss, 1973)。社会老年学可以提供另一个例子。衰老会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衰老阶段的观念也是权力关系的效果,但衰老也是一种生理过程,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没有最终的控制(Turner, 1995)。

现在该来尝试给身体体现下个定义,至少可以列出它必需的组成要素。首先,根据埃利亚斯有关作为过程的社会范畴的观念(Elias, 1978),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把这个术语物化,而是将身体体现当做过程性的现象,即身体体现之社会过程。身体体现是我们可称为“肉体化过程”(corporealization)的持续实践的效果或后果。由此观之,它需要习得或把握一系列的身体技术,比如走、坐、跳、吃等。身体体现融合了一系列肉体实践,这些实践生产并赋予了“一个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身体体现将特定的身体定位在或放置在一种社会惯习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从布迪厄的实践、性情倾向和惯习概念入手,很方便地描述身体体现(Bourdieu, 1984, 1990)。身体体现是一种成就,一个社会行动者可以由此接受一系列的性情倾向、实践和策略,并就此自得地享有一种独特的惯习。其次,身体体现就是从感觉上和实际上生产出生活世界中的在场。身体体现是感官身体或主观身体的活生生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它很接近马克思早期哲学人类学中的实践观念(praxis),即如人们所称的《巴黎手稿》所勾勒的那样。活生生的感官身体是日常社会关系背景中一种实际的成就,但也是体现身体的实践对活生生的世界的积极形塑。第三,身体体现是一种社会规划,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已经是社会性的生活世界之中。身体体现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规划;它处在一个由相互关联的社会行动者组成的社会历史世界中,处在一个网络中。有关活生生的身体的现象学描述并不立足于任何个体主义的假设,相反,它把身体看作是必然的社会产物。最后,身体体现一方面是塑造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身体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塑造一个自我的规划。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自我体现(enselfment)是两个相互依赖、自我增强的规划。自我包含着在一个特定社会网中的肉体规划,一个持续的但不断受到干扰的自我,需要有一种成功的身体体现,一种社会惯习,还有记忆(Becker, 1997)。

尽管身体体现这种社会规划的实现方式是例行性的(舒服的或容易的),但它自有其专门的特性。我的身体体现是在完全例行并可预期的背景中以独特的方式实现的。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在其《面向存在问题》(Heidegger, 1958)序言中的一种阐述,从社会学与本体论的关系入手,来表述特定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这种悖论。在社会学的横向层面上,有一系列社会角色以例行的方式规定着个人,这些角色具体指明了他或她在经济和政治的公共世界里的标准化位置。还有一种本体论层面形成了一种纵向的轴线,是由个人确定的、独特的身体体现而限定的。横向的社会层

面是属于社会系统的变幻莫测的世界；而纵向的层面则是体现在身体上的脆弱性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学（横向）分析关注的是理解社会存在的偶变性和任意性，而哲学（纵向）分析则力图把握我们的属人存在的必备项。这种阐述可以看作是回应了福柯的主张：“我的所有分析都是要反驳有关人存在的普遍必然因素的观念，它们所表明的其实是制度的任意性”（Gutman et al., 1988: 11）。社会关系的横向层面实际上是任意性的，也是变幻莫测的。在 20 世纪晚期，有关老龄的制度和机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老人统治的传统体制已不再占据支配地位。但不管怎么说，在有关人的存在的纵向层面上，还是有某些确定的必然因素，涉及老年、衰老和死亡。死亡的现象学与死亡和丧亲的制度之间是一种偶变的关系，但死亡其实还是可以确定的。

所谓本体性脆弱，我指的是处在必然性中的人的存在注定要遭受疾病和病患，我们都是向死而生的存在。我们逐渐变老的身体给作为体验的身体、客观的身体以及通过生命周期使我们陷入存在性不适的身体形象，这几方面之间造成了一种张力（Turner, 1995）。在这些状况的作用下，人在各个阶段的存在都涉及各式各样的依赖关系。用尼采的话来讲，我们都是未完成的动物。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来理解自我对于身体体现之连续性的依靠，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体现在身体上的自我的脆弱性。在生命周期的过程中，自我始终受到病痛和病患带来的创伤及危机对自我所产生的干扰与挑战（Becker, 1997）。而我所谓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幻莫测性质，则包括政治制度没有能力保护和服务于个体的利益，社会制度无法应对社会变迁，社会制度没有能力调和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最后还有社会在处理代际交换时出现的公平方面的问题（Turner, 1998b）。基于本体性脆弱而推出的主张或许意味着一种个体主义甚或功利主义的范式。但不管怎么说，相互关联性的观念表明人类始终是并且已经是社会性的。他们通过语言和社会化，深深地卷入社会之中。

17.6 结语：身体与人权

这里的观点是：作为社会存在，我在特定社会的文化发展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但作为属人的存在，我们都由我们共同的本体论维系在一起。不过，这种本体性的相互关联也受到技术变迁和医学变迁的威胁。这个话题也就是以下问题的真正含义：身体之后是否还有一个社会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技术转变了身体体现的伦理学？电子人及其他技术的增长，可以改变身体体现的性质，侵蚀人的生命的这种相互关联性。可以预见，身体社会学和身体人类学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将主要关注技

术、信息系统、电子人对身体体现和以身体为核心的权力关系的影响。

不管怎么说,在发展一种人权社会学和激进的社会生态学时,人的脆弱性的概念还是有用的。基础主义本体论的关键,就在于为规范性地评价虐待人权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基础。首先,关于脆弱的生物性质,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人权在这里表现为一种保护性的装备;其次,有观点认为社会制度都是变幻莫测的。鉴于脆弱和变幻莫测的性质,人类就需要有一种普遍主义的法律框架,在其中寻求保护。这两项观点(脆弱和变幻莫测)都是试图以当代的形式,继续发展霍布斯基于一种社会契约观而提出的国家学说。霍布斯在《利维坦》里主张,在自然状态下利益相互冲突的理性人将处在永恒的战争之中。为了保护他们自身免遭无穷无尽的相互残杀,他们会通过某种社会契约创造出一个国家,以这些理性的然而却相互对抗的人的集体利益,组织起一个社会空间。人是脆弱的,生活在变幻莫测的社会安排中,这样的陈述在一定程度上复述了所谓生命是“险恶、无情、短暂的”的观念。不仅如此,人类创造出那些制度是用来作为保护性或防护性机制,所以不得不强大到足以调控各种社会安排,但作为一种意外后果,也给业已通过某种社会契约创设了一个国家的人们带来了威胁。比如说,垄断了合法化暴力的国家,既是社会安全的一个前提条件,也是暴力的必然手段。

人类是理性的,但也是体现在身体上的,有能力对他们的人类伙伴表示同情。受难的能力就是道德共同体成员资格的一个重要特征(Morris, 1996)。在一个以变幻莫测为特征的社会里,是同情充当了社会胶合剂,这个观念也可以看作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情感(sentiments)学说的当代重述。这种新霍布斯主义的权利学说的关键,是要提供一种理论上的结构,能够联结作为保护性安排的个体人权,作为一种既保障权利又对权利构成威胁的制度的国家组织机制以及以下这种观念:和诸如信任之类更为传统的范畴一样,同情也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种重大要求。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下半叶,作为各种全球化过程的结果,有关人权的种种争论日趋激化。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认为,人权话语在各种世界宗教中自有其根源,这些世界宗教可以说为文化全球主义提供了一种先导或典范,而文化全球主义正是贯穿当代理论的一项主题。实际上,民族国家作为公民权的框架的兴起,破坏了自然法的大部分普遍主义因素,把人权看作是属于世界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遗产,奠定了基础主义的框架。普世教会和伊斯兰乌玛*(ummah)创造出全球性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里,原则上,种族区分或地域区分与一个人

* 乌玛(Ummah)即伊斯兰语中的“people”、“community”。——译者注




■ 作为人的价值的观念并无关联。正是自然法权利学说的崩溃,使韦伯在他的法社会学中倡导用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合法性。公民权利并没有超出民族国家的法律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权利是特殊主义的、局部性的权利。

有关权利的基础主义阐述试图要为社会学提供一种道德话语,通过它,社会之间的种种比较,不管是多么简约,也可以根据是贯彻权利还是虐待权利来做出。社会建构主义助长了天真的相对主义,后者会认为,任一特定群体的人权诉求都会在他们特定的文化框架之内享有一种排他性的权威。从这个方面来看,盖尔纳针对人类学功能主义(在这种立场下,所有的非理性信念形式都可以通过诉诸一种特定的背景而获得正当的理据)所提出的主张(Gellner, 1970),也可以拿来指向社会建构主义(在这种立场下,任何对人权的侵犯,只要作为权力均衡的产物被理解或说明,就都可以获得正当化)。波斯尼亚对人权的虐待,就是没有能够在地区争斗和全球争斗的背景下推行人权而酿成的后果,但这种有关权利的描述性政治社会学并不能使我们对这些虐待的行径做出什么道德见解。相对主义的立场完全可以受到列奥·施特劳斯的批判。列奥·施特劳斯的批判原本所针对的,是韦伯试图将价值无涉的原则与尼采有关权力意志下之永恒斗争学说融合起来。韦伯对实力政治的迷恋以及他对国际政治所采取的实力派路线,意味着“如果和平与人的生活或一种真正人的生活不相融合,那么道德问题似乎就可以允许有一种明确的解决之道:事物的性质需要有一种战士的伦理,作为完全由国家利益的考虑所引导的‘实力政治’的基础”(Strauss, 1950: 65)。韦伯在其 1895 年的弗莱堡就职讲演中,就明确地接受了这种解决之道,从在东欧谋取“生存空间”的需要入手,来框定德国的对外政策。韦伯的视角主义(被理解为“社会建构主义”)恰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权利只不过是实力政治的后果。很难理解,将人权视为仅仅是政治斗争的后果,这样的描述性阐述又如何能够奠定道德分析的基础。与之相反,我已经就价值中立和伦理评判之间的两难困境提出过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将温和的建构主义与一种有关身体的哲学人类学融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权利社会学的基础。这种权利社会学既不是“东方主义”的,也不是个人主义的,也就是说,它将不考虑文化的偶变因素或政治的风云变幻,而承认人类共同的本体论。与福柯不同的是,这样一种研究途径既承认制度的任意性,也承认身体体现的普遍必然因素。尽管由医学创新所推动的社会关系的未来发展,将会把社会生活推向某种“人之后”(post-human)的处境,但这些技术发展本身就会使社会关系更为脆弱,愈发变幻莫测。因此,本体性脆弱、政治变幻以及社会生存的相互关联性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必然的关系。身体社会学是当代社会理论中一种举足轻重的发展,为霍布斯的社会秩序这一传统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Ariès, P. and Béjin, A. (eds.) 1985: *Western Sexuality: Practice and Precept in Past and Present Times*. Oxford: Blackwell.
- Armstrong, D. 1983: *Political Anatomy of the Body: Medical Knowledge in Britai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balet, J. 1998: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ker, F. 1984: *The Tremulous Private Body: Essay on Subje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Baudrillard, J.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 Becker, G. 1997: *Disrupted L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ll, R. M. 1985: *Holy Anorexi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rger, P. L. and Luckmann, T. 1965: Arnold Gehlen and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s. *Social Research*, 32(1), 110—115.
-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rumberg, J. J. 1988: *Fasting Girls: 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rn Disea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dden, J. 1993: *Meanings of Sex Difference in the Middle Ages: Medicine, Science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C. 1987: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Blackwell.
- Coren, S. 1992: *Lefthander: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Left-handedness*. London: John Murray.
- Cranny-Francis, A. 1995: *The Body in the Text*.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Crownfield, D. (ed.) 1992: *Body/Text in Julia Kristeva: Religion, Women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unningham, A. 1997: *The Anatomical Renaissance.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Anatomical Projects of the Ancients*. Aldershot: Scolar Press.
-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  *Taboo*.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0: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London: Barrie and Rockliff.
- Downey, G. L. and Dumit, J. (eds.) 1997: *Cyborgs and Citadels. Anthropological Interventions in Emerg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Sante Fe,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Dreyfus, H. L. 1991: *Being-in-the-World*.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Elias, N. 1978: *The Civilising Process*. Vol. 1. Oxford: Blackwell.
- Falk, P. 1994: *The Consuming Body*. London: Sage.
- Featherstone, M. and Burrows, R. (eds.) 1995: *Cyberspace / Cyberbodies / Cyberpunk. 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London: Sage.
- and Turner, B. S. 1995: Body &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Body & Society*, 1 (1), 1—12.
- Feher, M. (ed.), with Naddaf, R. and Tazi, N. 1989: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New York: Zone (3 vols).
- Foucault, M. 1981: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 Introduc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87: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The Use of Pleas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8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 *The Care of the Self*.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aines, J. and Herzog, C. (eds.) 1990: *Fabrications: Costume and the Female Bod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Gehlen, A. 1980: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8: *Man. His Nature and Place in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ellner, E. 1970. Concepts and Society. In D. Emmet and A. MacIntyre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Inquiry*. London: Macmillan, 115—149.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utman, H., Hutton, P., and Martin, L. (eds.)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London: Tavistock.

- Haraway, D. J. 1989: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a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Verso.
- Heidegger, M. 1958: *The Question of Being*. New York: Twayne.
- Hepworth, M. and Featherstone, M. 1998: The male menopause: lay accounts and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midlife. In S. Nettleton and J. Watson (eds.) *The Body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276—301.
- Hertz, R. 1960: *Death and the Right Hand*. London: Cohen and West.
- Honneth, A. and Joas, H. 1988: *Social Action and Human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oks, b.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Husserl, E. 1991: *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Dordrecht: Kluwer.
- Johnson, D. 1983: *Body*. Boston: Beacon Press.
- Jones, C. and Porter, R. (eds.) 1994: *Reassessing Foucault. Power, Medicine and the Bo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antorowicz, E. H. 1957: *The King's Two Bod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cqueur, T. 1990: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Law, J. 1992: Notes on the theory of the Actor-Network ? orderings, strategy and heterogeneity. *Social Practice*, 5(4), 379—393.
- Leder, D. 1990: *The Absent Bo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vidow, L. and Robins, K. 1989: *Cyborgs Worlds: The Military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Lock, M. 1998: Anomalous ageing: managing the postmenopausal body. *Body & Society*, 4(1), 35—61.
- Lyon, M. L. 1997: The material body, social processes and emotions: “Techniques of the Body” revisited. *Body & Society*, 3(1), 83 = 101.
- McGuire, M. B. 1990: Religion and the body: rematerializing the human bod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of religio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9(3), 283—296.



- Marin, L. 1988: *Portrait of the King*. London: Macmillan.
- Martin, E. 1987: *The Woma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L. H., Gutman, H., and Hutton, P. H. (eds.)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London: Tavistock.
- Mauss, M. 1973: Techniques of the body. *Economy & Society*, 2, 70—88.
- Merleau-Ponty, M.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iles, M. R. 1986: The virgin's one bare breast: female nudity and religious meaning in Tuscan early Renaissance culture. In S. R. Suleiman (ed.) *The Female Body in Western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08.
- Moi, T. (ed.) 1987: *Frenc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 Morris, C. 1987: *The Discovery of the Individual 1105—120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Morris, D. B. 1996: About suffering: voice, genre and moral community. *Daedalus*, 125, 25—45.
- Nettleton, S. and Watson, J. (eds.) 1998: *The Body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O' Neill, J. 1985: *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9: *The Communicative Bod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en, A. and Bunton, R. (eds.) 1997: *Foucault, Health and Medicine*. London: Routledge.
- Porter, D. (ed.) 1997: *Social Medicine and Medical Soci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msterdam-Atlanta: Editions Rodopi.
- Pouchelle, M. -C. 1990: *The Body and Surgery in the Middle Ag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itzer, G.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London: Sage.
- Rousselle, A. 1988: *Porneia: on Desire and the Body in Antiquity*. Oxford: Blackwell.
- Scarry, E. 1985: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ilder, P. 1964: *The Image and Appearance of the Human Body*. New York: John Wiley.
- Schutz, A. 1962—1996: *Collected Papers: Alfred Schutz, 1899—1959*. Ed. M. Natans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Sennett, R. 1994: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Seymour, W. 1998: *Remaking the Body. Rehabilitation and Change*.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 Shilling, C. 199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 Strauss, L. 1950: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ynnott, A. 1993: *The Body Social: Symbolism, Sex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Turner, B. S. 1984: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1987: *Medical Power and Social Knowledge*. London: Sage.
- 1992: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1993: Outline of a theory of human rights. *Sociology*, 27(3), 489—512.
- 1994: Preface to Pasi Falk, *The Consuming Body*. London: Sage, vii—xvii.
- 1995: Aging and ident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omatization of the self. In M. Featherstone and A. Wernick (eds.) *Images of Aging.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Later Life*. London: Routledge, 245—262.
- 1997a: A neo-Hobbesian theory of human rights: a reply to Malcolm Waters. *Sociology*, 31(3), 565—571.
- 1997b: What is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 *Body & Society*, 3(1), 103—107.
- 1997c: From governmentality to risk, some reflections on Foucault's contribution to medical sociology. In A. Petersen and R. Bunton (eds.) *Foucault, Health and Medicine*. London: Routledge, ix—xxi.
- 1998a: Foreword to Wendy Seymour, *Remaking the Body*.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v—viii.
- 1998b: Forgetfulness and frailty. Otherness and right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In C. Rojek and B. S. Turner (eds.) *The Politics of Jean-François Lyotard. Justice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5—42.



- Vattimo, G. 1988: *The End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3: *The Adventure of Difference. Philosophy after Nietzsche and Heidegg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eber, M.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Wolfflin, H. 1950: *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yle in Later Art*. New York: Dover.

Intellectuals and the Public Sphere

第六编 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





第 18 章

社会理论与公共领域



C. 卡尔霍恩

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 1977 年以来在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Chapel Hill)校区执教,现任社会学兼历史学教授,并任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卡尔霍恩最新出版的书籍包括《既非上帝亦非皇帝:中国的学生与争取民主的斗争》(California, 1995)以及《批判性社会理论:文化史与差异的挑战》(Blackwell, 1995)。编有《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MIT, 1992),与 M. Postone 和 L. LiPuma 合编有《布迪厄评论集》(Chicago, 1993)。1994 年起担任《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杂志编辑。目前正从事有关民族主义、市民社会以及民主纪念标志的比较历史研究。

- 18.1 只有事实是不够的
- 18.2 批判的观念
- 18.3 法兰克福学派
- 18.4 新一代
- 18.5 公与私的转换
- 18.6 反思批判理论



近这些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应用性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来规定社会学的公共角色。为公共政策分析提供统计上的支持,对人口趋势做出预测,在社会工程方面给予协助,这些都被视为社会学在学院之外的使命中的核心内容。经验性社会研究和应用社会学所做出的特定贡献无论有多少益处,主导性的强调重点还是偏于一面的,既轻视公共生活的性质和潜力,也不注重其他更具批判意味和理论色彩的社会学形式。社会学(不管是理论性的还是经验性的)的公共角色不仅仅在于专家们的技术活动,也可以包括伸张民主、开启民智的公共话语。它还可以包括将构成日常生活和公共话语的那些概念、公理解以及文化范畴都交付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以牺牲经验研究为代价,去追求纯粹抽象的批判。相反,它是这样一种理论方案,既能够与经验性的学术活动和新近的研究密切交融,又不会使社会知识纯粹变成对于既存状况或理解的确证。

而这也正是 20 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社会理论家们所持有的方案。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领导下,并汲取了丰富的思想传统,尤其是包括马克思、弗洛伊德、德国观念论者,以及像尼采这样的批判上述人物与思潮的人,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出许多观念,特别是坚定地认为,批判性社会理论作为一个民主社会里自我反思性的公共话语的组成部分,所能发挥的作用潜力很大。而他们自己的实质理论也绝非穷尽了这种努力的定论。人们已经揭示出它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缺陷。不仅如此,强调其他主题的理论家也已经发展出了各种可供替代的批判理论传统,其丰富性与之可有一比,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也许要算强调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构成性范畴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我并不打算在本章里评论各门各派的批判理论,而是要集中讨论“法兰克福学派”,我认为它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供我们把握批判理论究竟是什么,它又如何能够作为具有转变潜能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除了评论霍克海默、阿多诺及其他核心人物的贡献,我还将讨论更为晚近的哈贝马斯的贡献,包括以公共话语为旨归发展社会理论以及对公共领域本身做出理论阐述。不管怎么说,法兰克福学派并不“独享”批判理论这一观念,并且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其他还有一批理论传统可以在当代公共领域中起到至少同等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我还将尝试提出作为公共话语的社会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一些一般性条件。

18.1 只有事实是不够的

所谓庸碌之徒(philistine),就是“生活在一个全然未经探察的世界里而安然适之的人”(Davies, 1968: 153)。庸碌之徒并不一定是消极被动的,因为他或她也可能

会十分积极地从事制造物品,或是在这个世界上谋得一个位置。但庸碌之徒是没有反思的,取向上基本是功利主义的。圣经里指的腓力斯人,是在数量上占优、自己将会落入其手的敌人。而阿伦特告诉我们,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最早是德国大学城里学生俚语中用来区分城镇居民与大学师生的(Arendt, 1954[1977:201])。〔1〕但是,即使这一责难之辞最初只是用来指思想上的势利(或许还掺杂着内心对遭受攻击的恐惧),随着非知识分子们也开始表现出对“文化”的实质兴趣,特别是把这当作塑造新式精英地位的一部分,庸碌之徒的观念也开始表现出更为微妙的色彩。〔2〕对于精神生活乃至更一般性的文化事务的非学术性兴趣,一直是断断续续、不很均衡的。时常有人担忧,在那些大学之外的人浑浑噩噩的使用之下,文化客体和思想产品会被化约为单纯的使用价值或商品。但这已被证明是杞人忧天。不过,与此同时,在大学本身内部却滋生出某种庸碌之气(philistinism)。学术生活已经远非纯粹的精神生活,不仅如此,把文化客体(比如出版物)用做职业升迁的手段,也产生了一种扭曲甚至是转变性的效应。我并不是想指出这种新式的庸碌之气如何粗俗不堪,而是想指出它是如何暗中腐蚀着批判性思想。文化生产被重新塑造造成积累某种学术职业资本的手段,就此而言,文化生产者会被鼓励去接受关于世界的常识理解。如果太过深层地挑战这些理解,就会导致自己疏离某些人,后者对于文化生产者产品的“购买力”会使他们有能力积累资本。〔3〕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知识分子被迫服从于不合法的主子,他们在当代处境下似乎并不比其他时候更有可能如此,而在于他们秉持着职业化的精神,却背叛了以真诚、开放的态度探索世界的天职。

人们的希望尽管一再落空,却依然希望社会科学家永远也不会成为这个意义上的庸碌之徒。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社会科学家以和所有小说家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的方式致力于探索世界。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对于社会科学家而非小说家来说,我们的探索是受到已知习惯世界的界限束缚的。不错,我们发现了新的事实,但它们已经被驯化在了我们认为自明的、无须质疑的知识框架内。对于社会科学绵亘日久的挑战之一,就是超越对熟悉世界的确证和重构,去认识其他的可能性。新的视角,新的理论以及新的经验信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看到,事情是如何能够以不同于最初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又是如何能够甚至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的。不管怎么说,捕捉诸如此类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拒绝认为,我们要么几乎照单接受所有事物现有的样子,要么我们必然会面临现实的彻底解组,在这样的解组状态下,我们无法宣称任何可以指引我们的意义与方向。〔4〕

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所描述的,都是熟悉亲近的社会世界,只是在背景和具体细节上略有不同,比如浪漫小说,只是在新的场景、新的人物上演非常标准化的情节。我们勤勤恳恳地积累着事实,然后检验这些事实,确保其可靠性,再将它们分

类整理成可以辨识出的模式。^[5]而这种分类通常局限于固定的分类系统,而不是像达尔文之前那样,根据生物的表型特征来整理生物世界。我们只是偶尔会以一种更具理论性的方式来做系统整理,主张存在一种潜在的秩序,是不可能在其研究对象的任何表面特征上找到的。但历史变迁和跨文化多样性的经验,让我们最深切地感受到这副理论探索的重担。

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从来也不在于事实本身,哪怕有些的确是证明了形形色色的事例之间存在着统计相关。休谟区分出真正的因果关系与单纯的相关关系,揭示出理论的根本地位,以及作为特定知识源泉的经验主义的局限。尽管几乎可以说他自己就不符合这种情况,或者说,他说的更符合康德而不是他自己。同时,他还指出了理论的不确定性,即不可能有朝一日基于经验例证而得出确定的证据。休谟从理论转而诉诸历史,将其作为人类理解与行动的指引。归根结底,理论并不是为行动提供取向的惟一方式;语言和日常文化赋予我们极大的分类能力,虽说当我们进入分析时,也会开始具备一点理论的色彩,至少是暗含的。人们通常把这等同于因果推理,但我们的理论观也需要为叙事中涉及的推理留出一席之地。叙事不一定只是对于进展或序列的陈述,也可以是说明前发事件或行动如何限制了后发事件或行动,为后者限定了方向。研究者可以不引入因果关系这个观念本身,就对“情节”结构的变异做出理论阐述。^[6]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系统地考察和建构知识,就社会理论而言,也就是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这种理论在形式上可能是因果性的,也可能是叙事性的,每一种形式都意味着做出一般概括与具体陈明的不同途径。因果推理是可以用来分析零散事件的,但在社会科学里,它更常用来分析成组现象,处在同一组类里的现象是被当作内部等价的现象来处理的,并且会对同样由相互等价的现象组成的其他组类产生影响(预计甲组内任一事例都无须外在因子介入即可产生可归入乙组的新事例)。与此相反,叙事时常被描述为本质上就是具体化的,但是(1)具体事例也可以具有全局性(比如世界史的有关叙事);(2)各叙事之间的比较有助于产生一种跨情境的一般性知识。

社会理论家力求理解的世界,并不只是一个经验的世界,由种种事实和命题所构成。它也是现象学经验的世界,反思性判断的世界,实践行动的世界。认识到这一点,会使理论家们自休谟以来一直面临的那个重大挑战愈发棘手,但或许也愈发有意义。这个挑战便是:发展出一些系统地理解世界的方式,能够如实反映这个既作为观察的对象、也作为经验和行动的对象的世界,并且既严格精确,又能认识到自身是根植在历史之中的。

这表明,对于理论的有些常见观念具有误导性。尤其错误的是把理论想作是完全抽象的,而经验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充分具体的。但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首先,社会科学的理论始终有一部分是归纳性的:它们至少得倚靠一些有关世界如何运转的信息,也得倚靠从理论家的文化和经验中推出的一种对于世界的取向(不过经常是不曾言明的)。不仅如此,第一流的理论中有许多也具有“经验的丰富性”,也就是说,它们不仅仅是形式命题或抽象思辨的汇编,而且是具体说明和叙事的汇编。它们作用的发挥在更大程度上靠的是经验的类比,相同之处与差异之处的陈述,而不是法则式的普遍陈述。^[7]只须略微思考一下那些已经证明影响至为持久的理论,比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的那些理论,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最具说服力的那些理论的经验性是何等的丰富而厚重。

其次,所谓理论不涉、完全具体的经验社会学,也同样是一种误导性的观念。即使是经验研究者完全不明言自己的理论取向,像福尔摩斯那样宣称“只凭事实”工作,他们也得依赖概念,有关因果关系的观念以及到何处寻找经验关系的理解。这些既不能完全从这种事实领域中推出,又必然构成着事实与说明。理论社会学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有条不紊、一以贯之地阐明这些经常被经验研究者想当然地接受的“取向”,并且将它们交付批判性的分析。

我们看待理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有时候既模糊了有关学术性科学领域中事态进展的理解,也模糊了有关理论在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性的理解。要想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逐一澄清社会学家——其实也是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使用“理论”这个术语的各种方式,也许不无益处。首先,人们有时以一种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式,将“理论”理解为一套经过检验的有序命题体系。在这样一种理论用法中,主要的成分包括:(1)具有普遍概括能力的命题;(2)就陈述的适合与不适合之处做出限定。这样理解的理论以普遍性和积累性为核心目标,经常被称作实证主义,无论是它的倡导者还是批评者都这么叫,但这却是个错误的命名。“实证主义”的标签来自于孔德这样的早期法国社会理论家所持的科学主义,以及黑格尔有关“纯粹实证性”(mere positivity)的批判,即只看世界的表面存在而不看其内在张力。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一方面利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确定性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的作用],同时结合了对社会科学经验主义和维也纳学派哲学(自称其研究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8]

逻辑实证主义远不是什么对经过检验的一些命题的综合。它转而追求逻辑表述(一般具有高度的形式性)的一致性和说服力,而不只是经验概括。许多逻辑实证主义者曾经对物理学和数学的有关理论很感兴趣(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而这些理论就几乎不能说是经验概括。例如,相对论确实产生出一些可检验的命题,但在它的绝大部分核心命题能够被检验之前,它就已经获得了认可,被视为一种“绝妙的”、有说服力的理论。波普(Popper, 1968)的实证主义阵营身份尽管还模棱两可,



但他还是简洁有力地概括了这种局面：科学家们应该关注“猜想与反驳”，而不只是概括。这样就引出了有关“理论”的第二种理解，即一种逻辑上整合一体的因果说明。只有对这第二种理论来说，诸如简洁、有力、完善之类的赞扬标准才说得上对路。

最后，还有第三种理论观，默顿(Merton, 1968)试图将其与头两种区分开来(但不曾完全充分地相区分)。他称这第三种为理论取向或视角，而不是理论。我认为，他的意思说的是像旨在解决问题、提出说明的一些研究途径，而不是解答和说明本身。帕森斯试图巩固的功能主义是作为一套整合一体的一般性理论，而默顿自己在中层理论中，却是把功能主义作为一种视角取向来使用的。而和韦伯或马克思维系在一起的一些更广泛的传统，绝大部分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在过去30年里，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第三种理论观是无法完全在头两种的背景中维持的。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首先，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谓的理论视角为探讨各种论题提供的语言，本身就依赖各种理论。换言之，如果说我们认为，在确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权力和冲突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功能整合，此时我们已经假定，只有基于一定程度的理论概括，才能够达成有关何谓社会秩序的某些理解，与其他理解可能有所不同。其次，出于一些颇为类似的原因，我们当作社会科学“事实”的东西，绝大部分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理论构成的，实际上，评价事实与评价说明的标准也是如此。理论所抽取的世界，试图加以说明的世界，都不只是由经验观察组成的世界，从归纳的角度上说已经预先给定了。理论使我们能够做出观察，从而将感官印象转换成我们可以作为事实加以利用的理解。理论就此提供给我们一些思考经验世界的方式，做出观察的方式，阐述检验的方式，而不仅仅是说明检验结果的方式，不仅仅是说明各种经验观察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这三种普遍流行的理论观都能使我们深入了解，社会学理论是通过哪些方式，既启示了科学研究，也启示了学院之外的公共生活和实践行动。理论著述是经验知识的仓库，是经验知识的综合。它们提供了说明，也提供了想出新的说明的方法。但这样说就把事情弄得太简单了；它模糊了理论在学院社会学和公共生活两方面都具有的潜在的转化作用。换句话说，有关理论如何运作的三种传统观念都假定，所有的科学都是库恩(Kuhn, 1970)意义上的常态科学(即在既有范式内来解决说明性问题，而不是改变范式)。它们不允许有革命性科学，甚至不允许对范式提出我们或许不打算宣称是革命的较小程度上的挑战，哪怕它们给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带来了重大的变化。

以我首先开列的经验主义理论观为例。这种观念很好地把握了理论中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经验知识，但它对于经验知识的表现却具有误导性，仿佛只有对经过检

验的命题的有序综合才能算是经验知识。首先,这就意味着认为,建构经验命题的方式可以不依靠理论(或元理论)假设,不根植在特定的理论取向中,从而有时很难转换成各种理论话语。从更根本上说,在经过检验的确定现象之外,异常和空白也影响着我们的知识结构,或许对知识的推动还要大得多,但这种理论观未能给后者留出一席之地。最后一点,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它没有考虑到,在相当程度上,第一流的理论不仅仅是命题的汇集,而且还包括在丰富多样的个案之间,以类比的方式构造比较、对比和确定相似性。

甚至在我们以更成熟的考虑,将理论说成是说明和建构说明的方法时,我们也仍然未能公正地评价,理论在**构成**我们接触社会世界的途径本身——包括**构成**我们对之进行理论概括的那些事实,以及我们借以检验假设和理解的那些实际行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理论观念,比如关于民主或阶级的观念,也成为我们所考察的世界的一部分,改变了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实现传统教科书中关于理论积累或理论与经验研究之关系所设想的那种彻底的闭合。尤其是考虑到社会理论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以及与最具学术性的科学的关系,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理论创新,正是在回应我们努力达成理解或者提供规范指导的问题,但是,在确定了一套问题的同时,它们也会制造出新的问题,或者,随着社会世界发生变化,新的问题也会浮现出来。我们不是简单地从虚假的命题迈向真实的命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是从不那么充分的说法迈向更为充分的说法,而我们关于充分性的标准,却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博得我们注意力的实际问题的左右。^[9]因此,不能只是在真理的标准上来比较韦伯与涂尔干的理论,哪怕凭据某些可以想得到的论据,我们可以决定一方正确而另一方错误。相反,只有根据他们对于达成不同种类的理解或有关不同议题的理解所分别具有的潜在用益,才能对他们做出最好的比较。^[10]

由此观之,理论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在于使我们能够问出新的问题、不同类型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思的理论就生发出一大堆重要的问题,而这些特定的问题无论是涂尔干的学说还是韦伯的学说都生发不出来。马克思的理论促使我们去考察,根植在物质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在怎样的程度上形塑了人们的身份认同和行动,对于此类利益的认识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国际性的阶级意识,强大到足以战胜民族主义。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从马克思的问题中所得到的教益,可能比从他的回答中得到的更多。不仅如此,理论还使我们能够问出原创的思想家本人都未曾想到的问题,例如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就引发出对共产主义社会种种状况如此坚持不懈的追问,以至于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政府们一心要遏制这种理论运用。



但是,理论固然使我们能够问出新问题,却并非简单地表明,我们的知识会变得越来越完善。恰恰相反,对于同一系列的社会现象的思考,人们可以达成许多可能的看法,而上述的说法只是其中的一种结论。理论之所以始终是多元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含糊困惑,或者是尚未达成对摆在我们眼前问题的正确的科学理解,而是因为所有的问题就像所有的人一样,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看。或者换一种说法,对于任何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现象,要在同一种理论中,甚或是同一套彼此可以通约、逻辑上可以整合的理论中,问出所有有意思的问题,一般来讲都是不可能的。注意到这一点正是现代物理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是和相对论分不开的。正如海森堡所言[转引自阿伦特对历史这一概念的发人深省的讨论(Arendt, 1954(1977: 44))]:

核物理学最重要的新结论就是认识到,同一桩物理事件有可能适用类型相当不同的一些自然法则,而不会出现矛盾。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事实上,在基于某些特定的基本观念的一套法则系统里,只有某些相当确定的提问方式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这样的系统是与其他允许提出不同问题的系统相分离的。

出于这一原因,我们不能指望理论的积累能够发展出单一的一种彻底充分的理论。社会学理论领域注定将依然是多种理论之间对话的领域,每一种理论都给出了真理的某些方面,但其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地把握真理。实际上,这种局面也是令人感到幸运的。这还意味着,需要通过理论在解释过程中的作用来对理论做出关键性的看法;意味着人们对于理论之经验内容的最佳使用方式,常常不是用作普遍真理或法则式概括,而是用作类比、对立和比较。

18.2 批判的观念

为了抗击庸碌之徒(或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同道们)的怡然自得,批判性社会理论将世界的给定性本身作为探索和分析的对象。这也体现出理论为何与事实有着复杂关联的又一项原因。理论不仅仅是对事实做出概括,不仅仅是由这些事实对理论做出很好的检验,因为始终有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参与构成了那些事实,就是某种理论。理论对于行动的指引方式,不单单是像工程建造的准则对桥梁修筑的指引。理论有助于在业已变化的环境和新出现的可能性下进行思考。它有助于实际行动者的眼光超出关于某一特定时刻中既存的直观性,以理解某种可能性,从而应

对社会变迁。这与乌托邦式的理论阐述或其他规范性的理论阐述并不完全相同,尽管有同样的能力推动规范性的理论阐述。相反,这是一种十分关键的分析能力,揭示了纯粹经验主义的局限。

追随黑格尔的辩证理论家,以及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作品中衍生出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的理论家,对这一点做出了不同的理解,不过却是同样的清晰。对于前者,关键在于支撑既存现实的种种张力与矛盾,它们既指明了该现实在更大的历史现实中的处境,又指明了超越这种处境的可能性。而对于后者,关键则在于能够看到隐含在种种原因与约束之下的某种潜在模式,而不仅仅是实际发生事件的更具或然性的表面模式。实际发生事件始终反映出偶然性和任意性的成分,因此,不能够很好地指出可能性的潜在结构。正因为这一点,经验知识需要由理论来补充,而理论也不能只是对经验知识的简单汇总。这种论点的逻辑与统计表述的逻辑并无完全的不同。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熟知一桩趣闻轶事与一种统计模式之间的差别。有时候,面对那些坚持从特定案例而非总体模式和概率的角度来思考的学生、同事和政客,我们也会感到挫火。但即便是一个设计精良的统计样本,也不一定能够触及根本的因果关系。它只是精确地再现了某一时点上的经验模式。因果关系始终有赖于超出“事实”或数字本身的进一步推论。从更深层的、理论的意义上来讲,它有赖于认识到,事实原本可以是另一种样子的。

独特性推理 (*idiographic reasoning*, 特殊性或个别性的) 与法则性推理 (*nomothetic reasoning*, 一般化或典型化的) 这一沿袭已久的对立,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上述论点。确切地说,它把握了典型的历史写作在怎样的程度上为导致某种独特结果的特定事件链给出了一种叙述。因此,历史就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叙述。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寻求对**本来能够**发生的事情给出一种阐述,因为对于考虑我们当前的决定来讲,这也是相当关键的信息。但法则性推理并不能提供这种阐述。它所提供的,是对业已发生的许多具体案例的一种概括,至少在它的绝大多数形式中,从方法论之争的角度来看,情况的确是如此。^[11]从单纯的普遍概括中往前迈一步,就意味着从经验的历史迈向了理论。人们说将军们总是根据经验,在准备打一场**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而理论的作用之一就是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未来的战争会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

理论与事实之间关系的种种复杂性,没有一点应当能使我们心安理得地让理论在经验上沦于贫乏。要触及根本的因果关系,光靠抽象是做不到的。而且,即使理论不总是根据经验考察做出修改,它也很有可能成为靠不住的理论,或者失去效用,或者干脆沦为意识形态的贮存地。不过,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社会科学所组织的经验考察,而且也适用于经验和实践行动,它们也是社会理论中归纳性的内容、

意义与灵活性的来源。用理论来挑战社会世界的给定性,让研究者有能力从那个世界中看到新的问题和新的事实,就需要认识到,知识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至少是始终有可能充当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媒介。

由于进行理论阐述就会开启一系列的理解,因此,理论阐述永远也不可能完全中立,它必然会是视角性的。这就强使理论家既得认真考虑他或她的理论的历史根源,又得认真考虑其理论的未来取向。阿伦特从卡夫卡那里借取了一则寓言,以描述这种必然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张力中的理论处境,其实也是思维的处境。这则寓言假设有那么一个人:[12]

他有两个对手:头一个从后面、从源头对他施加压力。第二个则挡住了去路。他得两头作战。当然,头一个对手会帮他去斗第二个,因为想把他推向前方;同样,第二个对手也会帮他去斗第一个,因为想把他推回去。但是,这只是在理论上如此。因为那里不仅有这两个对手,而且还有他自己,谁又能真正知道他的想法呢?他可是有这样一个梦想:有朝一日,乘其不备,得是在一个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夜晚,他将跳出火线,凭借着自己的战斗经验,跃到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仲裁着他的两个对手彼此战斗。(Arendt, 1954[1977:7])

主人公从他在这场斗争中的位置里获取了自己特殊而确定的身份。跃升到战斗之上的仲裁者的位置,这样的梦想颇有些危险,许多思想家难以抗拒它的诱惑。根据这样的梦想,理论既可以脱离关于过去的回溯性分析,包括关于它自身过去的回溯性分析,也可以脱离对未来的前瞻性介入。理论家会有这样的梦想,这种达成完美知识的希望,这并不奇怪,但至关重要,他们应该去抗拒这样的梦想与希望。跳离战场,坐上仲裁者的宝座,就是要努力采取笛卡尔式的来自乌有之地的眼光。可这并不是什么理性的胜利,而只不过是一种误识。这种眼光所提供的知识,并未摆脱偏见的起源,不受任何实践意图的扭曲;这种知识并不能理解其起源,或是对其效果负责。

有大量甚至是相当出色的理论,其生产和呈现都让人感到仿佛是从仲裁者的立场上写出来的。它们既未能认真考虑自身生产的历史条件,也没有认真考虑其作为一项实践行动所具有的意涵。这种状况不仅惹恼了那些吁求更具批判性的理论的人们,也促成了传统的、主流的或者是实证主义的理论家们常常陷于失落情绪,他们原本期望在社会科学知识中出现某种直接明确的积累。基于经验主义或其他大致可称为“实证主义的”元理论的哲学性自我理解,实际上使得许多社会理论家对自己真正的成就抱持一种自欺欺人的信念。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发现”不受时间

和视角限制的真理上,因此,当他们的真理被其他真理取而代之时,他们便会无助地守候,或者有时会在一肚子气之下,以防御性的姿态,破坏性的方式,倾泻出猛烈的回击。他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是对实践理性过程而不是纯粹知识的一种更具时间限制的贡献,是对不断建构出新理解的对话的贡献。他们仿佛只认同于柏拉图后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或者说非对话性作品中的柏拉图),坚持主宰着整个讨论,陈述的也是整个真理;他们看不出苏格拉底在早期对话中那种更为谦虚的态度是一种德性,那时苏格拉底的声音不管怎么显得才华横溢,也只是好几种声音中的一种,而每一种声音都说出了真理的某些方面,改变了其他人说出的东西的意义(这个意象取自伽达默尔,见 Gadamer, 1975)。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历史的变化,而在于声音的多样性,在于数目不定的一系列不同的主体立场和主观认同之间的种种差异。出生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都蕴含着彻底的新颖性。正像阿伦特所说的,出生就是人的世界通过存在的生产而无尽地更新,并且这种存在的生产既为凡人所共有,但也人人皆不同。在人类历史的共同世界——但从不会是完全共同的世界——上,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开端,尽管只有等到新观念代代相承,使它们中的某些观念递变为传统之后,这种多样性才会开出繁盛之花。

鉴于有那么多理论追求那仲裁者的座椅,而有些理论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在对话中和文化多样性中的位置,不可化约为事实的特性,以及与实际世界的关联,因而,为后面这类理论取一个特定的名目似乎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批判理论,这不只是在遵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是在遵照康德。

康德坚定地将自己的哲学定位在休谟的怀疑主义和莱布尼茨独断的唯理论的对立面上。他认为,拒绝接受关于日渐确定的知性和理论知识的方案,与过早地认为其属于定论,同样站不住脚。相反,除了不同形式的理性、知识与知性的根据,康德还尽可能系统地探求它们的限界。他不仅认真考察纯粹理性,而且认真考察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康德的追求或许算不上完全成功,实际上,人们还未能充分估计到,他的理论和其他人的一样,都在某种程度上根植于历史和文化之中,而不是有可能超出历史与文化,或是掩映在历史与文化之下。黑格尔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康德历史化并社会化,而涂尔干用的则是另一种方式。而在我们今天,布迪厄(在“职业判断的范畴,或系科之争”中)和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都不仅在各自思想的某些方面借用了康德,而且在文章的题目上也借用了康德,这绝非偶然。^[13]而哈贝马斯也越来越表现得像是一位新康德主义伦理学家,在他更晚近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康德这个形象有助于我们回想起,在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运动之间(或现代与

后现代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划界时所犯下的错误。康德既有助于命名启蒙运动,也有助于终结启蒙运动。他最钦佩的人便是卢梭,还一直在自己的书案上摆着卢梭的胸像。可是,在所有的18世纪思想家当中,卢梭最能够预示浪漫主义。今天,自我宣示的后现代主义者鞭挞启蒙运动为现代压迫意识的始基。在这样一个时代,很有必要回忆,在启蒙哲人所处的时日里,他们和稍后一代或两代的浪漫主义者一样可以肯定是庸碌之徒自得情绪的敌人。如果批判理论认为,自己孜孜以求的是在探索社会世界的时候,超越可以想当然地归入任一时代之当代意识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就必须是一座足够宽敞的房屋,足以一视同仁地欣然涵纳——当然也不是丝毫不加批判的——浪漫主义者与启蒙运动者的后续传人,同时也避免彻底的怀疑主义和独断论,前者认为惟一能够确保我们知识安全的源泉就是传统,后者则肯定通过直觉察知的世界的实证性。

18.3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的概念显然是哲学中一个古老的概念,不过也是很难明确阐述的一个概念。在许多用法里,它都处于相对于“实质”的“分析”的一面,处于发现我们的局限而非确认我们的可能性的一面。不管怎么说,我用这个词,与其说是要揭启这些由来已久的话语,不如说是要引出并同时拓宽一种更为新近的话语。批判理论这个名称,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兰克福学派”创建者们所挑选的,用来形象地概括他们达成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努力,包括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统一,以及结合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时代问题的一种根植于历史之中的自觉意识。这种努力所承诺的前景是诱人的,并且始终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遇到了一些被证明是无法克服的问题,至少对那些最初开展此项努力的人来说是如此。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重要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波洛克、纽曼、洛温塔尔、弗洛姆,以及有时候会保持一定距离的本雅明。其中霍克海默是一位具有克里斯玛气质的领导者和学术倡导者,维系着整个群体,让所有人都参与其中。这些人物在群体中的地位起起落落,有些人最终彻底断绝了联系。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流亡美国的年月里,其他还有些重要的学者也以多种方式与核心的法兰克福群体保持着联系,包括芬利、米切尔利希、拉扎斯菲尔德以及柯尔施。除了靠魏尔及其父亲的捐赠创建了社会研究所,维系群体的纽带还包括对霍克海默的忠诚,以及对一种将会弥合哲学与新兴的人的科学之间分野的方案的兴趣。

法兰克福群体的思想融合了来自许多方面的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德国观念论哲学与神学、浪漫主义,以及属于启蒙运动“被遮蔽的一面”的思想

家,比如尼采。诚如霍克海默(Horkheimer,1982)所言,他们想要从那种“传统理论”中区分出批判理论来,前者接受熟悉的東西的自我界定,未能在更深的层面上看到我们意识的各个范畴是如何被形塑出来的,又是如何反过来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以及我们认为有可能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很有必要再次提出,在这些传统理论的背景中,神学也属于重要的影响之一;也很有必要注意到,神学在分析既存世界时,是如何将其作为一个将要到来的可能会更好的世界的“史前史”,作为潜在的矛盾力量的表面反映。不过最重要的是,将批判理论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研究规划,而该规划将独具特色地融合从传统角度来说抽象、普遍的哲学与从历史角度来说具体、经验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这种观念的根源还在于黑格尔,在于由“青年黑格尔学派”开启、包括马克思与克尔凯廓尔在内的对黑格尔的种种回应。

最具体地讲,正是黑格尔想出了“启蒙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里,已经站到启蒙的对立面上的理性,还有可能用来赎救启蒙的潜力。他的哲学规划表现为要在现代生活中实现某种调和。即如哈贝马斯(Habermas,1987:4)所提请我们注意的,“黑格尔是第一位提出明确的现代性概念的哲学家。”^[14]这种兼容并蓄的调和涵括了调和的几个更为具体的方面:彼此相争的不同理性类型之间的调和,社会整体分裂了的各个片断之间的调和,以及个别同一性(individual identities)的互相脱节的各个环节之间的调和。用黑格尔的话来讲,现代性是由曾经整合一体的东西的几次“分裂”(diremptions)所构成的;由于并没有什么具有吸引力的途径,能够重新回到此前的统一,所以必须进一步前行,从历史现时的条件中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总体性来。

因此,通过启蒙辩证法取得推进,不失为一种努力的方式,以便有能力理解现时代,并具备转变(或统一)现时代的潜力。黑格尔所理解的主体性,既体现在个体自由的层面上,也体现在理念上的社会总体性独具特色的主体性层面上。而他所理解的批判意识,则建立在由根本的分裂引入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种种张力与矛盾的基础上。在黑格尔看来,现时代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这样一种主体性和批判意识。尽管说理性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并同时间接地通过促成不断增长的物质生产力革命),进一步推动产生了这些分裂,但理性也还是一条必然的出路。正是理性,可以使人们从单纯地怀想此前的统一,转变成认识到所有那些将人与人彼此分离的根本变迁,认识到那种理性,它可以引领这些异化了的人们看到各自本性是如何在他人分离出去的存在中被否定的。青年黑格尔得出这一结论的方式与日后的批判理论颇为相近,都想要寻求一种能够将自由与社会的整合相融合的解决之道,其基础在于某种主体间性而非关于主体本身的哲学。^[15]但是,成

年后的黑格尔却承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作为一种关键性的社会区分,是一种必然。他认可国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主体理性,也就同时放弃了对既存状况进行激进批判的可能性。

其他一些思想家则以多种方式,尝试在受黑格尔影响的思想框架内部,重新找回批判的能力。马克思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了通过一种当前史而趋近未来的基本设计,这样的当前史会重视其各项范畴具体的、专门的特征。实际上,他比黑格尔更坚定地贯彻了这一思路。^[16]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一样,都试图以艺术为例,来理解人类的绝对创造性。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将这一点进一步拓展到对劳动的更具一般性的分析。在此不宜详细探讨马克思分析的性质或含义。与批判理论的传统之间至关重要的关联,体现于马克思的去拜物教化批判(*defetishizing critique*,尤其是《资本论》第一章中所提出的),即各项具有历史特定性的人创的资本类型,包括劳动、商品与价值,是通过怎样的方式,逐渐呈现为准自然的,并在实际上主宰了人类生活中表面上更具偶然性的特性。种种物化了的资本范畴,将有质的分化的人类活动一概转变为具有压迫性的一致性与同一性。正是基于这个至关重要的论断,卢卡奇在20世纪早期进一步延伸了马克思的批判,更坚定地强调克服物化,也更坚定地依据美学标准来确立非物化的生活该是个什么样子。^[17]

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们借取了这条批判理论的脉络,并保留了以美学为核心的依据。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韦伯关于科层制作为工具理性之最终完成的分析相互辉映。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激起了一种对于总体受操纵的社会的恐惧,在那样的社会里,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中必然会导致超越现代社会的那种分裂与异化,却反而会趋于稳定。“大众文化阶段与此前的自由主义阶段相比,新颖之处即在于对于新颖的排斥”(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2: 134)。与此同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谈辩证批判的观念时,也联系到对于非同一性(*nonidentity*)的一种更为正面的评价,不仅仅是把它看作每一个主体与其自身关系中的张力,而且视其为人类个体创造性和自主存在的源泉。

无论是在理论的层面上,还是在生平经历的动力层面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都深切地关注对于异化了的社会的超越,此处的异化社会并不仅仅意味着将个体锁定为一个受操纵的总体性中的单纯环节。“完全的类似就是绝对的差异。范畴的同一性也就杜绝了个别实例的同一性……所以,所谓某人也只是意味着他身上那些可以用来取代其他任何人的属性:他是可以相互更换的,是一个复制品。作为一个个体,他是完全可以被消耗掉的,是彻底无足轻重的”(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2: 145—146)。这些理论家挑战了关于个体意识的传统哲学,拒绝

再仰赖个体作为认识主体假设具有的绝对同一性，这种绝对同一性的著名范例就是笛卡儿的我思(cogito,“我思故我在”)。在弗洛伊德、浪漫主义和尼采与萨德之类处在启蒙运动“被遮蔽的一面”的思想家影响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识到，作为个体的人必然比上述理解更为复杂，如果他或她要成为创造性文化的主体，情况就更是如此。同时，他们还以一种绝大多数寻常理论不会采取的方式来看待个体，视其为社会性的，是由与他人的主体间性关系所构成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推进了对于非同一性的认识，认识到与他人的多重关联的复杂性，从而使一个人有能力超出狭隘的自我同一性。有观念认为，在解释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时，应该是从浑然一体、独具特色的意图入手，或者从与时代模式之间的完美契合入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转而寻求推动作品超出直接明证的东西的那些张力与规划。他们认为，无论是现代社会成员的遵从主义，还是将潜在的张力甚至矛盾交付公共关注与行动时的困难重重，现代社会中这种同一性质都是愈益加剧，并且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对这样一种性质，他们也提出了挑战。有些观念认为人性不受随某个时代(首先是资本主义现时代)、不同的过去与社会位置等方面而定的特有理解的直接影响，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拒绝诉诸这样的观念。

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人性的观念，而是将人性看作始终根植于历史之中。比如可以认为人性意味着对幸福的追求，与他人保持团结的需要，以及天然的同情。霍克海默基于这种意义上的人性，发展出了一种对文明暗含批判态度的理性形式。马尔库塞也许会从现代社会从其成员那里索求的剩余压抑的角度出发来分析现代社会，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上述论证思路。资本主义与从工具的形式上具备理性的国家都要求抗御爱欲，抗御自然本性，摆脱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概括为通则的东西。〔18〕

正是因为存在诸如此类的张力，才促成了一种旨在揭露它们的批判理论。但批判理论的努力不仅仅是揭露这些张力，过去不仅限于此，现在也不仅限于此。这项努力是要揭示，诸如此类的张力不仅体现于文明与自然(人性的自然或外在的自然)之间，而且也表现为内在于文明及其特定文化产物(比如各种哲学体系)的矛盾。实际上，批判理论有一个基本主张，就是社会组织和文化中被融入了一种非同一性，一种与自身的张力。如果不把握这种潜在层面的矛盾与差异，就不能把握事件与动力机制的根源。

有些学者主张的是一种毫不掩饰的经验主义，或者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设想的那种理论检验。可以想见，这些人是无法容忍上述这种观点的。正如霍克海默在1936年撰写的“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一文中所言：



“思想是比能够直接观察到的程度更多地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完全是故弄玄虚”，这便是维也纳学派的一部作品中所表达的信念。堂皇的外表散发着彻底的统一与秩序，而恐慌与沮丧则在其下四处蔓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这项原则的重要意义尤为突出。专制君主，残酷的殖民总督，以及有虐待狂的狱卒，都始终渴望有带着这种实证主义心态的人自投罗网。（引自 Wiggershaus, 1994: 184）

我们之所以能够熟悉“传统的”、非批判的理论，所根据的不仅仅是过去，而且还有最最时新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关于知识积累的阐述，甚至包括那些明确区分事实与规范的解释学阐述，它们笃信这样一种观念：知识分子能够脱离于甚或凌越于社会的日常运作。霍克海默所谓的传统理论是一个宽泛的范畴，除了更具经验主义色彩的社会科学，还包括了大部分的康德传统。这许多种类的作品与批判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它们认为，理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脱离其他社会实践的东西，是曼海姆眼里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s）群体的领地，或者干脆是笛卡尔和康德传统中作为个体的认识主体的领地。

霍克海默写道：“传统理论观的基础，是在劳动分工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上，在这种分工中开展的科学活动。与之相对应的学者的活动，和一个社会中其他所有的活动并行，但与它们之间却毫无直接而明确的关联。因此，这种理论观并没有明确显现出科学的实际社会功能。它所说的不是理论在人类生活中意味着什么，而只是理论在一个孤立的领域里意味着什么。而它之所以会在这个领域里出现，其实是出于一些历史的原因”（Horkheimer, 1982: 197）。和这种理论观维系在一起的，不仅有对于社会的不负责任，而且还有理论家的一种自我形象，即便这种自我形象让人怡然自得，也不过是自欺欺人。“后者相信，他们是在根据个人的决断行事，而事实上，即便是在他们最精细的计算当中，他们也只不过是具体体现了一种不可计算的社会机制的运作”（Horkheimer, 1982: 197）。这样一种自我误解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倾向于将既存的社会条件视为惟一可能存在的条件。

因为理论家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活动看作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因为他或她只是简单地接受了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它的障眼手段，将其融入理论自我意识，所以就丧失了认识经验世界的或然性和内在矛盾的能力。“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成员眼里整个可认知的世界，在一种与该给定世界持续互动的传统世界观中得到解释的整个可认知的世界，就是观察者眼中事实的总和。它就在那里，必须被

接受”(Horkheimer, 1982:199)。因此,理论家就像社会中绝大多数个人一样,也未能看出社会秩序(或混沌)的潜在条件,而是夸大了由个体目的性立场所提供的虚幻的一致性。理论家也被误导去确认,已经正确处理了那些其实无法通过合目的的理性而轻易理解的社会根本条件,尤其是那些外在于有意识的人类之控制的人类活动结果,仿佛这些均出自自然之力。理论接受了历史性的人类行动的产物,视其为固定不易的人类行动条件,从而无法表达从这些条件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19〕

霍克海默进而主张,就连源自更具批判性的理论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也会陷入传统理论的习性之中。曼海姆重新构建了知识社会学,将其作为一门专业化的学科领域,有自己较为狭窄的考察对象,与关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分析划清了界线。尽管这种社会学可以产生出多少有些意思的成果,比如关于知识立场(intellectual position)与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之间的关系,但它却丧失了自己批判性地定位理论家本人或确定所考察事实的生产条件的能力。

因此,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理论的研究规划就变成成为人类重新找回人性的全部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批判理论的研究规划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延伸。批判理论不仅借鉴了早期的马克思,而且借鉴了《资本论》的第一章,同时也受到了卢卡奇有关物化的分析的影响,旨在揭示人类历史如何已经造成了人类能力的异化,以至于原本属于人类行动之产物的各种社会制度和过程,却超出了人们的行动控制范围而与他们相对抗。因此,批判的模式就是“去拜物教化”。它认为,人类能力的重建,从而是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必须基于真正的人际关系的恢复,以有利于*非人化的关系。在非人化的关系里,人只是物与物之间、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媒介。外在的自然必须始终是人类的“他者”,但这种“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并不如此。理论之所以能够发挥核心作用,是因为物化了的资本关系是靠着一一种意识形式而构成并且维持的。单单探察这是些什么关系,就已经是向克服它们对人类社会的主宰迈进一步。

霍克海默与其早年的同事们对于作为斗争对象的物化和异化的把握,尤其体现在“个体之目的性、自发性和理性与社会所赖以建立的那些运作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Horkheimer, 1982:210)。这一点又牵涉到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这是霍克海默及其同事们在大部分学术生涯中倾力关注的问题。〔20〕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按照世界的既有面貌原样接受了这个世界;事实上,它甚至再生产出物化而非挑战物

* 此处原文为“in favor of”,似觉应为“instead of”、“in place of”之类,即“而不是”、“取代”之意,请读者诸君明辨。——译者注



化,从而一开始就注定认识不到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性。而在这样的物化过程里,属人的内容,即体现人类创造力的原创活动,被排斥出社会世界的各项制度与过程。这种物化使得人的属性的这些方面有可能被当作纯属自然的属性,或者如涂尔干简练的概括所言,将社会事实当作物。[21]

高抬表面上各自孤立的个体主体,即理念化的认知主体,是与社会世界的物化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如此,这还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它还是对某种意识的系统清除,而这种意识原本可以认识到融入各种既存社会安排的张力、冲突、剥削与压迫。批判理论则会与此不同:“批判性思维既不是孤立主体的功能,也不是个体总的功能。相反,它所研究的主题是一种确定的个体,处在与其他个体和群体的切实关系当中,处在与某个特定阶级的冲突当中,最后一点,也处在与社会总体和自然之间由此产生的关系网当中”(Horkheimer, 1982:210—211)。将个体处理为一种非社会性、非历史性的客观性知识起点,“一种关于思维主体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下,观念论从笛卡尔以来一直延续至今,这便是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Horkheimer, 1982:211)。

霍克海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写作时,还依然能够乐观地认为,这种批判理论会与多少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联系在一起。要实现人类在即将到来的新秩序中有序安排它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关键在于缩小思想理解与具体物质实践之间的鸿沟。批判理论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思想的某种延伸,而是一种关于社会总体性的思维手段。无产阶级从自身的阶级立场出发,对社会的观照必然仍旧带有经验主义的片面色彩,而这样一种思维手段将会有助于从这种观照转向实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不再由不公正来安排结构。法西斯主义只是被表述为意识形态,是社会某些特定部分的根本动力,而与此同时,倡导价值无涉的科学的人,则声称自己是站在外在于所有社会冲突的思想立场上说话的。但是,霍克海默写道(Horkheimer, 1982:223—224),“批判理论既不像极权主义宣传那样‘根子很深’,也不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超脱’”。批判理论的起点不是自在的无产阶级,也不是其他任何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是某种思维,它所涉及的是整个社会最明确的基本结构,也就是使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整体,赋予它基本的动力,并指点其超越的可能性。当然,这样的思维也必然是由一些个人所做出的。“关于社会的批判理论就其总体而言,是一个单一的存在性判断的逐步展开。宽泛言之,这种理论说的是,商品经济具有历史给定性,其基本形式正是现代历史的基础,本身就包含着现时代的内在张力与外在张力。它一再产生出这些张力,并且愈演愈烈,在一个充满进步、人的力量的发展和个体解放的时期之后,在人对自然的控制获得巨大扩张之后,它最终对进一步的发展构成了阻碍,将人类引入一个新的野蛮时

代”(Horkheimer, 1982: 227)。

简而言之,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在这一点上还明显属于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但它日后的危机已经初露端倪。首先,当理论用在当代经验情境中,会更直接地指向一个新的野蛮时代,而不是对理论的超越(在1937年,这种看法或许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其次,霍克海默回避了对潜在革命的行动者做一明确的阐述,正如他回避了无产阶级或其他任何群体方面积极的政治参与。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种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当需要从社会的角度来给理论定位时,尽管霍克海默有能力清晰地从正面阐述批判理论作品中最具思想性的方面,但他却基本上只是从反面告诉人们批判理论不是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到了战后,都又回过来在批判理论当中造成了一场危机。即便在纳粹主义已被摧毁之后,对野蛮时代的担忧也依然非常尖锐。批判理论家们寻找着有能力在实际变革的规划中获得成功的社会行动者。他们不仅考虑了无产阶级,而且考虑了犹太人、学生以及第三世界的穷人,但最终徒劳无获。他们始终相信,不管各方有着怎样的正义,没有任何一方有能力进行如此具有革命性的变革,甚或没有一方有这种革命的倾向。实际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权威的研究中,尤其是《权威与家庭研究》的集体研究,其中关键的也是令人不安的重要意义就包括上述结论。^[22]经验研究表明,德国无产阶级的成员(而且包括那些据称是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比他们的对头更倾向于权威主义的态度。尤其是有这么一种形式的批判理论,其核心人物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它始终抱有一种否定的取向,随着其领军人物放弃了自己早年以坚定的自我约束为名,为安定自己所持有的那种乌托邦情怀,这种否定取向也只是愈发深重了。

霍克海默也好,阿多诺更甚,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努力,不再试图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提供一种具有历史和文化特定性的阐述。这也是日后困扰的一部分。在他们早期的大部分(尽管并非全部)作品里,他们曾经试图探索本雅明所谓的“史前史”,即从产生现在的历史动力的角度来分析现在。这些分析就涉及到至关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迁进行定位,既在大层面上,也在更具体的层面上,与资本主义的到来结合起来。无论是阿多诺还是本雅明,在力求阐明19世纪现代主义的起源时,都是这样做的。而霍克海默在早期研究资产阶级哲学的作品里,也像资产阶级哲学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那样,寻求确定哲学各学派与它们的社会条件之间的特定关系,并就此确立这些学派与它们所处的历史时期——首先便是资本主义时代——之间的特定关系。^[23]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历史特定性问题的立场模棱两可,而到了霍克海默写的《理性之蚀》,这种历史特定性研究路向所残留的最后一丝痕迹,也让位给了对工具理性造成的破坏所进行的

批判,而这种批判更超越于历史,更缺乏历史分期的意味。[24]由于体现为某种形式的工具理性在思想上可以一直回溯到古希腊人,而在实践中又据称是普遍性的,因此,很难看出,根据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可以批判性地挑战它愈演愈烈的过度发展和尘嚣日上的主宰地位。

如果要谈影响理性的一种疾病,就不应该把这种疾病理解成在某个历史环节上侵袭了理性,而是与我们迄今所了解的文明中理性的性质密不可分。理性的疾病在于,理性源于(男)人们想要支配自然的冲动,而“复原”则有赖于对原初疾病性质的深刻洞察,而不在于对最后表现出的症状的疗治。(Horkheimer, 1947: 176)[25]

在批判理论的核心,是“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的观念,即基于既存思想的各项范畴而做出的批判,使这些范畴激进化,不同程度地揭示它们的问题和未被认识的可能性。[26]霍克海默写道,“哲学将处在其历史背景中的既存范畴与其基于观念原则的主张相比照,以期对这两者(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做出批判,从而超越这种关系”(Horkheimer, 1947: 182)。所以说,这也就是阿多诺反复谈到的从内部破除资产阶级思想,从内部冲决观念论。正如他对马勒的“和声理性”(symphonic reason)的赞扬:“马勒并未变动既存之物的现有位置,但却从内部耗尽它。旧有的形式障碍现在表现为寓言,但与其说针对业已存在的东西,不如说是针对即将到来的东西”(转引自 Wiggershaus, 1994: 187; 也可参看第 188、531 等页)。

单凭内在性本身是不够的;要想实现蕴含在各种文化形式或社会物质关系上的种种可能性,不能只是一味地仰赖历史。需要以批判作为一种工具,来找出并彰显单纯的既存之物与其可能性之间的张力。对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来讲,这尤其意味着批判理论须有赖于对每一个时代、社会形态、情境或文本中内在的矛盾做出辩证分析。当内在批判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批判时,它就尤其有效。

对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著名考察,这只是一种读解方式。理性是在启蒙运动中并通过启蒙运动兴盛起来的,但它的发展却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引发了批判思维的巨大进展,包括现代哲学。另一方面,它引发了去人性化的社会理性化(通过韦伯的“铁笼”意象而更为社会学家所知),引发了技术的进步,这既使人类沦为奴隶,扼杀他们的创造性,也使人类逐渐远离了内在的自然(本性)与外在的自然。“就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而言,启蒙运动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将

人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确立其自主地位。尽管如此,这彻底启蒙了的世间所洋溢的却是耀武扬威的灾难”(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2:1)。如果只是简单地为启蒙运动做辩护,就等于是在为科层化辩护,为失去对技术的控制辩护,甚至是为纳粹科学的恐怖辩护。而与启蒙运动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关联,则需要认识到理性在施用的时候,如何可以说是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走向了理性的人类主体的对立面。然而,这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抛弃理性,之所以这么说,既是因为非理性的东西所包含的恐怖与理性的东西不相上下,也是因为只有理性才能提供一种研究路向,有机会重建内在一致的实践。根据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说法,各种社会力量与文化力量,包括科学、资本和政治权力的机制,都已经获得了自主性;它们已经获得了主宰社会稳定与变迁进程的能力。他们进一步延伸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已经提出的主张,揭示了人类主体是如何被自己所创造的那些社会关系形式本身化约为客体。〔27〕

这样来读解《启蒙辩证法》,可以表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依然认为,具有吸引力的资本主义(出于政治上的担忧,他们避免了直称此名)及其他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条件,还能够提供某种转型的希望,甚至是救赎的希望。纽曼、波洛克和其他直接写过政治经济学方面著述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事们,则更明确地为当代的危机确立了一些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原因,比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趋于崩溃,国家资本主义下市场的自主性被侵蚀。尽管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会继续对二战后兴起的“行政操纵化社会”(administered society)持有一种颇具历史特定性的批判,但在骨子里,他们在战后所坚持的批判理论,是以相对于自然而言的理性之超历史趋向为讨论层面的。在这一点上,《启蒙辩证法》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语焉不详。是否总体上的启蒙(理性的进步)已经铺定了通往灾难的道路?或者,是否启蒙运动以其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对资产阶级理性的制度化,导致了这种困局?每一种读解方法都能找到行文上的支持,但其中的一种提供了更多找到出路希望。

《启蒙辩证法》是两位德国犹太人在二次大战行将结束时的流亡之中撰写的,而他们也一度景仰启蒙运动,敬慕德国高雅文化。这两位作者没能够以某种信念把握乐观主义的源泉,这或许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他们写道:“启蒙运动具有极权主义的性质”(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2:6)。他们的意思不仅是指纳粹德国明显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极权主义,而且还指某种“文化工业”所蕴示的人类自主性的化约。在这种“文化工业”里,大众生产着日后思想家们所谓的艺术、音乐和文学方面的“拟像”,将具有创造潜力的人类化约为被动的娱乐消费者。当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试图找到希望的基础,一种“更好的”启蒙的源泉,一种更为正面的理性概念,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陷于茫然无措的境地。他们无法设想有一种不以理性为指引的进

步,虽说理性看起来已经背叛了自己正面的建设性潜力。

霍克海默写道,“在体察理性观念的时候,往往会设想理性的成就不会仅限于调控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理性被视为一种理解目的、确定目的的工具”(Horkheimer, 1947: 10, 黑体系原文所有)。但理性似乎已经退出了目的领域;关于基本价值观念乃至价值观念本身的取舍决定是根据普遍的共识,而不可能根据纯粹理性的理解。^[28]理性已经被化约为单纯工具性的了。理性,甚至是具体的科学制度,都可以拿来为纳粹的死亡工业服务,方便地就像是转向消灭贫困与疾病的任务。理性的制度化,理性的再生产,以及理性的实施,都不仅是纳粹德国所为,也是现代社会整体上所为;有鉴于此,理性似乎注定要彻底消除个体的自主性,而不是实现这种自主性。即如霍克海默所言(Horkheimer, 1947: 13),“成为理性的”这种表述就已经具备了这样一种意义,即采取一种调和的态度,而不是锻炼人的理性判断能力。*

问题并不仅限于政治。比如在宗教中,一种反宗教的精神就已经挑战了将理性作为根本洞见之源泉的价值观念(这种观点如今还在许多“基要主义者”那里延续)。这使宗教得以摆脱理性的腐蚀性力量,摆脱科学的威胁,因为宗教的真理据称依据的源泉不同于理性的源泉。但要实现这种防护需要付出代价,即宗教与现代社会保持批判性的关联的能力大大缩减,更不用说把握现代社会的总体性了。霍克海默主张,将理性化约为一种在多种手段之间做出主观选择的机制,而不是在多种目的之间做出客观决定的机制,这绝非历史的偶然。他认为这反映了社会变迁的物质进程,因此,光是认识到它是一个问题,还无法逆转这一进程。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担心,社会的既存状况不允许有任何真正具有转化能力的批判,不能为革命或其他实践行动提供任何基础,而革命或这些实践行动将会终结一种非人化的、压制性的、危险的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工作所能够做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持批判思维,但不再表现为其高度整合的形式,即作为批判理论,而是作为一种为未来一代提供的“漂流瓶”(message in a bottle)。这标志着后来被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悲观主义转向”(pessimistic turn)的开始。^[29]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更加剧了他们的抑郁情绪;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压迫环境里则更明显,前纳粹分子可以重掌权力,把自己装扮成纯粹的现实主义者,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乃至自由左派却被排斥为具有意识形态的立场(甚至被逐出大学)。对于这两处地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都感到所能做的工作最多不过是以

* 这里的“成为理性的”原文是“to be reasonable”,有“通情达理”、“见机得当”的权宜性意涵。——译者注

纯粹的思想形式,保持批判思维种子的活力,让它们在有朝一日条件变得更为有利的时候,还可以重新成长。在他们想来,即便这一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理性的主体化,乃至实行“自由企业制”的资本主义的成长,都似乎会赋予个体以力量,但这却带有欺骗性。“所有的单子,尽管以自我利益为沟壑而相互隔绝,但却往往通过对这种自我利益的追求而变得越来越相似”(Horkheimer, 1947: 139)。因此,遵从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与人和人之间一种真正愈益加剧的同一性质相伴随的,因为这两方面都严格地符合处在一个法团资本主义和大众文化的世界里的消费者的自我利益。同样,现代心理学基于一种可回溯至托马斯主义者的传统,主张一个个体的最高目标就是取得“调适”。真与善并不被看作带有批判色彩的价值,可以激励不满乃至社会变迁,而是在那些主张求适于既存现实,视其为个人健康基础的人的倡导下,以无须言明的方式,被等同于既存现实。

无论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艺术家,看起来,没有任何社会群体能够完全避免能力逐渐趋于僵死的这种势头,从而能够运用理性来把握社会过程的目的。起先,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曾经认为,要揭露现代社会中的对立(以及社会和它试图主宰的自然之间的对立),某种危机可能就绰绰有余。而当霍克海默不再相信有那么一群特定的行动者可以开展诸如此类的批判时,他便谈起了“理性的自我批判的可能性”。不过,即便是这种可能性也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社会不是陷入危机,倒反在繁荣与压迫的水乳交融之中凯歌前行。

18.4 新的一代

当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到来之时,渐已步入老年的批判理论家们普遍没有做好准备。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中,只有马尔库塞仍有能力在学生抗议运动重新将政治推回核心舞台时,依然认为激进行动是可能的。尽管传媒力捧马尔库塞为新左派的祖师爷,尽管他确实与学生活跃分子有直接的、积极的关联,但他对他们失望的。因为马尔库塞并不认为,实际革命的潜力把握在欧洲或美国的大学师生手中;他甚至不同意认为这些学生真的属于被剥夺阶级。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并不能把握社会总体的危机。他们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继承人。即便的确有什么社会群体可以声称有权接此衣钵,也声称拥有发动实际革命的社会力量,马尔库塞(和萨特一样)也认为那该是法农所谓的“世上的受苦人”(wretched of the earth),即第三世界被压迫的大众,以及身处第一世界却和他们同病相怜的长期失业的兄弟们(参看 Fanon, 1963, 以及萨特所撰序言)。他依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内思考,认为

预期中的激进社会变迁将出自激进否定性，出自那些被既存安排以最客观的方式去除权力的人，出自那些其生存与既定秩序截然对抗的人。这种人曾经一度据说是无产阶级；而在 20 世纪 40 年代，霍克海默也曾主张是犹太人；尽管 1968 年风暴中的学生可能会支持说该是被彻底剥夺权利的人，但他们却不是那个符合条件的群体。

另一方面，马尔库塞也和其他当代理论家一样，把握了学生抗议运动的某些根源。他看到了某些特定的压抑形式，包括爱欲的压抑，可以在某些方面为政治行动提供基础，甚至在富裕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商品化以拜物教化的形式，将人际关系化约为一个单一的向度，野蛮地破坏了人类的天然潜能，其方式必然会引发抵抗。也许最关键的是，他在自己多少带有些浪漫主义味道的主张中，表述了学生抗议运动核心的直觉认识之一：“针对的是否定自由，甚至是否定自由的可能性，与此相应的，是承认自由权利，尽管它们进一步增强了压抑”（Marcuse, 1964: 244）。这也预示了他日后一项更为激进的主张，即拒绝介入人类主体真正需求与需要的这种忍受，本身就含有一种内在的压抑（Wolff, Moore, and Marcuse, 1969）。

当然，学生对战后社会的批判五花八门，将和平主义，心理关怀和文化关怀，或者说是一种个人政治，与系统分析融合起来。当学生们谴责这个抽象的、非人性的、暴力的社会时，实际上也是承继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对于直接促进人际关系和深层的直接经验，他们也有远为实质的关怀。正如内格特（一位活跃分子，曾是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时的助手，后来成为社会学教授）所总结的那样（Negt, 1978: 65）：“批判理论的复兴中反制度、反权威主义的成分，通过利益和需求的政治化，与实现以下三样事情的努力结合在一起：（1）突破商品交换无孔不入的强制性中介作用；（2）突破潜在于工具理性的机制中、并作为对基本本能之升华与压抑的结构内在因素的暴力；（3）确立蕴含意义的直接性，就此消除沟通与经验之间的分裂。”^[30] 这种批判借鉴了赖希及其他精神分析传统的激进传人，表现为不仅更加偏重个人范畴而非系统范畴，而且更加偏重阐述直接性本身的长处。当然，这和更为传统的批判理论关于抽象的商品化社会的阐述也不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它也标志着强调重点上的一种转换，预示了“新社会运动”。所谓“新社会运动”，是以直接人际关系和经验中的一种人身政治为基础，很少诉诸高雅文化。对于这种运动，哈贝马斯会把它分析成抵抗的实践，根植在“生活世界”中，抗御着非人化的、“非语言化的”系统理性。^[31]

马尔库塞乐意直接参与 20 世纪 60 年代激情四溢的政治活动，这种态度使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大为震惊，也颇感忧虑，因为他们两位宁愿做一个旁观者，这还不够，他们甚至宁愿与争论相隔绝。尽管如此，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理论也在

事实上促成了德国和美国学生的政治分析与文化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再一次几乎成为批判理论的同义词,实际上几乎成了理论批判的同义词。

不管怎么说,或许最重要的一位理论家还不是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而是阿多诺过去的一位学生,名叫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深受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早期著作的影响,博士毕业后即去往法兰克福,开始在社会研究所工作。他起初谋求投在阿多诺门下准备自己的授课资格论文(Habilitation,一种更高层次的博士学位或大学教师的资格认定),但受阻于霍克海默的反对(以及阿多诺自己的犹豫)。反对的原因是说他过于“左”倾,对启蒙运动没有充分的批判态度,过于积极地想要将批判理论直接带入公开的政治论争。

哈贝马斯在自己早期的著作里,追求了两套基本的研究规划,其宗旨都是重新确立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批判理论的可能性。换言之,两套规划都以理论与实践的联结问题为指引。第一套规划致力于恢复以往理论的资源,揭示传统上的社会科学如何未能发挥自身的批判潜能。^[32]第二套规划追求的则是对实际历史制度的一种内在批判,在这样的批判里,理性的批判话语实现了政治意涵。

在启发哈贝马斯的众多思想源泉当中,有阿伦特的《人的处境》(Arendt, 1958)和亚里斯多德传统的变革。受这些思想源泉的启发,哈贝马斯力求在古典政治学说中确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可能性。关键不仅仅在于理论服务于政治目的,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工具理性,而是在于发展一种更为宽广的认识,将政治实践看作能够充分实现人的潜能共同生活方式之构成。就此而言,批判理论直接回应了政治需求:它是“一种具有实践意图的关于社会的理论”(Habermas, 1973: 1)。

哈贝马斯主张(Habermas, 1971),所有的知识都必须从引导实践行动者创造这种知识的旨趣(interests)的角度来理解。^[33]这就意味着,当一位批判理论家考察此前的理论时,他的任务就是确定:导致理论生产的各种形成知识的旨趣(knowledge-forming interests)之间的关系,限定理论的那些历史条件,以及理论的认识内涵。这样的主张是在对现代重要哲学体系的一系列考察中逐步阐明的,它不仅深入发挥了哈贝马斯在其前期研究中的主张,也深入发挥了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与“当代社会哲学的状况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等文中的论点。哈贝马斯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一样,也同时借鉴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以发展一种特定的理论批判的观念,这种理论批判可以表明,“客观的”知识,即作为一系列外在的结论而逐步接近世界的知识,如何可以和以主体间性之方式构成的行动意义与行动能力重新建立关联。一个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起先是不可能认识到他或她自己生活史的全部意义的,也无法对此负起充分的责任,采取充分有效的行动。这恰恰是因为,构成那些生活经验的意义和在人际角度上行之有效的旨趣中的核

心方面受到了全面的压抑。而精神分析本身就提供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医生与患者可以在这种关系中一起逐步克服沟通障碍,让此前受压抑的动机可以进入有意识的理解与控制。与此类似,批判理论本身作为一项主体间性的、沟通性的事业,也针对一种特定的社会发挥了此项功能,这个社会同样陷入能力的全面丧失之中,无法认识到自身历史的真正源泉。人的能力被不知不觉地压抑了,可以通过朝向更充分、更自由的沟通予以解放(也可参看 Habermas, 1970)。哈贝马斯吸取了这种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沟通过程的意象,设想“在组织社会关系时根据这样一条原则:具有政治后果的各条规范的有效性,都取决于在免于支配的沟通中达成的某种共识”(Habermas, 1971: 284)。不仅如此,“在其结构上即有助于澄清实践问题的那些理论,其宗旨就是要切入沟通行动”(Habermas, 1973: 3)。

在他的第二套研究规划中,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各项制度进行了基于历史的内在批判,以此趋近这同一项目标。这方面的核心研究便是霍克海默所反对的那部授课资格论文,他认为哈贝马斯的取向完全是过于乐观了。[34] 实际上,将哈贝马斯作品贯穿一体的特性之一,便是自始至终不堕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那种让人萎靡不振的悲观主义。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Habermas, 1989)里,哈贝马斯考察了使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真正表现出激进倾向的那种独特政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退化。[35]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公共领域是在此前的文学公共活动场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让人颇感惊讶的是,他忽视了科学与宗教)。[36] 沙龙文化与报刊新闻界也都助了一臂之力。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是以具有理性批判色彩的辩论为基础的,至少在原则上如此。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谁的论点最为有力,而不是其倡导者或反对者的身份。只有那些相对而言的精英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但这些精英的身份却是五花八门。工匠师傅可以在咖啡馆里与乡绅地主厮混在一起;贵族与平民在议会与沙龙中都杂然相处。不过,公共领域的话语与其说是肯定或挑战这些差别,不如说是将它们“置括”后存而不论——哈贝马斯特别挑了这个现象学的用语——使这些差别无关话语本身的宏旨。公共领域讨论到国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有关事务,也能够对这些事务有所影响,尽管它不属于国家,而只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公民们依据自主性进入这个公共领域,这种自主性是他们的私人生活和非国家的市民关系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同时赋予他们的。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公共领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公共沟通的典范,有能力实现对社会的理性指引。当然,这种沟通的潜力尚未充分实现,但资产阶级民主的各项范畴却并未就此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或较为悲观的批判理论家所假定的那样,变成无足轻重的东西。恰恰相反,一种内在的批判可以使理性批判话语

的有关理念再次发挥政治上的效力,就像关于权利的那些理念一样。这些理念已经被吸纳进一种旨在确认既存制度而非挑战既存制度的话语之中,由此也已经被化为意识形态。但批判理论可以让公民们意识到他们尚未实现的潜力,使他们有能力运用这些理念,来和那些名义上恪守这些理念但实际上却并不想依靠它们的人做斗争。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阐述,展现了一段 18 世纪的黄金时代,而随后便是衰落与退化。但由上述介绍可以看出,他这种阐述并不是直接就让人灰心丧气的。这种转型已经剥夺了公共领域最初所具有的理性批判话语的力量。通过进一步的探究,哈贝马斯力求确定这种转型的社会根源。因此,内在批判的步骤据说可以结合认定有能力将理论所揭启的可能性融入实践的历史主体。

不过话说回来,由于受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大众社会理论的强烈影响,哈贝马斯对 20 世纪 50 年代的描述也在逐渐削弱他自己原先的乐观主义。^[37]他所揭示的这个公共领域,由于受到两个重大过程的作用,不仅已经去除了激进的成分,而且在根本上趋于消逝。头一个过程便是越来越多的公民日渐被吸纳进公共的领域。这个过程承继了早期公共领域真正的民主逻辑,面对不断再现的要求,即更加重视其民主理念,这种逻辑无法维持其自身的排他性。但是,随着公共领域规模的扩大,它在形式上却趋于退化。即便新的参与者为该领域中理性批判话语所做的准备已经赶上了他们的前辈(那不是哈贝马斯所考察的范围),但是,因为必然得依赖大众传媒,因为必然有可能出现以广告、公关和类似制度为代表的对沟通的操纵,所以他们的话语还是会被扭曲。其次,公共领域丧失了它在一个明显有别于国家的市民社会里所曾经拥有的一部分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在 20 世纪,尤其是在二次大战之后,随着政府逐渐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随着福利国家的形成,随着巨型公司具备了政治功能,公民们也被组织进各种利益群体(或者被这些群体所代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也逐渐趋于瓦解。社会决策越来越从公民在政治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批判话语里转移出来,成为官僚、有文凭的专家及利益群体精英之间的协商(而不是话语本身)领域。

哈贝马斯直接跟随着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前辈们的足迹,举出大众社会的规模与经过中介的沟通,以及“行政操纵化社会”中瓦解了的国家—社会之区分,作为公共领域在结构基础方面发生根本转型的例证。和他的前辈们一样,这也使他得出的结论越来越具有悲观的色彩,他的著作结尾的调子与最初的有明显不同。尽管他的内在批判有能力确定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中,那些带有解放和理性色彩的未曾实现的潜能,但他却无法确定行动的社会物质基础,以便在 20 世纪晚期的公共领域中实现那些潜能。^[38]



因此,哈贝马斯放弃了为批判理论确立一种具有历史内在性的基础的规划。他还是在寻找批判的立足点,但已经不再着眼于各种具有历史特定性和文化特定性的社会形态的比较,而是着眼于深入阐述人类生活的普遍条件。他把自己的批判扎根于一个宽泛的观念,即沟通中带有进化意味的进步,而不是历史发展本身。在学生运动的那些年月里,他从理论上概括了具体转型的种种潜在可能,尤其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当代各国正经历着一场合法化危机,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沦入行政规划的掌控,这些国家所依赖的文化基础都被破坏了(Habermas, 1975)。哈贝马斯还念念不忘看到真正的政治话语重新占据公共领域,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对学生运动表示了欢迎(哪怕他公开谴责其中较为极端的一些趋向为“左倾法西斯主义”)。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哈贝马斯并未将自己的批判理论建立在话语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不受阻碍的沟通的潜能基础上。能够表明这种沟通的,不是实际的制度或历史,而是言说本身所蕴含的理性。他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以沟通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原初分裂为起点,而这种分裂甚至也体现在以理解自身为取向的言说和以实践效应为取向的言说之间的沟通上。工具理性的“自主化”愈演愈烈,自视为自足的,充分适应一系列实践规划的,这正是许多社会灾难和异化的来源。尽管如此,在言说本身的超验特征中,也存在着内在固有的对抗趋向。因此,每一沟通均需基于某些特定的有效性标准的假定。比如,言说者不仅要真实的说,而且要真诚地说,不带有操纵的意图。即便并未有所表达,这些有效性诉求也始终有可能接受话语的救赎。种种社会转型过程和文化转型过程可以趋向于使越来越多的沟通发挥出这些内在的潜能(或许还会表现为某种进化的形式)。^[39]

哈贝马斯日后关于沟通行动的著作保留了他早期作品的一项关键主题。他力求找出通过哪些方式,可以实现启蒙规划或现代性规划中未曾完成的潜能(参看Bernstein, 1985, 其中收有哈贝马斯的一章)。在转向普遍语用学后,他为批判理论的乐观主义取向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比自己在对公共领域的带有历史特定性的阐述中所确立的更可信。实际上,这条道路霍克海默就已经预见到了,尽管不是在公开出版的书中:“要对某人说话,根本上就意味着承认他是未来自由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的可能成员。言说确立了朝向真实的一种共享关系,因此,也是内心深处对另一存在的确认,其实就是根据它们的能力,对所有存在形式的确认。一旦言说否定了任何可能性,它也就必然与自身产生了对抗。”^[40]阿多诺赞同霍克海默的洞见,但面对二次大战和纳粹主义所带来的明显矛盾,他们看起来无法以此为依据,转而关注语言是在哪些形式下,被剥夺了自身的意义的。

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一开始也是关注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内在

批判,而后来也是越来越转向一种超历史性的理论。但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他仍有能力维持一种积极正面的行动取向。事实上,悖谬的是,哈贝马斯从历史中走出,转向恢复一种乐观主义的基础,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从历史中走出后,则转而将自己的绝望情绪进一步激进化。

无论是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还是哈贝马斯,都不曾对差异的问题完全视而不见。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系列“辩证”的主题占据着核心位置:非同一性;抗拒一个遵从的、调和的社会;以及抵抗这样一种社会科学,它已经沦为确认既存的条件而不承认这些条件中蕴含的矛盾。尤其是阿多诺,受到荷尔德林名言的启发,说“有差别的就是好的”。阿多诺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质疑“同一论思维”(identitarian thinking)中的唯我论(solipsism)和绝对论,质疑非辩证思想中暗含的主观主义及对差异的抗拒(Adorno, 1973: 尤其参见第 183 页)。但是,关于非同一性和差异的这种泛泛之论,与把握具体特殊性的能力还相去甚远。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社会化的个人只是通过群体认同*才得以维持的”(见 Adorno et al., 1976: 222)。不过群体认同并非其兴趣所在,他所追求的是以语言和个人潜能的普遍假设为基础的一种沟通行动理论。哈贝马斯和他的前辈们在阐述人类生活的普遍条件时,都未能充分把握人类的集体差异与个人差异所具有的根本性、构成性的重要意义。更晚近的一些理论传统,首先是女性主义,则已经在揭示人类差异被遗落的意涵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8.5 公与私的转换

在现代早期,公与私的区分本身就获得了新的意义,新的观念是:在国家统治的直接机器之外,既存在着公共话语和行动的领域,可以探讨国家,或对国家有所影响;也存在着公民的私人事务,受到合法的保护,免于过度的国家调控或干预。人们同时生活在这两个成对的方面,就好像任公职者的私人事务逐渐与其公共角色相分别。^[41]因此,公共领域的观念几乎总是含糊不清的,既指政治共同体的集体关注,也指对确定那个政治共同体至关重要的国家的各种活动。这种带有双重含义的关于公的观念也铭刻在与之相对应的关于私的观念上。私的东西既不属于国家管辖权限的东西,同时也指关注不同于公益、“res publica”**或合法公共关注之事务的私人目的的东西。

* 原文为“Group identity”,即群体同一性。——译者注

** 拉丁文,“共和国”、“国家”之意,字面意思为“公共的东西”。——译者注

“公共”的观念是各种民主学说的核心。它既表现为民主的关键主体,即作为一种话语性、决策性公众组织在一起的人群,也表现为民主的客体,即公益。到了晚近,这已经成为带有高度批判性的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英语国家里尤其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哈贝马斯关于该主题的重要作品英译本的出版(Habermas, 1989;也可参见 Calhoun, 1992),恰逢共产主义的覆亡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民主转轨的关注。例如,当哈贝马斯探求有关公共领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时,根本的问题便是,如何可以通过多少属于平等主义的广泛参与理性批判话语,来实现社会的自组织。

不过,关于妇女被公共生活所排斥的情况的考察,已经极为清晰地表明,对公共的概念理解也会以某些反民主的方式发挥作用。首先,如今被理想化了的早期资产阶级时代公共领域对于妇女是完全排斥的。妇女被排斥出英国的议会和法国的国民议会,但同样是这些方式,她们过去没有被排斥出贵族沙龙文化,当时也没有被排斥出大众的政治话语(Landes, 1988; Eley, 1992)。关于“民主包容性”的争议并不是一个定量的问题,并不在于哪一个公共领域的规模,或是哪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可以在其中说得上话的成员的比例。显然,这个问题在于分层和界限(比如对于无产者、未受教育者、妇女或移民的开放程度),也在于公共领域如何吸纳和承认多种多样的身份认同,人们在市民社会中有着形形色色的牵连,也就把这些身份认同都带进了公共领域。问题在于,为了参与这样一种公共领域,妇女们是否必须以此前专属于男人的方式行事,而避免讨论一些被界定为适合私人领域的特定话题(据说私人领域具有更多的女性特质)。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的公民权话语,认为它表面上平等适用于每一个人,实际上却无须言明地假定,将公民理解为有产者。另有一种同样类型的虚幻的普遍主义,则将公民这个用语表现为在社会性别上是中立的或均衡的,其实却不承认一些潜在的观念是高度社会性别化的。

所有试图赋予单一一种公共话语以权威地位的努力,都会特别强调某些特定的主题、言说形式和言说者。这一方面事关强调单一的、一体的整体,是所有公民的话语,而不是其中哪一个子集的话语。另一方面,这也涉及到公与私之间的具体分界。比如,如果性骚扰被视为事关妇女而非男性,那么它就成了—种局部性的事务,而不是针对整个公域的事务;而如果它被视为一种私人事务,那么根据界定,它就不是一项公共关注。这也适用于其他大量关注主题,它们都未能在某个公共领域中获得充分的认可,因为这个公共领域被理解为一套单一的话语,探讨的是被一致明确认为具有公共意义的事务。

另一种替代思路则是将公共领域看作由多个公众群体组成的领域,而不是单一—群公众组成的领域。这并不是说,涌现出难以计数的潜在公众群体,本身

就是对民主的这一根本问题的一种解决之道。相反,民主需要话语跨越根本差异的界限。重要的是,任一特定公众群体的成员都应该有能力进入其他公众群体。高度集权化的国家的政治效力需要在相当大的规模上对话语和行动进行某种组织。但即便是最集权化的国家也不是一元化的;对于这些国家科层机构的不同部门,可以各自独立地接触,在许多情况下,由在一个较狭小的范围内而不是整个政体里组织起来的公众群体来接触会最为有效。因此,对于政府管制机构所考虑的环境问题,以环境为核心的公共话语会比无所不包的一般性公共话语更好地予以监督。这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必要有一种更为广泛的话语,平衡考虑各国之间或不同利益之间的不同需求。但我们可以把这种话语作为相互异质的公众群体之间的一种多重交织来理解,来培育,而不是树立单一一个至高无上的公众的特殊地位。

不管怎么说,一旦我们开始从这类关于多个公众群体的替代性理解角度来思考,就会遇到阻力,而阻力的起源,就在于有关公共领域的种种观念已经通过某种方式,在民族主义话语中扎下了根。关于公共的观念一般会从民族主义的论调中吸取预先认定界限的能力,也吸取对关于整体的话语的强调。作为一种理解政治共同体的方式,民族主义论调会强调许多比喻性的辞藻,包括将个体理解成与整个民族有着直接的、无中介的关联,从而使人们将民族认同作为一种直接体现在个人身上的东西来体验、来认识,而不是作为在中间群体里的成员身份所带来的或然性结果。因为民族是一元性的、整合一体的,所以民族主义思想就不会提倡所谓多重的、多类型的公众群体的观念;它一般都会拒绝接受所谓民族内部子群体的话语或运动具有准自主性的主张,认为这些东西具有分裂性。关于公共生活,我们的常识之见和具有政治效力的理解,都依赖于民族主义的假定。这种依赖的程度非常大,容易出现同质化普遍主义的偏向。但不管怎么说,在民族主义或其他任何文化形态压制差异的地方,它在根本上也就破坏了一个公共领域贯彻民主的理性批判话语的能力。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未能充分估计到,差异,即阿伦特所谓的“多元性”(plurality),在何等程度上是一种非常根本的东西,不仅对于整体上的人类生活至关重要,而且具体对于公共生活的规划也至关重要,因此,对于民主也是至关重要的。^[42]在阿伦特看来,多元性既不是私人生活的条件,也不是日常个人品味的产物,而是在创造性的公共成就中蓬勃发育起来的潜能。阿伦特之所以会接受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对公共参与的限制,恰恰是因为她认为,一种物质生产的生活会施加无须言明的顺从性格,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超出这样的顺从,在实践的领域里真正秀出于林。不过我们不必非得接受这一具有排他性的假定,就可以把握

■ 一点：一种公共话语的存在理由，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形形色色的成员都将有可能把不同的观念带入思想的考虑。

要想将公私之间的区分与实践 (praxis) 和单纯的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区分联系在一起，关键之一就在于，不能仅仅将公共领域表现为相互竞争的物质利益之间你追我赶或彼此协商的领域。在哈贝马斯的阐述里，强调了一种超然的理性批判公共话语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当公共领域受到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渗透时，也就发生了退化。他就此进一步推进了上述意象。如果假定这些公共话语只是为了实现客观上可以确定的目的——更不用说那些可以化约为以利益最小公分母为表现形式的共同计算的目的了——而提出的不同政策，那就等于将公共领域化约为边沁主义政策专家的论坛，而不是民主的自我治理的载体。这显然不是哈贝马斯想要倡扬的东西。不过，这与他有关公共领域的阐述之间的距离，倒也不像乍眼看来那么明显。一个原因便在于，哈贝马斯并不像阿伦特那样强调创造性。他基本上还是从理性批判话语的角度，而不是从认同形塑或表达的角度，来探讨公共活动的，在某种程度上缩减了多元性的意义，降低了它的重要性，转而引入了一种可能性，诱使人们诉诸一些更适于技术理性而非沟通行动的技能。^[43]而在这个问题的背景当中，也包括了作为哈贝马斯理念型建构基础的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中公与私相分离的那种方式本身。

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所追求的，是通过废除关于行动者之间差异的话语的正当性，来达成话语的平等。这些差异被处理为事关私人旨趣而非公共旨趣。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最好的一种公共领域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交往，它远非预先假定地位的平等，而是根本就不考虑地位”(Habermas, 1989: 36)。它的运作有赖于“相互乐意接受给定的角色，同时暂且搁置他们的现实”(Habermas, 1989: 131)。哈贝马斯主张，之所以采取这种对于差异的“置括”，视差异为纯属私的范畴，与公共领域无关，是为了捍卫一种真正的理性批判观念，就是说在决定论证主张的对错时，必须根据它们本身的长短优劣而非提出主张者的身份。与此同样重要的，是 18 世纪公共领域中出于核查监督的担忧而盛行匿名或托名作者身份的现象。但是，这也会造成对任一政体中许多成员某些最重要的关注的排斥，这些成员既包括那些现有身份被压制、贬低的人，也包括那些在探求可能的身份时被阻截的人。不仅如此，这种对差异的置括还破坏了公共话语的自我反思能力。如果不可能认真地交流一个公共领域中各成员之间的基本差异，也就不可能处理跨越此类基本差异界线的沟通所遇到的难题。

哈贝马斯告诉我们，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社会中创造出来的，是从市民社会中脱胎而来的。^[44]因此，公共领域并没有被吸纳进国家，而是探讨国家和国家政策

可能涉及的那些类型的公共话题。它(1)基于一种不同于私人利益的公益观念；(2)基于赋予个人独立参与公共领域的权力的那些社会制度(比如私有财产权)，因为这些人的生计与谋取生计的渠道并不依赖于政治权力或庇护；(3)基于一些为个人成为公共领域中理性批判的自主主体做好准备的私人生活形式(尤其是家庭)。公共领域依赖于一种前政治的私人生活的组织，后者鼓励个人并使他们有能力超出私人认同和关注。从这一意涵中生发出一种核心性的悖论与缺陷(不仅仅体现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而且也体现在它所分析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的自由主义观念上)。这一意涵试图给出超越差异的希望，而不是提供承认、表达和相互关系的机会。

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有赖于两点。首先，需要质疑所谓独具权威性的单一公共领域的观念，转而考察相互交织、彼此异质的多重公众群体之间的关联方式。其次，需要将认同形塑理解为公共生活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以完全先于公共生活就在一个私人领域里确定下来的。

所以说，即使认识到同时存在多个公众群体，其中没有一个可以声称相对其他群体享有完全的支配地位，这还只是第一步(Eley, 1992; Fraser, 1992)。不管怎么说，关键在于，它还有赖于摆脱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核心假设。这是自由主义话语的种种幻觉之一，就是相信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关于公共事务，有一套或者说可以有一套独具权威性的单一话语。这等于试图提前解决一种争议，而这种争议原本是民主过程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假定，即在一个共同社会里的成员身份要先于民主的决定；它还反映了一种无须言明的信念，即政治活动是围绕着一个单一的、一元的国家来进行的。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人们在大量不同的公共领域里说话，还是这些人对多重的权力中心发表意见(不管它们是同处单一国家之中，但在制度上有所分化，还是融合了多重的国家或政治机构，抑或认识到像工商企业之类表面上的非政治机构其实是权力的核心，是公共话语探讨的对象)，都是正常的，并无有悖常理之处。这些公共领域到底有多少，分离程度到底有多大，都必然随经验实际而有所变化。但是，每一块公共领域都会倾向于使某些主题更容易被探讨，同时压制另一些主题；每一块公共领域赋予不同声音的权力也都会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妇女或少数民族在推行属于自己的公共话语的时候，就不仅反映了某些特定人群被排斥出“主导”公共领域，而且还反映出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一种积极行为。这就意味着，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她们被主导公共领域一视同仁地包容，就既不能充分认识到她们那在一定程度上分离的话语，也不能为潜在的根本问题提供一种解决之道。重要的是组织公共话语，以便让多重领域之间有可能形成话语的关联。



因此,单单承认有多重公共领域存在,并不能完全取代哈贝马斯就那个公共领域(即关于在最大的社会范围内提出的公共话语及其影响政治的能力)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它只是意味着,这些问题需要在一个多重的、各个不同的公众群体世界中来回答。只授权其中一个公众群体为适宜的“公众群体”,或者是其中有些公众群体比其他据说是“私人团体”的更具有合法的公共性,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力的政治演练。换言之,确定谁的言谈更适于公共,这本身就是政治争论的焦点。如何区分出所谓适于“私人”的东西,因此,也就是不适于在公共话语中讨论或不适于用来解决公共争论的东西,不同的公共话语一般都会有不同的结论。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能够适用于多种话语,将私与公区分开来。比如,我们不能说银行存款或性的取向本质上都属于私人事务。在话语的每一块领域里,都有可能出现变化不定(和可以修改)的公私之分。

在公域里发生、可以为最广大的公众所接触到的大量话语,其实并不是明显关于公共事务的。我的意思并不只是说,人们利用像上电视这样极具公共性的机会,来谈一些习惯上认为属于私人的东西,比如他们的性生活。我的意思是说,许多事关身体政治*的广为流传的话题,比如养儿育女、婚姻离合以及各式各样的暴力侵犯,都被带入了一些以公共的形式构成的讨论,而这些讨论却并不以类似于报纸社论版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公共性,在更具权威性的公共领域里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不会以同等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讨论。对这些事务的讨论是在教堂和自助团体那里,在影迷当中,在电台谈话节目上,在等待自己的孩子从学校舞会散场的父母当中,在那些等在监狱里待探监时间开始的人群里。至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群在组织自己的话语时,多大程度上是根据哈贝马斯所谓启蒙运动公共领域的经典范例所评价的那种理性批判思路,则无法一概而论。当然,对于其他任何公共讨论,情况也都是如此。但要是先验地推定,只有在关于国家或经济方面的事务上才能表现出理性批判的立场,这些方面也必然构成了公共领域的正确范围,那也是一种误解。相反,被放置到私人领域中去,既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一种保护,以免遭公共干预或监督,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一种解除力量的手段,将其排斥出公共话语。

不同公共领域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所有这些各自不同但多少具有公共性的话语都看作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就会忽略他的理论研究规划的核心,将他对某种特定话语的强调完全视为武断的判定,这种话语试图以一种理性批判的基础来运作,包容彼此不同的人们,让主张本身而非提出主

* 原文为“body politic”,传统释为“国家”。——译者注

张者的身份成为说服的依据,将国家的运作列入讨论。这就会在根本上消解公共领域分析对于民主理论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哈贝马斯所采取的公私之分确实存在疑问,因此,一定程度上也是自己招来了这些问题。这尤其体现在他将认同形塑(因此,也是利益形塑)归置到私人领域中去的做法上。

哈贝马斯假定,身份认同将在进入政治公共领域之前,就在私人领域〔和(或)其他公共情境下〕中形成。只有当人们通过各自私人的、文化的经验,为这种理性批判话语领域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个领域才能发挥作用。哈贝马斯简要地探讨了一个以读小说和上戏院的公众群体之兴起为根基的文学公共领域之兴起,是如何促进了政治公共领域的发展,但他并未进一步深入挖掘这一深刻见解。当谈到文学公共领域在19世纪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一旦它已经为铺筑启蒙运动政治公共领域的兴起道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哈贝马斯也就中断了对它的讨论。他并未考察随后在文学话语中的一些变化,考察这些变化是如何可以联系到人们带入政治公共领域的各种认同的变化。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来讲,哈贝马斯并没有充分地将形塑认同、形塑文化的公共活动列入考察主题。他主要还是在探讨私人生活领域〔而私密领域(intimate sphere)则是它不可侵犯的内室〕与公共领域之间的一种对立,认定是私人生活与在市民社会中所占据的经济位置两者的融合产生了认同。不管怎么说,一旦我们不再认为,身份认同是在参与公共领域之前就已经一劳永逸地形成了的,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所有的公共话语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认同形塑提供了机会。这便是内格特和克卢格所提出的深刻见解(Negt and Kluge, 1993)的核心所在。他们借用了“经验视界”(horizons of experience)的现象学观念,来拓展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路向。经验这东西并不完全先在于公共领域的理性批判话语,也并不只由这种话语来探讨。它只有一部分是通过公共领域而构成的,与此同时,它还不断以不同的方式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指点方向。^[45]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公共领域,一类是认同形塑表现得更为显著,另一类则是理性批判话语更突出些;但我们不应该假定存在一种政治公共领域,其间的认同形塑(与重塑)是无足轻重的。^[46]认同形塑与时事讨论是很难分得一清二楚的。

将认同形塑的规划排斥出公共领域,不会比排斥那些“具有令人困扰的差异的”身份认同具有更多的意义。今天,很少还会有人主张(至少在大致为自由主义的西方公共领域里是这样)反对包容妇女、少数民族和种族,几乎所有其他群体都明显地归于同一个国家,属于同一个市民社会。然而,也还是有许多人主张拒绝给予那些不接受形形色色的同化规划的人以公民资格。德国人自有他们带有种族色彩的国族公民身份(national citizenship)观念,但与外来移民之间存在某种问题的可

不单是德国人。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语言被用来要求在佛罗里达只能说英语，或者，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要想呆在法国，就必须遵从某些特定的法国文化观念，等等。不仅如此，其他还有许多主张在其形式和地位上也与此多有相似，比如只有同性恋者才可以在军中服役。它们要求遵从一致成为完全公民资格的前提条件。然而，全球范围内人群的流动还在继续，越来越难以压制差异，哪怕这种流动正在挑起压制的冲动。从某种内在固有的根本意义上说，如果公共领域有能力改变市民社会，形塑国家，那么它自己的民主实践就必然会面临成员资格及它所代表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无法“客观地”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大大小小的公众群体负载着政治意涵——但也具有理论上的蕴味——的话语。这些形形色色的公众群体本身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功地包容不同的声音，将对它们在实践中重要性的切实发挥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

18.6 反思批判理论

总的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既不曾凭空创造批判理论，也没有在此项事业中独享什么产权。但不管怎么说，在融会一些关键性的思想传统以启示批判理论方面，在提出一种见解以揭示社会理论能够如何不容小觑地参与公共领域话语方面，他们也的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今日继续推行批判理论的，不仅有哈贝马斯和他的同道们，而且还有其他许多类型的人，他们的研究路向五花八门，包括女性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实践理论家等等。

批判性社会理论可以界定为在下述四种意义上要求批判、提出批判的一整套相互渗透的研究工作：

1. 与理论家所处的当代社会世界保持批判性的关联，认识到既存事态并不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为社会行动提供积极的意涵；
2. 对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既是社会性的，也是个人性的）做出批判性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家自身的思想活动；
3. 对理论家的理解所依据的构成范畴和概念框架，包括这些框架的历史建构，不断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
4. 以批判性的态度应对其他社会说明工作，不仅要确定它们的长短优劣，而且要揭示出它们的盲点与误解背后的原因，证明有能力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吸收它们的深刻见解。

在我看来,所有这四种批判形式,都有赖于某种方式的历史理解与分析。第一种要求对人的世界的“去自然化”,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因此,也就意味着是在大量可能性当中的某些行动的产物。进而言之,要与某人所处的社会世界保持一种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批判性关联,就要求从这个世界对于实践行动而言的突出特征的角度来阐述这个世界,要求在定位这个世界的时候,有能力参照其他基本的活动模式(比如在文化或社会的角度上有所不同的其他当代情境,或者是其他的时代)。

第二项要求阐述历史的成就和特殊性,正是这些东西促成了当代理论家的眼光。这里的关键并不仅仅是说理论家可以站到巨人们的肩膀上,还关系到使理论家有机会进行理论反思、限定并形塑其理论观照的整个社会形态。

第三项要求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观念通过哪些方式,开始获得了特定的意涵,根植在了不同的思想背景和规划中,被赋予了与经验世界和实践世界之间某些特定的指涉关系。如果我们想要以严肃的批判态度,来对待我们吸收进自己理论中的概念,诸如雷蒙·威廉斯所分析的各式各样的“关键词”(keywords),就像“个人”或“民族”,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些概念的历史创造过程来看它们,并且要看到,没有任何一项操作具体化的尝试会逃脱那种历史的影响。

最后,以一种真正具有批判性的态度来应对其他说明的努力,即在于努力以严肃的态度去把握所有理论的历史根植性,在探讨过去的理论的时候,不仅仅把它们当作范例,未臻完善的成功,或者是去除其具体文本背景后的深刻见解的来源,而是要认为这些作品都受到不同于我们自己历史的那些历史的束缚,或是建立在那些历史的基础上。还可以往更基本的层面上讲,我们需要看到,理论之间的对抗很少是通过正确战胜错误、真理战胜虚假就可以解决的。构成理论家们在其间工作的那个世界的,并不是正确的答案,而是查尔斯·泰勒所谓的“认识获益”(epistemic gain),就是在一个由可资利用的替代选择所组成的场域里,从尚存在问题的立场,迈向更为充分的立场(而不是从虚假到真理的玄妙的认识论运动)。^[47] 从不受时间限制的、抽象的角度出发,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种运动。理论家个人并不能在自己和世界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单纯改变自己的思维。相反,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的惯习在改变,他们的人在改变,他们的思维(作为他们身上不可分解的一部分)也就和他们一起在改变。

(在这四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有赖于历史理解,这种状况与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处境不无关联。严肃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不能接受所谓客观性或“绝对超然的观照”的诉求,这些诉求总使某些理论家相信,自己的工作可以达致完美,可以充分地摆脱历史变迁的影响,值得从公共话语中抽身而出。然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至

臻完美的；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与社会位置无涉的；因此，所有的理论都必须接受以批判话语为基础的修整。出于同样的原因，鉴于所有的公共话语都必然在带有偏颇与狭隘的范畴中展开，因此，它们也必须接受基于批判话语的修整。不管怎么说，这种看法的关键意义似乎针对的是一种关于民主的观照，而不是关于社会工程的图景。

注释

[1] 亦参阿伦特的有关观点，她不仅或甚至说不主要将现代的庸碌之徒观念联系到这个词的圣经出典，而是联系到希腊观念中的一种“刻板实利精神”(*banausic spirit*)，即单纯的机械复制者们共同的生活取向。(Arendt, 1954[1977:215])

[2] 阿伦特早在布迪厄的《区隔》问世 20 年前就曾写道：“在这场对于社会位置的争夺之中，文化开始作为众多武器之一——即便不说是最合用的一种武器——而发挥巨大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增进自身，‘教育自身’，走出据说是现实之所在的底层境界，向上步入非现实的较高境界，那里据称是美的家园，精神的家园。……文化甚至尤甚于其他现实因素，至此开始被人们称为‘价值’，也就是成为一种社会商品，可以流通售卖、兑换牟利，交换其他各种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Arendt, 1954[1977:202,204])

[3] 这也是布迪厄在《学术人》(Bourdieu, 1988)中叙述的寓意之一，尽管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布迪厄将学术文化的这一特征刻画得比我会做的更具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不仅仅是程度上的轻重。

[4] 罗蒂就库恩有关常态科学与革命性科学之分的阐述提出了一种类比，从而接近了这种二元论(Rorty, 1982)。如果拿它太当真[有如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哈贝马斯出于批判目的而做出的颇有些偏见的读解(Habermas, 1987: 206)]，就会有碍于而非有利于达成对于世界的某种充分开放。

[5] 这种做法决非毫无用处。世界的嬗变点点滴滴，难以胜数，要想再生产出数量庞大的日常活动，我们需要新的知识来描述社会模式中的种种变异：人口分布中的转变，教育投资回报上的变动，或者市场条件与组织结构之间的新型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无所知地来到人世，必须从头学习一些基本的洞察，有时还不止一次。这些基本洞察尽管不会挑战我们周遭熟悉的世界，但是大大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个世界。因此，我的意思既不是说只有能够转变世界观的知识的生产才是值得珍视的生产，也不是说只有根本上有所创新的知识才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转化作用。

[6] 关注叙事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形形色色的叙事可以对整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种类的行动者的想像与决策有更基本的把握。参看利科(Ricoeur, 1984—1986)，以及以下有关叙事

的社会学讨论:Somers,1992;Somers and Gibson,1994;Abbott,1990,1992。

[7] 斯廷奇康敏锐地指明了这一点,尽管他所用的“理论”这个词只限于指普遍的、命题性的阐述,而将类比视为与理论不同的某种东西(Stinchcombe,1978),我认为他误入了歧途。

[8] 参看 Adorno et al.,1976。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非常容易被混为一谈,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直接体验到的最重要的经验研究者就是拉扎斯菲尔德,而他在移居美国之前就受到维也纳学派的深刻影响。

[9] 伽达默尔(尤其是 Gadamer,1975)和查尔斯·泰勒(Taylor,1989;1995)已经对这种论证路数做出了最重要的推进。

[10] 人们普遍认为,福柯通过主张“真理效果是在本身无所谓真假的话语中生产出来的”(Foucault,1980:118),已经对真理发动了根本性的攻击。但不管福柯本人是否真想提出诸如此类激进的挑战,我们也能够从这种观点中读出他的某种立场:只有在不能化约为真理声言结构的更广泛的话语中,才能给出具体的真理声言。而当韦伯与涂尔干给出了广泛的理论话语,并协助奠定了广泛的理论话语,由此促进了社会学的发展,此时在这些理论话语中,也可以生产出“真理效应”,提供比较具体的命题式真理声言。但是,要笼统地判定作为整体的韦伯社会学或涂尔干社会学的真假对错,则是毫无意义的。与此类似,民族主义的话语促成了形形色色的真理或真理效应,促成了种种设定可能真实的命题与主张的方式,而它本身却无所谓真假对错。

[11] 经19世纪晚期德国方法论之争而广为人知的围绕方法的争斗当然尚未停息,但是,当年历史还留有实在论的外表,矫称要作为一门涵盖广泛、确立认同的学科,具有主导性的公共意义,当时走向前台的那些范畴,如今已经不再主导这些争斗。

[译者注: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发生在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时数十年,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尽管争论各方立场纷纭,不能简单分出清晰阵营,不过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新老)历史主义学派和理性主义,在哲学中的所谓“历史主义的危机”和新康德主义等思潮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以及社会学中与此相关的理论、价值等问题,是整个方法论争论的焦点。争论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在充分考虑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性,所涉及的“意义”或“价值”的方面的同时,是否保证和怎样保证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以及抽象概括的理论怎样把握独一无二的历史现实。这一争论对社会学 and 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韦伯、舒茨等人的社会学思想,都必须放在这个大争论的背景中才能理解。(摘自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李猛、李康译,第248页,原注者李猛;另参见本书第2章的2.1。)]

[12] 也可参看伯恩斯坦对于阿伦特作品的讨论,包括她对于这一比喻的用法(Bernstein,1992:15—30)。



[13] 梅吉尔 (Megill, 1985) 也提请我们注意, 康德是从尼采开始经海德格尔到福柯与德里达这一脉传统的出发点。具体而言, 康德通过明确区分知性 (纯粹理性) 领域、道德行动 (实践理性) 领域和审美 (判断力) 领域所引入的张力令人深感困扰, 特别是考虑到, 不能认为康德的头两种批判中间存在的断裂, 能够通过第三种批判来起到充分的中介作用。当然, 这也是黑格尔对于康德的基本关注之所在。黑格尔对于康德之作为确立范式的现代哲人的这种反思, 以多种方式塑造了他的早期作品, 有关这一点请参看 Hegel, 1977 与 1978。

[14] 这本书或许是对黑格尔在批判理论传统中之位置的最佳介绍, 也是对于他在此书书名《现代性之哲学话语》表明之更一般主题的最佳介绍。我在以下行文中受惠于该书以及查尔斯·泰勒对于黑格尔的读解 (Taylor, 1975)。

[15] 此乃青年黑格尔之所以吸引卢卡奇的一点原因 (参看 Lukács, 1976), 而卢卡奇后来又对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关键影响。

[16] 关于马克思所提出的范畴的历史特殊性, 或许最站得住脚的论证见于 Postone (1993)。

[17] 尽管这些主题渗透在卢卡奇的整体著述当中, 但最关键的文本还是《历史与阶级意识》(Lukács, 1922) 中的核心一章“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马克思也借取了类似的审美统一性观念, 特别是手工业生产者的思想、劳动与生产本身的统一性的观念, 但在他的早期著作里, 这种思路贯彻得更坚定一些。而到他的成熟著作, 他对于资本主义之系统性的认识逐渐加强, 使得他 (表面看来) 更有些怀疑, 根植于前资本主义或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批判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其有效性。虽说关于异化的批判并没有销声匿迹, 也不再是他后期著作的组织原则。这就使批判理论家和其他学者都有可能在马克思早期文献姗姗来迟的出版问世 (20 世纪 30 年代重新回到学术界的视野, 虽说并非迅速流传开来) 之后欢欣鼓舞, 认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出现意义非凡的重新定向的大好时机, 也有助于从马克思本人立场上来批判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

[18] 因此, 马尔库塞 (Marcuse, 1955) 在某种意义上是将弗洛伊德 (Freud, 1962) 重新塑造造成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批判。

[19] 这方面有一个特别具有说服力的实例, 就是在分析民族主义暴力 (比如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在波斯尼亚所发生的事情) 的时候, 简单地视其为原生的种族特性和由来已久的冲突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虽说确实令人感到遗憾, 而不是看到 (1) 种族认同与张力本身就是被创造出来的; (2) 此前存在的种族特性受制于一些非常晚近并仍在持续的操纵。当“传统的”观点通过地位显赫的政治领导人 (比如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 而表达出来, 便成为对于无所作为的合理辩护, 成为对于世界之现状——无论多么令人遗憾——的肯定确认, 而不是为看看如何可以不是这个样子奠定基础。

[20]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 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后来的哈贝马斯都一贯将“实证主

义”作为一个内涵芜杂的方便用语，泛指某些社会科学研究途径，它们确认社会世界基于纯粹实证的事实性(facticity)，未能揭示其出自人类的创造，揭示其相关的内在矛盾。他们所指的并不是更狭义上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者，更不是指波普这样的异见分子，在他们看来，至少就理论的本质以及它与经验概括之间的无条件区别而言，波普的立场更具批判性。

[21] 尽管这种涂尔干式的实证主义并不是霍克海默批判的直接对象，但至关重要是，作为社会学教学中涂尔干式研究途径的典型对立面，韦伯对于解释性理解即“Verstehen”的强调也决不确保能够挑战物化。相反，霍克海默在对曼海姆的批判中阐明，一种解释性的思路也可以做到始终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体主体性的层面上，以至于始终无法清楚地认识社会世界，并且尽管就历史中创造出来的种种制度对于当代个体的意义做出了估价，但是，个体表面上的自主性与社会领域的物化依然没有受到挑战。

[22] 此书乃是最为重要的早期作品。法兰克福理论家们，也就是社会研究所的同事们，在这本书里尝试要将自己对于理论与经验研究之跨学科联合的观点付诸实践。除了霍克海默，弗洛姆、马尔库塞和魏复古等也参与其事。而更著名的《权威人格》(Adorno et al., 1950)则由阿多诺发挥了核心作用，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延伸了这项早期研究规划，不过更集中地关注了反犹主义，因而面目有所改变。

[23] 英语读者们现在可以在 Horkheimer, 1993 出版之后更好地看到这一点。

[24] 实际上，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长久以来就在历史特定性的问题上态度含糊。他们在处理马克思的劳动观念时，是将其普遍地作为一种超历史的劳动范畴，而不是特殊地作为比如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构成性范畴。参看 Postone, 1993。

[25] 这与今天所谓“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主要内容之间的类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深层生态学”中，一种超历史的叙述也同样削弱了有关自然退化之动力的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基础。

深层生态学：挪威哲学家 Arne Naess 提出，属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一种主张，与传统生态思想[即其所谓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相对，强调非人类中心论，从技术主宰之进步观转向人与自然之和谐整体观。——译者注

[26] 关于不同的批判观念及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参见 Benhabib, 1986。

[27] 此项主题不断凸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当中。除了《启蒙辩证法》，还请特别参看阿多诺《否定辩证法》(Adorno, 1973)，他力求阐明一种正面的启蒙概念，即反思性启蒙，以对抗《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负面的启蒙概念。

[28] 亦参阿伦特近乎同时对于同一论题的分析(Arendt, 1951, 1954)。

[29] 除了业已提及的马丁·杰和维格斯豪斯的作品，亦参 Postone and Brick, 1982。应当指出，这种悲观主义转向对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影响，要比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中其他



一些成员来得大(虽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悲观情绪的某种表现已经夺去了他们的同事本雅明的生命,他对离开欧陆的需要是如此抗拒,以至于迟迟地等待,直至认为自己已经不能成功地逃脱被占领的法国,从而选择了自杀)。最明显的例子是,马尔库塞从未屈服于这种悲观情绪,始终在寻求激进社会变迁的可能性,始终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心存疑虑的方式支持各种社会运动,后两人认为所有这类运动最终都可能落入压迫或者沦为新的恐怖。

[30] 内格特与克卢格的合著(Negt and Kluge, 1993)对探究学生运动背景下批判理论的多样化发展做出了重大尝试。

[31] 德里达在批判纠缠于在场的那些哲学学说与艺术实践,批判假定言说奠定了书写使我们远离的某种直接性的思维时,就是受到了同一论题的某种思路的启发,只是处理的方式非常不同。他将书写及其非直接性和差异作为首要范畴,从而直接回应了他似乎认为的有关直接性之追求中蕴含的种种幻觉与危险。

[32] 因此,在这第一套研究规划中,哈贝马斯除了直接探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了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种种争论,既试图确立超出单纯解释学的重要性,又努力指明那些严格区分客观知识与带有旨趣之人类行动的实证主义信念的谬误。参看 Habermas, 1988, 1969。

[33] 正如哈贝马斯所总结的那样:“知识的技术旨趣与实践旨趣并不是为了知识的客观性而必须予以消除的认知调节因素;相反,它们本身就决定着将现实予以客观化的那种特征,因此,也就可以作为经验的起点而触及”(Habermas, 1973:9)。

[34] 哈贝马斯在马尔堡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授课资格论文,指导教师 Abendroth 或许是当时西德教授中惟一一位立场鲜明、言行活跃的社会主义者。

[35] 除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本身,亦参 Calhoun(1992)的论文,包括该文集序言中对哈贝马斯的书的本文阐释与背景研究。

[36] 有关对于科学和宗教的忽视,参看 Calhoun(1992)的文集中扎雷特的文章。有关科学话语如何始终与政治公共领域纠缠在一起,参看 Ezrahi, 1990。

[37] 大众社会理论本身部分来自于早先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尽管其观念更为宽和,而其根源更为久远。

[38] 在 Calhoun(1992)的序言中,我已经更为详细地概括了哈贝马斯的主张及其理论困境。

[39] 这里的关键素材是 Habermas, 1987。其后的种种作品已经对该书提出的基本学说有所修整。伦理的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关注焦点,参见 Benhabib and Dallmayr, 1990。

[40] 霍克海默 1941 年致阿多诺的信,引自 Wiggershaus, 1994:505。哈贝马斯将该主题回溯至青年黑格尔所开辟不过后来放弃了的一条道路,即寻求从沟通的角度对于自由主体

的拯救(Habermas, 1987)。

[41] 就好像家庭财政与工商财政相分离,这当然也属于韦伯所描述的作为理性化的现代化过程。

[42] 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观念的探究(Arendt, 1958)既影响了哈贝马斯,其本身也对这一理论脉络做出了重要的(并且有重要不同的)贡献。参看 Benhabib(1992)的比较。

[43] 最后一个术语当然借自哈贝马斯后来的著作,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尚未使用。

[44] 因此,尽管哈贝马斯受到了阿伦特的影响,但当他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定位于市民社会中时,所采取的立场还是非常不同于她有关公共领域(public realm)的说法。她眼里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总体上被她贬为有关生活必需条件之纯粹再生产的领域)有着鲜明的对立,并且,由于对希腊城邦的理想化处理,而没有怎么考虑公共领域与现代国家结构之间的关系。参见 Arendt, 1958。

[45] 应当把这种阐述理解成既远离哈贝马斯,也同样远离对于许多“新社会运动”共有的对于经验的研究途径,就是将经验作为知识的纯粹根基,作为某种本质化的批判性自觉意识立场的基础。参见 Scott(1990)站在同情角度的批评意见。

[46] 当哈贝马斯转而关注战后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的公共领域时,除了一套“衰退”、“再封建化”的说法,再无任何分析工具,其中有一点原因便是他明确将认同形塑的过程排除出了公共领域。

[47] 查尔斯·泰勒在其“附论历史说明”中对这一观念(源出多门,包括伽达默尔)做了有益的讨论(Taylor, 1989)。

参考文献

- Abbott, A. 1990: Conceptions of time and events in social science methods: causal and narrative approaches. *Historical Methods*, 23, 140—150.
- 1992: From causes to events: notes on narrative positivism.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 428—455.
- Adorno, T. W. 1973: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F.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Adorno, T. W., Dahrendorf, R., Pilot, H., Albert, H., Habermas, J., and Popper, K. R. 1976: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Trans. B. Adey and D. Frisb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Adorno, T. W.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Arendt, H. 1951 (197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54 (1977):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habib, S. 1986: *Critique, Norm, and Utopia: A Study of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2: *Situating the Self*. New York: Routledge.
- Benhabib, S. and Dallmayr, F. (eds.) 1990: *The Communicative Ethics Controvers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ernstein, R. J. (ed.) 1985: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2: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8: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lhoun, C. (ed.) 1992: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Davies, R. 1968: *The Lyre of Orphe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Eley, G. 1992: Nations, publics and political cultures: placing Haberma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Calhoun (1992), 289—339.
- Ezrahi, Y. 1990: *The Descent of Icarus: Sci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anon, F. 1963 (1968):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 Foucault, M. 1980: Truth and power. In C. Gordon (ed.) *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 Fraser, N. 1992: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Calhoun (1992), 109—142.
- Freud, S. 1962: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 Stacey. New York: W. W. Norton.
- Gadamer, H. -G. 1975: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Seabury.

- Habermas, J. 1969 (1976): The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Adorno et al. (1976).
- 1970: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 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3: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J. Viertel.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5: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4: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 Lawr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88: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S. W. Nichol森 and J. A. Stark. Oxford: Polity Press.
-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egel, G. W. F. 1977: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78: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chtean and Schellingian Systems of Philosophy*. Trans. J. P. Sourber. Reseda, Calif.: Ridgeview Publishing.
- Horkheimer, M. 1947: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2: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hi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ontinuum.
- 1993: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 Trans. G. F. Hunter, M. S. Kramer, and J. Torpe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orkheimer, M. and Adorno, T. W. 197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 Cumming.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des, J. 1988: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ukács, G. 1922: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76: *The Young Hegel: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 Trans. R.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Marcuse, H. 1955: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Megill, A. 1985: *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rton, R.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3rd ed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Negt, O. 1978: Mass media: tools of domination or instruments of liberation—Aspect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ommunication analysis. *New German Critique*, 14, 61—80.
- Negt, O. and Kluge, A. 1993: *The Public Sphere and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opper, K. 1968: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ostone, M. 1993: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stone, M. and Brick, B. 1982: Critical pessimism and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Marxism. *Theory and Society*, 11, 617—658.
- Ricoeur, P. 1984—1986: *Time and Narrative*. 2 vols. Trans.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rty, R. 1982: *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cott, A. 1990: *Ideology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Unwin Hyman.
- Somers, M. 1992: Narrativity, narra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action: rethinking English working-class forma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6(4), 591—630.
- Somers, M. R. and Gibson, G. D.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In C. Calhoun (ed.) *Social*

-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Stinchcombe, A. 1978: *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aylor, C. 1975: *Heg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Selected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ggershaus, R. 1994: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Wolff, R. P., Moore, F. Jr, and Marcuse, H. 1969: *The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London: Cape.



附录一 中外人名对照

A

阿贝尔 Abell, Peter
 阿本罗特 Abendroth, Wolfgang
 阿德金斯 Adkins, L.
 阿多诺 Adorno, Theodor
 阿尔 Harré, Rom
 阿尔茨海默 Alzheimer
 阿尔都塞 Althusser, Louis
 阿克塞尔罗德 Axelrod, R.
 阿伦特 Arendt, Hannah
 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 David
 阿诺德 Arnold, Matthew
 阿佩尔 Apel, Karl-Otto
 阿切尔 Archer, Margaret
 阿桑特 Asante, Molefi Kete
 埃尔斯特 Elster, Jon
 埃利奥特 Elliott, Anthony
 埃利亚斯 Elias, Norbert
 埃奇利 Edgley, Roy
 埃斯科巴 Escobar, Arturo
 埃文斯 Evans, Mary
 埃文斯—普里查德
 Evans-Pritchard, E. E.
 爱丁顿 Eddington, Sir Arthur Stanley
 阿尔维修 Helvetius, Claude Adrienne
 爱因斯坦 Einstein, Albert
 艾略特(乔治) Eliot, George
 艾略特(T. S.) Eliot, T. S.
 艾默贝耶 Emirbayer, Mustafa

艾森斯塔德 Eisenstadt, Samuel N.
 安德森 Anderson
 安德森(佩里) Anderson, Perry
 安扎尔杜阿 Anzaldúa, Gloria
 昂鲁 Unruh, David
 奥本海姆 Oppenheim, Paul
 奥德修克 Ordeshook, P. C.
 奥尔森 Olson, Mancur
 奥古斯丁 Augustine
 奥克利 Oakley, Ann
 奥尼尔 O'Neill, John
 奥斯汀 Austin, John
 奥斯怀特 Outhwaite, William
 奥特迦(伽塞特) Gasset, José Ortega y

B

巴恩斯 Barnes, Barry
 巴尔德温 Baldwin, John
 巴尔扎克 Balzac, Honoré de
 巴赫芬 Bachofen, Johannes
 巴克尔 Barker, Francis
 巴兰 Baran, Paul
 巴蕾特 Barrett, Michèle
 巴林特 Balint, Michael
 巴什拉尔 Bachelard, Gaston
 巴斯卡尔 Bhaskar, Roy
 巴塔耶 Bataille, Georges
 巴特(罗兰) Barthes, Roland
 巴特勒 Butler, Judith

巴特斯比 Battersby, Christine
 芭特曼 Baartman, Saartjie
 拜伦 Byron, Lord
 鲍曼 Bauman, Zygmunt
 保涩谷 Shibutani, Tamotsu
 贝尔 Bell, C.
 贝尔(丹尼尔) Bell, Daniel
 贝克 Beck, Ulrich
 贝克尔 Becker, Howard
 贝拉 Bellah, Robert
 本迪克斯 Bendix, Reinhard
 本杰明 Benjamin, Jessica
 本雅明 Benjamin, Walter
 比尔施泰特 Bierstedt, R.
 宾莫尔 Binmore, K.
 波德莱尔 Baudelaire, Charles Pierre
 波德利 Baudry
 波芙娃 Beauvoir, Simone de
 波勒纳 Pollner, M.
 波洛克 Pollock, Friedrich
 波普 Popper, Karl
 博丹 Bodin, Jean
 博厄斯 Boas, Franz
 博尔多 Bordo, Susan
 博克瑙 Borkenau, Franz
 博托莫尔 Bottomore, Tom
 博伊德 Boyd, Richard
 博伊恩 Boyne, Roy
 伯恩斯坦 Bernstein, Richard J.
 伯格 Berger, Peter
 伯格森 Bergeson, Albert
 伯吉斯 Burgess, E.
 伯麦 Böhme, G.
 柏格森 Bergson, Henri
 柏克 Burke, Edmund

柏拉图 Plato
 布迪厄 Bourdieu, Pierre
 布拉赫 Brah, A.
 布拉伊多蒂 Braidotti, R.
 布莱希特 Brecht, Bertolt
 布劳 Blau, Peter
 布劳代尔 Braudel, Fernand
 布龙菲尔德 Bloomfield, Leonard
 布鲁尔 Bloor, David
 布鲁默 Blumer, Herbert
 布伦娜 Brenner, Johanna
 布洛赫(恩斯特) Bloch, Ernst
 布洛赫(马克) Bloch, Marc
 布希亚 Baudrillard, Jean

C

查尔顿 Charlton, J.

D

达尔顿 Dalton, John
 达尔文 Darwin, Charles
 达·芬奇 Da Vinci, Leonardo
 达朗贝尔 d'Alembert, Jean
 道 Dawe, Alan
 道格拉斯 Douglas, Mary
 德·博纳尔 de Bonald
 德·迈斯特 de Maistre
 德·塞尔托 de Certeau
 德尔斐 Delphy, Christine
 德朗蒂 Delanty, Gerard
 德勒兹 Deleuze, Gilles
 德雷弗斯 Dreyfus
 德里达 Derrida, Jacques

登钦 Denzin, Norman K.

笛卡尔 Descartes, René

狄德罗 Diderot, Denis

狄尔泰 Dilthey, Wilhelm

狄更斯 Dickens, Charles

迪昂 Duhem, Pierre

迪恩 Dunn, Giles

迪蒙 Dumont, Louis

迪娜斯坦 Dinnerstein, Dorothy

迪尤斯 Dews, P.

蒂勒尔 Tyrrell, B.

蒂利 Tilly, Charles

丁勒 Dingler, Hugo

杜波依斯 Du Bois, W. E. B.

杜尔阁 Turgot, Anne-Robert

杜威 Dewey, John

E

厄里 Urry, John

恩布里 Embree, Leslie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恩斯特 Ernst, Max

F

法贝尔 Farber, M.

法比昂 Faubion, James D.

法恩 Fine, Gary Alan

法尔伯曼 Farberman, Harvey

法尔克 Falk, Pasi

法拉罗 Fararo, T.

法农 Fanon, Frantz

凡勃伦 Veblen, Thorstein Bunde

菲尔斯特 Firestone, Shulamith

费尔巴哈 Feuerbach, Ludwig

费尔贝恩 Fairbairn, W. R. D.

费赫 Feher, Michel

费瑟斯通 Featherstone, Michael

费希特 Fichte, Johann

费耶尔阿本德 Feyerabend, Paul

费英格 Vaihinger, Hans

芬克 Fink, Bruce

芬利 Finley, Moses

伏尔泰 Voltaire

弗格森 Ferguson, Adam

弗拉克斯 Flax, Jane

弗兰克(安德烈·贡德)

Frank, Andre Gunder

弗兰克(曼福雷德) Frank, Manfred

弗兰克斯 Franks, David D.

弗雷格 Frege, Gottlob

弗雷泽 Frazer, James

弗蕾泽 Fraser, Nancy

弗里丹 Friedan, B.

弗里斯比 Frisby, David

弗洛姆 Fromm, Erich

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福柯 Foucault, Michel

福克斯 Fox, M.

福楼拜 Flaubert, Gustave

富兰克林 Franklin, Benjamin

傅立叶 Fourier

G

盖尔布 Gelb, Adhémar

盖尔纳 Gellner, Ernest

盖姆 Game, Ann

甘贝塔 Gambetta, Diego

甘恩 Gane, M.
 高兹 Gorz, Andre
 歌德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哥白尼 Copernicus, Nicolaus
 戈达洛美 Gedalof, I.
 戈尔德曼 Goldmann, Lucien
 戈尔特施泰因 Goldstein, Kurt
 戈夫曼 Goffman, Erving
 格尔兹 Geertz, Clifford
 格拉霍夫 Grathoff, Richard
 格拉诺维特 Granovetter, Mark
 格拉泽 Glaser, B.
 格雷马斯 Greimas, A. J.
 格伦 Gehlen, Arnold
 格罗斯 Grosz, Elizabeth
 格罗斯伯格 Grossberg, Lawrence
 格瑞尔 Greer, Germaine
 格瑞奥勒 Griaule, Marcel
 葛兰西 Gramsci, Antonio
 古布里姆 Gubrium, J. F.
 古尔德纳 Gouldner, Alvin
 古尔维奇 Gurwitsch, Aron
 瓜塔里 Guattari, Félix

H

哈贝马斯 Habermas, Jürgen
 哈丁 Harding, Sandra
 哈金 Hacking, Ian
 哈拉维 Haraway, Donna
 哈里森 Harrison, Tom
 哈特曼 Hartmann, Eduard von
 哈维 Harvey, David
 海德格尔 Heidegger, Martin
 海森堡 Heisenberg, Werner

汉堡 Hamburger, H.
 汉密尔顿 Hamilton
 豪尔绍尼 Harsanyi
 豪斯曼 Haussmann, Georges Eugène
 荷尔德林 Hölderlin, Friedrich
 赫尔德 Herder, J. G.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赫里蒂奇 Heritage, John
 赫瑟林顿 Hetherington, K.
 赫西俄德 Hesiod
 赫茜 Hesse, Mary
 赫希特 Hechter, Michael
 赫兹 Hertz, Robert
 黑格尔 Hegel, G. W. F.
 亨德森 Henderson, L. J.
 亨佩尔(C. G.) Hempel, C. G.
 亨佩尔(C. J.) Hempel, C. J.
 胡克斯 hooks, bell
 (起首字母原系小写)
 胡塞尔 Husserl, Edmund
 华莱士 Wallace, Jennifer
 怀特 White, Harrison
 怀特布克 Whitebook, Joel
 怀特海 Whitehead, A. N.
 惠特福德 Whitford, Margaret
 霍布斯 Hobbes, Thomas
 霍尔(J.) Hall, J. A.
 霍尔(彼得) Hall, Peter M.
 霍尔(斯图尔特) Hall, Stuart
 霍尔巴赫 Holbach
 霍尔斯坦 Holstein, J. A.
 霍加特 Hoggart, Richard
 霍金 Hawking, Stephen W.
 霍克海默 Horkheimer, Max
 霍克希尔德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霍利斯 Hollis, Martin

霍罗维茨 Horowitz, I.

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霍妮 Horney, Karen

J

吉登斯 Giddens, Anthony

吉尔伯特 Gilbert, Nigel

吉尔罗伊 Gilroy, Paul

吉尔曼 Gilman, Sander L.

吉利根 Gilligan, Carol

加芬克尔 Carfinkel, Harold

加滕斯 Gatens, M.

伽达默尔 Gadamer, Hans-Georg

伽利略 Galileo

杰斐逊 Jefferson

杰文斯 Jevons, Stanley

K

卡巴尼斯

Cabanis, Jean-Pierre-Georges

卡贝 Cabet, Étienne

卡尔贝格 Kalberg, Stephen

卡尔霍恩 Calhoun, Craig

卡夫卡 Kafka, Franz

卡梅伦 Cameron, Deborah

卡米克 Camic, Charles

卡斯泰尔 Castells, Manuel

卡斯托里亚迪 Castoriadis, Cornelius

卡沃利斯(Kavolis, V.)

开普勒 Kepler, Johannes

凯勒 Keller, Evelyn Fox

坎特罗威茨 Kantorowicz, E. H.

康德 Kant, Immanuel

康吉兰 Canguilhem, Georges

康马罗夫夫妇

Comaroff, Jean and John

康纳顿 Connerton, Paul

康诺尔 Connor, Steven

康帕内拉 Campanella, Tommaso

康托尔 Cantor, Georg

科尔曼 Coleman, J. S.

科胡特 Kohut

科沃德 Coward, Rosalind

柯尔施 Korsch, Karl

柯亨 Cohen, Ira J.

柯林斯 Collins, Randall

柯热夫 Kojève, Alexandre

柯特 Koedt, Anna

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Søren

克恩 Kern, S.

克拉克 Clarke, Adele

克莱因 Klein, Melanie

克莱曼 Kleinman, S.

克雷普斯 Kreps, D. M.

克里格 Krige, John

克里斯蒂娃 Kristeva, Julia

克里斯托弗 Christopher, Warren

克利 Klee, Paul

克利福德 Clifford, James

克卢格 Kluge, Alexander

孔德 Comte, Auguste

寇克曼斯 Kockelmans, J.

库恩(曼福德) Kuhn, Manfred

库恩(托马斯) Kuhn, Thomas

库克(船长) Cook

库勒 Coole, Diana

库利 Cooley, Charles

库奇 Couch, Carl
 蒯因 Quine, W. V. O.

L

拉比诺 Rabinow, Paul
 拉德克利夫—布朗
 Radcliffe-Brown, A. R.
 拉卡托斯 Lakatos, Imre
 拉康 Lacan, Jacques
 拉克尔 Lacqueur, Thomas
 拉马克 Lamarck, Jean
 拉马斯 Ramas, Maria
 拉姆森 Ramusen, E.
 拉什 Lash, Scott
 拉铁摩尔 Lattimore, Owen
 拉图尔 Latour, Bruno
 拉扎斯菲尔德 Lazarsfeld, Paul
 莱昂 Lyon, Margot
 莱昂斯 Lyons, John
 莱布尼茨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莱法 Raiffa, H.
 莱赫纳 Lechner, Frank J.
 劳伦斯 Lawrence, D. H.
 赖特 Wright, Frances
 赖希 Reich, Wilhelm
 兰德格雷贝 Landgrebe, Ludwig
 朗 Wrong, Dennis
 朗西曼 Runciman, W. G.
 劳 Raub, W.
 勤费费尔 Lefebvre, Henri
 勒内 Reine
 雷德菲尔德 Redfield, R.
 雷丁 Radin, Paul
 雷娜 Raine, Kathleen

雷诺兹 Reynolds, L. T.
 雷舍 Rescher, Nicholas
 雷伊 Rey, P. P.
 李嘉图 Ricardo, David
 里茨尔 Ritzer, George
 里什 Rich, Adrienne
 里斯曼 Riesman, David
 利奥塔 Lyotard, Jean-Francois
 利德尔 Liddle, J.
 利科 Ricoeur, Paul
 利维斯 Leavis, F. R.
 列宁 Lenin, V. I.
 列维 Levi, M.
 列维—布留尔
 Lévy-Bruhl, Lucien
 列维—斯特劳斯
 Lévi-Strauss, Claude
 列维纳斯 Levinas, Emmanuel
 林登伯格 Lindenberg, S.
 林奇 Lynch, Michael
 刘易斯 Lewis, J. David
 卢卡奇 Lukács, Georg
 勒克曼 Luckmann, Thomas
 卢曼 Luhmann, Niklas
 卢斯 Luce, D.
 卢梭 Rousseau, Jean-Jacques
 鲁安 Ruane, Janet
 鲁宾 Rubin, Gayle
 鲁宾逊 Robinson Crusoe
 伦纳德 Leonard, D.
 罗伯逊 Robertson, Roland
 罗博特姆 Rowbotham, Sheila
 罗得斯 Rhodes, Cecil
 罗蒂 Rorty, Richard
 罗尔丝 Rawls, Anne



- 罗尔斯 Rawls, John
 罗克 Rock, Paul
 罗斯 Rose, Arnold
 罗丝 Rose, Jacqueline
 罗素 Russell, Bertrand
 罗特 Roth, Philip
 罗伊斯 Royce, Josiah
 洛夫兰德 Lofland, John
 洛夫乔伊 Lovejoy, Arthur
 洛珂 Lock, Margaret
 洛克 Locke, John
 洛伦岑 Lorenzen, Paul
 洛伦泽 Lorenzer, Alfred
 洛特里阿蒙
 Lautréumont, Isidore Ducasse
 洛温塔尔 Lowenthal, Leo
 洛维尔 Lovell, Terry
 吕莉 Lury, Celia
- M**
- 马蒂诺 Martineau, Harriet
 马丁 Martin, Emily
 马尔可夫 Markov, Andrei
 马尔凯 Mulkay, Michael
 马尔库塞 Marcuse, Herbert
 马赫 Mach, Ernst
 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 Niccolo
 马克思 Marx, Karl
 马库斯(乔治·) Marcus, George
 马库斯(萨龙·) Marcus, Sharon
 马拉美 Mallarmé, Stéphane
 马兰 Marin, Louis
 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Bronislaw
 马勒 Mahler, Gustav
- 马奈 Manet, Edouard
 马奇 Madge, Charles
 马舍雷 Macherey, Pierre
 马斯特斯 Masters
 马希 Massey, D.
 马歇尔(阿尔弗雷德) Marshall, Alfred
 马歇尔(I.) Marshall, I.
 马歇尔(T. H.) Marshall, T. H.
 马扎 Matza, David
 麦迪逊 Madison, James
 麦独孤 McDougall, Joyce
 麦克弗森 MacPherson, C. B.
 麦克卢汉 McLuhan, Marshall
 麦克伦南 McLennan, John
 麦金太尔 McIntyre, Alasdair
 曼(迈克尔·) Mann, Michael
 曼达利奥 Mandalios, John
 曼海姆 Mannheim, Karl
 曼宁 Manning
 芒福德 Mumford, Lewis
 梅奥 Mayo, Katherine
 梅厄森 Myerson, R. B.
 梅尔科 Melko, Matthew
 梅尔泽 Meltzer, B. N.
 梅吉尔 Megill, Allan
 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 Maurice
 梅罗维茨 Meyrowitz, Joshua
 梅耶 Meyer, Julius Lothar
 梅耶松 Meyerson, Emile
 梅因 Maine, Sir Henry
 梅因斯 Maines, David
 门格尔 Menger, Carl
 门捷列夫 Mendeleev, Dmitri Ivanovich
 蒙田 Montaigne, Michel de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米德(乔治·赫伯特)

Mead, George Herbert

米德(玛格丽特) Mead, Margaret

米尔娜 Milner, Andrew

米尔斯 Mills, C. Wright

米拉 Millar, John

米莉特 Millett, Kate

米切尔 Mitchell, Juliet

米切尔利希 Mitcherlich, Alexander

米舍 Mische, Ann

明希 Münch, Richard

摩尔 Moore, Barrington

摩尔根 Morgan, Henry Louis

莫尔 More, Sir Thomas

莫拉加 Moraga, Cherríe

莫塞尔 Moser, Paul K.

莫斯 Mauss, Marcel

莫亚 Moya, P.

莫伊 Moi, Toril

默顿 Merton, Robert K.

穆勒 Mill, John Stuart

穆林斯(C.) Mullins, C.

穆林斯(N.) Mullins, N.

N

娜娜 Nana(左拉笔下人物)

纳拉扬 Narayan, Uma

纳什 Nash

那坦森 Natanson, Maurice

奈恩 Nairn, Tom

内格特 Negt, Oscar

内特爾 Nettle, J. P.

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尼尔森 Nelson, Benjamin

尼斯比特 Nisbet, Robert

牛顿 Newton, Issac

纽拜 Newby, Howard

纽曼 Neumann, Franz

O

欧文 Owen, Robert

P

帕克 Park, Robert E.

帕累托 Pareto, Vilfredo

帕森斯 Parsons, Talcott

帕斯卡尔 Pascal, Blaise

庞德 Pound, Ezra

培尔 Bayle

培根 Bacon, Francis

佩特拉斯 Petras, J.

佩特曼 Pateman, Carole

佩林巴纳扬甘 Perinbanayagam, R. S.

皮尔斯 Peirce, Charles Sanders

皮尔西 Piercy, Marge

珀蒂托—柯寇达

Petitot-Cocorda, Jean

普拉卡什 Prakash, G.

普拉特 Platt, Gerald

普兰查斯 Poulantzas, Nicos

普勒内 Playnet

普鲁东 Proudhon, Pierre Joseph

普鲁默 Plummer, Ken

普鲁斯 Prus, Robert

普鲁斯特 Proust, Marcel

普特南 Putnam, Hilary

Q

齐美尔 Simmel, Georg

乔多萝 Chodorow, Nancy

乔姆斯基 Chomsky, Noam

乔希 Joshi, R.

乔伊斯 Joyce, James

切鲁洛 Cerulo, Karen

琼斯 Jones, Steven G.

R

日热克 Žižek, Slavoj

荣格 Jung, Carl

S

塞加尔 Segal, Lynne

塞拉瑟 Thrasher

塞内特 Sennett, Richard

沙林 Shalin, Dmitri

沙瑟盖—斯米格尔

Chasseguet-Smirgel, Janine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萨德 Sade, Marquis de

萨加尔 Saghal, Gita

萨克斯 Sacks, Harvey

萨利文 Sullivan, Harry Stack

萨林斯 Sahlins, Marshall

萨马 Schama, S.

萨特 Sartre, Jean-Paul

萨伊德 Said, Edward

舍勒 Scheler, Max

舍夫 Scheff, Thomas

圣西门 Saint-Simon, Claude Henri

施本格勒 Spengler, Oswald

施鲁巴 Srubar

施皮格伯格 Speigelberg, Herbert

施特劳斯(安瑟伦)

Strauss, Anselm

施特劳斯(列奥) Strauss, Leo

史密斯 Smith, Richard

叔本华 Schopenhauer, Arthur

舒茨 Schutz, Alfred

斯宾诺莎 Spinoza, Benedict

斯宾塞 Spencer, Herbert

斯各特 Scott, Charles

斯嘉莉 Scarry, Elaine

斯金纳 Skinner, Quentin

斯考克波尔 Skocpol, Theda

斯克兹 Skeggs, Beverley

斯库布拉 Scubla, Lucien

斯马伦巴赫 Schmalenbach, H.

斯马特 Smart, Barry

斯梅尔塞 Smelser, Neil

斯密(亚当) Adam Smith

斯莫尔 Small, Albion

斯佩尔曼 Spelman, Elizabeth

斯皮瓦克 Spivak, Gayatri

斯普伦内特 Sprengnether, Madelon

斯廷奇康 Stinchcombe, Arthur

斯通(A. R.)

Stone, Allucquère Rosanne

斯通(戈里高利) Stone, Gregory P.

斯托勒 Stoller, Robert

斯威夫特 Swift, Jonathan

苏格拉底 Socrates

索夫纳 Soeffner

索加 Soja, Edward
 索罗金 Sorokin, P.
 索绪尔 Saussure, Ferdinand de
 朔尔 Schor, Naomi

T

泰勒(查尔斯) Taylor, Charles
 泰勒(爱德华)
 Tylor, Edward Burnett
 汤姆 Thom, René
 汤普森(E. P.) Thompson, E. P.
 汤普森(爱德华)
 Thompson, Edward
 特克尔 Turkle, Sherry
 特拉维克 Traweck, Sharon
 特拉西 Tracy, Destutt de
 特鲁别茨科伊 Trubetskoy, Nikolay
 特纳(布赖恩) Turner, Byran
 特纳(乔纳森) Turner, Jonathan
 滕尼斯 Tonnies, Ferdinand
 涂尔干 Durkheim, Emile
 图海纳 Touraine, Alain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Alex de
 托马斯 Thomas, W. I.

W

瓦蒂莫 Vattimo, Gianni
 威廉斯(雷蒙) Williams, Raymond
 威尔逊 Wilson, E.
 威斯特 West, Cornell
 维蒂希 Wittig, Monique
 维尔默 Wellmer, Albrecht

维格斯豪斯 Wiggershaus, R.
 维柯 Vico, Giambattista
 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Ludwig
 维特库斯 Vaitkus, Steven
 维希 Weesie, J.
 韦伯(阿尔弗雷德)
 Weber, Alfred
 韦伯(马克斯) Weber, Max
 魏尔 Weil, Felix
 魏复古(魏特夫) Wittfogel, Karl
 温尼科特 Winnicott, D. W.
 温奇 Winch, Peter
 文德尔班 Windelband, Wilhelm
 文图里 Venturi, R.
 沃尔比 Walby, Sylvia
 沃尔夫林 Wolfflin, Heinrich
 沃格林 Voeglin, Eric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Immanuel
 沃纳 Warner, Michael
 沃思 Wirth, Louis
 沃斯通克拉夫特
 Wollstonecraft, Mary
 乌达特 Oudart, Jean-Pierre
 乌尔曼—马加利特 Ullmann-Margalit
 伍尔芙 Woolf, Virginia
 伍尔嘉 Woolgar, Steve

X

西卡 Sica, Alan
 西苏 Cixous, Hélène
 希尔斯 Shils, Edward
 希普 Heap, James
 席尔兹 Shields, R.
 席勒 Schiller, Friedrich von



- 席林 Shilling, Chris
 夏赫 Shiach, Morag
 肖 Shaw
 肖瓦尔特 Showalter, Elaine
 谢格洛夫 Schegloff, Emmanuel
 谢林 Schelling, T. C. *
 辛哈 Sinha, Mrinalini
 辛诺特 Synnott, Anthony
 熊彼得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休谟 Hume, David
 休斯 Hughes, Everett
 勋伯格 Schoenberg, Arnold
- Y
- 雅各布森 Jakobson, Roman
 雅斯贝斯 Jaspers, Karl
 亚当 Adam, B.
 亚当斯 Addams, Jane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历山大(杰弗里) Alexander, Jeffery
 亚历山大(萨利) Alexander, Sally
 扬 Young, Iris
 叶尔姆斯列夫 Hjelmslev, Louis
- 伊格尔顿 Eagleton, Terry
 伊莉嘉瑞 Irigaray, Luce
 伊利赫 Illich, Ivan
 英格利斯 Inglis, Fred
 于桑 Huyssen, A.
 约阿斯 Joas, Hans
 约翰逊 Johnson, Don
- Z
- 扎雷特 Zaret
 詹宁斯 Jennings, Humphrey
 詹明信 Jameson, Frederic
 詹姆斯二世 James II
 詹姆士 James, William
 周蕾 Chow, Rey
 兹纳涅茨基 Znaniecki, Florian
 祖海尔 Zohar, D.
 祖金 Zukin, S.
 卓别林 Chaplin, Charlie
 左拉 Zola, Emile
 佐尔博 Zorbaugh
 佐尔伯格 Zolberg, Aristide

* 原书索引中误作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F. W. J. von Schelling)。——译者注

附录二 中外术语对照*

<p>A</p> <p>阿赞德人 Azande</p> <p>爱尔兰根学派 Erlangen School(2)</p> <p>奥斯维辛 Auschwitz(喻指纳粹;高度技术文明下之野蛮;高度理性下之非理性)</p> <p>B</p> <p>巴洛克(巴罗克) baroque</p> <p>百科全书派 encyclopedistes</p> <p>拜物教 fetishism</p> <p>半边缘 semi-peripheral(14)</p> <p>半偶族 moieties(6)</p> <p>保守主义 conservatism</p> <p>包豪斯学派 the Bauhaus</p> <p>卑贱 abjection(巴特勒)</p> <p>卑贱的他者 abject others(12,巴特勒)</p> <p>悖谬(的) paradox / paradoxical(ly)</p> <p>背景世界 milieu-world(10,古尔维奇)</p> <p>本体性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3,吉登斯)</p> <p>本体性脆弱 ontological frailty(17,布赖恩·特纳)</p> <p>本我 id(5)</p> <p>本原自我活动 original self-activity(10)</p> <p>本真性 authenticity</p> <p>本质 essence</p>	<p>本质还原 eidetic reduction(10)</p> <p>本质主义的 essentialist</p> <p>(系统)闭合 closure(3)</p> <p>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s(8)</p> <p>边缘化 marginalization</p> <p>边缘社会 peripheral societies(14)</p> <p>边缘依附 peripheral dependency(14)</p> <p>变量 variables</p> <p>标签理论 labeling theory</p> <p>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p> <p>表层结构 surface structure(6)</p> <p>表现危机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7,16)</p> <p>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p> <p>病理化 pathologized(17)</p> <p>并置 juxtapose</p> <p>博弈(游戏、局) game</p> <p>博弈论(对策论) game theory</p> <p>博弈树(对策树) the game tree(8)</p> <p>博弈者 players(8)</p> <p>不可通约 incommensurable</p> <p>不明推论式结构 abductive structure(10)</p> <p>不确定次博弈 infinite times games(8)</p> <p>不透明性 intransparency(10)</p> <p>不完备信息 incomplete information(8)</p> <p>不完善信息 imperfect information(8)</p> <p>不在场(缺席) absent, absence</p> <p>部落社会 tribal society</p>
---	--

* 对于较不常见的术语或较具个人特色的用词,括号内数字标示书中出现章节,人名为首先使用者或主要使用者。——译者注





C

参数性互赖 parametric interdependence(8)

参与观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参照框架 frame of reference

参照群体 reference group

残障 disability

操作化 operationalization

操作原则 performance principle(5, 马尔库塞)

草根运动(基层社会运动) grassroots movements

测不准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

策略结构 strategic structure(8)

策略情境 strategic situation(8)

策略生成原则 strategy-generating principle(13, 布迪厄)

策略性互赖 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8)

差异 difference(16, 德里达)

差异哲学 philosophy of difference(16)

差异政治 politics of difference

常识世界 commonsense world(10)

常规化 regularization

常态科学 normal science(托马斯·库恩)

常人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

长时段 longue durée, long term(14)

场景 setting(3)

场域 field(布迪厄)

超级摹拟 hypersimulation(16, 布希亚)

超级现实 hyperreality(布希亚)

超我 superego(5)

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ts

超有机体的 superorganic(4)

沉默的大多数 silent majorities

臣民 subjects

臣属(者) subaltern(9, 14)

承认政治 politics of recognition(12)

成就 accomplishment(3, 加芬克尔)

城邦 polis(1)

城市国家 city-states(14)

持存 protentions(10, 舒茨)

冲突社会学 conflict sociology

重复博弈 repeated games(8)

除魅 disenchantment

处在现代的现在 modern present(13, 齐美尔)

纯粹策略 pure strategies(8)

传递性 transitivity(8)

此在 Dasein(10)

次生越轨 secondary deviance

刺激 stimulus

初级社会化 primary socialization

初阶构造 first order constructs(10, 舒茨)

初民社会 primitive societies(9)

存在 Sein, Being(10)

存在现象学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10, 那坦森)

存在之巨链 Great Chain of Being(1, 11, 洛夫乔伊)

D

达达主义 Dadaism

达鹄 goal-attainment(帕森斯)

大都市 metropolis(14)

(纳粹)大屠杀 Holocaust

大众传媒 mass media

大众观察运动 Mass Observation movement

- (13)
- 大众社会 mass society
- 大众文化 mass culture
- 大众消费(大众消费主义) mass consumerism
- 单次博弈 one-shot games(8)
- 单位行动 unit action(帕森斯)
- 单位行动链 chains of unit actions(帕森斯)
- 单线进化论 unilinear evolutionism
- 单一因果关系 monocausality
- 单元论 singularism
- 单子 monad
- 单子似的 monadic
-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 学派)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13)
- 当前史 history of the present
- 道德密度 moral density(15, 涂尔干)
- 道德民族志 moral ethnography(7, 登钦)
- 道德认同 moral commitments
- 道德哲学家 moral philosophers
- 德性 virtue
- 等级秩序 hierarchy
- 抵抗叙事 resisting narratives(7)
- 底层阶级 underclass
- 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格尔兹)
- 地球村 global village(3, 15)
- 地位 status
- 地位过渡 status passages(7)
- 第二波女性主义 second-wave feminism
- 第二性 second sex(波芙娃)
- 电脑空间 cyberspace(15)
- 电脑文化 cyberculture(13)
- 电视自我 TV self(15)
- 电子人 cyborg(13, 17)
- 动机 motive
- 都市化 urbanization
- 独特性推理 idiographic reasoning(18)
- 短语结构语法
phrase-structure grammar(6, 乔姆斯基)
- 断片(性)fragments / fragmentary /
fragmentariness(13, 齐美尔, 本雅明)
- 对偶组织 dual organization
(6, 列维-斯特劳斯)
- 对象关系性 object-relational(5, 11)
- 对象投入 object-cathexis(5)
- 多重均衡 multiple equilibria(8)
- 多用户领域 Multi-User Domains
(MUDs, 13)
- 多元化 pluralization
- 多元文化处境 multicultural condition
- 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 多元性 plurality
- E
- 俄狄浦斯困境 Oedipus dilemma
- 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
- 二重性 duality
- 二阶构造 second order constructs(10, 舒茨)
- 二元论 dualism
- F
- 发展 development
- 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 法团资本主义 corporate capitalism
- 法则性推理 nomothetic reasoning(18)
- 凡俗 profane



- 反功能 dysfunction
 反人本主义 anti-humanist
 反实证主义 anti-positivist
 反思性 reflexivity
 反思性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吉登斯、贝
 克、拉什)
 反犹太主义 anti-Semitism
 反直觉后果 counter-intuitive outcomes(15)
 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10)
 反自然主义者 anti-naturalists
 泛神论 pantheism
 范式 paradigm
 方法丛 Methodenbündel, methods-bundle
 (10, 格拉霍夫)
 方法论二元主义者 methodological dualists
 方法论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
 ism
 方法论之争 Methodenstreit(2, 18)
 方法论主观主义
 methodological subjectivism(10, 格拉霍夫)
 非合作博弈 non-cooperative games(8)
 非理性主义 irrationalism
 非连续性逻辑
 logics of discontinuity(14, 吉登斯)
 非零和博弈 nonzero-sum games(8)
 非同源性 nonidentity(13, 18)
 非洲中心主义 Afrocentrism
 肥皂剧 soap opera
 分化 differentiation
 分权(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
 分析实在论 analytic realism
 分析哲学 analytic philosophy
 分析中断 analytic interruptus(7, 洛夫兰德)
 风险 risk(贝克、道格拉斯)
 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贝克)
 封建主义 feudalism
 否定辩证法 negative dialectics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s
 福利主义的 welfarist
 福特制(福特主义) Fordism
 符号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符号界 symbolic order, the symbolic(拉康)
 符号学 semiotics, semiology
 符号域 the semiotic(克里斯蒂娃)
 符号域合奏 semiotic chora(克里斯蒂娃)
 符号支配 symbolic domination
 符号资本 symbolic capital(布迪厄)
 符码 codes
 父亲之法 Law of the Father(5, 6, 拉康)
 父权制(男权制) patriarchy
 负功能 negative function
 复杂性 complexity(4, 卢曼)
- G
- 概念图式 conceptual schema
 干预主义的 interventionist
 高度现代性 high modernity
 高雅文化 high culture
 格局 constellations(13, 本雅明)
 革命性科学
 revolutionary science(托马斯·库恩)
 个案研究 case study
 个体成就指数 individual achievement
 score(8)
 个体主义(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崇拜 cult of individualism
 根基关联

- rhizomatic connection(6,德勒兹与瓜达里)
- 工匠 bricoleur(9,列维—斯特劳斯)
- 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 reason(哈贝马斯)
- 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ism
- 工联主义 trade unionism
- 工业社会 industrial society
- 工业主义 industrialism
- 公共道德 public morality
- 公共话语 public discourse(18)
- 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 公共民族志 public ethnography(7)
- 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8)
- 公民 citizen
- 公民权(身份、地位) citizenship
- 公民宗教 civil religion
- 公意 general will(1,卢梭)
- 宫廷理性 courtly rationality(14,埃利亚斯)
- 宫廷社会 court society
- 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 功利主义两难困境 utilitarian dilemma(3)
- 功能 function
- 功能必备项 functional imperatives
- 功能闭合 functional closure
- 功能分化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 功能互赖 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
- 功能说明 functional explanation
- 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
- 拱廊街计划 Arcades Project(13,本雅明)
- 共同体 Gemeinschaft(滕尼斯), community
- 共同在场 co-presence
- 共同知识 common knowledge(8)
- 共和国家主义 republican nationalism
- 共和主义 republicanism
- 共谋关系 complicity(13)
- 共生(的) symbiosis / symbiotic
- 共时性的 synchronic
- 共识整合 consensual integration
- 共现关系 appresentational relations(10)
- 贡赋 tribute(14)
- 沟通 communication
- 沟通理性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哈贝马斯)
- 沟通行动 communicative action(哈贝马斯)
- 沟通性身体 communicative body(10, 奥尼尔)
- 构成性活动 constitutive activity(10)
- 古典自由主义 classical liberalism
- 古拉格
Gulag(喻指现代极权体制;精神奴役与改造)
- 观念学派 ideologues, ideologists
- 关键词 keywords(雷蒙·威廉斯)
- 关联关系 associative relations(6)
- 关系性思维 relational thinking
- 关系主义 relationism
- 关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ty
- 关注性互动 focused interaction(3,戈夫曼)
- 惯习 habitus(布迪厄)
- 广岛 Hiroshima(喻指原子弹、核战争)
- 规范 norm
- 规范性规则 normative rules(3)
- 规范整合 normative integration
- 规范秩序 normative order
- 归纳推理 inductive inference
- 归纳主义 inductivism



- 国家社会主义的 state socialist
 国家主义 nationalism
 国家资本主义 state capitalism
 国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 H
- 含混 ambivalence / ambivalent(16)
 涵括 inclusion(4)
 合成效应 compositional effects(8)
 合法化 legitimation
 合法化危机 legitimation crisis(哈贝马斯)
 合法性 legitimacy
 合法秩序 legitimate orders
 合作博弈 cooperative games(8)
 核 the core(8)
 核心关注 focal points(8)
 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ies
 核心社会 core societies(14)
 核心行动者 focal actor(8)
 和平主义 pacifism
 痕迹系统 economy of traces(16,德里达)
 宏大理论 grand theory
 宏大叙事 grand / great narrative(利奥塔)
 后代 successors(10,舒茨)
 后福特主义(福特制)经济
 post-Fordist economy
 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后凯恩斯主义的 post-Keynesian
 后实证主义的 post-positivist
 后台 backstage(3,戈夫曼)
 后台区域 back regions(7,戈夫曼)
 后现代化 post modernization
 后现代社会学 postmodern sociology
 后现代性 postmodernity
- 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后形而上学的 post-metaphysical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蝴蝶效应 butterfly effect(15)
 互动 interaction
 互动仪式(链)
 interaction rituals(chain)(3,柯林斯)
 互动秩序 interaction order
 互赖行动 interdependent actions(8)
 互为文本性(文本际性) intertextuality
 华而不实的社会学
 decorative sociology(17,布赖恩·特纳)
 化约论 reductionism(8)
 话语 discourse
 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话语形态 discursive formation(福柯)
 话语意识 discursive consciousness
 (3,吉登斯)
 怀旧(恋乡、乡愁) nostalgia
 环保主义 environmentalism
 环节社会 segmentary societies
 还原 reduction(10)
 换喻的(转喻的) metonymic(6)
 幻想 fantasy(5)
 幻象 phantasms
 荒诞 absurd
 回归 regression(5,8)
 混沌 chaos(15)
 混沌行为 chaotic behavior(8)
 混合策略 mixed strategies(8)
 活生生的身体
 lived body(10,梅洛—庞蒂,奥尼尔)
 货币经济 money economy(齐美尔)
 货币哲学 philosophy of money(齐美尔)
 霍屯督人 Hottentots(11)

J

- 激进民主 radical democracy
- 激进女同性恋者 Radicalesbian(11)
- 激进人类学 radical anthropology
- 激进生态主义 radical ecologism(17)
- 激进想像界
the radical imaginary(5, 卡斯托里亚迪)
- 激进主义 radicalism
- 基本压抑 basic repression(5, 马尔库塞)
- 基础结构(经济基础) infrastructure
- 基础主义的 foundationalist
- 基要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 fundamentalist
- 机会 opportunities(8)
- 机械复制时代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13, 本雅明)
- 机械团结 mechanic solidarity(涂尔干)
- 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 集权(中心化) centralization
- 集体表现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 集体欢腾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涂尔干)
- 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15, 哈布瓦赫)
- 集体良知 collective conscience(涂尔干)
- 集体行动 collective action(8)
- 集体意识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 集体原型 collective archetypes(9, 荣格)
- 集体主义的 collectivist
-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技术文化 technoculture(13)
- 即时性时间 instantaneous time(15)
- 纪律 discipline(福柯)
- 纪律实践 disciplinary practices(福柯)
- 记号 sign(6)
- 记忆 memory
- 家户 household
- 家庭 family
- 家庭暴力 domestic violence
- 价值关联 Wertbeziehung, value-reference(2)
- 价值关系 value-relation(2)
- 价值理性 value rationality
- 价值判断 value judgments(2)
- 价值取向 value-orientations
- 价值无涉 value-free/freedom
- 价值一般化 value-generalization(4)
- 监禁社会 carceral society(14, 17, 福柯)
- 监控 surveillance
- 检验 testing(2)
- 建构 construction
- 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 交互性 reciprocity
- 交换理论 exchange theory
- 阶级 class
- 阶级斗争 class struggle
- 阶级分化社会 class-divided society
(15, 吉登斯)
- 阶级社会 class society
-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 接受理论 reception theory
- 结构 structure
- 结构二重性 duality of structure(3, 吉登斯)
- 结构功能主义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 结构化理论 structuration theory(吉登斯)
- 结构人类学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 结构史 histoire structurale(14, 布劳代尔)
- 结构因果性 structural causality(13, 阿尔都塞)
- 结构语言学 structural linguistics



- 结构整合** structural integration
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解放 emancipation
解放旨趣 emancipatory interest
 (2, 哈贝马斯)
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
解释 interpretation
解释社会学
 verstehende Soziologie,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解释性理解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8, 韦伯)
解释学 hermeneutics
解释学本体论
 hermeneutic ontology(17, 瓦蒂莫)
解释者 interpreter(鲍曼)
禁忌 taboo
禁止 prohibition(5)
进步 progress
进化 evolution
进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8)
进化性博弈 evolutionary game(8)
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精英 elite
经验社会学 empirical sociology
经验视界 horizons of experience
经验主义 empiricism
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
景观 spectacle(15)
景观社会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5)
镜像 mirror image(5, 拉康)
镜像阶段 mirror stage/phase(拉康)
镜中自我 looking glass self(7, 库利)
酒神仪式 Dionysiac ritual(9, 尼采)
救赎 redemption(18)
局势 conjuncture
局势史 histoire conjoncturelle(14, 布劳代尔)
句法 syntax
聚合关系 paradigmatic relations(6)
剧本 scripts(7)
绝对价值 absolute values
绝对精神 absolute mind
绝对同一性 absolute identity
绝对主义国家 absolutist state
绝望 despair
决定性时刻 fateful moments(3, 吉登斯)
角色 role
角色扮演 role-taking
角色距离 role distance
角色期待 role expectations
军事社会 militant society(1, 斯宾塞)
均衡 equilibria / equilibrium
均衡路径 equilibrium path(8)
均衡选择 equilibrium selection(8)

K
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
考古学 archeology
科层化 bureaucratization
科层制 bureaucracy
科层组织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科学社会学 sociology of science
科学实践 scientific practice(6, 阿尔都塞)
科学主义 scientism
可逆时间 reversible time(15)
可说明性 accountability(3, 加芬克尔)
可修补的人 prosthetic man(10)

克里斯玛 charisma
 客观主义 objectivism
 客体化(对象化) objectification
 客体文化(客观文化)
 objective culture(13, 齐美尔)
 客我 me(3)
 空间 space
 空间安排 spacing(15)
 空想社会主义 utopian socialism
 控制的辩证关系 dialectic of control
 (3, 吉登斯)
 控制论 cybernetic(4, 帕森斯)
 口传文化 oral culture
 口述传统 oral tradition
 口述史 oral history
 酷儿理论(怪异理论) queer theory(巴特勒)
 跨社会系统 intersocietal systems(15, 吉登斯)
 跨学科研究 interdisciplinarity
 快感 jouissance, enjoyment(6)
 快乐原则 pleasure principle(5)
 框架分析 frame analysis(戈夫曼)
 扩展博弈 extended game(8)
 扩展行动链
 extended chains of action(3, 帕森斯)

L

浪荡子 flâneur(13, 15, 齐美尔、本雅明)
 劳动 labor
 劳动剩余价值论 labor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老人统治 gerentocracy
 累加博弈 super games(8)

类型化 typification
 类型学说 theory of types(8, 豪尔绍尼)
 冷社会 cold societies(9, 列维—斯特劳斯)
 理解 understanding
 理论社会学 theoretical sociology
 理念型 ideal type(韦伯)
 理性 rationality, reason
 理性的狡计 cunning of reason(1, 黑格尔)
 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理性行动 rational action
 理性选择 rational choice
 理由 reason
 理智化的 intellectualized
 历时性的 diachronically(6)
 历史的终结 end of history(14, 福山)
 历史社会学 historical sociology
 历史性(历史) historicity(9, 14)
 历史主义 historicism
 利润 profit
 利他主义 altruism
 利维坦 Leviathan(1, 霍布斯)
 利益 interest
 利益群体 interest groups
 例行常规 routines
 例行化 routinization(吉登斯)
 例证 instance-confirmation
 立法者 legislator(鲍曼)
 立体主义 cubism
 力比多 libido
 力比多克制 libidinal renunciation(5)
 力比多理性 libidinal rationality(5)
 力比多系统 libidinal economy
 联盟 alliance(9)
 恋童风 pederasty(9, 福柯)
 量子社会 quantum society(15)

- 零和博弈 zero-sum games(8)
 留存 retention(10, 舒茨)
 垄断资本主义 monopoly capitalism
 路径依赖式的 path-dependent
 路径独立 path independence
 乱伦禁忌 incest prohibition
 伦理生活 ethical life, Sittlichkeit(1)
 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16, 德里达)
 逻辑经验主义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实证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原子论 logical atomism
 洛可可 Rococo
 虑己 self-regarding(8)
 虑他 other-regarding(8)
- M
- 马尔可夫模型 Marcov model(8)
 麦当劳化 McDonaldization(17, 里茨尔)
 满足因子 satisficers(8, 西蒙)
 矛盾 contradiction
 没有历史的人民
 peoples without history(9, 14)
 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1)
 美学 aesthetics
 美学化 aestheticization(13)
 蒙太奇 montage
 迷信 superstition
 弥散权力 diffuse power(14, 迈克尔·曼)
 绵延 durée(15)
 面对面互动 face-to-face interaction
 面向事实本身 Zu den Sachen selbst,
 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10)
 面子工夫 face-work(3, 戈夫曼)
 民德 mores(1, 孟德斯鸠)
- 民俗社会 folk society(15, 雷德菲尔德)
 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民族志 ethnography
 民族志超现实主义
 ethnographic surrealism(13, 克利福德)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铭刻 inscription
 模式变量 pattern variables(帕森斯)
 摹拟 simulations(布希亚)
 摹拟化 simulacrazation(瓦蒂莫)
 陌生人 stranger(舒茨、齐美尔)
 默含知识 implicit knowledge(10)
 母权制 matriarchy(9)
 母性女性主义 maternal feminism(11)
 目的论 teleology
- N
- 纳什方案 Nash Program(8)
 纳什均衡 Nash equilibrium(8)
 男流理论
 malestream theory(与主流 main-stream 相近)
 男权制(父权制) patriarchy
 男同性恋(男同志) gay
 男性特质 masculinity
 男性至上主义 masculinism
 内爆 implosion
 内部人类学 interior anthropology(13)
 内部殖民化 inner colonization(5, 哈贝马斯)
 内化 internalization
 内容 content
 内生的 endogenous

内生变量 endogenous variables(8)
 内在批判 immanent critique(18)
 内在时间 inner time(10)
 能指 signifier
 拟剧论 dramaturgy(戈夫曼)
 拟剧论的 dramaturgical
 拟人论 anthropomorphism(10)
 拟像 simulacrum / simulacra(布希亚)
 拟像秩序 orders of simulacra(16,布希亚)
 你们关系 thou relation(3,舒茨)
 逆喻 oxymoron(6)
 年鉴学派 Annales(14)
 凝聚作用 condensation(6)
 凝视 gaze(6)
 女同性恋(女同志) lesbian
 女性主义 feminism
 女性主义者 feminist
 女性特质 femininity
 女性特质主义者 femininist(12,巴特斯比)

O

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
 偶变性 contingency

P

帕累托均衡 Pareto equilibrium(8)
 配置性资源 allocative resources(14,吉登斯)
 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性主义 critical rationalism(1)
 偏好 preference(8)
 偏序 partial ordering(8)

品味 taste(布迪厄)
 平等 equity
 平等派(平均派) Levellers
 平行行动
 Parallellaktion, parallel action(10,勒克曼)
 普遍必备项 universal requisites(4,帕森斯)
 普遍法则 universal laws
 普遍理性 raison universelle, universal reason(10)
 普遍生活 general life(13,雷蒙·威廉斯)
 普遍语用学 universal pragmatics(18,哈贝马斯)
 普遍知识分子 universal intellectual(16)
 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普世教会 oecume
 谱系学 genealogy

Q

歧异 differends(16,利奥塔)
 启发性概念 sensitizing concepts(7)
 启蒙辩证法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启蒙哲人 philosophes
 启示宗教 revealed religion
 气韵(韵味、氛围) aura(13,本雅明)
 气韵之枯萎 shriveling of the aura(13,本雅明)
 (社会)契约论者 contractarians
 潜在的模式维持与张力调控(维模) latent pattern-maintenance and tension-management(帕森斯)
 前本我论的 pre-egological(10)
 前俄狄浦斯(阶段) pre-Oedipal
 前述谓的 pre-predicative(10)



- 前台 frontstage(3, 戈夫曼)
 前台区域 front regions(7, 戈夫曼)
 前意识 preconsciousness(5)
 欠发展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强纲领 strong program
 强纽带 strong ties(3)
 强迫性异性恋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11)
 亲属关系 kinship
 青年黑格尔派 Young Hegelians(18)
 情感 emotion
 情感工夫 emotion work(3,7)
 情感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13,15, 雷蒙·威廉斯)
 情节剧 melodrama
 情境 situation, context
 情境根植性
 Seinsverbundenheit, situational
 groundedness
 情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情境限定的创造性 situated creativity
 情境性 contextuality(3)
 囚徒困境博弈 prisoner's dilemma game(8)
 区隔 distinction(布迪厄)
 区域化 regionalization(15, 吉登斯)
 去拜物教化 defetishizing(18)
 去传统化 detraditionalization
 去常规化 deregularization
 去分化 dedifferentiation
 去合法化 delegitimation
 去殖民化 de-colonization
 权利 right
 权力 power
 权力的微观政治 micropolitics of power
 (福柯)
 权力容器 power-containers(15, 吉登斯)
 权力意志 will-to-power
 权威 authority
 权威性资源 authoritative resources
 (14, 吉登斯)
 权威主义 authoritarianism
 全局史
 histoire globale, global history(14, 布劳代尔)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全球时代 global age
 确定次博弈 finite times games(8)
 确定性 certainty

 R
 热社会 hot societies(9, 列维—斯特劳斯)
 人的科学 human sciences
 人工智能研究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人类学 anthropology
 人民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 humanism
 人种学 ethnology
 认识论 epistemology
 认识论断裂
 epistemological break(2,6, 巴什拉尔)
 认识论构型 epistemological configuration
 (6)
 认同作用 identification(5)
 认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认知秩序 cognitive order(3)
 日常偶遇 encounters

肉体女性主义 corporeal feminism

弱纲领 weak program

弱纽带 weak ties(3)

弱序 weak ordering(8)

S

商品 commodity

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

上位 superordination(6,齐美尔)

社会 Gesellschaft(滕尼斯), society

社会不平等 social inequality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

社会地位 social status

社会动力学 social dynamics

社会范畴 the social

社会分层 social stratification

社会分化 social differentiation

社会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

社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社会化成 sociation(3,齐美尔)

社会建构主义 social constructionism

社会结合 social cohesion

社会进化 social evolution

社会静力学 social statics

社会剧本 social script(3)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l

社会老年学 social gerontology

社会理论 social theory

社会流动 social mobility

社会面孔 social face(3,戈夫曼)

社会情境 social situation

社会人类学 social anthropology

社会生成 sociogenesis(14,埃利亚斯)

社会生活几何学

geometry of social life(6,齐美尔)

社会生物学 sociobiology

社会失序 social disorder

社会时间 social times(15)

社会事实 social facts

社会世界系 social worlds(7)

社会思想 social thought

社会他人 social other(7)

社会统合 social cohesion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社会位置 social position

社会文本 social texts(7)

社会问题 social problem

社会系统 social system

社会现象学 social phenomenology(10)

社会形态 social formation

社会形态学 social morphology(6)

社会型构 social(con)figuration(埃利亚斯)

社会性别 gender

社会性别化(社会性别塑造过程)

gendering

社会学 sociology

社会学极简主义者

sociological minimalist(3)

社会学理论 sociological theory

社会学美学 sociological aesthetics

(13,齐美尔)

社会学想像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米尔斯)

社会有机体 social organism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社会再生产 social reproduction(3)

- 社会整合 social integration
 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
 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
 社会追问 social question
 社会主义 socialism
 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
 社团物品 club goods(8)
 深层结构 deep structure(6)
 身体 body
 身体技术 technologies of the body(莫斯)
 身体社会学 sociology of the body(17)
 身体体现 embodiment
 身体体现社会学 sociology of embodiment
 (17)
 神创秩序 divinely created order(1)
 神话(迷思) myth
 神话学(神话体系) mythology
 神经(官能)症 neurosis(5)
 神圣 sacred
 神圣的帷幕 sacred canopy(伯格与勒克曼)
 神圣化 mystification
 生产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
 生产关系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生产力 productive forces
 生产之镜 mirror of production(16, 布希亚)
 生成语法 generative grammar(6)
 生存单元 survival unit(14, 埃利亚斯)
 生存美学
 aesthetics of existing / existence(6,
 16, 福柯)
 生活方式 life style
 生活关联
 Lebenszusammenhang, life-nexus(17)
 生活领域 spheres of life
 生活史研究 life history research(7)
 生活世界 Lebenswelt, life-world
 生活形式 forms of life(2)
 生机论 vitalism(13, 尼采、柏格森)
 生理性别 sex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
 sex-gender system(11, 12)
 生理性别化 sexualization
 生命 life(13, 齐美尔)
 生命体验 Erlebnis
 生平研究 biographical research
 生物决定论者 biological determinist(11)
 生物学主义 biologism(11)
 (职业)生涯 career
 声望 prestige
 声音 voice(7)
 剩余范畴 residual categories
 剩余价值 surplus value
 剩余压抑 surplus repression(5, 马尔库塞)
 圣母研究 Mariology(17)
 圣三一 holy trinity(社会学史上指经典社
 会学传统中的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
 失范 anomie(涂尔干)
 实践 practice, praxis
 实践逻辑 logic of practice(布迪厄)
 实践意识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3, 吉登斯)
 实时 real time(13)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实在论者 realist
 实证主义 positivism
 实证主义论争 Positivismusstreit(2)
 时间 time
 时间安排 timing(15)
 时间地理学 time-geography(3)
 时间性 temporality(15)

- 时空边界 time-space edges
(14, 15, 吉登斯)
- 时空社会学 time-space sociology(15)
- 时空伸延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3, 14, 15, 吉登斯)
- 时空压缩 time-space compression(15, 哈
维)
- 时尚 fashion
- 世纪末 fin-de-siècle
- 世界帝国 world-empires(14, 沃勒斯坦)
- 世界经济体 world-economy(14, 沃勒斯坦)
- 世界体系 world-system
- 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 世上的受苦人 wretched of the earth
(18, 法农)
- 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 市场社会主义 market socialism
- 市场资本主义 market capitalism
- 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bourgeois society
- 适应 adaptation(帕森斯)
- 适应性升级 adaptive upgrading(4, 帕森斯)
- 适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fittest(斯宾塞)
- 弑父 parricide
- 事件 event
- 事实性 facticity
- 视角变更 perspectival variations(10)
- 视角变异 perspectival modifications(10)
- 视角主义 perspectivism
- 视若无睹 seen but unnoticed(3)
- 视域 horizon(10)
- 试错法 trial and error
- 手段—目的理性 means-ends rationality
- 受众研究 audience research
- 书写 writing(16, 德里达)
- 数字时代 digital age(15)
- 数字文化 digital culture
- 双重偶变性 double contingency(4, 帕森斯)
- 双性倾向 bisexuality(12)
- 说明 explanation
- 司法整合 judicial integration(1)
- 私密关系的转型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吉登斯)
- 私有领域 private sphere
- 死亡驱力 death drives(5, 弗洛伊德)
- 随机性的 stochastic
- 索引性 indexicality(3, 加芬克尔)
- 所指 signified
- T
- 他者 Other, other
- 他者化 othering
- 他们关系 they relation(3, 舒茨)
- 泰勒制 Taylorism
- 太一 the One(6, 拉康)
- 谈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3)
- 谈话疗法 talking cure(5)
- 弹性积累 flexible accumulation(15, 哈维)
- 特殊意识形态
particular ideologies(12, 阿尔都塞)
- 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m(帕森斯)
- 特征函数 characteristic function(8)
- 替代过程 substitution(5)
- 天职 calling
- 田野调查 fieldwork
- 调和 accommodation(3)
- 铁笼 iron cage
- 通俗文化 popular culture
- 同时代人 contemporaries(3, 10, 舒茨)
- 同心圆 concentric ring(15)



- 同性恋(同志) homosexuality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
 lesbian feminism(11)
 同一化 saming(11)
 同一系统 economy of the same
 同一性 identity(13,18)
 同一论思维 identity thinking(16);
 identitarian thinking(18,阿多诺)
 同一性原则 identity-principle(13,阿多诺)
 同义反复(套套逻辑) tautology
 同质化 homogenization
 统握 apprehension(10)
 统一科学
 Einheitswissenschaft, unified science(2)
 投射 projection(5)
 图腾 totem
 图腾崇拜(图腾制度) totemism
 托马斯主义者 Thomists(18)
 脱离机制
 disembedding mechanisms(15,吉登斯)
-
- W
-
- 外部性 externalities(8)
 外生的 exogenous
 外生变量 exogenous variables(8)
 外生性 exogeneity(8)
 完备信息 complete information(8)
 完善均衡 perfect equilibrium(8)
 网络分析 network analysis(8)
 网络纽带 network ties(3)
 网络社会 network society(15)
 网络文化 Internet culture(13)
 微观政治 micropolitics(12,福柯)
 微小概念 mini-concepts(7)
- 微型体系 mini-systems(14,沃勒斯坦)
 唯名论者 nominalist
 唯实论者 realist
 唯我论 solipsism
 唯意愿论 voluntarism
 唯意愿行动 voluntaristic action(帕森斯)
 维也纳学派 Vienna Circle(2)
 未来学 futurology
 未完成的动物 unfinished animals(17,尼采)
 文本性 textuality(7)
 文化 culture
 文化的悲剧 tragedy of culture(1,齐美尔)
 文化分析 cultural analysis
 文化工业 cultural industry
 文化化的社会学 culturized sociology(13)
 文化科学 cultural sciences(2,13)
 文化全球主义 cultural globalism(17)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文化社会学
 cultural sociology; sociology of culture
 (13)
 文化相对主义 cultural relativism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文化政治 cultural politics
 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布迪厄)
 文化主义 culturalism(13)
 文明 civilization
 文明分析 civilizational analysis(14)
 文明复合体 civilizational complex
 (14,尼尔森)
 文明化进程 civilization process(埃利亚斯)
 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文字学 grammatology(德里达)

问题化 problematization
 问题域 problematics
 我们关系 we-relation/relationship
 (3,10,舒茨)
 我思 cogito
 乌托邦 utopia
 巫魅 enchantment(1)
 污名 stigma
 污名化 stigmatization
 无意识 unconsciousness
 无预判性 prejudgmentlessness(10)
 无预设性 presuppositionlessness(10)
 物化 reification
 物质密度 material density(15,涂尔干)
 误识 misrecognition

X

稀缺资源 scarce resources
 习得行为 learned behavior
 系统 system
 系统扭曲的沟通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
 (哈贝马斯)
 系统再生产 system reproduction
 系统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
 下位 subordination(6,齐美尔)
 先代 predecessors(3,10,舒茨)
 先锋派 avant-garde
 先验现象学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10)
 先验构成现象学
 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ve phe-
 nomenology(10)
 先验自我 transcendental ego(10)

现代化 modernization
 现代性 modernity
 现代主义 modernism
 现实原则 reality principle(5)
 现实界 real order, the real(拉康)
 现实主义 realism
 现象学 phenomenology
 现象学还原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10)
 现象学社会学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现象学运动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10)
 相对剥夺 relative deprivation
 相对主义 relativism
 相互交错的社会空间权力网络
 overlapping socio-spatial networks of
 power(14,迈克尔·曼)
 想像界 imaginary order, the imaginary
 (拉康)
 向死而生 being unto death(15,海德格尔)
 消费社会学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消费身体 consuming body(17,法尔克)
 消费主义 consumerism
 消费自我 consuming self(17)
 小对形 objet-petit-a, part-object(5,6,拉康)
 效用 utilities(8)
 协商 negotiation(8)
 协商秩序 negotiated order(7)
 写作策略 writing strategies(7)
 心理生成 psychogenesis(14,埃利亚斯)
 心理学 psychology
 心理主义 psychologism(13)
 心力内投 interjection(12)
 心力依附 anaclitic(11)
 心身并行论 parallelism(17,斯宾诺莎)

身心二元论

dualism of mind and body; mind /
body division
心态 mentalities
心物同型论 isomorphism
新功能主义 neo-functionalism
新古典经济学 neoclassic economics
新教伦理 Protestant ethics
新康德主义 neo-Kantian
新石器悖论
Neolithic paradox(6, 列维—斯特劳斯)
新韦伯主义者 neo-Weberian
新殖民依附 neo-colonial dependency(14)
信任 trust
信息社会 informational society
行动 action, agency
行动位 actants(6, 格雷马斯)
行动者 actor, agent
行为 behavior, act, conduct
行为心理学 behavior psychology
行为主义 behaviorism
行政操纵化社会 administered society(18)
型构 configuration
形式 form
形式化 formalization
形式逻辑 formal logic
形式命题 formal propositions
形式社会学 formal sociology
形式主义 formalism
性本性 sexuality(福柯)
性别研究 gender studies
性别政治 gender politics
性偏好 sexual preference
性情倾向 disposition(布迪厄)
性驱力 sexual drives(5)

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性学 sexology
性政治 sexual politics
修辞 rhetorics(7)
虚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
虚假总体化 false totalization
虚拟共同体 virtual communities(13)
虚拟文化 virtual culture(13)
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13, 15)
虚无主义 nihilism
叙事 narrative
叙事组织 narrative organizations(7)
悬搁 suspension(10)
选择性亲和 elective affinity

Y

压抑 repression
亚文化 subculture
阉割 castration(5, 12)
言语 parole(索绪尔)
延异 différance(16, 德里达)
严格科学 rigorous science(10)
演绎主义的 deductivist
阳具(菲勒斯) phallus
阳具中心主义的 Phallogocentric
野蛮人 savages(9)
衣阿华学派 Iowa school(7)
依附 dependencia(14)
伊利诺斯学派 Illinois school(7)
一般化他人 generalized other
一般意识形态
ideology in general(12, 阿尔都塞)
一神论 monotheism
一元历史 unitary history

- 移置作用 displacement
- 仪轨 practice
- 异化 alienation
- 异化美学
aesthetic of *Verfremdung*(13, 布莱希特)
- 异性性 alterity(9)
- 异性恋 heterosexual
- 异性恋范型 heterosexual matrix(11, 巴特勒)
- 义素 semes(6, 格雷马斯)
- 意识流小说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
- 意识情景 awareness contexts(7)
- 意识形态 ideology
-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5, 阿尔都塞)
- 意识形态实践
ideological practice(6, 12, 阿尔都塞)
- 意识形态型态
ideological formations(6, 阿尔都塞)
- 意图动机 in-order-to motives(10, 舒茨)
- 意外后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s(3)
- 意向对象的(意向相关项的)
intended, noematic(10)
- 意向活动的 intending, noetic(10)
- 意向性 intentionality(10)
- 意义 meaning
- 议会自由主义 parliamentary liberalism
- 议会主权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 抑郁的主体 melancholy subjects(12, 巴特勒)
- 易性癖 transsexuality
- 阴道性高潮神话 myth of vaginal orgasm(11)
- 阴蒂 clitoris
- 阴茎 penis
- 因果法则 causal laws
- 因果关系 causality
- 因果性说明 causal explanation(8, 韦伯)
- 隐喻的 metaphoric(6)
- 印象风格 impressionistic qualities(13)
- 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7, 戈夫曼)
- 应变量 function(8)
- 应用社会学 applied sociology
- 庸碌之气 philistinism(18)
- 庸碌之徒 philistine(18, 阿伦特)
- 永恒斗争 perpetual struggle(尼采)
- 幽闭恐惧症的(恐幽症的) claustrophobic
- 游戏(博弈、局) game
- 有机团结 organic solidarity(涂尔干)
- 有限的符号意义域
finite symbolic provinces of meaning(10, 舒茨)
- 有限状态语法
finite-state grammar(6, 乔姆斯基)
- 有效性诉求
validity-claims; validity claims(哈贝马斯)
- 娱乐 entertainment
- 语言 langue(索绪尔)
- 语言学 linguistics
- 语言学转向 linguistic turn
- 语言游戏 linguistic games(2)
- 语言姿态 linguistic gestures(3, 米德)
- 欲望 desire
- 元理论 metatheory
- 元心理学的 metapsychological(5)
- 元语言 metalanguage
- 原初场景 Primal Scene(9, 弗洛伊德)

- 原初民 primitives(9)
 原初丧失 prime loss(5)
 原逻辑 Urlogik, proto-logic(10, 古尔维奇)
 原社会学 proto-sociology(10, 勒克曼)
 原始共产主义 primitive communism
 原物理学 protophysics(2)
 原因 cause
 原因动机 because motives(10, 舒茨)
 约定主义者 conventionalist(2)
 越界 transgression
- Z
- 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7)
 再现系统 economy of representation
 在场 presence
 在场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of presence(16, 德里达)
 在场可得性 presence-availability(15, 吉登斯)
 增权 empowerment
 占有性个人主义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1)
 哲学人类学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真理声言 truth claims
 真理体制 regimes of truth(16, 福柯)
 真理效应 truth effects; effects of truth
 (福柯)
 针锋相对策略 tit for tat strategies(8)
 震愕 shock(13, 本雅明)
 症候 symptoms
 症候合成人 sinthome(6, 拉康)
 整合 integration
 整体论的 holistic
 正常化 normalization / normalizing
- 正功能 positive function
 证实 verification
 证伪 falsification
 政治女同性恋主义 political lesbianism(11)
 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知识型 episteme(6, 16, 福柯)
 芝加哥学派 Chicago school
 支配 domination
 支配意志
 will-to-domination(13,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
 殖民主义 colonialism
 直观 intuition(10)
 直觉知识 intuitive knowledge(3)
 职业群体 occupational groups
 旨趣 interest(哈贝马斯)
 秩序 order
 制导机制 steering mechanisms(哈贝马斯)
 制度 institution
 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制度结构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制度约束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8)
 制度秩序 institutional orders
 治理 governance
 治疗国家 therapeutic state(10, 奥尼尔)
 置括(加括号) bracket
 置信度 degree of confidence
 质询 interpellation(5, 6, 阿尔都塞)
 致命理论 fatal theory(16, 布希亚)
 中层理论 middle-range theories
 中观结构 mesostructure(7)
 中介变量 intervening variables(8)
 终极价值 ultimate values
 终极目的 ultimate ends
 种系发育 phylogeny

- 周遭世界 surrounding world(10)
 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15, 吉登斯)
 专门化 specialization
 转换语法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6)
 资本 capital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资格能力 competence
 子系统 subsystem(4)
 自均衡 autopoiesis(4)
 自利驱力 egoistic drives
 自恋 narcissism
 自明 self-evident
 自然 nature
 自然法 natural law
 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自然时间 natural time(15)
 自然态度 natural attitude(10)
 自然主义 naturalism
 自为阶级 class-for-itself(15)
 自我 self, ego
 自我筹划 self-projection
 自我反思 self-reflection
 自我技术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17, 福柯)
 自我确证 self-authenticating
 自我认同 self-identity
 自我指涉 self-reference
 自我指涉性的 self-referential
 自相关 autocorrelation(8)
 自由 freedom, liberty
 自由联想 free association(5)
 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
 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s(18, 曼海姆)
- 自由主义 liberalism
 自在阶级 class-in-itself
 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钟点时间 clock-time(15)
 (样本)总体 population
 总体化 totalization
 总体受操纵社会
 totally administered society(1)
 总体性制度 total institution(7, 戈夫曼)
 种族中心主义的 ethnocentric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racism
 主导均衡 dominant equilibrium(8)
 主导叙事 master narratives(16, 利奥塔)
 主观主义 subjectivism
 主奴辩证法 master-slave dialectic
 主权 sovereignty
 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主体文化(主观文化)
 subjective culture(13, 齐美尔)
 主体中心理性 subject-centered reason
 主我 I(3)
 族外婚制的 exogamous(6)
 组合段(结构段) syntagms(6)
 组合关系 syntagmatic relations(6)
 组织、组织过程 organization
 最优状态 optimality(8)
 作为社会文本的历史
 history as sociotext(10, 奥尼尔)
 作为生物文本的历史
 history as biotext(10, 奥尼尔)
 作为文化的社会学 sociology as culture(13)

附录三 外中术语对照

A

- abductive structure 不明推论式结构
 abject others 卑贱的他者
 abjection 卑贱
 absent, absence 不在场(缺席)
 absolute identity 绝对同一性
 absolute mind 绝对精神
 absolute values 绝对价值
 absolutist state 绝对主义国家
 absurd 荒诞
 accommodation 调和
 accomplishment 成就
 accountability 可说明性
 actants 行动位
 action 行动
 actor 行动者
 act 行为
 adaptation 适应
 adaptive upgrading 适应性升级
 administered society 行政操纵化社会
 aesthetic of Verfremdung 异化美学
 aestheticization 美学化
 aesthetics of existing / existence 生存美学
 aesthetics 美学
 Afrocentrism 非洲中心主义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机械复制时代
 agency 行动
 agent 行动者
 alienation 异化
 alliance 联姻
 allocative resources 配置性资源
 alterity 异他性
 altruism 利他主义
 ambivalence / ambivalent 含混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国例外论
 anaclitic 心力依附
 analytic interruptus 分析中断
 analytic philosophy 分析哲学
 analytic realism 分析实在论
 annales 年鉴学派
 anomie 失范
 anthropology 人类学
 anthropomorphism 拟人论
 anti-humanist 反人本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反智主义
 anti-naturalists 反自然主义者
 anti-positivist 反实证主义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applied sociology 应用社会学
 apprehension 统握
 appresentational relations 共现关系
 Arcades Project 拱廊街计划
 archeology 考古学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人工智能研究
 associative relations 关联关系

audience research 受众研究
 aura 气韵(韵味、氛围)
 Auschwitz 奥斯维辛
 authenticity 本真性
 authoritarianism 权威主义
 authoritative resources 权威性资源
 authority 权威
 autocorrelation 自相关
 autopoiesis 自均衡
 avant-garde 先锋派
 awareness contexts 意识情景
 Azande 阿赞德人

B

back regions 后台区域
 backstage 后台
 baroque 巴洛克(巴罗克)
 basic repression 基本压抑
 because motives 原因动机
 behavior psychology 行为心理学
 behaviorism 行为主义
 behavior 行为
 being unto death 向死而生
 biographical research 生平研究
 biological determinist 生物决定论者
 biologism 生物学主义
 bisexuality 双性倾向
 body 身体
 bourgeois society 市民社会
 bracket 置括(加括号)
 bricoleur 工匠
 bureaucracy 科层制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科层组织
 bureaucratization 科层化

butterfly effect 蝴蝶效应

C

calling 天职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capital 资本
 carceral society 监禁社会
 career (职业)生涯
 case study 个案研究
 castration 阉割
 causal explanation 因果性说明
 causal laws 因果法则
 causality 因果关系
 cause 原因
 centralization 集权(中心化)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 学派)
 certainty 确定性
 chains of unit actions 单位行动链
 chaos 混沌
 chaotic behavior 混沌行为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特征函数
 charisma 克里斯玛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
 citizenship 公民权(身份、地位)
 citizen 公民
 city-states 城市国家
 civil religion 公民宗教
 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
 civilization process 文明化进程
 civilizational analysis 文明分析
 civilizational complex 文明复合体
 civilization 文明
 class consciousness 阶级意识



- class society 阶级社会
 class struggle 阶级斗争
 class-divided society 阶级分化社会
 class-for-itself 自为阶级
 classical liberalism 古典自由主义
 class-in-itself 自在阶级
 class 阶级
 claustrophobic 幽闭恐惧症的(恐幽症的)
 clitoris 阴蒂
 clock-time 钟点时间
 closure (系统)闭合
 club goods 社团物品
 codes 符码
 cogito 我思
 cognitive order 认知秩序
 cold societies 冷社会
 collective action 集体行动
 collective archetypes 集体原型
 collective conscience 集体良知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集体意识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集体欢腾
 collective memory 集体记忆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集体表现
 collectivist 集体主义的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commodity 商品
 common knowledge 共同知识
 commonsense world 常识世界
 communication 沟通
 communicative action 沟通行动
 communicative body 沟通性身体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沟通理性
 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义
 community 共同体
 competence 资格能力
 complete information 完备信息
 complexity 复杂性
 complicity 共谋关系
 compositional effects 合成效应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强迫性异性恋
 concentric ring 同心圈
 conceptual schema 概念图式
 condensation 凝聚作用
 conduct 行为
 configuration 型构
 conflict sociology 冲突社会学
 conjuncture 局势
 consensual integration 共识整合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constellations 格局
 constitutive activity 构成性活动
 construction 建构
 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
 consuming body 消费身体
 consuming self 消费自我
 contemporaries 同时代人
 content 内容
 contextuality 情境性
 contextualization 情境化
 context 情境
 contingency 偶变性
 contractarians (社会)契约论者
 contradiction 矛盾
 conventionalist 约定主义者
 conversation analysis 谈话分析
 cooperative games 合作博弈
 co-presence 共同在场
 core societies 核心社会

- corporate capitalism 法团资本主义
 corporeal feminism 肉体女性主义
 cosmopolitanism 世界主义
 counter-intuitive outcomes 反直觉后果
 court society 宫廷社会
 courtly rationality 宫廷理性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表现危机
 critical rationalism 批判理性主义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
 cubism 立体主义
 cult of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崇拜
 cultural analysis 文化分析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资本
 cultural globalism 文化全球主义
 cultural industry 文化工业
 cultural politics 文化政治
 cultural relativism 文化相对主义
 cultural sciences 文化科学
 cultural sociology; sociology of culture
 文化社会学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cultural turn 文化转向
 culturalism 文化主义
 culture 文化
 culturized sociology 文化化的社会学
 cunning of reason 理性的狡计
 cyberculture 电脑文化
 cybernetic 控制论
 cyberspace 电脑空间
 cyborg 电子人
- D
- Dadaism 达达主义
 Dasein 此在
 death drives 死亡驱力
 decentralization 分权(去中心化)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化
 deconstructionism 解构主义
 decorative sociology 华而不实的社会学
 dedifferentiation 去分化
 deductivist 演绎主义的
 deep structure 深层结构
 defetishizing 去拜物教化
 degree of confidence 置信度
 delegitimation 去合法化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
 dependencia 依附
 deregularization 去常规化
 desire 欲望
 despair 绝望
 detraditionalization 去传统化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欠发展的发展
 development 发展
 diachronically 历时性的
 dialectic of control 控制的辩证关系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启蒙辩证法
 difference 延异
 difference 差异
 differends 歧异
 differentiation 分化
 diffuse power 弥散权力
 digital age 数字时代
 digital culture 数字文化
 dionysiac ritual 酒神仪式
 disability 残障
 disciplinary practices 纪律实践
 discipline 纪律



- discourse analysis 话语分析
 discourse 话语
 discursive consciousness 话语意识
 discursive formation 话语形态
 disembedding mechanisms 脱离机制
 disenchantment 除魅(除魔)
 displacement 移置作用
 disposition 性情倾向
 distinction 区隔
 divinely created order 神创秩序
 domestic violence 家庭暴力
 dominant equilibrium 主导均衡
 domination 支配
 double contingency 双重偶变性
 dramaturgical 拟剧论的
 dramaturgy 拟剧论
 dual organization 对偶组织
 dualism of mind and body 心身二元论
 dualism 二元论
 duality of structure 结构二重性
 duality 二重性
 durée 绵延
 dysfunction 反功能
- E
- econometrics 计量经济学
 economy of representation 再现系统
 economy of the same 同一系统
 economy of traces 痕迹系统
 egoistic drives 自利驱力
 ego 自我
 eidetic reduction 本质还原
 einheitswissenschaft, unified science 统一科学
- elective affinity 选择性亲和
 elite 精英
 emancipation 解放
 emancipatory interest 解放旨趣
 embodiment 身体体现
 emotion work 情感工夫
 emotion 情感
 empirical sociology 经验社会学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empowerment 增权
 enchantment 巫魅
 encounters 日常偶遇
 encyclopedistes 百科全书派
 end of history 历史的终结
 endogenous variables 内生变量
 endogenous 内生的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entertainment 娱乐
 environmentalism 环保主义
 episteme 知识型
 epistemological break 认识论断裂
 epistemological configuration 认识论构型
 epistemology 认识论
 equilibria / equilibrium 均衡
 equilibrium path 均衡路径
 equilibrium selection 均衡选择
 equity 平等
 Erlangen School 爱尔兰根学派
 erlebnis 生命体验
 essence 本质
 essentialist 本质主义的
 ethnocentric 种族中心主义的
 ethnographic surrealism 民族志超现实主义
 ethnography 民族志
 ethnology 人种学

- ethnomethodology 常人方法学
Eurocentrism 欧洲中心主义
event 事件
evolutionary game 进化性博弈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 进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 进化
exchange theory 交换理论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存在现象学
exogamous 族外婚制的
exogeneity 外生性
exogenous variables 外生变量
exogenous 外生的
expert system 专家系统
explanation 说明
expressionism 表现主义
extended chains of action 扩展行动链
extended game 扩展博弈
externalities 外部性
- F
- face-to-face interaction 面对面互动
face-work 面子工夫
facticity 事实性
false consciousness 虚假意识
false totalization 虚假总体化
falsification 证伪
family 家庭
fantasy 幻想
fashion 时尚
fatal theory 致命理论
fateful moments 决定性时刻
feminist 女性特质主义者
femininity 女性特质
- feminism 女性主义
feminist 女性主义者
fetishism 拜物教
feudalism 封建主义
fieldwork 田野调查
field 场域
fin-de-siècle 世纪末
finite symbolic provinces of meaning 有限的符号意义域
finite times games 确定次博弈
finite-state grammar 有限状态语法
first order constructs 初阶构造
flâneur 浪荡子
flexible accumulation 弹性积累
focal actor 核心行动者
focal points 核心关注
focused interaction 关注性互动
folk society 民俗社会
Fordism 福特制(福特主义)
formal logic 形式逻辑
formal propositions 形式命题
formal sociology 形式社会学
formalism 形式主义
formalization 形式化
forms of life 生活形式
form 形式
foundationalist 基础主义的
fragments/fragmentary/fragmentariness 断片(性)
frame analysis 框架分析
frame of reference 参照框架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free association 自由联想
freedom 自由
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s



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
 front regions 前台区域
 frontstage 前台
 functional closure 功能闭合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功能分化
 functional explanation 功能说明
 functional imperatives 功能必备项
 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 功能互赖
 functionalism 功能主义
 function 功能
 function 应变量
 fundamentalist 基要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
 futurology 未来学

G

game theory 博弈论
 game 博弈(游戏、局)
 gay 男同性恋(男同志)
 gaze 凝视
 gemeinschaft 共同体
 gender politics 性别政治
 gender studies 性别研究
 gendering 社会性别化(社会性别塑造过程)
 gender 社会性别
 genealogy 谱系学
 general life 普遍生活
 general will 公意
 generalized other 一般化他人
 generative grammar 生成语法
 geometry of social life 社会生活几何学
 gerentocracy 老人统治
 gesellschaft, society 社会

global age 全球时代
 global village 地球村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goal-attainment 达鹄
 governance 治理
 grammatology 文字学
 grand / great narrative 宏大叙事
 grand theory 宏大理论
 grassroots movements
 草根运动(基层社会运动)
 Great Chain of Being 存在之巨链
 grounded theory 扎根理论
 Gulag 古拉格

H

habitus 惯习
 hermeneutic ontology 解释学本体论
 hermeneutics 解释学
 heterosexual matrix 异性恋范型
 heterosexual 异性恋
 hierarchy 等级秩序
 high culture 高雅文化
 high modernity 高度现代性
 Hiroshima 广岛
 histoire conjoncturelle 局势史
 histoire globale, global history 全局史
 histoire structurale 结构史
 historical sociology 历史社会学
 historicism 历史主义
 historicity 历史性(历史)
 history as biotext 作为生物文本的历史
 history as sociotext 作为社会文本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present 当前史
 holistic 整体论的

- Holocaust (纳粹)大屠杀
 holy trinity 圣三一
 homogenization 同质化
 homosexuality 同性恋(同志)
 horizons of experience 经验视界
 horizon 视域
 hot societies 热社会
 Hottentots 霍屯督人
 household 家户
 human sciences 人的科学
 humanism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
 hyperreality 超级现实
 hypersimulation 超级摹拟
- I
- I 主我
- ideal type 理念型
 identification 认同作用
 identitarian thinking 同一性思维
 identity politics 认同政治
 identity thinking 同一论思维
 identity-principle 同一性原则
 identity 同一性、认同
 ideological formations 意识形态型态
 ideological practice 意识形态实践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deologues, ideologists 观念学派
 ideology in general 一般意识形态
 ideology 意识形态
 idiographic reasoning 独特性推理
 id 本我
 Illinois school 伊利诺斯学派
 imaginary order 想像界
- immanent critique 内在批判
 imperfect information 不完善信息
 implicit knowledge 默会知识
 implosion 内爆
 impression management 印象管理
 impressionistic qualities 印象风格
 incest prohibition 乱伦禁忌
 inclusion 涵括
 incommensurable 不可通约
 incomplete information 不完备信息
 indexicality 索引性
 individual achievement score 个体成就指数
 individualism 个体主义(个人主义)
 inductive inference 归纳推理
 inductivism 归纳主义
 industrial society 工业社会
 industrialism 工业主义
 infinite times games 不确定次博弈
 informational society 信息社会
 infrastructure 基础结构(经济基础)
 inner colonization 内部殖民化
 inner time 内在时间
 in-order-to motives 意图动机
 inscription 铭刻
 instance-confirmation 例证
 instantaneous time 即时性时间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制度约束
 institutional orders 制度秩序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制度结构
 institutionalization 制度化
 institution 制度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 reason 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ism 工具主义
 integration 整合

I
 intellectualized 理智化的
 intentionality 意向性
 interaction order 互动秩序
 interaction rituals(chain) 互动仪式(链)
 interaction 互动
 interdependent actions 互赖行动
 interdisciplinary 跨学科研究
 interest groups 利益群体
 interest 利益、旨趣
 interior anthropology 内部人类学
 interjection 心力内投
 internalization 内化
 internet culture 网络文化
 interpellation 质询
 interpretation 解释
 interpreter 解释者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解释性理解
 intersocietal systems 跨社会系统
 intersubjectivity 主体间性
 intertextuality 互为文本性(文本际性)
 intervening variables 中介变量
 interventionist 干预主义的
 intransparency 不透明性
 intuition 直观
 intuitive knowledge 直觉知识
 invisible hand 看不见的手
 Iowa school 衣阿华学派
 iron cage 铁笼
 irrationalism 非理性主义
 isomorphism 心物同型论
J
 jouissance, enjoyment 快感
 juxtapose 并置

K

keywords 关键词
 kinship 亲属关系

L

labeling theory 标签理论
 labor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劳动剩余
 价值论
 labor 劳动
 langue 语言
 latent pattern-maintenance and
 tension- management
 潜在的模式维持与张力调控(维模)
 Law of the Father 父亲之法
 learned behavior 习得行为
 Lebenswelt, life-world 生活世界
 Lebenszusammenhang, life-nexus 生活
 关联
 Legislator 立法者
 Legitimacy 合法性
 legitimate orders 合法秩序
 legitimation crisis 合法化危机
 legitimation 合法化
 lesbian feminism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
 lesbian 女同性恋(女同志)
 levellers 平等派(平均派)
 Leviathan 利维坦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liberty 自由(权利)
 libidinal economy 力比多系统
 libidinal rationality 力比多理性
 libidinal renunciation 力比多克制

- libido 力比多
 life history research 生活史研究
 life style 生活方式
 life 生命
 linguistic games 语言游戏
 linguistic gestures 语言姿态
 linguistic turn 语言学转向
 linguistics 语言学
 lived body 活生生的身体
 local knowledge 地方性知识
 logic of practice 实践逻辑
 logical atomism 逻辑原子论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主义
 logics of discontinuity 非连续性逻辑
 logocentrism 逻各斯中心主义
 longue durée, long term 长时段
 looking glass self 镜中自我
- M**
- mainstream theory 男流理论
 Marcov model 马尔可夫模型
 marginal effects 边际效应
 marginalization 边缘化
 Mariology 圣母研究
 market capitalism 市场资本主义
 market socialism 市场社会主义
 masculinism 男性至上主义
 masculinity 男性特质
 mass consumerism 大众消费(大众消费主义)
 mass culture 大众文化
 mass media 大众传媒
 Mass Observation movement 大众观察运动
 mass society 大众社会
 master narratives 主导叙事
 master-slave dialectic 主奴辩证法
 material density 物质密度
 maternal feminism 母性女性主义
 matriarchy 母权制
 McDonaldization 麦当劳化
 meaning 意义
 means-ends rationality 手段一目的理性
 mechanic solidarity 机械团结
 melancholy subjects 抑郁的主体
 melodrama 情节剧
 memory 记忆
 mentalities 心态
 mesostructure 中观结构
 metalanguage 元语言
 metaphoric 隐喻的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在场的形而上学
 metapsychological 元心理学的
 metatheory 元理论
 methodenbündel, methods-bundle 方法丛
 methodenstreit 方法论之争
 methodological dualists 方法论二元主义者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方法论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subjectivism 方法论主观主义
 metonymic 换喻的(转喻的)
 metropolis 大都市
 me 客我
 micropolitics of power 权力的微观政治
 micropolitics 微观政治
 middle-range theories 中层理论
 milieu-world 背景世界
 militant society 军事社会

mind / body division 心身二元论
 mini-concepts 微小概念
 mini-systems 微型体系
 mirror image 镜像
 mirror of production 生产之镜
 mirror stage/phase 镜像阶段
 misrecognition 误识
 mixed strategies 混合策略
 mode of production 生产方式
 modern present 处在现代的现在
 modernism 现代主义
 modernity 现代性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moieties 半偶族
 monadic 单子似的
 monad 单子
 money economy 货币经济
 monocausality 单一因果关系
 monopoly capitalism 垄断资本主义
 monotheism 一神论
 montage 蒙太奇
 moral commitments 道德认同
 moral density 道德密度
 moral ethnography 道德民族志
 moral philosophers 道德哲学家
 mores 民德
 motive 动机
 multicultural condition 多元文化处境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multiple equilibria 多重均衡
 Multi-User Domains (MUDs) 多用户领域
 mystification 神圣化
 myth of vaginal orgasm 阴道性高潮神话
 mythology 神话学(神话体系)
 myth 神话(迷思)

N

narcissism 自恋
 narrative organizations 叙事组织
 narrative 叙事
 Nash equilibrium 纳什均衡
 Nash Program 纳什方案
 national identity 国族认同
 nationalism 国家主义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nation-state 民族国家
 natural attitude 自然态度
 natural law 自然法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
 natural time 自然时间
 naturalism 自然主义
 nature 自然
 negative dialectics 否定辩证法
 negative function 负功能
 negotiated order 协商秩序
 negotiation 协商
 neoclassic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
 neo-colonial dependency 新殖民依附
 neo-functionalism 新功能主义
 neo-Kantian 新康德主义
 Neolithic paradox 新石器悖论
 neo-Weberian 新韦伯主义者
 network analysis 网络分析
 network society 网络社会
 network ties 网络纽带
 neurosis 神经(官能)症
 nihilism 虚无主义
 noematic, intended
 意向对象的(意向相关项的)

noetic, intending 意向活动的
 nominalist 唯名论者
 nomothetic reasoning 法则性推理
 non-cooperative games 非合作博弈
 nonidentity 非同一性
 nonzero-sum games 非零和博弈
 normal science 常态科学
 normalization / normalizing 正常化
 normative integration 规范整合
 normative order 规范秩序
 normative rules 规范性规则
 norm 规范
 nostalgia 怀旧(恋乡、乡愁)
 nuclear families 核心家庭

O

object-cathexis 对象投入
 objectification 客体化(对象化)
 objective culture 客体文化(客观文化)
 objectivism 客观主义
 object-relational 对象关系性
 objet-petit-a, part-object 小对形
 occupational groups 职业群体
 oecume 普世教会
 Oedipus complex 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dilemma 俄狄浦斯困境
 one-shot games 单次博弈
 ontological frailty 本体性脆弱
 ontological security 本体性安全
 operationalization 操作化
 opportunities 机会
 optimality 最优状态
 oral culture 口传文化
 oral history 口述史

oral tradition 口述传统
 orders of simulacra 拟像秩序
 order 秩序
 organic solidarity 有机团结
 organization 组织、组织过程
 original self-activity 本原自我活动
 Other, other 他者
 Othering 他者化
 other-regarding 虑他
 overlapping socio-spatial networks of power
 相互交错的社会空间权力网络
 oxymoron 逆喻

P

Pacifism 和平主义
 Pantheism 泛神论
 paradigmatic relations 聚合关系
 paradigm 范式
 paradox / paradoxical(ly) 悖谬(的)
 Parallellaktion, parallel action 平行行动
 Parallelism 心身并行论
 parametric interdependence 参数性互赖
 Pareto equilibrium 帕累托均衡
 parliamentary liberalism 议会自由主义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议会主权
 parole 言语
 parricide 弑父
 partial ordering 偏序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参与观察
 particular ideologies 特殊意识形态
 particularism 特殊主义
 path independence 路径独立
 path-dependent 路径依赖式的
 pathologized 病理化



- patriarchy 父权制(男权制)
 patriarchy 男权制(父权制)
 pattern variables 模式变量
 pederasty 恋童风
 penis 阴茎
 peoples without history 没有历史的人民
 perfect equilibrium 完善均衡
 performance principle 操作原则
 peripheral dependency 边缘依附
 peripheral societies 边缘社会
 perpetual struggle 永恒斗争
 perspectival modifications 视角变异
 perspectival variations 视角变更
 perspectivism 视角主义
 Phallicentric 阳具中心主义的
 Phallus 阳具(菲勒斯)
 phantasms 幻象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现象学运动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现象学还原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现象学社会学
 phenomenology 现象学
 philistine 庸碌之徒
 philistinism 庸碌之气
 philosophes 启蒙哲人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哲学人类学
 philosophy of difference 差异哲学
 philosophy of money 货币哲学
 phrase-structure grammar 短语结构语法
 phylogeny 种系发育
 players 博弈者
 pleasure principle 快乐原则
 plurality 多元性
 pluralization 多元化
 polis 城邦
 political lesbianism 政治女同性恋主义
 politics of difference 差异政治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承认政治
 popular culture 通俗文化
 popular sovereignty 人民主权
 population (样本)总体
 positive function 正功能
 positivismusstreit 实证主义论争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占有性个人主义
 post modernization 后现代化
 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
 post-Fordist economy 后福特主义(福特制)经济
 post-Keynesian 后凯恩斯主义的
 post-metaphysical 后形而上学的
 postmodern sociology 后现代社会学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
 post-positivist 后实证主义的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power-containers 权力容器
 power 权力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实践意识
 practice 仪轨、实践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praxis 实践
 preconsciousness 前意识
 predecessors 先代
 pre-egological 前本我论的
 preference 偏好
 prejudgmentlessness 无预判性
 pre-Oedipal 前俄狄浦斯(阶段)
 pre-predicative 前述谓的

presence-availability 在场可得性
 presence 在场
 prestige 声望
 presuppositionlessness 无预设性
 primal Scene 原初场景
 primary socialization 初级社会化
 prime loss 原初丧失
 primitive communism 原始共产主义
 primitive societies 初民社会
 primitives 原初民
 prisoner's dilemma game 囚徒困境博弈
 private sphere 私有领域
 problematics 问题域
 problematization 问题化
 productive forces 生产力
 profane 凡俗
 profit 利润
 progress 进步
 prohibition 禁止
 projection 投射
 prosthetic man 可修补的人
 protentions 持存
 Protestant ethics 新教伦理
 Protophysics 原物理学
 proto-sociology 原社会学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psychogenesis 心理生成
 psychologism 心理主义
 psychology 心理学
 public discourse 公共话语
 public ethnography 公共民族志
 public goods 公共物品
 public morality 公共道德
 public sphere 公共领域
 pure strategies 纯粹策略

Q

quantum society 量子社会
 queer theory 酷儿理论(怪异理论)

R

racism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radical anthropology 激进人类学
 radical democracy 激进民主
 radical ecologism 激进生态主义
 Radicalesbian 激进女同性恋者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raison universelle, universal reason 普遍
 理性
 rational action 理性行动
 rational choice 理性选择
 rationality, reason 理性
 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
 real order 现实界
 real time 实时
 realism 现实主义
 realist 唯实论者、实在论者
 reality principle 现实原则
 reason 理由
 reception theory 接受理论
 reciprocity 交互性
 redemption 救赎
 reductionism 化约论
 reduction 还原
 reference group 参照群体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反思性现代化
 reflexivity 反思性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regimes of truth 真理体制
 regionalization 区域化
 regression 回归
 regularization 常规化
 reification 物化
 relational thinking 关系性思维
 relationism 关系主义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生产关系
 relative deprivation 相对剥夺
 relativism 相对主义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repeated games 重复博弈
 repression 压抑
 republican nationalism 共和国家主义
 republicanism 共和主义
 residual categories 剩余范畴
 resisting narratives 抵抗叙事
 retention 留存
 revealed religion 启示宗教
 reversible time 可逆时间
 revolutionary science 革命性科学
 rhetorics 修辞
 rhizomatic connection 根茎关联
 right 权利
 rigorous science 严格科学
 risk society 风险社会
 risk 风险
 Rococo 洛可可
 role distance 角色距离
 role expectations 角色期待
 role-taking 角色扮演
 role 角色
 routines 例行常规
 routinization 例行化

S

sacred canopy 神圣的帷幕
 sacred 神圣
 saming 同一化
 satisficers 满足因子
 savages 野蛮人
 scarce resources 稀缺资源
 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
 scientific practice 科学实践
 scientism 科学主义
 scripts 剧本
 second order constructs 二阶构造
 second sex 第二性
 secondary deviance 次生越轨
 second-wave feminism 第二波女性主义
 secularization 世俗化
 seen but unnoticed 视若无睹
 segmentary societies 环节社会
 Sein, Being 存在
 Seinsverbundenheit, situational groundedness 情境根植性
 self-authenticating 自我确证
 self-evident 自明
 self-identity 自我认同
 self-projection 自我筹划
 self-reference 自我指涉
 self-referential 自我指涉性的
 self-reflection 自我反思
 self-regarding 虑己
 self 自我
 semes 义素
 semiology 符号学
 semiotic chora 符号域合奏

- semiotics 符号学
- semi-peripheral 半边缘
- sensitizing concepts 启发性概念
- setting 场景
- sex-gender system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
体制
- sexology 性学
- sexual drives 性驱力
- 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
- sexual politics 性政治
- sexual preference 性偏好
- sexuality 性本性
- sexualization 生理性别化
- sex 生理性别
- shock 震愕
- shriveling of the aura 气韵之枯萎
- signified 所指
- signifier 能指
- sign 记号
- silent majorities 沉默的大多数
- simulacration 摹拟化
- simulacrum / simulacra 拟像
- simulations 摹拟
- singularism 单元论
- sinthome 症候合成人
- Sittlichkeit, ethical life 伦理生活
- situated creativity 情境限定的创造性
- situation 情境
- soap opera 肥皂剧
- social (con)figuration 社会型构
- social anthropology 社会人类学
- social cohesion 社会结合
- social cohesion 社会统合
- social constructionism 社会建构主义
- social control 社会控制
-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 social differentiation 社会分化
- social disorder 社会失序
- social dynamics 社会动力学
- social engineering 社会工程
- social evolution 社会进化
- social face 社会面孔
- social facts 社会事实
- social formation 社会形态
- social gerontology 社会老年学
- social inequality 社会不平等
- social integration 社会整合
- social justice 社会正义
- social mobility 社会流动
- social morphology 社会形态学
- social network 社会网络
- social order 社会秩序
- social organism 社会有机论
- social other 社会他人
- social phenomenology 社会现象学
- social position 社会位置
- social problem 社会问题
- social question 社会追问
- social relations 社会关系
- social reproduction 社会再生产
-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
- social script 社会剧本
- social situation 社会情境
- social statics 社会静力学
- social status 社会地位
- social stratification 社会分层
- social system 社会系统
- social texts 社会文本
- social theory 社会理论
- social thought 社会思想



- social times** 社会时间
social worlds 社会世界系
socialism 社会主义
socialization 社会化
sociation 社会化成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景观社会
sociobiology 社会生物学
sociogenesis 社会生成
sociolinguistics 社会语言学
sociological aesthetics 社会学美学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社会学想像力
sociological minimalist 社会学极简主义者
sociological theory 社会学理论
sociology as culture 作为文化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消费社会学
sociology of embodiment 身体体现社会学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ty
 关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science 科学社会学
sociology of the body 身体社会学
sociology 社会学
solipsism 唯我论
sovereignty 主权
space 空间
spacing 空间安排
specialization 专门化
spectacle 景观
spheres of life 生活领域
standardization 标准化
state capitalism 国家资本主义
state socialist 国家社会主义的
status passages 地位过渡
status 地位
steering mechanisms 制导机制
stigmatization 污名化
stigma 污名
stimulus 刺激
stochastic 随机性的
stranger 陌生人
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 策略性互赖
strategic situation 策略情境
strategic structure 策略结构
strategy-generating principle 策略生成原则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 意识流小说
strong program 强纲领
strong ties 强纽带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结构人类学
structural causality 结构因果性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结构功能主义
structural integration 结构整合
structural linguistics 结构语言学
structuralism 结构主义
structuration theory 结构化理论
structure of feeling 情感结构
structure 结构
subaltern 臣属(者)
subculture 亚文化
subject-centered reason 主体中心理性
subjective culture 主体文化(主观文化)
subjectivism 主观主义
subjects 臣民
subordination 下位
substitution 替代过程
subsystem 子系统
successors 后代
super games 累加博弈
superego 超我
superordination 上位
superorganic 超有机体的

superstition 迷信
 superstructure 上层建筑
 surface structure 表层结构
 surplus repression 剩余压抑
 surplus value 剩余价值
 surrealists 超现实主义
 surrounding world 周遭世界
 surveillance 监控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适者生存
 survival unit 生存单元
 suspension 悬搁
 symbiosis/symbiotic 共生(的)
 symbolic capital 符号资本
 symbolic domination 符号支配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order 符号界
 symbolic violence 符号暴力
 symptoms 症候
 synchronic 共时性的
 syntagmatic relations 组合关系
 syntagms 组合段(结构段)
 syntax 句法
 system integration 系统整合
 system reproduction 系统再生产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
 系统扭曲的沟通
 system 系统

T

taboo 禁忌
 talking cure 谈话疗法
 taste 品味
 tautology 同义反复(套套逻辑)
 taylorism 泰勒制

technoculture 技术文化
 technologies of the body 身体技术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自我技术
 teleology 目的论
 temporality 时间性
 testing 检验
 textuality 文本性
 the Bauhaus 包豪斯学派
 the core 核
 the game tree 博弈树
 the imaginary 想像界
 the One 太一
 the radical imaginary 激进想像界
 the real 现实界
 the semiotic 符号域
 the social 社会范畴
 the symbolic 符号界
 theoretical sociology 理论社会学
 theory of types 类型学说
 therapeutic state 治疗国家
 they relation 他们关系
 Thomists 托马斯主义者
 thou relation 你们关系
 time-geography 时间地理学
 time-space compression 时空压缩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时空伸延
 time-space edges 时空边界
 time-space sociology 时空社会学
 time 时间
 timing 时间安排
 tit for tat strategies 针锋相对策略
 total institution 总体性制度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totalization 总体化
 totally administered society 总体受操纵社会



■ totemism 图腾崇拜(图腾制度)
 totem 图腾
 trade unionism 工联主义
 tragedy of culture 文化的悲剧
 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ve phenomenology
 先验构成现象学
 transcendental ego 先验自我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先验现象学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私密关系的转型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转换语法
 transgression 越界
 transitivity 传递性
 transsexuality 易性癖
 trial and error 试错法
 tribal society 部落社会
 tribute 贡赋
 trust 信任
 truth claims 真理声明
 truth effects; effects of truth 真理效应
 TV self 电视自我
 typification 类型化

U

judicial integration 司法整合
 ultimate ends 终极目的
 ultimate values 终极价值
 uncertainty principle 测不准原理
 unconsciousness 无意识
 underclass 底层阶级
 understanding 理解
 unfinished animals 未完成的动物
 unilinear evolutionism 单线进化论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意外后果
 unit action 单位行动

unitary history 一元历史
 universal intellectual 普遍知识分子
 universal laws 普遍法则
 universal pragmatics 普遍语用学
 universal requisites 普遍必备项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
 urbanization 都市化
 Urlogik, proto-logic 原逻辑
 utilitarian dilemma 功利主义两难困境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utilities 效用
 utopian socialism 空想社会主义
 utopia 乌托邦

V

validity-claims; validity claims 有效性诉求
 value judgments 价值判断
 value rationality 价值理性
 value-free/freedom 价值无涉
 value-generalization 价值一般化
 value-orientations 价值取向
 value-relation 价值关系
 variables 变量
 verification 证实
 verstehende Soziologie, interpretative so-
 ciology 解释社会学
 Vienna Circle 维也纳学派
 virtual communities 虚拟共同体
 virtual culture 虚拟文化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virtue 德性
 vitalism 生机论
 voice 声音
 voluntarism 唯意愿论

voluntaristic action 唯意愿行动

W

weak ordering 弱序

weak program 弱纲领

weak ties 弱纽带

welfare states 福利国家

welfarist 福利主义的

we-relation/relationship 我们关系

Wertbeziehung, value-reference 价值关联

will-to-domination 支配意志

will-to-power 权力意志

world-economy 世界经济体

world-empires 世界帝国

world-system 世界体系

wretched of the earth 世上的受苦人

writing strategies 写作策略

writing 书写

Y

Young Hegelians 青年黑格尔派

Z

zero-sum games 零和博弈

Zu den Sachen selbst, 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面向实事本身



译者说明

一个人译这样一部指南，缺点不说大家也知道：要是对每一领域都有精到了解，肯定是自欺欺人；聊以自慰的是尽量保证专名统一。就前者而言，尤其有关现象学的一章，本人殊无把握，读者一定小心；全书有关女性主义的内容约 10 万字，译者作为男性，略知女性研究有关规矩，不免胆战心惊。就后者而言，书后三份详细对照系译者自行编制，供读者查考、批评、补充。外中术语对照虽显多余，也好让读者读其他文献时有所参照。

体例上，中译本倒置了原书的初版序与再版序，将原附于卷首的作者简介移至各章题头之下，并在其下加了分章目录，以便查考。原书各章体例不尽相同，注释、参考文献、深入阅读书目、致谢等或有或无，译本未作修改。英文本虽已是第二版，但仍有不少排印错误，我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添加了译者注。

其余所谓人物众多、流派庞杂、术语繁复、时间紧促、学识浅陋、诚惶诚恐、敬请指教等等，虽然是无数译后记的固定说辞，而且似乎这本书更有必要说，但我想既然敢于承担，勇于交稿，并且也竟然乐于拿钱，就是不必说也不该说的了。还是日日陪伴我的《英汉大词典》里，陆谷孙引用蒲伯的诗句说得好：“凡人多舛误，唯神能见宥”(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感谢世纪出版集团施宏俊先生几年来的支持。当初我向他允诺尽量开出原书所有文献的中文译本，并给出一定的取舍。但我很快发现这是一项“mission impossible”，非但超出一己之力，而且肯定得罪多多，只好半途放弃。坊间各类译著、译丛风起云涌，读者当有明鉴。

本书第 14 章原系数年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姚映然根据本书第一版译出，经该系教师李猛与我本人先后校对；后本人根据第二版作了校订和增补，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应星组织的《国外社会学》2001 年“历史社会学”专辑中刊出。今次仅做些许修改，不当之处完全由我负责。他们如今或远渡重洋，再做学生，或在海子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生活且战斗着，且让我遥致谢忱。

本书译稿未出版之前，我在给北大、清华的学生上课时“剽窃”了其中许多内容，自然是未作版权说明的了。但愿能很快有一天我没机会也没必要作这等事情。

2002 年 8 月 18 日

此次看清样,已是过了大半年。许多地方依然是雾里看花,只能尽量保持贴近原文,也好让读者揣测我可能的错误。当代社会理论众声喧哗,往往不免有走火入魔的嫌疑,更不乏唬人的把戏。不过就算我们不把这部“指南”太当真,先大致摸清地图的涵盖范围,地形分布,倒也不无益处。

回头来看自己的译文,翻译的痕迹实在很深。那些实在很西化的句子,是不能用“尽量精确”来为自己开脱的。最近读到的《余光中论翻译》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年的翻译实践和阅读已经在怎样的程度上改变了我的语言习惯乃至思维方式,也使我学到了许多原本就会后来忘却的表达方式。倘有机会,我愿意从头改起。

2003年5月24日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致谢	
第一编 基础	
第1章 社会理论的基础：起源与流变	
第2章 社会科学的哲学	
第二编 行动、行动者、系统	
第3章 关于行动与实践的各种理论	
第4章 系统理论与功能主义	
第5章 精神分析与社会理论	
第6章 结构主义	
第三编 社会分析与文化分析视角种种	
第7章 20世纪的符号互动论	
第8章 社会学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	
第9章 人类学与社会理论	
第10章 现象学与社会理论	
第11章 第二波女性主义	
第12章 已转型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第13章 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科学	
第四编 时间与空间视角种种	
第14章 历史社会学	
第15章 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	
第五编 社会理论的当代发展	
第16章 后现代社会理论	
第17章 普通身体社会学概述	
第六编 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	
第18章 社会理论与公共领域	
附录一 中外人名对照	
附录二 中外术语对照	
附录三 外中术语对照	
译者说明	